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通史·近代卷(下)



世界通史

第十二章 美国内战

第一节 内战的背景

(一) 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的美国经济

美国人民在 18 世纪下期通过独立战争推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但是英国统治阶级是不甘心失败的。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为了打击美国的经济力量，不断截击美国商船，破坏美国对欧洲的贸易。另一方面，美国资产阶级则利用英国在对法战争中的困难，想侵占英属加拿大。于是终于在 1812 年爆发了英美战争，战争进行到 1814 年，双方未分胜负，不得不停战讲和。史称这场战争为“第二次独立战争”。

19 世纪上期，美国通过不同的方式扩张了领土。1803 年从法国手中购买了路易斯安那，1811 年强占西班牙所属的佛罗里达西部，后来又在 1818 年强购佛罗里达东部。1845 年，美国合并了得克萨斯（这原来是墨西哥的领土），后来又通过侵墨战争（1846～1848 年）吞并了墨西哥的辽阔的领土（包括今天的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内华达、新墨西哥四州以及科罗拉多和怀俄明州的一部分）。同时，美国又在 1846 年以战争为威胁，从英国手中夺取了奥勒冈地区的一部分。最后，美国在 1867 年又从俄国手中购得阿拉斯加。

这样，到 19 世纪中叶，美国的领土已经扩展到太平洋沿岸。

随着领土向西扩张，也发生大规模的向西移民运动。这个移民运动在本质上就是对于土著居民印第安人的侵略，移民当局对印第安人所采取的政策是：无情地屠杀、剿灭及强占他们的土地。侥幸生存下来的印第安人，也被驱逐到西部山区不毛之地。

美国资本主义就是在对外实行贪得无厌的领土扩张及对国内的印第安人进行惨无人道的掠夺屠杀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美国工业资本主义大幅度发展，是 19 世纪 20 年代以后的事情。发展得最早的工业部门，就是棉纺织业，它早在 1814 年就开始采用机器，以后，机器逐步推广到其他工业部门。到 30 年代中期，在皮革制造业、羊毛织业、制铁业、玻璃工业、陶器制造业等部门中，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厂制度已经代替了手工业生产制度。到 40 年代末开始用机器制造机器，这标志了工业革命进入更高的阶段。工业革命的结果，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的提高，产量也因之大增。煤产量 1840 年为 200 万吨，到 1860 年达到 1400 余万吨。生铁产量 1840 年为 32 万吨，到 1860 年增至 92 万吨。铁路到 1860 年已经长达 4.5 万公里。到 1860 年，美国工业生产已占全世界第四位。

必须指出：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也加深了。工作日长达 10～14 小时，甚至童工每天也要劳动 10～13 小时。在大多数企业中都签订合同，强迫工人住在工厂的公共宿舍，一切必需品都要在工厂的商店里购买。工人欠债者极多。据 1833 年统计，因负债无力偿还而坐牢的每年有 7.5 万人。

因此，美国工人阶级很早就开始了反对资本家的斗争。1828 年发生的罢工，规模极大，在资产阶级中间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工人组织也纷纷出现，到 1860 年成立了“全国工人同盟”。

在工人运动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也开始在美国传播起来。在美国工人中间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是德国侨民约瑟夫·魏德迈。他一方面向工人阶级阐明了工人的独立的政治经济斗争的任务，另一方面和工人运动中各式各样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的思潮进行斗争，许多先进的工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资本主义在农业中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自从殖民地时代以来，在北方就开始形成了小农土地所有者阶级。到 19 世纪上期，伴随着美国领土向西部扩张，在西北地区也越来越多地产生小农阶级。小农经济的特点是：小农在自己的土地上，用自己的劳动进行生产，但是小农阶级并不是一帆风顺地生长起来的，而是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主要是通过“占地”形成的。“占地”开始于殖民地时代，一直继续到 19 世纪上期。从欧洲远渡重洋来到美洲的劳动人民，为了在这个“新世界”谋生，往往在政府权力达不到的边远地方自行“占地”，加以开垦，然后耕种。这些小农必须经常与前来驱逐他们的政府军队作坚决的斗争。“占地”是美国劳动人民与企图奴役他们的北美大地主阶级进行反抗斗争的一个方式，因而是革命行动。

到 19 世纪初，北方及西北部的小农经济仍旧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但是这种自然经济到 20 年代就开始瓦解，而越来越带有商品货币经济的性质。美国农民经济从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促成的：第一，东北地区进入工业革命后，工业区及城市对于农产品的需求激增。第二，交通运输的改善，特别是伊利运河的修成（1825 年），加强了东北工业区与西北农业区之间的经济联系。第三，工业革命的结果，农民愿意购买廉价的工业品，而为了购买工业品，不能不出卖自己的农产品。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农民阶级的分化和资本主义的产生。本来在小农中间就存在财产上的差别，而且有些农民还通过土地投机而积累一些财富。这些富裕农民便借助于对广大贫农的剥削而进一步致富，而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他们进行这种剥削提供更多的机会。于是少数富裕农民便把积累起来的财富转化为资本，雇用工人，扩大经营，因而一跃而成为农业资本家。然而在另一方面，广大贫农在富农的剥削及排挤下，走向破产了，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不得不要受雇于人，而变为农业工人。可见，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灾难分不开的。上述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所走的道路，列宁称之为“美国式道路”，以区别于“普鲁士道路”。

新兴的农业资本家所经营的农场，有的达到相当大的规模。如迈克尔·沙利文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家”，他在伊利诺斯州拥有 8 万英亩的土地，使用一二百名雇佣工人，饲养 5000 头牛羊。资本主义农场一般都采用机器和先进技术。19 世纪中叶，在美国农业中使用的机器有：草原碎土机、耕地机、播种机、收割机、割草机及打谷机等等。到 1855 年，蒸汽犁又试验成功。

资本主义大农场的出现及机器的采用，产生了显著的效果。农业产量大大提高，到 19 世纪中叶，旧西部的大城市芝加哥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谷仓了。

不过，工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只限于北方和西北方，美国南方经济是沿着另一条道路发展的。

在美国南方亚热带作物区，特别是在植棉区，存在着以黑人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种植场经济。这个种植场奴隶制经济在 19 世纪上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大，这主要与英国工业革命和美国北方工业化有很大关系。英国在工业

革命后，棉纺织业有了飞快的发展，美国北方也是如此，因之市场上对于棉花的需求大增。在这种情况下，生产棉花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业，因而经营棉花生产的南方种植场奴隶主便不断扩大经营范围，也不断购入新的奴隶以扩大棉花生产。

奴隶主之扩大生产，是靠残酷地剥削黑人奴隶来实现的。美国奴隶制度是一个非常野蛮的社会制度，它与英国及美国北方的工业资本主义经济有密切的联系，英国及美国北方纺织工厂的原料——棉花就是南方奴隶主供应的。从事奴隶贸易把从非洲运来的黑人奴隶卖给南方的也有许多北方大商人。因此，对于黑奴制度的罪恶，美国北方资产阶级也不能脱卸责任。

在种植场奴隶制度下面，奴隶主不仅对于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而且也对于直接生产者——黑人奴隶，拥有充分的所有权；他不但可以对奴隶施加肉体上的惩罚，而且还可以买卖他们，甚至杀死他们。在这一点上，美国南方奴隶制度与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度并无任何区别。

但是与古代奴隶制度不同，美国南方奴隶制度不但是资本家一手创造出来的，而且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为资本主义工业提供原料，是为资本主义经济服务的。也正是忠于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紧密联系，美国南方奴隶制度，比起古代的奴隶制度，带有更大的残酷性。种植场奴隶主为了赚钱，便从奴隶身上榨取每一滴血汗。黑人奴隶在监工的鞭打下劳动，被剥夺了一切自由，甚至建立家庭的权利也没有。在奴隶主的残酷役使下，奴隶往往劳动七八年，就活活累死。对此，奴隶主是毫不介意的，因为他们可以购买新的奴隶来补充。

在奴隶主的剥削及压迫下的黑人奴隶一再起来和他们进行斗争。奴隶起义，是与奴隶制度的存在相终始的。最著名的奴隶起义是 1831 年在弗吉尼亚爆发的纳特·特纳起义。但是这次起义被奴隶主用无情的手段镇压下去，起义者被淹没在血泊里。

南方奴隶制度也在北方广大人民中间引起了激烈的反对，他们强烈地要求废除这个野蛮的剥削制度。持有这种见解及主张并且为这个主张的实现而斗争的人，称为废奴主义者。他们从 19 世纪 20 年代末起就开展了一个废奴运动，其著名领袖有劳埃德·加里森、温德尔·菲立普斯及黑人弗列得里克·道格拉斯等人。参加废奴运动的有北方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黑人及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到处进行宣传鼓动的工作，要求消灭南方奴隶制度，把黑人从奴隶制枷锁下解放出来。废奴主义者还组织了所谓“地下铁道”，协助南方奴隶逃到北方“自由区”和加拿大。废奴主义者中间有许多人在反对奴隶制的斗争中表现了高贵的革命品质，并且为了这个高尚的事业而不惜付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奴隶主在北方的代理人千方百计地去迫害这些废奴战士，用殴打、突然袭击及卑劣的暗杀手段去对付他们。但是，这一切是吓不倒英勇的废奴战士的，他们不屈不挠地把这个运动坚持下去。

废奴运动是北方人民反对南方奴隶制度的运动，它在某种意义上是南北斗争的表现，但是南北之间的斗争，只是在 40 年代以后在争夺西部土地的问题上才空前尖锐化。

（二）西部土地问题与南北斗争的尖锐化

19 世纪上期，在美国领土向西扩张的过程中，在西部接二连三地成立了

新的州。但是每当建立新州之际，就发生在该州内容许或禁止奴隶制存在的斗争。北方资产阶级和农民主张在新州内禁止奴隶制存在，所以要求把新州确定为自由州。南方奴隶主力图把奴隶制扩大到西部去；所以主张把新州确定为奴隶州，亦即容许奴隶制存在的州。奴隶主之所以坚持这个主张，首先是与他们的统治欲分不开的。美国联邦众议院的代表是按各州的人口比例选出的，由于北方及西北部人口日益增长，南方奴隶主感到要想控制众议院是不可能的。为了维持自己在联邦政府中的统治地位，他们便把希望寄托在联邦参议院上面，因为参议院的代表，是不分人口多寡，各州都一律选出两名，只要增加奴隶州，就可以保证奴隶主在参议院中的统治地位。其次，到 19 世纪 40 年代以后，奴隶主增加奴隶州的要求，也是为种植场奴隶制经济的特点所决定的。这种经济是与土壤的迅速消耗分不开的，因为奴隶主在经营棉花时，由于资本主要用在奴隶及土地的购买上面，无力施用肥料，以致一片种植场在使用了几年之后，由于地力耗尽而不堪再用。奴隶主必须另找新的土地以便继续生产棉花，因之不断扩大奴隶制区域，就成了南方奴隶制经济的生存法则。如果限制奴隶制区域的扩大，奴隶制经济就有逐渐消亡的危险。

在另一方面，北方农民之所以要求增加自由州，是有政治经济背景的。在美国独立后不久，联邦政府就宣布西部土地为国有，同时还实行国有土地拍卖的政策。对此，北方农民是不满的，他们要求政府无代价地从国有土地中拨出小块土地分配给到西部去的每一个居民。换言之，他们要求实行《宅地法》。但是，在争取《宅地法》的斗争中，北方农民进一步认识到：光是争取《宅地法》是不够的，他们还必须反对奴隶制扩大到西部去，因为他们从过去的经验里看到：在容许奴隶制存在的地方，农民的小块土地是没有保障的，强大的种植场奴隶制经济或早或晚会把小农经济吞并掉。可见，农民要求在西部成立新的自由州，是与争取“宅地法”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

北方资产阶级希望把西部变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农业后方——为北方工业提供原料、粮食，并且购买北方工业品。在他们看来，只有发展农民经济，方能达到这个目的。这是北方资产阶级反对奴隶制扩大到西部及主张成立自由州的原因。

但是在 19 世纪上期争夺西部土地的斗争中，北方资产阶级最初一味向南方奴隶主让步妥协，这在 1820 年密苏里妥协案中表现得比较明显。1819 年以前，自由州与奴隶州数目相等，所以南北双方在参议院中的势力是平衡的。1819 年当密苏里即将成为新州时，该州奴隶制存废问题便关系到南方在参议院中的地位；所以，南方奴隶主疯狂地要求把密苏里确定为奴隶州。一连数月双方争执不下。1820 年 3 月，在几天暴风雨般的辩论之后，国会的北方代表终于让步了，国会通过了一个妥协案，它确定密苏里为奴隶州，同时从麻萨诸塞州分出一个新州——缅因州作为自由州。更重要的是，它还为尚未建州的西部广大土地划定了奴隶制与自由制的分界线——北纬 36 度 30 分以南为奴隶区域，以北为自由制区域。

但是南方奴隶主“得陇望蜀”，他们不满足于北方的这次让步，他们妄图把奴隶制扩充到整个西部土地上去。1854 年，当讨论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建州问题时，国会在奴隶主的压力下，通过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规定新州的奴隶制问题由该州的居民自己去决定，这就等于取消了“密苏里妥协案”所规定的分界线，并且把整个西部开放给奴隶制。奴隶主的打算是：在这个法案的掩护下，依靠武力去强迫新州居民接受奴隶制。因此，法案刚

一通过，奴隶主武装便冲进堪萨斯。当时从北方也赶到成千上万的农民，他们用英勇的斗争去回答奴隶主的强暴行为。结果，在堪萨斯发生了流血冲突，史称“堪萨斯内战”。这可以说是美国内战的前奏曲。

在堪萨斯内战中北方人民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的、英勇的战斗精神，使得南方奴隶主认识到“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并不可靠，到1857年他们又利用联邦最高法院作为扩张奴隶制的工具。这一年，最高法院通过了“得累德·斯科特判决案”，宣布：今后，奴隶无论被带到任何地方，都是“主人”的财产，这就是说，奴隶制度在全国一切地方都是合法的。因此，这个判决案激起了北方广大人民的反对和义愤，在北方出现了反对奴隶制的高潮，在这个高潮中，一位农民出身的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制定了一个通过武装斗争推翻南方奴隶制的计划。

1859年夏，约翰·布朗率领了一小队武装人员，来到了弗吉尼亚州，积极准备起义。这一年10月16日晚上，震动全国的起义爆发了。布朗的队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袭击了哈泼渡口，占领了当地的联邦军火库。

起义的消息很快地传开了，地方政府火速召集民兵，赶到出事地点。不久，海军陆战队也开来了。起义者被团团围住，他们英勇地坚守阵地，一再击退进攻者。但终因寡不敌众，起义失败了，布朗等人落到敌人手中。1859年12月2日，布朗等人昂然走上绞台，从容就义。在就义前，布朗在遗嘱里写道：“我，约翰·布朗，现在坚信这个罪恶的国土的罪恶，只有用鲜血才能洗净。我曾经自以为不用流很多的血，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但现在我认为这是徒劳无益的。”

但是，约翰·布朗起义的失败，并没有动摇北方人民打击奴隶制的决心，因为这时他们已经团结在一个强大的反奴隶制政党——共和党里面了。

共和党是在堪萨斯内战的反奴隶制的高潮中形成的。在南方奴隶主得寸进尺的进攻下，北方工业资产阶级放弃了过去的妥协让步的态度，决定与奴隶主进行坚决的斗争。为了与奴隶主作斗争，资产阶级感到有必要和人民群众建立联盟。这便是1854~1856年共和党形成的背景，共和党便是北方工业资产阶级领导的，有广大农民、工人和自由黑人积极参加的反对奴隶主的统一战线组织。美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毫不犹豫地支持共和党，并且号召工人站到共和党的旗帜下，为反对奴隶制度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但是，共和党一开始就出现两派：温和派反映了大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反对废除奴隶制度，只是主张把奴隶制限制在原有的奴隶州范围内，反对奴隶制扩张。急进派代表北方工业资产阶级中的革命集团的利益，他们反对奴隶制的态度比较坚决，主张无条件地废除奴隶制，实行有利于农民的《宅地法》，这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只有彻底消灭奴隶制度，和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美国资本主义才能畅通无阻地发展起来。

与共和党对立的是民主党。民主党代表南方奴隶主的利益，与南方奴隶主有经济联系的一部分北方资产阶级分子（如向奴隶主提供贷款的纽约大银行家、运输及推销南方棉花的北方大商人船主等等）也加入了民主党。

共和党在成立后不久，就参加了1856年的总统选举运动。虽然选举结果共和党失败了，但它信心百倍地准备参加1860年的大选活动。

1860年大选前夕，全国出现了革命形势。1857年的经济危机，把大多数工人推到失业的深渊。大批饥民在全国各地流浪，渴望得到西部小块土地。北方广大工人、农民都把南方奴隶制度看作是一切苦难的根源。因之到处是

一片用革命手段消灭奴隶制的呼声。在南方，奴隶的斗争席卷了各州，许多地方发生奴隶放火烧毁种植场仓库的事件。奴隶起义也是彼伏此起，层出不穷。1860年11月的总统选举就是在革命危机中举行的。

在竞选当中，共和党推选阿伯拉罕·林肯为总统候选人，并且提出了一个反奴隶制纲领。共和党在纲领中要求限制奴隶制的扩展，要求实行保护关税及实现《宅地法》。共和党把《宅地法》列入自己的纲领要求中，是为了争取西北地区的农民的拥护。它在奴隶制问题上的温和的态度，完全反映了右翼共和党人的立场。

选举的结果，共和党获胜，林肯当选为总统。林肯的当选，固然是由于资产阶级的支持，也是广大劳动人民拥护的结果。人民之所以拥护他，首先是因为希望他在当选后能实行关于《宅地法》的诺言；其次是因为他出身于劳动人民。林肯于1809年出生在西部边疆的农民家庭。他的青少年时代便是在边疆森林的艰苦贫困的环境中度过的。他自幼就参加体力劳动，饱尝辛酸，年岁稍长时又当过雇农、船夫，也在小店铺里当过伙计，后来又担任过乡村邮务员及土地测量员的助手。但是在参加政治活动后，他就成为资产阶级政治家，他的言论和行动，都代表了资产阶级的立场。

他反对奴隶制度，认为奴隶制度与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格格不入，并且阻碍了美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但是他并不是废奴主义者，他反对马上取消奴隶制度，反对干涉南方诸州现存的奴隶制度，他只是要求限制奴隶制向西部扩张。他认为如果把奴隶制度固定在原来的地区内而不让它进一步扩展，则它在一定的时期内会逐渐自行消灭的。他尤其反对暴力革命，反对用暴力手段去推翻南方奴隶制度。他在1856年说过：“不要弄错了，选票比子弹更有力量。”林肯在奴隶制问题上所持的这种温和的态度，反映了美国资产阶级对待奴隶制的妥协立场。北方资产阶级担心一旦用革命手段废除南方奴隶制度，他们本身的私有财产也将遇到威胁。也正是由于林肯在奴隶制问题上的温和态度，北方资产阶级才拥戴他为共和党候选人。

但是，林肯的当选对于南方奴隶制度是一个直接的威胁。林肯及共和党固然信誓旦旦地一再表示决不干涉南方奴隶制度，但是共和党在竞选纲领中明确地反对奴隶制的扩张，而且这也是林肯的一贯主张。根据美国宪法，总统享有很大的权力。因此，林肯在选举中的胜利，意味着反奴隶制扩张的纲领势在必行。换言之，林肯当选的结果，奴隶主把奴隶制扩大到西部去的希望完全破灭了。这样一来，南方奴隶制度及奴隶主的统治就面临崩溃的危险。奴隶主头子们也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路易斯安那的参议员朱达·本杰明曾很形象地说过：“你们（指共和党）说你们不打算进入我们州内，那末我们有什么可以埋怨的呢？你们不要求进入我们州内来用武力杀死或毁灭我们的制度，不是的。你们模仿拉达米斯塔斯（希腊神话中宙斯与尤罗巴所生之子）的教义，你们拥抱我们只不过是闷死我们。你们不打算把树砍掉；你们答应不这样做。你们只是打算剥去一圈树皮，于是树便死了。”

很明显，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在大选中的胜利，使得奴隶主的统治岌岌乎危殆万分。奴隶主是不愿坐以待亡的，他们决定作最后的挣扎，脱离联邦，举行叛乱。1861年2月4日，南方有七个州的代表集会于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宣布成立另外一个国家——“美利坚诸州联盟”。1861年4月，亦即林肯就任总统后不久，南方奴隶主叛乱集团悍然发动武装进攻，于是酝酿多年的内战终于爆发了。内战爆发后，南方又有四个州也参加了叛乱。

关于内战爆发的原因，马克思作了如下的科学分析：“当前南部与北部之间的斗争不是别的，而是两种社会制度即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这两种制度再也不能在北美大陆上一起和平相处。”

第二节 内战与奴隶的解放

（一）内战的第一阶段

南方奴隶主之所以敢于发动这一场内战，是由于他们对于局势作了主观片面的估计。首先他们认为北方缺乏军事人材，当时美国许多知名的将领都是奴隶主出身，他们在林肯当选总统以后，都纷纷南下参加叛乱。而且他们还以为北方对战争毫无准备，南方则早有充分的准备。实际上也的确如此，因为在1860年冬林肯在大选中获胜后，南方就通过其在北方的代理人布卡南总统把大批武器运往南方，并且积极组织和训练军队，同时还从欧洲购入大量武器弹药。其次，他们指望得到英国的援助。他们之仗恃外援，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手中握有一张王牌：棉花。他们看到：南方诸州是英法棉纺织工业的原料的主要供应者，一旦断绝这个供应，英法，首先是英国的棉花工业将在俄顷之间陷于停顿，这就必然迫使两国走上武装干涉的道路。南方的一个叛乱头目本杰明·希尔就得意忘形地吹嘘棉花的作用说：“我们所指的是那根小小的、细弱的棉线，一个小孩子可以弄断它，但是它却能够把世界绞死。”

但是，南方没有考虑到其他方面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是重要的因素）：第一，双方在物质力量上相差悬殊：北方有强大的工业，1860年，全国有107座纺纱厂，其中南方只有6座。北方诸州工业企业的资本已达8.5亿美元，而南方不过1.7亿美元。在北方，银行资本在1860年超过4亿美元，而南方只有2200万美元。北方有众多的人口，1860年北方人口为2234万人，南方只有910万人，其中400万是黑人。北方不论在人力或物力上，南方都是难望其项背的。第二，北方在政治上也处于比南方更为有利的地位。正义是在北方，北方人民同仇敌忾，充满了消灭叛乱者的决心。林肯政府可以指望得到北方广大人民的有力支持。相反地，在南方，奴隶主是失道寡助的，不仅400万黑人奴隶反对他们，并且白人中间的广大下层人民也反对他们，因为种植场奴隶主与南方小农之间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小农在政治上无权，在经济上受大奴隶主的排挤。

北方虽然在人力、物力及政治方面比南方优越得多，但是在内战第一阶段上，北方在军事上连遭失败。1861年7月在马纳萨斯一役，北军被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1862年北军虽然在西线取得一系列辉煌胜利，从南方手中夺取了几个战略据点，但是在东线却连遭失利。1862年夏的“半岛战役”以严重的失败而告终。一个时候南军乘胜北上，甚至直接威胁了首都华盛顿。

北方在军事上迭次失败，第一是由于林肯政府迟迟不肯实行解放奴隶的政策，林肯政府在内战的初期阶段进行战争的目的是恢复南北的统一，使南方重新回到联邦来，而不是为了废除南方奴隶制度。它之所以不肯触动奴隶制度，原因主要有二：首先，北方资产阶级认为奴隶是南方奴隶主手中的财产，如果废除奴隶制度解放奴隶，就等于破坏奴隶主的财产，这样一来，北方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也将受到威胁。其次，边境诸州也是奴隶州，但战争发生后有四个边境州仍留在联邦之内。以林肯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低估了边境奴隶州人民群众反对奴隶制的力量和决心，而担心宣布奴隶解放会推动边境奴隶州脱离联邦而投到南方叛乱者怀抱中去，这样一来就会失掉边境诸州这个重要的战略地区。为了安抚边境州的奴隶主，林肯政府不敢在奴隶制问题上采取大胆的步骤。由于北方政府不肯宣布解放奴隶，“使得奴隶制度由南

部的致命弱点变成了它的坚不可破的甲冑。由于有奴隶负担着所有的生产劳动，南部就可以把所有适于作战的人都投到战场了！”换言之，在客观上加强了敌人的力量。

第二，内战开始不久，北方自由黑人就热情洋溢地要求参军杀敌，要求为解放自己的南方同胞而战。但是都被林肯政府拒绝了。这就使得内战失去群众性质。林肯政府没有依靠黑人群众进行战争，也是北方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内战开始后，敌人的奸细在北方大肆活动，甚至北方政府及军队中也潜伏着南方的代理人。内战初期担任北方军队总司令的麦克雷伦将军就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他消极怠工，长期按兵不动，甚至帮助南方种植场主捕捉逃亡奴隶，镇压奴隶起义。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也很严重，他们到处煽动群众反对战争，动摇军心，同时，北方大资产阶级在战争中进行猖狂的投机活动，他们利用战争大发其不义之财。有的把劣等军火卖给政府，影响了军队的作战力量。还有不少丧心病狂的商人用物资供给敌人，以图厚利。但是北方政府对此熟视无睹，没有与这些不正当行为作坚决的斗争。这一切都削弱了北方的战斗力量。

总而言之，林肯所领导的北方资产阶级政府没有用革命方法进行战争，所以才招致了军事上的挫折。

在北方屡次败溃的情况下，人民群众的不满越来越甚，到 1862 年春夏之际，在北方出现了人民革命的高潮。人民群众到处开大会，举行游行，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早日宣布解放奴隶，武装黑人，清洗政府中的反革命分子及异己分子，并且严厉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他们还要求政府取缔奸商的非法牟利行为，对资本家征收重税，以充军费，要求军政当局采取更为坚决的军事行动，撤换颞顽无用的将领，以便扭转败局。一句话，群众要求用革命方法进行战争。

在 1862 年 7 月到 10 月间，在匹兹堡、欧斯维哥、米得尔顿、普拉特堡、费城、米尔沃基、伯尔根、辛辛那提、波士顿、芝加哥、纽约、希拉格斯以及其他许多城市都召开了盛大的群众集会，与会者常常达到上万人。这些群众大会在发言及决议中都表达出下面的要求：立即解放奴隶、征召黑人入伍，用坚决的军事手段迅速地粉碎叛乱等等。

《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了许许多多的人民来信，都要求尽快地、干净彻底地消灭奴隶制度。在有八个人署名的一封读者来信里写道：“2600 万或 2700 万北方和南方的自由劳动群众”迫切地主张用急进的手段解决奴隶制问题。在另一封来信里有这样的话：“人民群众热切地希望总统用沉着的、坚决的手段写出决定国家生存的语言：解放！”“全部重大责任是在你（指林肯）的身上。”

群众的请愿书也纷至沓来。有 8000 名妇女联名向林肯请愿，要求林肯采取坚决措施去尽快地打败叛乱者，以便使她们的当兵的亲人重返家园。

反映广大人民要求的急进派和废奴派也展开了积极活动。他们有的在公开讲演中批评政府，有的直接面见总统，敦促他接受人民的要求，实行解放奴隶及武装黑人的政策。1862 年 7 月 4 日，急进派领袖萨姆纳在会见林肯时告诉他说：他不但在北方需要更多的人帮助他，而且“在南方，在叛乱者的后方”也需要人们，亦即奴隶的帮助。萨姆纳认为，如果林肯决定宣布奴隶的解放，就会得到南方奴隶的帮助。另一位急进派领袖史蒂文斯在一次讲演

中提议把来复枪放到南方每一个黑人手中，以便让他们参加战斗。他说林肯太软弱，假如安得鲁·杰克逊（19世纪上期的美国一位总统）在世的话，他会解放奴隶和武装黑人的。“他会向奴隶制心脏进军，不是为了摘棉花，而是为了把武器放到每一个被解放者手中……我认为这个办法是我们武器库中最可怕的武器”。

这样，到1862年夏秋两季，北方已出现了这样的形势：“如果林肯不让步（但是他会让步的），就会来一个革命。”

林肯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当时他说：如果他“拒绝发表〔解放〕宣言的话，在北方会发生暴动。”因此他决定发表《解放宣言》。

同时，国际形势也逼使林肯迈出这一重大步骤。1862年夏，英国政府已准备武装干涉美国内战了。林肯理解到：为了粉碎英国的干涉计划，实行解放奴隶的政策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正如美国驻马德里大使舒尔茨在给本国政府的一封电报中所提出的，如果美国政府发表一项解放奴隶的宣言，“欧洲舆论马上会强烈地、一面倒地同情我们，以致……没有一个欧洲政府会敢于借宣言或行动置身于一个受举界谴责的制度那一方面的”。林肯更认识到：南方是靠奴隶劳动来维持生产的，而且由于有奴隶在后方从事生产劳动，南方叛乱当局才有可能把白人调到战场上作战，如果北方宣布解放南方奴隶的话，南方奴隶会成批成批地逃到北方来，这样一来不但可以瓦解南方的经济，而且可以利用逃亡黑人这支强大的战斗力量。一言以蔽之，林肯已痛切地感到：为了赢得战争，解放奴隶的行动，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

（二）过渡到革命战争阶段

1862年9月24日清晨，林肯终于发表了震动全世界的《解放宣言》，宣布从1863年1月1日起，叛乱诸州的奴隶全部获得自由。这一伟大举动，标志着美国内战进入了“以革命方式进行战争”的阶段。从此以后，解放奴隶成为北方作战的重要目标了。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这个《宣言》，称它是“在联邦成立以来的美国史上最重要的文件”，并且指出：由于发布了这个《宣言》，“在美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林肯必将与华盛顿齐名！”

但是必须看到：这个《宣言》也有很大的缺陷：第一，宣言中关于解放奴隶的规定没有应用到边境奴隶州，它没有触动边境奴隶州的奴隶制度，这里的奴隶们照旧处在奴隶主的淫威之下。后来只是通过奴隶逃亡，这些州的奴隶制才走向瓦解。第二，《宣言》既没有把选举权送给被解放的奴隶，也没有把土地分配给他们。因此，南方黑人奴隶虽然从奴隶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但是在政治上仍受压迫，在经济上穷得一文莫名。无怪乎黑人领袖道格拉斯说：“在历史上还没有过这样的例子，即解放的条件是那样不利于被解放的阶级。”

然而，不管这个宣言有这样那样缺陷，它的伟大的进步的历史意义是无法抹煞的。而且，它一发表，马上产生了巨大的效果。消息传到南方后，穷年累月处在暗无天日的压迫下的南方黑人奴隶，突然看到了一线光明。因之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2年8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国内战》，第233页，人民出版社，1955。

马克思：《北美事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86页。

在短时间内就有大量奴隶从南方种植场上逃出来，同时南方的奴隶起义也如野火燎原一般发展起来。这些都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的力量。

这个宣言在击败英国的干涉计划方面也起了巨大的作用，如前所述，本来英国统治阶级是想插手美国内战的，但是由于林肯发表了《解放宣言》，英国工人阶级认识到正义是在北方一边，于是便开展了强大的运动，坚决反对英国政府的这个可耻的计划。当时马克思正侨居在英伦，他领导了英国工人的斗争。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强大的压力下，英国政府终于放弃了原来的计划。

除了发布《解放宣言》之外，林肯政府还实行一系列的革命措施和政策。

(1) 武装黑人的政策。到 1862~1863 年，林肯政府由于人民的压力，也由于兵力之不足，决定实行武装黑人的政策。这个政策一经宣布，马上有大批黑人涌到招兵站，争先恐后地报名当兵。在南方战地上，也不断有逃亡奴隶参加了北方军队的行列。黑人之参军，给北方军队增添了新的生力军。

(2) 1862 年 5 月，林肯政府颁布了北方劳动人民多年来渴望的《宅地法》。《宅地法》规定：一切忠于联邦的成年人只要交付十美元的登记费，就可以在西部领取 160 英亩的土地，在所领得的土地上耕种五年后，就可以成为这块土地的所有者。这个措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历史意义：第一，它创造了数量众多的小农土地所有者，从而大大地促进了美国农业资本主义沿着“美国式的道路”发展，加快了西部开发的步调，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产粮国之一。第二，这个措施满足了北方广大农民的要求，在鼓舞农民积极参加反奴隶主的战斗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然，这个《宅地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许多大资产阶级分子与土地管理人员勾结，冒名领取大量土地。第二，政府在分配土地给居民的同时，还以大片土地赠送给大铁路公司。

(3) 严厉镇压反革命。1862 年 9 月，在林肯政府决定解放奴隶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于反革命的镇压：逮捕了一些叛徒和奸细，封闭了反革命分子的报馆。1863 年 5 月 4 日，政府逮捕了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头目瓦兰狄罕。早在 1862 年 11 月，林肯就解除了奴隶主代理人麦克雷伦的军事统帅职务。此外，又清洗政府及军队里的异己分子，提拔有能力和军功的普通士兵为军官。如马车夫出身的谢里旦就被擢升为将官。

(4) 在军事上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内战初期，北方实行的是志愿兵制。1863 年 3 月以后开始实行《征兵法》，它规定美国公民凡年龄在 20 岁至 45 岁之间的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从而参军成为强制性的了。这在加强北方军事力量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说 1862 年底北方兵力为 556,000 人的话，那末到一年后就增加到 918,121 人了。到 1864 年初，林肯政府还调整了军事领导机构。北方过去三年来一直忽略了统一指挥的重要性，在兵力部署方面都是各个战区司令各自为政。1864 年 3 月，林肯任命有卓越的军事才能的格兰特为“全军大将军”（相当于指挥整个陆军的总司令，过去只有独立战争期间的华盛顿膺这个称号），由他指挥全军，一切军事调动，全归他掌握。

(5) 实行累进所得税。1862 年，国会制定了征收累进所得税法案，规定：每年收入在 600 到 1 万美元的人，要纳 3% 的所得税，每年收入在 1 万美元以上的人，要纳 5% 的所得税，后来又提高到 10%。纽约的大富翁斯图尔特每年收入为 400 万美元，他不得不缴纳 40 万美元的所得税。在内战期间

政府的所得税收入达 5500 万美元。累进所得税是让富人负担战争费用的措施，尽管税率比较缓和，对富人征收的税还不够重，但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的措施，对进行战争是有帮助的。

上述这些革命措施和政策，大大地增强了北方的战斗力量，也有力地鼓舞了北方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北方工人、农民及黑人积极参加革命战争，他们的英勇战斗保证了战争的最后胜利。美国工人阶级不愧为最先进的阶级，工人们组成的联队，是北方军队中最有觉悟、最有纪律的队伍。在军队成分中占比例最大的便是工人，每 1000 名士兵中便有 423 人是工人。

美国马克思主义者比国内任何其他集团更为深刻地理解内战的性质及意义。他们认识到，假如联邦在战场上失败，南方奴隶主阶级就要在全国建立反动统治，奴隶制度不但要继续存在下去，而且要普及全国，白人劳动者也要沦为奴隶，工人阶级的解放就要多走弯路。因此，美国马克思主义者不但号召北方工人阶级踊跃参加战斗，而且他们自己也以身作则，直接参加了战斗的队伍。美国马克思主义者魏德迈等人在内战中建立了不容抹煞的功绩。他们特别在保卫边境州密苏里的斗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与工人阶级并肩作战的黑人（包括南、北方黑人），在内战中同样是一支伟大的、决定性的力量。美国黑人充分地意识到这场战争的结局与黑人同胞的命运息息相关，所以他们一个个都奋不顾身地英勇杀敌。内战期间北方军队所取得的几次大捷，都是在黑人部队参与下取得的。黑人士兵不怕死的精神，甚至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在 1863 年维克斯堡的战役中，有 1 万名黑人部队参加了米利铿河湾的保卫战，而进攻的敌人有 2 万人。战斗主要是短兵相接的肉搏战，黑人英勇地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战斗结束后，发现有许多黑人被刺刀戳死，还有的黑人头颅被枪柄打烂。目击这次战斗的丹尼森将军说：“黑人部队在那次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是任何人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黑人不仅在战场上浴血战斗，而且也在其他方面帮助了北方军队，有的当军事侦察员，为北方提供有价值的军事情报，有的充当向导，为北方军队带路，有的直接深入南方腹地进行游击战。

据黑人学者杜波伊斯的估计，在内战中直接参战的黑人，大约有 30 万人。此外还有 30 万黑人在联邦军队中从事劳动。黑人有 3.8 万人在战场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黑人在内战中的伟大贡献及他们对于内战的最后胜利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林肯的话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他说：“倘若没有黑人的支持，北方将无法取得胜利。”这个事实有力地粉碎了美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谎言，他们硬说美国黑人之获得解放，是出于白人的“恩赐”，黑人本身毫无作为等等。事情的真相是：黑人赢得了内战，从而他们自己解放了自己，因为假如北方在内战中失败，林肯所颁布的《解放宣言》将成为一纸空文。

到 1863 年，北方在军事上开始有了好转，这一年 7 月 1 日取得的盖提斯堡大捷，成为整个内战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战场上的主动权完全操在北方军队手中。到 1864 年春，北方最高统帅作了新的军事部署，决定在东、西两线同时展开强大攻势。

在东线，格兰特将军以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停顿地攻打敌人，并且把其主力逼到叛乱者“首都”里士满附近。

在西线，谢尔曼将军的大军在 1864 年 9 月把南方的最大的军事工业城市亚特兰大拿下来了。两个月后开始了有名的“向海洋进军”，目标是萨凡纳。

“向海洋进军”，实际上就是一次胜利的进军，大军所到，如入无人之境，敌人望风奔逃。在“向海洋进军”的过程中，谢尔曼将军指挥大军在佐治亚州境内完成了大规模的破坏工作：敌人的铁路破坏得不堪再用，铁轨被扭成螺丝形，枕木被付之一炬。士兵们还在沿途烧掉种植场仓库、轧棉机以及奴隶主的其他财产。这些行动完全是军事上的必需，沉重地打击了叛乱者的经济力量。

1864年12月下旬，大军终于攻下了萨凡纳，从而胜利地完成了这次进军。

1865年2月1日，谢尔曼大军又离开萨凡纳北上进军，目的在于在东线与格兰特军队会师。

这时，南方叛乱集团已陷于山穷水尽的绝境。奴隶逃亡和奴隶起义，使种植场经济濒于瓦解；北方海军所实行的海上封锁，使得南方与欧洲之间的贸易不绝如缕，因此南方的物力枯竭了，军队都枵腹作战。南方居民拒绝当兵及逃兵的增加，使得南方的兵员越来越缺乏。作为南方主力军的罗伯特·李的部队就是在南方内部危机日益严重的条件下勉强应战的。1865年4月初撤出里士满之后不久，李的部队在阿波马托克斯小村附近完全落入北方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下。4月9日，李率他的部队向格兰特将军请降。于是持续四年之久的美国内战，以北方的最后胜利而结束。奴隶主所拼凑的“国家”取消了，美国又恢复了统一。

（三）战后南方重建

南方奴隶主在内战中彻底失败了，但是他们并不甘心于失败，他们连做梦也在想复辟。未几他们的梦想得到了暂时的实现。

在内战结束后不久的1865年4月14日，林肯遇刺身死，副总统约翰逊继任为总统。这个亲奴隶主分子在上任后不久（1865年5月）就颁布了大赦令，赦免了几乎所有叛乱分子的罪行。于是在约翰逊的庇护下，奴隶主分子在南方各州复辟了——南方各州的立法行政大权又落到他们的控制之下，在这个情况下，他们便对黑人大施报复，用各种恐怖手段迫害黑人。他们还组织“三K党”这样的恐怖团体，对黑人进行血腥的蹂躏。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他们在南方各州制定了“黑人法典”，几乎把黑人的一切自由都剥夺了。如不准黑人拥有土地，不许他们从事脑力劳动，不许集会，不许和白人接触，对黑人仆役可以任意施行体罚等等。其用意无非是想恢复变相的奴隶制度。

约翰逊对奴隶主的包庇纵容以及奴隶主在南方的复辟，不但遭到黑人群众的反对，而且也在北方广大人民中间引起了无比愤慨。这件事也使得资产阶级急进派担忧，他们担心奴隶主在南方的复辟，是走向在全国范围内复辟的第一步，而奴隶主在全国的复辟，将意味着北方工业资产阶级在内战中所取得的胜利果实全部化为乌有。在急进派看来，杜绝这种可能的唯一办法，便是把选举权送给南方黑人（主要是刚刚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黑人）。1866年国会选举的结果，急进派取得了多数，他们促使国会通过了公民权利法案，宣布一切美国人，包括黑人在内，一律享有公民权力。1867年国会不顾总统约翰逊的反对，强行通过了南方“重建法案”。按照“重建法案”，在过去参加叛乱的南方诸州实行军事管制，在军队的监督下举行选举，成立新的州政府。更重要的是，法案剥夺了奴隶主叛乱分子的选举权，同时把选举权送

给南方黑人。

不久，“重建法案”便付诸实施，在南方开始了“重建”工作。在联邦军队的保护下，南方各州都举行了选举。黑人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参加选举。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顾“三K党”人的恐吓，勇敢地走向投票场。到1868年中，在南方多数州选出了州立法会议，并且组成了新的州政府。在一些州里，黑人在立法会议的下院中获得一半席位。在某些州，黑人当选为副州长。但是在各州政府及立法会议中占优势的还是白人急进派分子。

“重建”的年代，是黑人为争取民主权利而进行顽强的斗争的年代，通过他们的努力，南方各州都制定了保障黑人人权的法律，并且废除了“黑人法典”。各州政府还拨出大量款项创办黑人学校，使黑人得到受教育的机会。黑人在争取自己权利的斗争中，也得到南方白人劳动者及随同北方军队南下的急进派的支持。

新成立的南方各州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南方工商业的措施，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南方资本主义的发展。

北方资产阶级虽然在“重建”时期授予南方黑人以选举权，但是没有用民主方式解决南方土地问题，没有没收奴隶主的土地，更没有分配土地给黑人。黑人曾经为取得土地而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但是遇到无情的镇压。因此，黑人虽然摆脱了奴隶制的枷锁，但是却一身之外别无长物，从而不得不向过去的奴隶主租种土地，变成了佃农。他们在每年辛辛苦苦劳动之后，不能不将生产品的一半或一半以上缴给过去的奴隶主。这个制度又称为“分成制”，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剥削制度，实际上是奴隶制的残余。

同时，在“重建”时期黑人所取得的政治地位也是不巩固的。1873年发生了经济危机，工人运动高涨了。为了镇压工人运动，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和南方过去的奴隶主妥协。因此，1877年美国政府取消了对南方的军事管制，把北方军队从南方调走，并且恢复了南方叛乱分子的政治权利。这样一来，过去的奴隶主又恢复了在南方的统治地位，他们把黑人及其同盟者从南方州政府及立法会议中驱逐出去，并且利用各种借口去限制南方黑人的选举权。

过去的奴隶主恢复了在南方的统治以后，对黑人进行残酷的报复。“三K党”人横行霸道，任意殴打、袭击黑人。

美国内战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称它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是因为它消灭了奴隶制，从而为美国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扫清了道路；称它是民主革命，是因为广大人民特别是黑人积极参加了革命，他们不断地把革命推向前进，争取到一系列民主成果，从而在革命进程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这次内战不但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推动了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得到了锻炼，阶级觉悟提高了，在组织方面也加强了。因而在内战后，工人运动进入了高涨时期。

正因为这样，所以列宁高度评价了美国内战，说它具有“极伟大的、世界历史性的、进步的和革命的意义”。——

第十三章 日本明治维新

第一节 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

(一) 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

德川幕府统治时期，设在江户的幕府是全国最高统治机关，国家大权掌握在幕府将军手中。将军称为“征夷大将军”，他依靠以老中（有时在老中上面设置大老）为首的幕府官僚进行统治。天皇及其公卿（宫廷贵族）住在京都，天皇被剥夺了一切大权，只不过是全日本精神上的最高统治者。

全国分为大小不一的许多封建领地，其中最大的是幕府将军的领地，其面积占全国土地的四分之一，三大都市（江户、大阪、京都）也归幕府直辖。天皇及公卿也拥有领地，这些领地合在一起，年收入在十二万石左右。其余的领地分属于两百六十几个封建领主——大名。大名的领地称曰藩，因之大名又称为藩主，他们的领地在名义上是由将军分封给他们的，所以他们要向将军效忠，并且向他负担军事上的或其他义务。在军事上，幕府控制的军队最多，约八万余人，而大名手下的兵力最多也不过一万人。大名分为三类：一、“亲藩大名”，是德川将军的同族；二、“谱代大名”，是德川家的旧臣，或在德川幕府建立前臣服于德川家的大名，他们可以担任幕府显要官职；三、“外样大名”，是1600年关原之战后臣服于将军的大名，他们不能参加幕政，因为他们与将军的关系最为疏远。为了控制“外样大名”，幕府要求他们都把家属安置在江户，实际上是作为人质，以防备他们“作乱”，大名在藩内是最高统治者，握有行政、立法、司法及军事大权，居民都处在他的管辖之下。

将军和大名都养有许多武士（这是狭义上的武士，从广义上说，将军及大名也是武士），全国武士有40万人之众。直属于将军的武士，有“旗本”和“御家人”之分，前者地位优越，可以参加幕政，而且德川家的领地有三分之一是属于他们的。大名手下的武士，有“权门武士”和下级武士之分，前者是高级门第出身的武士，可以参加藩政。武士中除旗本外，一般都没有领地，他们靠将军或大名所发给的禄米为生。武士是世袭的职业军人，负有跟随将军或大名作战的义务。他们有携带佩刀的特权。

以上便是所谓幕藩体制，在这个体制下，全国居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士”便是统治阶级，其中包括将军、公卿、幕府及藩的官员以及武士，共约占全人口的10%。“农”、“工”、“商”是被统治阶级。“农”便是农民，农民约占全人口的80%，他们是将军、天皇、公卿、大名及旗本的领地上的直接生产者，他们必须向封建领主缴纳封建地租或年贡（大部分为实物，一部分旱田则缴纳现款）。地租按照“五公五民”、“六公四民”甚至“八公二民”的比例缴纳，可见剥削是很重的。领主还要求农民服各种劳役，其中最突出的是“纳乡”，在这个制度下，领主外出旅行沿途所需脚夫、马匹等都向附近农民征发，这对于农民是一个沉重的额外负担。领主为了加强剥削，用种种方法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剥夺他们的许多自由：迁徙的自由、转业自由以及买卖或处理耕地的自由等等。甚至农

这是德川家康将军平定全国的一次决定性的战役。

民想在土地上种植自己认为最有利的作物的自由也被剥夺了。各村实行“五家连坐”制度，一家拖欠地租或“犯罪”，其余四家都要负连带责任。大多数农民每年生产出来的粮食，在缴地租、年贡后，所余无几，无法维持全家温饱。领主们公然说：“把农民弄得不死不活，是政治秘诀。”在农村中，除了租种领主土地的农民（称为本百姓）外，还有无地的贫农，如“水吞”、“小前”等，他们连参加村内公共事务的权利也没有。

“工”指手工业者，“商”指商人，他们都被称为“町人”，是封建等级中的下层。幕府为了防止封建经济瓦解，对町人的活动加以严厉的限制。17、18世纪以来，经过幕府或各藩的批准，在各地成立所谓“株仲間”的封建行会组织，只有加入这个组织的人方能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这实际上就是使“株仲間”垄断了工、商业。“株仲間”对于加入这个组织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进行密切的监督，监督手工业者的产品质量，调整商人出售的商品的价格，控制贸易等等。手工业者及商人还负担沉重的赋税。在政治上，他们也处于无权地位，甚至人身也得不到保障。武士如果认为他们“失礼”，就可以根据“格杀勿论”的法律用剑杀死他们。

在“土、农、工、商”之外，还有三四十万“贱民”，“贱民”分为“秽多”和“非人”二种。“秽多”被视为先天的“贱民”，永世不得改变身份，他们只能从事制皮革、制草履、屠宰等“卑贱”职业。“非人”除世袭者外，也有平民因犯罪而被贬为“非人”的，他们靠卖艺、乞讨度日，有时也被幕府拉去充当牢房看守或刽子手。他们的身份比“秽多”还要低。“贱民”在社会上蒙受种种歧视和迫害。这是一种等级森严的制度，等级之间不能通婚，而且士之子恒为士，农工商之子也恒为农工商。

（二）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

到18世纪初为止，日本基本上维持了自然经济，不但粮食，而且举凡日常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大部分是农民自己生产的。各藩的经济也都是以自给自足为原则。由于实行锁国政策，对外贸易只限于以中国、荷兰及朝鲜为对象，并且在严格限制的范围内进行。因此整个日本也过着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日本社会恰像一潭死水。

然而从18世纪初以后，自然经济逐步过渡到商品经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有的农民生产出来的农产品除上缴外还有剩余，并且作为商品出卖。也开始生产经济作物——桑、棉、菜籽、靛蓝植物、蜡树、漆、甘蔗、茶及烟草等。同时，以这些产品为原料的农村家庭手工业生产也发展起来。商品经济及农业生产发展的结果，农村的阶级分化也日益显著，在“本百姓”中有少数人上升为富农，他们雇用短工耕种大片土地。有的富农成为商人包买主，他们事先把原料（棉花）贷给农民，叫他们以自己的工具织成布匹，然后付以现金作为报酬。也有的人先把织机供应给农民，责其在家中为他织布。这两种情况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分散的工场手工业形式。再进一步发展，一些商人包买主自己设立棉纺织工场，招雇“机织下女”从事纺织。于是集中的手工工场形式开始在棉纺织业中出现。到19世纪初，丝织、造纸、酿酒等生产部门都出现手工工场。手工工场场主不仅来自富农，而且也来自各藩的城市商人。

进入19世纪以后，在一些先进地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已逐渐占了统

治地位。大阪地区就是如此。1842年宇多大津村有18家织布行使用工人137人，其中雇佣工人就有87人。19世纪中叶，关东地区的丝织业中约有260家手工工场，每家有织机6架至10架。1854年日本全国雇用工人10人以上的手工工场有300个，到1867年已超过400个。不过，在整个工业生产中，手工工场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

在农村，也有许多富农和商人从封建领主那里承包开垦新田，把新田出租给农民，成为新地主。还有的富农、商人和高利贷者向贫苦农民放贷，在债务人过期无力偿还时，便将他们抵押的土地据为己有，于是他们也成为新地主。新地主土地的最高所有权仍属于封建领主，因此他们必须按年向领主缴纳年贡；而另一方面他们则向租佃土地的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农民每年生产所得有70%到80%被领主和新地主夺去。新地主除出租土地者外，还有人雇用长工或短工亲自经营农业，变成经营地主。这些新地主固然靠剥削农民、雇农而存在，但是他们本身也受封建领主的榨取、压抑。

这样，到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关系在城乡生长起来了。

（三）经济变动下的阶级关系

随着资本主义关系在工农业中的生长，新兴资产阶级——手工工场主、商人包买主及富农——出现了。就是新地主，也是作为瓦解封建领主所有制的因素而出现的新生力量。新兴的资产阶级经济受到幕府统治下的封建制度的重重阻碍，也受到特权大商人的限制和压抑，因而他们对幕藩体制深为不满。新地主要求对自己的土地享有充分的所有权，要求独占农民的剩余劳动，反对领主加给他们的年贡负担，因而也反对幕藩制，反对封建领主制度。但是，新兴资产阶级人数少，经济力量薄弱，所以他们尚未形成独立的、强大的政治力量。

与新兴资产阶级不同，依附于幕藩的特权大商人（又称“政商”）却是一个经济力量雄厚的集团。他们勾结封建领主，通过包揽税收，享有各种专卖权，压制和排挤中小商人，发展成为大商人、大金融高利贷者和大矿场主。其中最著名的有三井、鸿池、小野和住友等。早在18世纪末这些特权商人就集中了巨额财富，雄视全国。据本多利明估计，1790年，“日本财富的15/16在商人手中，1/16在武家手中”。雄厚的经济力量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拥有强大势力。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幕藩的财政日益拮据，将军和大名不得不向大商人借债，一个时候债务总数达黄金6000万两，每年利息折合大米300万石。有些大名因对豪商负债过多而为他们所挟制，不得不允许他们参与藩政，让其购买武士身份，给予带刀的特权。这些富商大贾尽管与封建统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寄生在封建制度上面，和广大人民处在对立地位，但是他们和封建统治阶级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利害冲突。将军、大名随时可以宣布债权无效，甚至捏造罪名对他们滥施刑罚，强夺他们的财产，使其失去生命财产的保障。因之，这个集团对幕藩封建统治也怀一定程度的不满。不过，由于它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密切关系，它不可能成为一个反对幕藩封建统治的力量。

经济变动大大影响了武士的地位。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领主的生活更加豪奢糜烂，以致弄得财政支绌，入不敷出。同时，国家承平日久，豢养武

士成为一种无用的负担，因此许多大名不得不裁减武士的禄米，有的减至一半。有些下级武士的生活困苦到“冬穿单衣夏穿棉，无处安身，借居陋室”（武阳隐士语），以致被迫另谋生路。许多武士从事副业生产，在仙台藩，几乎全部下级武士都兼营手工业。他们中间还有不少人经营商业，有的当批发资本家。还有一些下级武士为谋生计，宁愿放弃武士籍，成为“浪人”，设塾教书，或开业当医生，或当作家等等。武士的这种转化，也是日本武士在封建社会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日本下级武士和欧洲的骑士不同，后者有封地，他们和封建领主制是共命运的；而日本下级武士没有封建领地，只有禄米把他们和封建领主制联系在一起，这就决定下级武士和领主制的关系比较脆弱。因此，一旦减少或失去禄米，他们就很容易转而从事其他职业。下级武士的这种转化，意味着他们脱离统治阶级，并且与被统治阶级共命运了。

在农村，在从农民中分化出少数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同时，有一部分农民没落了，他们丧失了土地，沦为“水吞”、雇农、佃农，或者变成受包买主剥削的家庭手工业者、雇工等等。不过，“本百姓”在农村中仍占压倒多数，他们和“水吞”、半无产者都受到领主、新地主的剥削，过着艰苦贫困的生活。农民贫困，土地也随之贫瘠了，连年歉收，时常发生大饥馑，饿死于沟壑者动辄以万计，甚至达到数十万。

处境悲惨的广大农民，很自然地向往一种没有剥削、压迫的理想社会。他们的渴望和要求，最明显地反映在安藤昌益（1707～？年）的思想中。安藤当过医生，他关心人民的疾苦，同情人民的遭遇，憧憬一个美好的自由平等的社会。他的思想表达在他所写的《自然真营道》《统道真传》等书中。他写道：“无富无贫，无上无下；男女无上下之分；真仁存在于从事耕织之众人，不耕织而图衣食者若能得禁，则无穷民矣。”他主张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压迫，消灭现在的“法的世界”，回到“自然世界”去。在他心目中，在“自然世界”里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大家一律平等，自耕而食，自织而衣。他这个思想虽属空想，但是在当时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

农民的悲惨地位，也推动他们起来反抗。到18世纪初期，农民起义屡次发生，平均每年要有5次。到18世纪后半期增到每年平均15次。到19世纪上期，从1801年到1843年，爆发了320次农民起义。这个时期发生的起义规模大，时间长，参加者达几万至几十万人。过去的农民起义者仅仅要求减轻租税，现在则提出分配土地、赶走贪官污吏等要求。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幕府对于城市人民的剥削也加强了，加以灾荒连年，商人囤积居奇，粮价腾贵，因而平民生活每况愈下，在群众中间酝酿着深深的不满。结果，在1837年在大阪爆发了大盐平八郎（1794～1837年）所领导的起义。

19世纪30年代，大富豪勾结幕府官吏任意抬高米价及物价，城市居民无法生活下去。大阪町奉行所“与力”（办理民政警务的下级警官）大盐平八郎（也是一位学者）目睹平民的惨苦遭遇，不胜悲愤，感到只有领导他们起来斗争，才是出路。1837年2月19日，大阪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和下级武士在他的带领下起义。起义者捣毁米店、放火焚烧豪商邸宅。声势浩大的起义震动了大阪全城。起义虽然很快地就被镇压下去，但是它的意义和影响

武士所领的禄米原来就不多，平均收入在35石以下，和农民的生活水平不相上下。

是很大的。它是进步的知识分子领导城市平民推翻幕府统治的一个尝试。在它的推动下，摄津、越后、周防等地相继爆发了同样的起义。

（四）天保改革

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资本主义关系的成长及城乡人民反抗运动的发展，使得德川幕府和各藩的封建统治面临崩溃的前景。为了挽救垂危的封建制度，在加紧镇压人民运动的同时，幕府一再进行所谓“改革”，以图增强幕府的财政力量，限制商品流通，阻止新生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和防止人民运动。

1842年到1843年（天保13~14年）的“改革”是在幕府的“老中”水野邦忠的主持下进行的。这次“改革”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各个方面，其主要内容是：第一，禁止人民习练武艺和持有武器，严禁农民结党活动，目的是防范农民暴动。第二，发布“遣返令”，强迫外出做工的农民重返农村，禁止农民流入城市当工人，限制雇工的工资。其目的在于妄图阻止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第三，“禁止奢侈，矫正风俗”。“禁止奢侈”的目的在于断绝商品经济发展的根源；“矫正风俗”的目的在于取缔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新的思想——“兰学”。第四，取消城市手工业的同业公会，向商人征收沉重的捐税，抑制物价，借以限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恢复封建自然经济秩序。第五，减免大名、旗本所欠幕府的债务，或者重新贷钱给他们，以便救济日趋贫困没落的封建领主。奖励领主家臣习武，以强化封建统治者的爪牙。第六，颁布“征收土地令”，将江户、大阪周围十里内的大名与旗本的土地划为幕府领地。

这个“改革”并不是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而对于封建制度进行的调整，而是妄图开历史的倒车，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垂死挣扎。这次幕政“改革”因遭到幕府内部、大名和城市商人的反对，不到两年便告失败。

在幕府进行“改革”的前后，各藩也进行了“藩政改革”。在各藩的改革中，许多藩仿效幕府的做法，同样遭到失败。但是西南诸藩——长州、萨摩、佐贺和肥前所实行的改革却成功了。这是因为它们的改革基本上顺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

原来西南诸藩的商品经济和工业农业更为发达，阶级分化也更为剧烈，农民起义、平民起义也更为频繁。同时，这里与新兴地主、商人有联系的下级武士由于接受西方思想，极力主张实行藩政改革，以促进生产的发展。在下级武士的推动及农民起义的压力下，四个藩从1838年起先后着手藩政改革。首先进行改革的是长州，它的改革内容有以下几点：第一，把藩的财政状况（藩主的私人用度也包括在内）都向全体藩士与人民公开，并征求改进意见。藩政的一般方针也让藩内武士自由讨论。第二，“破格用人”，广求人材。这是下级武士参加藩政的开端。第三，减轻地租，豁免荒田的地租。这促进了耕地的扩大，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当然这主要对富农有利。第四，打击富豪，救济下级武士，禁止高利贷。第五，改革教育与军事。增设学校，奖励西学，擢用人材。采用西洋枪炮练兵。

锁国以后，西方国家只有荷兰与日本有贸易关系。日本人只能通过来日的荷兰商人了解西方世界的形势及西方科学文化。所以称西方的科学文化为“兰学”。

其他西南诸藩改革内容与长州大同小异。萨摩藩在经过改革后，加强了对琉球的贸易，扩大了南部各岛的蔗糖生产。该藩在军事方面，特别在海军方面学习了西方技术。因而萨摩成为日本后来建设近代海军的基础。

在西南四藩改革中还提出“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的口号。

西南四藩的改革卓有成效：第一，为发展商品生产和流通打开了新局面，维护了地主、富农和商人的利益。第二，藩的财政力量增强。第三，下级武士在藩政中的发言权扩大了。第四，在军事方面采用了西方技术，因而加强了藩的实力。

第二节 1868 年革命

到 19 世纪中叶,德川幕府的统治及其所维护的一整套封建制度严重地阻碍了日本新兴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在封建领主、新地主以及高利贷者的层层剥削下,广大农民经常处在贫困之中,因而无力购买商品,这意味着国内市场非常狭小。而且,封建领主禁止农民自由离开土地,这就堵塞了工业发展所需的自由劳动力的来源。第二,幕府的统治并没有消灭封建割据状态,藩国林立,各藩在边境上都设有关卡,都有自己的货币,这就大大阻碍了商品的自由流通。第三,幕府及大名对于工商业者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税,这严重地影响了资本的积累。第四,幕藩政府对于工商业者的活动设置了种种限制,而且对于有利可图的生产部门实行垄断。为了维护封建主义经济基础,幕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破坏商品经济的反动措施。幕府在 1864 年 2 月颁布严禁扩大桑、茶的种植面积的命令;4 月更下令在全国禁止种植桑树;6 月再度禁止生丝、茶叶等出口商品的生产,同时压低出口商品的价格。一句话,封建制度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与新的生产力处于矛盾的状态。此其一。

日本资产阶级力量虽然远远不足以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但是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却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集团。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掌握文化,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儒学者、国学者、兰学者和洋学者。也有不少人学贯东西,不但有深厚的东方文化修养,而且洞察西方情况,醉心于资产阶级制度。此外,下级武士还具有政治斗争经验和组织能力,他们早在各藩的改革中崭露头角,其中有一大批有勇气、谋略和胆识的活动家和组织者。因此,下级武士有能力充任反封建的领导力量。此其二。

在整个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不下一千多次,规模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频繁。到幕末时,城乡劳动人民已形成反幕府统治的主力。此其三。

因此,在开国以前,日本已经具备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而这些条件都是日本内在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所准备好了的。

但是,外来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和冲击,加速了日本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

(一)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

19 世纪 50 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为了扩大国外市场和争夺原料产地,开始把侵略魔掌伸向日本,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日本大门。第一个打开日本大门的便是美国。1853 年美国一支舰队在海军少将柏利的率领下开到了日本,以大炮相威胁,要求开放港口,并限期一年答复。1854 年柏利又带领由十艘军舰组成的舰队和两千名陆战队来到了日本,要求开港。幕府将军不敢发动人民来抵抗外来侵略,所以便接受了美国的要求。1854 年 3 月在神奈川签订了“日美条约”,日本开放下田、函馆等港口以供美国商人进行贸易,并且同意在下田设立美国领事馆。

不久,英、俄、法、荷等国也援例强迫日本与之订立类似的条约。

但是,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它们不满足于已经在日本取得的权益。1858 年美国又以恫吓手段强迫日本签订新的条约。幕府照样屈从了。这一条约具有更明显的不平等性质,它规定:开放更多的港口给美国商

人，并且确认美国在日本享有治外法权，降低日本对于从美国进口的商品的进口税。

接着英、俄、法等国也强迫日本订立同样的不平等条约。

这些不平等条约给日本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进口货物的低关税率使得外国商品充斥日本市场，因此日本手工业遭到很大的摧残，城市手工业者及以手工业为副业的农民处境大大恶化。外国商品之大批涌入，也打击了日本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生产，使手工工场主蒙受了不少的损失。同时，外国商人又以低价收购日本原料及粮食，这就引起物价飞腾，造成粮食恐慌。外国商人还利用日本金银比价与国际金银比价之不同而从日本套购大量黄金运出国外。当时日本的金银比价为1 5，而国际比价为1 15，因之日本黄金价格低于国际牌价。西方商人利用这个差额，以墨西哥银元套购日本黄金，攫取暴利。黄金因而大量流出，仅1859年6月到年底，从日本流出的黄金就达100万两。结果，钱价下跌，促使米、麦、盐等日用必需品涨价，从而包括下级武士在内的日本人民的生活更加困难。这就推动人民走上革命道路。

60年代初，农民暴动和城市平民暴动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从1860年到1867年共发生86次农民起义，仅1866年就发生40次。在纪伊的一次农民暴动中，参加者达13万人以上。起义农民夺取或焚毁封建领主的城堡，杀死地主及其走狗，占领了城市，打死了许多官吏。

在江户、大阪、京都及其他城市，城市贫民因粮食不足及米价昂贵而纷纷起来暴动。暴动者捣毁了大米商人及高利贷者的住宅，袭击米店和仓库，把大米免费分配给赤贫的居民，并迫使商人们按低价把大米出售给一般居民。

不平等条约签订后，洋人洋商接踵而至。在各开放港口都有类似租界的洋人居留地。英国还在横滨驻军，建立陆海军兵营、弹药库及打靶场等。日本幕府所在地江户以及其他重要港口，都处在英法等国的军事压力之下。外人动辄制造借口，把军舰开进日本港口，进行恫吓，甚至干涉日本内政。

1863年长州藩炮轰一艘美国船，后来又炮轰法国和荷兰军舰。为了报复，英、美、法、荷四国组成联合舰队，于1864年9月炮轰下关，然后登陆，肆意烧杀。长州藩的武装无力抵抗，乃向联军求和。四国索取了300万两巨额赔款，事情才算了结。

1864年11月，法国与幕府签订了一个在横须贺建立海军工厂和炼铁厂的合同。法国还积极策划帮助幕府推行维护和加强封建统治的“改革”。在法国公使指挥下，幕府改革行政机构，改革军制和税制，发展新式工业，妄图投靠外国势力，通过改良来挽救自己濒于灭亡的命运。法国还出钱、出武器，帮助幕府整顿军队，并且派来陆军教官训练幕府的洋枪队。这样，幕府变成了法国卵翼下的傀儡。

欧美势力之入侵很自然地引起了日本人民的反抗，也激怒了一些封建武士。1858年8月，有俄国水兵二人被武士刺杀于横滨。1860年底，武士在江户又刺杀了美国领事馆的一个外交人员。1862年9月，萨摩藩的武士在神奈川附近的生麦村袭击了迎面相遇的几个英国人，结果打死一人，刺伤三人。但是这只是日本人民自发的爱国行动。比这更重要的是一个富于思想内容的尊王攘夷运动，在外国势力入侵的刺激下勃然兴起。

（二）尊王攘夷运动

幕府的腐朽的封建统治、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及中国人民在鸦片战争后遭受悲惨命运的生动事例，不能不使得日本一些先进人士担忧祖国的前途，考虑日本的出路。这些人主要来自西南诸藩的下级武士，因为这里接触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较早，许多下级武士早已倾心于西方的文化科学。而且这些下级武士中有不少人与新兴资本主义发生关系，他们最关切日本的资本主义前途。

这些人士认识到：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必须打击、驱逐外国势力，实行开国进取政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改革幕藩体制，革除弊政，必须借“王政复古”（恢复天皇的最高权力）之名，以行改革幕藩体制之实。因此，他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并且积极进行宣传。这便是尊王攘夷运动的由来。尊王攘夷运动在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运动的代表人物有绪方洪庵、佐久间象山、桥本左内和吉田松阴等人。

尊攘志士们都有一股爱国的热情，一种豪迈的大无畏精神。吉田松阴在民族危机最严重的时刻（1854年），曾不顾幕府的禁令，冒生命危险，筹划秘密越海赴美，以寻求救国的方策（尽管没有成功）。这些人虽然心中燃烧着对于西方入侵者的仇恨，要求日本政府坚决抵抗外国侵略，但是与盲目排外的封建顽固派不同，他们一般地都认识到：为了打击西方侵入者，必须学习西方在科学技术方面的长处，因为他们对于幕府统治下的日本的落后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科学技术上的先进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当然，在这方面，他们也受中国学者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影响，当时魏源的《海国图志》与《圣武记》已流传到了日本。他们批判旧学（儒学与国学），提倡实学，热情地号召日本人学习洋学（科学技术），急切地要求向西方国家寻求救国的药方。但是他们还不想彻底丢掉旧学，而是力图把旧学与洋学揉合在一起，制成一套救国方案。例如佐久间象山就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的方案。桥本左内说：“器械艺术取于彼，仁义忠孝存于我。”吉田松阴也坚持这个态度，他在崇尚旧学的同时，留心世界形势，注意海防，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日本改良主义者在保存旧学及旧道德的口号下，实际上是利用旧学为自己的变革主张服务。这在吉田松阴的思想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吉田通过讲《孟子》的“天命观”，批判时政，他指出：幕府和大名“不应将国家之衰败混乱，夷狄之猖獗推托为时运与天命”，而应尽人事，“各尽其职”。他还以孟子的思想为依据，指责幕府的卖国行径，说国家之所以陷于危亡的困境，完全是由于“幕府和诸藩将士皆心术不正，不能为国家为忠义而死”。他从国学的忠君思想及神权思想出发，提出“皇权论”，主张人人平等，人人直接向天皇效忠。这实质上是对幕藩体制的否定，具有反封建的要素。

根据儒学和国学去反对幕府独裁卖国，从儒家思想及日本神学思想中寻找改良变革的理论，不但是吉田的思想特点，而且也是同时代尊王攘夷派的共同特点。

尊王攘夷派不但提出和宣传改良主义思想主张，而且也为实现这些主张而积极开展活动。有的人给藩主、将军上条陈，提出改革建议；有的离开藩国到京都，出入于公卿之家，宣传“尊王攘夷”的道理；有的设塾讲学，向青年灌输“尊王攘夷”的思想。吉田松阴在从事政治活动的余暇，设立松下

村塾，从事讲学。他实行“有教无类”的原则，广收门徒于各个阶层，武士、农民、商人、医生、僧侣等均可入塾求学。他尝言：“愈贵者愈迟钝，愈贱者愈敏锐”，“育天下英才必起自无名小卒”。他竭力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教育他们维护民族尊严，发扬民族自强精神。在幕藩体制下，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的结果，不仅普通群众，就是武士阶层也多不晓国家大事。“幕士不知有皇室者、藩士不知有幕府者，不乏其人”（渡边修次郎语）。因此，松下村塾的学生从吉田的教导中受到很大的教益。在这个村塾的简陋小屋里培养出来的80名学生中，出现了以高杉晋作、木户孝允、山县有朋、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为代表的为明治维新立下不朽功勋的杰出人物达37人之多。无怪乎有人说：“松下村塾乃一孵化颠覆德川幕府之卵的保育场”（德富猪一郎语）。

绪方洪庵也授徒讲学，他一生共培养出3000名学生，在他的学生中间出现不少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如桥本左内、福泽谕吉等。

最初，以吉田松阴为代表的尊王攘夷派并不想推翻幕府，只是希望“幕府真能一日感悟，奉皇敕，率诸侯，安兆民，驭群夷”，无愧于“征夷大将军”的称号（吉田松阴语）。但是，在1858年幕府屈于压力与西方国家订立不平等条约后，吉田松阴便开始有了倒幕的思想。当时他清楚地看到幕府的统治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只有把它推翻，日本方能得救。他说：“当今之世界如旧屋颓厦”，必须“兴起一场大风将其颠覆”，然后“代朽楹，弃败椽，杂新材而再造者方为美观”，因此，他便和西乡隆盛等人来到京都进行活动，与天皇及其近臣一道秘密策划“倒幕”。主持幕政的井伊直弼在获知后，于1858年10月突然下令逮捕吉田松阴及西乡隆盛等人，并且宣布吉田等七名志士死刑，流放西乡隆盛于大岛，史称“安政大狱”。

吉田松阴于1859年7月27日就义那一天，高声朗诵着辞世之诗，泰然自若地走向刑场。他死时年方29岁。

井伊直弼的高压手段并没有吓倒反幕的志士们。1860年3月3日，一些武士把井伊直弼刺杀于江户的樱田门外。

（三）倒幕运动

1858~1859年的“安政大狱”表明：幕府反动派不但坚决抵制任何改革，而且决心消灭任何反对者。1864年列强之炮轰下关，使人们感到攘夷及盲目排外不但无补于事，而且只能带来损失和恶果。因此，尊王攘夷派开始认识到改良主义是行不通的，攘夷也是失策的，于是便毅然采取了倒幕开国——推翻幕府，学习西方以实现富国强兵——的决策。此后，尊王攘夷派就一变而成为倒幕派，尊王攘夷运动也就发展为倒幕运动。这意味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转变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倒幕运动是下级武士为领导的、具有广泛的社会阶级基础的革命运动。倒幕派的首要代表人物有高杉晋作、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倒幕派也得到豪农豪商——城乡资产者和新地主、富农的支持，因为这个资产阶级集团很早就对幕府的封建统治，而他们本身又软弱无力，为了反对幕府只能支持倒幕派。与倒幕派站在一起的还有与幕府有深刻矛盾的西南强藩。

安政是当时的年号。

诗云：“吾今为国死，死不负君亲。悠悠天地事，鉴照在明神。”

倒幕运动比起尊王攘夷运动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不仅表现在它用倒幕去代替幕政改革，用开国去取代攘夷，而且也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倒幕派在思想上虽然保留了尊王论，但是又采纳了西方资产阶级两院制议会的主张，这比尊王攘夷派的“东洋道德西洋艺”要进了一步。比如，1867年6月由倒幕派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坂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等人签订的“萨土盟约”就反映了这个思想，它提出了“参酌世界形势，王政复古”的原则及成立有陪臣庶民参加的议事院的具体建议。

而且个别的倒幕派，如横井小楠的思想更前进了一步。他早在1855年就提出“天下之人才共理天下之政事”的主张。他向慕美国开国以来实行的资产阶级民选制度，欣赏美国总统“让贤不传子，废君臣之义”，认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符合儒家理想中的“三代治教”之精神。他甚至反对幕藩领主及天皇的世袭制度，发出“嗟乎血统论，是岂顺天理？”的浩叹。可以说横井小楠是日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先驱。

不过，横井的思想在这个倒幕运动中并不占支配地位，占支配地位的是大久保利通等人的思想主张。而且大久保利通等人的思想主张后来在明治维新期间也未获全部采纳。

第二，倒幕派强调暴力。在他们看来，要想推翻幕府统治，舍使用武力外别无他法。因此，他们很快地着手军事准备。

首先倡导军事准备的是高杉晋作。他曾受教于吉田松阴，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对祖国的命运极为关切。1862年他在上海看到英法联军在中国犯下的种种暴行，悚然动心，发誓要使日本避免蹈中国的覆辙，早日摆脱对外国的从属地位。他认为，要想拯救日本，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它们为榜样来改造日本的国家和社会，使其臻于富强；要想图谋国家富强，必须打倒腐败透顶的幕府；要想打倒幕府，必须使用武力，从而必须建立新型的武装队伍。1863年他掌管长州藩政之后，便选拔材勇之士组成名为“奇兵队”的新式军队。他在谈到选拔队员的标准时说：“食肉之士人等辈不堪用……如欲编组新兵，务须矫正门阀之弊，不问士庶，加厚俸禄，专募强健之人。”为了组织、训练“奇兵队”，高杉晋作夙夜勤奋操劳。另一位倒幕派前原一诚专为他赋了一首诗曰：“军谋终夜剪青灯，晓闪旌旗气益增，凜冽寒风面欲裂，马蹄踏破满街冰。”

高杉晋作的“奇兵队”组成后，藩内其他人士也纷纷组织类似的武装队伍。在长州藩内建立的这些新式武装队伍，主要由武士、“浪人”、自耕农、新兴地主及富农组成，比起幕府及各藩的旧式军队，不但成分新、武器新，而且也接受新式训练，纪律严明，所以战斗力很强。长州藩的新式军队兵力至少有5000人，这是一支精锐的倒幕队伍。

由于看到长州藩是倒幕运动的大本营，幕府决定派大军“征讨”长州。第一次“征讨”是1864年8月，正值保守派上台掌握长州藩政，他们向幕府表示恭顺，所以幕府军不战而胜。然而1866年第二次“征讨”却一败涂地。原因有四：第一，这时幕府已众叛亲离，过去支持幕府的大名多按兵不动。第二，倒幕派武士通过政变掌握了长州政权，他们励精图治，加强军备，特别是整顿“奇兵队”，大大增强了战斗力。第三，1866年1月长州与萨摩成立同盟，这更增强了长州的力量。第四，战争引起物价腾贵，人民不堪其苦，江户、大阪等地的城乡劳动人民接连暴动，从背后狠狠打击了幕府军队。

幕府的军事失败，导致了萨摩、土佐同盟（1867年6月）及萨摩、长州

和安艺的同盟的成立（同年9月）。而且，这时倒幕派武士还积极同英国接近，企图得到英国的帮助打倒幕府。而英国看到幕府大势已去，也愿意支持倒幕势力，以便在推翻幕府后增加自己对新政府的影响。

在第二次“征讨”长州的战争失败后，幕府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政权，乃进一步投靠法国，希望得到法国方面更多的援助。1866年9月，同法国签订了3500万法郎的贷款合同，准备从法国购买武器、装备和军舰。另外又成立日法合营公司，由它来垄断日本蚕丝贸易。幕府还聘请法国军事教官团，改编幕府军队。而且法国公使罗休亲自指挥幕府的政策。因之，日本政治、军事及财政均落到法国控制之下。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日本势将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四）革命的经过

目睹幕府勾结法国的情况，倒幕派不禁为祖国命运担忧。1867年5月，木户孝允在一封信里写道：“天下形势至此，如果大权不迅速归于朝廷，则将来之天下，必将堕入幕府与法国手中……”中冈慎太郎提醒人们：在英法未强盛之前，都曾有过内战。因此，倒幕派决定发动政变。参与政变策划的还有萨摩、土佐、安艺、越前、尾张五藩主和岩仓具视、三条实美等公卿。

1867年10月14日，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倒幕首领从新即位的天皇睦仁（当时不满15岁）手中弄到一份给萨摩、长州二藩的“讨幕密敕”，“密敕”命令二藩举兵征讨幕府。于是，萨、长两藩的大军便浩浩荡荡开进京都。1867年12月9日，萨、长两藩的倒幕派在军队的帮助下发动政变，用天皇的名义发布“王政复古”诏书，宣布废除幕府将军制，将政权归还给天皇，并且发表了“一洗旧弊”、“广开言路”、“登用人才”、“百事一新”的改革纲领。与此同时成立了新的中央政府，在天皇下面设立由“总裁”、“议定”和“参与”组成的三职政府，“总裁”由有栖川宫担任，“议定”由公卿和五个藩主担任，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等人被任命为“参与”。

三职政府实际上是倒幕派、藩主和公卿的松驰的联合，而且在这个联合中，反对改革的藩主和公卿的势力很大。三职政府在公卿、藩主的把持下，对德川幕府将军抱容忍的态度，默许他继续拥有土地和兵权。因此，所谓“王政复古”成为有名无实的了。在这个情况下，倒幕派为了真正推翻幕府，必须继续斗争下去。

1867年12月9日在三职会议上，大久保利通不顾藩主、公卿的反对，提议下令强制德川庆喜“辞官纳地”。所谓“辞官”就是献出他的“兵马之权”（伊藤博文语），“纳地”就是献出他的领地和人民。这个建议一提出，在三职政府内外立即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德川庆喜拒不接受“辞官纳地”的命令，表示要为此而决一死战。三职政府内的公卿、藩主则附合了德川，反对大久保利通。到1868年1月2日，大久保利通在三职会议上严正宣布：假如德川庆喜继续拒绝“辞官纳地”的命令，将依靠萨、长的兵力，断然举兵讨伐。与此同时，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命令在京都的萨、长、土、艺军队作好临战准备。

1868年1月2日夜，德川庆喜以“除君侧之奸”为名，亲率幕府大军从大阪出发，准备进入京都，颠覆新政权。幕府兵分两路，分别在伏见、鸟羽

(二地均在京都西南方)与西乡隆盛指挥的以萨、长两藩的军队为主的新政府军遭遇,发生激战。当时幕府军的兵力1.5万,新政府军只有5000,但是新政府军士气昂扬,锐不可当,竟以少数击溃了幕府军的多数。庆喜仅以身免,只身逃回江户。

鸟羽、伏见大捷后,天皇政府宣布庆喜为叛逆,发出“庆喜追剿令”,并且号召持观望态度的诸藩派兵参加讨伐庆喜的战争。结果,多数藩主表示效忠天皇政府,并且积极参战。1868年3月中旬,新政府军在西乡隆盛的率领下,进抵江户城下。这时幕府内部有人主张依靠法国的援助抵抗到底。但是当时幕府军几乎瓦解,江户人民对幕府已经深恶痛绝,关东一带人民起义频频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庆喜知道大局已无法挽回,因此便在1868年4月献城投降。新政府允许庆喜退居故乡水户藩,为水户藩主。但是,幕府的残余势力在外地继续顽抗,只有到1869年6月27日,新政府军才攻克反革命的最后据点北海道。于是统治日本265年的德川幕府终于结束。革命胜利了。这次国内战争的主要战役是在1868年(戊辰年)进行的,所以它被称为“戊辰战争”。

1868年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除了要归功于以西南诸藩的武士为核心的志士们的努力外,也不应忽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在倒幕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奇兵队”及其他倒幕军队,虽然有许多新兴地主富农参加,但是其中也涌进大量自耕农。而且,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和市民起义,有力地动摇、削弱了幕府的封建统治力量。在倒幕的几次战争中,人民群众从各方面支援了倒幕军队。

有利的国际环境对于1868年革命的成功,在客观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时英法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中国方面,特别是英国忙于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因而腾不出手来干涉日本的革命。法国在1862~1867年的墨西哥冒险中遭到惨败,接着又在欧洲大陆上遇到像俾斯麦这样的劲敌,以致无力用兵于东方,更无力出兵镇压日本革命运动。美国正埋头于内战,也顾不得插手日本问题。

最后,也应该提到亚洲人民反抗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民族解放斗争所起的伟大作用。1851年开始的中国太平天国运动,1857年印度人民反英民族大起义以及中印两国人民对侵略者的坚决抵抗,都给英法侵略者以深刻的教训,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使他们认识到亚洲人民是不可侮的,所以就不敢明目张胆地干涉日本革命运动,以免冒引起日本人民反抗的风险。

第三节 明治政府废除封建制度的措施

革命胜利后不久，1868年7月，新政府宣布改江户为东京，确定东京为日本首都；9月8日定年号为明治。因此，1868年革命及革命后的国家改造及一系列资产阶级性的改革，称曰明治维新。

新政府刚一成立，即采取几项重大措施，把封建的国家改造成为资产阶级国家。

（一）废藩置县

1868年4月27日公布“维新政体书”，规定天皇有无限权力，在天皇下面设有太政官，辅佐天皇，太政官下面设行政、议政和司法三个部门。表面上是三权分立，实质上大权集中在天皇及其重臣手中。因此，革命的结果在日本建立起来的是君主专制制度。

1868年鸟羽、伏见之战结束后，新政府一步一步地取消幕府的封建领地，改设8府21县。但是，绝大多数藩国领地依然如故，政令无法统一。在戊辰战争尚在进行之际，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坂垣退助等人就开始劝告藩主们认清大局，主动退还版籍。于是，萨、长、土、肥四藩于1869年1月提出“封土奉还表”，以示忠诚。1869年6月，新政府正式宣布“版籍奉还”，命令大名交出对土地和人民的封建领有权，同时任命原来的大名为藩知事，以原领地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为他们的俸禄。但是这个改革只是初步的，因为藩的内部组织原封未动，藩政仍操在大名手中，只不过他必须在基本方针方面服从中央罢了。因此尚待进一步改革。

明治政府刚一成立，伊藤博文就向木户孝允建议立即废除藩国，行府县之制，以实现国家统一。他说：“废封建，置郡县，统一兵力、财力于朝廷，而谋国力之进展，舍此别无可取之路。”大久保利通也有同样见解。在大久保利通等人的推动下，1871年7月，新政府发出“废藩置县”的命令，完全取消大名作为封建领主的统治权，废除藩国制度，全国行政区重新划分为3府（东京、京都、大阪）、72县，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府、县知事管理。大名离开藩国，迁居东京，从国家领取俸禄。新政府之断然采取这个措施，一方面是因为新政府有实力，不怕大名造反，另一方面也给大名们许多好处，使其不愿反抗。中央政府不但发给他们俸禄，而且还要将各藩所欠的债务也包了下来，替他们偿还。

此外，新政府先后在1868年5月和1869年1月废除各藩在其边境上所置的关卡。1868年8月还下令禁止各藩私铸货币，实行全国统一币制。

这样，日本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这就为全国性市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为日本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前提。

在中央，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下级武士实力派接连不断地改组政府，逐步减少公卿藩主在中央政府中的作用。在1875年萨摩藩主岛津久光隐退时，中央政府内已经没有藩主了，除两名公卿外，全是萨、长、土、肥出身的倒幕派。因之中央政府成员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治政府成为资产

“维新”一词采自中国《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从1873年起由新政府负责解决的各藩的债务达34,864,582日元。

阶级化的下级武士所控制的政府。

革命后的政府之所以采取了专制主义形式，而没有实行资产阶级立宪制度，也是日本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当时幕藩体制刚刚废除，将军和大名的统治刚刚被取消，旧势力的威胁依然存在；而且为了把封建的日本改造成为资本主义的日本，一个艰巨的任务摆在面前，所以日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完成除旧布新的任务。

（二）废除封建等级制。取消武士特权

新政府在实行“版籍奉还”后，即着手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大名和公卿的称号被取消，改称“华族”，其地位仅次于皇族。武士的称号也被取消了，改称为“士族”；废除武士佩带刀剑的制度。过去宫廷中的下层官员也划归“士族”。农民、商人、手工业者及僧侣、神官都称为“平民”。“华族”、“士族”和“平民”可以互相通婚。1871年8月废除“秽多”、“非人”的贱民称呼，划归“平民”。宣布职业自由和迁徙自由。这就使得农民有可能离开农村流入城市，从而对需要大批劳动力的新兴资本主义有利。

但是，在废除大名、武士等称号后，出现了其原来的收入（在“版籍奉还”及“废藩置县”后大名所领取的俸禄及武士原来所领取的禄米）如何处理的问题。新政府决定取消他们的这些特权，因为新政府当时财政拮据，无力继续发放俸禄及禄米。但是，为了取消这种封建性的特权，新政府采取了渐进的步骤，而不是操之过急。

第一，1873~1874年允许“士族”放弃禄米，凡放弃禄米者，由政府发给产业资金，即世袭禄给六年份，终身禄给四年份，其中一半现金，一半公债，公债利息为八分。

第二，1875年7月，政府宣布停止放弃禄米的做法。9月又作了新的规定：按1872年至1874年三年平均米价，将禄米改为用现金支付的货币俸禄。

第三，1876年8月政府命令所有领取俸禄者（包括“皇族”、“华族”及“士族”）一律献出俸禄，同时发行公债，按照俸禄多寡及不同种类把不同数量的公债支给献出俸禄的人，一次支给完毕。所支给的公债从第六年起，每年以抽签方式偿还，规定30年内偿还完毕。当时领取公债者总计三十一万多人，共领取公债一亿七千三百多万日元。值得注意的是，巨额公债都集中到少数“皇族”、“华族”及上层“士族”手中。他们用巨额公债从事金融活动和投资于新兴工业企业，因而摇身一变成为百万富翁或大资本家。1877年创立的、有1782万日元的第十五国立银行就是以持有巨额公债的“华族”、上层“士族”为支柱而设立起来的。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下级武士所得甚微，平均每人不过得到548日元。全国下级武士约26万人，每年平均利息收入仅77日元。因之他们多半入不敷出，不得不变卖公债来维持衣食，最后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特别是1877年以后由于通货膨胀，这个过程更为加速。他们失去的公债通过各种渠道集中到高利贷者手中，转化为资本。无产化的下级武士及其家人有相当一部分被吸收到工厂企业当工资劳动者。如群馬县富冈制丝厂，1878年在籍的寄宿女工371人中，有148人出身于“士族”。

不过，新政府之用赎买方式取消封建特权及用公债代替俸禄的办法，不失为明智之举，因为这样做不但可以缓和政府财政困难，而且也可以大大减少封建势力对于新政治秩序的反抗，有利于造成维新后的政治稳定局面。

（三）土地改革与地税改革

新政府采取一些措施，以实现经济自由。1868年5月明令取消商业垄断，准许买卖自由。1871年宣布允许农民自由种植作物，取消幕府对于农业生产的种种限制。1872年又取缔“株仲間”。这些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是有利的。但是政府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土地改革上面。

在反对幕府的革命战争中，农民曾大力支持倒幕派，他们如饥似渴地希望从封建剥削下解放出来。新兴地主也迫切要求确认他们的全部土地所有权，以发展他们那种不同于封建领主剥削方式的新的生产关系。明治新政府也感到以幕藩领主土地所有制为特点的、旧的封建制度严重地阻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且，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水平低下的当时，要想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也不能不在土地上打主意。因此，新政府决定实行土地改革。

1872年政府下令解除自1643年以来颁行的关于禁止土地买卖的法令，允许人们自由买卖土地。同年又发布关于丈量土地及颁发土地执照的法令，宣布废除旧封建领主（幕府将军及大名等）对于土地的所有权，而确认土地的实际占有者的土地所有权，并向他们颁发土地执照。这意味着不仅在幕末出现的新兴地主取得了完全的土地所有权，而且多少年来一直受封建领主直接剥削的广大自耕农（“本百姓”）及富农也成为真正的土地所有者。诚然，过去租种新地主的土地的佃农，依旧是佃农，他们并没有从土地改革中得到好处。但是新兴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的确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因为地主土地所有制比起封建领主制究竟是前进了一步。

土地改革不可避免地要推动地税的改革。1873年政府颁布了有关地税改革的法令，法令规定：凡土地所有者均要缴纳地税，地税的税率应为土地价格的3%，不因年景的丰歉而有所增减，地税一律用现金交纳，而不以产品的价格变动为转移。土地价格由政府规定，而政府规定的价格很高，以致地税也很高，甚至与幕府时代的封建地租不相上下。而且根据该地税改革法令，土地所有者除地税外，还要缴纳村费（为地价的1%），地税加村费，相当于土地每年收获量的34%。因此，土地所有者的负担很重。但是新地主的这些负担最后还是落在广大佃农身上。

地税改革的影响至为深远。第一，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解决了财政问题。地税收入最多的1875年占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80%。正是从农民身上榨取这么多的血汗钱，才使政府能够顺利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执行对“华族”、“士族”的赎买政策。这就是说，取之于农民，用之于资产阶级身上，因而地税改革是日本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杠杆之一。第二，导致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在1883年至1885年间，每年出卖的土地的数量竟达全部耕地的3%到3.5%。农民因失去土地而流入城市当工人者为数并不太多，大多数留在农村当佃农。这是因为：一、由于吸收了大批“士族”分化出来的无产者，也由于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而节省了劳动力，城市工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并不太大。二、农民大多数安土重迁，不愿离开乡土。

这样，一方面地税地租太重，造成农民贫困，另一方面大量农业人口留

佃农每年劳动果实近70%被政府及新地主夺去。

在农村。结果，日本国内市场变得比较狭小，这就使得日本资产阶级有强烈的对外扩张侵略要求。

第四节 明治政府的三大政策

明治政府在改造封建国家的同时，也积极进行国家的建设工作。

维新的元老们立志要把落后的、弱小的日本建设成为一个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及经济力量的资本主义强国。同时他们又认识到，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大力学习西方。为了学习西方他们决定派遣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全权大使，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臣伊藤博文等为全权副使，包括理事官、书记官、随员等在内共 40 人的大型使节团，前往美国和欧洲各国进行考察。这个使节团的使命便是与欧美各国进行修改条约的谈判和调查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教育作为日本建设工作的参考。当时革命刚刚胜利，日本国内局势尚未稳定，但是还是派了元老重臣参加这个使节团，这足以说明日本新政府是如何重视这次考察。使节团于 1871 年 11 月出发，到 1873 年 9 月才陆续返国，前后历时将近两年。使团一行考察了美、英、法、比、荷、德、俄、丹、瑞（典）、意、奥、瑞（士）等 12 个国家。在访问期间，使节团仔细考察了西方国家各个方面的情况及经验。代表团在访问途中就不断给国内的留守政府人员写信，随时介绍情况，以便国内及时学习到西方的先进经验。明治元老们就是参考这个考察报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的。要想把一个封建的日本改建成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明治元老表现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卓识远见和励精图治精神，他们提出了“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三大政策，作为指导国家建设的总方针。兹分述如下。

（一）“殖产兴业”与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

殖产兴业政策是明治政府根据大久保利通在考察欧美回国后于 1874 年提出的建议而制定出来的。大久保在“殖产兴业建议书”中写道：“大凡国之强弱，决定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则系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又起因于是否鼓励人民之工业。因此，归根到底，是依据政府官吏之诱导奖励之力。”所以，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政策的主要精神便是充分发挥国家干涉经济的作用，以促进资本主义发展。

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政策主要有三个内容。

第一，用国家力量扶植资本主义。在 1880 年以前，主要采取了“官营示范主义”和“技术移植主义”的方针：大办官营企业，由国家投资，引用西方先进技术设备，聘请外国技师，作为“示范”，以供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仿效。工部省主管的官营企业有铁路、矿山及加工制造三大部门。所谓加工制造指生产机器、水泥、玻璃及造船。工矿及加工制造的企业，大部分是工部省在接管原幕府和各藩所经营的矿山和工厂的基础上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加以改造、扩建而发展起来的。内务省则经营牧场和农产品加工厂——呢绒厂、纺纱厂等近代化工厂。内务省兴建这些事业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出口，抑制进口，以扭转日本在对外贸易方面的入超局面，并进而为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积累外汇。

1880 年以前，明治政府在大办官营企业的同时，也大力扶植和保护私人

谈判修改条约一事，未获结果。

资本。政府以“公司补助金”的名义给予大资本家以巨额补助金。其中受益最大的是三菱公司、三井家族、东京汇总公司和日本铁道公司。三菱公司是日本政府为发动对外侵略的军事需要而一手扶植起来的一家大航运公司。三井家族在幕府末年，在江户、大阪等地经营商业和钱庄，曾在 1868 ~ 1869 年国内战争中在财政上支持过新政府。

自从 1880 年 11 月以后，明治政府开始把官营企业划归私人经营，这就进入全面扶植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的阶段。这个转变是由以下情况决定的。一、官营企业的任务已经完成：既推广了先进技术设备，又培养出大批技术工人。二、在前一阶段私人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发展，已具备了相当的基础。三、官办企业工厂大多数亏损，不能继续官办下去。

政府在决定将官营企业划归私人时，最初索价甚高，以致私人资本家无人问津。因此到 1884 年决定降低出售条件：所有官营企业均按低价、无息、长期分期付款的办法出售。这无异于无偿转让，因为购买企业的人在开始时不必拿出现款即可接管这些官营企业，等待若干年赚到利润后，再向政府分期付款。而实际上政府主要是把这些官营企业出售给同它密切勾结并因而拥有特权的大资本家以及少数经营近代工业的新型资本家。如三井家就购买了三池煤矿、新町纺织所和富冈制丝所。三菱公司从政府购买长崎造船所、佐渡金矿、生野银矿，后来又购买了高岛煤矿、大葛金矿。这样一来，原来主要是从事商业和金融活动的大资本家变成了大工矿企业主，从而奠定了他们后来发展成为“财阀”的基础。

第二，用国家力量促进资本的原始积累。

明治政府为了兴办官营企业及扶植、保护私人资本主义，付出了大量的国家资金。为了前者，到 1885 年为止政府共拿出 2.1 亿日元；为了后者，在 1875 年到 1885 年间政府单以“公司补助金”的名义就拿出 147 万日元。此外，由于在改革“华族”、“士族”俸禄时发给他们大批公债，政府也于事后付出巨额资金。

政府所支出的这些巨款，有以下几个来源：首先是印刷、发行大量纸币。滥发纸币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致物价连续上涨，使人民蒙受巨大损失。

发行公债是政府筹措资金的另一个重要来源。1874 年和 1876 年发行的公债额近 2 亿日元，1873 年发行的公债总额约为 2300 万日元。1878 年和 1883 年共发行 3250 万日元的公债。政府用税收去偿还公债及支付公债利息。

在税收当中，直接间接向农民征收的土地税占重要地位。仅次于土地税的是消费税。消费税的负担同样落在人民大众身上。

这样，通过国家机器，日本广大劳动人民手中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到资本家及公卿大名（他们也变成大资本家）手中，化为资本。因此，明治政府的政策、措施成为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有力的杠杆之一。

第三，用国家力量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及设备、聘请外国专家和派遣留学生。

幕末日本处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初期阶段，技术水平很低，生产设备极其简陋。因此，明治政府在推行殖产兴业政策时，特别注意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及设备。以内务省为例，它所办的轻纺工业企业大部分是用从西方引进成套设备的办法建立起来的。由于引进先进技术设备需要大量外汇，政府便大力发展生丝生产，以便扩大出口赚取外汇。而为了提高生丝的产量，也不能不从外国进口先进生产技术和设备。

但是，只是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和掌握这些技术，因此政府又采取了两个措施：一、向西方选派留学生。二、聘请西方专家和技术人员，而且不惜重金。外国专家的待遇很高，其薪俸一般超过本国高级官员。然而对外国专家的管理甚严，不许他们干涉日本内政。

但是，由于缺少经验，最初日本政府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中也出现过许多问题：一、曾一度出现不顾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条件，不加选择地、盲目地引进、移植外国机器设备，以致大量引进的设备报废了。二、片面强调引进西方技术设备，而忽略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生产管理制度。结果，不少官营企业因管理不善而严重亏损。三、重设备，轻人材；只知从外国引进先进技术，而忽视训练技术人员去使用它们。四、重视引进外国技术，轻视本国传统的、优秀的技术。五、过分重视外国专家，忽略培养本国人材。针对这些错误和教训，日本政府及时作了改进和纠正，而且着重抓培养本国技术人材这个中心环节，其办法是：一、大力发展本国的技术教育，建立许多技术学校；二、在引进外国技术时，先抓人材，后抓设备；三、大胆使用本国技术人材；四、重视改进推广本国传统技术，并且培养这方面的人材。

（二）“文明开化”和大力发展教育

文明开化是明治政府的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国策之一，它意味着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乃至思想风尚和生活方式，以便把日本从封建社会迅速改造成资本主义社会。早在幕末，启蒙学者福泽谕吉（1834～1901年）就出版了几本介绍西洋文明的书籍：《西洋事情》（1866年）、《西洋导游》（1867年）及《西洋衣食住》（1867年）。《西洋事情》一书问世后，立刻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短时间内就卖掉20万至25万册。可见，在1868年革命前，日本人已经向往西方文明了。及后来明治政府一提出“文明开化”的口号，学习西方顿时形成一个高潮。但是在这个高潮中出现了很大的偏向——追逐西方文明的皮毛和崇洋媚外的不良倾向都发生了。有的人甚至主张取消日语，改用“文明”的英语。井上馨说过：“化我国为欧洲帝国，化我人为欧洲国民。只有如此，我帝国方能与泰西各国齐跻于同等地位。”

这种风气立即遭到日本有识之士的指责。木户孝允要求警惕这种追求时髦的倾向，他反对“装饰门面的开化”，认为日本学习西方不能脱离日本的国情。福泽谕吉指出：真正的文明开化，在于学习欧美近代的科学精神，学习其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经济、哲学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

但是，为了把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真正学到手，必须从教育入手，文明开化与教育是不可分的——对于这一点，明治元老是清楚的认识的。伊藤博文说：为了使日本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首先必须“启发国民多数之智法良能，而进于文明开化之域”。木户孝允说：“……确立……牢不可破之国之基者，唯在于人，而期望人才千载相继无穷者，唯在于教育而已。”他们认为发展教育是吸收、消化和运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之科学技术及文化的最好途径。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新政府把教育工作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尽管政府财政困窘，但却不惜把最多的资金用在学校建设上。主管教育的文部省的经费是政府部门中最多的。

新政府是把教育改革和教育建设结合进行的。幕府时代实行的是封建教育，教育非常落后，除了统治阶级中的少数人外，大多数人都是文盲。针对这种现实，明治元老们决定以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制度为榜样改革日本教育制度。

1871年文部省派人赴欧美各国专门考察教育。翌年考察回国后，明治政府决定革除封建教育，仿照欧美实行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建立了小学、中学、大学的完整的近代学校体制，并且确定了普及小学的原则，务期做到“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同一年文部省又宣布成立师范学校。1873年又决定振兴实业教育，以造就科学技术的骨干力量，不但成立采矿、工业、农业、商业等实业学校，而且在中、小学里也加强技术教育。

这样，维新后建立了普通学校、师范学校及实业学校三个教育体系。

关于教育宗旨问题，一开始就在天皇近臣元田永孚为代表的守旧派与伊藤博文为首的维新派之间发生尖锐的斗争，前者反对以西洋为榜样改革教育，认为这样会破坏东方固有道德。由于有守旧派作梗，明治元年新政府在办学宗旨中宣布以“皇学”为主、西学为辅的原则。但是在教育改革的实践中却违背了这个原则，采取了比较开明的自由主义政策，出现了新者皆模仿，旧者皆排斥，完全摒弃日本旧道德的现象。元田等守旧派在1879年公开攻击这个教育方针，说什么社会道德败坏、风俗浇薄都是全盘西化的开明政策所造成的，并且要求在学校里培养学生的“仁义忠孝”的品德。结果，政府与守旧派妥协，到80年代开始向德国学习，提倡“国粹”。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把儒家的伦理标准忠孝仁义作为学生准则。此后，在各级学校中强制推行“忠君”思想教育，并且向学生灌输民族沙文主义。

但是，总的说来，明治政府的教育改革成果最为显著。一、文化知识普及于全民，国民的素质普遍提高，这在公德心等精神文明方面都有所表现。二、培养出大批科学技术人才及工商业管理人才，这对于日本从封建落后国家一跃而跻身于先进强国之林，起了无法估量的积极作用。

（三）“富国强兵”与建立新式军队、警察制度

富国强兵是明治政府实行一系列改革及建设的最终目的。但是，为了富国强兵，首先必须加强国家的军事国防力量，而为了增强这个力量，就必须取消旧的军制，建立新的军制。早在1870年从欧洲考察军事回来时，山县有朋就提出改革军制的建议，并且指出改革军制的目的就是“内以镇压草贼，外足以伸张对峙之势力”。可见，富国强兵政策之提出，不但是针对开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欺凌，具有奋发图强抗敌自卫的积极意义，而且也有对内加强镇压人民及对外侵略扩张的目的。这可以说是富国强兵政策的消极面，而且这个消极面越来越大。

在正式采纳山县有朋的建议之前，新政府曾做了一些军队建设改编的工作。1871年2月发布建立近卫军的法令，从参加推翻幕府的军事行动的原萨摩、长州、土佐三藩的军队中选拔出大约一万人，建立专门保护天皇的近卫部队，称曰“亲兵”。与此同时，又将原属各藩的军队调整改编为新政府的军队。但是，这些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为了富国强兵，必须仿效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军事制度，实行征兵制，建立新式常备军。因此，明治政府决定采纳山县有朋的建议，在1872年11月颁发了征兵诏书。1873年又颁布征

兵令，正式着手建立新式常备军。

实行征兵制，意味着在军事上取消旧的封建武士军队而建立资产阶级军队，剥夺武士垄断军事的特权，而从民众中征兵。但是，为了减少来自武士方面的反抗，又起用“士族”担任新式军队中的骨干军官。

随着新式军队的扩充，从 1875 年起逐步解散由诸藩军队改编的旧式军队。到 1890 年左右，新式军队中的陆军已拥有 7 个师团现役 5.3 万人，预备役 25.6 万人。海军拥有 25 艘军舰和 10 艘鱼雷艇，总计 5 万余吨。

明治政府也注意警察制度的改革，还逐渐地建立和发展了近代警察制度。1873 年大警视川路利良赴欧考察回国，提出“以警治国”的建议。1874 年在全国建立了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国事警察”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由中央的内务省全面指挥全国各地的警察。这个警察制度，既参照外国经验，又继承了日本封建时代的传统。警察头子川路利良就是萨摩藩的封建武士出身，而且明治初期的警察也完全是由封建武士出身的“士族”充当。

日本的新式军队及新的警察制度，都是封建残余和资产阶级的混合体。新式军队称为“皇军”，即天皇的军队，向他们灌输效忠天皇服从天皇的思想。1878 年发布的“军人训诫”第一条就要求军人把天皇当作超人的“神”来崇拜。所谓“武士道”精神成为一切军人的行为准则。“武士道”本来是日本封建武士的道德规范，它强调“忠君”、绝对服从、勇敢及不怕死的精神，军人在必要时必须勇于拔刀“切腹”，“切腹”被看作是武士“忠勇”、“义烈”的表现。

明治维新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说它是资产阶级革命，是因为它通过国内战争，消灭了封建领主制度，推翻了幕府的封建统治，使得政权从封建领主阶级转移到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手中，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说它是不彻底的革命，是因为这次革命不仅没有给人民带来民主，而且也没有给一般资产阶级以充分的民主；它不仅未能彻底解放农民，而且以沉重的地税去阻碍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在消灭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时，不是把土地无代价地分配给劳动的农民，而是把新地主对于佃农的剥削保存下来；在消灭封建等级时，不是实现真正的资产阶级平等，而是保留了“华族”、“士族”、“平民”的差别；在推翻幕府的统治时，不是把天皇制同时予以废除，而是把天皇抬到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并加以“神化”，建立了天皇专制制度；它未能为自由资本主义和自由资产阶级的发展充分提供条件，而是凭借国家的权力，发展了带封建性的、垄断性的国家资本和特权财阀资本，这种特权资本不仅剥削劳动人民，而且也压抑了中小资本。一句话，这次革命保存了大量的封建残余，因而随着向帝国主义过渡，日本就形成为军事封建法西斯帝国主义国家。

那末为什么日本这次资产阶级革命如此不彻底？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革命的战斗力量虽然主要是人民群众，但是人民群众并没有用革命行动推动革命前进，没有影响革命进程及革命结局。第二，领导革命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赞成资产阶级改革的下级武士。这一点是由日本的特殊的历史条

关于明治维新的性质问题，在史学界是众说纷纭，有的认为它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有的认为它是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有的人说它不是革命，而是改良，是“从纯粹的封建国家体制向封建主义的最后政治形态专制王权的转变”，并且认为后来的自由民权运动才是日本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此外还有“民族运动”、“革命与改革”等等说法，不一而足。

件所决定的。革命前夕，日本资本主义关系远远没有成熟，资产阶级刚刚诞生，数量不多，经济实力十分薄弱，因而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外国资本主义突然入侵，并且造成了日本的民族危机。这就使得国内一个能量最大的集团——下级武士于仓卒之间担任了革命领导者的角色，起来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下级武士之所以能够成为革命的领导者，是因为它具备下面几个条件：一、他们大多数资产阶级化了，所以最关心日本的资本主义前途及国家的命运。二、日本武士从来就是一个垄断文化的阶层，在下级武士中间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儒学者、国学者、兰学者和洋学者，他们中间大多数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三、下级武士多半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才干，在他们中间产生了出色的政治家、理财家、军事家及外交家。也有的成为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和工业家。

但是，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化的武士终究与封建制度有藕断丝连的联系，而且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受儒学、国学的思想熏陶，有浓厚的封建意识——忠君思想。这就使得这次资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地保留大量的封建残余，从而造成了革命的不彻底性。

不过，总的说来，这次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就是巨大的，它把落后的封建的日本推进到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地位，使日本避免了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命运。

在这次革命中，下级武士所发挥出来的那种炽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奋发图强、刻苦学习先进国家的那种进取的精神，为了救国而把生死置之度外的那种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些精神是明治维新所留下来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明治维新在中国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反应。清政府中的顽固派全盘否定了明治维新，谴责维新是“篡国”。洋务派肯定明治维新学习西方技艺的一面，否定其政治改革的一面。而黄遵宪、郑观应、王韬、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则站在维新派的立场上，对于明治维新推崇备至。

明治维新推动了中国的戊戌变法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积极从事变法活动，也是由于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鼓舞。黄遵宪写了《日本国志》，对于明治维新的原因、动力及意义都作了论述，并且分析、评论了维新时期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等方面所进行的改革。他特别赞赏日本政府大力提倡“殖物产，兴商务”的政策。康有为写了《日本变政考》，按时间顺序介绍了维新时期的日本大事，着重分析了明治政府各项改革的利弊。黄遵宪和康有为写这两本书的目的，便是希望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在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性的改革。比如，康有为在把《日本变政考》进呈光绪皇帝时，还建议中国应该“以强敌为师资”（当时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实行变法，以便使中国“由弱而强”。

第十四章 17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中叶的亚洲

古老文明的亚洲大陆，从 16 世纪初年开始，就变成了欧洲殖民者侵略和奴役的对象。先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继之而来的是荷兰、英国、法国和沙俄。他们使用炮舰政策，蚕食鲸吞，到 19 世纪中叶，先后占据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印度和西伯利亚等地，奥斯曼帝国、伊朗和中国等国也相继被列强敲开大门，强加上不平等条约，沦为半殖民地。

亚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侵略和奴役的斗争连绵不断，到 19 世纪中叶汇集成一次反殖反封建斗争的高潮。印度尼西亚爪哇人民起义（1825～1834 年）是这一次高潮的序幕，构成这个高潮主要内容的伊朗巴布教徒起义（1848～1852 年）、中国太平天国（1851～1864 年）、印度民族大起义（1857～1859 年）沉重地打击了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对这个规模大、地域广、持续时间长的革命风暴，恩格斯预言：不要过多少年，就可以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第一节 印度尼西亚沦为荷兰殖民地与印尼人民的反荷斗争

（一）荷兰的侵略和殖民统治

印度尼西亚由三千多个大小岛屿组成，在 17 世纪中叶处于分裂割据状态。群岛上的伊斯兰教封建王国主要有：东爪哇的马塔兰、西爪哇的万丹、苏门答腊的亚齐和苏拉威西的戈阿等。在加里曼丹等岛屿上，还残存一些印度教王国。

印度尼西亚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在爪哇，封建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在沿海地区，商品货币关系和手工业都比较发达。封建地主让商人承包税收，越来越多地用货币租税代替实物租税。在其他各岛上，社会经济则显著落后，有的地区（如苏拉威西）盛行奴隶制，有的地区（如新几内亚）还处在原始公社制阶段。

印度尼西亚，特别是马鲁古群岛出产珍贵的香料（胡椒、豆蔻、丁香等），一向驰名于东方和欧洲市场，早就为欧洲殖民者所垂涎。为了垄断香料贸易，葡萄牙人第一个侵入了印度尼西亚。在 1511 年强行占领了安汶岛。这是印尼遭受殖民侵略的开端。

荷兰人接踵而来。1596 年 6 月，科尔尼里斯·德·霍特曼率领一支荷兰船队首航印度尼西亚。霍特曼抵达万丹港，态度蛮横，并用武力劫夺了两艘爪哇船。为此，万丹素丹将其监禁，罚款后驱逐出境。离开万丹后，他们继续航行到马鲁古群岛，要求通商，均遭拒绝，只得扬帆回国。1598 年荷兰人又作第二次远航。由范尼克率领八艘船只于 11 月到达万丹。这时正值万丹与葡萄牙殖民者发生武装冲突，荷兰人乘机向万丹素丹提供一些助力。葡人被击退后，荷人邀功，获准设立办事处，买得大量胡椒，满载四艘船只先驶回国，获利 400%。其余四艘继续沿爪哇海岸前进，在班达、安汶等地搜购香料，并在安汶设立一个收购站。这次远航既掌握了到印尼的航线，又获得两个立足点，为日后进一步侵略创造了条件。

从 1599 年至 1601 年，荷兰先后组织了十多次远航队到印尼搜购香料。一时经营东方物品的公司林立，彼此进行着激烈的竞争。1602 年，荷兰国会通过决议，把各公司联合成一个大公司，名为联合东印度公司，简称东印度公司。该公司集合资本 250 万盾，由国会给予特许证，有权用国会名义发动战争，签订条约，占据土地，建筑炮垒等。

东印度公司成立后，一方面攻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印尼的据点；一方面把以前各公司分别设立的收购站统一起来，改为联合公司的商馆。在 17 世纪的最初十年，公司先后征服摩鹿加群岛上的素丹小国，控制盛产香料的安汶、德那地、帝多利和班达群岛。1610 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尼西亚设置总督府，任命彼德尔·坡施为首任总督。他用 2700 盾在雅加达购得一片土地，建筑房屋、仓库和堡垒。1619 年荷兰和英国殖民者因争夺雅加达而发生火并，结果英国办事处被摧毁，市区化为灰烬，荷兰人占领了雅加达。1621 年雅加达改名为巴达维亚，成为荷兰侵略印尼和亚洲各国的大本营。从此以后，荷兰殖民者的侵略重点移到了爪哇岛。他们对强大的马塔兰王国和万丹王国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不断地唆使这两个王国之间相互斗争，以削弱它们的力量。”

自从荷兰殖民者侵占雅加达后，马塔兰与东印度公司的矛盾日益尖锐。阿贡素丹力图驱逐荷兰人出境。他先后派兵占领马都拉、泗水和井里汶等国，并制定专卖政策，禁止人民售米给荷兰人。1628 年至 1629 年，马塔兰出兵攻打巴达维亚，但未成功。阿贡素丹的后继者阿孟古拉一世，是一个残暴的君主。1674 年，马都拉王子杜鲁诺佐约举行起义，进军爪哇，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荷兰殖民者妄图以“援助”为名，行奴役之实，遭到杜鲁诺·佐约的坚决拒绝。起义者在赶走欧洲强盗和恢复麻诺八歇国家口号的鼓舞下，连战皆捷。阿孟古拉一世惊慌失措，逃离首都，投靠东印度公司，但很快死去。其子阿孟古拉二世于 1677 年和公司订立卖国协定，同意公司在马塔兰领土上免税贸易，割让加拉横和勃良安地区以及爪哇北岸的三宝垄，偿付公司因给予援助而耗费的全部费用，将马塔兰全部海港暂交公司使用；荷兰殖民者则同意出兵镇压杜鲁诺·佐约起义。1678 年，东印度公司调动大批军队侵入马塔兰。起义者顽强抗击，到 1679 年底终为侵略者所镇压，杜鲁诺·佐约被害。

荷兰殖民者控制了马塔兰以后，开始侵略万丹。1651 年阿庚素丹即位后，尽力抵制荷兰的侵略，建立了一支精锐的舢板队，给荷兰人的海上活动以很大的威胁。阿庚素丹还拥有欧式帆船，远航印度与菲律宾。当时万丹港盛极一时，贸易发达，港口上又筑有欧式的炮台，足资防守。但是，70 年代后，万丹王国逐渐走上衰亡道路。因王位继承争执，万丹宫廷分为两派：一派是父王派，另一派是王子哈夷素丹派，两派内争，削弱了万丹的国力，给荷兰殖民者以可乘之机。1680 年，哈夷素丹乘父王准备攻打巴达维亚之际，发动宫廷政变，夺取政权，父子兵戎相见，达两年之久。哈夷素丹向东印度公司求援。荷军于 1681 年开赴万丹港口，激战数月，阿庚素丹为荷军所俘。哈夷素丹于 1684 年同荷兰东印度公司签订不平等条约，确认荷兰在万丹及其苏门答腊属地楠榜享有贸易垄断权，并支付巨额军费。万丹变成荷兰的属领。

在此之后，荷兰殖民者不断地利用马塔兰和万丹王国的封建内争，迫使它们签订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一步一步地使它们完全丧失独立，成为公司的殖民地。

东印度公司在爪哇建立了两种占领制度：公司直辖殖民地和藩属土邦。到 18 世纪末期，直辖地占爪哇总面积的五分之三，总人口的二分之一以上。直辖地由公司委任荷兰人为省长，掌握最高权力，保留原来印尼封建王公的特权地位，让他们担任各级殖民机构的官吏。藩属土邦在爪哇有万丹、井里汶、梭罗、日惹和莽古尼卡兰。它们名义上是“独立的”，由各邦素丹统治，但公司派驻的驻扎官却拥有极大的权力。他直接干预王位继承，监督与东印度公司签订的奴役性条约的实施。

为保证高额利润，东印度公司实行垄断贸易制度，独占了产品交换的全过程。在收购方面，公司规定一定的地区种植指定的产品，例如安汶岛种植丁香，班达岛生产肉豆蔻，勃良安种植咖啡，并以低廉的价格卖给公司。为防止“走私”贸易，公司每年派出船队四出巡逻。违者要遭到残暴的惩罚。因为班达岛的居民把肉豆蔻卖给了非荷兰籍的商人，东印度公司几乎把班达岛的全体居民（约 15,000 人）都杀光了。在贩卖方面，公司独占某些商品的专卖权。它与藩属土邦签订条约，规定棉布、鸦片等商品由公司输入。垄断贸易制度给公司带来了惊人利润。公司在安汶和班达以 7 分钱收购 1 磅香料，运到荷兰则以 300 分（3 盾）的高价出售。在爪哇收购食盐每石费用仅 6 盾，运到苏门答腊每石卖价 50 盾至 70 盾。

东印度公司在直辖地实行实物定额纳税制，规定各州应承担一定数量的贡品份额，各州再把贡品摊给各村，由村长强迫农民种植。在藩属土邦实行强迫供应制。强迫供应制首先实行于马塔兰，规定马塔兰每年以最低价格供应公司一定数量的大米。后来推行到其他土邦，如万丹供应胡椒，井里汶供应蓝靛、蔗糖、大米、木材等，勃良安供应木材、大米、胡椒、牲畜、棉花等。无论是贡品或供应品，都由各级官吏负责运送到雅加达。按规定，公司应付给生产贡品或供应品的农民以微薄酬金。而这一点点酬金大都被荷兰职员和各级官吏装入腰包。

东印度公司还在印尼实行盗人和贩卖奴隶的制度。为了掳掠奴隶，公司最初在苏拉威西实行盗人制度。马克思说：“荷兰人为了使爪哇岛得到奴隶而在苏拉威西岛实行盗人制度。为此目的训练了一批盗人的贼。盗贼、译员、贩卖人就是这种交易的主要代理人，土著王子是主要的贩卖人。盗来的青年在长大成人可以装上奴隶船以前，被关在苏拉威西的秘密监狱中”。公司还与巴厘等岛屿的封建主缔结供应奴隶的协定，并到中国东南沿海掳掠中国居民到印尼为奴。雅加达一度成为一个贩卖奴隶的大市场，1778 年仅巴厘奴隶就有 13,000 名。奴隶从事各种繁重的劳役，在欧洲人开办的种植园作苦工。例如，荷兰殖民者在消灭班达岛的居民以后，把班达岛的土地分给荷兰的退伍军人，使用奴隶种植肉豆蔻。这些荷兰种植园主靠残酷剥削奴隶而变成了富翁。

荷兰殖民者通过这些奴役方式，从印度尼西亚掠夺了大量财富。在 1602~1615 年间，公司年平均利润率为 32.5%，1650 年竟高达 500%。1750~1759 年间，从印度尼西亚汇回荷兰的汇款每年平均 250 万盾，1770~1779 年间平均每年 400 万盾。掠夺去的金、银和宝石的价值约等于汇款的两倍。与此相反，印度尼西亚人民则陷于饥饿、贫困的境地，以致人口减少、土地荒芜。

（二）苏拉巴蒂起义和“红溪事件”

荷兰殖民者的侵略和掠夺，不断激起爪哇各地人民的起义和反抗。17世纪末年爆发了苏拉巴蒂领导的反荷起义。苏拉巴蒂原是巴厘人，名叫翁栋，在一次内战中被俘，卖给荷兰人，送到巴达维亚当奴隶，后来又在公司的军队中当兵，升为军官。在东印度公司与万丹进行战争时，苏拉巴蒂因不堪忍受荷兰军官的凌辱，带领自己的同伴，在勃良安起事，反抗荷兰殖民者。万丹素丹投降后，苏拉巴蒂转移到马塔兰，受到阿孟古拉二世的欢迎。荷兰派军进攻，在卡尔达苏拉战斗中，得到马塔兰支持的苏拉巴蒂打败了荷军。随后，苏拉巴蒂占据了巴苏鲁安，得到当地农民的广泛支持，其辖区日益扩大。

1703年，阿孟古拉二世去世，由其子阿孟古拉三世继位。阿孟古拉三世比其父更坚决地联合苏拉巴蒂，共同反抗东印度公司。事态的发展引起了以其叔父邦格兰·甫格尔为首的封建王公的不满。邦格兰·甫格尔逃往三宝垄，与东印度公司勾结，自立为王。1705年他与东印度公司签订新约，承认井里汶、勃良安和马都拉东部地区归东印度公司管辖。东印度公司出兵协助他镇压苏拉巴蒂起义，反对阿孟古拉三世。1706年10月，东印度公司的军队进攻庞吃，苏拉巴蒂英勇抵抗，荷军伤亡惨重。不幸，在这次战役中苏拉巴蒂受伤，不久在巴苏鲁安去世。次年，荷军继续进攻由苏拉巴蒂三个儿子率领的起义军，巴苏鲁安被荷军占领，起义军余部退到玛琅。1708年阿孟古拉三世向荷兰投降，被流放到锡兰岛（今斯里兰卡）。苏拉巴蒂的子孙们坚持抗荷斗争，直到1767年。

苏拉巴蒂起义尚未完全平息，1740年又爆发了华侨与印尼人民的联合抗荷斗争。荷兰占领巴达维亚的初期，为了解决劳动力的不足，竭力招引和掳掠华工从事手工业和农业生产。1706年，雅加达的华侨已超过1万人，1720年增至6万人，市郊的华侨尚未计入。华侨人数的增多和经济势力的加强，使荷兰殖民者日益不安。他们认为富裕的华侨是他们的竞争对手，而贫苦华侨则是他们的反对者。于是便决定采用野蛮手段，对华侨进行排斥、打击和迫害。

1706年，荷兰殖民政权颁布限制华侨入境的命令，规定只有取得“入境许可证”的人方可入境。领取入境证要缴纳十盾；已入境的人要领取“居留证”，纳费五盾。1722年，殖民政权下令拘捕雅加达的所谓“无业华侨”，并禁止华侨在路旁开设饮食商店和随意外出旅行，被捕者部分被遣送回国，部分送往锡兰岛和南非充当奴隶。1727年，殖民者又逮捕所谓没有居留证的华侨。1740年7月25日，荷兰殖民总督命令贫苦华侨登记，以便送往锡兰，充当苦力。命令发布后，没有一个华侨奉命登记。于是殖民者蛮横宣布：凡是殖民政权认为可疑的人，不论其是否贫穷或有否居留证，一律逮捕审查。许多勤勤恳恳的华侨被捕，甚至被戴上手铐，押往锡兰岛。他们在途中受到的非人待遇，绝大多数被折磨至死。当死里逃生的华侨潜回雅加达并把殖民者的罪行公诸社会之后，广大华侨义愤填膺，一致认为：与其坐而待毙，不如起而反抗，庶几死中求生。大起义时机成熟了。

当华侨正在酝酿反荷起义之际，惧祸者纷纷逃往甘打利亚，荷兰殖民者派兵追击，很多华侨被杀，被捕者多至数百人。于是群情鼎沸，华侨终于被迫在1740年10月9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抗荷兰殖民者的大起义！

本来起义的领导者连怀、林楚等计划分兵两路，一路自丁加兰进攻文登墟炮台，一路从望加寺攻击荷兰兵营，俟得手后，再合力进攻巴达维亚，扫荡殖民者的军事巢穴。但是林楚私受贿赂，出卖起义计划，致使荷兰殖民者得以从容布置，作了准备。因此，攻击荷兰兵营的队伍遭受重大伤亡，攻击炮台的队伍也受阻无功。在此紧急关头，进攻炮台的队伍恐怕贻误战机，遂直接进攻巴达维亚。这时，凶狠的荷兰殖民者一面杀死狱中华侨，炮轰起义队伍和华侨居留区；一面调集军队，组织流氓恶棍，大肆洗劫华侨商店住宅。起义队伍在巴达维亚西门、南门、文登墟及望加寺一带苦战七日七夜，最后终因组织松懈、武器不良、粮弹两缺，伤亡太大而转移。在此次荷兰殖民者一手制造的大屠杀中，华侨惨死数万，所流的血把河水都染红了，故称这次起义为“红溪之役。”

红溪事件后，起义者在黄班等人领导下，联合印尼人民，共同进攻扎巴拉、淡目等地的荷军侵略据点。直葛、三宝垄、泗水等地都爆发了华侨和印尼人民联合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武装斗争，并先后克服南望等城市，起义声势非常浩大，起义浪潮弥漫全岛。甚至连封建王公如马塔兰素丹巴古·甫握诺二世等也暗中和起义队伍互通声气，待机而动。后来巴古·甫握诺二世虽因形势不利而变节，但他的部下却另立玛斯·卡连迪为新素丹，继续与华侨联合抗荷。1742年6月，起义军攻克首都，巴古·甫握诺偕同荷兰使节逃到坡诺罗科。荷兰军队反扑，先后占领巴当、淡目和扎巴拉。1743年玛斯·卡连迪在泗水投降，起义被镇压。这次起义在华侨和印尼人民反殖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荷、英、法对印尼的争夺

在印度尼西亚人民不断反抗下，东印度公司走上了衰落的道路。公司财政入不敷出，负债累累。到1780年，公司负债总额已达2500万盾，走到了破产的边缘。

同时，东印度公司对印尼的垄断性剥削，引起了荷兰国内工业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对印尼实行自由贸易。为此荷兰政府从1796年3月1日起接管了东印度公司的营业。1800年东印度公司正式解散，荷兰政府接管了它的全部财产，承担了它的全部债务。

19世纪初，印度尼西亚成了英法争夺的对象。1806年，拿破仑占领荷兰，委派亲法的荷兰人丹德尔斯为印尼总督。逃亡英国的荷兰执政威廉成为英国统治集团争夺印尼的工具。1906年底在雅加达港口的荷兰舰队，几乎全部被英国舰队歼灭。

1808年，丹德尔斯来到印度尼西亚，他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军事，准备对英作战。丹德尔斯强迫各地封建主提供兵员，把殖民军从4000人扩增到19,000人；修筑横穿东西爪哇的公路，全长达1000公里；在泗水、万丹和马都拉等地建军港，筑炮台。这些巨大的工程都是靠当地居民的血汗来完成的，成千上万农民死于繁重无比的劳动之中。例如，在万丹建筑堡垒的1500名农民，没有一个能活着返回家园的。丹德尔斯除保持了剥削爪哇人民的一切旧方法外，还把土地出售给欧洲和华侨商人，凡是向政府承购土地者，不仅可以自由使用购得的土地，而且可以奴役土地上的农民。爪哇人民不堪徭役和苛税之苦，因之在万丹和井里汶等地爆发了反抗殖民暴政的起义。1811年8

月，英国驻印度总督明多带领战舰百艘，进攻巴达维亚。人民拒绝支持荷兰殖民者，被强制征募的军队一触即溃。刚到任的荷兰驻印尼总督詹生氏在三宝垄向英军投降，把爪哇统治权移交给英国人。

英国统治印度尼西亚后，委派莱佛士为总督。这个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到印度尼西亚后实行改革，推行了一系列新殖民政策：一、宣布全部土地为宗主国所有，农民为世袭佃农；二、废除强迫供应制，改行地税制，依收成而定税率，税额从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收税以村社为单位，直接向殖民财政机构交纳，地租可用货币或稻米缴纳；三、废除贸易垄断制和国内关卡税，鼓励私人资本开辟、经营种植园；四、分爪哇为 18 州，每州设一州长，甫巴迪（即封建领主）的权力被削弱；五、设立陪审制。这些政策的实行，活跃了殖民地的商品货币关系，增加了农产品的出口，扩大了英国工业品的市场。印度尼西亚各港口开放后，来爪哇的外国商船在短短的四年内增加了十倍。

拿破仑帝国覆灭后，荷兰恢复独立。根据 1814 年英荷所签订的条约，印度尼西亚重归荷兰统治。荷兰殖民者卷土重来后，首先遇到英、美两国在商业上的竞争。荷兰殖民者因本国经济比较薄弱，无力同工业发达的英国竞争，于是重走老路实行保护关税。1824 年，荷兰国王组织尼德兰贸易公司，运输和销售印度尼西亚的土产。又实行新关税法，对进口别国货物课以重税，以保证荷兰在贸易上的优越地位。荷兰殖民者还禁止印度尼西亚封建主出租土地给别国种植园主，要求废除租赁契约，以进一步排挤别国资本的势力。殖民当局沿用了英国实行的土地课税制，并部分恢复东印度公司时期的强迫供应制，扩大咖啡种植。印度尼西亚人民还被迫交纳各种新的苛捐杂税，如门户税、庭院税、牲畜税、稻谷税、迁居税、土地贸易税等，甚至过桥入市也都须纳税，人民极为不满。对出租土地的禁止，使封建主的收入受到影响，许多封建主无法偿还预收的租金，负债累累，因此也对殖民统治产生怨恨。荷兰殖民者同印度尼西亚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矛盾终于导致了 1825 年至 1830 年爪哇人民大起义。

（四）蒂博尼哥罗领导的人民大起义

蒂博尼哥罗（1785～1855 年）是日惹素丹的庶子，自幼跟随祖母居住在德卡尔列佐（日惹附近）领地。蒂博尼哥罗对自己的祖国和民族文化受到西方外来势力的蹂躏和摧残怀有极大的愤慨，对荷兰殖民者日益剥夺印尼贵族的权力，深感不满。他向往麻诺八歇王朝的鼎盛时期，企图恢复贵族的权力和地位，重建一个独立强盛的伊斯兰教封建王国。起义前，蒂博尼哥罗实际上已成为封建贵族抗荷集团的领袖人物，他的领地成了反荷人士的聚集地。

蒂博尼哥罗的反荷活动，直接威胁了荷兰殖民者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于是，殖民者想尽各种办法，企图消灭这支抗荷力量。他们一面剥夺蒂博尼哥罗继承王位的权利，一面劝诱他迁居日惹素丹的宫廷，以便于监视。蒂博尼哥罗识破了敌人的阴谋，拒绝迁往日惹。荷兰殖民者诡计失败，决定以武力镇压。1825 年 7 月，殖民者借口修筑公路，派重兵包围蒂博尼哥罗住宅，企图逮捕他。蒂博尼哥罗立即组织他周围的人员进行抵抗，并冲出敌军重围。这一事件成了爪哇人民大起义的导火线。

1825 年 7 月 20 日，蒂博尼哥罗率领部属在离日惹约十一公里的斯拉朗

发动了武装起义。他发表告人民书，号召人民进行圣战，消灭荷兰殖民者。数日内有近六万农民响应起义，日惹王族有七十多人参加起义。梭罗王国的著名阿訇奇阿依·摩佐也来到斯拉朗，成了蒂博尼哥罗的主要顾问。许多华侨参加作战，或供应武器弹药。起义军所到之处严惩了殖民官吏，烧毁殖民者的住宅、仓库、关卡和种植园。

起义军占领了日惹附近地区，并包围了马吉冷和荷军大本营日惹。当时，荷兰殖民军正忙于镇压苏门答腊、加里曼丹、苏拉威西的抗荷起义，留守爪哇岛的荷军不多，并散驻在各地。因此，当爪哇的起义军包围日惹时，被困在日惹城堡内的荷兰殖民者丧魂落魄，向总督范·德尔·卡勃仑哀鸣：“我们没有足够的兵力，我们无力坚持下去。……我们将在城堡中饿死，我们的前途多么悲惨啊，救救我们吧！”

在这种形势下，荷兰殖民者积极部署兵力，力求解日惹之围。7月30日，副总督兼荷军总司令德·科克亲自来梭罗督战，并且控制梭罗王国，防止梭罗的王族参加起义军；还从三宝壟派出军队南下支援日惹，但这支增援部队被慕尔约·圣迪科率领的起义军完全消灭了；随后，殖民者又组织兵力进攻起义军的大本营斯拉朗，蒂博尼哥罗回避大规模的战斗，下令部队撤退，殖民军扑了一个空。

起义军的节节胜利，大大鼓舞了爪哇广大地区的人民群众，抗荷斗争不仅波及日惹王国，而且蔓延到其他地区。北到北加浪岸、三宝壟、南望、淡目，西到万由马士，东到茉莉芬，起义几乎席卷了爪哇岛的中部和东部。

在起义军取得一系列胜利的基础上，1825年10月，蒂博尼哥罗建立伊斯兰教王国，自立为素丹。从1827年开始，蒂博尼哥罗着手整顿军队，把起义军分成若干固定的队伍，作为联络和推动各地斗争的骨干力量。

荷兰殖民者为了镇压起义军，从巴达维亚、泗水和苏拉威西等地调来大量正规军；在三宝壟组织荷兰侨民的“志愿人员队伍”；还强迫梭罗素丹、马都拉素丹提供兵员组成雇佣军。之后，殖民军在范·兴上将的统领下，集中兵力围攻北加浪岸和三宝壟地区的起义军。接着殖民军总司令德·科克带了一支配有火炮的几千殖民军，向斯拉朗进攻，妄图一举抓住蒂博尼哥罗，摧毁起义政权。但起义军早已转移，斯拉朗已是一座空城。以后，德·科克又几次寻找起义军主力作战，都一再扑空。起义军采取游击战术，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使荷兰殖民军疲于奔命，伤亡惨重。

1828年底，范·德尔·卡勃仑总督由于战争失利，被迫下台，遗缺由德·科克代理（后由迪·贝斯任总督）。德·科克一面采用碉堡战术，在起义军控制地区，每隔20公里至30公里筑一碉堡，并组织14个流动部队与各碉堡据点互相配合，企图围歼起义军；一面在起义队伍领导上层进行诱降分裂活动，拉拢一些封建主，允许他们在归附后可以占据“叛变者”的土地。殖民者的诱降分裂活动，在某些封建主身上产生了效果：1828年11月，蒂博尼哥罗的主要助手奇阿依·摩佐叛变投敌；1829年10月起义军的将领申托特和其他一些人也相继投敌。但是，蒂博尼哥罗在艰苦环境中，依靠农民群众支持坚持战斗，表现出不屈不挠的英勇气概。他既不屈服于荷兰的军事压力，又断然拒绝殖民者的多次诱降，甚至当殖民军俘获其长子，以杀害逼降时，也不为所动。

1830年3月8日，蒂博尼哥罗被骗，前往马吉冷同德·科克进行停战谈判。在谈判中，蒂博尼哥罗坚持要在爪哇建立独立的伊斯兰教王国。荷兰殖

民者背弃诺言，逮捕了蒂博尼哥罗及其随从，解往巴达维亚，后被流放到万鸦老，1834年又迁往望加锡。

蒂博尼哥罗领导的反荷起义在广大农民支持下，以农村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了五个年头，歼灭了15,000多名殖民军，使荷兰殖民当局消耗战费2000万盾，惩办了许多殖民官吏，烧毁了无数咖啡种植园，给荷兰殖民者以沉重打击。这次人民起义在印度尼西亚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并揭开了19世纪中期亚洲民族解放斗争高潮的序幕。

荷兰殖民当局残酷镇压了爪哇人民大起义之后，为了弥补它在战争中所消耗的大量军费和克服国内所遇到的财政困难，变本加厉地对印度尼西亚进行剥削。

1830年至1870年，荷兰殖民者在印尼推行一种“强迫种植制度”，规定农民必须以八分之一的土地种植欧洲市场所需要的物产：甘蔗、蓝靛、咖啡、烟草等。全部收成，按规定的价格交售给政府。种植上述农产品的土地，免交地税。不适于种植经济作物的地方，农民交纳人头税，或每年以五分之一的工作时间为殖民地政府服徭役。荷兰殖民者为了有效推行强迫种植制度，还规定监督农民种植的封建主和官吏可分享总收成的一部分，授予大片土地和种种特权。

在这种制度下，农民所受的剥削大大加重。封建主为从中多捞油水，强迫农民种植土产的土地，不是八分之一而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是全部；殖民政府规定的收购价格很低，往往不足以偿付劳动费用；被征发服徭役的农民，远离家乡，劳动时间长达100天、200天。由于农民种粮土地减少，如遇天灾歉收，大批死亡。如东爪哇的淡目，原有居民33.6万人，经过1848年饥荒，减至12万；克罗博安原有居民89,500人，经过1849年饥荒，仅存9000人。农民忍无可忍，时常集众反抗。

这个制度给荷兰殖民者带来了神话般的利润。印度尼西亚的输出额由1830年的1270万盾增长到1840年的7400万盾，即增长了近五倍。在实行这个制度的40年间，荷兰殖民者总共搜刮了8亿盾。这些资金流入宗主国，加速了资本的积累，推动了荷兰本国工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荷兰殖民者在印度尼西亚的侵略范围也迅速扩大。在18世纪末叶以前，荷兰对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以爪哇及马都拉岛为中心，对其他外部诸岛不够重视，当时荷兰人把许多未征服的岛屿叫做“外部领地”。他们对“外部领地”不以夺取土地为目的，只在这些地方设置公司的经理处和堡垒，以控制封建主和加强对人民的掠夺。但是从1840年英国势力侵入北婆罗洲，加之苏伊士运河开通后，印度尼西亚和欧洲的市场航距缩短，欧洲资本家涌入印度尼西亚，刺激荷兰殖民者加紧侵占外岛。1846年至1849年间，荷兰向巴厘岛发动三次侵略战争，终于迫使当地王公承认荷兰统治，随后又把侵略矛头指向西加里曼丹。这里的华侨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并肩作战，抗击荷兰的侵略。华侨的自卫组织兰芳公司在印尼人民的支援下一直坚持到1886年。1860年，荷兰殖民者吞并了南加里曼丹的马辰王国。在苏门答腊岛上，荷兰殖民者逐渐兼并许多独立的小邦。到70年代，印度尼西亚只有亚齐还保持着政治上的独立。

第二节 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与印度人民的抗英斗争

（一）莫卧儿帝国统治下的印度

1525年蒙古贵族帖木尔的后裔巴布尔，率部侵入印度，打败德里苏丹，建立了莫卧儿王朝。17世纪后半期，莫卧儿帝国依然是印度几个封建国家中的一个。到18世纪初，它才统一了科佛里河以南的整个印度。

莫卧儿帝国统治时期，农业是印度封建经济的基本部门，由于商品货币关系渗入农村的结果，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农村公社的瓦解加速了。扎吉达尔和柴明达尔利用向宫廷馈赠礼物等手段，逐渐把有条件的、非世袭的领地或包税地攫为己有，变成封建大地主。村社内部也发生了阶级分化。多数农民在封建地主和商业高利贷资本的盘剥下而贫困破产，少数上层则利用经济政治权势，霸占村社公有地和社员使用地，剥削同村居民，窃取村社奴仆（不可接触者等）的劳动果实，变为不劳而食的小封建主。

印度素以手工业的精巧闻名于世。首饰匠、铜匠、军械匠、木刻和石刻匠的技术极为高超。印度的织工们用棉和丝织成各种各样的布匹，用羊毛织成优美的毯子和披巾。17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手工业进一步脱离农业。许多农村的手工业者除供应村社社员需要外，开始在市场上出售他们的部分产品；商路附近的农民离开村社，以纺织为主要职业，建立自己的居民点。城市的富商巨贾力图用预付现金等方式控制手工业者，并进而投资工业。例如，在从马德拉斯到阿尔马冈的广大地区中，布匹生产者都掌握在当地商人卡济·维兰纳的手里；在巴拉索尔—索赫罗郊区，对织工织物的收购，都为当地中间商人凯姆·昌德所垄断；17世纪后半期，一些大商人在哥尔孔达开采钻石矿，雇佣工人达6万人，劳动组织比较严密。在纳拉萨普尔，有一些富有经验的造船承包人雇用住在附近的木匠、铁匠和其他工人来建造、修理船只。18世纪90年代，在萨伊达巴德市的缫丝厂里，设置了三十多日煮茧锅，雇用了几十名工人，实行计件付酬制。

由此可见，在近代开端时期，印度虽然还是一个封建农业国，但在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印度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印度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有土地制的破坏，动摇了莫卧儿帝国的经济基础，助长了封建割据势力。在封建制度日益没落的历史条件下，奥朗则布囚其父（沙·杰罕），败其弟（达拉·希科），于1658年登基称帝。在他统治的半个世纪（1658~1707年）中，顽固地维护伊斯兰大封建贵族的利益，推行扩大封建剥削、迫害印度教徒、镇压人民运动的政策。1665年，他颁布法令，规定伊斯兰教商人输入商品只缴纳2.5%的内地关卡税，而印度教商人则须缴5%，两年后又完全免除伊斯兰教商人的关卡税。1669年，他向各省总督发出通令，要求“拆毁异教徒所有的学校和寺院”，据此印度教寺庙或改建为清真寺，或夷为平地。1671年颁布的法令中规定，把大部分印度教官吏驱逐出国家衙署和税务机关以外，后又改为只能占半数。1679年，他恢复

巴布尔自称蒙古人，“莫卧儿人”系“蒙古人”一词的音变。

扎吉达尔是以担任官职（多半是军职）为条件而占有土地的封建主。柴明达尔初为国税包税人，后变为世袭的土地占有者。

了早已废止的异教徒人头税，使占农村人口 80% 的印度农民的捐税负担增加了三分之一，奥朗则布为控制沿海港口以增加商税收入，向南扩张领土，于 1686 年和 1687 年先后吞并了比贾普尔和高康达，帝国领土直抵克利斯纳河。

奥朗则布的倒行逆施激化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

1656 ~ 1674 年，印度中部马拉特人举行起义。马拉特人是居住在德干高原西部的一个民族，17 世纪中期被莫卧儿帝国和比贾普尔所瓜分。1656 年，马拉特人在其领袖西瓦吉的领导下发动起义，争取民族独立。西瓦吉从农民中招募军队，建立一支强大的轻骑兵。民族成分的统一和战争的解放性质，使西瓦吉的军队具有高度纪律性和战斗力。1661 年西瓦吉挫败了莫卧儿和比贾普尔联军的进攻。1664 年、1670 年，他两次率领军队袭击印度最富庶的港埠苏拉特。1674 年，西瓦吉宣布自己为马哈拉斯特拉的国王。

1666 ~ 1678 年，苏里曼山脉南北的阿富汗人起义，要求摆脱莫卧儿帝国的统治，建立独立国家。参加者主要是农民，领导权掌握在部落贵族之手。奥朗则布利用各部落的分裂，把起义镇压下去。

1669 ~ 1705 年，德里—阿格拉地区爆发了扎特人起义。扎特人信奉印度教，他们不堪忍受伊斯兰教封建主的压迫揭竿而起。起义者占领了朱木拿河右岸广大地区，驱逐了许多封建主和包税人，并一度进逼德里。京畿震动，宫廷惊慌万状。奥朗则布一手血腥镇压，一手收买分化。起义者坚持斗争将近五十年。

1705 ~ 1715 年旁遮普地区爆发锡克教徒的起义。锡克教产生于 16 世纪初期印度西北部，最初是印度教的一个异端。它的创始人和第一代古鲁是那纳克（1469 ~ 1539 年）。锡克教初期反映城市商人和高利贷者等富裕阶层的利益。它一方面反对种姓差别，谴责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僧侣们滥用职权，主张在神面前人人平等；另一方面又宣传对未来世界的幻想，号召采取非暴力行动，主张对统治者的压迫逆来顺受。至 17 世纪后半期，成千上万农民和破产手工业者信仰锡克教，第十代古鲁哥文对锡克教进行了重大改革，如废除古鲁的专制权力，建立锡克教徒公社；教徒不分种姓和部落，一律平等；批评了“非暴力”教义，主张用武力粉碎压迫者莫卧儿帝国，号召建立“真理王国”，土地归农民。这样，锡克教就成了旁遮普农民反封建的思想武器和组织形式。锡克教徒的起义从 1705 年到 1715 年，不屈不挠，前仆后继，曾一度逐走德里和拉合尔之间广阔地区的封建主。起义虽暂时被镇压下去，但旁遮普事实上脱离了莫卧儿帝国。

奥朗则布为镇压席卷全国各地的人民起义，连年调兵遣将，结果耗尽国库，使德干变成一片荒漠。意大利旅行家曼纽西记载，当 1705 年奥朗则布从马拉提国撤退时，“他所经过的省区，原野上的树木庄稼都一扫而空，遍地是人兽的白骨”。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掌握兵权的总督，往往擅自夺取城市和行省的全面统治权力，迫使莫卧儿皇帝予以“追认”，拥兵自重，日益坐大，俨如独立的封建君王。89 岁的奥朗则布在临终前留给儿子的信中哀叹：“我孤身而来，子然而去，我不知道我是谁，我做了些什么事……宝贵的生命为什么悄然而去，我在尘世上的生命就将结束，已逝去的年华将不留痕迹。将来没有希望了。我在各处进行的战争都充满了茫然失措、惶恐无已的情绪，正像水银一样动荡不定、行将踏上最后旅程的我本人一样。”1707 年奥朗则

“古鲁”系锡克教首领之意。

布死后，帝国四分五裂。奥德、孟加拉、罗希尔坎德和德干等省区的总督都成为独立的君主。马拉特人走上扩张领土的道路，它先后占领了古吉拉特、马尔瓦、比拉尔等地区，控制了德干高原和中印度；在这广阔的领土上建立了那格浦尔、瓜廖尔、印多尔和巴罗达四个马拉特人土邦，与马哈拉施特拉土邦结成联盟，由宰相（派施华）进行统治。

土崩瓦解的莫卧儿帝国无力抵御来自西北的游牧民族入侵。1738年，伊朗的纳狄尔沙率游牧大军侵入印度，击溃莫卧儿军，次年攻陷德里，大肆掠夺而去。十年以后，1748年，阿富汗的阿赫美德沙又率军侵入印度，几度攻占德里。1761年，阿富汗的游牧军在巴尼帕特同北上夺取德里的马拉特人相遇，发生大战。马拉特10万大军惨败。巴尼帕特战役使印度境内最后一支能够抵抗西方殖民者入侵的强大力量受到严重削弱。阿富汗人也因内讧无法乘胜前进吞并印度，不久撤出印境。这便给英国侵略者的征服造成了机会。

（二）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

最早来到印度的欧洲殖民者，是开辟新航路的葡萄牙人。16世纪初，葡萄牙殖民者在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的果阿、达曼和第乌等地建立据点，独占了印度与西方的海上贸易，称霸于印度洋。至17世纪，荷兰、英国和法国相继东来，在印度展开了争夺殖民优势的斗争。1600年创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1602年创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1664年创立的法国东印度公司，是欧洲殖民主义国家侵略印度的主要工具。

荷兰于1638年至1658年，攻占斯里兰卡，后又占据了印度西南海岸的奎隆、柯钦等据点。英国殖民者早在1613年就从小莫卧儿皇帝那里获得在苏拉特设立商馆的权利，以后在马德拉斯（1640年）、孟买（1668年）和加尔各答（1690年）建筑了设防城市。法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殖民活动中心是它在1674年建立的本地治里城，另外，在马苏利帕塔姆、加利库特、马埃、卡果卡拉和昌德那哥也设有商馆。欧洲殖民者利用这些据点和设防基地网，骗诱成千上万的印度手工业者供其奴役，掳去沿海居民卖作奴隶，用低价收购印度的土特产品运到欧亚市场销售，勒索附近的封建王公，劫夺印度的海上船只，从罪恶的掠夺性贸易和海盗勾当中大发横财。

18世纪中期前后，英、法在印度的争夺加剧。法属印度总督杜布雷阴谋狡诈，他第一个在印度推行“用印度人打印度人”的恶毒策略，招募印度人组成军队作为侵略的马前卒，并利用德干各土邦王公的纷争，与之缔结“军费补助金条约”，使其变成东印度公司的附庸。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期间（1740~1748年），英、法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战争爆发了。战争初期，法国人占领了英国的许多据点（如1746年占领马德拉斯），击溃了英国控制下的卡那提克的军队，并把亲法傀儡扶上海得拉巴的尼扎姆（君主）和卡那提克的那瓦布（太守）的宝座。但在1748年订立和约时，法国被迫把马德拉斯归还给英国。

七年战争（1756~1763年）爆发后，英法争夺印度更趋激烈，英国开始侵占印度大片领土。18世纪中期，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设有150个贸易站和

军费补助金条约是欧洲殖民者所使用的在政治上征服印度的工具之一，按照它规定的军事同盟的条件，印度王公们必须允许在他们国内驻扎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并由国库拨款补助军费。

15 个大商馆。1756 年，孟加拉那瓦布西拉吉·乌德·多拉对东印度公司擅自扩大加尔各答的城防工事，收容反对孟加拉当局的阴谋分子，提出交涉。公司不予置理，于是多拉出兵，相继袭击和收复卡西姆巴扎尔和加尔各答。公司派克莱武率领一支英军于 1757 年 1 月重占加尔各答。3 月，克莱武攻占法国在孟加拉的殖民据点昌德那哥。法国无力反攻，便与多拉结盟，共同对付英国。1757 年 6 月 23 日，双方在加尔各答以北三十余里的普拉西村大战。诡计多端的克莱武事先买通孟加拉军的将领米尔·伽法，交换条件是克莱武同意伽法窃居孟加拉那瓦布的宝座。战斗打响后，伽法按兵不动，结果只有 800 英军和 2000 多名雇佣军的克莱武部队，战胜了约 7 万名孟加拉军和一支前来支援的法军。伽法当上了孟加拉那瓦布，克莱武则当上了东印度公司驻孟加拉的省督。普拉西战役标志印度开始沦为英国殖民地。1761 年英国海陆军配合。攻占了本地治里和马埃等法国据点。根据 1763 年签订的巴黎和约，法国在印度只能保留本地治里等五座城市作通商之用，不得设防。从此，法国在印度的势力一蹶不振，而英国“东印度公司由一个商业强权变成了一个军事的和拥有领土的强权。正是那个时候，才奠定了现时的这个东方不列颠帝国的基础”。

英国殖民者侵占孟加拉后，大肆掠夺，激起孟加拉人民的愤怒反抗。1763 年，孟加拉那瓦布米尔·卡西姆率领手下的两万名军队，发动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起义。五千余名手工业者和农民纷起响应。起义军在达卡等城市中，消灭英国殖民者，捣毁英国商馆，威震遐迩。1764 年 10 月，布克萨尔一役，米尔·卡西姆大败，逃出孟加拉。布克萨尔战役后，封建主不再与英军作战，而农民起义军继续坚持战斗，队伍一度扩大到 5 万人。1774 年，起义军被击溃。同年，英国又侵占了孟加拉的西邻奥德。此后，东印度公司利用孟加拉的财力和人力，逐步吞并了整个印度。

18 世纪后半期，印度境内有两个较强的独立国，一个是南印的迈索尔，另一个是中印的马拉特联盟。英国殖民者为了把它在南印度侵占的领土连成一片，首先把侵略矛头指向迈索尔。从 1767 年至 1799 年，殖民者发动了四次侵略迈索尔战争。在战争过程中，殖民者玩弄阴谋，挑拨离间，收买拉拢马拉特、海德拉巴等邦的封建王公令其出兵，“以印制印”，达到其削弱双方，各个击破的目的。虽然殖民军占绝对优势，但海达尔·阿里素丹及其子铁普素丹（1782~1799 年）依靠人民，英勇抗战，多次挫败敌人的进攻。在 1799 年保卫首都色林卡帕坦的战斗中，铁普素丹三次负伤，死于战场。迈索尔灭亡后，殖民者利用马拉特各邦之间的内讧，于 1802 年和马拉特派施华巴杰·拉奥签订条约，规定 6000 英军驻扎马哈拉施特拉，未经英国人同意不得进行任何政治改革，双方互相接受防御同盟的约束。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遭到了马拉特人民的反对，信地亚等邦结成马拉特联盟，反抗英国殖民者。英国接连发动战争，逐个击破各邦，终于在 20 年代占领了印度的腹地和德里。40 年代初，英国和沙俄在中亚细亚、伊朗的角逐日趋激烈，东印度公司加紧向印度西北边境进军。1843 年吞并信德；1845 年英军击败锡克人的顽强抵抗，占领旁遮普。1848 年，锡克人再举义旗，起而反抗，在奇利安瓦会战中重创英国骑兵，使敌人损失二千三百多人，最后英国调集炮兵将起义血腥镇压下去。1849 年，英国吞并旁遮普。至此，英国完全侵占了印度。

英国殖民者征服印度后，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进行统治。他们把印度分为直接统治区和间接统治区。直接统治区约有三分之二的领土，四分之一的居民。间接统治区有大小五百多个土邦，各邦内政由当地王公行使。这两种统治区之间互相犬牙交错，以便于英国殖民者的监视和控制。

（三）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与掠夺

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是在征服战争的进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东印度公司占领孟加拉后，曾假手那瓦布作傀儡进行统治，继而又实行“双重管理制度”：那瓦布当局管理民事，公司掌握征收田赋权。1773年，英国国会通过“印度管理法案”，规定由英国政府任命英属印度领地的总督，“双重管理制度”结束。1784年，英国国会又通过“改善东印度公司和不列颠印度领地管理法案”。根据这项法令，由内阁任命一个督察委员会来处理印度的一切重大问题；尽管任用一切文职人员和军职人员的权力，仍属于公司的董事会，但是统治印度的最高权力已归于英国政府。

英国殖民统治印度制度的变化，是为英国资产阶级掠夺印度的需要服务的。在17、18世纪英国殖民者对印度军事征服和建立殖民统治制度过程中，英国正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其对殖民地掠夺的主要手段是：海盗抢劫、不等价贸易、直接搜刮。东印度公司占领孟加拉后，洗劫国库，掠走财富总值达3700万英镑，其中有2100万英镑落入公司高级职员腰包，克莱武一人就抢得23.4万英镑；攻陷迈索尔首府时，英国人仅掠获王室珍宝就值1500万英镑。“双重管理制”保证了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直接搜刮土地税。在东印度公司未接管孟加拉征税权以前，孟加拉的田赋实收额为81万英镑，而公司接管后的一年（即1764~1765年度），田赋额便猛增至147万英镑，到1792~1793年度，竟高达300万英镑。公司对手工业者的剥削也极残酷。它通过自己布满在各地的商馆和印度经纪人，强迫成千上万的印度手工业者为其加工订货，而支付给他们的价格却低于市价的一半，甚至不足以购买原料。此外，公司还垄断食盐、烟草和鸦片等项贸易。仅食盐专利一项，每年就净赚80万英镑；公司强迫孟加拉农民种植鸦片，以低价收购，再用走私方式运到中国，牟取暴利，毒害中国人民，鸦片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七分之一。英国殖民者从印度掠夺来的大量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英国。据统计，在占领孟加拉以后的58年间（1757~1815年），英国从印度榨取了10亿英镑的财富。这一大笔财富促进了英国的工业革命，使它迅速成为世界第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强国。但是，英国对印度骇人听闻的掠夺，却严重地破坏了印度的社会经济，使印度变成一个极端贫穷、哀鸿遍野的国家。英国议员威廉·富拉登曾这样描述东印度公司掠夺孟加拉的情景：“以前孟加拉是各国的谷仓，是东方商业财富和工场手工业荟萃之地。……在短短的20年内，这里的许多地方都已呈现沙漠的景象。田地荒芜，广大地面长满野草；农夫被掠夺，手工业者受压迫，饥荒一再发生，随之而来的是人口减少。”1770年，孟加拉发生了一次大饥荒，孟加拉人口的三分之一被饿死。1789年，英国总督也不得不承认：“本公司在印度领土的三分之一，现在已是一片只有野兽栖居的荒漠之地。”

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经济力量日益强大。他们坚持要求开放印度市场，参与对印度的剥削。1813年，东

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被取消。从此开始了英国工业资本对印度掠夺的新阶段，印度日益变成英国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

从 1814 年到 1835 年，英国借助于低关税（棉丝织品课税 3.5%，毛织品课税 2%）输往印度的棉织品由不足 100 万码增加到 5100 万码以上。自古号称世界棉织业大国的印度，现在到处充斥了英国的棉织品。在英国廉价商品的冲击下，印度的手工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百万手工业者破产失业，陷入绝境。著名的纺织工业中心达卡迅速衰落萧条，1827~1837 年人口从 15 万人减到 3 万人。总督本丁克供认：“悲惨的境况在商业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棉织工人的白骨使印度平原都白成一片了。”

为了保证税收来源及培植殖民统治的社会支柱，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实行新的田赋制度。1793 年，殖民当局首先在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等省实行“固定柴明达尔制”，取消农村公社的土地继承权，土地由公司交给柴明达尔；柴明达尔向农民征收租税，但须把土地税额的 90% 交给公司；不管征收地租的多寡，柴明达尔按 1790 年交纳给公司的数额，永久“固定”不变。这样，农民成了佃农，而柴明达尔成了拥有土地的地主。从 1818 年起，殖民者先在马德拉斯后在孟买，实行“莱特瓦尔制”。该制度虽然承认公社农民对于耕地的所有权，但农民必须向公司缴纳相当于全年收成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土地税，农民实际上成了公司的佃农。1822 年又在中部地区实行“不固定柴明达尔制”，规定柴明达尔负责向农民征收租税，税额不固定，每 25 年至 30 年重定一次。英国在印度实行的土地税制，虽然形式多样，但本质则一，即最大限度地压榨农民。马克思在论到这些制度的实质时说：“这两种制度都是贻害无穷的，都包含着极大的内在矛盾，都不是为了耕种土地的人民群众的利益，也不是为了占有土地的掌管人的利益，而是为了从土地上征税的政府的利益。”实行新土地税制后，殖民当局的土地税收入激增。1800~1801 年度，土地税总额为 420 万英镑，到 1857~1858 年度增至 1560 万英镑，占殖民当局总收入的五分之三。马克思指出：“无论是在孟加拉的柴明达尔制度下，或者是在马德拉斯和孟买的莱特瓦尔制度下，占印度居民十二分之一的莱特农民都遭到了可怕的赤贫化。”19 世纪上半期，印度连续发生七次大饥荒，约有一百五十万人死亡。印度农民的悲惨处境，使他们对英国殖民者充满了深仇大恨。

英国的殖民统治也损害了部分印度封建王公的利益。印度各邦的封建王公原是英国殖民统治的支柱，但殖民当局为扩大直接统治区的地盘，以开辟更广阔的市场和更多的原料产地，采取兼并部分封建王公领地的政策。1848 年戴贺胥任总督后，按照殖民者的所谓“丧失权利说”，规定王公死后若无直系后嗣，其土地和年金即由东印度公司收回。通过这种手段，殖民者先后兼并了萨塔拉、那格浦尔、詹西等十多个封建土邦。1846 年，殖民当局竟宣布奥德王公不善治理，强行吞并其领地。另外，还剥夺了马拉特王公那那·萨希布领取年金的继承权，没收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寺院大量的土地。英国殖民者的这些政策，引起土邦王公及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僧侣的不满。

印度“土兵”对英国殖民者的怨愤也日益增长。50 年代，英印军队共有 28 万人，其中“土兵”23 万多人，他们都是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为生活

马克思：《战争问题。——议会动态。——印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第 242~243 页。

马克思：《战争问题。——议会动态。——印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第 244 页。

所迫而受雇于公司。在征服印度的长期战争中，殖民者曾施以小恩小惠，对他们进行笼络和收买，如薪饷较高、纳税较轻等。随着英国征服印度战争的结束，他们原有的一些权利和优待被取消了，薪饷被降低了，英国军官对他们的统治和压迫更加严厉了。这些措施都激起了印度“土兵”的强烈不满。因此他们后来成了民族大起义的发难者。

总之，19世纪上半期英国殖民者为强化统治和剥削而实施的各项政策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第一，它瓦解了印度的农村公社，破坏了农业和手工业密切结合的封建自然经济，摧毁了传统的手工业；但是资本主义关系却并没有随着旧社会结构的瓦解而发展起来，因而使印度所遭受的灾难更加深重。第二，它不仅使印度劳动人民陷于水深火热的痛苦深渊，而且也损害了一部分封建贵族的利益，因而引起印度社会各阶级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不满和反抗情绪，使英国殖民者与印度民族的矛盾迅速激化，最后发展为印度民族大起义。

（四）1857～1859年民族大起义

19世纪中期，印度社会各阶层都在秘密酝酿反英起义。从1856年起，作为联络人民起义信号的烤薄饼开始在农村传递。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这些神秘的薄饼已经传遍了北部广大农村。在印度“土兵”中，出现了秘密组织，作为起义信号的红莲花在团队广泛传送。各团队之间还建立了秘密通信联系，鼓动反英斗争。巴拉克普尔的“土兵”在给其他团队的一封信里写道：“如果我们暴动，我们就会胜利，从加尔各答一直到白沙瓦，就会成为一个壁垒森严的战场”。各团队或利用节日互相邀请，加强联系，或在深夜秘密集会，有的团队还秘密组成军官委员会，准备发动起义。

不满英国殖民统治的土邦王公，也在进行反英宣传。马拉特王公那那·萨希布等，派遣使者奔走联系，密谋发难。一些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如阿哈默德·沙深入城乡各地进行鼓动。在勒克瑙和阿格拉等城市，经常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听他们讲演。阿哈默德·沙用印度百年来亡国的历史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1857年初，他被捕入狱。民间艺人也用说书、卖唱、木偶戏和戏剧等文艺形式揭露英国殖民者的贪婪残暴，鼓动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

起义前夕，到处传说要在普拉西战役100周年即1857年驱逐英国殖民者。在德里、马德拉斯等城市，经常出现号召人民起来进行反英斗争的传单。这些传单写道：“大家一条心，赶走外国侵略者！他们践踏了正义的最低要求，攫走了我们的主权，决心要毁灭我们的国家。现在唯一的道路是挣脱异族的暴政，进行流血的圣战！”

1857年初，英国殖民当局发下了一种用涂有牛脂和猪油的纸包装的新子弹，使用时要用牙咬开。信奉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土兵”认为这是对他们宗教信仰的侮辱（印度教视母牛为神圣，伊斯兰教禁忌猪肉），极为愤慨。印度教“土兵”手捧恒河水，伊斯兰教“土兵”面对《古兰经》，发誓要摧毁英国的殖民统治。1857年3月29日，巴拉克普尔第三十四步兵团检阅时，一个青年“土兵”曼加尔·潘迪怀着对殖民者的满腔怒火，高呼“起来！兄弟们，为了我们的自由，向阴险的敌人进攻吧！”并开枪打死了三个英国军官。英军闻讯赶来，逮捕了潘迪，判处了绞刑。随后英国殖民者就解散了这个步兵团。4月底5月初，米鲁特又发生“土兵”拒绝使用新子弹事件。殖民者对拒绝使用新子弹的85名“土兵”判以七年徒刑。5月9日，英国召集

全旅官兵集会，当众剥去判刑的 85 名“土兵”的军装，夺走武器，然后带上手铐脚镣押往监牢。为此，“土兵”忍无可忍，回到营房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立即发动起义。这时，印度全国各阶层对英国殖民压迫的愤懑已到了极点，而印度“土兵”反抗的枪声就成了民族大起义的信号。

5 月 10 日（星期日）黄昏，当英军在教堂里祈祷时，米鲁特第三骑兵连的“土兵”，在市民和郊区武装农民的配合下，发动了起义。起义者打开了牢房，释放了被捕者，封锁了交通要道。“报普拉西之仇！”“杀死英国人！”的呼喊声响彻米鲁特上空。起义军民烧毁了英国殖民者的住宅、教堂、兵营和衙署，严惩了英国殖民军政官员，并在当天夜里向德里挺进。

经过一夜行军，5 月 11 日清晨，起义军进抵德里城下。德里驻军中的印度兵和城市居民打开城门，迎接起义军。起义者很快就占领了古都德里城。

德里的占领，是起义者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它沉重地打击了殖民主义者的统治，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斗争信心。从此，那些对英国统治者心怀不满的贵族、僧侣也纷纷参加到起义队伍中来，初步形成了一个包括各阶级、各种力量的反英战线。德里的起义者拥立英国入侵后已名存实亡的莫卧儿王朝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为印度皇帝；还成立了一个行政会议，作为起义的领导机关，直接掌握实权。行政会议由巴赫特汗等十人组成，绝大部分来自下级军官和士兵。起义者发表文告，号召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消除分歧，团结一致，驱逐英国殖民者；文告还号召全民都在一个旗帜下战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富贵贫贱一律参加圣战。行政会议颁布了命令，废除柴明达尔制度，豁免贫民捐税，对地主、富商和高利贷者征收特别税。

德里是印度传统的政治中心，德里起义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其他各地的反英斗争，起义的浪潮迅速淹没了北印度和中印度大部分地区。奥德省的勒克瑙、康波尔和中部的詹西成为起义的重要中心。在阿哈默德·沙领导下的奥德省内的起义，不到十天时间就在全省范围内彻底清除了英国殖民者的行政组织，击毙英殖民长官劳伦斯。6 月 4 日，在那那·萨希布和唐提亚·托比领导下，康波尔的士兵和市民把英军打得焦头烂额。在女王拉克什米·巴伊领导下，詹西起义军英勇奋战，摧毁了英军堡垒，歼灭了英国殖民军。6 月 8 日，在詹西城举行盛大游行，庆贺胜利。起义也波及南印度一些地区。

英国殖民者在起义人民的沉重打击下，惊慌失措。总督坎宁在寄回英国的一封信里沮丧地说：“目前是危急存亡的关头，事态将如何演变，很难预料。”当时，英国殖民者十分害怕起义蔓延到其他地区，特别担心西北边境的旁遮普及介于德里和旁遮普之间的土邦响应起义。为了稳住这一地区的阵地，英国迅速调集军事力量加强防御，并残酷镇压当地印度人民的一切骚动。

随后便调集兵力，准备围攻德里。他们把侵略伊朗的军队和派赴中国的侵略军调到印度，并要锡兰总督向印度增派援军，还从锡克人、廓尔喀人中招募雇佣军，扩大兵力。

英军于 1857 年 6 月 8 日开始围攻起义中心德里。在 6 月至 8 月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起义军英勇奋战，不断挫败敌军的攻势。6 月 23 日是普拉西之战的百周年，起义军冲出德里城，与敌军展开一场血战。一个英国军官在日记中写道：“大约是夜间 12 点钟，起义者向我们全军展开了一场极其凶猛的攻击，再没有任何人比起义者战斗得更勇敢了。……我曾一度想到我们要完蛋了”。但起义者在战略上始终处于防御地位，并未乘胜进攻，拔掉城外敌人据点，结果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

卷进起义队伍的王室和封建主与人民群众的目的是根本不同的，这在起义一开始就表现出来。德里起义的第二天，贵族们就开始讨论如何恢复“秩序”问题，甚至对起义军占据御花园也表示不满，并力图篡夺起义军的指挥权，但当时这个阴谋没有得逞。正当战斗紧张进行的时候，城里一部分封建贵族、买办商人囤积粮食，抬高物价，窝藏军火，阴谋挑起宗教纠纷，制造政治混乱。他们还进行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炸毁起义军的军火库，盗窃情报，与英军秘密往来。他们的叛卖活动，严重地削弱了起义队伍的力量。当时，德里城内有来自各地的起义军近四万人，但缺乏强有力的统一的领导。巴赫特汗虽是德里起义军的总司令，但不能统一调动和指挥全部军队。领导的不统一，组织上的松散，使起义军的力量不能充分发挥。

9月14日英军向德里发动总攻，在炮兵的支持下，闯进了城里。起义军同英军进行了激烈的巷战。在六天的保卫战中，打死敌军五千余人，击毙两个英军司令官。英军占领德里后，在全城进行了极其野蛮的烧杀抢掠。连医院的伤员也惨遭屠杀。以巴哈杜尔·沙为首的封建贵族集团无耻地向殖民者屈膝投降。起义军撤出德里后，继续在朱木拿河与恒河之间的平原地带进行游击战。

英军占领德里后，就集中兵力进攻奥德的首府勒克瑙。勒克瑙保卫战，表现得更加英勇顽强。从1857年9月起，战斗持续了将近六个月，直到1858年3月21日，英军集中装备精良的军队将近4万，配备180门大炮才攻下勒克瑙。英军入城后，洗劫了两个星期，勒克瑙所受损失达600万英镑。

1858年3月末，英国殖民军开始向中印度起义中心詹西进攻。詹西军民在女王拉克什米·巴伊领导下英勇抗敌。4月3日，敌军突入城市，詹西军民逐屋地和敌人展开争夺战。500名坚守高地的战士，全部壮烈牺牲。女王率领一部分起义军突出重围，詹西陷落。

德里、勒克瑙、詹西等起义中心相继陷落后，各地分散的起义军转入游击战。当时，活跃在各地的起义军不少于12万人，唐提亚·托比所率领的起义军是其中突出的一支队伍。詹西女王突围后，和唐提亚·托比的队伍汇合，转战中印度，并在瓜廖尔成立了临时政府。6月17日，女王拉克什米·巴伊在瓜廖尔城郊的一次战斗中牺牲，唐提亚·托比继续坚持战斗。

英国殖民者在进行武装镇压的同时又进一步施展政治分化手段。1858年11月1日，坎宁总督在印度公布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诏书，以不再侵犯印度大小封建主的利益和特权为钓饵，收买封建主。此后，有更多的封建主纷纷叛变投敌，并帮助殖民者搜寻起义领袖。1859年4月，由于封建主曼·辛格的出卖，唐提亚·托比被捕牺牲。但游击队的反英斗争一直延续到1859年底。

（五）起义失败的原因和历史意义

1857~1859年的反英起义一开始即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几乎社会各阶层都参加了起义。印度“土兵”是起义的发动者和突击力量，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是起义的主要动力，部分封建主参加并领导了起义。

轰轰烈烈的民族大起义在英国殖民者的残酷镇压下终于失败了。其主要原因是：第一，掌握起义领导权的封建主在英国威胁利诱下投降叛变。英国统治印度后，绝大多数封建主为了阶级私利而背弃民族大义，成为英国殖民

者统治印度的重要支柱。起义爆发后，一部分封建主公开站在英国人一边，帮助殖民者镇压起义。英国殖民者供认：“如果波梯亚和棉德土王不是我们的朋友，如果锡克人不参加我们的队伍，如果旁遮普不保持平静，我们围攻德里就是完全不可能的。”另一部分封建主由于他们的特权的被剥夺，和殖民者发生矛盾而参加了起义，但在英国殖民者的收买政策下，除少数土邦王公如那那·萨希布和詹西女王拉克什米·巴伊外，多数叛变投敌。第二，统治印度的英国资产阶级实力强大，阴险狡猾，善于玩弄反革命两手。当时，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完成，握有世界工业的垄断地位和海上霸权，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力量也是强大的。老奸巨猾的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长期统治中，曾不断地制造并扩大印度不同民族、部落、种姓和宗教之间的矛盾。在印度人民起义期间，他们在血腥镇压起义的同时，逐渐改变对封建主阶级的政策，先后颁布《奥德宣言》《维多利亚女王诏书》，对放下武器并协助殖民者的封建主不咎既往，还允许他们保留土地和各种特权，这就分化瓦解了起义队伍。第三，起义缺乏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印度民族起义虽然是全国性的，但分为大大小小的若干各自独立的地区集团，没有统一的政治纲领，统一的指挥，统一的部署和互相配合的行动，易于为敌人所各个击破。

1857~1859年印度人民反英起义是印度近代史上第一次具有全国意义的反对殖民统治的民族大起义，是印度史册上光辉灿烂的一页。起义加强了印度人民反英斗争的意志，表现了印度人民不甘屈服于英国殖民统治的顽强反抗精神，有力地推动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使英国消耗四千多万英镑战费，大批殖民官员和士兵被消灭，税收和贸易受到巨大损失，使它的统治从印度的一端到另一端发生动摇。这次起义是19世纪中期亚洲民族解放斗争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指出：这次“英印军队中的起义与亚洲各大国对英国统治的普遍不满同时发生，因为在孟加拉军内的起义无疑与波斯战争和中国战争有密切的联系，——所有这些，都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情”。印度起义打乱了英国的侵略部署，迫使英国把派赴伊朗和中国的侵略军调回印度，从而间接地支援了伊朗和中国人民的反英斗争；英国侵略阿富汗和缅甸的计划也不得不往后拖延。印度民族起义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人民斗争一道客观上帮助了日本民族的自由与独立，为日本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印度民族起义深为欧洲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所同情。马克思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向欧美无产阶级阐明印度起义的情况、性质和意义，揭露英国殖民者的谎言与罪行，把印度民族起义看成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同盟军。他在1858年说：“印度使英国人消耗人力和贵金属，现在是我们最好的同盟者。”

英国工人运动的领导者琼斯曾揭露英国殖民者屠杀印度人民的血腥罪行，要求英国政府承认印度的民族独立，他在1857年9月5日《人民报》上写道：“关于印度的起义，在整个欧洲只应有一个意见：这是在世界历史上最公正、崇高和必要的一次起义”。意大利的民族英雄加里波第曾组织“红衫军”准备去印度参加战斗，船至地中海时，得悉印度起义已被镇压而返回。

在起义的打击和影响下，英国殖民者为巩固和加强殖民统治而实施一系列措施：1858年6月，宣布撤销东印度公司，印度由英国女王直接统治；11

马克思：《印度军队的起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252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2卷，第324页。

月，根据女王诏书，以“尊重当地王公的权利、尊严和荣誉”为名，调整了同封建主阶级的关系，英国殖民者和印度封建势力结成了反动联盟；为防止印度“土兵”再度叛乱，彻底改组了英印军队，即增加英籍士兵人数，炮兵和技术部队只许由英人充任，从锡克教徒、巴坦人、廓尔喀人中大量征募新兵，解散独立的印度舰队等。

第三节 殖民主义者对伊朗的侵略与伊朗人民的反抗斗争

(一) 卡扎尔王朝的统治

17世纪以来，伊朗封建王朝更替频繁，内外战乱连绵不断，社会生产停滞不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非常尖锐。

1709年，萨非王朝（1502~1722年）统治下的阿富汗人举行起义，杀掉总督，占领坎大哈省。1722年，阿富汗封建上层分子攻陷萨非王朝首都伊斯法罕，统治了伊朗。阿富汗封建主对伊朗人民进行血腥的镇压和掠夺，激起伊朗人民的英勇反抗。1730年，纳狄尔利用人民的力量，驱逐了阿富汗侵略者。1736年纳狄尔被伊朗贵族拥戴为王，建立了纳狄尔王朝（1736~1747年）。纳狄尔为了扩张疆土，曾先后远征阿富汗、印度、中亚等地，于1747年战死。从此伊朗各族封建主展开了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混战。卡扎尔人在内战中崛起，1796年，阿加·穆罕默德建立卡扎尔王朝，统一全国，定都德黑兰。

卡扎尔王朝统治下的伊朗是一个多民族的封建专制国家。国王是最大的封建主，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国王之下，由宰相和大臣组成枢密院，管理国家日常事务。全国分为30个省和州，省设总督，州设州长，由王亲国戚充任。这些总督和州长拥有很大的财权和兵权，事实上都是独立自主的诸侯。他们对于国王的职责是：每年缴给国库一定的税款，受国王征召，率领自己的部队去打仗或镇压暴动。王室对于各省和州的内政很少过问。游牧部落（占伊朗总人口三分之一）的酋长是本部落的统治者，他们俨如世袭的封建君主，享有更大的独立性，甚至名义上也不承认国王的政权。

伊斯兰教什叶派是伊朗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什叶派的高级阿訇本身也是大地主，他们按照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解释《古兰经》。有关财产继承、婚姻、买卖交易等民事案件，都由高级阿訇控制的教典法院审理，他们往往滥用职权，进行敲榨勒索，鱼肉人民。学校教育，从初级神学院到高级神学院，教的全都是神学上的信条，而且也完全控制在僧侣手中。

卡扎尔王朝沿袭了历代王朝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伊朗国王是全国水源和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所得贡赋收入用于宫廷、军队和中央政府机关的开支。封赐给将领、廷臣的采邑，叫作俸田。伊斯兰教寺院及僧侣也都领有土地，叫作供养田，免交赋税。被束缚在各种类型封建土地上的农民，必须把收成的五分之四交给封建贵族，并缴纳羊毛、食油、鸡和鸡蛋、燃料等实物贡赋。

除家庭工业外，城市中的手工业比较发达。手工业者组织在中世纪的行会组织里，行会由会首领导，内有师傅、助手、学徒。手工业者拿现款或自己的劳动产品向州长的管事人或包税者缴纳赋税。18世纪末19世纪初，伊朗出现了简陋的手工工场。有些织工由企业主供给原料和织机，为企业主织布；也有些织工聚集在大工场里做工。生产的毛毯和布匹大量运销俄国和西欧。

经济的落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战乱，使伊朗不能有效地抵抗欧洲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

什叶派是伊斯兰两大教派之一。

（二）英、俄的侵略与伊朗的半殖民地化

西方殖民主义者最早侵入伊朗的是葡萄牙人。早在 16 世纪，葡萄牙人已占据了靠波斯湾口的霍尔木兹等地。18 世纪中叶，荷兰人趁伊朗全国混战之机，夺取了波斯湾的哈尔克岛。1763 年，英国强迫伊朗签订奴役性条约，在波斯湾沿岸布什尔等地设立商站，并取得自由贸易、免交进口税等特权。这是伊朗沦为半殖民地的开端。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在欧洲列强追求扩大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条件下，伊朗逐渐成为英、俄、法等国争夺的对象。

沙皇俄国利用毗邻伊朗的有利条件，不断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大肆进行领土扩张。在 1804~1813 年和 1826~1828 年两次战争中，沙俄打败伊朗后，先后强迫伊朗签订古利斯坦条约和土库曼彻条约。古利斯坦条约规定：伊朗将俄军占领的格鲁吉亚等地割让给俄国；俄国在必要时“帮助”伊朗国王所指定的继承人继承王位；伊朗放弃在黑海保有海军的权力，俄国独享在黑海拥有舰队的特权；俄国商人输入的商品值百抽五，不再缴纳内地关卡税和其他一切杂税。土库曼彻条约除申明古利斯坦条约中俄国在伊朗的特权外，还规定：伊朗放弃南高加索的一切权力；承认俄军新占领的土地为俄国所有；双方之间划定国界，基本上以阿拉斯河为界；伊朗付给俄国 2000 万卢布赔款；俄国可在伊朗各大城市自行设立领事馆，俄国臣民与伊朗臣民之间的一切诉讼必须由俄国领事会审；俄国人可在伊朗租赁、购买房产住用或作货栈；伊朗各州官员如不履行条约，应即撤职。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揭露，土库曼彻条约已将伊朗“变成俄国的附属国”。

英国为了同俄国争夺，扩大自己在伊朗的势力，从 1800~1841 年间，先后四次强迫伊朗签订不平等条约，英国获得了领事裁判权，输入商品值百抽五且豁免国内关卡各税，在大不里士、德黑兰等地设立商业代办处。随后，法、美、奥等国援例同伊朗签订类似条约。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伊朗沦为半殖民地。

不平等条约给伊朗带来深重的民族灾难。外国商品，特别是英国商品，潮水般地涌入伊朗。从 19 世纪 30 年代起，英国纺织品几乎占伊朗全部进口总值的 90%。1833 年，运到大不里士的欧洲商品总值折合 1500 万卢布，1836 年增至 4000 万卢布。欧洲商品的倾销，破坏了伊朗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自然经济，扼杀了处于萌芽状态的伊朗资本主义手工业工场，促使大批手工业者和中小商人破产。

外国商品的涌入加深了封建制度的危机。封建地主阶级力求以货币地租代替实物地租，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国王、总督、州长、高级阿訇公开卖官鬻爵，以获取大量金钱。买得官爵的人疯狂地加紧掠夺农民。贵族和官吏需要现金，把采邑出卖给商人高利贷者，于是出现了与世界市场紧密相联的新地主阶层。固有的封建军事采邑制遭到破坏，土地私有制日益盛行。许多农民失去原有耕地，挣扎在死亡线上。

封建经济的解体也使低级阿訇的生活每况愈下。他们原来是依附于高级阿訇而生存的。由于高级阿訇的穷奢极欲，入不敷出，低级阿訇的收入愈加没有保障。供养田的收益，他们分沾不到；诉讼案件的油水，他们更捞不到。为生活计，许多低级阿訇不得不经营手工业、小商业，甚至农业，勉强维持

清贫的生活。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与天灾交织一起，使伊朗人民生活越发悲惨。19世纪上半期，灾荒、鼠疫、霍乱接踵而来，吞噬了几百万伊朗人民的生命，南阿塞拜疆地区二分之一的人口死亡。农村赤地千里，十室九空；城市萧条，道路不宁。全国到处呈现出荒凉的景象。

劳动群众对封建统治集团卖国求荣、横征暴敛的反动统治再也不能忍受了。农民暴动与城市下层人民起义接连发生。一些低级阿訇利用布道传教之机，在宗教的掩盖下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累累罪行。一场大的斗争风暴就要到来了。

（三）巴布教徒起义

19世纪40年代，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条件下，产生了巴布教。巴布教的创始人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1820年出生于小商人家庭，1844年他宣称自己为“巴布”。巴布之意为“门”，意为人们所渴望的救世主的意志通过此门传达于人民。原来伊斯兰教有这样的教义，即：伊斯兰教的救世主——第十二世教长马赫迪已经不见了1000年，但他还会出现的，当人间充满灾难和不幸时，他就会降临，消灭大地上不平之事，并建立合理的新制度。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根据这个教义，加以发挥，预告：马赫迪降临不是在遥远的未来，而是近在眼前；不是降临在别的地方，而是恰好降临在伊朗；当马赫迪降临时，“正义的王国”就会跟着建立起来。这个王国是人人平等的，没有封建专横。在马赫迪没降临之前，巴布（即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本人）的使命就是向人们揭示真理，号召人们作好准备去迎接那即将到来的美好生活。

1847年，巴布被捕入狱，在狱中写成《默示录》，进一步发展其教义。巴布认为人类社会各个时代依次发展，后来的一定超过以前的时代。每个时代皆有其特殊的制度与法律，旧制度与旧法律应随旧时代结束而结束，代之以新制度与新法律，新制度与新法律必须由“主”派下来的“先知”制定。先知给人们的指示就是代替旧圣经的新圣经。巴布宣称他是受主委托而降临的先知，《默示录》就是新圣经，一切制度和法律都应按《默示录》重新制定。巴布指出世俗官吏和高级阿訇不愿抛弃旧制度是世界不平和倾轧的原因，主张人人平等，反对剥削压迫。但是，巴布并没有提出废除私有制，相反却主张要保障私有制、继承权、债务关系，并提出其他许多有关商人利益的要求，如严守商业通信秘密，改良邮递，统一币制等。

巴布教徒最初在上层宣传其学说，遭到统治阶级迫害后，转而面向广大人民群众。这时，原巴布学说中的一些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一些比较接近劳动群众的巴布教徒宣传家（如毛拉·侯赛因·别什鲁伊、哈治·穆罕默德·阿里、毛拉·穆罕默德·阿里、赛义德·雅西·达拉比等人）明确宣称：新先知即将降临，新世界即将诞生，一切旧制度与旧教典均已失效，人民已没有义务再向统治者纳税服役，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将要失去他们的特权，降为平民。他们还进而提出废除私有制，一切财产归公，男女平等这样一些更急进的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巴布教徒的领袖对贫民说：“你们去，把你们在国王宫廷中，在僧俗显贵的壮丽宫殿中，在你们暴君的箱子中所发现的一切都拿来——一切都是你们的。在此以后，尘世上一切王国都是你们

的。”巴布教派的这些宣传得到城乡人民的热烈欢迎，巴布教徒迅速发展，许多手工业者、农民、小商人和低级阿訇纷纷加入巴布教派。1849年2月，全国已有巴布教徒十余万人。

1848年9月初，国王穆罕默德逝世，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伊朗北部呼罗珊、伊斯法罕、设拉子、基尔曼等省市的居民和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各地封建统治者惊慌失措，马赞得兰的州长吓得跑到首都德黑兰去了。这种局势大大便利了巴布教徒的活动。

10月间，聚集在巴尔福鲁什市的700名巴布教徒在穆罕默德·阿里·巴尔福鲁什的领导下，首先在伊朗北部的马赞得兰省举行武装起义。在击溃了当地驻军之后，起义者胜利抵达巴尔福鲁什东南20公里的塞克·塔别尔西陵墓，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准备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他们筑起城堡，挖掘壕沟，击退了来犯的地方封建主的军队；他们废除了私有制度，一切财物归公共仓库，实行共餐制；他们生产武器和军需品，制造劳动工具和缝制衣服。周围附近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不断带着牲畜、粮食和其他东西来到陵墓，全国其他地区的一些巴布教徒也远道赶来。起义队伍很快增加到2000人。

集结在塞克·塔别尔西陵墓的巴布教徒的革命行动，使德黑兰宫廷大为震惊，陵墓附近的封建主赶忙收拾细软，四散逃命。但是，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反扑的。1848年底，新国王纳歇尔丁派他的叔叔密尔扎·马赫底·古里率领2000王军，从德黑兰出发去讨伐巴布教徒。起义者乘他们还未站稳脚跟，一次夜袭就把王军打得落花流水。1849年初，国王决定加派军队，纠集一万多人，配备大炮，加紧围攻塔别尔西陵墓的起义军。什叶派的教长也宣布向巴布教徒进行“圣战”。在强大的反动势力面前，起义者毫不气馁，他们用自制的武器——马刀、长矛和短剑，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最后堡垒的保卫者只剩下250人，但他们不怕死，不投降，决心与堡垒共存亡。到1849年5月，反动派看到要攻下堡垒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于是就玩弄欺骗手段，假惺惺地当着《古兰经》发誓许愿，说起义者放下武器，离开阵地，可以保全生命和自由。起义者信以为真，停止抵抗。结果，国王军队背信弃义地实行血腥屠杀，无一人幸免。巴布教徒的领袖穆罕默德·阿里被带上镣铐，押解到巴尔福鲁什，被当众杀害。

塔别尔西陵墓起义者被镇压后，巴布教徒运动仍在继续发展。当时，俄国驻德黑兰公使忧心忡忡地说：“在德黑兰到处都是这种危险教派的信徒。”1850年5月，巴布教徒又分别在赞兼、亚兹德、尼里兹等城市举行起义。在赞兼起义的15,000名巴布教徒占领了城的东半部，建立起“正义的王国”，宣布人人平等，实行财产公有，修筑了防御工事和街垒，设立铸造厂制造大炮和火药，准备长期战斗。在狱中的巴布还和信徒保持联系，号召他们为建立“正义的王国”而斗争。为防止起义扩大，国王于7月杀害了巴布。巴布的被杀害更加激怒了起义群众，他们奋勇杀敌，一举歼灭王军8000人。许多妇女、少年和自己的丈夫、父兄一起同3万敌军浴血奋战，坚持了半年多。年底，反动政府又重演故伎，诱骗起义者放下武器，才把赞兼起义镇压下去。

尼里兹的巴布教徒在1850年举行了两次起义。在第二次起义中，起义者利用山地的有利地形，同王军机智地进行周旋。他们常常出其不意地发动夜袭，把讨伐军打得抱头鼠窜。在一次夜袭中，杀死了贪赃枉法的州长。最后粮尽援绝，坚持到1851年失败。

1851年后，大规模起义基本结束，巴布教徒转入隐蔽活动。1852年8

月巴布教徒在德黑兰谋刺国王未遂，使城内数百名巴布教徒惨遭杀害。接着，封建统治阶级在全国各地疯狂逮捕和屠杀巴布教徒，有的被烧死，有的被绑在炮口上轰死，其中有许多妇女和儿童。这种野兽般的行动，充分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狰狞面目。至此，经过四年之久的伊朗巴布教徒起义终于失败了。

1848~1852年的伊朗巴布教徒起义的主要群众是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和一部分农民，还有不少商人和低级阿訇参加。起义领导权掌握在商人和低级阿訇手里。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掌握起义领导权的商人和低级阿訇始终没有明确提出一个解决土地的纲领，因此未能广泛发动农民。其次，起义组织得不够严密，各地之间缺乏联系，大都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易于遭受敌人的各个击破。再次，起义者在战略上消极保守，他们占领几个重要城市后就坐受围攻，而没有采取大胆进攻，特别是未能深入广大农村开展游击战，以致起义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而当起义遭到挫折时，其中一部分人轻信统治者的欺骗放下了武器，另一些人走上个人恐怖的道路。最后，混进起义队伍的个别上层人物代表买办商人的利益，极力阉割巴布教义的革命民主内容，公然反对革命斗争，这就从内部动摇和削弱了起义。

在这次起义的打击下，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实行了一些自上而下的改革。宰相密尔扎·达吉汗就是这部分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在达吉汗的三年（1848~1851年）宰相任期内，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军事方面，他严格军纪，建立武器和军需品工场，开办军事学校，改组军队。在财政方面，他禁止贪污舞弊和买卖官职，实行裁员减薪以节约开支。同时，达吉汗还取消了部分王子和大臣的土地赏赐，改发少量生活津贴，撤除敌视宰相的高级阿訇，没收其供养田。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国家的军事和财政实力，借以巩固中央政权，巩固封建统治阶级业已动摇的统治。但达吉汗的改革遭到封建贵族、高级阿訇和外国列强的反对，他们把达吉汗从宰相的位置上赶下了台。达吉汗在1852年被国王处死，改革彻底破产。

由于当时伊朗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王朝实际上是欧洲列强的代理人，因此起义在客观上也具有反抗外国殖民者、争取民族独立的性质，是19世纪中期前后亚洲人民反封建反殖民主义伟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四节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改革

（一）社会经济衰落和军事采邑制瓦解

到17世纪中期，土耳其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还是幅员横跨亚、欧、非三洲的庞大的军事封建国家。在亚洲，占有小亚细亚、阿拉伯、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拉克、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一部分等；在欧洲，占有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门得内哥罗、保加利亚、希腊和多瑙河两公国——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以及克里木、亚速夫海和黑海沿岸附近地区等；在非洲，占有埃及、的黎波里、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

奥斯曼帝国内部并不统一。它的各个部分，在居民的人种、语言和宗教上，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上，在对中央政权的依附程度上，都有重大差别。土耳其人在帝国人口中仅占少数，只有小亚细亚和伊斯坦布尔附近的鲁米利亚（欧洲土耳其）的一部分，是土耳其人密集的地区。居于统治地位的土耳其人封建贵族，剥削和压迫着帝国内部的各个民族。

奥斯曼帝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素丹宣布他是“主在人间的影子”，是政治和宗教的首脑。各地总督（帕沙）兼管军事民事，事实上成为半独立的封建主。伊斯兰教是帝国的国教，《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典被奉为制订法令的依据。伊斯兰教僧侣掌握着司法和教育，对非伊斯兰教徒进行严密的监视和控制。基督教徒农民遭受着双重压迫。非伊斯兰教徒负担的人头税很重。任何一个近卫兵（雅内恰尔）都可以对非伊斯兰教徒施加暴行而不受惩罚。非伊斯兰教徒不准持有武器，不准和伊斯兰教徒穿同样的衣服和鞋子；伊斯兰法庭不承认“不信教者”的证词；官方文件中对非伊斯兰教徒使用污辱性的绰号。

在这样一个庞杂的帝国里，充满着阶级的、民族的、宗教的矛盾，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缺乏必要的内聚力，完全依靠武力来维持。到16世纪时，奥斯曼帝国的军事扩张达到了极限。在东方，奥斯曼的军队无法打进伊朗；在海上，由于新航路的发现，海上霸权落到西方国家手里去了；在欧洲，1529年在维也纳城下的第一次失败，标志着它再也不能向前推进了。在经过一个半世纪夺取匈牙利的毫无结果的战争之后，1683年，土耳其军队又一次在维也纳城下败北，这次是被赶来援助奥地利的波兰国王杨·萨比斯基率领的波兰军队击溃的。1686年，奥、波和威尼斯组成反土联盟。1687年的莫哈奇战役和1697年的曾塔战役中，土军两次失败。1699年签订了卡洛维茨条约。这是奥斯曼帝国第一次作为战败国签订的和约。从这时起，奥斯曼帝国以前所征服的领土开始一块一块地丧失。维也纳城下的溃败，是它的军事采邑制的解体，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衰败的一个反映。

奥斯曼帝国一开始就是一个军事封建国家，在土耳其的统治阶级看来，帝国“是用马刀取得的，也只有用马刀才能维持”。在长期的侵略战争中，历代素丹为加强、补充自己的军事力量，实行军事采邑制，即把大量的土地作为采邑赐给武将功臣，而获得土地的军事采邑主（西巴希）必须为素丹提供骑兵，参加征战。17世纪以前，军事采邑制的推行，使国家减少了大部分军事开支，保证了军队的迅速动员。三千多个“扎伊姆”（年收入在两万阿

克切 以上的采邑主)和五万多个“吉马里奥特”(年收入在两万阿克切以下的采邑主)不仅是帝国的一支军事力量,而且是一支主要的政治力量。

最初,西巴希主要靠从被征服的土地上获得军事虏获品、奴隶和贡品作为发财致富的源泉,而把对采邑农民的租税剥削当作补助的收入。随着对外战争的失败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西巴希日益加强对采邑农民的剥削,滥征苛捐杂税。1528年以前,每个农民每年担负捐税约100阿克切,到17世纪增至700阿克切至800阿克切。包税制极为盛行。贪婪的包税人往往数倍地增加租税额,有时还预征若干年的租税。陷入高利贷罗网的千百万农民被迫背井离乡,家破人亡。例如,到18世纪,阿勒颇省原有的3200个村庄只剩400个,而全国荒废了的土地,占可耕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

西巴希内部也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少数大西巴希利用各种方式兼并小西巴希的领地,16世纪末以前帝国法律所规定的一人不得占有几处采邑的禁令变成了具文,个别大西巴希竟占有四五十处采地。另外,一些商人和高利贷者也乘机购进破产的西巴希的土地。这些暴富的新地主不仅把非世袭的有条件的领地变为完全归自己私有的土地,而且拒绝履行为素丹供养骑兵、参加作战的义务,这就使军事采邑制的实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国库收入的减少,宫廷开支的浩繁,财政危机的出现,促使素丹自己放弃了军事采邑制的基本原则。17世纪后,历代素丹除把很多土地赏赐给宠臣近幸外,还开始把国有土地包括采邑在内出售给富人,以增加收入。这更加速了军事采邑制的瓦解。

军事采邑制的瓦解虽没有引起封建生产方式本身的变化,但以战争为主业而贪求军事俘获品的剥削者西巴希被新的、以剥削农民为主要目标的封建地主所代替,军事采邑制为新的地主土地私有制所代替。

军事采邑制逐渐瓦解的直接后果是兵源枯竭,帝国的军事力量严重削弱。在苏里曼大帝时代,西巴希军队达20万人,后减少到12万人,至17世纪扎伊姆和吉马里奥特所出的兵力已不及1万人。

帝国的军事封建制度是工商业发展的严重障碍。帝国政府只注意军事掠夺和向居民榨取税收,根本不重视发展工商业。欧洲人发现新航路和新大陆,给帝国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东西方贸易的垄断权逐步从穆斯林商人手里转到了欧洲商人手里。1625年,厄梅尔·塔利布写道:“在过去,印度、信德和中国的货物照例都是首先运到苏伊士,然后经穆斯林的手分发到世界各地。但是,如今这些货物都已改由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等国船只载运前往法兰基斯坦,再由那里分运到世界各地。凡是他们自己不需要的东西,便运来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伊斯兰的地方,并以五倍的高价出售,从而大发其财。”结果,对外贸易几乎完全掌握在外国商人,特别是法国商人手中。奥斯曼帝国政府给予外国商人许多特权,如输入货物只纳一次值百抽五(后改为值百抽三)的关税。相反,奥斯曼帝国的商人输入的货物,不仅要交纳高达10%至12%的关税,而且经常遭到官吏的勒索和盗匪的抢劫。

欧洲商人把大量的美洲白银贱价输入帝国境内,给土耳其的财政带来严重的打击。外国硬币把土耳其的硬币逐出了流通领域。银价下跌,金价上涨,土耳其的原料价格下跌,欧洲商人非常便宜地大量收购土耳其原料和禁止出口的谷物。

战争、兵役和封建主的残酷剥削破坏了农村家庭手工业。城市手工业受到行会制度的种种束缚，生产工具和技术都很落后。在欧洲商品的竞争下，手工业者大批破产。枪炮弹药和船舶制造等有关军需部门也一蹶不振。多数矿山荒废，无人愿意承包开采。

随着社会经济的衰落，奥斯曼帝国已危机四伏。

（二）巴特罗纳·哈利尔起义和帝国的危机

素丹阿赫美德三世在位时期（1703～1730年），封建贵族生活之腐化日甚一日。居住在首都伊斯坦布尔的达官显贵穷奢极欲，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尽情地用于寻欢作乐。素丹阿赫美德三世及其左右驱使成千上万的农民、手工业者为他们营建豪华的宫殿和别墅。他们夜以继日地沉溺在宴会、打猎以及各种各样的娱乐中。贵族们竞相用精心培植的郁金香来装饰自己的花园。与这种骄奢淫逸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极度贫困。当时，伊斯坦布尔约有六十万人口。其中有很多手工业者，从事军需品和日用消费品的制造；也有不少充当短工的破产农民和游民。捐税的沉重，食品价格的上涨，高利贷的猖獗，使这些劳动群众濒于饥饿的边缘，因之他们对统治阶级的愤懑与日俱增。1730年9月17日晚，在小贩出身的阿尔巴尼亚人巴特罗纳·哈利尔的领导下，伊斯坦布尔的手工业者、贫民、小商人以及部分近卫军等3000人聚集在艾特-美丹广场，要求素丹阿赫美德三世把人民痛恨的宰相、神学家和其他高级官吏交给他们审判。起义者夺取了很多武器。宰相伊布拉金建议素丹调动宫廷卫队去镇压起义，阿赫美德三世胆怯地加以拒绝。9月18日，首都的近卫军全部参加了起义，起义人数共达12,000人。素丹看到起义规模迅速扩大，决定牺牲自己的近幸，下令将伊布拉金和其他几位官员处死，并将尸首交给起义者。不久，阿赫美德三世被迫逊位给自己的侄儿马赫默德一世。统治者的微小让步迷惑了起义者。巴特罗纳·哈利尔等天真地认为所有灾难都是由于残暴的素丹及其佞臣造成的，只要“仁慈的”素丹即位，暴政和灾难就会自行消失。新素丹利用起义领袖缺乏警惕而策划了杀害他们的阴谋。11月14日，巴特罗纳·哈利尔等被请入宫举行军事会议，即在宫中遇害。接着，下令屠杀一切起义的参加者，仅仅一天之内，被杀害的就有400人。这次起义失败后人民的反抗运动并没有停止。1731年3月13日，300名近卫军又举行了一次起义；8月，政府又发现了一个反对素丹的新密谋，有300个密谋的参加者被杀害。1730～1731年首都人民的起义虽告失败，但它表明帝国内部的矛盾已很尖锐，帝国的大厦已岌岌可危。

18世纪后半期，奥斯曼帝国内部被压迫民族掀起了争取独立的斗争。巴尔干各族人民在60年代组织武装起义，反抗近卫军的横暴。阿拉伯各国、亚美尼亚和高加索等地也展开斗争，其中以1769年阿里贝伊领导的埃及人民起义规模最大。到80年代，在阿尔巴尼亚、叙利亚、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巴尔干以及安那托利亚的一些地区，都发生了起义。

奥斯曼帝国的危机还表现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上。一些地方的总督，利用素丹政权的软弱无力，开始割据一方。在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加尼那的总督阿里在18世纪末开始割据伊庇鲁斯，维丁的总督奥斯曼·巴兹温特-沃格鲁开始据有多瑙河下游从贝尔格莱德到海岸的广大地区。他们不服从素丹的管束，直接与欧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奥斯曼帝国的西亚北非部分，

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伊拉克、叙利亚地区的封建主也都成了独立或半独立的诸侯。甚至在小亚细亚和鲁米利亚，也出现了不少“山谷之王”。他们控制一方，抗拒素丹的命令，中央政府也不得不对他们采取迁就妥协的态度。例如扎尼克总督阿里，拥有 1000 名士兵，十天之内能集合 6 万人的大军，他占有大量田产和几千头牲畜，实际上占据着小亚细亚的东北四省。到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素丹的实际权力几乎不超出首都附近地区，奥斯曼帝国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局面。

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弱，俄、奥、英、法等列强都对“土耳其遗产”垂涎三尺，由此产生了所谓“东方问题”。

土耳其首先引起了强邻俄国的觊觎。从 17 世纪末到 18 世纪末，通过一系列战争，俄国夺取了亚速夫、克里木、库班、布格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黑海北岸地区等，以致土耳其的疆域日蹙，国力日弱。

法国、英国和几乎所有欧洲列强都在 18 世纪强迫土耳其签订了“特权条约”。这些条约规定了治外法权、特惠通商条件、成为欧洲列强对奥斯曼帝国内各民族人民进行殖民奴役的一种方式。

（三）封建统治集团的改革

面对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局面，奥斯曼帝国统治阶级内部的有识之士，力图实行改革，走“富国强兵”之路，以挽救帝国的瓦解。这场改革经历了改革派与守旧派的反复曲折的斗争。改革派得到了一部分受到欧洲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封建官吏、知识分子、商人和随后兴起的资产阶级的支持。守旧派的力量主要是享有特权的大封建主、近卫军和伊斯兰教僧侣。

早在 18 世纪初年，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就引起了统治阶级一部分人的忧虑。但是，他们所处的阶级地位决定他们不可能了解国家崩溃的真正原因，而只是感受到这个危机的外部表现，例如国库空虚，军事失败，近卫军的叛乱，帕沙的独立，政府机关中的贿赂公行和骄奢淫逸，大批领土的割让，被统治民族的解放运动等。他们企图在军事技术、行政和财政方面采取一些措施和改革来挽救行将崩溃的帝国。

在亚非国家中，土耳其是最接近工业革命发祥地的国家。它利用其地理优势，最早开展了防御性的现代化，即学习英法的科学技术知识，加强国力，实行改革，以防止封建帝国的崩溃。第一个进行改革尝试的政治家是达马德·易卜拉欣。他在 1718～1730 年任大维齐期间，指示驻巴黎大使“详细研究有关文明与教育的各项措施，并汇报其中能使其应用于土耳其者”。1727 年在君士坦丁堡设立了第一家印刷所，承印各类土耳其文书籍。及至 1742 年印刷所被封闭，总共才出版了 17 部书。1720 年在首都组织了一个消防队。对海军进行了改组。1734 年建立了一个几何学学校，训练炮兵军官，但是因为近卫兵团的反对，很快关门了。这些改革无关要旨，对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经济没有产生多少重大的影响。

第一个正式实行改革的是塞里姆三世（1789～1807 年）。他在 1792 年至 1796 年间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没收拒绝服兵役的封臣们的大小采邑，改组海军，依照欧洲方式训练常备军，开办新式陆军学校和海军学校，组织“12 人委员会”以监督宰相，设立财政局，对烟、酒、咖啡和其他商品征税，向国外派驻常设使节等。这些改革遭到了官僚贵族、高级阿訇和近卫军官的反

对。1794年，维丁的总督奥斯曼·巴兹温特-沃格鲁首先发动了反对塞里姆三世改革的武装叛乱，迫使素丹妥协。1806年，近卫军在鲁米利亚发动叛乱，反对组织新军，素丹无奈只得收回在鲁米利亚推行“新制度”的命令。1806年，俄国发动对土战争。反对“新制度”的封建主，利用改革派大臣和军队开往前线的机会，于1807年5月策动近卫军在首都暴动，在赛马场设立大本营，屠杀改革派大臣，塞里姆三世被废逐。新素丹穆斯塔法残酷迫害改革派，完全恢复了旧制。

在塞里姆三世改革失败前后，南斯拉夫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蓬勃发展起来了。1804年，在商人出身的盖奥尔吉·彼得罗维奇领导下，塞尔维亚爆发了人民起义。起初，塞尔维亚人民只是反对近卫军的横暴行为，要求有自由选举地方官的权利和减轻税收，尚未提出建立独立国家的问题。1805年9月，起义者建立塞尔维亚行政委员会来治理从土耳其人铁蹄下解放出来的领土。1806年末，起义者攻占最后一座要塞贝尔格莱德，正式提出脱离土耳其统治的独立要求。塞里姆三世派去镇压的军队，多次遭到惨败。1812年素丹政府被迫给予塞尔维亚人以自治权。但素丹背信弃义，旋即于1813年向塞尔维亚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并占领了塞尔维亚。不甘忍受奴役的塞尔维亚人民于1815年再度举行起义。经过长期艰苦的战斗，终于迫使素丹政府重新让步。1830年8月，素丹颁布敕令，承认塞尔维亚的自治权和选举大公的权利，但大公必须允许素丹在贝尔格莱德等城市驻军。

继塞尔维亚起义之后，1821年又爆发了希腊起义。1830年希腊脱离奥斯曼帝国而独立。

巴尔干和希腊的民族独立运动震动了土耳其的封建集团，改革派又重新抬头，他们坚持主张消灭近卫军和成立新军，甚至一部分高级阿訇也感到，近卫军毫无用处，只有建立一支按照欧洲方式训练的军队，才能使帝国免于崩溃。

在改革派的支持下，素丹马赫穆德二世于1826年5月颁布了成立新军的命令，邀请埃及军官前来训练新军。马赫穆德二世考虑到近卫军必然反抗，乃调集素丹直接控制的炮兵到首都预作防备。近卫军果然在6月15日掀起叛乱，立遭炮兵猛烈轰击。血战继续了好几天，近卫军大败，数以千计的尸体被投入马尔马拉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通过这场较量，素丹遂正式宣布解散近卫军。近卫军的被消灭，虽然翦除了人民最痛恨的、最横暴的封建恶霸势力，但并不能中止奥斯曼帝国腐烂和崩溃的进程。

马赫穆德二世的另一项重大改革，是在1831年宣布废除军事采邑制，使大小采邑变成了与军役无关而征收土地税的一般私有财产。勒令西巴希退休，发给他们养老金，总共约为七十五万英镑（当时的价值）。同时，把伊斯兰教会的土地和其他产业也置诸素丹政府控制之下。

在行政方面，他仿照欧洲国家设立了外交部、内政部、财政部、陆军部等等，建立使地方行政长官直接依附于素丹的制度，派文官担任省长和县长。

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取消内地关卡，开办邮政，发行报纸，恢复旧日停办的军事学校，派遣留学生，开办军医学校、军事科学院和帝国音乐学校。

在1831~1833年和1839~1840年的两次土埃战争中，素丹的军队都被埃及的新式军队所打败。因此，在土耳其封建统治集团中那些受过欧洲教育的官吏，认为马赫穆德二世的改革还不能挽救帝国的危亡，主张进一步实行

改革。改革派的领袖是 1839 年任外交大臣的穆斯塔法·雷希德-帕沙。当土耳其军队在第二次土埃战争中溃败，素丹统治正受到严重威胁时，穆斯塔法·雷希德-帕沙劝说素丹阿卜杜尔-梅吉德实行新的改革。11 月 3 日，雷希德-帕沙在皇宫的花园里对各大臣、高级阿訇与各国外交使节宣读他所草拟的敕令，即所谓“御园敕令”。宣布保证帝国全体臣民不分宗教信仰一律享有人身、名誉和财产的不可侵犯权；确定固定税率，废除包税制；建立合理的征兵制度，服役期限定为五年。敕令谴责卖官鬻爵与贪污受贿行为，宣布违犯者处以严刑。以后又根据雷希德-帕沙的拟议，颁布了一系列改组法院、政府机关、军队和教育机构的法令。

雷希德-帕沙特别重视世俗教育，力求摆脱伊斯兰教对教育的控制。1845 年设立了临时教育委员会，负责制定教育改革方案，1848 年正式确定了大中小学的三级教育体制。到 50 年代设立了许多中小学，还创办了大学和土耳其科学院。

以 1839 年的“御园敕令”为起点的新的改革，在土耳其近代史上称为“坦齐马特”。这次改革和以往两次不同，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耳其资产阶级的要求。但是，它的倡导者仍来自封建集团，目的在于巩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土耳其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改革缺乏坚实的新的阶级基础。封建集团中只有一部分人认为改革有必要，大多数僧俗封建主以为改革危害帝国的统治，因而进行公开和隐蔽的破坏，使许多措施不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害怕改革会导致土耳其减少对外国资本的依赖，因此也大力反对。这些因素招致改革的失败。

改革的失败表明奥斯曼帝国已病入膏肓，单靠它自身的力量再也无法恢复生机。从而使它成为欧洲列强任意宰割的“近东病夫”。在克里木战争中，土耳其虽是战胜国之一，但它却不能以平等的一员参加会议。在英、法等国的强大压力下，1856 年 2 月 18 日素丹颁布诏书，重申 1839 年改革的各项原则，并列入巴黎和约作为土耳其政府必须履行的义务。1856 年的诏书表面上是“坦齐马特”的继续和发展，实质上是列强奴役奥斯曼帝国的一根绳索。诏书答应外国人有权占有不动产，规定利用欧洲的科技和资本施之于改革事业，修建铁路，建立银行，发展商务。1856 年颁布创办奥斯曼银行的法令，1863 年该行改名为奥斯曼帝国银行，它由英法资本控制，有权发行货币，不纳捐税。该行利用它的垄断地位，掌握了土耳其绝大部分对内对外贸易。1858 年颁布新土地法，进一步巩固了地主阶级的地位，使他们成为全权的土地所有者，而佃农和雇工则听任地主随意摆布。还颁布了外国人有权占有土地的法令。克里木战争期间，为了筹措经费，奥斯曼帝国首次向英、法借债。此后，财政状况日趋严重，债台高筑，到 1870 年已负债 25 亿法郎。封建统治集团只得以关税等收入作为抵押。于是，这些经济部门也落到了外国资本手中，土耳其的半殖民地地位日益加深。

第十五章 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非洲

17世纪，当欧洲国家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时，非洲却变成欧洲列强侵略的对象，贩卖奴隶的场所。由于工业革命的开展，资产阶级感到贩卖黑人为奴，还不如就地奴役非洲人民，于是开始了变非洲为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政策。

在欧洲列强的侵略下，非洲人民不仅为抗击殖民主义侵略、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而战，而且开始实行开放改革，力图挽救民族危亡。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就是开先河之举。

第一节 贩卖黑人

（一）近代开端时期的非洲

当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取代腐朽的封建制度时，非洲已经遭受了欧洲殖民者两个多世纪的侵略。但殖民者仅仅占领了一些岛屿和沿海据点，大多数非洲国家依然在闭塞的状态中独立地向前发展着。

那时，非洲各国社会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北非的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已经是发达程度不同的封建制国家。埃及地中海沿岸和尼罗河流域的一些城市，如亚历山大、开罗，工商业繁荣，并同欧亚两洲进行着频繁的贸易。

埃塞俄比亚等国，封建制度已占主导地位。东非、西非的一些国家，正在向封建制度过渡，另一些国家尚处在奴隶制社会阶段。南部非洲的班图族和科伊桑人则生活在原始社会的不同阶段。

自从1415年葡萄牙侵占休达以后，非洲一直是殖民侵略的对象。但到近代开端前后，葡萄牙的殖民霸权已经衰落。1578年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昂，亲率3万大军远征摩洛哥，结果葡军全军覆灭，塞巴斯蒂昂本人也淹死在姆哈曾河。经此一战，葡萄牙一蹶不振，只能在摩洛哥保住休达和丹吉尔两地，而且大大削弱了它在非洲东征西伐的军事力量。

荷兰、英国、法国乘葡萄牙衰落之机，夺取了它在西非海岸的许多殖民据点。1595年，荷兰人冲破葡萄牙海军的封锁，首次来到黄金海岸，1598年在摩里、布特里、科曼廷和柯门达分别建立了商站。1621年荷兰人又在塞内加尔的果雷埃建立了商站。1637年，荷兰组织一支部队，九艘战舰和两百多只小船，攻下了葡萄牙在西非的主要殖民据点埃尔米纳，葡萄牙守军投降。随后，荷兰又夺占了阿克西姆和其他据点。

英法也积极向西非渗透。1618年英国从葡萄牙手里夺取了冈比亚河口的圣马丽村，建立了詹姆士堡。1631年英国在黄金海岸建立了科尔曼丁。在英荷激烈的角逐中，1642年荷兰夺取了除海岸角以外的英国在黄金海岸的据点。法国人的主要活动场所是塞内加尔，1638年建立了圣路易堡，1677年从荷兰人手中夺取了果雷埃。

在这一轮殖民竞争中，葡萄牙失去了对西非海岸的控制，但仍占领着马德拉、佛得角和圣多美-普林西比等岛屿。同时，葡萄牙集中力量镇压了安哥拉恩津加女王领导的起义，加紧向安哥拉内地扩张，竭力把安哥拉变成一个新的“大奴隶工厂”。

东非沿海各族人民也恨透了葡萄牙殖民者。1631年蒙巴萨苏丹带头起来反抗葡萄牙的统治。他率部攻占了耶苏堡，杀死了葡萄牙殖民行政长官。奔巴岛和东非沿海其他城镇，相继响应。经过几次反复，到1698年葡萄牙终于被赶出蒙巴萨，次年又从鲁伍马河以北完全撤出，龟缩于莫桑比克。当葡萄牙被打得焦头烂额之际，荷兰于1638年占领了毛里求斯岛，1652年开始侵入南非，建立好望角殖民地。法国则渗入马达加斯加岛，建立了第一批商站。

葡萄牙和荷、英、法等国在东、西非沿海建立的这些要塞和商站，既是他们从事罪恶的黑奴贸易的据点，也是日后向内地扩张的前进基地。

（二）黑奴贸易的兴盛

葡萄牙殖民者是入侵非洲的先锋，也是近代“贩卖人类血肉”行业的开山鼻祖。猎捕和贩卖黑人为奴开始于15世纪40年代。葡萄牙殖民者在西非沿岸猎取黑人，或贩回欧洲，替封建大地主服役种田，或利用黑人奴隶的廉价劳动力，在圣多美、马德拉、佛得角等大西洋岛屿上开办种植园，生产出口作物。在15世纪，猎捕和贩卖黑人的规模不大，当时只不过是葡萄牙殖民者在掠夺黄金、香料之余的一项副业而已。有人估计，15世纪下半叶每年大约从非洲大陆输出五千名黑人到欧洲和西非沿海各岛屿。

从16世纪初年起，兜捕和贩卖黑奴的规模越来越大。从16世纪初到18世纪末，是贩卖黑人的“兴盛”时期。因为欧洲殖民者在征服美洲的过程中，大批屠杀印第安人，致使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一些地区，尸骨遍野，人口锐减。他们要掠夺美洲大陆丰富的矿藏，开发肥沃的土地，尖锐地感到劳动力不足。利欲薰心的贵族商人看到，把吃苦耐劳的非洲黑人运到美洲，既可以解决劳动力问题，又可以做一笔一本万利的生意。

美洲的奴隶种植园制度是极其残酷的。奴隶种植园主奉行的信条是从黑奴流汗得到的钱能抵上买他们的钱，就不怕把他们累死。所以，美洲黑奴的死亡率很高，例如圣多明各岛每年要死3万人。如果不从非洲每年运进大批黑人加以补充的话，不但奴隶种植园不能扩大，即使已有的种植园也不能继续存在下去。贩卖黑人的暴行，几个世纪盛行不衰，原因就在于此。

1502年，第一批黑人贩运到圣多明各岛。1513年，西班牙国王正式颁发执照，准许商人把黑奴运往西属美洲殖民地。从此，贩卖黑奴就成了由政府支持的“合法”行业。

在贩卖黑人的兴盛时期，猎取和贩卖黑人的区域，主要是从塞内加尔到安哥拉的西海岸。西海岸距离美洲航程较短，且该地区的黑人开化程度较高，人烟稠密。东海岸是另一个重要的贩卖区。1645年第一批奴隶从莫桑比克运往巴西。东非的黑奴除运往美洲以外，还运到马斯克林群岛、印度和某些东方国家。他们或在殖民者开办的种植园作工，或作家务劳动。一个英国船长写道：葡萄牙“国王的船只与私商的船只一样，装运很多奴隶去印度。男女奴隶都得到在印度的葡萄牙人的好评”。

贩卖黑人起初由葡萄牙商人一手把持。葡萄牙政府派遣的海军分遣队，在海洋上巡弋，严禁其他国家的商人插手。例如，1606年一个葡萄牙修士得悉阿拉伯商人在帕特贩奴，立即进行阻拦，训斥帕特素丹说：“不能准许这

种买卖。”当时一些英法的海盗偶尔也冲破封锁到非洲贩奴。1562年，英国的约翰·霍金斯曾窜到塞拉利昂，捕捉300名黑人，运到西印度群岛出售，发了大财。

1580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占领，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被歼灭，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据点相继丢失，海上和商业霸权一落千丈。从此，荷兰、英国和法国对葡萄牙贩卖黑奴的垄断权提出了挑战，甚至丹麦、瑞典、美国和勃兰登堡也插上一脚。在这场竞争中，英国凭借雄厚的资本，强大的海军，先后击败荷兰和法国，做到“后来居上”，成了最大的人肉贩子。英国夺得贩奴贸易优势的标志是1713年签订的《乌特勒支条约》。这个条约使英国商人获得了在30年内每年向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输送4800名黑奴的垄断权。自此以后，英国在黑奴贩卖中所占的份额不断上升。到1770年，黑奴的半数由英国船只载运，近五万名；其次是法国，三万名；葡萄牙人占第三位，约一万名。

猎获和贩卖黑人的全过程，是一幅血和火交织而成的图景。最初，欧洲殖民者组织“捕奴队”，驾驶海盗船，偷袭黑人村庄，杀死老弱病残，将年轻力壮的人掳掠而去。例如，1446年葡萄牙殖民者阿苏拉拉，在一次猎奴战争中曾杀死许多无辜居民，掳走了160名男女和儿童。由欧洲殖民者亲自动用武力猎取黑奴，遭到了非洲人民的激烈反抗，于是他们改变手法，由他们出枪，挑动一些非洲酋长去从事猎奴战争，在东非则由阿拉伯奴隶商，组织猎奴队，深入内地，猎获黑人，他们自己则躲在沿海的商站，等待收购。例如，阿拉伯最大的奴隶贩子提普·蒂帕，曾拥有一支一千多枝枪的武装商队，把猎获的黑人从内陆押到沿海，卖给欧洲殖民者。他自己也由此而成为拥有数百万英镑的富翁。

黑人在猎奴战争中被俘，只是他们苦难生活的开始。在从内地押运到沿海的漫长途中，黑人戴着脚镣手铐，步履蹒跚，艰难地穿过丛丛荆棘，被折磨得皮开肉绽。稍有不慎，就遭到毒打。跟不上队伍的孩童，被揍得脑浆迸裂。在漫长的贩奴道上，洒满黑人的鲜血，遍布黑人的白骨。

到达沿海以后，黑奴被成串地牵往贩奴市场，让欧美奴隶贩子选购。买卖双方拍板成交之后，奴隶贩子就用烧红的烙铁，在黑奴的臂上和胸前打上带有公司纹章的烙印，关进地牢，等待装船运往目的地。

运送黑奴到美洲的大西洋航线，被称作黑人的死亡线。从西非到美洲，黑奴要忍受六周到十周的苦难，从东非到美洲，要遭受四个多月的煎熬。奴隶贩子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往往不顾核定的载重量，拚命塞进尽可能多的黑奴。加之饮食恶劣，疾病肆虐，无数黑人葬身于大西洋海底。据估计，从非洲到美洲，一般只有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的黑人能活着到达目的地。

黑人奴隶的苦难是没有尽头的。一到目的地，他们要再次被出卖，被押到种植园或矿山当牛做马。

（三）西方殖民政策的转变与禁止“奴隶贸易”

以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欧美各国的工业革命引起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在政治上，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工业资本的经济实力迅速超过和压倒了商业资本，它们在政治上日益排斥商业资本家，成为资产阶级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在经济上，工厂制大机器生产的确立和日新

月异的科学技术相结合，使生产力以空前未有的速度突飞猛进，工业品和工业原料的供求大大地突破了本国市场的容量，因此寻求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成为欧美经济生活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然而，在工业革命前，西方在非洲推行的以贩奴为主的殖民政策，使非洲无法成为西方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因此代表工业资本利益的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提出了“通商（Commerce）、传教（Christianity）、文明（Civilization）、殖民（Colonization）”的方案，被称为“四C连祷词”。“殖民”是四C连祷词的关键词。通过通商、传教和强行输入西方文明，使非洲变成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工业原料产地。为此，必须废除“奴隶贸易”，打开进入非洲内陆地区的大门，于是禁止“奴隶贸易”和内陆探险，几乎同时出台。

同时，“奴隶贸易”的废除也是黑人顽强反抗的结果。

从殖民者贩卖黑人的那一天起，非洲人民就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非洲大陆，他们举起长矛，拿起弓箭和石块，迎头痛击“捕奴队”。在沿海的黑牢里，黑奴秘密组织暴动，越狱逃跑。现在已见于文字记载的，在18世纪就发生过15次黑奴起义。

在大西洋航行的贩奴船上，尽管奴隶贩子全副武装，严加防范，黑人还是不断地掀起反抗斗争。据不完全统计，1700年到1845年，仅在英美贩奴船上就发生了55次黑奴暴动。1769年，英国贩奴船“南西号”，停泊在新卡拉巴尔河口，赤手空拳的黑人奴隶，同武装到牙齿的奴隶贩子英勇搏斗。当地居民闻讯赶来支援，赶走了奴隶贩子，救出了自己的骨肉同胞。

在美洲，黑奴们怠工、逃亡、起义，为反抗野蛮的奴隶制度，争取黑人的解放而英勇斗争。海地革命和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胜利，导致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颁布了废除或限制奴隶制的法令，从根本上打击了黑奴贸易。

欧美各国的废奴运动的兴起，也给“奴隶贸易”以有力的冲击。18世纪80年代英国兴起了反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运动，1792年英国议会以230票对85票通过了反奴隶制的动议，1807年英国宣布禁止“奴隶贸易”；法国大革命对奴隶制也是一个冲击，在“人生而自由”的思想指导下，法国国民大会于1794年宣布废除法属殖民地的“奴隶贸易”和奴隶制；1807年美国国会通过禁止“奴隶贸易”的法律，于1808年起生效。丹麦于1792年，瑞典于1813年，荷兰于1814年，葡萄牙于1820年，西班牙于1823年也先后宣布禁止“奴隶贸易”。

资产阶级政府宣布废除“奴隶贸易”，是在黑奴斗争的沉重打击下，为了适应工业革命后生产力飞速发展的需要，改变对殖民地的剥削方式，把非洲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变成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英国殖民者欧文19世纪初考察东非以后，竭力主张废除奴隶贸易，就地利用当地资源，他说：“这些新的资源将为我国的企业和工业开放。”

1787年，英国废奴主义者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把300多名黑人、76名白人妇女和儿童，送到塞拉利昂的圣乔治湾，向当地的托姆酋长购买了一块土地，安顿移民，并建立了格兰维尔镇。1791年组织了“塞拉利昂公司”，负责管理这块新殖民地。1808年由英国政府接管，把塞拉利昂变成成为直辖殖民地。英国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海军基地，在海上搜捕贩奴船。同年就有6000名在海上抓获的黑奴被安置在塞拉利昂。塞拉利昂也是英国向西非扩张的一个基地。1821年，塞拉利昂、冈比亚和黄金海岸合并，称“西非殖民地”，

设总督府于弗里敦。

美国也仿效英国的榜样，企图在废奴的旗号下，在西非建立殖民地。1816年为了组织自由黑人移民，成立了“美国殖民协会”。181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在西非建立殖民地的法案，并拨款10万美元。1822年，美国政府派“鳄鱼号”军舰到西非，在梅苏腊多角购买了一块土地，把从奴隶制度下解放出来的黑人送到这里，建立了居民点（后称蒙罗维亚），并委任白人阿什曼为总统。殖民协会陆续在蒙罗维亚附近建立了埃迪纳、马歇尔、布坎南、格林维尔、锡诺、马里兰等移民区。1824年这个新的殖民地被称为利比里亚。1825年利比里亚制定了一部宪法，规定主权归“美国殖民协会”所有，由协会任命总督行使这个权力。1841年，黑人约瑟夫·罗伯茨担任总督，他领导黑人争取独立。1847年7月26日，在蒙罗维亚召开人民大会，宣布利比里亚独立，并以美国宪法为蓝本制定了一部新宪法。宪法规定利比里亚为共和国；立法权由国会行使，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共和国总统是政府首脑和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罗伯茨当选为第一任总统。但是，美国拒绝承认利比里亚的独立，直到1862年林肯政府才予以承认。

一方面，英美等国在反对奴隶贸易的旗号下，积极向非洲扩张，建立殖民地；另一方面贩卖黑人的勾当并未因西方各国的一纸禁令而嘎然而止。在整个19世纪，黑奴贸易继续进行着，不过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例如从葡属东非输出的黑奴1818~1830年为35万名，1830~1850年下降到15万名。

非洲“奴隶贸易”禁而不止，其根源在于美国、古巴、巴西和法国海外殖民地的奴隶种植园依然存在。其次，欧美各国的工业革命有先有后，工业化的程度有高有低，因而各国政府对执行禁止“奴隶贸易”的态度就各有不同，有的比较坚决，有的比较暧昧。与“奴隶贸易”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商业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则千方百计地抵制禁止“奴隶贸易”法令的实施。

他们抵制的手法之一是“走私”。法国、美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奴隶贩子，规避英国军舰的检查，私运黑奴到美洲。例如，1860年英国海军截获一艘美国贩奴船，其中装载着840名黑奴。

他们抵制的手法之二是“自由劳工移民”。当时非洲根本不存在大量自愿移民的自由劳动力。所谓“自由劳工移民”，是打起招募“自由劳工”的旗子，公开恢复“奴隶贸易”。法国殖民者是这种“自由劳工移民”的倡导者。他们通常在与本地奴隶贩子就价格达成协议之后，把选中的黑奴带到法官面前，当众宣布这些黑奴已获自由，并让法官出具证明，然后押运上船，贩运到美洲和其他法属殖民地，特别是马斯克林群岛，投入种植园当奴隶。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这是“一个以最卑劣的形式，即借口黑人向法国殖民地‘自由移民’来恢复这种可耻贸易”。

在走私和“自由劳工移民”形式下继续着的“奴隶贸易”，直到美国、古巴和巴西在19世纪60、70和80年代，相继废除种植园奴隶制以后，才逐步停止下来。

（四）贩卖黑奴对世界和非洲的影响

源出拉丁文 Liber，意即“自由的”。

马克思：《英国政府和奴隶贸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545~546页。

贩卖黑奴历时四个多世纪，对世界和非洲的历史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这种浸透黑人血泪的掠夺性买卖，加速了欧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并促使近代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起来。

在贩卖黑奴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本万利的“三角贸易”制度，给欧美资本家带来了巨额利润。通常，欧洲奴隶贩子带着一些劣质商品，从欧洲各个港口出发，航行到非洲海岸，这是“三角贸易”的第一程，又叫“出程”。在非洲海岸用劣质货物“交换”黑奴，然后横渡大西洋到美洲，这叫“中程”。在美洲用黑奴换取金银和工业原料，返回欧洲，这叫“归程”。奴隶贩子一般用半年时间，跑一趟“三角航程”，可以做三笔生意，发三笔横财。在17世纪，非洲海岸一个黑人的离岸价格是25英镑，运到美洲可卖150英镑，利润率高达600%。18世纪，在非洲用50美元买一个黑人，到美洲可卖400美元。许多奴隶贩子以微薄的资本起家，经过一次和几次“三角航程”，立刻变成阔佬。英国著名的冶铁大老板安东尼·培根，就是贩卖黑奴起家的。他在1768~1776年间大做黑奴买卖，赚了76,000英镑。这笔钱成了他创办冶铁业的重要资本。

贩卖黑奴给南北美洲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大批黑人的到来，改变了美洲居民的民族构成。不仅海地这类国家变成了黑人占绝对优势的国家，而且在许多美洲国家中，黑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巴西独立前，全国居民380万人，黑奴就占170万人。正是由于对广大黑奴实行骇人听闻的剥削，大量的黄金、白银以及糖、烟草、棉花、蓝靛才源源不断地流进欧洲，为宗主国提供了大量财富。据德耳比·托马斯估计，在英属殖民地糖料作物种植场工作的黑奴，给英国带来的利润要比在本国劳动的人大130倍。

欧美的许多海港和工业城市，诸如英国的伦敦、利物浦，法国的南特、波尔多，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美国的纽约、波士顿等，都是不同程度地靠贩卖黑奴发展起来的。“以奴隶贸易扬名天下”的利物浦，原本是一座荒僻的小村庄，经营“黑奴贸易”后，一跃而为英国的第二大商港。利物浦用于黑奴贸易的船只，1709年只有一条37吨的小船，1751年增至32艘，1792年上升到132艘。奴隶贸易是它进行原始积累的方法，18世纪末叶，黑奴贸易每年给它带来30万英镑的纯收入。利物浦的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坦白地承认：“人类的血和肉是我们白手起家的代价。”

但是，贩卖黑人却给非洲人民带来了大灾难，给猎奴区的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带来了大破坏。殖民者从非洲究竟掠走了多少黑人？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精确的数字。估计有1000万或者1500万黑人输出到美洲，非洲损失了1亿人或者1.1亿人。在输出的黑人中男子比女子多一倍，男子的年龄一般为10岁至35岁，女子为10岁至25岁。大量强劳动力的丧失，必然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不可估量的破坏。

连绵不断的“猎奴战争”，使昔日繁华的城市变成一片废墟，把人烟稠密的村落弄得田园荒芜，野草丛生。那些死里逃生的人们，不得不从生机盎然的农业区，迁居到人迹罕到的深山老林，重过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手工业生产逐渐衰落，许多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失传。欧洲殖民者贩来的甜酒代替了非洲酿造的烈性较小的饮料。在英国廉价布匹的竞争下，许多非洲国家生产的花布、锦缎和丝绒消失了。

长期的“奴隶贸易”败坏了道德，破坏了非洲优秀的文化和精神文明。黑人离井背乡，妻离子散，失去了人类应有的天伦之乐，少无所养，壮无所眷，老无所终。黑人被作为“会说话的工具”受人奴役和剥削，妇女则更受到百般凌辱和摧残。他们被灌输一种低劣种族的观念，受尽种族歧视之害。

（五）内陆探险

西方在开展禁止“奴隶贸易”的同时，对非洲发起了大规模的内陆探险。

非洲内陆地形复杂，沙漠、沼泽、密林和瀑布纵横交错，道路崎岖难行，气候恶劣，疫病流行，如热病能致人死命。长期以来西方殖民者很少深入内陆，他们对非洲内陆的了解仍停留在古罗马或阿拉伯学者著作中只字片语的水平。因此，要把非洲变成西方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首先必须破除对非洲内陆的无知，打通自沿海进入内陆的交通，否则，西方对非洲的殖民计划将成为泡影。

1769年，英国人詹姆斯·布鲁斯对尼罗河上游的青尼罗进行了探险考察，揭开了内陆探险的序幕。内陆探险起于布鲁斯的尼罗河之行，止于1876年布鲁塞尔会议，历时百余年。在内陆探险中，数以百计的探险家和探险队深入非洲内陆。

布鲁塞尔会议以后，仍有内陆探险，但其活动直接构成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内容，与此时的内陆探险，在性质上已经不同。

第二节 埃及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和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

（一）法国入侵前的埃及

1517年埃及被土耳其人占领，沦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日趋衰落，过去的封建主曼麦鲁克集团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1769年他们的首领阿里贝伊赶走了土耳其总督。1773年阿里贝伊被暗杀后，土耳其总督的统治虽然恢复，但他被软禁于撒拉丁堡垒中，有名无实。曼麦鲁克封建主集团的首领们在埃及掌握着实权。

当时，埃及是一个拥有400万人口的封建制国家。土地名义上归国家所有，实际上控制在各个封建地主集团手里。其占有形式有三种：奥斯曼素丹占有的土地；专供宗教团体和寺院使用的土地；曼麦鲁克封建主占有的土地，后一种是主要的。曼麦鲁克封建主既是军人，又是包税人。他们各霸一方（一村或数村），独揽包税权。他们向政府预缴全部或部分“国税”（米里），代表政府向农民征收“国税”。为酬答他们负责征税，他们被分到一块个人使用的土地（乌西叶）。这块土地归他们终生享用，可以出租。他们还向农民征收“包税余额税”（法伊德），中饱私囊。这些包税人实际成了自己包税领地内所有土地的绝对控制者。

曼麦鲁克军团是埃及的主要军事力量，到17世纪，其力量已经超过土耳其驻扎在埃及的奥斯曼近卫军。他们的头目充任开罗和各地的地方长官，包揽了24个郡守的职务。曼麦鲁克军团分裂成许多派系，各自为政，割据一方。为争夺开罗和各郡长官的职位，常常互相攻伐，结果造成埃及内战连绵，动乱不已。

埃及农民依附于封建地主。他们不能擅自离开土地，否则包税人可以强行抓回。他们除交纳“国税”和“余额税”外，还要替包税人服徭役，交“郡县税”和“过路捐”等。所谓“过路捐”，就是近卫军和曼麦鲁克长官的侍从路过某村时，不论人数多少，逗留多久，村民必须摊钱供给他们美餐佳肴。在曼麦鲁克封建主压榨下，埃及农民一贫如洗，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十分落后。

埃及本来有比较发达的工商业，但奥斯曼帝国占领埃及以后，实行闭关政策，严禁欧洲商船往来于吉大港和苏伊士城，造成外贸萧条，工商业衰落。手工业者都组织在各类行会之中，如皮箱匠行会、珠宝匠行会、铜匠行会等等。行会有严密的组织和行规。行东叫谢赫，学徒必须满师才能正式入会，入会仪式叫做“拽孩子”。

到了18世纪，埃及的闭关自守局面有所改变。177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埃及缔结条约，规定苏伊士港向英国商人开放。1785年，埃及又与法国签订了类似的条约。可是，当埃及对外开放时，它已比欧洲落后了几个世纪。

（二）拿破仑远征埃及和它的影响

埃及地处欧亚非三洲的接合部，是通往印度的交通要道，是列强争霸欧洲和世界的必争之地。英国重视埃及，主要是为了巩固它在印度的统治和东方的商业优势。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前夜就强调占领埃及的重要性，企图通过埃及发展它与阿拉伯半岛和伊朗的贸易，获得法国原来依靠加勒比海供应

的部分原料，开辟更广大的出口市场。法国大革命后，督政府和拿破仑把进攻埃及当作与英国在全球争霸的一环。1797年8月16日拿破仑写道：“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感到，要真正打垮英国，就必须占领埃及”，他认为，要进攻印度，“必须有一个中途阵地作为进攻基地。埃及离土伦600法里，离马拉巴尔（印度西部低洼海岸。——引者注）1500法里，它正是这样一个基地”。

1798年4月12日督政府发布了远征埃及的命令。5月19日拿破仑率领350艘战舰和35,000人的军队，从土伦出发，他对士兵们说：“你们是对英作战军的一个侧翼。”7月1日法国战舰驶抵亚历山大港，经过12天战斗，法军占领该城。7月21日法军与曼麦鲁克军团和开罗平民、农民组成的抗法部队激战于金字塔附近。结果曼麦鲁克军团被击败，法军占领了开罗。接着，拿破仑派军消灭了曼麦鲁克军团的残部，征服了上埃及。

拿破仑在埃及像在意大利一样，一方面打起反封建的旗子，进行改革，笼络埃及人民；另一方面又无情地镇压埃及人民的反抗，搜刮民脂民膏。

法军还未进入开罗，拿破仑就声称他要从曼麦鲁克的暴政下“解放”埃及人。为确立自己的统治，他首先着手改革旧的行政机构，建立新的行政机关。他委派阿卜杜拉·谢尔戈维为首的九名伊斯兰长老组成开罗行政会议，协助法国人统治开罗；把全埃及划分为16个军区，每个军区任命一名将军为军事长官，建立地方行政会议管理民政事务；10月初召开全埃国务会议，由各区各派九名代表参加。

拿破仑宣布没收所有已死或逃亡在外的曼麦鲁克的土地，取消他们征收的赋税，把农民担负的各种税额合并为一种单一税。从此，埃及农村中的包税制开始消亡。

为了供应法军的需要，拿破仑建立了面包房、土啤酒场、制硝厂、弹药厂、军服厂、铸造厂、机械制造厂和造船厂。这些工厂不但生产军需用品，而且生产民用产品，制造水压机等机械和科研仪器。

有上百名法国科学家随军来到埃及。8月23日在拿破仑的主持下，建立了埃及研究院，下设数学部、物理部、政治经济部和文学艺术部，附设图书馆、印刷所和实验室。由著名学者蒙热任院长。研究院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工作。罗塞达刻石的发现为创立埃及学奠定了基础。

拿破仑把法国革命中的一些改革措施，生搬硬套到历史条件和社会发展水平迥异的埃及来，往往收效甚微，甚至推行不下去。同时，拿破仑是一个侵略者，他遭到了热爱民族独立的埃及人民的仇视。拿破仑为对付埃及人民的反抗，采用屠杀政策。7月30日，他命令部下：“你们必须严厉对付居民，我每天至少杀三个人，将人头挂在开罗大街上，这是叫他们服从的唯一办法。”

当8月1日纳尔逊消灭法国舰队，割断法军与本土的联系之后，拿破仑便加紧向埃及人民勒索。法军要各大城市的商人交纳巨款，如开罗50万法郎，亚历山大港30万法郎。法军规定埃及人民供应法军全部军粮，并交纳实物税；行东要领取执照，必须交纳执照税；10月20日又下令“向私人财产、诉讼和诸如浴室、酒店、铺子、咖啡馆、磨坊、油坊、香油坊和住房等一类的建筑物征收新的捐税”。新税令的颁布是第一次开罗反法大起义的导火线。

在下层伊斯兰教长老和手工业行会的组织下，开罗人民于1798年10月21日，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法起义。成千上万的市民和学生涌向爱资哈尔清真寺，郊区的农民也赶来参加。起义群众击毙了法军卫戍司令戴布，占领了城

门，猛攻法军盘据的高地。拿破仑闻讯急忙从外地赶回开罗，调集大批军队进行反扑，炮轰爱资哈尔清真寺，并将其占领；大规模屠杀群众，一天之内就杀害了四千多人。起义终于失败。

1799年1月，法军为打通到印度的道路，进军叙利亚。法军在雅法城遭到顽强抵抗，拿破仑下令屠杀全城居民。进攻阿克要塞时，守军在当地人民支持下，坚持两个月之久，毙伤法军三千多人。拿破仑远征叙利亚惨败而归。8月，他把远征军指挥权交给克莱贝尔将军，自己潜返法国。

1800年3月20日，法军与开进埃及的奥斯曼军队在艾因舍姆斯地区发生冲突。开罗人民乘机掀起了第二次反法起义，进攻法军总部和其他阵地，迫使法军从沿海调遣驻防军增援开罗。外地群众开展游击战，打击法国侵略者。开罗的第二次起义虽被镇压，但法军已陷于四面楚歌的绝地。

英国唯恐法国的势力伸向东方，夺取印度，乃根据与土耳其政府的协定，于1801年3月派军在埃及登陆，“帮助”土耳其军队反攻埃及。法军受到内外夹攻，节节溃败，先是撤离开罗，困守亚历山大，9月又从亚历山大撤回回国。

拿破仑的侵略，给埃及人民带来了难以形容的苦难，数万人惨遭杀害。但是埃及人民在反侵略斗争中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发扬了民族主义精神。

拿破仑远征揭开了资本主义列强争夺埃及的序幕。拿破仑在埃及给了曼麦鲁克封建地主集团以致命的打击，一个新的地主商人集团在斗争中兴起。拿破仑的各项改革虽然失败，但它却是穆罕默德·阿里改革的先声。

（三）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

在埃及人民战胜法国侵略者之后，土耳其素丹在英国的支持之下，把军队重新开入埃及，恢复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曼麦鲁克集团的残余，分成几股，在上、下埃及流窜。这时，新兴的地主商人集团业已成长起来，他们要求改变军事封建割据局面，反对外国的奴役，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埃及，穆罕默德·阿里便成了这个集团的政治代表。

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年）原是一个阿尔巴尼亚烟草贩子，后来参加土耳其后备军。在埃及服役期间，与新兴地主商人集团建立了密切联系。1803年，他率领后备军，暂时与曼麦鲁克军团首领联合，赶走了土耳其总督。1804年和1805年，开罗人民曾两次发动起义，穆罕默德·阿里毅然率部参加，击溃了曼麦鲁克军团，终于取得了政权，土耳其素丹承认既成事实，任命他为埃及总督。从此，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统治埃及达一个半世纪之久（1805~1952年）。

英国为了把埃及变成自己的殖民势力范围，阻止拿破仑可能发动的第二次进攻，于1807年3月派军占领亚历山大城。接着，英军进犯席腊德。该城军民给予迎头痛击，打死英将沃科普，毙伤英军五百余人。英国不甘心失败，4月增兵席腊德，用密集炮火猛烈袭击。席腊德军民坚守城池，各地组织的志愿军纷纷前来支援。在第二次战斗中，埃及军民共打死和俘虏英国军官38人、士兵476名。英军残部逃回亚历山大。在埃及人民的沉重打击下，英军同穆罕默德·阿里签订停战协定，9月英军从亚历山大撤退。

反英斗争的胜利使穆罕默德·阿里控制了港口城市亚历山大，巩固了新

兴地主商人政权。

穆罕默德·阿里当政期间，实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改革，对埃及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土地和农业改革。反英战争一结束，穆罕默德·阿里就着手土地改革。他针对伊斯兰教长老在动乱年代扩占土地，生活腐化，威信下降的现实，宣布废除“长老领地”，1909年又下令向用于宗教事务的田产课税。在夺权斗争中，穆罕默德·阿里已用武力消灭了大部分曼麦鲁克，1811年他又把留在开罗的曼麦鲁克召到撒拉丁堡，全部予以屠杀。他废除了腐朽的包税制，没收了曼麦鲁克的土地。

所有被没收的土地，一半分给了穆罕默德·阿里的亲属和部下，其中主要是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也有小部分埃及人。这些人构成了新的地主阶级，是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统治埃及的社会支柱。另一半分成小块（3~5费丹），租给农民耕种。实行统一的田赋，税额按土质好坏和灌溉条件而定。

穆罕默德·阿里大力兴修水利，疏通旧渠，开挖20条新渠，修筑近30座水坝，推广改良水车，试用蒸汽排灌机，引种新作物、新品种，著名的埃及长绒棉就是这个时期推广的。

由于改革土地制度和田赋制度，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耕地面积从1821年的200万费丹增加到1840年的385万费丹，农作物由一熟变为两熟或三熟，经济作物产量和出口额大幅度增长，棉花出口量由1821年的944包增加到1849年的25万余包。

发展工业。穆罕默德·阿里建立了各种工厂：硝石场、火药厂、造船厂、纺织厂、呢绒厂、染料厂、铸造厂等等，仅纺织厂就有30个。在职工人达31,000人。为改变技术落后状况，他购买西方机器设备，聘请技师，引进先进技术。他主张一边进口，一边仿制，一旦仿制成功就减少进口。

工厂工人大部分是强制征发来的。他们被编成排、连、营，过着军营式的生活，经常遭到毒打、体罚和监禁，不能自由地离开工厂。

1809年，穆罕默德·阿里规定，私人作坊主和工场主所需的原料由政府按价供给，产品由政府按价收购。他还采取措施由政府控制进出口贸易。

建立新军。穆罕默德·阿里改编了曼麦鲁克遗留下来的旧军，建立了一支用新式装备武装起来的新军，一度拥有25万人。他还创建了埃及海军，一度拥有战舰32艘。为了建立一支强大的新军，1813年起派人到法国、意大利学习军事技术；1825年创办军事学校和参谋学校，延聘法国军官为教官。

改革文化教育。穆罕默德·阿里按欧洲的模式，建立了世俗教育制度。开办几十所初级学校、中级学校和专科学校。专科学校有医药、农业、技术和外语等。1828年创办了“布拉格印刷所”和《埃及纪事》报。诠释古籍，修订文法，编纂辞书、字典，出版历史、地理、文学著作。

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阿拉伯文化的繁荣，培养了一批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加强了国家的统一，使埃及成为“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唯一有生命力部分”。但是，他的改革基础是脆弱的。他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的基础，农民依旧受到封建主

1 费丹等于6.3市亩，约4000多平方米。

的剥削，工人也带有农奴制烙印。这就导致改革在欧洲列强干涉下而宣告破产。

（四）列强的干涉和埃及的半殖民地化

穆罕默德·阿里为了地主商人的利益，不断发动对外扩张战争。1811年，他受奥斯曼素丹之命，派军在阿拉伯半岛登陆，镇压日益扩展的瓦哈卜教派运动。经过七年苦战，埃及军队占领了麦加和麦地那，控制了许多阿拉伯部落。

1820~1821年，穆罕默德·阿里又出兵占领了苏丹。苏丹名义上隶属于奥斯曼帝国，实际上却是埃及统治阶级的“私产”。

1824年，奥斯曼素丹无力镇压希腊独立运动，再次要求穆罕默德·阿里援助，许以叙利亚和克里特等地为酬。埃及军队于1822年首先攻占克里特岛，1825年2月在摩里亚半岛南端登陆，接连获胜，几乎占领了全部摩里亚。结果引起列强干涉，1827年10月英、法、俄联合舰队在那瓦利诺重创埃及舰队，埃军被迫撤回国内。

镇压希腊革命虽然败北，穆罕默德·阿里依然要求土耳其素丹践约。素丹予以拒绝，埃及遂于1831年出兵叙利亚，占领耶路撒冷、雅法、大马士革等地，并向小亚细亚推进，进逼君士坦丁堡。这时，沙俄首先出面干涉，派军在小亚登陆，截断了埃及军队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俄军的突然出现，使英法惊惶失措，赶紧出面调解土埃冲突，结果于1833年5月签订了《屈塔希亚协定》，规定埃及撤军，大马士革、阿勒颇、亚克、贝鲁特、的黎波里划归埃及管辖。

法国为了把自己的势力伸入阿拉伯国家，大力支持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建立大阿拉伯帝国的企图，以便利用埃及割断英国同它的东方殖民地的通道，而英国决不允许在通往东方的道路上出现一个强大的埃及阻碍它的扩张。正像帕麦斯顿所说：英国宁愿在通往印度的道路上与土耳其打交道，而不愿同一个积极有为的阿拉伯君主发生关系。英国竭力唆使奥斯曼素丹进攻埃及，以便利用奥斯曼帝国的宗主权，把埃及变成自己的殖民地。

1839年，第二次埃土战争爆发。土军渡过幼发拉底河，向叙利亚推进，打到了阿勒颇。6月初埃及军队反攻，并在尼西布战役中歼灭了土耳其军队的主力。7月4日，土耳其海军投降，埃及军队有一举夺取君士坦丁堡之势。英国眼看自己的殖民利益受到威胁，于1840年7月联合俄、普、奥，签订了干涉埃土冲突的《伦敦条约》，规定埃及军队必须撤出除苏丹、叙利亚南部以外的一切地区，约定用武力“援助”土耳其，以“保护”土耳其的独立和领土安全。9月，英奥联合舰队封锁叙利亚海岸，炮轰贝鲁特等港口，同时，反对埃及统治的人民起义席卷了叙利亚、黎巴嫩和阿拉伯半岛。埃及军队不得不从上述地区撤退。这时曾答应支持埃及的法国临阵退缩。11月，穆罕默德·阿里被迫同英国签订《英埃协定》，埃及承认土耳其宗主权；军队缩减为18,000人；关闭造船厂，接受1838年签订的《英土商约》。该商约规定，允许英国商人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包括埃及）自由贸易，实行低关税制，只对进口商品征收5%的关税，对出口商品征收12%的关税。《英埃协定》标志埃及开始沦为欧洲列强的半殖民地。

根据《英土商约》，埃及取消了国家专卖制，欧洲的廉价商品潮水般地

涌进埃及市场，打击了埃及的近代工业，到 1849 年穆罕默德·阿里去世时，他兴办的工厂多数已经倒闭。由于专卖制的取消，外国商人深入农村收购农副产品，特别是棉花。从 1840 年到 1852 年，埃及棉花的出口额增加了四倍多。埃及逐步变成了专门种植棉花的单一作物的国家。同时，英法资本家纷纷向埃及投资，建工厂，办交通，控制埃及的经济命脉。1851 年，英国取得了修筑亚历山大至开罗的铁路的租让权，1852 年英法联合开办了内河航运公司，1856 年英国开办“埃及银行”，投资 50 万英镑，1857 年法国在亚历山大设立了自来水公司和面粉厂。

对埃及历史有重大影响的是苏伊士运河的开凿。1854 年，法国取得了修建苏伊士运河的租让权，成立了“苏伊士运河公司”。在修建运河的过程中，公司无偿占据开凿运河所需的土地。1859 年春，苏伊士运河正式开工，由于采用最原始的施工方法，埃及人民从事了十年沉重的奴隶劳动，被夺走了 12 万人的生命。沟通欧亚非三洲的这条重要国际航道，是用埃及人民的累累白骨砌成的。但是，1869 年苏伊士运河竣工开航后，埃及却因修建运河而负债累累，国库空虚，日益成为英法资本家的奴役对象。

第三节 阿尔及利亚的抗法斗争

(一) 法国远征阿尔及利亚

从 16 世纪初年起，阿尔及利亚就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1515 ~ 1586 年间，阿尔及利亚由奥斯曼素丹委任的贝勒贝伊统治。1587 年素丹把北非的占领区改为三个摄政国，即的黎波里塔尼亚、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由任期三年的帕夏（总督）治理。1671 ~ 1830 年间，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阿尔及利亚名义上承认奥斯曼素丹的宗主权，实际上由独立的封建君主——德伊统治。从 1689 年起，德伊由近卫军军官推选。德伊由五大臣（如司库大臣、海军大臣、陆军司令、宫廷大臣和收税官）协助治理国家。全国分为四个省，阿尔及尔省是德伊的私人领地；西方省、中央省和东方省由德伊委派贝伊治理。每个省又分为若干区，每区通常包括几个部落，由掌握民政、军事和审判全权的卡伊德管理。卡伊德往往由势力强大的部落酋长充任。

阿尔及利亚摄政国同欧洲一些国家建立了领事和贸易关系。法国在 1564 年设立了领事馆，后来英国也派驻了代表。阿尔及利亚同法国、英国、荷兰、意大利、瑞典、丹麦进行贸易，到 1822 年英国占有全部贸易额的一半。

法国商业资产阶级利用它与阿尔及利亚距离较近的有利条件，设立了商站，获得了珊瑚开采专利权，从 1714 年起，又开始自由地输出粮食。马赛商业资产阶级在出口贸易中占首位，获利甚巨。因此，它在发行的纪念章上，有一个阿非利加神，手持象征丰收的号角，号角里撒出源源不断的谷穗。

法国资产阶级企图征服阿尔及利亚，由来已久。拿破仑为准备征服阿尔及利亚，曾派伊夫·布坦侦察过登陆地点。复辟王朝统治的末期，国内人民反对的声浪日益高涨，它企图以远征阿尔及利亚的有限胜利，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扇击事件”为出兵阿尔及利亚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借口。

法国大革命和督政府时期，阿尔及利亚通过法国商人巴克里和布斯纳克两人供应法国一批谷物。法国商人故意拖延付款，欠了一大笔款。1820 年 7 月，法国剥夺了阿尔及利亚德伊的债权。德伊屡次给法国去函，一直没有得到答复。1827 年 4 月 29 日，侯赛因德伊就此事询问法国领事德瓦尔。德瓦尔用粗暴的语调回答说：“我国政府将不给您信件，这就是说您的请求无效。”侯赛因用大团扇柄敲击德瓦尔的头，以示回敬。法国复辟王朝要求阿尔及利亚德伊赔礼谢罪，并实行海上封锁，积极进行远征的准备。

1830 年 6 月 14 日，陆军大臣布尔蒙率领三万七千多名远征军在西迪费鲁希登陆，阿尔及利亚军立即进行反击。19 日在斯塔乌利埃战役中，阿尔及利亚近卫军被击败，29 日法军开始围攻阿尔及尔皇家城堡，7 月 4 日开始攻城，当晚布尔蒙把一份协定草案送给侯赛因，要他画押投降。5 日德伊投降，法军开进了阿尔及尔城。

在协定中，布尔蒙曾保证：“……各阶层居民的自由、宗教信仰、财产和工商业不得予以任何损害。”但是，侵略者一进城就杀人抢劫。他们洗劫了阿尔及利亚国库，把大量金币和银币，装船运回法国。这些所谓战利品总值 5500 万法郎。

(二) 喀德尔领导的抗法斗争

侵占阿尔及尔只是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开始。从 1830 年到 1832 年，法国殖民者用惨绝人寰的方式征服了米蒂贾和沿海地区。例如，1832 年 4 月 6 日，法军开出阿尔及尔，突然袭击酣睡中的艾尔乌菲亚人。出征归来时，人头挂在长枪的一端，女人的手镯还戴在砍下来的手腕上，耳环还粘着一块一块肉。这些带血污的掳获品卖掉以后，赃款在杀人者之间瓜分了。法军的暴行激起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反抗，他们“把独立视为珍宝、把对外族统治的仇恨置于生命之上”。西起特累姆森，东至君士坦丁堡，抗法斗争到处兴起，其中以阿布德·喀德尔领导的西部人民的斗争规模最大，坚持的时间最长，给法国侵略者的打击最为沉重。

阿布德·喀德尔（1808～1883 年）出生于阿拉伯伊斯兰教修道士家庭。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两次到麦加和麦地那朝圣，对埃及等国的政治和经济进行过考察。他性格坚毅，沉着勇敢。法国入侵后，其父以马斯卡腊为中心，领导西部人民进行反法的“圣战”。1832 年，喀德尔被拥戴为素丹。他组织以农牧民为主的正规军和游击队，运用游击战，打击法国侵略军，迫使法国人坐下来谈判。1834 年，签订了《德米舍尔条约》（因参加签约的德米舍尔将军而得名），宣布“两国人民——上帝命定他们在同一统治下生活——之间”建立持久和平；法国承认喀德尔领有除奥兰城以外的奥兰地区，一切战争物资均可自由交易。

喀德尔为增强抗法力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建设。他把西部阿尔及利亚分成八个行政区，任命与封建主素无瓜葛的人为卡伊德，负责征收捐税，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封建割据势力。他建立军火工场、被服工场，以供应军需。

1834 年 7 月，法国宣布吞并阿尔及利亚，设总督治理。1835 年法国撕毁《德米舍尔条约》，重新挑起战争。6 月，当特雷泽尔率领一支 2500 人的法军纵队，行至哈布拉峡谷时，喀德尔领导 12,000 名骑兵突然袭击法军，将其歼灭三分之一。法军进行反扑，侵占喀德尔的首都马斯卡腊，并烧毁了该城。喀德尔则集中一万大军，把法军围困在塔夫那河，给法军以重创。1837 年 5 月，法国殖民当局被迫再一次同喀德尔谈判，签订了《塔夫那条约》。该条约规定，双方自由通商；法国人和阿拉伯人可以在彼此的领土上定居；法国承认除阿尔及尔、奥兰等城市和东部一些地区外，喀德尔在其余的领土上拥有主权。这个条约是法国殖民者玩弄的缓兵之计。法国企图先集中兵力扑灭东部阿赫默德所领导的抗法斗争，然后再掉转矛头打击喀德尔，以便各个击破。

1837 年 10 月，法军攻占君士坦丁，打败了阿赫默德。为打通阿尔及尔和君士坦丁的通道，把法占区联成一片，法军于 1838 年 10 月 27 日从君士坦丁出发，到达塞蒂夫，穿过铁门，至 1839 年 11 月抵达阿尔及尔。法军的这一行动公开破坏了《塔夫那条约》所划定的边界。喀德尔认识到法国人所说的和平是不算数的，于是宣布“圣战”，出兵收复米蒂贾，逼近阿尔及尔，弄得法国人惊恐不安。

1840 年春，法军发动攻势，3 月 15 日占领滨海地区谢尔谢勒，5 月 17 日占领麦迪亚，6 月 18 日侵入米利亚纳。喀德尔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不争一城一池之得失，而集中力量消灭敌军有生力量。

1840年12月，毕若继任阿尔及利亚总督。此人极为残酷和狡猾。他一到任就宣称：“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必须用剑和犁”。他一改过去法国侵略军的战略，不是动用大兵团作战，而是用小股军队进行扫荡，实行“焦土政策”，破坏农作物、畜群、水源、粮仓、武器工场和军火库。1841年到1842年初，法军相继摧毁和占领了马斯卡腊、赛义达、特累姆森、塞卜杜等。1843年5月16日法军偷袭喀德尔设于塔吉纳井的“流动首都”，抗法部队受到重大损失，被迫退往摩洛哥边境。

摩洛哥是唯一没有臣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北非国家。面对欧洲殖民者的侵略，摩洛哥一方面要积极抵御列强对自己的侵略渗透，另一方面支援喀德尔的抗法斗争，给他以庇护。喀德尔利用这一有利条件，重整队伍，准备再战。法国则向摩洛哥施加压力，要求驱逐喀德尔。1844年8月1日，法国海军炮击摩洛哥的丹吉尔和摩加多尔，法国陆军发动伊利斯河战役，击败了摩洛哥军队。9月签订《丹吉尔条约》，摩洛哥承认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并承诺“不得以任何形式援助法国的敌人”。

喀德尔并未因摩洛哥撤销援助而气馁。1845年阿尔及利亚西部掀起了新的抗法斗争。9月，在杰马加扎韦特附近，喀德尔的部队围歼了一支侵略军，400多名法军，仅仅逃出16人。喀德尔乘胜向东部推进，进入米蒂贾平原。法军立即集中18个机动纵队追击喀德尔。经过两年苦战，喀德尔于1847年战败投降。

尽管喀德尔领导的抗法斗争失败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使法国损失了4万军队；它奠定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爱国主义的英勇传统。此后，抗法斗争彼伏此起，接连不断。1849年在扎贾绿洲，1852年在拉格瓦特，1854年在图古尔特，1859年在西部阿特拉斯山北麓，1864年在乌勒德西迪赛克诸部落都爆发过抗法起义。

（三）法国的殖民统治

法国在其征服的初期，就着手在阿尔及利亚建立殖民统治机构。1834年7月，法国宣布阿尔及利亚为“法国属地”，建立一个直属陆军大臣的总督府。总督集军事指挥权和行政权于一身。1845年，把阿尔及利亚分为阿尔及尔省、奥兰省和君士坦丁省。各省划分成“公民区”和阿拉伯人区。公民区供欧洲人移民，由文官治理。阿拉伯区由军人管理。毕若建立了“阿拉伯局”，主管土著事务，监督酋长的活动，审理案件，规定捐税总额并确保如数征收。他们任命的卡伊德等地方官员的主要任务是征税和强迫居民从事劳役。

法国殖民者在阿尔及利亚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掠夺。在法国侵入之前，阿尔及利亚的土地制度，以伊斯兰教习惯法为依据，分为哈布地产（寺院土地）、伯利克地产（国有土地）、阿尔克地产（部落公有土地）和麦尔克地产（家族占有可以继承的土地）。在阿尔及利亚不存在欧洲那样的土地私有制。1843年，法国宣布接管伯利克地产，把哈布地产并入国有土地。次年又规定哈布地产可以转让。

对于武装反抗法国或一切支持反法运动的人的土地，一概征用。其结果使许多部落的土地被剥夺，殖民者的土地则增加了数十万公顷。集体的土地（阿尔克地产）则被宣布为“空地和无主地”，变成可以买卖的商品。他们在保护穆斯林权利的幌子下，颁布法令，宣布每一个土地所有者，无论是欧

洲人还是阿拉伯人，只要能提出正式凭据，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就可以得到法律保障。根据伊斯兰教习惯拥有土地的阿尔及利亚人是根本拿不出正式凭据来的。于是，麦尔克地产就成了殖民者可以任意夺取的对象。

法国殖民者通过上述种种卑劣手法，强占了大量土地。1850年占有的土地达11.5万公顷，1860年为36.5万公顷，1870年增加到76.5万公顷。这些土地都被法国军官、资本家和垄断公司所攫取。例如1853年成立的日内瓦公司抢占了2万公顷土地，阿尔及利亚公司在1865年获得了10万公顷，1862年到1863年，30多个殖民者占据了16万公顷森林。殖民者在其霸占的土地上，开办种植园，种植葡萄和烟草等经济作物，为法国工业提供大量廉价原料。他们对阿尔及利亚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许多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分成制佃农，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每遇灾年，就有大批阿尔及利亚人死亡，例如1868年至1870年就有50万人丧生。

为了加强统治，推行“同化政策”，法国向阿尔及利亚大批移民。1833年欧洲移民只有7800人，1847年为10.9万人，到1860年已增至20万人。20万人中，有12万法国人，其余为西班牙人、德国人、瑞士人、马耳他人等。大多数移民都从事手工业和做小买卖，只有少数资本家获得了大量土地，成为种植园主和资本家。在1848年革命中，大批革命者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所以，阿尔及利亚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殖民地，无产阶级的流刑场。

第四节 南非人民反抗荷英殖民者的斗争

（一）殖民者入侵前的南非

南非（阿扎尼亚）位于非洲大陆的南端，处于两大洋之间，西面是大西洋，东面是印度洋。在沟通欧亚非三洲的苏伊士运河没有通航之前，洲际航行不得不绕道非洲的南端，因而南非成为东西交通的要冲。

殖民者入侵之前，南非居住着科伊桑人和班图人。科伊桑人分为两支：科伊—科因人（霍屯督人）和桑人（布什曼人）。他们的皮肤淡黄，头发卷曲成绺，语言具有共同的咋喳声。科伊桑人还生活在原始社会阶段。布什曼人以狩猎和采集为生，推一个最能干的猎手为首领。狩猎的主要工具是短弓和毒箭，箭头有石制的和骨制的。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所，只用树枝搭成小棚，或以岩洞作为临时栖息之所。科伊—科因人以游牧为主，饲养牛羊，也打猎和采集。他们住在覆盖着兽皮的圆形小屋里，牲畜被圈在有荆棘的篱笆内。为寻找新的牧场，他们经常迁徙。他们已形成为部落，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土地和酋长。但是，这些部落共同体并不牢固。如果某个氏族不同意部落的决定，可以随时离开。

从 15 世纪起，班图人分三股南迁。最先南下的是恩古里人，他们移居到了纳塔尔和特兰斯凯；苏陀人徙居到了奥兰治、特兰斯瓦和博茨瓦纳；赫勒罗和奥博万人则进到了西南非洲。在南非的班图人，同科伊桑人相比，他们处在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畜牧业依然是主要的部门，但已有较为发达的锄耕农业和家庭手工业。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一块土地，但牲畜仍是财富的基础。他们已经冶炼金属，能用铁制造小锤子、钳子、斧子、小刀、矛和箭头，用铜制造手镯和项饰；用草和芦苇编织席子、筐子和各种家具；用兽皮做成衣服。铁匠颇受尊敬，他不耕种土地，可以用铁制品交换牲畜、粮食和各种家庭日用品。班图各部落都有一个世袭的酋长（或叫“王”），每个部落又分为若干部，由一个小酋长统治，他们都出身于显贵家族。

殖民者的到来，破坏了阿扎尼亚人民的和平生活和社会发展进程。从 15 世纪末年开始，葡萄牙海盗船队，经常在南非沿海靠岸，补充淡水、新鲜蔬菜和肉类。他们凭借手中精良的武器，向科伊—科因人进攻，抢劫他们的牲畜，杀害他们的妻子儿女。科伊—科因人进行了英勇的自卫反击。例如，1510 年在桌湾打死了葡萄牙驻印度总督阿尔梅达和他的 75 名同伙。葡萄牙殖民者一直认为，南非沿岸是不安全的，始终未敢在这里建立殖民据点。

（二）开普殖民地的建立

自从荷兰侵占印尼以后，南非对荷兰的海上和商业霸权日趋重要。仅 1598 年通过好望角的荷兰船只就达 26 艘。1647 年，一艘从印尼回航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桌湾搁浅。六十多名船员在此住了一年多，直到 1649 年才被营救回国。该船船长杨森等人向东印度公司建议，向南非移民，建立永久性殖民据点。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派范·里贝克为司令，带领一百多人的殖民队伍，于 1652 年前往南非。董事会要求他在好望角建立一个要塞；选择“最好和最肥沃的土地”，开办种植园，保证淡水、粮食、蔬菜的供应；同土著居民保持“良好的关系”，为的是进行牲畜贸易，并迫使他们“信奉

改革了的基督教和上帝”。

1652年4月6日，荷兰殖民者在桌湾登陆。范·里贝克立即选择一个有水源的地方，建筑要塞和畜圈、工场，强占一块土地，种植蔬菜和庄稼。由于荷兰殖民者刚到，立脚未稳，需要土著居民供应新鲜食物，于是伪装“友好”，用铜板、铜丝和烟草交换科伊—科因人的牲畜。这种交换，名为贸易，实为骗取。例如，值八便士的念珠，竟能换到一头肥壮的公牛。

1656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同意让它的职员占有土地，开办农场，并授予“自由经营证书”。白人移民逐渐增加，17世纪60年代为394人，1790年增加到14,000多人。他们当中的官吏和军官，乘机侵占阿扎尼亚人民的大片土地，成为奴役南非人民的大地主。这些荷兰移民及其后裔，被称作布尔人。

荷兰殖民者不断扩大侵占土地的范围，遭到了阿扎尼亚人民的不断反抗，科伊—科因人割掉殖民者种植的庄稼，牵走他们放牧的牲畜。1659年，范·里贝克以此为借口，向科伊—科因人宣战，并动员布尔农民组成“民团”，参加作战，残酷镇压科伊—科因人。战争持续了一年多，双方签订协定，划定了边界。

协定的墨迹未干，殖民者就越过边界，侵占新的土地。1672年，开普殖民当局，又用欺骗的手法，从科伊—科因人手里购买了从萨尔达尼亚湾到福尔斯湾以东的大片地区。签订协定时，答应付款1600英镑；协定签订后，殖民者用几种次货充抵现款，货物价格由殖民者“估定”，科伊—科因人实得9镑12先令9便士。科伊—科因人忍无可忍，在萨尔达纳部落酋长果尼马领导下，向殖民者发动反击。他们袭击“谋杀谷”，进攻萨尔达尼亚湾的荷兰畜牧站，杀死了几个布尔人。开普殖民当局，兴师问罪，大举进剿，把一些科伊—科因人部落驱赶到南非内陆地区。

1680年，荷兰殖民者挑唆科伊—科因人的两个部落纳马夸人和格里夸人，自相残杀。打了败仗的格里夸人在荷兰殖民者胁迫下，变成了殖民者的佣工。1713年，殖民者“输入”的天花，使开普地区的科伊—科因人几乎死亡殆尽。

战争、屠杀和瘟疫，这就是荷兰殖民者剿灭科伊—科因人的法宝。居住在沿海地区的科伊—科因人消灭后，殖民者就进攻生活在内地的布什曼人，大批屠杀他们。一个布尔“民团”的头目承认，六年之内他们杀死和俘虏了3200人。1774年歼灭布什曼人的战争达到高潮时，仅一支250人的民团就杀死布什曼人500名，俘虏329名。

荷兰殖民者每发动一次战争，屠杀一批土著居民，就占领一片土地。1775年，他们已抵达菲什河。科伊桑人的许多部落大部被歼灭，死里逃生者不是进入深山老林，就是变成了殖民者的佣工。

西非和东非是猎取和贩卖奴隶的主要区域，而夹在这两大奴隶贸易区之间的南非，不但不输出奴隶，而且是蓄奴区。这是因为荷兰殖民者一开始就侵占大片土地，开办农场，需要劳动力。把科伊桑人变成奴隶的企图，遭到他们的坚决抵抗，收效甚微。从欧洲招募白人劳工，工资高，人数少，限制了白人农场主的利润。因此，输入奴隶的呼声，在白人农场主中高涨起来。1657年输入了第一批奴隶，共12名，来自爪哇和马达加斯加。1658年从安

哥拉输入了两批奴隶，第一批 147 人，第二批 228 人。因安哥拉人在科伊桑人帮助下大批逃亡，于是，殖民者主要从东非和东印度输入奴隶。在输入的奴隶中，一般说来，马来人有较高的文化和技术，多半从事手工业奴隶劳动；黑人和马达加斯加人从事农业奴隶劳动；科伊桑人则当仆人和放牧，处于半奴隶地位。

在南非殖民地社会中，有色人种处于被剥削、被奴役和被歧视的地位。1754 年开普殖民地的总督发布一道命令，凡奴隶打了主人，即使是徒手，不论男女，一律处死。奴隶被捆绑、鞭打、烙印、割耳，则是天经地义。禁止有色人种同白人通婚，有色人种的小孩不能同白人小孩同校学习。

在剥削和压迫有色人种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白人农场奴隶主集团。他们充当各级殖民统治机构的官吏和军官，过着打猎、牛车旅行、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寄生生活。这个残忍腐朽的集团就是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统治集团的先驱。

为了维护白人种族主义统治集团的利益，殖民当局大力宣扬种族优越论。他们把人类种族间生物学上的自然差异，同宗教的邪说揉合在一起，宣传白人优越，黑人低劣。南非殖民主义神学家利用《圣经》中的荒诞故事，编造了一套谎言，说什么非洲人是“哈姆的子孙”，而哈姆是诺亚的次子，天生就该过“劣等人”的生活。在这种种族主义理论指导下，黑人不被看作是“人”，他们生活在世的目的就是受白人奴役；在经济上，他们没有资格拥有财产，田野和厨房是他们命中注定的劳动场所；在政治上，他们不配享有政治权利，不受法律保护，要听凭白人主子的处置。

（三）英国占领开普殖民地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英国与欧洲大陆反动君主政权结盟，对法作战。荷兰执政站在英国一边反对法国，而荷兰的共和主义者则同法国联合，并推翻了荷兰执政，建立了巴塔维亚共和国。1795 年 8 月，英国海军上将埃尔芬斯通，携带荷兰执政奥伦治王子的函件，率领舰队开往南非，占领了开普殖民地，结束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统治。1802 年，根据亚眠和约，开普殖民地归还给法国的同盟国巴塔维亚共和国。1806 年反法战争再起，英国又一次夺取了开普殖民地。打败拿破仑以后，英国将奥伦治王子扶上了荷兰王位，并以 600 万英镑得到了开普殖民地和荷兰在美洲的一些殖民地。

英国占领开普后，实行了一系列“英国化”的政策和措施。英国当局解散了荷兰时期的“国民会议”；宣布英语为官方语言，凡在政府机关供职者，必须懂得英语；按照英国的模式，建立了最高法院和巡回法庭，最高法院法官由英国政府指定。这些措施剥夺了布尔人的一些政治特权。

为了维持行政机构和驻军的开支，英国当局向布尔人征收比荷兰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更高的捐税。1825 年宣布废除荷兰旧币，采用英国货币。这项措施使许多布尔移民倾家荡产，因为值五先令的旧币，往往只能兑换一个半先令。英国政府鼓励英国人向南非移民，分配给他们东南部最好的土地，仅 1820 年，开普殖民地就接纳了 5000 名英国移民。在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一个布尔人找到一块合适的土地，每年向殖民当局交付五英镑“租金”，五年以后“租金”变为土地税，占地者就获得了那块土地的所有权。英国当局废除了这个制度，并规定对新占土地按土质好坏和开垦程度估价，公开拍卖，

出价最高者方能获得。1824年，又规定奥兰治河为北部边界，禁止越界占地定居。

英国当局的政策，造成了同布尔人矛盾的尖锐化。1815年，布尔人掀起暴动，反抗英国殖民当局，遭到残酷镇压，六名暴动的领袖被处死。

在开普殖民地奴隶制存废问题上，英国殖民者同布尔人的矛盾更加尖锐。长期以来，布尔人的经济完全依赖奴隶劳动。布尔农场主竭力扩大和使用奴隶的范围，为此他们就要不断侵占阿扎尼亚人民更多的土地，输入更多的奴隶。然而，英国这时已经成为世界工商业的霸主，资产阶级主张自由贸易，需要把南非变成取得廉价劳动力和原料的场所，为此英国要废除殖民地的奴隶制经济。1833年8月，英国通过决议，废除大英帝国各地的奴隶制，1834年12月起在开普殖民地生效。释放奴隶时，由英国政府补偿布尔农场主。1836年，有39,000名奴隶被释放，估价282.4万英镑，经过七折八扣，布尔农场主实得124.7万英镑。废除奴隶制并没有使有色人种获得真正的解放，他们依旧受到殖民者的压迫和剥削，甚至是超经济的剥削。

废除奴隶制摧毁了布尔农场主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些政治上受压抑，经济上受掣肘的农场主，鼓动布尔人离开英国统治的开普殖民地，向北和东北方向迁移，去开辟他们的“自由”天国。这次大迁移，实质上是英国殖民者和布尔人对班图人进行大规模掠夺和扩张土地的运动。班图各族人民掀起了空前激烈的反殖民主义斗争。

（四）南班图人国家的建立及其对殖民侵略的英勇斗争

在抵抗英布侵略者的斗争中，祖鲁人和科萨人起了重大作用。科萨人是南班图人的一支，居住在大菲什河，与开普殖民地紧紧相邻。祖鲁人散居在今纳塔尔地区，他们由单一农业经济过渡到农牧混合经济以后，农牧业生产得到增长，并带动了矿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和黑人人口的增长，需要突破原有狭小的部落组织结构，在更大范围内组织生产。从18世纪末起，在奥兰治河以北地区掀起了一场部落合并和联合运动。殖民入侵威胁所形成的外部刺激，也促进了国家的形成过程。祖鲁人在恰卡和丁干的领导下，用地域关系代替旧的部落关系，逐渐向国家组织过渡。军队由各部落全体有战斗力的男子（20岁至40岁）按年龄等级组成“同龄兵团”，由联盟的最高首领统帅。军人集中居住，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从而克服了分散状态，提高了组织性和战斗力。祖鲁人改进了传统的战术，用有组织的密集队形代替没有指挥的各自为战，把青年纵队放在两翼，从侧面包抄敌人；取消了各式杂乱武器，代之以短矛和兽皮制造的宽大盾牌。祖鲁人的部落约有三万人，成了南非抗击侵略者中最骁勇善战的一支武装力量。祖鲁王国的建立成了巴苏陀人、斯威士人仿效的榜样，相继建立了巴苏陀王国、斯威士王国。

1835年，布尔人的大车队，开始从开普殖民地向奥兰治河和纳塔尔迁移。头几股移民人数不多，或者死于热带疾病，或者在同班图人的战斗中死亡。1836年另两股移民在奥兰治河和瓦尔人之间的地区汇合，遭到马塔别列人的激烈反抗。韦格科普战役中，马塔别列人战败，数百人被杀。1837年6

另说15,000人。

月，几股布尔移民在温堡建立了自己的国家，选举皮特·雷提夫为总统，波尔吉特为司令。11月，波尔吉特又率领民团进攻马塔别列人，攻占了他们的主要营寨，马塔别列人弃地北上。但是，纳塔尔对布尔人更有吸引力。因为那里土地肥沃，可以占有出海口岸。1838年2月，雷提夫带领一支移民队伍，侵入纳塔尔。雷提夫来到祖鲁人领袖丁干的住处，胁迫丁干让出一块有出海口的土地。在谈判过程中，丁干将雷提夫及其随从全部处死。这一事件发生后，英国人的民团和另外几支布尔人移民赶来围攻丁干。丁干率部击败了英国民团，但在1838年12月16日的因科马河战役中，被荷兰移民打败。丁干下令撤退，布尔人的马队冲出追击，大肆砍杀，血流成河。因科马河从此被叫作血河。丁干失败后，布尔人乘机分裂祖鲁人，支持丁干之弟潘达争夺“王位”，打败效忠丁干的部队。丁干出走，1843年在斯威士兰被害。

潘达被宣布为祖鲁人“国王”后，割让了大片土地给布尔人。布尔人宣布成立共和国。但是，英国当局认为，布尔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不列颠的臣民。1842年英国殖民当局派军攻占纳塔尔。布尔人大部离开纳塔尔，返回奥兰治河。

在奥兰治河和德兰士瓦的布尔移民，分别成立了奥兰治自由邦（1854年）和南非共和国（1852年）。英国殖民当局在布尔人和班图人之间挑起冲突，坐收渔利。它时而以班图人的保护人自居，时而又帮助布尔人的共和国进攻班图人。1867年在英国煽动和支持下，布尔人打败了巴苏陀人，占领了整个巴苏陀兰。但一年以后，英国宣布巴苏陀兰为保护地，1871年合并到开普殖民地。

在布尔人“大迁移”的同时，英国殖民当局还直接向科萨人进攻，扩张领土。早在1811年，英国军队就袭击科萨人，迫使他们退到大菲什河左岸。从1811年到1856年，英国殖民者多次进行讨伐，大批屠杀老百姓，焚毁村庄，掠走畜群。这几次战争的结果，十万多科萨人离开了自己祖祖辈辈生息的土地，四万多人变成了半奴隶性质的农场工人，替英国殖民者当牛做马。

第五节 埃塞俄比亚和马达加斯加的改革

（一）埃塞俄比亚西奥多二世的改革

19世纪中叶，现代化的改革之风也吹进了非洲的文明古国——埃塞俄比亚。当时，埃塞俄比亚正处于“王子纷争年代”，实际上是一个封建割据时代。1800年左右，全国竟同时并存六个皇帝。到了19世纪上半叶，绍阿、冈达尔、提格雷和戈贾姆四个地区的诸侯势力最强，割据一方，互相厮杀。同时，外部威胁也日趋严重。19世纪，在埃塞俄比亚闭关锁国100年之后，英国第一个闯了进来。181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索尔特窜入提格雷两次，他建议利用埃塞俄比亚的混乱局面，占领沿海地区。40年代，在绍阿统治者萨尔·塞拉西的宫廷里，就有法国国王的代表罗歇·德里古和英国政府代表哈里斯在活动，利用分裂局面，混水摸鱼。1843年英国驻马萨瓦的领事同当地统治者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规定对英国商品只抽低额关税，并给予免税在国内销售的权利。

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再一次促使这个文明古国警醒。当时在民间流传一个古老的预言：一个名叫西奥多的皇帝行将诞生，救民于水火，使埃塞俄比亚复兴，卡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卡萨（1818~1868年）出身于冈达尔西部一个破落封建贵族家庭。自幼丧父，靠贩卖一种名叫科索的药材为生。曾被送进塔纳湖附近的一家修道院。后因修道院毁于战乱，遂投奔其叔父坎福侯爵。后来，戈贾姆的大封建主哥舒强行夺去坎福的领地，他被迫成为一伙带有绿林气息的地方武装的首领。由于社会地位比较接近，他了解农牧民的意愿。许多农牧民加入他的队伍。他不断扩充实力、训练军队，靠这支能攻善战的农民军，先后击败了冈达尔、提格雷，又征服了绍阿等地区，基本上统一了全国。1855年，卡萨加冕称帝，他自认身负天命，称西奥多二世，开始进行一系列旨在巩固统一，推动国家进步的改革。

西奥多二世首先采取措施削弱诸侯权力，加强中央集权。他将省区划小，各省由皇帝任命的长官代替昔日割据一方的诸王，他们领取薪俸，不得在管区内私自占有土地和其他财源。

在埃塞俄比亚，教会占有大量土地，权势显赫。西奥多二世为了削弱教会势力，实行国教政策，清除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维护基督教唯一真神教派的正统地位，以巩固国家的统一。1856年，他又对教会土地实行改革，规定每个教堂设两名神甫和三名祭司，分给免税土地，没收教堂的其他土地，分给纳税农民耕种。教堂其他剩余人员或去耕种非特权土地，或者去当兵。

为了发展经济，西奥多二世在即位之初就确定了休养生息的政策；要求人民恢复自己祖辈的行业，商人回店铺，农民去扶犁。他减轻农民的捐税，废除政府官员和军队由当地农民供养的盖巴尔制。他修筑道路，包括从首都马格达拉通往冈达尔、戈贾姆的几条重要公路。他缩减妨碍国内贸易的关卡，废除奴隶贸易，对贩卖奴隶者处以严刑，并将获得自由的奴隶送去学习生产技能。

西奥多二世为了抗击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力图建立一支装备新式武器、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军队。他除了购买欧洲的火器外，更重视引进欧洲的技术和人材，建设自己的近代化军事工业。应邀而来的有法国人、波兰人、

德国人，还有八名英国技术工人于 1866 年到达马萨瓦。他一方面给外国技术人员以优厚的报酬，另一方面让本国人员向他们学习技术，以便将来顶替外国技术人员。在欧洲技术工人的协助下，埃塞俄比亚工人铸造了 12 门青铜大炮，并在一些大炮上镌刻了工整的阿姆阿拉文。

但是，西奥多二世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本国近代工业的努力，终因英国发动侵略而中断，被称为“未遂的产业革命”。

西奥多二世的改革，触动了封建贵族阶级的既得利益，提格雷、戈贾姆和绍阿的封建主从 60 年代起纷纷发动反对中央政权的叛乱。英国政府对西奥多的改革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英国人担任西奥多二世的顾问，答应派遣工匠帮助他发展军火生产；另一方面又暗中支持封建诸侯。这引起了他的警惕和不满。当英国取消早已承诺的军火供应，迟迟不答复他致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件时，西奥多二世扣押并监禁了英国领事卡麦伦，给英国发动武装侵略以借口。

英国决定利用埃塞俄比亚国内封建诸侯的叛乱进行武装干涉。1867 年 10 月，英国政府派内皮尔率领 32,000 人在祖拉港登陆。提格雷、拉斯塔、戈贾姆、绍阿的封建主纷纷倒戈，致使西奥多控制的军队从七八万人减少到一万人左右。1868 年初，英军向内地推进。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西奥多下令焚毁冈达尔，率军撤退到马格达拉。4 月 10 日英军向马格达拉平顶山发动进攻。西奥多拼死抵抗，最后只剩下 16 名将士，他举枪自戕，宁死不屈。埃塞俄比亚人民把他看成是抵抗殖民主义侵略的民族英雄，称之为“马格达拉的雄狮”。

（二）马达加斯加的统一和改革

马达加斯加岛的居民是马尔加什人。主要是由约 5~12 世纪陆续迁入的印度尼西亚人和非洲班图人结合而成。他们共同使用马尔加什语，其中 94% 的基本词汇明显受印度尼西亚语的影响，在马尔加什语的方言中则都含有班图语词汇。

先后移入马达加斯加的各族人民居住在不同地区，组织在村社和部落之中。在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默里纳地区，约在 14 世纪建立了伊默里纳王国。其土地属于国王，固定给村社使用，不得出卖。社会分为三个等级。贵族称为“安德里纳”，拥有大量土地和奴隶，享有免税特权。平民称为“霍瓦”，其中农民附着于土地，手工业者和商人也受到类似的限制和压迫。奴隶称为“安德沃”，处于社会最底层，他们分为三类，一是战俘及其后代；二是因负债、犯法而沦为奴隶的霍瓦及其后代，称“扎扎—霍瓦”，他们可以赎身；三是输入的黑奴及其后代。

到 18 世纪时，在马达加斯加的其他区域也形成了类似伊默里纳的奴隶制国家。如萨卡拉瓦人占领西部平原，建立了默伯纳和博厄尼两个王国，不断向邻居进行掠夺性远征，抢劫财富和奴隶。在中部高原建立了四个伯威列奥人的王国。此外，南端的牧民马哈法利人和安坦罗德伊人，内陆高原的巴拉人则尚处于原始公社阶段。

尽管马达加斯加存在着分裂的王国，但它们的居民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通过联姻、迁徙、战争和交往，为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创造了条件。他们说的是不同方言的马尔加什语，他们的物质生产和风俗习惯近似一致。

农业生产是当地生产的主要部门，种植水稻、小米、山药、芋头、香蕉，使用锄头和耕牛。当地居民的房屋都是四方形的，尖顶，坐北朝南，大门开在西边。男人穿袍子，腰间缠布；妇女穿紧身衣。他们织布、打铁、编筐、制作家具和演戏都相差无几。

由于农产品的剩余和各地手工业的分工，马达加斯加的商品交换和贸易得到了发展，出现了规模不等的集市。长途贩运以牲畜和食盐为主，粮食开始输往马斯克林群岛。由于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出现了大小不一的集镇，马任加已成为一个商业中心，不仅有本国商人，而且有东非大陆和科摩罗群岛来的商人。国内市场的形成，是促进国家统一的一个内在因素。

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是促进马达加斯加统一的外在因素。1500年后，一艘葡萄牙船被风暴吹到马达加斯加岛，这是第一批抵达的欧洲人。1524年，两艘商船上的法国人在该岛登岸，但被击退。1640年左右，400名英国人企图在马达加斯加建立殖民地，后被歼灭。到17世纪中叶，法国企图侵占马达加斯加，作为它向印度洋扩张的基地。1643年，法国东印度公司占领多凡堡，并向塔马塔夫扩张，但在1674年被赶走。1768~1771年，法国再度占领多凡堡，1774年又在安通吉尔湾建立殖民据点，但先后都失败了。在此期间，法国在该岛东岸的费内里夫、多凡堡、佛尔波因特等地掠夺木材、牲畜和奴隶。法国供给当地头人新式武器，用以猎奴。殖民主义侵略的严重威胁，增强了马尔加什人团结御敌的意识。新式武器的输入则提供了实现统一的重要手段。

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英法在印度洋和马达加斯加岛的激烈争夺，在伊默里纳宫廷引起很大反响，安里亚纳姆波印伊默里纳（简称纳姆波印纳）国王（1784~1810年）力促伊默里纳各方停止内战，建都塔那那利佛，完成了统一伊默里纳王国的任务。他去世后继位的拉达马一世（1810~1828年）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国王。他不但完成了全岛的大一统，而且进行了近代化的改革。

首先他着手改革军队，建立一支近代装备的常备军。军费由税收提供。富者要缴纳五分之一的财产税，一般平民要交纳十分之一的所得税。购买欧洲新式装备，聘请英法教官训练军队。依靠这支军队，完成了全岛统一，扩展国界“达到了海边”，改国名为马达加斯加。依靠这支军队从法国人手里夺回了塔马塔夫，1825年收复了多凡堡，实现了不许欧洲人占有土地的诺言。

第二，实行开放政策，让欧洲人进入内地，准许传教士传教。他将传教士看作有技艺有才能的人，充分利用他们的技艺，并通过他们了解欧洲各国情况，熟悉欧洲近代文化。

第三，奖励教育，创办学校，提出大力创办“学校与工场的原则”。1820年，马达加斯加创办了23所学校，在校学生2300名，其中女生为三分之一。拉达马一世还派遣贵族学生到毛里求斯和英国学习。实行文字拉丁化，发展印刷业。一些欧洲人来马达加斯加教授马尔加什人制造肥皂、硫磺、铁器和皮革，传授新的锻工和木工及欧式建筑方法。1826年卡敏斯输入了第一台织布机，发展机器纺织工业。

第四，实行社会改革，废除奴隶制度。当时，马达加斯加不仅盛行奴隶贸易，而且奴隶还占人口的多数。例如，1828年，塔那那利佛有75,000人，其中奴隶占三分之二。为了消除奴隶制度对社会发展的阻碍，拉达马一世同

英国签订了废除奴隶贸易的条约，颁布法令废除奴隶制度。

历史学家沙皮乌在《欧洲对马达加斯加发生影响的九十六年》一书中说：“凡是拉达马认为好的，凡是能促使他的臣民进步的东西，他都整个地予以采纳。”拉达马一世的改革虽然未臻完成，但奠定了马达加斯加近代化的初步基础。在他英年早逝(36岁)以后，拉纳瓦洛纳一世统治时期(1829~1861年)，新官僚集团出身的首相赖尼哈罗继续拉达马一世的改革政策。他加强军队建设，更新装备，建立本国的军火工业。他在法国人拉博德的帮助下，建立了曼塔索阿工业中心。曼塔索阿位于塔那那利佛以东，有木材和矿产资源。上千名工人在这里制造枪枝、火药、军刀，生产玻璃、陶器、石灰、水泥、染料、丝织品和工具。铁矿、金矿、磷酸盐矿的开采也日益扩大。

马达加斯加的改革，也像其他东方国家的改革一样，其目的是“富国强兵”，基本上没有触动封建生产关系。虽然采用欧洲近代化工业生产技术和某些组织形式，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这种嫁接毕竟收效有限。在外国，特别是法国1861年后加紧侵略的情况下，近代化不仅放慢了脚步，最后不得不流产了。

第十六章 第一国际

第一节 第一国际的创立

(一) 第一国际成立的历史背景

1848年革命失败后，接着而来的便是政治反动的年代。在政治反动的年代里，马克思、恩格斯坚信：工人革命运动的高潮还是要到来的，因此他们从事紧张的理论研究工作，以使用革命理论武装无产阶级，准备未来的战斗。

马克思在这个时期大力从事经济理论的研究。当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力图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及不可动摇性。这种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也渗透到工人运动中去。这样就有必要揭露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虚伪性，并且以真正的科学理论武装工人阶级。1859年马克思发表了自己的初步研究成果：《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及货币的性质，并且在序言里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1861年起，马克思开始写《资本论》。

在从事理论工作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他们竭尽全力去保存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在道义上、物质上帮助他们，特别是帮助他们获得理论知识。为了从理论上提高他们，马克思在欧美许多进步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宣传自己的学说。这些工作，为第一国际的创立打下了理论基础，也为它准备了干部。同时，第一国际成立的客观条件也成熟了。这时正是欧洲工业高涨的时期。大工业在各先进国家普遍建立起来，工厂工人人数大增，工业无产阶级成为这些国家强大的阶级力量，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也有显著的提高。各国工人纷纷成立自己的独立组织。1860年在英国出现了工会联合会，熟练工人多半团结在这个组织里。在法国，工人虽然处在普鲁东思想影响下，但是工人觉悟日益提高，1864年法国工人发表了“六十人宣言”，号召工人单独选出自己的代表到立法机关，而不要选资产阶级代表。1863年德意志工人成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这表明德意志工人阶级也初步走上独立的工人运动的道路。在美国，在内战的推动下，从1863年起，工会运动也有了迅速的发展。

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思想加强了。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同时在欧美先进国家发展起来，各国无产阶级有同样的遭遇和命运，这就使得各国工人不约而同地感到他们的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因而迫切希望加强各国工人之间的团结。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发挥的工人阶级国际团结的思想的传播，也有助于工人国际团结思想的发展。60年代资产阶级时常从外国招收廉价劳动力来破坏工人罢工斗争，促使各国工人越来越感到加强国际团结的重要性。

(二) 第一国际成立的经过

1862年夏，伦敦举办世界博览会，有许多国家的工人代表参加，其中有300多名法国工人和12名德国工人，并且接受了英国工会联合会的招待。在接触中，一些国家的工人，特别是英法两国的工人痛切感到各国工人之间建立联系的必要。这便开始了各国工人代表与英国工联领袖之间的联系。

1863年7月22日，英法工人在伦敦联合举办了一个群众大会，抗议沙皇俄国政府镇压波兰起义的野蛮行为，并且支持波兰的独立。这次大会后开始讨论成立国际工人组织的问题。四个月后，英国工会领袖乔治·奥哲尔写了一份告法国工人书，强调成立国际工人组织的重要性，其中说：“法国、意大利、德国、波兰、英国及一切愿意为了人类的幸福而合作的国家的代表集在一起罢！我们开会罢！讨论各国和平所系的大问题罢！……”诚然，在这个文件里所提出的工人要求基本上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如废除专制制度，建立能够“制订保护大多数人的权利而不是少数人特权的法律”的“君子和智者”的政权。关于工人利益，文件也只是提出了反映英国工联主义的要求，比如文件上说：建立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将有助于工人提高工资及阻止雇主破坏罢工。但是这个文件反映了英国工人对无产阶级国际联系的向往及阶级团结的感情，因而具有积极的意义。

1864年5月，法国工人代表托伦起草了《法国工人致英国兄弟》的答辞，同意成立工人的国际组织，在答辞中写道：“我们必须联合起来，给后果严重的制度设置不可克服的障碍，因为这种制度正威胁着要把人类分为两大阶级——愚昧无知的百姓和脑满肠肥的显贵。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得救！”文件的起草人托伦等人虽然处在普鲁东思想影响之下，但是该文件也反映了对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渴望。

接着很快地便在伦敦成立了工人国际组织的筹备委员会，参加筹备委员会的不仅有英国工联领袖，而且也有各国流亡在伦敦的工人及小资产阶级革命者。

当时，马克思正侨寓伦敦，与各国革命流亡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筹备委员会认为马克思作为德意志革命流亡者的代表参加成立大会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决定邀请他出席成立大会。

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教堂召开了成立大会。大会规模宏大，出席者不但有英国工人代表，而且也有寓居伦敦的德国、意大利、波兰、爱尔兰工人代表，以及一些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法国还特意派工人代表团（其中有托伦等）参加大会。马克思出席了大会，并且是主席团成员之一。大会参加者情绪高昂，演说人的话时时被掌声和欢呼声所打断。

大会通过了成立工人国际组织的决议，并且当即选出21人的中央委员会（1866年更名为总委员会），马克思当选为委员。中央委员会在10月初决定采用“国际工人协会”（以下简称为第一国际）作为新的国际组织的名称，并且选出领导人员：主席、总书记、财务委员及各国通信书记，由这些人组成常务委员会。马克思当选为德国通信书记，奥哲尔当选为主席。

中央委员会在10月5日又选出一个九人专门委员会（马克思也当选为委员），由该委员会草拟新组织的纲领性文件。11月1日总委员会通过的《成立宣言》及《临时章程》都是马克思执笔写的。这两个文件都体现了《共产党宣言》的主要思想。《成立宣言》是把科学共产主义原理应用到工人阶级实际斗争中的光辉范例之一。在这个文件里，马克思以英国为例说明：当政治经济统治属于资本家阶级的时候，无论是生产力的发展，抑或国民收入的增加，都不能减轻劳动人民的苦难，而且相反地加深了有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之间的鸿沟。他指出：“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

当时在英国工人罢工时，资本家往往从欧洲大陆招来工人，以代替罢工工人，这就破坏了英国罢工运动。

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他们不仅不会赞助劳动解放的事业，而且恰恰相反，会继续在它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为了达到工人在政治上、经济上解放的目的，马克思特别强调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必要。他写道：工人们“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宣言最后号召各国工人展开斗争去反对那种追求罪恶的目的、玩弄民族偏见、要在掠夺性战争中浪费人民的血及财物的外交政策。

《临时章程》分为两个部分：序言和本文。在序言里指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由工人阶级自己获得”，无产阶级应当通过政治斗争夺取政权。“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在本文部分规定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组织机构：国际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并选举总委员会的成员。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由总委员会负责领导日常工作，并且在各种工人团体之间起联系作用。章程要求国际工人协会必须依靠各地现存的工人组织，而不是使自己与它们对立，必须努力把这些工人组织统一为全国性的组织，把它们统一为联盟或支部，由联盟会议或支部理事会领导。在工人组织被禁止存在的国家里，工人可以以个人资格直接向总委员会提出申请，参加国际。

为了加强第一国际的无产阶级性质，马克思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加入国际，以免他们利用国际组织追求自己的目的。因此，他在章程里规定不许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参加国际。对于各国工人阶级内部的各种派别，马克思在章程里规定：这些派别都可以加入国际。易言之，按照这个规定，英国工联主义者、法国蒲鲁东主义者都可以加入。这样规定是切合实际的，因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在各国工人运动中尚未占支配地位，各国工人尚未摆脱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潮或反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的影响，而这些思潮和学说之产生和流传也是受各国经济政治发展的特点所制约的，如果不许这些流派加入的话，国际就会失去群众的性质。当然，马克思在当时并不是想保存这些流派或与它们妥协，相反地他所采取的策略是：不倦地与所有这些错误的流派学说进行理论上的斗争，以便把它们纳入统一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

这样，第一国际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建立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及策略的基础上，因而马克思就是第一国际的实际创始人。而且，马克思也是第一国际的真正的领导者。国际总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实际上集中在常务委员会手中，马克思一开始就是常务委员会的委员，他在常务委员会里把最有觉悟的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工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且依靠这些人实现对于第一国际的领导。马克思不倦地工作，第一国际的大多数文件出于他的手笔，他还为每一次代表大会准备议案，慎重地挑选议案报告人。在领导国际工作时，他不断地以无产阶级的党性及纪律去教育国际的成员，并且为巩固国际的组织而进行不懈的斗争。

第二节 第一国际的前期（1864～1868年）

（一）为实现国际联合行动而斗争

为了把欧美工人群众团结到第一国际里面来，马克思首先着手与每一个国家的现存的工人组织建立联系。主要由于马克思的努力，各国的国际支部很快建立起来了。

巴黎支部是1864年末及1865年初成立的，其创立者就是蒲鲁东主义者托伦等人。巴黎支部在蒲鲁东主义者领导下，一开始就采取了狭隘的宗派主义立场，不但反对政治斗争，而且还拒绝支持当时在法国发生的许多次罢工。混进巴黎支部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分子利用蒲鲁东主义者反对政治斗争的态度，谴责他们是拿破仑三世独裁政府的支持者，并且企图夺取国际巴黎支部的领导权。1865年3月，在马克思坚持要求下，巴黎支部把资产阶级分子清除出去。马克思也严厉批评巴黎支部不联系工人群众及不支持工人罢工运动的立场。因此，1865年春，为了加强和群众的联系，在巴黎支部理事会下面成立协助委员会，吸收下层工人组织的代表参加，其中有瓦尔兰等人。

至于布朗基主义者，则一开始就被拒绝加入国际组织，因为他们坚持阴谋策略。

为了争取英国工人群众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定期派代表团到伦敦工人中间去，向他们阐明国际的原则，号召他们参加国际。结果，到1865年夏，英国有两个大的工联和几个较小的工人团体参加了国际。到这一年9月下旬，国际已有14,000名英国工人会员。到1867年2月，英国“全国改革同盟”（这是英国工人争取选举法改革的组织）也加入国际。该同盟里面有不少宪章主义者，因而同盟之加入国际，就加强了国际内部的社会主义力量。

不过，成为改良主义者的英国工会领袖竭力阻碍英国工会与国际建立密切联系，而且奥哲尔坚决反对宣布伦敦工会理事会为国际的英国支部。只是在工会会员群众的坚持要求下，伦敦工会理事会才在1867年1月宣布自己准备与国际“合作”，但是后来它仍旧是单独的独立的组织。

马克思力图把德国工人组织吸收到国际中来，特别希望全德工人联合会作为一个组织整个地加入国际。但是他的努力遭到了挫折，原因是：第一，领导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者施韦泽等人强烈地反对加入国际，他们认为这个联合会如果加入国际，就会威胁自己的改良主义纲领。第二，普鲁士早在1850年3月就颁布了一项结社法，禁止任何团体与国外其他组织发生联系。而且德国其他各邦也有类似的禁令。在这个情况下，德国的先进工人只有以个人资格加入国际，他们或者直接与总委员会发生联系，或者通过在瑞士日内瓦的法国流亡者国际支部的中央委员会与总委员会发生联系。德国的国际会员虽然为数不多，但是他们在传播国际思想方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威廉·李卜克内西为了传播国际思想做了大量工作。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派）之建立，是与第一国际的思想影响分不开的。

瑞士是欧洲革命流亡者的集中地。在瑞士的德国和法国流亡者中间很快地就分别成立了两个国际支部。德国流亡者的国际支部设在日内瓦，法国流亡者的国际支部设在汝拉山区。

在比利时，由社会主义者排字工人塞札尔·得·巴布所领导的几个工人协会在1865年夏也成立了第一国际支部。

马克思又通过自己的朋友约·魏德迈在美国报纸上发表了国际的《成立宣言》，并且吸收美国工人参加了国际。

另外，在西班牙、意大利也都先后成立了国际支部。

马克思不但致力于各国支部的建立，而且也努力把各国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联合起来，纳入共同的轨道，支持或参加各国工人罢工斗争和所有的进步运动。

1866年开始的经济危机激起了尖锐的阶级斗争，有力地促进了罢工运动的发展。在罢工运动中，国际总委员会起了积极的作用。

1866年春，当伦敦和爱丁堡的成衣工人举行大罢工时，马克思进行募捐工作，以便支援罢工工人。为了破坏罢工，爱丁堡的企业主从德国招雇了一些成衣工人，企图用他们去代替罢工者。马克思当即给德国各报寄去致德国成衣工人的呼吁书，劝德国工人不要去破坏爱丁堡的工人罢工。总委员会还说服已经被招来的外国工人拒绝充当罢工的破坏者，并且为他们另外安排工作，或者筹措经费遣送他们回国。总委员会所进行的这些工作，对于这次罢工的胜利起了不小的作用，因而第一国际在工人中间的威信大大提高。不仅英国罢工工人，而且大陆上的罢工工人也都越来越经常地呼吁总委员会的支援。

1867年2月巴黎铜工举行罢工。罢工工人的代表通过巴黎国际支部理事会向总委员会呼吁支援。在总委员会的号召下，英国工会慷慨地向法国罢工工人提供贷款及无偿的捐助。

这一年7月，伦敦成衣工人举行新的罢工，罢工人数达7000人，他们要求重新评定工资。总委员会乃号召各国工人予英国罢工者以物质上的援助，响应这个号召的有巴黎、里昂、波尔多、日内瓦以及许多其他城市的国际支部。

在1868~1869年英国罢工运动中，总委员会也大力支援罢工工人。1869年春，总委员会为在1868年11月开始罢工的巴塞尔织带工人发起募捐运动，并且为他们募集了一笔数量相当可观的款项。1869年5月威尔士矿工把专横暴戾的总管赶出了家门。5月20日有两名为首的矿工被逮捕，矿工们企图夺回被捕的同志，这时押送被捕者的军警悍然开枪打死了五名矿工。但是法院在处理这个案件时，竟无理地宣判杀人者无罪，而判处工人中的“骚乱肇事者”十年苦役。国际总委员会坚决站在矿工一边，马克思痛斥了枪杀事件的罪魁祸首，并且无情地揭露了英国“司法”的黑暗。

总委员会也积极地支持了日内瓦罢工运动。1868年春爆发了日内瓦建筑工人大罢工。第一国际日内瓦中央委员会召开了声势浩大的一切支部的共同大会（国际的会员及其他有关者约五千人参加），表示支援这次罢工。罢工的消息传到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等地。总委员会便开始为罢工者募捐。英国捐献者非常踊跃，这就使得总委员会有可能每月向日内瓦中央委员会至少提供4000法郎，其中一部分作为贷款，一部分作为捐助。巴黎寄去1万法郎。由于得到经济上的支援，日内瓦建筑工人的罢工终于取得胜利——资方同意把工作时间缩短一小时至二小时，把工资提高10%。

总委员会也关心各国的民主运动，并且为促使无产阶级参加各种民主运动而努力不懈。

60年代在英国广泛开展了争取选举法改革的斗争。参加这一运动的有无产阶级群众和资产阶级激进阶层，他们的目的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

政治特权。以马克思为首的总委员会不但支持国际会员参加这个运动，而且也积极组织工人参加斗争。马克思认为，按其性质来说，选举法改革运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但是这个运动的胜利将进一步扫清封建残余，为无产阶级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创造有利条件；同时无产阶级在这次运动中可以进一步团结起来，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和政治地位。马克思希望通过这个运动使英国工人阶级摆脱资产阶级（自由党）的政治影响，并且开创独立的工人运动。他也希望在这个运动中把英国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国际这边来，并且用革命精神教育他们，使他们摆脱工联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也为无产阶级确定了在这个运动中所应采取的策略：无产阶级应该在运动中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来行动，决不能充当激进的资产阶级的政治附庸；无产阶级必须提出和坚持自己的独立要求，即普选权及秘密投票制；如果资产阶级激进派公开承认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无产阶级也可以和他们建立同盟。

总委员会和国际会员在英国选举法改革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国际会员的推动下，1865年“全国改革同盟”建立起来，参加建立的有总委员会的代表（主要是英国工会领袖）和资产阶级激进派。于是在全国改革同盟的领导下，一个群众性的改革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了。

民族解放运动也得到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总委员会的极大的关注。首先，波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在总委员会的活动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总委员会参加纪念1830~1831年、1846年和1863~1864年波兰起义的一切活动。1864年11月29日，总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声明：“……波兰独立战争是为欧洲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战争的失败对人类文明和进步事业是一个残酷的打击……波兰有无可争辩的权利要求欧洲先进的人民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帮助它恢复国家主权”。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支持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具有特殊意义，因为这个运动会严重地打击沙皇制度，会加速俄国革命的发展，从而促进欧洲社会革命的胜利。

在1867年1月22日为纪念1863~1864年波兰起义四周年而举行的群众大会（这是总委员会与波兰流亡者共同筹备的）上，许多演说者主张支持为自由而奋斗的波兰人。马克思代表总委员会作了发言，他用锋利的语言痛斥了压迫波兰的各国政府，并且提出一项决议案：“没有波兰的独立，欧洲的自由就不能确立”。由于举行这次大会，波兰流亡者联合会伦敦支部在1867年3月12日向总委员会表示谢意。

其次，以马克思为首的总委员会也很重视爱尔兰的民族解放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批判爱尔兰的芬尼亚派的错误（他们在芬尼亚运动中看到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但是他们还是号召英国工人去支持芬尼亚运动。这是因为他们认为爱尔兰的民族解放会沉重地打击英国统治阶级，从而有利于英国劳动人民的解放。1867年总委员会在马克思的主持下发起和领导了一个运动，抗议判处四名芬尼亚分子死刑。1869年12月，总委员会在马克思的坚持下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英国首相格拉斯顿奴役爱尔兰的政策，并且要求赦免被判罪的爱尔兰革命者。

（二）反对工联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斗争

英国工会是国际总委员会直接依靠的唯一的群众性组织，而且英国工会领袖之一奥哲尔是总委员会的主席。因此，英国工会与第一国际的关系是极

为密切的。但是，英国工会的领导人迷信工联主义，夸大工会的作用而忽略政治斗争，不要求推翻资本主义，而只满足于在这个制度下面保持工人的一定的工资水平。这不能不引起马克思的关切，马克思不能不与这个错误的思想倾向作斗争。

1866年6月，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马克思作了《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批判了英国工会领袖的错误观点。他在报告中一方面承认成立工会组织及进行经济斗争的重要性，指出经济斗争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的学校，对于提高工人生活有现实意义，但是另一方面也指出：不应过分夸大这个斗争的作用。工会不是跟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进行斗争，而是在跟资本主义的结果进行斗争，这种斗争只能是在用止痛剂而无法根绝雇佣劳动制度，因此必须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马克思的理论，对于打击工联主义并以革命思想武装英国工人具有重大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也批判了工联主义者在爱尔兰问题上所采取的沙文主义立场。工联主义者反对支援爱尔兰的民族解放斗争，反对爱尔兰脱离英国的统治而独立。他们甚至把企图用小恩小惠来欺骗爱尔兰人民的英国首相格拉斯顿颂扬为“诚心诚意地”关心爱尔兰人民的慈善家。马克思、恩格斯无情地揭露了工联领袖所歌颂的格拉斯顿的关于爱尔兰问题的纲领的欺骗性，并且指出这个纲领不过是英国统治阶级用来防止革命的避雷针。

但是，对于国际工人运动来说，国际前期的主要危险来自蒲鲁东主义，因为19世纪50~60年代蒲鲁东主义在法国、意大利及西班牙等国广为流传，对西欧的工人运动发生很大的影响。而且，在第一国际建立后，蒲鲁东主义者不仅把持了巴黎支部，拒绝执行国际的正确路线，而且还积极向国际进攻，力图把其错误理论和纲领强加给国际。因此，反对蒲鲁东主义就成为国际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之一。

反映遭受破产威胁的手工业者利益的蒲鲁东主义者提出了一套社会改革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便是企图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找出一个第三种东西。蒲鲁东认为，私有制是违反平等的，共产主义是违反独立的，而他的任务就是寻找一个“平等”和“独立”的合题，这个合题叫作“自由”。蒲鲁东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所谓“自由”的社会。

在社会经济方面，他认为“自由”的社会就是以“个人领有”为基础的“互助制”的社会。他说：互助制是“各个自由力量之间取得均势的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每一个力量只要履行同样的义务，就享有同样的权利，每一个力量都能用劳务来换取相应的劳务”。“互相效劳，互换产品，彼此贷款，互提信用，互相保证，彼此担保，等等——这就是（互助制的）法则。”简言之，蒲鲁东所设想建立的只能是以小生产者为基础的合作社、互助协会等等。显然，这是一个反动的空想的计划。

在政治方面，蒲鲁东所说的“自由”社会就是无政府主义。他极端仇视资产阶级官僚国家机器，并且看出了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阶级局限性。但是他却走到另一极端，得出了反对任何国家组织的结论，他既反对资产阶级国家，也反对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组织。他不但反对国家，而且也反对一切权威，反对一切形式的“统治与服从”。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观点。他主张各地的居民组成“自治集团”，各个集团也可以结成“自由联邦”。

蒲鲁东反对政治斗争，甚至也反对罢工，反对工人成立工会，认为任何

联合都是对于个人的强制。他也反对妇女参加生产，认为妇女只能从事家务劳动。

针对这些错误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毫不调和的斗争。

1866年在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上，在合作社、工会及罢工、妇女劳动等问题上进行了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关于合作社问题，大会的多数代表驳斥了蒲鲁东主义者关于合作制度可以经由和平道路去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论点。大会在《关于合作制》的决议中指出：合作运动只是改造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手段之一，它本身不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社会制度改变的先决条件是国家政权从资产阶级地主手中过渡到无产阶级手中。

在工会及罢工问题上，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也驳倒了蒲鲁东主义者的观点，它指出：“资本代表集中的力量”，工人如果成立工会组织就可以加强工人的团结，以对抗资本家的进攻；而工人举行罢工，可以阻止资本家之加强剥削，因此工会和罢工都是必要的。但是同时决议也警告社会主义者及工人不要夸大罢工斗争的意义，工会也不应该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目的之内，而应该争取千百万被压迫工人大众的解放。

关于妇女参加劳动的问题，大会多数代表证明：妇女劳动的推广是简化了劳动过程的大规模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结果，同时由于资本家坚持压低工资，为了维持最低生活，妇女之参加工厂劳动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争取实现男女同工同酬。大会还承认妇女之卷入工业生产是进步现象：它增强了无产阶级斗争力量，可以使妇女摆脱家庭事务的狭隘圈子。

在1868年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蒲鲁东主义者提出了保存小土地所有制的主张，因此大会便展开了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讨论。早在布鲁塞尔大会以前，马克思曾向总委员会作了一次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在资本主义下面，农民之破产，小农之被资本主义大农吞并的现象都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的观点得到总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及许多工人的拥护。因此在布鲁塞尔大会上大多数代表反对蒲鲁东主义者的主张。大会通过决议，主张金属矿、煤矿、铁路“必须属于整个社会”，土地应“成为公共财产”。

布鲁塞尔大会是马克思主义对于蒲鲁东主义的彻底胜利。因此大会后在蒲鲁东主义者内部发生分裂，在法国及比利时开始出现左派蒲鲁东主义者，其中有法国的瓦尔兰及比利时的得·巴普。他们放弃小私有制的幻想而开始拥护集体所有制。

第三节 第一国际的后期（1868～1876年）

（一）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

蒲鲁东主义者在布鲁塞尔大会上遭到失败后，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就不可能再打着保护私有财产的旗帜去反对马克思主义了。于是他们便改变策略，而开始以“左”的面貌出现，并且在“左”的口号的掩盖下进行活动了。巴枯宁主义者就是如此。

米哈依尔·巴枯宁（1814～1876年）原来是俄国的军官，后来流亡到国外，参加欧洲1848年革命。1849年5月起义失败后，他遭到逮捕并被引渡给沙皇政府。1857年徒刑期满后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从这里他逃到日本，从日本到达北美。后来他又离开北美，逃回欧洲，1864年来到伦敦，然后又到意大利。在1865～1867年侨居意大利期间，他的政治社会观点形成了，成为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

巴枯宁思想中最突出的一点便是主张立刻消灭国家。他说：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能享有资本，因此消灭国家之后资本便会自行消亡。他不仅否定资产阶级国家，而且认为任何形式的国家都是有害的，从而他也反对无产阶级的国家。

巴枯宁不仅否定国家，而且也否定政党的作用，否定政治斗争。他主张举行盲目的暴动，认为只要这个暴动发展为反资本主义国家的总暴动，就可以一举而消灭国家，劳动人民就可以立刻得到解放。巴枯宁把社会上的渣滓看成是依靠力量，认为暴动的参加者应该是流氓、乞丐、盗贼、小偷等等。

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反映了丧失任何得救希望的、已经破产了的小资产阶级的情绪。巴枯宁主义在经济比较落后的西欧国家——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及法国非工业区——影响最大，因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破了产的小生产者极多。而且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又披上了激进的外衣，并且善于使用革命词句，所以更容易欺骗人。

因此，第一国际在60年代末以后必须与巴枯宁主义者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这个斗争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与巴枯宁主义者阴谋破坏第一国际的组织活动作斗争。

巴枯宁于1864年秋在伦敦会晤了马克思。马克思委托巴枯宁在意大利组织第一国际的支部。但是他并没有按照马克思的要求建立国际支部，而是另建立一个阴谋组织——“秘密协会”，并且吸引一些意大利人、法国人、瑞士人和俄国人参加，这些“兄弟”后来成为巴枯宁在国际内部从事破坏活动的工具。

1867年夏，巴枯宁移居瑞士，在这里他参加了资产阶级的和平与自由同盟，并且建议同盟与第一国际“合并”，结果这个建议被布鲁塞尔大会拒绝了。于是巴枯宁便退出这个同盟，在1868年秋创立一个国际性的组织——社会民主同盟，还成立许多地方支部。在同盟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巴枯宁的“秘密协会”的“兄弟”们，他们之间保持了秘密的联系。巴枯宁要求国际总委员会允许这个同盟的整个组织（保持其原来机构及领导机关）加入国际。1868年12月28日，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报告，拒绝这个同盟加入国际，并且指出：“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及外部活动的第二个国际组织的存在，将不可避免地破坏它的组织。”

后来巴枯宁再一次提出申请，这次他表示愿意解散同盟的中央组织，以便使其地方组织加入国际，作为其支部。总委员会接受了这个请求。但是，他欺骗了国际，他表面上宣布同盟中央组织的解散，但事实上却把它保存下来作为国际内部的秘密组织。他指望把自己的秘密组织布满国际内部，在即将召开的巴塞尔大会上取得多数，然后把总委员会抓到自己手中。但是巴枯宁夺取国际领导权的阴谋遭到失败。1869年在巴塞尔大会上选举的结果，总委员会的前任委员继续留任。巴枯宁分子没有一个人被选入总委员会。

在这次失败后，巴枯宁又图谋使个别的支部脱离总委员会的领导。他在日内瓦《平等报》上展开了一个公开的运动，竭力诬蔑马克思和总委员会，德国的拉萨尔派、英国的工联主义领袖都支持巴枯宁。马克思被迫作了答复，他在发给国际的所有的支部的《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委员会》（又称《通告信》）中粉碎了对于总委员会的诬蔑，并且揭露了巴枯宁集团的本质。《通告信》予巴枯宁主义者以严重打击，他们陷入很大的混乱。

与巴枯宁主义斗争的第二个方面便是思想斗争。这个斗争主要是在“继承权”问题上的斗争。如果说对蒲鲁东主义的胜利解决了私有制的存废问题，那末在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中还要进一步解决如何消灭私有制的问题，即消灭私有制的方法和步骤的问题。巴枯宁认为消灭私有制的重要步骤是取消继承权，因为继承权是私有制的一个主要特点，它是以暴力占有自然和社会财富的结果，它促使土地所有权和社会财富转到少数人手中，从而成为多数人的祸患。他认为废除继承权就可以实现土地及其他财产的公有，既不会吓跑小私有者，又可以达到私有财产公有化的目的。

在1869年巴塞尔大会上围绕继承权的废除问题展开了尖锐的争论。会上埃卡留斯代表总委员会宣读了马克思起草《关于继承权的报告》。马克思在这篇报告里指出：继承权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存社会经济制度在法律上的反映，它不是产生私有制的原因；恰恰相反，私有制才是产生继承权的原因。当然，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在继承权方面可以采取一些过渡性的措施，比如征收更多的遗产税，限制遗嘱继承权。但是，无产阶级的伟大目标在于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

大会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辩之后，受巴枯宁分子操纵的继承权问题委员会就决定把总委员会的提案（即马克思为总委员会写的《关于继承权的报告》）和巴枯宁的提案提交大会表决。在表决总委员会的提案时，有19票赞成，37票反对，6票弃权，13票缺席；在表决巴枯宁提案时，有32票赞成，23票反对，13票弃权，7票缺席。然而巴枯宁的提案由于赞成票没有超过总票数（75）的一半，也没有为大会所通过。这样，巴枯宁原来妄想通过继承权问题来篡改国际的宗旨的企图，也就未能实现。

（二）第一国际的解散

1871年3月18日爆发了巴黎无产阶级革命，人类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建立起来了。巴黎公社提高了第一国际的威信，并且扩大了它的影响。因此公社失败后，各国资产阶级便对国际发动了疯狂的进攻。法国政府在1871年6月向欧洲各国政府发出通知，号召共同“讨伐”第一国际；同年法国政府又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凡加入国际者就要处以监禁和罚款，并且剥夺其公民权。德国政府于1871年5月27日以“叛国”罪判处倍倍尔

和李卜克内西两年监禁。荷兰、丹麦、比利时、奥匈、意大利、西班牙、俄国和美国政府也都对国际支部和会员进行迫害。

在这个严重关头，国际内部的各种投机分子也原形毕露。英国工联首领、总委员会委员奥哲尔等人宣布退出总委员会；右派蒲鲁东主义者托伦等人则投到反动政府怀抱中去。总委员会谴责了这些叛徒，并且把他们开除出国际。

巴枯宁分子在巴黎公社问题上也暴露出其凶恶的嘴脸。巴枯宁的追随者竟然谩骂公社领导人里果、费烈等人为“穷凶极恶的人物”。巴枯宁本人诽谤巴黎公社的伟大创举是“犯罪行为，是蠢事”。巴枯宁分子还利用公社失败后国际的不利处境，加剧了分裂国际的阴谋活动。巴枯宁继续保留他的秘密组织社会民主同盟，妄图以此取代国际。他还把瑞士的汝拉联合会拉过去作为反对国际的基地，并且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到处网罗信徒，以图分裂当地的国际支部，成立巴枯宁的宗派组织。这使国际面临完全分裂的危险。

巴枯宁主义者还得到右翼蒲鲁东主义者、工联主义者和拉萨尔主义者的支持，因此情况就更严重了。

在这个情况下，国际的任务便是粉碎巴枯宁主义者的分裂阴谋，并且根据公社失败后的形势和公社的经验重新确定无产阶级的行动方针。在 1871 年 9 月召开的秘密的伦敦代表会议上，通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拟定的“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决议强调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应把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密切结合起来；工人阶级为了实现社会革命，必须“组织成为政党”。在会议上马克思还提出了“城市劳动者利益和农村劳动者利益一致”的口号及工人与农民建立联盟的任务。伦敦会议也讨论了巴枯宁的社会民主同盟的问题，揭露了同盟的分裂活动。

1871 年 11 月 12 日，巴枯宁主义者在瑞士召开了所谓代表大会，到会的仅仅 16 个人。他们在会上通过了一个《告国际工人协会各联合会书》，公开反对国际总委员会的领导，并且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独裁者”。他们要求“支部自治”和“自由联合”。

这样，巴枯宁主义者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国际的活动。如果继续容忍巴枯宁分子留在国际内部，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1872 年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开除巴枯宁主义者。海牙大会还通过了把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往美国的决定。这个决定基于以下几个理由：第一，机会主义在英国工会中愈益得势，总委员会无法继续留在伦敦。第二，欧洲各国反动政府加强迫害国际组织，所以总委员会也不可能迁到欧洲其他国家去。第三，巴枯宁主义在欧洲落后国家（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占优势，如果总委员会继续留在欧洲，其领导权可能遭到巴枯宁分子的篡夺。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在迁到美国后，左尔格当选为书记，但是此后已经无法与欧洲劳动者继续保持联系了，所以事实上几乎停止了工作。1876 年在费城大会上，遵照马克思的指示，宣布解散。

第一国际虽然只存在了 13 年，但是它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第一，国际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下，批判了英国工联主义、德国拉萨尔主义、法国蒲鲁东主义以及巴枯宁主义，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间的传播。第二，它用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思想教育了各国无产阶级，使国际主义深入人心。第三，它培养了大批工人运动的干部，在组织上为各国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奠定了基础。第四，它推动了欧洲各国工人运动

的发展，巴黎公社在某种意义上便是国际的产儿。总而言之，“第一国际（1864～1872年）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第一国际的活动对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立下了伟大的功绩，留下了深远的影响”。¹

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790页。

第十七章 法兰西第二帝国与巴黎公社

第一节 法兰西第二帝国及其覆灭

(一) 第二帝国及其危机

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年）的法国政权是波拿巴式政权，在这个政权下，皇帝拿破仑三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和他的左右手——少数冒险家政客——依靠庞大的军事官僚警察机构实行独裁统治。当时法国虽设有议会，但它只是一种装饰品，它的立法权被限制到最小的限度。虽然实行普选制，但这是骗人的东西，整个选举过程都被操纵在政府手中，以致当选的议会议员绝大多数是皇帝的代理人。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权利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出版自由受到很大限制，人民享受不到任何言论自由。不但劳动人民处于无权地位，而且资产阶级也基本上被排斥于政权机构之外。为了缓和法国无产阶级的不满，拿破仑三世巧妙地玩弄各种政治手腕，向工人施小恩小惠，借以麻痹工人。尽管他剥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但是在经济上却无微不至地照顾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内，他大力保护、鼓励工商业；对外，他使法国参加克里木战争，以便为资产阶级开辟国外市场。总的说来，从第二帝国对内对外政策得到好处的是法国大银行家、大工厂主等大资产阶级。

在帝国政府的保护和鼓励下，法国资本主义有了迅速的发展，工业革命就是在第二帝国时期完成的。在许多企业中，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蒸汽发动机被广泛地使用，它的马力从1852年的21.6万马力增加到1865年的87.8万马力。出现了一些大规模的企业，如斯奈得冶金工厂雇用了一万左右的工人。不过，许多地区还保留中、小型企业及小手工业作坊，甚至巴黎也是如此。

在这些年里，工业技术也取得很大的成就。法国钢铁厂用煤作为燃料，以代替木炭，并且采用了新式钢铁冶炼法。结果，钢铁产量大增，与钢铁有关的工业部门——造船业（当时已用钢铁制的轮船代替木船）蒸蒸日上。铁路铺设长度也迅速增长，从1850年的3083公里增长至1860年的9525公里，国内铁路网基本完成。

在工业发展的基础上，这期间对外贸易额增加二倍，国内商业也日益兴隆，出现了商业史上最早的百货商店，如罗浮商店、奥—邦—马歇商店。

但是，所有这些工业企业、铁路、轮船公司及大商店等等都掌握在大股份公司手中。而这些大股份公司实际上受183家大银行家支配。银行家波列尔兄弟控制了37家股份公司，银行家洛希尔控制了27家公司，马勒控制了22家公司。银行不但控制工业企业，而且还从事高利贷。法国银行大规模向外国放贷，牟取高额利息。银行资本这时已开始法国经济中起主导作用。

恩格斯指出：波拿巴式政权是披着立宪主义外衣的君主专制政权，它是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势均力敌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如俾斯麦统治下的德国、法兰西第一帝国及第二帝国的政权都属于这个类型。见恩格斯：《论住宅问题》，第101～104页，人民出版社，1951。

根据1852年的宪法，立法权分属于三个机构：议会（又称立法团）、元老院及国务院。民选的议会只能对法案投票表决，而提出法案的权力属于国务院（国务院委员由皇帝任命），而修改法律的权力则属于由皇帝任命的元老院。因此，议会的立法权微乎其微。而且，议会也不能公开发表它的议事记录。

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出现的是疯狂的投机活动、商业上的欺诈行为以及对劳动人民的敲骨吸髓。大金融资本家、大工业家不择手段地从国家公债中、从城市建设工程中捞取大量油水。皇室也插手于欺诈性的经济活动而大发横财。这些富人由于发财容易，都尽情享乐，过着荒淫无耻、穷奢极欲的生活。

与富人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大人民。在大资本的压迫下，小资产阶级破产者，日有所闻。大部分农民由于土地过少，又加上受高利贷者及国家的剥削（重税），只能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农村还有近三百万农业工人及短工，他们由于没有土地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力过活。处境最悲惨的莫过于工人阶级。当时法国有 300 多万工人，每天工作 12 小时，甚至更长。货币工资提高了，但是物价及生活费用提高更多，因而实际工资下降了。

不过，在 1860 年以前，拿破仑三世的统治还是比较稳固的。原因有二：第一，法国对外侵略战争的顺利进行（如克里木战争），为法国资产阶级开拓了国外市场；对内实行的鼓励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资产阶级虽然享受不到政治权力，但是在经济上得到满足，因而对于拿破仑政权抱容忍态度。第二，法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在 1848 年 6 月起义失败后遭到严重的摧残，尚未恢复元气。而且，一部分工人在蒲鲁东主义影响下，拒绝参加政治斗争及罢工。因而工人阶级尚未构成对帝国的重大威胁。

但是，1860 年以后，第二帝国的统治开始动摇，到 60 年代末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这是因为不但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加强了，而且资产阶级也起来反对第二帝国。

资产阶级开始反对第二帝国，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首先，1860 年 1 月，拿破仑三世的法国政府与英国签订了新的商约，这个商约体现了自由贸易原则，规定英法双方互相降低从对方进口的商品的关税税率。这个商约显然不利于法国的工业，因为法国工业落后于英国，它只能造成英国商品在法国大量倾销的结果。这激起了资产阶级很大的不满。其次，政府的庞大的财政赤字，也引起资产阶级的不满。法国参加克里木战争、意大利战争及侵略中国的战争，使得法国政府的财政支出大大增加，1853~1860 年的八年间，赤字达到 28.78 亿。此外，拿破仑在意大利反奥战争中背弃加富尔的行为，也引起许多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愤慨。面对资产阶级的反对，善于玩弄手腕的拿破仑三世便实行了让步。早在 1859 年他就对因不同政见而被逐出国外的人颁布大赦。翌年，又给予议会较多的自由，它可以批评政府，可以公开发表议会辩论的内容。出版法也放宽了。这些让步的结果是出现了由共和派、保王派及教士组成的自由联盟，并且争取在 1863 年选举中把 35 个人选进议会。在这个压力面前，拿破仑进一步让步了：他任命一位反教会的历史家维克多·杜鲁伊为教育部长。

但是，这些让步阻止不了资产阶级反对政府的浪潮。这主要与第二帝国的对外战争及外交上的失败有关。首先，60 年代法国远征墨西哥失败了，而且丧失了大量物力人力。其次是拿破仑三世在欧洲大陆上的外交遭到挫折：法国在俾斯麦的请求下，在 1866 年的普奥战争中严守中立，而且事前俾斯麦答应在对奥战争胜利后给予法国领土报酬；但是事后俾斯麦食言了，拿破仑三世不但没有取得领土报酬，而且还坐视德国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完成了初步统一，而德国统一对法国称霸欧洲是一个最大的威胁。对外战争及外交的失败进一步激怒了法国资产阶级，他们对政府的攻击更为大胆、更为激烈。在

这个斗争中出现了所谓第三党，主要是由温和的自由派构成，他们要求选举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及成立向议会负责的内阁。

于是皇帝又让步了，在 1867~1869 年间他使议会享有充分的质询的权利，缓和了书刊检查制度，允许举行公众集会。这些让步使许多资产阶级感到满意，但是却引起不妥协的共和派的更大的反对。共和派要求推翻第二帝国，而建立一个共和国。共和派的领袖有列昂·甘必大和亨利·洛希佛。洛希佛是一位卓越的新闻记者，他在 1868 年创办了一份周报《路灯报》，向皇帝及其政府发出猛烈的攻击。因此该报大受群众欢迎，发行额非常大。同年一个审判案在法国轰动一时，受审判者是一位新闻记者，他的罪名是他为了替一个在 1851 年政变中牺牲的共和主义者(名曰波丹)树立纪念碑而发起募捐运动。为这位新闻记者作辩护的律师就是甘必大。甘必大在法庭上不仅为被告作辩护，而且还发表长篇演说，无情地谴责了第二帝国，指出它的起源就是犯罪，它的行为就是残暴，并且预言它将很快地走向灭亡。他声称：“在 12 月 2 日，在一个觊觎王位者的周围集合了法国从来不认识的人们，这些人既无才能，又无荣誉、无品位、无地位；这些是在任何时候都要组织阴谋的那种类型的人……而就是这些人胆敢声称自己是法兰西的拯救者。”他接着便谴责这些阴谋分子所创建的政府，并且在结尾里发出了如下的震惊全国的言论：“你们这些 17 年来对法国进行绝对统治的人们听着：……你们从来也不敢说：‘让我们和 1789 年、1830 年和 1848 年的人们庆祝他们的胜利的日子一样把 12 月 2 日作为一个庄严的国家纪念日来庆祝’，这就证明了你们在良心上有愧。你们拒绝庆祝的这个纪念日，我们将庆祝它。我们将在每年定期纪念那些在那一天倒下来的人，一直到这个国家重新取得自由之后，以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名义惩办你们的罪行那一天为止。”

这项演说立即使甘必大声名大噪，并且被共和派推选为他们的领袖。他为共和党拟定了纲领，其主要内容是：要求建立一个以普选制为基础的议会共和国，教会与国家分离，教育世俗化及言论、结社的完全自由。

在 1869 年的选举中，有 90 名反对党代表当选为议员，其中包括甘必大和洛希佛二人。面对共和派势力的增长，皇帝又让步了，以 1870 年 4 月 20 日的法令为主的一系列法令剥夺了元老院修改宪法的权力，使得议会享有更多的立法权。

但是对第二帝国构成真正威胁的是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工人阶级到 60 年代不但恢复了元气，而且日益成长壮大。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求进行独立的政治斗争。1864 年巴黎工人发表了“六十人宣言”，宣布工人是一个单独的阶级，应该在议会里有自己的代表。第二，工人的罢工运动有了发展，而且罢工带有鲜明的政治性质。1869 年，巴黎工会统一为“工人联合会”，团结了数十个工人组织。这样一来，罢工就成为有组织、有领导的运动了。第三，在工人中间国际团结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加强了。60 年代初法国工人开始与英国工人建立联系，并且参加了第一国际的创立。到 1870 年春，法国大多数大中城市建立了国际支部，国际会员达二十万人左右，并在巴黎、里昂、卢昂和马赛成立了四个国际支部联合会。第一国际法国支部最初虽然处在蒲鲁东主义者的影响之下，并且是脱离政治斗争及罢工运动的狭隘的团体，但是不久便从蒲鲁东主义者中间分化出左派，而且到 60 年代末期左派蒲鲁东主义者开始领导了第一国际的巴黎组织(其中著名的人物有瓦尔兰和弗兰克尔等人)。左派虽然没有彻底摆脱蒲鲁东主义

的错误，然而他们已经开始认识到政治斗争及工人夺取政权的重要性，拥护罢工，赞成生产手段的集体所有制，在观点上逐步接近马克思主义。他们在行动上组织了大罢工及示威运动；组织工会，使工会与第一国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左派蒲鲁东主义之出现，一则是因为在第一国际的几次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战胜了蒲鲁东主义者；二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拉法格及杜邦对于法国蒲鲁东主义者进行了具体的帮助。在左派领导下的第一国际法国支部在工人中间大力宣传社会主义。1869年创办了《马赛报》，它刊载了许多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政治方面的论文。在文章里讨论了未来革命的任务，未来的革命政府的性质，并且已经称未来的革命政府为“公社”了。在第一国际法国支部的影响下，到60年代末，法国工人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越来越多。当时有一个资产阶级政论家写道：“除饮食之外，还对别的事情感到兴趣的工人，十人中有九人都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是准备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人。”第四，在工人中间关于夺取政权的思想开始流行，这和布朗基主义者的宣传分不开。布朗基主义者认为首要的任务是夺取政权，并且强调采取暴力手段。他们的错误在于相信少数人的密谋，不想依靠工人群众的力量。不过，到60年代末，他们已经开始接近工人群众了。布朗基主义者中最活跃分子有工人出身的杜瓦尔，学生、记者出身的特里顿、里果等人。

1860年以后，资本的集中和积聚加速进行，促成了小规模的手工业企业的破产。1867年的经济危机加速了这个趋势。小资产阶级的不满加深了。新雅各宾派便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情绪。新雅各宾派继承了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的传统，提出了激进的口号，要求打碎第二帝国的官僚警察机器，实行彻底的民主改革。其代表人物有德雷克吕兹，他衷心崇敬罗伯斯庇尔，要求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的共和国，以实现人类的平等。

目睹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增长，皇帝也被迫实行了让步，希图借此缓和人民的不满。1862年，政府允许法国工人代表团参加伦敦世界博览会。1864年取消了关于禁止工人罢工的列·霞伯列法，承认工人有罢工的自由。这样，到60年代末，法国已形成了共和派、新雅各宾派、第一国际法国支部的蒲鲁东主义左派和布朗基派等革命势力，任何一个偶然事件都可能触发一次革命。

（二）普法战争与第二帝国的崩溃

面对国内革命势力的日益增长，拿破仑三世忧心忡忡。在他看来，为了摆脱国内的困境，为了转移国内敌对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的视线，打一场对外战争是一条最好的出路。皇后欧仁妮的话透露了他的动机：“如果没有战争，吾儿将不能当皇帝了。”对外战争的目标是普鲁士，这是因为：第一，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拿破仑三世遭到了外交上的失败，大大损害了自己在法国资产阶级中间的威信。为了缓和资产阶级的反对情绪，他认为有必要通过一次战争打败普鲁士。第二，当时法国资产阶级对德国抱有很大的野心，企图夺取莱茵河左岸的土地，破坏德国的统一，以便扫清法国资产阶级称霸欧洲的障碍。拿破仑三世非常愿意满足资产阶级的这些愿望和要求，以便博得他们的欢心。

实际上，这个措施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当时为组织罢工所必需的集会自由仍付阙如。

与此同时，普鲁士统治集团也有对法作战的迫切要求。在首相俾斯麦的领导下，普鲁士通过 1864 年对丹麦的战争和 1866 年对奥地利的战争，实现了德国的初步统一，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南德四个邦——巴登、巴伐利亚、符腾堡和黑森——仍处于北德联邦之外，德国统一并未完成。南德四个邦之所以没有参加北德联邦，首先是出于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反对。当时法国掌握了重要的战略要地斯特拉斯堡。在这种情况下，南德是不敢加入联邦的。当然，南德置身于联邦之外，也还有其它原因。第一是巴伐利亚及符腾堡的统治集团不愿自己的主权受到限制。第二，南德诸邦的居民中间反对加入北德联邦的也不在少数，资产阶级民主派不信赖俾斯麦，害怕他的军国主义会侵害议会权利。第三，南德诸邦的工业比德意志其他诸邦的工业更为落后，对于国家统一的要求不甚强烈。南德诸邦虽然未参加联邦，但是他们在俾斯麦的劝诱下，与普鲁士订立了秘密的攻守同盟。在北德意志联邦成立后，南德陷于孤立，而且毗邻的法国又虎视眈眈，俾斯麦就是利用这个形势来劝说南德加入攻守同盟的。总之，在当时的形势下，在俾斯麦看来，只有通过一场战争打败法国，才能使得南德诸邦加入联邦，从而实现德国的最后统一。当然，俾斯麦的目的不限于完成统一，他还想通过战争掠夺法国。

从 1868 年起，双方都积极准备战争，并且为了在未来的战争中争取盟国及孤立对方而展开了紧张的外交活动。

拿破仑三世认为丹麦及奥地利都是新近被普鲁士打败的国家，于是便向这两国建议与法国成立同盟，但是丹、奥两国都害怕强大的普鲁士，不敢接受法国的建议。法国皇帝又向意大利王国递送秋波，也遭到拒绝，因为意大利人民对于拿破仑三世在 1859 年背信弃义的行为怒气未消，对于法国军队驻扎在罗马干涉意大利统一，更是愤恨不已。拿破仑的外交活动以失败而告终。

而普鲁士的外交活动却取得很大的成功。普鲁士最害怕在未来的普法战争中腹背受敌，因此它的首要任务便是争取俄国及意大利的中立。意大利很快地就作出守中立的诺言。至于俄国，则普鲁士在 1863 年波兰起义时曾当了俄国镇压起义的帮凶，而且又向俄国保证普鲁士决不干涉俄国废除 1856 年巴黎和约中关于黑海问题的条款（俄国丧失保持黑海舰队和在黑海沿岸建造要塞的权利），因而从俄国政府方面得到关于俄国守中立的保证。

普鲁士不但完成了外交上的准备，而且在军事上也作好了准备。但是，俾斯麦却不愿由普鲁士先放第一枪，他希望由法国首先发动战争，以便在国际上及国内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普鲁士处在被侵略的地位，从而不仅可以在外交上占优势，而且动员军队也有所借口。

恰好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发生了，这就为俾斯麦提供一个机会。1868 年西班牙爆发革命，女王伊莎伯拉被推翻了。在俾斯麦的收买下，临时政府有意将王位送给普鲁士国王的堂兄列奥波德亲王。拿破仑三世立刻出来反对，因为这样一来会使法国遭到两面攻击的危险。但是，俾斯麦和罗恩、毛奇等人力劝列奥波德接受这个王位，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会推动法国首先挑起战争。当时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虽然表面上依从了俾斯麦，但是内心中感到忐忑不安，他劝列奥波德放弃西班牙王位。结果，列奥波德接受了这个劝告，并通知了法国政府。因而俾斯麦的打算一时落空。

但是，拿破仑三世却错误地认为普鲁士的这个让步，是其战争无准备的表现。法国陆军大臣贝夫也很轻视普鲁士的陆军。因此，法皇决定进一步向普鲁士挑衅，以便制造战争。1870 年 7 月，法国政府命令法国大使面见普鲁

士国王，提出了令人难以接受的无理要求：普王应保证此后永远不许列奥波德接受西班牙王位。当时在埃姆斯疗养地的普王以温和的口吻予以拒绝，然后将其与法国大使会见的经过用电报通知俾斯麦，同时指示俾斯麦可以对电报内容作必要的改动，然后予以发表。俾斯麦接到电报后，与罗恩等人商议的结果，便修改了电报的内容，使其带上侮辱法国政府的口吻，以便激怒法国，促其首先宣战。

这份被修改了的电报在报纸上发表出来之后，法国政府人员为之大哗，甚至立法团的大多数代表都感到受辱而要求宣战，他们还一致投票赞成军事拨款。7月14日晚，法皇决定宣战，翌晨法军就接到动员的命令。同日晚，普鲁士政府亦向北德联邦发出动员令。7月16日南德诸邦也动员了。战争终于爆发。

由毛奇拟定的普鲁士作战计划，非常周详、具体，它预见到一切可能遇到的困难，并且拟定了克服困难的办法。法国的铁路运输能力，都调查得一清二楚，普鲁士当局发给德国军团的莱茵河与巴黎之间的地图，比法国参谋本部的地图更为准确。普鲁士为了迅速地把军队运到前线，还修筑了战略铁路。军队装备是最新式的，后勤工作安排得井井有序，对于士兵的生活照顾得也甚为周到，从肩上扛的来福枪到口袋里的手帕都准备好了。按照普鲁士军事计划，应有38.4万的兵力参加对法作战，并且估计法军用在战场上的兵力不超过25万人。它又根据法国铁路网分布情况，估计法军一定集中在麦次及斯特拉斯堡一带。因此，普鲁士决定在开战后，动员第一军团至摩塞尔河流域，第二军团配置在莱茵河，第三军团及后备军配置在中间地带，起衔接作用。毛奇的计划以攻陷巴黎为其目标，直接的企图是粉碎敌方的陆军。

与普鲁士的切合实际的军事计划相比，法国的军事计划则显然带有主观片面性。它的最大弱点便是把法国力量估计过高，而把敌方力量估计过低。拿破仑三世估计法国可以调动40万兵力参战，法军可以在德军集结之前开到前线。他认为普鲁士尚未从1866年的战争创伤中恢复过来，而法军的迅速进攻可以促成北德意志联邦的分裂。这些估计都是错误的。法国的军事部署只着眼于进攻，而未考虑到防御问题。

战争一开始，德国军队一切均按照计划行事，很快地有33万兵力投到战场。而法国方面则是一团糟：士兵找不到军官；大炮没有炮弹，马匹没有马具，运输工具更为不便；军粮供应不足；军官甚至没有必要的地图。

法军通往德国的两个门户是麦次及斯特拉斯堡这两个要塞。集中在麦次的是巴赞元帅的军队，集中在斯特拉斯堡的是麦克马洪元帅的军队，这两支军队都准备入侵德国。但是它们行军迟缓，未等集结到边境，德国军队已经迅速地侵入法国国境。德方第三军团于8月6日在伏尔特与法军发生战斗，法军一败涂地，下阿尔萨斯省落到德军手中。德方第一、第二军团也在8月6日与巴赞部下的法军在斯皮塞伦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德军大胜，结果东部洛林省为德军占领。巴赞的法军从前线退至麦次，德方第一、第二军团跟踵追击，把麦次包围了。麦克马洪军队本想援助麦次，但是被德方第三军团截住，因而不得不折向北方，来到色当（8月30日晚）。色当不久也落到德军的包围之中。9月2日发生一次猛烈的战斗，12万法军遭到惨败，色当为德军攻陷。法军有1.7万人死伤，其余完全被俘，其中有拿破仑三世本人。

这次德军大获全胜，决非偶然。首先这是由于德军在军队编制上的优越性，它采取严格的征兵制，有充足的后备军作为补充力量。法国虽然也采用

征兵制，但是弊病很大，富人只要出钱即可以免除兵役。第二，普鲁士军事部署周密，铁路网发达，军队调动迅速。普鲁士士兵受到长期的严格的军事训练，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相反地，法军训练不足，军官多无战斗经验，只通军事理论。法国人民对这次战争抱旁观态度，士兵也无斗志。第三，普鲁士军事官僚机构效率高，军事计划周密，而且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的。法国官僚警察机构庞大而混乱，行政效率低下，军事准备不足。第四，普鲁士统治集团人材济济，以俾斯麦最为出色。俾斯麦大胆敢为的气魄，灵活而泼辣的手腕，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作风，胸怀全局的胆略以及缜密而周详的心计，再辅以战略家军事家罗恩、毛奇等人的谋略，在克敌制胜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9月4日，色当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这就成为巴黎群众自发的革命行动的导火线。群众在布朗基派的带领下涌到立法团大厅，高呼：“打倒帝国！”“共和国万岁！”的口号，要求废除帝制，建立共和国。立法团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议员当即宣布废除帝制，同时声称：要在市政厅宣布共和制，希望借此把民众调离立法团大厅。这时，布朗基分子也忙于救出被监禁在狱中的同志。利用这个间隙时间，共和派赶忙拟出了临时政府的名单，宣布临时政府的成立。参加政府的不仅有以甘必大为首的共和派，而且还有奥尔良派。天主教教权主义者特洛胥成为政府首脑，共和派的法佛尔担任外交部长，奥尔良派凯拉特利担任巴黎警察总监。工人阶级在组织上还很脆弱，缺乏革命政党的领导，工人领袖多半被囚在第二帝国的监狱中，因此，工人阶级未能阻止资产阶级夺取政权。

第二节 巴黎公社——人类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

(一) 3月18日革命

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巴黎就落到德军的包围中，于是临时政府宣布自己为“国防政府”。为了抗击敌人，巴黎工人要求武装人民，“国防政府”乃被迫成立了200营的国民军。参加国民军的主要是工人、手工业者、小职员及小商人。大多数的大队长由士兵直接选出，布朗基、瓦尔兰等人当选为大队长。国民军豪迈地担负起捍卫首都的责任。

与此同时，巴黎人民在政治上也组织起来了。早在9月5日，巴黎20个区都分别选出本区的监察委员会。20个区的监察委员会又在9月11日共同选出了一个领导机构——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其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保卫巴黎，并且监视政府的行动，以防它与敌人媾和。参加中央委员会的有布朗基派、第一国际会员及新雅各宾派。中央委员会的活动紧紧依靠人民团体——工会联合会、各种人民俱乐部等。中央委员会特别警惕政府的投降活动，要求把战争进行到底，反对谈判和平。

在巴黎人民奋起保卫首都的时候，前线情势越来越危急。9月28日，斯特拉斯堡落入敌军手中。10月27日，困守麦次的巴赞元帅以17.3万人的部队及大量军事物资投降敌人。这两个“门户”之丧失，使得德军长驱直入。为了抗击敌军大举入侵，“国防政府”的共和派领袖甘必大在10月7日乘氢气球飞出巴黎，抵达巴黎以东的图尔城，组织抗战军队。于是全面抗战开始了。

自从9月2日拿破仑三世投降后，德国统一的障碍不复存在，但是德军继续前进，特别是德军到处蹂躏法国人民，烧杀掠劫，无恶不做。因此，对于法国来说，这场战争就从侵略性变为防御性的正义战争。过去对拿破仑三世的战争抱冷淡态度的法国人民，现在都热情洋溢地参加抗战。他们自发地组织游击队，到处打击入侵之敌。

但是当全国及巴黎人民奋不顾身地为保卫祖国而战斗之际，大资产阶级对于抗战却抱另一种态度。他们由于看到人民奋起抗战而感到不安，认为武装的人民，比普鲁士的军队还可怕。特别是巴黎武装人民在抗击敌人的战斗中表现出来的勇敢更使他们怀有戒心。在他们眼中，武装巴黎人民，就意味着武装革命，巴黎战胜德军将是巴黎工人对于资本的胜利。因此，“国防政府”一方面消极抗战，甚至破坏抗战（比如故意组织几次无成功希望的出击，以图削弱巴黎人民的力量），另一方面暗中与敌人谈判投降问题。外交部长法佛尔早在9月19日就与俾斯麦会谈，准备投降。在会谈失败后，“国防政府”又把希望寄托在外国的调停上面，派梯也尔为特使赴英、俄、奥等国，乞求三国政府出面调停。“国防政府”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变成了卖国政府。

此时，处在围城中的巴黎居民的生活日益困难。粮食来源断绝，大商人疯狂地囤积居奇，粮价扶摇直上，面包在市面上绝迹了。群众只能靠吃狗肉、猫肉来维持生命了，有时不得不捕捉老鼠充饥。但是，政府对人民的生活漠

不过，以甘必大为首的少数共和派坚持抗战到底，愿为共和制的祖国而战。

梯也尔是历史学家，曾任七月王朝内阁首相兼外交大臣（1836~1840年）。

不关心，并且纵容奸商的投机行为。

麦次投降的消息传来后，巴黎人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10月31日，他们在二十区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掀起了武装起义。但是由于准备不足，归于失败。在这次起义失败后，中央委员会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在1871年1月6日的公告中，它愤怒地谴责政府，号召人民起来为成立公社而斗争，以使用公社代替资产阶级政府。1月22日，巴黎人民又在中央委员会的率领下举行起义。结果又失败了。不久，中央委员会又与第一国际共同发表了一个宣言，要求“推翻政府的寡头政治和工业贵族”，让工人参加政府。2月23日，第二十区监察委员会也发表宣言，其中写道：“监察委员会的一切成员宣布自己属于社会主义政党。因此他们要求并且千方百计地争取消灭资产阶级特权，推翻作为统治者的资产阶级，让劳动者登上政治舞台。”这样，巴黎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到1871年2月下旬已经有了夺取政权及成立公社的思想准备。

1871年1月28日，法国政府终于可耻地屈膝投降：与德军当局签订战协定，规定法国向德国赔款2亿法郎，巴黎区正规军解除武装（国民军除外），并且由临时政府召集国民大会，以便由它批准普鲁士即将提出的和约。

临时政府立即着手筹备国民大会的选举。在竞选中，德国占领军对选民施加压力，同时资产阶级各个党派向农民进行欺骗性宣传，说什么工人想没收他们的土地等等。因而在选举中，农民大多数投了资产阶级地主候选人的票。结果，选进国民大会的都是大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代表，而且其中保王党人居多数。1871年2月12日，国民大会在波尔多召开，第二天就选梯也尔为政府首脑，“国防政府”解散。

国民大会召开后不久，就实行了对劳动人民不利的措施。2月15日，下令取消国民军所领取的微薄的薪金，这就使得战士的家庭生活恶化。国民大会还否决了巴黎市民自围城以来所拖欠的房租延期交纳的要求。于是，四分之三的居民，包括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都面临被从住房中赶走的危险。

1871年2月21日，梯也尔开始与俾斯麦磋商，26日双方签订了预备和约，其主要内容是：法国向德国赔款50亿法郎，割让阿尔萨斯全省及洛林省的一部分给德国，在赔款付清以前，德军一部分留驻巴黎。3月1日，国民大会批准了这个预备和约（正式和约是1871年5月10日在法兰克福签字）。大资产阶级的这种卖国行径，引起了巴黎工人的极大义愤。

梯也尔政府知道自己的卖国行为一定会引起人民的反抗。为了加强弹压巴黎人民，3月3日梯也尔政府任命第二帝国时期的反动将军帕拉丹为国民军总司令，以便把国民军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后来又任命拿破仑三世的亲信维诺亚为巴黎总督，宣布巴黎处于戒严状态，封闭革命报刊，并且在外省逮捕了布朗基。3月16日又任命第二帝国的宪兵头目瓦伦顿为巴黎警察局长。

针对这个严重形势，巴黎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便是建立一个军事、政治合一的组织，以应付内外敌人的进攻，将革命进行下去。国民军中央委员会正是为了适应这个需要，在3月15日被选举出来。而二十区中央委员会的许多重要成员也参加了国民军中央委员会。于是，国民军中央委员会就代替二十区中央委员会而成为巴黎工人的军事、政治领导中心。被选进国民军中央

在国民大会中，共和派150名，自由派80名，保王党人达400名，波拿巴派分子20名，共650名。

委员会的有布朗基分子、第一国际会员（左派蒲鲁东主义者），其中工人占半数，另一半人是同情工人的知识分子及小职员。因此，工人控制了中央委员会。

巴黎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起来，对于资产阶级说来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而梯也尔政府决定解除国民军的武装。

在停战后，国民军是巴黎的主要武装力量。它的大炮安放在蒙马特尔高地，这些大炮本来是国民军自己出钱购置的，但是梯也尔政府硬说国民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并且在3月17日夜派一支政府军前往夺取。附近的工人群众得到消息后，立刻起来阻止政府军的无理行动。一群妇女甚至以自己的胸膛对着政府军士兵的枪口，而毫无惧色。政府军的士兵深受感动，便放下武器与群众握手言欢。情绪激昂的群众与士兵把政府军的指挥官勒孔特和镇压过六月起义的刽子手、疯狂反对国民军的克列芒·托马逮捕，并且不顾国民军中央委员会的阻拦，把二人枪决在洛杰大街。与此同时，国民军也行动起来，在3月18日黎明以前就占领了陆军部、警察局及市政厅等重要的政府机关。

但是，革命当局没有立即逮捕梯也尔等资产阶级政府首要分子，而让他们带领仅存的正规军的一个师逃离巴黎奔往凡尔赛；也没有解除警察的武装，而是大开城门，任其扬长而去。这显然是一个很大的失策。

在梯也尔政府撤离后，国民军中央委员会就接管了政府机关的各个部门，因而就成为临时政府。这样，革命胜利了，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

当时国民军中央委员会本应该趁逃到凡尔赛去的反革命集团喘息未定的时机立即向凡尔赛进军，一举而歼灭之。但是它没有这样做，而是把宝贵的时间用在公社的选举上面。这无疑是另一个重大失策。但是，也必须看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还不可能在法国取得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更何况德军就在巴黎城下，即使向凡尔赛进军，也未必能达目的；巴黎无产阶级所能够争取做到的则是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起义胜利后不久，同凡尔赛达成一种对全体人民有利的妥协。

这次革命是人类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它之发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一系列事态的发展所促成的。

普法战争的失败及围城时期的痛苦，无产阶级的失业和小资产阶级的破产，资产阶级的卖国行为及其加重人民苦难的措施——这一切便是推动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

但是，这次革命之发生，也有其更为深远的历史背景。一、自从1789年以来，通过暴力的革命行动谋求社会变革及政治变革是法国人民斗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并且形成一个传统。1789年7月14日攻陷巴士底大狱的革命行动、1792年8月10日革命、1793年5月31日~6月2日革命、1795年的芽月和牧月起义、1830年七月革命、1831年和1834年两次里昂工人起义、1848年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都是这样的暴力革命行动。1871年3月18日革命就是继承了这个传统，就是上述一系列暴力革命的继续和发展。二、在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中，作为法国无产阶级前身的“无套裤汉”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参加了历次武装起义，但是结果只是帮助了资产阶级完成推翻封建制度的任务，他们本身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到1830年他们又参加了七月革命，结果也只是帮助金融资产阶级建立七月王朝。三四十年代，法国无产阶级形成了，并且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但

是两次里昂起义都遭到失败的命运。后来到 1848 年，巴黎无产阶级又带着自己的“社会共和国”的幻想参加了二月革命，但是在资产阶级的欺骗下，这个幻想破灭了。紧接着发生的六月起义是“为保存或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战斗”，但也以失败而告终。这样，自从 18 世纪末以来，无论是“无套裤汉”，或是无产阶级本身，争取解放的斗争一一都失败了。因此，1871 年 3 月 18 日革命，在本质上便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巴黎无产阶级为继承先行者的遗志，为自身的解放而掀起的暴力行动。

（二）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无产阶级民主的实验

3 月 18 日革命胜利之后，国民军中央委员会就发布公告，宣布“巴黎人民终于挣脱了别人一直想强加于他们的桎梏”，号召人民立即“准备公社选举，进行投票”，它将把一切权力转交给公社。国民军中央委员会从 3 月 18 日到 28 日的十天中，起了临时政府的作用。国民军中央委员会一方面准备选举，一方面开始着手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在第二帝国时期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庞大的军事官僚机器，是法国大资产阶级统治集团榨取和压迫人民的得心应手的工具。第一，官僚、警察高踞于人民头上，任意欺凌压迫人民，监督人民的一切行动，压抑人民的一切自由，残酷地镇压人民革命运动。第二，维持臃肿庞大的官僚军事机构（官僚有 50 万，军队也有 50 万）的巨额财政支出，是压在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3 月 18 日的革命，“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

国民军中央委员会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中，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消灭常备军。3 月 19 日的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必须“解除军事独裁武装”的意见，3 月 22 日通过的决议规定：凡留在巴黎的士兵一律编入国民自卫军。这些措施实际上消灭了常备军、警察和宪兵。公社成立后，于 3 月 29 日颁布的第一道法令，宣布撤销常备军，而用国民自卫军代替，从而确认了国民军中央委员会的革命实践。随着常备军和旧警察的被消灭，资产阶级压迫人民的物质力量也就被摧毁了；而国民自卫军成了镇压敌人和抵御外来侵略的人民武装。

摧毁旧的官僚机构是中央委员会执行的另一项重要任务。从 3 月 19 日早晨起，中央委员会就派出代表接管了旧政府各部和主要行政机构，如派格列利埃到内务部，艾米尔·埃德到陆军部，瓦尔兰和弗朗索瓦·茹尔德到财政部，格鲁赛到外交部，杜瓦尔到警察局等等。由于旧政府官员的逃亡和怠工，中央委员会一面在 3 月 22 日发出警告：“凡国家机关职员本月 25 日前未能返回履行其日常职务者，将无条件地予以撤职”，一面用新人员来代替旧官员。3 月 23 日，在各区区长的支持下，梯也尔政府的司令赛塞上将，在交易所广场发动叛乱。国民自卫军奉命前往镇压，反革命分子不打自溃，赛塞逃往凡尔赛。国民自卫军随即接管了所有的区政府。首都巴黎的旧官僚机构，从上到下都被摧毁了。

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34 页。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初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第 587 页。

公社成立之后，也打击了作为旧国家机器一个组成部分的天主教会，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取消宗教财

3月26日举行了公社委员会的选举，群众踊跃参加投票。选进公社委员会的一共86人，其中有35名知识分子、25名工人、8名职员、1名手工业者、17名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不久，这些资产阶级代表自动退出了公社，工人或者公社的工人阶级的代表领导着公社，因此公社委员会在本质上是工人阶级政府。3月28日，在市政厅广场，公社正式宣告成立。公社委员会下面设置相当于政府各部的九个委员会——军事、政治、粮食、司法、财政、对外关系、社会服务、教育以及劳动与交换委员会等。此外，还设置了执行委员会，以监督各委员会所颁布的法令的实施。各委员会由五人到八人组成，公社委员兼任各委员会委员。

巴黎无产阶级大胆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民主的实验，这首先表现在它为了使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为了防止公职人员由“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上面。

第一，实行公职人员的民主选举。

在第二帝国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长官都是由皇帝直接或间接任命。议会议员虽然是选举产生，但这不过是形式，实际上皇帝的代理人操纵了选举，使选举成为无意义的东西。

为了使公职人员成为真正的人民公仆，必须实行民主选举，使人民把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人选出来当公职人员。早在3月18日革命前就实行了民主选举。各区监察委员会，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及国民军中央委员会都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在3月18日革命胜利后，领导这次革命的国民军中央委员会很自然地成为最高权力机关。但是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一刻也没有贪恋权势和地位，而是积极筹备选举，以便把权力移交给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公社委员会。他们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在3月19日国民军中央委员会的公告中表现得很清楚。公告写道：“你们曾责成我们组织巴黎的防务，捍卫你们的权利。我们认为这一任务已经完成，……此刻，我们的代表证书已告期满，特此奉还，因为我们无意于谋取刚被群众风暴推翻的那些人的位置。”不久，它又发表文告说：“几天之前，我们是无名之辈，我们仍将以无名之辈的身份回到你们的行列中去。”

公社的选举体现了真正的民主原则。一、选举不受任何限制，是名符其实的普选制。因此，参加选举的人数比已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巴黎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几乎都参加了投票，投票人数达229,167人。二、选举程序简便，有利于劳动人民。选举是分区进行的，各区选出的代表人数，与各区人口成正比例，每两万居民选出一名代表，其余超过一万名者增选一名。这样，人口稠密的工人区，代表人数就增多了。三、实行无记名投票，不许任何人干预选举。

巴黎不但通过民主选举选出公社最高权力机关，而且公社所属单位——工厂企业的负责人、国民军各级领导人、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法官、公证人）也都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但是更多的公职人员是实行任命制，如炮兵总监、铁路总监、医院总监等。公社各委员会所属各单位的负责人也都由各委员会的领导人任命。不过，任命也是走群众路线。先由群众提名，经过集体

产，没收宗教团体的产业归国家所有。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12页。

酝酿讨论，最后才任命。业务性较强的公职人员则实行考核录取的办法。公社的选举、任命及考核都贯彻民主原则。

第二，监督权和罢免权。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所面临的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就是要防止产生官僚集团，防止出现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防止“社会公仆”蜕化为人民的主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公社实行选民对权力机关及公职人员的监督权和罢免权。3月22日，国民军中央委员会在一份公告中写道：公社的“基点在于经常征求大多数人的意见，不断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助”，“委员不断受到舆论的检查、督促和批评，他们是可信赖的、对选民负责的，并且是随时可以撤换的”。后来，公社在《告法国人民书》中重申“通过选举或竞选任命”的“公职人员和公社官吏”，应该是“经常受到监督的、可以更换的”。

为了保证人民真正能够行使监督权，公社还在自己的法令中明文规定要“完全保障人身自由、信仰自由和劳动自由；公民通过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自由保卫自己的利益，来经常参加公社的事业；公社应该保证这些权利，因为公社负有全责监督正确而自由地行使集会权和出版自由，并保证这些权利和自由”。

为了便于群众监督，公社还通过各种形式让人民了解公社的工作。公社将自己作出的决议，有时包括公社会议上讨论的重要问题，及时刊登在《公报》上。公社还要求公社委员及各级领导人向人民报告工作，通过选民大会听取群众意见，答复群众的质询。公社在讨论重大问题时，如有必要，就请有关人员列席会议，并且经常接见群众的代表团，听取批评和建议。马克思很赞赏公社的这些做法，他说：“公社可不像一切旧政府那样自诩决不会犯错误。它把自己的所言所行一律公布出来，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让公众知道。”

各种群众性组织——俱乐部——也起了对公社的监督的作用。这些俱乐部经常向公社提出批评意见。

公社还采取一些措施，吸收群众参加政权机关和企业的管理部门。在工厂里曾设想建立监督委员会，以便让工人实行对企业的管理和监督。参加监督委员会的工人代表有权了解工厂的一切内外业务，审查有关账册簿籍。

公社委员及其他公职人员除了接受群众的监督外，还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要求，随时撤换。失职者或不称职的领导人，公社一旦发觉，或者在人民检举经过查实之后，一般说来是要被撤职的。

总之，选举、监督及随时撤换三者结合的原则，在公社的全部活动中得到了认真的贯彻，这大大有助于使国家工作人员成为社会公仆。

第三，取消高级官员的高薪制。

为了更有效地防止国家机关人员蜕化为人民的主人，公社还采取了一个重大步骤——取消高薪制。在第二帝国时期，高级官员的薪金收入与一般职员、工人的收入相比，简直是天悬地隔。拿破仑三世本人每年领取2500万法郎的皇帝赡养费。一个外交部长的年薪为13万法郎。梯也尔的年薪高达300万法郎。许多高级官吏身兼数职。大臣鲁埃尔的年俸为26万法郎，其中3万法郎是他当元老院议员所得，10万法郎是作为枢密院议员所得，13万法郎是他任国务院参事所得。但是，一个铁路粗工年工资只有540法郎，普通工

人和低级职员的一年工资也只有 800 法郎到 1400 法郎。上下相差何止数十倍！高级官吏的高薪是靠吮吸人民的血汗得来的，而他们所得的高薪又巩固了他们作为国家主人的地位。因此，巴黎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便着手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在 3 月 31 日就讨论了公社委员的薪金问题，在 4 月 1 日公布最高薪金额的法令：“考虑到到目前为止，各公共机关的高级职位由于所得高薪而往往成为钻营的对象，并且按谋职者的后台势力来分配；考虑到在真正的共和国里，既不应该有高薪的闲职，也不应该有过高的薪额；为此决定：……各市政机关职员所得的最高薪金每年为 600 法郎。”

公社在规定最高薪金限额的同时，还提高了低工资，从而缩小了工资差别。以一个电报局为例，调整前最低薪金与最高薪金之比为 1 : 9，调整后为 1 : 3.9。

巴黎公社虽然取消高薪制借以防止国家公职人员由公仆变为主人，但是同时它也实行“使工资和劳动相称”的原则。第一，公社承认公职人员与普通工人在工资收入上的差别。比如公社委员的平均薪金为工人的四倍。这是因为高级负责人的劳动比较复杂，贡献更大。第二，在工人之间，在公职人员之间也实行工资差别。

取消高薪特权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不但可以防止国家机关的官僚化，防止公职人员的蜕化，而且也有助于使糜费国家大量钱财的官僚机构变为节约的廉洁的政府（公社的机构和人员大大精简了，只为原政府的四分之一），是打碎旧国家机器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措施。

公社还取消公职人员的一切特权。公社军事委员阿夫里阿尔说：即使谁当上了 20 次公社委员，也不能享有特权。公社在这方面初步采取了一些措施。4 月 12 日公社的一项公告规定：除军团指挥官及两名参谋有权利骑马外，任何军官自作主张备有坐骑者，均应将马匹立即交还军马补给处。当然，由于公社存在时间甚短，无暇作出更多的规定。

第四，加强法制的措施。

公社委员认识到，为了防止公职人员任意欺压老百姓，为了保障人民的人身自由及其他各种民主权利和自由，加强法制非常必要。在短短的 72 天里，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公社公布了不少法令和决议来加强法制建设。

4 月 7 日，公社执行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反对任意逮捕的决议”，并指示司法委员会要特别重视这个措施，因为它“直接涉及共和国的一个重要原则——自由原则”。4 月 17 日公社又通过决议，规定：如果不符合法庭手续及规定，不准进入私人住宅，不准任意抄家和逮捕人。4 月 18 日，公社又通过了关于逮捕手续的法令，对于逮捕人的手续作了具体而详尽的规定，以保护人身安全。

公社严格按照法律办事。公社治安委员会委员皮洛泰尔被控在逮捕犯人时曾侵吞犯人的钱财，公社查明后，立刻把这个知法犯法的委员撤了职。

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民主不仅表现在上述各种措施上面，而且也渗透在实际生活当中。

第一，公社领导人的人民公仆作风。

在公社委员的选举期间，国民军中央委员会在公告中写道：“只有从你们中间选出来的、与你们同甘共苦的人，才能最好地为你们服务。”“要提防野心家和向上爬的人”，“也要提防言而不行的空谈家”。“总之，要挑选真心实意的人，出身平民，坚定、积极，有正义感，公认为正派的人”。

“你们终能创立真正代表人民的机构，能找到永远不以主子自居的代表。”果然没有辜负国民军中央委员会的期待，人民选举出来的公社委员大多数是正派的人民公仆。

公社领导人之一瓦尔兰是装订工人出身，他通过刻苦自学，达到很高的文化水平。他在任财政委员时，公社面临极大的财政困难，但是他仍能每天保证35万人有饭吃。虽然每天从他手里要经过大宗款项，但是他一尘不染，依然身穿破烂衣服，常常和战士们一道吃饭。他对财政工作一丝不苟，与一切浪费、舞弊现象作斗争，而不怕得罪任何人。一发现有贪污行为者，他严惩不贷。爱德华将军订制了一套价值6000法郎的将军服，瓦尔兰发现后立即在账单上批示：“公社没有钱买这样贵重的衣服”，并且严肃地批评了他，终于制止了这位将军的铺张浪费行为。波兰出身的革命家符卢勃列夫斯基作为前线指挥官，掌握了军事大权。但是他从不享受任何特殊照顾。有一次他的秘书为他找到了一所豪华的别墅，但是遭到他的严词拒绝。他说：“将军的卧室只能在战士中间。”另一位波兰出身的革命家东布罗夫斯基在公社时期担任巴黎防区司令，梯也尔派反动商人韦塞用150万法郎来收买他，这笔钱相当于他的250年的工资收入，但是他一口回绝，表现出贫贱不能移的节操。公社委员匈牙利革命家弗兰克尔一心一意维护人民的利益。他有一句名言：人皆有死，但至少要为正义事业而死。担任公社检察长的里果是一个铁面无私的战士。一天他在审查第二帝国警察局的情报档案时，发现从前救过自己的老同学拉托维是一个秘密间谍，他便立即签署逮捕令，把他押送监狱。

第二，人民群众成了国家主人。

公社期间，巴黎人民充分地认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并且克尽了主人翁的职责。他们不但履行了选民的义务，选出了社会公仆，而且还经常讨论国家大事，向公社提出建议和批评，监督公社的活动，推动它前进。

巴黎群众主要是利用俱乐部这个组织形式进行活动的。在3月18日革命前，巴黎人民就成立了许多俱乐部，革命后俱乐部进一步增加了。在4月中旬到5月下旬，经常活动的俱乐部达40个。

俱乐部的任务是：同那些反对公社权利、反对自由和共和制的敌人作战；保卫人民的权利；使人民受到政治教育，为的是让人民自己能够管理国家事务；支持、批评和监督当选代表。各俱乐部经常讨论当前政治问题、社会经济问题及军事问题。许多公社委员也经常出席各种俱乐部的集会，发表演说。在圣爱斯特什教堂俱乐部发表演说的公社委员有沙姆波、沙尔东、布朗塞等。里果的助手费烈不止一次在圣伯纳教堂俱乐部讲话。

俱乐部是公社事业的有力推动者。许多俱乐部提出建议要求公社采纳，例如在特里尼泽俱乐部，一个女演说者曾提出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要求，她说：“首先应当结束社会灾难，结束靠工人血汗发财致富的企业主对工人的剥削。打倒把工人当作某种生产机器的企业主！让工人们团结到协会之内，让工人们把自己的劳动联合起来，使他们成为幸福的人。”有时，俱乐部也提出过火的、不合理的要求。如5月13日成立的五区圣塞维棱俱乐部要求公社封闭为保卫工作而生产的工厂以外的一切工厂；要求枪毙拒绝拿起武器来保卫共和国的一切公民。公社对俱乐部的合理建议加以采纳，并付诸实施。

巴黎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巴黎无产阶级大胆的首创，无先例可循，因而它

就不可避免地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或错误。

第一，公社政府废除了资产阶级议会制，而实行了立法、行政合一的公社委员会制。其实这种公社委员会制只是适合于战争环境的战时体制，而在正常的情况下，则难以为继。立法、行政合一的最大缺点便是没有实现权力的划分，因而难以收互相监督、互相制约之效，容易造成少数人或个人独裁专制。立法、行政合一，也违反政府分工的原则。一个政权机构既管立法，又兼行政，有无法兼顾之弊。实际上，公社委员每天都要举行例会，对公社进行总的、全面的领导，同时又要分别担任十个委员会的委员，担任各区的全权代表，负责领导各区。这样势必要顾此失彼，不是误了公社的立法工作（经常有三分之一的委员不到会），就是误了行政工作。所以，公社成立后不久即感到决议、法令执行不力，指挥不灵。

第二，巴黎公社只着重加强无产阶级民主的一面，而忽略了对敌专政的一面。在3月18日革命胜利后，一直没有采取过镇压反革命的措施，而听任留在巴黎的反革命分子及从凡尔赛派来的奸细在巴黎大肆活动。他们甚至打进军队和政府内部刺探情报。就是混进军队的敌人密探及身带弹药的破坏分子，在被捕后，也都被赦免了。相反地，凡尔赛方面对待被俘的公社人员，肆行屠杀。杜佛尔将军被俘后不经任何审讯手续即被敌人枪杀。公社也未能封闭反革命报馆。这些都是无法原谅的过失。

但是，不管怎样，巴黎公社所实行的无产阶级民主究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三）公社的社会经济及文化教育措施

巴黎公社不但在政治上创造了无产阶级民主，而且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领域内也实行了许多旨在改善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状况的措施。公社领导人虽然没有提出完整的改革纲领，但是他们在许多文告中多次表明了实现劳动解放和反对剥削的决心和意图。4月5日，国民军中央委员会在告人民书中写道：“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这是寄生与劳动、剥削与生产之间的搏斗”，并且要求“一切从事劳动和真心实意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人”团结起来共同努力。4月19日，公社在一份告人民书中写道：公社革命意味着“使无产阶级受奴役、给祖国带来不幸和灾难的军阀统治、官僚体制、剥削、投机、垄断和特权的寿终正寝”。

公社的社会经济措施，一般说来都是针对实际问题，并且根据群众的要求而实行的。

4月20日，公社颁布关于禁止面包房夜工制的法令，开工不得早于清晨5时。这是面包工全体联合会要求的结果。面包工人已经为此斗争了两年以上。现在这个要求终于在工人自己的政权下实现了，因此工人莫不为之欢欣鼓舞。5月15日，面包工人举行隆重集会，热烈庆祝这次胜利。有1500~2000人参加，会后工人们手执红旗奏乐向市政厅进发。红旗上绣着口号：“1871年的社会的共和国！”“白昼劳动万岁！”“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

4月27日，公社颁布法令，禁止私人的和社会的企业当局对工人、职员进行罚款及克扣他们的工资，并且申明：破坏这项法令者，将由法院严加追究。它还规定：本年3月18日以后以惩罚为名而课的罚金及克扣的工资，必须在本法令颁布后两个星期内发还给受害人。

在5月12日公社委员会会议上,劳动与交换委员会负责人弗兰克尔就对公社军需科与私人包工头之间所订的缝制军服的合同调查结果,作了报告。原来,从4月25日起,与公社政府订立合同的裁缝包工头,降低了工人一半的工资和制服的质量。因此,弗兰克尔在报告中建议公社直接与裁缝工人合作社订立合同,他说:“我们不应当忘记:3月18日革命完全是由工人阶级完成的。而且,我们是选择社会平等为自己的原则的。假如我们不为这个阶级谋利益的话,那末我们就看不到公社的存在有何意义。”会议讨论的结果,通过了一项法令,翌日公布。该法令委托劳动与交换委员会修改一切早先所订立的合同,并且命令以后直接与工人合作社订立合同。它还规定:“包工条件及价格由军需科、合作社的工团及劳动与交换委员会的代表团决定。”这个法令虽然是工人的重大成就,但是它是在公社失败前不久颁行的,所以收效甚微。

3月29日,公社颁发了免交房租的命令。在巴黎被围期间,交易中断,生产停顿,中下层人民的生活陷于极端贫困境地。但围困解除后,房主立即催交房租,这就造成了千家万户的困难,只有那些在围城时发国难财的商人及富翁有力量交纳房租。命令规定在围城期间收入来源断绝或收入减少的房户可以免缴1870年第四季度及1871年第一、第二季度的房租,而在围城期间收入正常的公民可以照旧交纳房租,但是必须把房租交到市经费保管所。这个措施显然有利于中下层人民。

5月6日又发布典当物归还原主的法令,要求在1871年4月25日以前典押,而且价格不超过20法郎的动产(家具、衣服、衬衣、被褥及劳动工具),从5月12日起无偿退还给原主。

4月20日,公社成立了工人工作介绍所,由巴黎20区的区长负责。

为了改善工人住宿条件,4月25日公社下令没收逃亡富人的住宅,供无家可归的工人居住。

另外,早在3月20日国民军中央委员会就下令把期票的支付延期至1871年10月1日;4月18日,公社又命令所有的债务均延期三年偿还。

以上各种措施虽然是民主主义性质的改革,但是这样有利于劳动人民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改革,只有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才有可能实现。

公社在社会经济领域内所实行的最有意义的改革措施,便是在4月16日颁布的关于把从巴黎逃亡的工厂主所抛弃下来的工业企业转交工人生产合作社的法令。法令责成工团成立“调查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负责完成如下工作:一、统计被遗弃的工厂数目,精确记载这些企业的现状,登记其中的工具;二、提交关于立刻使这些工厂复工的实际办法的报告;三、草拟这些工人合作社的章程草案;四、成立仲裁法院,以便在企业主归来时规定最后把工厂转让给工人合作社的条件及工人合作社向厂主所交付的报酬数量。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法令是在公社委员会全体与会者无一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通过的。

这个法令的实质内容便是用赎买方式把一部分工厂从私人所有转变为集体所有,从而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性质。因此,这个法令在劳动者中间引起了很大的兴奋,工人们热烈地参加这个工作。金属工人走在前头,机器工人工团及冶金工人工团在4月23日召开了金属工人大会,大会决定派两名代表参加调查委员会。大会在发给两名代表的训令中要求他们务期做到:“消灭人剥削人这个奴隶制度的最后形式。”裁缝工人工团向全体工人发出呼吁书,

号召他们赶快着手建立调查委员会。呼吁书写道：“任何时候，任何一个政府也没有授予工人阶级以更好的机会。放弃利用这个机会，意味着对于劳动解放的背叛。”

在法令颁布后一个月内，巴黎工人从事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可惜公社存在时间甚短，这个法令未能见诸实行。

罗浮尔军械厂的体制改革，也带有向社会主义改革迈进的趋向。5月3日，罗浮尔军械厂的工人根据公社的指示，讨论、制定了该厂管理章程，确定了该厂的管理体制。章程首先确定了工人参加管理工厂的原则。这个原则充分体现了工人群众当家作主的精神。它规定：上至工厂代表，下至工长均由工人大会直接选出，成立有工人代表参加的工厂管理委员会，由它来监督厂内各项工作。章程还规定了明确的工作责任制和严格的劳动纪律，确立了既不同于高薪制，又不是绝对平均主义的工资标准。这个章程得到了公社的批准。

上述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法令，一般地都是左派蒲鲁东主义者在公社委员会上提出来的。4月16日法令的提议者就是机械工人出身的左派蒲鲁东主义者阿夫里阿尔。罗浮尔军械厂的章程也得到当时兼任炮兵器材局局长的阿夫里阿尔的支持。

公社之所以能在社会经济方面进行一些有利于工人和劳动人民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劳动与交换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就是与马克思接近的左派蒲鲁东主义者弗兰克尔。弗兰克尔在这次革命中很想有一番作为，为劳动人民谋一些福利。他在1871年3月20日给马克思的信里写道：“如果我们能对社会关系进行根本的改造，3月18日就会成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有成效的变革”。他在信里还请求马克思帮助，请他提供关于社会改革的意见。弗兰克尔也很注意联系工人群众。早在4月初他就专门成立了一个“倡议委员会”，附属于劳动与交换委员会，其成员来自工人协会联合会、二十区中央委员会、第一国际巴黎联合会以及工业、科学团体等组织。倡议委员会搜集了许多工人群众的意见，经过讨论研究后向公社提出建议，也帮助草拟过几项关于社会经济的法令。该委员会还协助贯彻公社所颁布的法令。

弗兰克尔曾研究了对市场的监督问题，也研究了工资问题。他还和阿夫里阿尔一道参与了罗浮尔军械厂的章程（特别是有关劳动时间和工资）的制定。弗兰克尔提出了八小时工作制。

公社所实行的这些社会经济措施，使广大劳动人民初次尝到社会经济解放的滋味，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在保卫巴黎的战斗中，巴黎人民奋不顾身地英勇战斗的原因之一。

然而在社会经济措施方面，公社也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未能没收作为法国的主要金融杠杆的法兰西银行。公社容忍这个银行继续掌握在与凡尔赛有密切联系的旧管理局手中。因之，这不但是一个经济上的错误，而且也是政治上的错误。恩格斯认为假若公社掌握了这个银行，“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由于公社没有接管法兰西银行，该银行才得以向凡尔赛汇去25,700万法郎，从而加强了反革命力量。

公社的这个错误，蒲鲁东主义者不能辞其咎。当时公社派去监督法兰西

银行的贝雷就是蒲鲁东主义者。贝雷的见解是：如果夺取银行，“则将是对于凡尔赛政府、公社、整个国家、法国信用事业和全体商业界的严重打击”。他这话反映了蒲鲁东的观点，因为后者认为决定社会经济生活的不是生产，而是交换。布朗基主义者阿木鲁曾提议占领法兰西银行，他说：“必须用武力去占领银行，因为银行站在反动的、和我们明显敌对的立场上，……正因为它不情愿服从我们的支配，我们更要占领它、管理它。”5月12日，在布朗基主义者的倡议下，经公社治安委员会的同意，国民军第二十区的工人营包围了银行。但是由于公社驻银行代表贝雷的多方阻挠，终于没有占领它。

公社对学校教育十分重视，并且在文化教育领域内进行了巨大的改造工作。

公社教育委员会的负责人是博学多才的学者、国际会员布朗基主义者瓦扬。参加教育委员会的还有著名艺术家库尔贝和政论家、诗人让·巴·克雷芒。

用世俗教育全面代替宗教教育，是公社改革学校教育的最重要的步骤。

天主教会是第二帝国的重要支柱之一，它的势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并且全面控制了教育部门。各级学校，不但办学者是教士，而且许多教师也由教士充任，他们向学生灌输宗教迷信思想。

4月28日，瓦扬签署了一项命令，要求巴黎各区“把宗教教育加速改造成为世俗教育”作为一个紧急任务，并责成“教育组织委员会”具体领导进行这项工作。于是学校中的教士被清洗了，世俗教师代替了教士教师，学校中的宗教仪式及宗教偶像也被取消了。

在教育方面的另一个改革措施，便是提高教师的地位，提高他们的物质待遇。

在3月18日革命前，法国教师处在政治上无权的地位。教师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帝国政府，充当波拿巴主义的宣传者，稍有不满意，就会随时被辞退。教师薪金很低，男教师的年薪一般为700~850法郎，男助理教师年薪为400~450法郎。女教师待遇更低，绝大多数女教师的年薪只有550法郎，而女助理教师只有350~400法郎。因此，教师的生活得不到保障。

在公社期间，教师地位提高了。公社政府要求学生：“听教师的话，听从教师的教导，尊敬他们，因为他们把你们培养成对人对己更加有用的人，是应该受到尊敬的。”公社政府大大提高了教师的薪金。公社的一项法令指出：“鉴于3月18日革命前教师的薪金低到可笑的程度”，公社决定：助理教师最低年薪定为1500法郎，教师最低年薪定为2000法郎。法令强调男女平等，女教师与男教师薪金待遇完全相同。

公社的教育政策，大大激发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许多教师工作积极主动，各级学校出现欣欣向荣的气象。还有一些教师投身于政治斗争，成为公社活动家。如公社杰出的女英雄路易丝·米歇尔原来是蒙马特尔区小学教师。由于教师都站在公社一边同凡尔赛作斗争，在公社失败后，他们受到凡尔赛政府的迫害。据统计，有106名教师受到军事法庭判决。

公社改革教育的另一个内容，便是普及初级教育。瓦扬在一个文件里写道：为了“使公社的革命能用教育改革来确定它的真实的社会主义性质，保证每个人得到社会平等的真正基础”，就要让“每个人都有权利享受普通教育”。为了使劳动人民子女能够入学，公社实行免费教育。入学的儿童不但免缴学费，而且还可以免费领到学习用品。

公社也兴办职业教育，以培养各式各样的职业人材。

公社奖励文化艺术。它邀请先进的艺术家、建筑家参加公社成立的艺术委员会。领导该委员会的是库尔贝。公社关心艺术普及，为中国人民开放图书馆和博物馆。

公社所实行的无产阶级民主和各种有利于劳动人民的社会经济及文化教育措施，在短时间内就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巴黎在第二帝国时代是一个藏垢纳污的罪恶之渊藪，盗窃、凶杀事件屡见不鲜。但是在公社时期，这些罪恶都绝迹了。据拉法格记载，自从3月18日以来，“就没有听说过发生偷窃和暗杀的事”。

（四）公社内部的派别斗争

公社委员会内有三分之一的委员是蒲鲁东主义者，再加上一部分独立革命派，成为公社委员会里面的少数派。其余的三分之二是多数派。多数派是由布朗基派、新雅各宾派及独立革命派中的另一些人构成的。从公社成立的第一天起，多数派与少数派就发生分歧，到1871年4月底和5月初，两派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终于酿成5月中旬的危机。

多数派虽然大多数出身于知识分子阶层，其中有大学生、新闻记者、政论家等，但是他们一般都是坚定的革命者。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在第二帝国时期由于从事革命活动而一再系身于囹圄。9月4日革命以后，在为建立公社而进行的斗争中，他们发挥了卓越的作用。3月24日被国民军中央委员会任命为负责指挥军事的三将军——埃德、勃吕涅尔、杜瓦尔——都是多数派。4月2日，凡尔赛军队向巴黎城外工事首次进犯时，率领公社战士奋起迎战、英勇牺牲的就是杜瓦尔与另一位布朗基主义者弗路朗斯。公社期间在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凡尔赛间谍进行的斗争中表现得最为坚定的里果及费烈，也都属于布朗基派。新雅各宾派的优秀代表德雷克吕兹是公社委员中威望最高的几个人之一。他虽然是文职人员，但是在5月中旬战局危急的时刻被选为军事代表，这充分说明公社对他的信任。他担任这个职务一直到牺牲在街垒上。可见多数派对公社事业是有贡献的。

但是，多数派在社会经济方面没什么建树，布朗基派及新雅各宾派都是如此。布朗基主义者素来就没有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也没有关于社会改造的明确的方案。多数派在军事上也犯了错误，如木兰—萨格多面堡之失守，就是多数派中的皮阿任社会拯救委员会成员时擅自干预军事、滥发命令的结果。而且事后他还百般抵赖，不肯承认错误。最后别人拿出物证（他签署的调令），他才无话可说。

少数派中的蒲鲁东主义者中间大多数是左派蒲鲁东主义者。他们多半是著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为工人的利益而斗争的战士。而且他们大多数是国际的会员。

如前所述，公社的各种社会经济改革措施，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左派蒲鲁东主义者的努力。而且还应该看到：正统的蒲鲁东主义者中间也有人在这方面作出贡献。如金属雕刻工人出身的泰斯，作为公社驻邮政局的代表，在整顿邮政局使之成为模范的机关方面，是劳绩卓著的。而泰斯就是正统的

蒲鲁东主义者。

但是，少数派中确有人受蒲鲁东主义的影响较深，执拗地奉行蒲鲁东的原则，对资产阶级财产权表现了不敢触动的敬畏心情，在处理法兰西银行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给公社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这样，两派各有功过，不分轩轻。而且，两派在斗争中，也各有是非。

多数派和少数派主要在两大问题上发生分歧，斗争就从这些分歧而来。

第一，两派一开始就在对于公社政权性质的理解上，有严重分歧。在布朗基主义者、新雅各宾派以及独立革命派中的一部分人看来，巴黎公社是全国性质的政权机构，不能与凡尔赛政府和平共处，所以公社应该作好随时投入与凡尔赛作战的准备。布朗基主义者不同意把起义后的巴黎置于与法国其他地方公社同等的地位。这个观点在国民军中央委员会执政时期表现得尤其明显。3月22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载文道：“巴黎负有职责，以使得人民的自由得到尊重，并要求人民的权利不受侵犯。巴黎既不会和外省分离，也不允许别人把外省从它身边夺走。巴黎从前是，现在仍然是，今后永远都应该是法国的首都，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头脑和心脏。”多数派坚持主张起义后的巴黎应该在统一的法国居首都地位，巴黎公社应该是法国中央政府。

蒲鲁东主义者和独立革命派中的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公社仅仅是巴黎的市政府，它的地位同法国其他城市是平等的，巴黎不能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而去指挥全国，只能采取“自治与联合”的原则，即每个城市独立自主、各城市之间自由联合的原则。他们又认为，既然公社是巴黎人民选举产生的合法政权，那末它也用不着用内战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与此相反，“公社理应小心规避一切会引起嫌疑的行动，免得让人认为公社怀有某种统治全法国和取代政府的意图”。蒲鲁东主义者贝雷3月29日在公社委员会会议上，把巴黎公社说成是地方分权和自治的模范。他说：从此以后，“每一个社会集团都可以获得完全独立和充分的行动自由”。他又说：“和平和劳动！这就是我们的未来！这就是……我们社会复兴的保证。”

在这个分歧中，显然多数派站在正确的一边，而少数派是错误的。马克思严正地批评了少数派的错误。指出：正如新的历史创举往往被误认为是抄袭过去有过的社会生活形式一样，摧毁了现代国家政权的公社也被误解为反对中央集权的中世纪公社的复活。而在近代，民族的统一已经成为社会生产的强大因素，因而不应该再去破坏民族统一。

少数派的这个观点不仅非常错误，而且也极其有害，因为他们完全无视距革命的巴黎仅仅17公里的凡尔赛政府所表现出来的杀气腾腾的敌意，而沉醉于和平的幻想之中。国民军中央委员会在3月18日革命后没有一鼓作气向凡尔赛进军，主要是由于蒲鲁东主义者这个观点作祟。3月19日在国民军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有几个中央委员，如杜瓦尔、埃德等人主张追击到凡尔赛，“先结束革命，然后再选举公社”。但是他们的意见遭到否决。反对他们的主张的蒲鲁东主义者说：“我们除了保卫巴黎的权利而外，再没有任何其他任务。”

蒲鲁东主义者之迷恋公社的自由联合，实际上就是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反映。而且尽管有蒲鲁东主义者反对，公社还是在实践中为自己开拓

了革命的道路，因为无论在政府机构上，还是在实际活动中，公社委员会都扮演了法国中央政府的角色。

第二，两派在加强专政的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分歧。布朗基主义者一心一意想加强专政，在他们看来，必须以人民的名义实行专政，把大权集中于几个人手中，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革命。少数派则认为这样做会破坏民主，容易流于专制独裁。

3月28日，在公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在是否公布公社会议记录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当时新雅各宾派格鲁赛建议：“公社会议将不公开。会议报告不公布，只公布它的决议记录”，因为这样做有利于与凡尔赛作战。格鲁赛说：公社应该是一个军事委员会性质的机构，不应该让敌人了解我们的讨论情况。这个建议得到了布朗基主义者的支持，但是遭到蒲鲁东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因为后者认为如果按照这个决议去做，群众无从了解公社的辩论内容，从而也就无法监督它。民主将受到损害。但是结果还是多数派的主张占了上风。

4月23日、24日两次公社会议讨论了关于犯人的隔离问题。有不少委员对已经实行的犯人隔离制度有异议，其中以蒲鲁东主义者阿尔努、泰斯等人的态度最为激烈，他们要求立即废除这个制度，主张任何一个公社委员都有权利到监狱里去访问犯人，听取他们的申辩。公社治安委员会的代表布朗基主义者里果与阿尔努展开了舌战，里果认为这是战争时期，如果每个公社委员都可以访问犯人，治安委员会就无法开展工作，从而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争论的结果，里果提出了辞呈（但后来他又被选为治安委员会成员，并且担任了公社检察长）。

促成公社委员会两派最后分裂的，是关于成立社会拯救委员会的争论。

4月24日，巴黎第十九区监察委员会开会讨论了巴黎的局势，与会者认为“危险愈是不可避免，就愈需要表现出更大的毅力”，为了保证公社的法令得到贯彻，建议公社立即着手成立享有全权的领导核心——社会拯救委员会。第十九区监察委员会最后就这个问题作出了决议。在公社委员会内，4月28日布朗基主义者米奥提出成立社会拯救委员会的提案，委员会应由五名委员组成，拥有最广泛的权力。米奥的提案受到了重视，公社用三次会议来讨论它。绝大多数布朗基主义者认为早就应该成立这样一个集权机构，否则就不能应付日趋严重的军事形势。但是，这个提案遭到蒲鲁东主义者的猛烈反对，他们所提出的一个重要的理由是，成立一个拥有全权的社会拯救委员会是“向专制主义倒退”，是“破坏公社的民主原则”。但是多数派不顾少数派的反对，强行通过了这个提案。

5月1日选举第一届社会拯救委员会时，蒲鲁东主义者集体抵制了这次选举（有个别的布朗基主义者也参加了抵制）。因此，选举出来的社会拯救委员会成员都是清一色的多数派。5月13~15日，社会拯救委员会清洗了公社委员会内的一些少数派委员。5月14日，少数派在邮政局集会，通过了同多数派公开分裂的“少数派宣言”，谴责多数派强制公社把政权交给社会拯救委员会，声明不承认这个“专政机关”，并宣布不再参加公社会议，而回到原选区去管理区公署和参加作战。第二天，“少数派宣言”在报上公开发表。这样，公社内部的意见分歧终于表面化。

这个宣言发表后，巴黎舆论界哗然，凡尔赛的报刊则幸灾乐祸。反映公社各派观点的报刊也纷纷发表评论，群众俱乐部也召开群众集会专门讨论两

派分裂的问题。由于看到巴黎处在危急存亡的关头，分裂不利于革命，少数派有 15 名委员在 5 月 17 日又回到公社参加会议。但是，两派的裂痕始终没有得到弥缝，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 5 月 21 日凡尔赛军队攻进巴黎时为止。

平心而论，这次分裂的责任应该由多数派来负，因为分歧是他们首先制造出来的。正是因为他们不顾少数派的反对硬要成立社会拯救委员会，才引起这一场斗争和分裂。而且成立这样一个享有全权的机构显然会导致少数人甚至个人独裁的局面，这就等于取消巴黎无产阶级所首创的无产阶级民主。其实，多数派之要求成立社会拯救委员会，不言而喻，就是布朗基关于专政的错误主张的体现。布朗基心目中的专政，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并“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进行突袭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事先又被组织在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的专政之下”。

最后，关于两派的斗争，可以作如下的结论。

首先，这两派虽然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不能因此而否认他们对公社事业作出的贡献。无论是多数派，抑或是少数派，当他们投身于广大群众之中，同他们一道创造惊天动地的事业的时候，指导他们行动的已经不是他们原有的信仰，而是他们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与广大群众同命运共生死的决心和献身于工人阶级事业的崇高精神。因此，与他们所创造的事业及献身精神相比，两派之间的斗争只占次要的地位。当凡尔赛军队攻入巴黎，革命处在存亡关头，两派都能捐弃已往的成见，并肩参加了保卫公社的战斗。他们的分歧及互相斗争，只是由于观点之不同，而不是出于个人恩怨。分歧是历史造成的，一切为公社而奋斗的人，不论哪一派，都是不朽的。

其次，在两派之间的斗争即使发展到分裂的地步时，任何一派都没有对持不同政见的另一派采取极端手段——雅各宾式的恐怖，都没有利用断头台去消灭对方。5 月 15 日当两派之间的斗争达到白热化时，多数派的一家报纸称少数派为“一群懦夫”、“叛徒”等等，并且建议逮捕他们，把他们送交法院并执行枪决。但是，掌握社会拯救委员会的多数派并没有利用自己的大权，给少数派扣上“敌人”的帽子把他们送上断头台。巴黎第四区召开了选民大会，让多数派代表与少数派代表充分陈述自己的意见，由人民来评论。在充分听取了两派的意见后，大会通过了充满团结精神的提案：“第四区选民大会完全不责备自己的代表，只号召他们重新回到公社去担任自己的职务，并且希望公社会议能公开，以便使每个人对自己的发言负责。”巴黎无产阶级革命内部的这种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两派的斗争，毕竟虚掷了许多大好时光，浪费了大量的精力，从而削弱了革命的力量。

（五）巴黎保卫战与公社的覆灭

在梯也尔政府逃到凡尔赛之后，凡尔赛就变成了反革命基地。

最初，凡尔赛政府的兵力只有从巴黎逃出来的一万五千人左右，还没有力量镇压巴黎革命，所以梯也尔只能采取阴险而狡猾的手法。第一，开动宣传机器，竭尽诬蔑和攻击巴黎公社之能事，妄图在道义上使巴黎陷于孤立。第二，唆使巴黎的一些区长拖延公社的选举，以便转移国民军中央委员会的

注意力，使其推迟向凡尔赛进攻。第三，策动巴黎内部的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活动。

与此同时，他又想方设法来增强凡尔赛的军事力量：到处搜刮兵力，哀求俾斯麦释放俘虏。当时国际反动派视巴黎公社为“洪水猛兽”，迫不及待地要求扑灭巴黎革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一再吁请俾斯麦帮助梯也尔镇压巴黎革命。俾斯麦最初假惺惺地表示恪守中立，但是很快地就撕掉假面具，释放了一部分法国俘虏。因此，到4月5日为止，凡尔赛兵力达到65,000人。第二帝国时代的元帅麦克马洪被任命为总司令。

4月2日，感到羽毛丰满的凡尔赛当局下令向巴黎发动攻击。当时，巴黎公社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反击：拥有人数众多的、士气旺盛的国民军，上千门大炮和充足的军火，而且有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可是，公社的军事领导不统一，指挥权分掌在公社军事委员会和国民军中央委员会手中，步调不一，有时互相掣肘。国民军训练不够，缺乏炮手，大炮多半闲置。因之，公社的部队同凡尔赛军队一开始交锋，就处于不利地位，以致很快地巴黎西北部的一些重要据点就落入敌手。

凡尔赛军队的进攻，立刻激起了巴黎群众的革命热潮。广场上，大街上集合了激动的人群，纷纷要求参加战斗。公社委员会在4月2日召开会议，研究了军事计划，决定兵分三路向凡尔赛进军。右路军由贝热瑞和弗路朗斯率领，中路军由兰维埃和阿夫里阿尔负责，左路军由杜瓦尔指挥。4月3日开始了军事行动。开始时，国民军的行动比较顺利，右路军占领了凡尔赛北面的吕埃伊，左路军前锋一直打到凡尔赛的东南方几公里处。但是由于事前缺乏周密计划，也由于缺少实践的经验，再加上没有后援，在敌人猛烈炮火的轰击下，败退下来。弗路朗斯被敌人用马刀砍死。杜瓦尔战败被俘，并且被敌人枪杀。临死前，杜瓦尔高呼：“公社万岁！”

向凡尔赛进军失利后，克吕泽烈成为公社最高军事领导人。他是一个巴枯宁主义者，是一个讲究虚荣、轻率浮躁的人。他错误地坚持防御战略，认为只有防御才能挽救颓势。他在命令中说：“我们的任务是耐心地等待侵犯，因为我们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正义的。从我们方面说，只要防守”。克吕泽烈的消极防御战略，给公社带来极大的危害。

4月7日，凡尔赛军队侵入巴黎西郊，有很大的军事价值的塞纳河上的渡口——涅依桥失守。但是巴黎的军队继续抵抗，只有到4月20日，敌人才占领西郊的塞纳河左岸地区。5月9日，巴黎西南隅的伊西炮台也陷落了。5月10日，梯也尔在德国提出的使法国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俾斯麦立即释放10万俘虏，并允许凡尔赛军队通过德军防线从北面进攻巴黎。当时梯也尔气焰非常嚣张，扬言要“手持法律走进巴黎”，对巴黎“我是不会留情的”。

5月21日，凡尔赛军队在奸细的协助下，潜入防守不严的圣克卢门，因而闯进巴黎城内。接着敌军又占领了奥特伊门、帕西门、谢弗尔门及凡尔赛门。到5月22日黎明，通过这五个城门进入巴黎市区的敌人已有9万~10万之众。由是开始了保卫巴黎的战斗。

在这个战斗中，公社人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凡尔赛军队从西部及西南部向巴黎市内推进，同时，德军在梯也尔的请求下又从北部、东部加紧封锁，因此公社的军队落到两面夹攻之中。

但是，公社人进行了英勇的抵抗。5月22日，公社发表了《告巴黎人民和国民军书》，号召“公民们，拿起武器来！”号召书还写道：“你们的代

表将和你们一起战斗，必要时，也将和你们一起献身”。

巴黎人民热烈响应公社的号召，不分男女，不分老幼，都踊跃参加战斗及防卫工作。巴黎人民日夜修筑街垒，妇女和儿童也参加了修筑。在两天之内，城内布满了成百个街垒。同时，英雄的巴黎人利用每一所房屋，每一道墙壁以及一切障碍物作为自己的防垒来打击入侵之敌。

妇女们也投入保卫公社的战斗，有的坚守街垒，迎击敌人，有的冒着枪林弹雨抢救负伤的战士。据估计，大约有一万名妇女参加作战。妇女营长米歇尔身着军装率领部队，始终战斗在前沿阵地。

波兰革命家东布罗夫斯基以城防司令的身份，身先士卒，多次持枪击退敌人进攻，5月23日在保卫蒙马特尔高地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在临终前他还勉励战友：“我的生命算不了什么，你们只是去想办法挽救共和国吧！”在最危难的时刻出任军事委员的瓦尔兰，一直在阵地上组织战斗，他从一个区转战到另一个区，从一条街转战到另一条街。为了保卫公社事业，他作出了最大的努力。

5月23日，梯也尔政府军队又在俾斯麦的同意下，穿过德军防线，从北面 and 东北面攻进巴黎。因此，公社的局势急剧恶化。到5月27日，巴黎大部分地区陷于敌手。5月28日，公社的最后一个街垒被敌人攻下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

反革命恐怖开始了。凡是参加战斗的人，凡是衣衫上有血迹的人，甚至穿着工人服装的人，没有一个逃出反革命的魔掌，他们不是被就地枪杀，就是被抓起来集体被枪杀。为了加速屠杀，敌人甚至使用了榴霰弹。敌人对革命领袖更不留情。瓦尔兰被逮捕后，两手被捆在背后，在蒙马特尔斜陡的大街上整整拖了一小时。他的头部被敌人用军刀砍烂了，鲜血淋漓。但是他泰然自若，表现了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最后，敌人向他开枪了，他倒了下去，但是又挣扎着站起来高呼：“公社万岁！”然后才死去。瓦尔兰就义时年仅32岁。

在白色恐怖中，一共有3万人遭到屠杀，有5万多人被逮捕，其中有46,000人被送到军事法庭受审。在审判后，又有200多人被处死刑，13,000余人被判处各种徒刑或苦役，有7000人被流放。

（六）马克思与公社。公社失败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

马克思自始至终留心观察1870~1871年法国事态的发展，并且特别关注公社的命运。他以极大的喜悦看到摧毁旧国家机器并且建立了新型的无产阶级政权的巴黎无产阶级的伟大创举。

马克思通过各种渠道与公社建立联系，以便对它进行帮助。在给巴黎和各省的国际支部的指示中，马克思曾提出了关于作战的具体建议。4月4日，马克思建议巴黎派遣代表到法国各大城市去建立联系。他对巴黎的防务曾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在给公社委员的信中，他建议加强与德军前哨交界的蒙马特尔高地北面的防务，因为他预见到德军可能让凡尔赛军队通过自己的防线。他还警告公社说梯也尔会勾结俾斯麦共同镇压巴黎革命。后来事态的发展，都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

当然，在赞扬巴黎群众的伟大创举及向他们提供建议的同时，马克思也率直地批评了巴黎公社的错误，批评了他们对阶级敌人的宽大，并且指出他

们“浪费在琐碎事务和私人争执上的时间太多了”。

马克思还通过国际总委员会向所属各国支部发出几百封信，介绍公社的性质，宣传公社的原则，并且号召各国无产阶级支援公社。尤其在巴黎人民进行艰苦的巴黎保卫战中，马克思毅然接受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委托，起草了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在宣言里，马克思愤怒地谴责了梯也尔之流勾结俾斯麦镇压公社的罪行，热情地歌颂了巴黎无产阶级创造公社的光辉业绩，严厉地驳斥了阶级敌人对公社及第一国际的诬蔑，并且科学地总结了公社的历史经验。

在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公社流亡者的热心援助，也是十分感人的。

在公社失败后，残酷的迫害使成千上万的法国人背井离乡，流亡国外。他们的主要流亡地是英国的伦敦和瑞士的日内瓦。也有的人流亡到比利时、德国、荷兰、西班牙等国。法国统治集团对于这些流亡国外的人也不肯放过，法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要求欧洲各国政府将这些流亡者引渡给法国政府。本来按照欧洲一些国家的法律，外国政治流亡者可以获得合法的避难权。针对这个情况，法国政府不惜捏造事实，硬说这些流亡者是杀人、放火和抢劫的刑事犯，企图以这种卑鄙的手段达到引渡这些流亡者的目的。英国政府准备接受法国政府的要求，引渡这些流亡者。

在这种情况下，寓居在英国的马克思便积极活动，为阻止英国政府引渡法国流亡者而斗争。他在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揭露了英国政府准备充当法国反动派的帮凶，并且把包括他这个发言在内的总委员会会议纪要发表在报纸上。报刊上的公开揭露，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注意，这对于英国政府无疑地是一种压力，因而对于英国政府引渡流亡者起了一定的阻止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非常关心来不及逃离而继续留在法国的公社人，并且设法为他们弄到出国护照。

流亡到国外的公社人往往一文不名，在生活上遇到很大的困难。为了救济这些流亡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付出了大量心血。在他们的倡议下，国际总委员会建立了救济基金，并且开展了募捐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头捐献。为了解决流亡者的生活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协助他们寻找职业。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政治上帮助了流亡者。当时在流亡者中间形成了许多组织，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动地和这些组织接近，帮助它们克服思想上的缺点和错误。他们还协助散漫的流亡者成立自己的组织。

巴黎公社的失败，有其主、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有以下数端：

第一，在3月18日革命胜利后没有立即向凡尔赛进军，直捣反革命巢穴。在同凡尔赛的战争中，采取了防御战略。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

第二，公社浪费在党派斗争上的时间和精力太多了。而且公社委员会内部的分裂，削弱了革命的力量。

第三，没有建立工农联盟。诚然，公社也曾向全国各地的农民呼吁，以争取他们参加斗争。但是，由于公社处在被包围的城市中，与各省的联系被切断了。公社曾印发了10万份告农民书，并且准备用氢气球散发出去。但是

终于没有达到目的。

第四，没有严厉制裁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甚至也没有取缔在巴黎出版的反革命报刊。

但是更主要的是客观原因。

欧洲资本主义世界还比较稳定，欧洲各国尚未出现革命形势，因而各国无产阶级不可能给法国革命以有力的支援。另一方面，法国资产阶级却能与昨天的敌人德国统治阶级结成凶猛的，尽管是暂时的联盟。此外，由于德军占领了法国几十个省份，并且同凡尔赛军队共同包围了巴黎，使公社的革命运动不可能发展为全国性的革命运动。

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的历史意义是深远的。

第一，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是无产阶级民主制的试验，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马克思在总结 1848 ~ 1851 年法国阶级斗争的历史时指出：工人阶级在下一革命中不能简单地利用现成的国家机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须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由于当时阶级斗争还没有提供现成的经验，马克思没有提出应该用什么样的国家形式来代替旧的国家机器。巴黎公社是终于发现的，可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旧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列宁称它为“公社类型的民主共和国”。在这个新型国家里，政府由压迫人民的机关变为为人民服务的机关，人民从被压迫者变为国家主人。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这个大胆创造。

第二，巴黎公社树立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典范。

公社的国际主义精神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第一国际不仅在创建公社的斗争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而且在公社的社会经济改革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国民军中央委员会和公社委员会中的蒲鲁东主义者大多数是第一国际会员。其次，活跃在公社的各个战线上的不少杰出人物是外国革命家。在公社的社会经济改革中出力最多，并且热心于劳动群众福利的弗兰克尔就是匈牙利工人。著名的公社将军东布罗夫斯基和符卢勃列夫斯基是波兰革命家。而且在公社旗帜下战斗的还有许多外国革命者——不但有匈牙利人和波兰人，而且还有奥地利人、比利时人、俄国人和意大利人。仅仅波兰籍的公社人就有五六百人。俄国女革命家伊丽莎白·季米特列娃就是公社的著名妇女领袖。弗兰克尔在谈到他当选为公社委员时说：“我并没有从个人角度来看待它，而仅仅把它看作是国际性质的一个措施。”

最足以表现公社的国际主义精神的莫过于推倒旺多姆圆柱这件事了。这个附有拿破仑一世铜像的圆柱是为了纪念拿破仑一世对外侵略战争的胜利而建立起来的。巴黎无产阶级很久以来就想摧毁这个象征侵略和独裁的圆柱。1871年4月4日，巴黎有影响的报纸《人民呼声报》郑重地提出了拆毁圆柱的要求。在人民的推动下，4月12日晚上，公社委员会一致通过法令：“旺多姆广场的圆柱应予拆毁”。这个法令得到巴黎全城广大工人和进步群众的热烈拥护。5月16日下午在旺多姆广场举行了拆毁仪式，在万头攒动的群众的欢呼声及《马赛曲》声中，圆柱连同拿破仑的铜像被推倒了。这个伟大举动的意义，如目击人阿尔努所指出的，在于它“是对战争和征服的谴责”，是“人民和后代对那个独裁者的审判，他把争取人权的革命变成了对法兰西和欧洲的奴役”。

巴黎公社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第一国际的影响的结果。第一国际在马克思的指导下，不断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各国工人，要求他们在反对国际资本、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互相学习，互相支援。马克思和恩格斯严肃地批判过去法国支部中的沙文主义情绪。因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便逐步在法国工人中间成长起来。

第十八章 19 世纪晚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第一节 资本主义经济的猛烈发展和垄断的形成

(一)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

19 世纪最后 30 年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

这个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世界工业生产增长了两倍以上。这个增长不但是各国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国内外广大劳动人民的结果，而且是由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特别是内燃机和电动机的发明和运用的缘故。

内燃机早已发明，只是到 90 年代德国工程师狄塞尔加以改进后才被广泛应用。内燃机使用液体燃料，不需要锅炉，比蒸汽机方便得多。

内燃机的应用为汽车和飞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也推动了石油开采业的发展。汽车发明于 80 年代。飞机出现于 20 世纪初。全世界的石油开采量 1870 年才 80 万吨，1900 年已增加到 2000 万吨。从这时起，资本家开始了争夺石油（能源）的尖锐斗争。

电能的利用具有重大意义。1800 年，德国工程师西门子发现了发电的原理，1870 年比利时人格拉姆发明第一架发电机，1873 年他又发明电动机——将电力变为机械力的机器。1879 年，美国人爱迪生发明了电灯。从 80 年代起，电灯在家庭生活中开始普及。1882 年，爱迪生将电动机用在交通方面，试验电车成功。1893 年他又发明了电影放映机，20 世纪初出现了最早的电影院。

1882 年法国学者德普尔发明了远距离输送电力的方法，这就使电动机和由电动机发动的工作机有可能安装在离发电站较远的地方。

这个时期又出现了新兴的工业部门——化学工业。从 80 年代起，就开始从煤炭中提炼氨、苯、人造染料等化学产品。不久，人造染料就排挤了植物染料。1867 年，诺贝尔发明了炸药，80 年代又改良了制造无烟火药的技术，这大大促进了军事工业的发展。塑料、绝缘物质、人造纤维开始投入生产和实际使用。

电气工业的兴起，也推动了旧有工业部门，诸如冶金、造船、机器制造工业的技术革新和发展。托氏炼钢法、电弧炼钢炉、电解炼铝法、电解炼钢法相继被采用。全世界铁的生产从 1870 年的 1400 万吨，增加到 1900 年的 4100 万吨，钢产量从 52 万吨增加到 2830 万吨。

交通运输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火车、轮船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汽车成了新的重要交通工具。1876 年，美国人贝尔发明了电话；1895 年，俄国人波波夫发明了无线电；意大利人马可尼作了同样的研究，1896 年领取了无线“传电脉冲方法”专利许可证。80 年代全世界电报线的长度为 150 万公里，19 世纪末已增长到 430 万公里。

总之，在 19 世纪最后 30 年和 20 世纪初，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飞速发展的突出标志是电代替蒸汽成为重要的能源，从这个意义上说，“电气时代”代替了“蒸汽时代”。

(二) 垄断资本统治的确立

在 1870 ~ 1900 年间，资本主义生产的迅速发展，促使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出现了新的现象——垄断组织。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生产过程的复杂化，竞争的加剧，促进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于是少数采用新技术的企业大量挤垮技术落后的企业。生产和资本集中到一定程度便自然而然地产生垄断。在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少数规模较大的企业之间，便达成协议，共同议定价格和市场范围。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欧美诸国便出现了最初的垄断组织。19 世纪晚期的几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引起许多基础薄弱的企业的倒闭，加速了垄断组织的形成。到 19 世纪末，英、美、法、德诸国的冶金、海运、铁路、化学、电气工业等部门，绝大部分的生产都已集中在几十个大企业中，并在它们之间建立了联合组织。垄断组织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卡特尔（为了瓜分倾销市场、确定生产规模及价格等而联合成立的组织）、辛迪加（为了共同出卖商品而成立的联合组织）、托拉斯（为了共同生产和倾销而把许多企业充分合并起来的组织）和康采恩（把一系列生产部门的企业从纵的方面联合起来的组织）。

到 19 世纪末，银行资本也日益集中。同时，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结合的现象，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生活中也明显地出现了，这便形成所谓金融资本。这个过程首先发生在比较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和美国，因为在这些国家里，工业缺乏资本，银行贷款对工业企业的作用很大。在美国形成两大金融资本集团——摩根和洛克菲勒，到 19 世纪末，它们已经把美国国民经济的大部分控制在自己手中。

与此同时，资本输出也开始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把“过剩”的资本向某些落后的国家输出。到 19 世纪末，资本输出在英、法、德诸国的经济中已占相当重要地位。

垄断组织、金融资本以及资本输出等都是帝国主义的因素，不过在 19 世纪 70 ~ 90 年代，它们对于整个经济还未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这个时期只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

到 20 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终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当时在资产阶级书刊和报纸上已出现“帝国主义”这个名词了。“帝国主义”被赋予各式各样的涵义，但是在大多数场合它被理解为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扩张政策。只有列宁才给它下了全面的科学的定义，指出它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的、最后的阶段。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有五大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

垄断是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1900 ~ 1903 年席卷欧美的深刻的经济危机有力地促进了垄断组织的发展，以致垄断组织在资本主义大国的国民经济中已占主导地位。1901 年，世界经济危机刚刚爆发，在美国就出现了 75 家托拉斯（它们联合了 1600 多家企业，资本股份达 30 亿美元），1903 ~ 1905 年，这些垄断企业所生产的钢，占全国产量的 70%，煤占 75%，石油占 84%。

在德国，到 1905 年卡特尔已不下 385 家，它们联合了 12,000 家企业，控制了主要的工业部门。

成立垄断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减少竞争，以保证比通常的平均利润高得多的超额利润。然而实际上，垄断组织并没有能够杜绝竞争，在垄断组织的参加者之间以及垄断组织与未参加垄断组织的企业之间仍时常发生剧烈的竞争。垄断资本家采用各种方法排挤及压迫未参加垄断组织的企业，使其破产。此外，他们还人为地抬高商品价格，增加消费者的负担，因而进一步恶化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

到帝国主义时代，银行资本的集中达到惊人的程度。1907 年，在德国几乎全国存款的半数（47%）集中在九家大银行手中，还有相当数量的小银行依附于这九家银行，变成它们的分行。在英国及美国，银行资本也有类似的情况。

同时，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融合也成为普遍现象。到 20 世纪初，德国柏林六大银行控制了 751 个企业。美国摩根银行集团控制了许多铁路，20 世纪初一共掌握大约 8 万公里的铁路。此外，这个银行集团还支配电气工业、保险公司、电报公司及钢铁业托拉斯。财政资本挟其巨大的经济力量，不但控制了整个国民经济，而且也操纵政治生活。

垄断组织和垄断利润的增长，使得垄断资本家积累了巨额的过剩资本。在落后国家里，不但缺少资本，而且工资低廉，原料便宜，因而利润极高。垄断资本家为了获得高额利润，便把过剩资本输往落后国家，在那里进行投资。当然，有时也采取向落后国家贷款的形式。资本输出虽然早在 19 世纪晚期便出现了，但是只有到 20 世纪初才获得大规模的发展。其中以英、法两国的资本输出数额最多，输出的对象主要是美国、俄国、拉丁美洲诸国、中国、日本等等。

为了争夺投资场所、倾销市场及原料供应地，各国垄断组织之间又斗争又勾结，它们成立国际卡特尔，共同瓜分市场及投资场所。1907 年在电气工业方面，在德国的电气总公司与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之间签订了分割市场的协定。1903 年在汉堡，美利坚公司、北德航运公司和摩根英美航运托拉斯之间又签订了划分活动范围的条约。这样的国际垄断组织到 20 世纪初有了很大的增长。1897 年，国际卡特尔只有 40 个，但是到 1910 年就增长到 100 个。然而，成立国际垄断组织并没有减轻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相反地，这不过是爆发更大的新竞争之前的间歇阶段。

与垄断资本家从经济上瓜分世界相适应，列强便从领土上分割世界。早在 19 世纪晚期，列强就掀起了瓜分殖民地的高潮。到 19 世纪末，世界已被英法等国瓜分完毕。但是，这时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德国，在工业上已赶上或超过英法两国，因此重新瓜分世界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垄断组织作为独占生产和市场的经济联合体，必然有其停滞和腐朽的一面，但是垄断组织意味着高度社会化的超大型企业集团，它也有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面。它的积极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垄断组织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在它形成后又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垄断组织的出现一方面是竞争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出现的新兴工业部门，如电力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和汽车工业，以及因采用新技术而得到迅速发展的传统工业部门，如炼钢工业，都要求大量的生产资料，

进行大规模生产和巨额投资，因而出现大规模企业是不可避免的。垄断组织在这些工业部门中有更大程度的发展，是必然的。垄断是在竞争中形成的。由于大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要高得多，加之设备完善，经营管理有方，它在竞争中取胜是必然的，挤垮力量较弱的企业也是必然的。它们在发展为垄断组织后，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大，这自然地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此外，垄断的形成也使技术发明和改良的过程社会化。垄断组织资金雄厚，使科学技术的研究有可能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因而容易取得新的科研成果，并且应用于生产。总之，垄断组织的出现，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二，成立垄断组织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独占市场，以攫取高额利润。但是这也是为了“调节生产”，以适应市场的变化。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工业产品的增长幅度暂时超过了市场需求增长的幅度，这就导致价格、利润的普遍下降，结果经济危机更加频繁、更加深刻和持久。恩格斯说：为了摆脱困境，“国内同一工业部门的大生产者联合为一个‘托拉斯’，即一个以调节生产为目的的联盟；他们规定应该生产的总产量，在彼此间分配产量，并且强制实行预先规定的出售价格。但是，这种托拉斯一遇到不景气的时候大部分就陷于瓦解，正因为如此，它们就趋向于更加集中的社会化……”总之，成立垄断组织，是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

最后，托拉斯和康采恩等高级形式的垄断组织，对于改善企业经营管理，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具备更加有利的条件。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即使组织得很好，能有效地降低成本，提高质量，然而对于企业以外，对于企业与企业之间，都无计可施。而建立高级形式的垄断组织，就等于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外部关系转化为企业内部关系，以便在更大的范围内组织生产，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在把企业合并成为垄断组织之后，在生产和经营管理方面可以产生如下优越性：实行更有效的分工，不同的工厂有不同的专业化；也能更充分地利用副产品；可以减少行政费用，可以取消重复的高薪职位。如果托拉斯实行纵向联合，不仅控制生产，而且控制原料资源和加工，以及产品的销售，那末就可以进一步改善企业的经营，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因此，在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后，经济发展的速度不但没有放慢，而且加快了。20世纪初，垄断组织有高度发展的美、德两国的经济发展最快，其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4.8%和4.2%。

当然，垄断资本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因为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剥削性和侵略性也加强了。

第一，垄断组织之垄断市场，垄断价格，必然降低广大居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意味着对于劳动人民的掠夺加强了。第二，垄断组织的形式，就是大生产吞噬小生产的结果，其中充满了暴力、欺诈及种种丑恶的手法。这在美国最为突出。第三，垄断的形成，必然伴随着食利阶层的出现，他们靠海外投资及向外国放贷，坐享超额利润及高利息的收入，因而成为游手好闲的寄生虫阶层。第四，垄断的形成，推动了殖民扩张。垄断资本不但要求扩大国外市场及原料供应地，而且也要求扩大向海外输出资本，因此19世纪下期出现

瓜分殖民地的狂潮。第五，垄断资本也是战争的根源。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必然导致它们之间的争夺殖民地，从而导致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一个例子。——

（三）政治社会调整与资本主义再现活力

1871年以后，伴随着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科学技术和工农业的突飞猛进，以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猛烈开展，欧美几个资本主义大国在社会经济方面出现了新的情况：第一，资本主义的阴暗面更加突出，社会不公正现象愈趋严重。国民财富急剧增长，但是财富分配极不公平，贫富差别天悬地隔。第二，劳动人民的觉悟空前提高，各国工人阶级纷纷成立自己的政党，在政治生活中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资本主义面临严重的挑战。第三，1871年以后，欧美进入社会化大生产时代，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发展，以致社会生活愈益趋向错综复杂，意想不到的问题纷至沓来。第四，各先进国家政治积弊成堆，腐化在侵蚀着整个政治机体。第五，各国展开了工业竞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问题也被提到日程上来。

面对上述新形势新问题，旧有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中的许多环节及旧有的方针政策已经不能适应了。如果“率由旧章”，一切墨守成规，资本主义只有没落或灭亡之一途。为了让资本主义继续生存下去，为了给资本主义增添活力，为了迎接新时代的挑战，欧美国家便不得不在政治、社会领域内进行一连串的调整。

首先是政治调整。

（1）强化国家机器。不但强化了军事警察机构，建立或加强官僚制度，而且国家机器的职能也扩大了，它不限于镇压或压迫，它还管理教育、负责公共卫生、保护自然资源、推行福利政策，甚至制裁托拉斯的不法活动等等。若赛亚·斯坦普写道：“国家已从作为警察的国家，发展为作为护士、医生、药剂师、保护人、向导、哲学家和朋友的国家了，从摇篮到坟墓都是如此。”而且从1871年以后，行政权力的加强也是国家机器强化的一个表现。为了应付近代化大工业所带来的问题，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便成为当务之急，而行政手段的效率显然要比立法手段更高，所以1871年以后，英美及比利时等国行政权力加强了。在英国，内阁地位提高了，而议会权力下降。在美国，也呈现国会权力削弱和总统权力增强的趋势。

（2）进一步完善国家管理机构。进入19世纪晚期，由于社会化大工业及城市的发展，社会生活日趋复杂化、多样化，为了处理千头万绪的国家事务，就必须加强政治管理的专业化、科学化，以期国家管理机构臻于完善。1871年后，英美两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第一，它们都通过文官制度的改革，完善了国家管理机构。第二，美国实现了城市管理机构的完善化。

在英国，在文官制度改革之前，吏治腐败，政府工作效率低下。这是不合理的文官任免制度使然。官吏任免大权掌握在内阁首相及大臣手中，他们任人唯亲，一般都把本党的亲信安插在政府要津。黜陟官吏也不是依据才能大小，勤奋与否或政绩优劣，而是以资历深浅及上级喜怒好恶为转移。结果，冗官充斥，工作混乱，贪污盛行。

吏治腐败，在美国表现在“分赃制”上面。这个制度形成于19世纪30年代，其特点是：甲党上台，立即斥退大批政府官员，而让在竞选中立功的

本党党徒取而代之。乙党上台也如法炮制。因之政府官员素质低下，道德败坏。而且“分赃制”也影响了政府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为了矫正这些弊端，也为了适应近代化大工业时代政府工作专业化、科学化的需要，英国在 1855 年和 1870 年前后颁布两道枢密院命令，美国在 1883 年颁布了“彭德尔顿法”，分别推行了文官制度的改革。综合说来，两国文官制度改革有以下内容：一、文官任用采取公开平等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只有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与专业知识的人才能担任官吏。在美国，有时邀请学术界专家主持考试。二、实行定期考绩，按照勤惰、政绩大小予以升降、奖惩。三、禁止文官介入党派活动，文官不与执政党共进退。

文官改革收到了一定的良好效果。首先，文官超然于党派斗争之外，这保证了政府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其次，把竞争机制引进文官制度中来，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官场中的腐败现象，提高了文官的素质和工作效率，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第三，它也推动了文官的知识化、专业化和政府管理上的科学化，使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取代了庸庸碌碌的政客。

在美国，还通过市政改革实现了城市管理机构完善化。

到 19 世纪晚期，美国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全国范围内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已经初步形成，经济发展重心转向城市。由于经济结构发生这样重大变化，现有的城市体制已无法与它相适应。这便是美国市政改革的基本原因。

在改革之前，美国城市一般地实行市长—市政会议制。在这个体制下，市政管理效率甚低，而且贪污成风。到 19 世纪 90 年代，随着进步运动的兴起，市政改革的要求发展为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

改革运动产生了结果，市长—市政会议体制被送到历史博物馆中去，取而代之的是委员会—经理制。在新的体制下，委员会（五人至九人）由市民按普选原则选出，由它负责制定政策，颁布法令，批准年度预算。经理是由委员会聘请的、受过专门教育并且有丰富的管理经验与才干的专家担任，由这位经理全权负责城市的行政管理。他向委员会负责，任期不限，由委员会视其政绩优劣而定。该体制既有民主成分（由人民选出的委员会掌握大权，由它来决定大方针），又能发挥专家的特长。易言之，它把企业管理原则注入民主的市政管理之中，既能照顾到市民各个集团的利益，又能实现城市管理的专业化、科学化。

这样，在 1871 年后，为了适应工业化、城市化的时代需要，为了应付社会生活的复杂化所带来的新问题，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政治上的调整——改革了文官制度，改革了城市管理体制，从而完善了国家管理机构，使其专业化、科学化，这样就使得政治体制适应了工业化社会的新格局，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作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

（3）扩大政治民主。在这方面英国是一个典型。在 1871 年以后，英国工人阶级已经发展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不但有工会组织，而且也倾向于社会主义。面对这个情况，在英国交替执政的两大党自由党和保守党，都感到有必要进一步扩大民主，藉以缓和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他们从过去几十年的经验中看到，扩大政治民主不但不会威胁私人财产制度，反而可以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磨掉他们的斗争锋芒，从而可以达到稳定社会秩序、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目的。这便是 19 世纪晚期到 20 世纪初英国通过改革扩大民主的主要原因。

这一时期英国扩大民主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实行秘密投票制；进一步扩大选举权范围，甚至实现妇女投票权，因而使英国接近了普选制；调整议会席位的分配，因而实现了比较公平的代表制；取缔选举中的舞弊行为，因而减少了贿选现象。而且，也对贵族势力的堡垒——上议院进行了改革：大大降低了上院的权力地位，使议会的权力重心移到下院来。在立法和财政方面下院取得了最后的决定权。

这时，在美国也有扩大民主的趋势，这主要是在州以下的地方政府进行的。在欧洲其他国家（俄国是例外）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民主。

在 19 世纪晚期以后，欧美先进国家在社会领域内也进行了调整。以英国为例，它在 1870 年以前实行的是经济上的放任政策，而实行这个政策的结果，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加剧，大公司、大企业飞扬跋扈，富者腰缠万贯，贫者欲求温饱也不可，他们的生活下降到无法维持健康和工作效率的水平。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然激化社会矛盾，危及资产阶级的统治。为了防患于未然，统治集团感到有必要实行社会调整。实行社会调整意味着从过去的自由放任政策过渡到政府对社会生活的干预。

实际上，这个时期在社会领域内进行调整不但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因为当时具备了客观条件：第一，科学发展日新月异，一支强大的科学家队伍已经成长起来，他们用自己的科学知识及科学研究成果为政府出谋划策，协助政府实行社会调整。第二，工农业的飞速发展，创造出丰盈的社会财富，为实行这个调整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针对社会上贫富悬殊和垄断资本的横行霸道，西方国家所实行的社会调整主要有两个内容，即推行劳工福利（或社会保障）政策和触动上层集团利益的政策。

（1）劳工福利政策

在此期间，英国所推行的劳工福利政策，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首屈一指的。但是英国当政者决定实行这个政策，也是社会上各种力量推动的结果，首先是工人的压力，其次是社会主义者的呼吁，最后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督促和协助。但是也不能忽略工厂主资本家的作用。英国政府有事总是找他们商量，只有取得他们的同意，才制定有关劳工福利的法律。大企业主一般地同意实行这样的政策，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实行这样的政策可以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他们认为社会福利政策可以防止工人倾向社会主义。然而“社会控制”并非工厂主资本家支持福利政策的唯一动机。对于他们说来，有时提高生产率的考虑更为重要。他们认为福利政策可以激发工人的劳动积极性。

英国的劳工福利政策有以下几个内容：

1897 年制定工人赔偿法，它规定：危险最大的工业部门——铁路、制造业、采矿业、采石业及建筑业——中的工人因工致死或致残者，可以领取赔偿费。到 1900 年又扩大到农业部门，1906 年普及到一切产业部门。

1905、1909 年制定了有关解决失业问题的法律，但是实行结果成效不大。因此到 1911 年自由党人劳埃德·乔治向议会提出失业保险法案，并获得通过。其内容要点如下：保险适用范围包括建筑业、土木事业、造船业；每周从工人工资中扣出 2.5 便士，雇主出钱 2.5 便士，政府出钱 1.25 便士，作为保险金；失业工人领取 15 周的生活费，每周 7 先令。

1909 年颁布商业法，它授权成立一个机构，由它对几个工资低下的工业

部门的工资实行工资管制。但是，受益者只有 10 万人。

1908 年制定关于老年津贴的法律，规定年过 70 岁的穷人每周可以领取 5 先令的津贴。据该法，全国只有 49 万人有资格享受这个待遇，而且其中许多人是妇女。这笔钱完全由国家负担。

1911 年又制定“国民保险法”，内容有二：第一，工人生病、残废或怀孕者，可以领取补助金。第二，经费来源是：工人每周拿出 4 便士，雇主拿出 3 便士，政府拿出 5 便士。

英国也实行工厂法，以求改善工厂的劳动条件。1878 年的“工厂与工场法”确定了工人十小时工作制及星期六半日制。1886 年的“商店法”规定了在零售店中工作的儿童及青年的工作时间。1908 年的“煤矿法”规定了井下工作时间为每天八小时。

在这个时期，美法诸国也在不同程度上推行工人福利政策。其背景因国而异，有的出于和工人政党争取工人的策略上的需要（如俾斯麦的德国），有的来自改革运动的推动（如 20 世纪初的美国）。

（2）触动上层集团利益的政策

实行这个政策的目的在于安抚下层人民的不满，缓和社会矛盾。这在美国表现为反托拉斯的斗争和向富人征收累进所得税。

19 世纪末以后在美国出现的一个惊心动魄的现象便是大公司、大垄断组织的权势驷马凌驾于州政府之上，甚至与联邦政府分庭抗礼。更严重的，大托拉斯还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干出许多危害人民利益的勾当。因此，美国公众以极其愤慨的心情，要求政府制裁这个横霸势力。

当时要求制裁托拉斯的不仅有人民群众，也不仅有中等阶级，而且有垄断资产阶级中间的自由派。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反映了这个自由派的愿望，但是罗斯福并不反对托拉斯本身，他只反对托拉斯的不法行为和犯罪行为。他把托拉斯分为“好的”和“坏的”两种，主张限制托拉斯的“坏的”方面，而保存其“好的”方面。罗斯福从事反托拉斯的斗争，也有安抚中、小资产阶级和防止社会主义在美国传播的目的。正如霍夫斯塔特所指出的，罗斯福制裁托拉斯的动机是“避免范围广泛的灾难、群众的不满、可能发生的暴民的暴力行动、一个潜在的同情罢工及‘社会主义的行动’”。

罗斯福反对“坏的”托拉斯的斗争，一个时候声势很大。斗争的结果，“坏的”托拉斯的凶焰有所收敛，但是托拉斯本身照旧发展下去。

向富人征收累进所得税，是触动上层集团利益的政策的一个表现。西方先进国家征收累进所得税，有双重目的：一是为了解决推行劳工福利政策所需要的资金的来源问题；一是为了缓和贫富悬殊所造成的社会矛盾。

英国政府用在实施劳工福利政策上面的金额，数量之大令人咋舌。1914 年达到 2050 万镑，而国家全部财政支出为 19,230 万镑。地方政府用在社会政策上面的金额为 1900 万镑，而财政支出总额为 14,800 万镑。

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英国就开始把征收累进所得税的措施纳入正常轨道。德意等国从 19 世纪 90 年代起，美法从 20 世纪初起也实行这样的税收制度。

欧美大国所实行的这些调整，达到了以下两大目的：

第一，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延长了资本主义的寿命。不消说，强化国家机器收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效果，从而有利于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然而必须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扩大政治民主的作用，比强化国家机器的作用

大得多。资产阶级国家扩大政治民主这件事本身，就剥夺了人民群众进行独立斗争的意志。以英国为例，自由党人格莱斯顿曾积极为扩大政治民主（主要是扩大选举权）卖过力气，结果他在人民眼中就成了代表进步、正义的英雄。因此，人民取得了选举权之后，踊跃地投了格莱斯顿的票，而没有运用选举权来选出人民自己的代表。可以说在扩大民主之后，在政治上，人民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此外，政治民主的扩大，也起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安全阀”的作用。因为在民主制度下，人民群众可以在许多场合（特别是在选举中）发泄内心的不满，这样就不至于由于不满情绪长期郁积心中不得宣泄而最后爆发为革命行动。再者，政治民主对于广大人民说来，也是一副有效的麻醉剂，使他们容易产生对于资产阶级统治的幻想，从而满足于现状。

但是，比起扩大政治民主，资产阶级国家的劳工福利政策所起的作用更大，至少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劳工福利政策与触动上层集团利益的政策相配合，发挥了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作用。以英国为例最能说明这个问题。自从18世纪以来一直到1870年为止，英国政府的大部分财政收入来自对消费者征收的“国产税”，因而税的负担主要落在广大消费者劳动人民身上。而与此同时，英国政府把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用于支付国债利息和处理国债需要的费用。这意味着以国家财政政策为杠杆，穷人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富人或大资本家的金库中去，结果是富者愈富，贫者益贫。但是，1871年以后实施的劳工福利政策及累进所得税制二者结合在一起，发挥了国民财富再分配的作用：从富人身上挖出一小部分的财富，用在穷人身上。这种财富再分配，在稳定资本主义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容忽视的。社会财富再分配，使得劳动群众勉强维持温饱，结果他们安于现状，而不会铤而走险或接受革命思想。

众所周知，在1871年以后，西欧和北美的先进国家都呈现了社会安定的局面，没有发生革命。显而易见，这主要是和这个时期这些国家实行政治、社会调整分不开。

第二，资本主义增添了活力，出现了西欧北美经济高速发展。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的仍是劳工福利政策及触及上层集团利益的政策所起的重要作用。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会拉大贫富之间的差距，并且导致劳动人民的贫困，因而降低他们的购买力，造成周期性生产停滞。然而，劳工福利政策及触动上层集团利益的政策，却缓和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造成的这个矛盾，因而这两项政策在实质上意味着对于低收入工人的一种经济上的补偿，他们在得到补偿后，购买力提高了，社会需求增大了，这就刺激了生产，导致经济繁荣。市场经济所重视的是钱，而以劳工福利政策等社会调整所强调的是人，实行社会调整就是对于市场机制的一种限制，就是对市场经济所造成的劳工贫困的一种经济上的补偿，因而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大有裨益。

此外，劳工福利政策还可以刺激工人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又有助于他们的体力的恢复，因而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发展。

此外，国家管理机构的完善，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政治民主的扩大有助于社会矛盾的缓和，从而为经济发展准备了一个安全的社会环境。

大家都知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资本主义经济飞跃发展和空前繁荣的局面，并且发生第二次工业革命。蒸汽时代已成为过去，电气时代翩然

来临。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这些工业大国推行了一整套政治、社会的调整。取得资产阶级统治的巩固及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两大成果——这就是这些工业先进国家实行政治、社会的调整的全部历史涵义。

第二节 德国

（一）统一后的德国政治

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之宣布成立，标志着德国统一的最后完成。

1871年4月16日颁布了俾斯麦一手包办制定的帝国宪法。按照这部宪法，德意志帝国由22个邦和3个自由市组成。帝国的立法机关有联邦会议和帝国议会。联邦会议由各邦代表58人组成，其中普鲁士占17席，而且普鲁士首相兼联邦会议主席。因此，普鲁士邦在联邦会议中起决定性作用。帝国议会根据普选权直接选出（采取秘密投票法）。议会两院对于普通法案都有表决权，但是最后决定权属于联邦会议，特别是对有关关税及重要的税收法案，联邦会议主席可以作最后决定。联邦会议得到皇帝批准还可以解散帝国议会。可见，由普选产生的帝国议会的权力大大小于联邦会议。帝国皇帝由普鲁士国王世袭，同时普鲁士首相兼任帝国宰相。皇帝握有广泛的权力，他是帝国行政部门的首脑，对官吏有任免大权。帝国宰相向皇帝负责，而不向帝国议会负责。皇帝还有宣战媾和及派遣驻外大使的权力。他有权召集联邦会议及帝国议会，也可以解散它们。他也可以提出法律，要求议会通过。更重要的是，皇帝掌握军事大权，帝国的武装力量由他指挥。

宪法没有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人民得到警察许可后方能集会。

可见，德国不过是披着议会外衣的半专制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普鲁士官僚地主居于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但是，以俾斯麦为首的统治集团所采取的措施，在经济上满足了资产阶级的要求。

1873~1875年颁布了货币法及银行法，限制滥发纸币，实行以金马克为单位的统一币制。这大大便利了工商业活动。

另外，又统一了民法、刑法、商法、破产法以及裁判所组织法，这些也都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活动。

1879年颁布了保护关税法，大大提高了进口税率，结果使政府的关税收入几乎增加了两倍。保护关税政策，使得资产阶级有可能垄断国内市场的价格，以便在国外有能力以蚀本的价格倾销商品，夺取国外市场地盘。

不消说，普鲁士领导下的统一事业的完成，对资产阶级更为有利。因此由大资产阶级组成的“民族自由党”无条件拥护政府，并且成为俾斯麦在议会中的主要支柱。

但是，在另一方面，俾斯麦政府却遭到其他政治集团的反对。第一是代表普鲁士落后的地主的利益的保守党，反对统一德国及照顾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第二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的利益的“自由思想者党”，反对半专制的统治，主张实现自由。第三便是在1870年产生的中央党。这个党对俾斯麦政府威胁最大，俾斯麦一个时期全力对付的正是这个党。

中央党的成分极为复杂，领导该党的是天主教僧侣。原来在宗教改革后，普鲁士成为新教国家，南部及西部诸邦仍是天主教国家。现在既然普鲁士在统一后的德国占统治地位，天主教僧侣害怕天主教会的特权会被普鲁士所剥夺，所以成为俾斯麦政府的反对者。参加中央党还有因统一而失去统治大权的各邦的贵族统治集团，他们嫉妒普鲁士地主在德国的统治地位。中央党还

由于皇帝威廉一世已经老耄，实际掌握大权的是宰相俾斯麦。

用反对大资本及高利贷资本的口号吸引了破产的手工业者、落后的天主教工人及莱茵省的小农参加自己的队伍。因此，中央党的势力很大，帝国议会中的中央党人达百人以上。

为了与中央党作斗争，俾斯麦乃发动一个反天主教的攻势，史称“文化斗争”。他的目的有二：第一，为了消灭异己者，以巩固普鲁土地主在帝国内的统治地位；第二，为了转移工人运动的目标，想借宗教斗争来冲淡阶级斗争，以利于对工人的统治。

1872~1875年，俾斯麦在民族自由党的支持下，促使议会颁布一系列反对天主教的法律。1872年的法律剥夺了天主教僧侣监督小学的权利，不久又下令驱逐耶稣会会员。1873年颁布“五月法令”，把一切培养天主教神甫的学校都置于国家监督之下，并且限制教会惩罚僧侣及教徒的权力。1875年的法律限制教会干涉婚姻。

罗马天主教教皇下令天主教僧侣及教徒不许服从这些法律。于是政府开始镇压，凡不服从这些法律的主教与牧师被大批免职或逮捕。

但是从1878年起，俾斯麦放弃了“文化斗争”，而与中央党和解，在数年内陆续取消了反对天主教的法令和法律。俾斯麦这样做，是因为，原来俾斯麦之进行“文化斗争”主要是靠议会内民族自由党的支持。但是1873年的经济危机使阶级斗争尖锐化，过去在选举中支持民族自由党的小资产阶级开始反对民族自由党了。因此在1877年选举中，民族自由党的席位激减，而中央党席位却增加到192席。在这种情况下，俾斯麦再也不能依靠民族自由党的支持了，所以只好和中央党妥协。同时，德国工人运动日益高涨，为了对付工人阶级这个主要敌人，俾斯麦也不能不放弃对天主教的斗争。

（二）统一后德国资本主义的猛烈发展

从70年代开始，德国的工业生产有惊人的增长。1871年生铁产量为156.4万吨，1891年增至464.1万吨。钢产量在1871年为25.1万吨，1891年达到235.2万吨。煤产量（包括褐煤）在1871年为379万吨，1891年为942万吨。1871年到1900年，铁路长度增加了一倍多。以德国生铁产量在世界生铁生产中的地位来说，1870年德国占第四位，而到90年代初已跃居第二位，不但超过法国，而且也超过了英国，仅次于美国。

在德国工业中，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占有支配地位；新兴的电气工业、化学工业和光学工业的发展，也是德国工业的特色。

随着德国工业的迅速发展，德国对外贸易也有很大的增长。1870年德国对外贸易额占世界第三位，到1900年已跃居第二位了。

资本主义在农业中也有增长。容克大庄园采用机器耕种和收割，使用化学肥料，实行合理轮种。全国绝大部分的土地仍旧掌握在容克和富农手里。易北河以东，容克庄园占耕地的一半。而且农村还保存封建残余。雇农为了从容克手中领到一小块带有茅舍的份地，还必须带全家到容克的庄园上劳动。易北河以西，中小农占优势。1882年全德有300万小农户，占农户总数的3/5，但他们的耕地只占整个耕地的1/20。70~80年代，在农业危机的打击下，大批中小农户破产，流入城市，绝大部分加入工人阶级队伍。

19世纪晚期德国工业迅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统一的实现，因为国家统一不但从消极方面扫清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障碍，而且也从积极方面

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也不能忽视其他因素：从法国掠夺来的 50 亿法郎的战争赔款，主要用于发展军事工业；从法国吞并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使德国得到丰富的地下资源；利用了科学技术上的最新成就，兴办了新兴工业部门；保护关税政策，使德国工业避免了外国工业品的竞争；农民的大量破产及流入城市，为工业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帝国政府强迫各铁路系统降低出口货的运费，以利于德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一言以蔽之，国家在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这也是德国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不同的独特之点，因为英国资本主义是在政府的放任政策下发展起来的。

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飞速发展，德国资产阶级强烈地要求扩大国外市场及原料供应地，要求德国参加瓜分世界的活动。1882 年，德国工业家和银行家建立了德意志殖民协会，该协会到 1887 年又改组为德意志殖民公司，广泛宣传对外扩张政策，鼓吹殖民掠夺。俾斯麦把主要力量用在欧洲大陆的争霸上面（“大陆政策”），而且德国海军势力这时还很小，根本不能与英国较量，因此他对向海外殖民掠夺抱比较慎重的态度。不过，他也不能完全忽略资产阶级的要求，他利用欧洲其他列强之间的矛盾，为德国占领一些尚未被“瓜分”的殖民地。1884 年，德国在南非取得第一块殖民地，这就是盛产金钢石的西南非洲（纳米比亚）。同年，西非的多哥和喀麦隆也被置于德国的“保护”之下。1885 年德国又占领了伊里安岛（新几内亚）的东北部和马绍尔群岛，并且建立了东非殖民地（坦噶尼喀地区）。80 年代，德国资本也开始渗入亚洲和拉丁美洲。但是，在亚、非、拉诸洲，德国的势力到处都遭到以英国为首的列强的排挤。

（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立及其发展

德国统一后，工业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造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1852 年德国产业工人不过 190 余万人，但是到 1894 年已增至 613 万。同时，德国工人状况比英法等国要坏得多，工资低下（1874～1879 年间工资下降了 17.5%），劳动强度大。资本家用降低工人工资的办法压低成本，以便在外国市场上进行顺利的竞争。工人的贫困和苦难提高了他们的革命性。

在德国统一完成时，德国工人运动中存在两个党派，一个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又称为爱森纳赫派），另一个是拉萨尔派，前者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后者是机会主义政党。这两个党对许多问题持截然不同的态度。在普法战争中，爱森纳赫派表现了高度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当普鲁士从防御性的战争转入侵略性的战争时，爱森纳赫派的领袖倍倍尔等人挺身而出坚决反对俾斯麦的侵略战争，并且抗议德国合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但是拉萨尔派则不然。在巴黎公社成立后，倍倍尔等公开支持巴黎公社，称赞公社人的英勇气概，同时也批评公社的弱点。相反地，拉萨尔派对巴黎无产阶级革命抱冷淡态度。因此，爱森纳赫派在德国工人中间的威信越来越高，而拉萨尔派则反是。

但是，德国统一后事态的发展，使得两个党派的合并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普法战争后，德国工人罢工运动大大加强。1872 年夏，鲁尔的矿工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以及提高工资 25% 而举行了罢工。同年，萨克森矿工、开姆尼茨、纽伦堡、莱比锡等地的工人都举行罢工。然而这些罢工大多限于局部

地区。虽然多次尝试把罢工运动扩展到更为广大的地区去，可是这些尝试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德国工会分裂成为两派，一派处在爱森纳赫派的影响下，另一派处在拉萨尔派的影响下。这就使得人们痛切地感到两个党派合并的必要性。而且，巴黎公社失败后，德国统治集团疯狂地迫害工人领袖和社会主义者。这也使得许多人认识到：工人阶级团结和两个党派合并刻不容缓。此外，在爱森纳赫派威信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很多拉萨尔派分子转到爱森纳赫派方面来。这就使得拉萨尔派领袖不得不考虑合并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支持德国工人把两个党派统一起来的要求，但他们主张两派在合并时，不能对拉萨尔派的思想主张妥协。

1875年在哥达召开了两党统一代表大会，实行了合并，称为社会主义工党（1890年改称为社会民主党）。当时，爱森纳赫派的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忽视了马克思的忠告和指示，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对拉萨尔派的观点采取了妥协的态度，这明显地反映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即《哥达纲领》）上面。

纲领对于国家持有错误的见解，认为国家不是统治阶级的权力工具，而是一个独立的、超阶级的组织，其法律是为一切人服务的。

纲领认为对于工人阶级说来，“所有其他各阶级都是反动的群众”。

马克思批判了《哥达纲领》，并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但是，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没有真正领会《哥达纲领批判》的重大意义，他们把马克思的这个批判藏起来不予发表。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达纲领虽然有许多根本性的错误观点，但是这个党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指导和工人群众的推动下，仍旧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因此，它发展得很快，不久就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人政党。到1877年春，党已经有32,000名积极的党员，有一个中央机关报。1877年议会选举时，党获得大约50万张选票，在柏林有40%的选民投了社会民主党的票。

针对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迅速发展，俾斯麦政府实行了“鞭子与蜜糕”的政策。首先，他颁布了一批工人社会立法：1881年颁布《工人伤残老病社会保险纲领》，1883年颁布《疾病保险法》，1884年颁布《意外事件保险法》，1889年又颁布《老年和残废保险法》。实施这些法律的保险费用，三分之二出自工人身上，三分之一由雇主负担。这些立法的颁布一方面是德国工人阶级斗争的成果，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企图以此小恩小惠引诱工人阶级离开革命斗争的轨道。其次是实行暴力镇压政策。1878年5月11日发生了谋刺皇帝的事件。俾斯麦便以此为借口，在1878年5月24日向议会提出了一项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议会议员多数人反对颁布这项法令，资产阶级议员虽然不反对镇压工人，但是也害怕这个法令有可能被用来对付自己的党派。于是俾斯麦就解散了这个不听话的议会，宣布举行新的选举。在选举中，俾斯麦采用各种手段，包括恐怖手段在内，强迫选民投保守分子的票。选举结果，保守分子在新议会中占优势。新议会在1878年10月19日终于通过了这个“非常法”。

这个法令全名为《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最初规定有

效期为两年半，但是后来延长到 1890 年春。根据这个法令，任何团体、报刊及其他印刷品或集会，如系“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旨在推翻现存国家和社会制度，而又以危害治安，特别是破坏居民群众和睦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活动”，一概加以禁止。同时，对于这种团体的任何支持，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这样，工人阶级的一切自由权利都被剥夺了。大批党员遭到逮捕或放逐，仅在法令公布后两个月内就有 521 名社会民主党人被逮捕监禁。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则被企业主解雇，并被列入黑名单。有一个时候党的领导和各组织之间失去了联系，党的组织陷于瓦解。

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俾斯麦政府的大举进攻下惊慌失措，他们甚至宣布解散党。马克思、恩格斯尖锐地批评倍倍尔等人的立场，要求收回这个错误的决定。他们指出应该把非法的活动与合法的活动结合在一起。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及党员群众的压力下，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逐步纠正了错误。1880 年 8 月 21 日在瑞士苏黎士附近举行一次党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关于以一切非法的与合法的手段进行活动的决议。为了领导群众及与群众保持联系，倍倍尔等不久就创办一份地下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版，秘密运回国内散发。后来还在国内秘密印刷一部分。该报在 80 年代发行额达 12,000 份，在巩固地下党的组织，在启发工人的觉悟及在党内反对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非常法”时期，党还进行了以下两项工作，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第一，积极参加国会选举。当时党的存在及活动虽然遭到禁止，但是党员和工人却享有选举权，因此他们便积极参加选举。党在选举中取得的成就一次比一次大：1881 年取得 312,000 票，1884 年增加至 549,990 票，1890 年速增至 1,427,298 票，并且在议会中取得 35 个席位。

第二，党领导和组织了罢工。1889 年 5 月党在鲁尔领导了一次空前规模的罢工，大约有十万人停止工作，斗争目标是争取八小时工作日。

“非常法”实行的结果，社会民主党的势力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强大。因此，1890 年 1 月 25 日，议会的大多数议员拒绝了俾斯麦提出的继续延长“非常法”的法案。这对于俾斯麦说来，是一个严重的失败。皇帝威廉二世（1888 年即位）早已不满俾斯麦的政策，他便乘这个机会迫令俾斯麦辞职。

但是在“非常法”废除、党取得合法地位后，党内改良主义倾向增长了。这充分表现在党的《爱尔福特纲领》上面。

1891 年夏在爱尔福特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新的纲领，即《爱尔福特纲领》。这个纲领比起《哥达纲领》来说，是前进了一步。纲领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导向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果。纲领也指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结社自由及罢工自由的斗争的必要性。但是，纲领也向机会主义进行了怯懦的让步。第一，它主张“通过和平道路建立”社会主义。第二，它不敢提出推翻半专制的君主政体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

恩格斯对《爱尔福特纲领》作了尖锐的批判，指出党的领袖由于害怕“非常法”的恢复，不仅不敢在纲领中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甚至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都不敢提出。他写道：“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

俾斯麦的“大陆政策”使得德国在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斗争中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这颇使皇帝不满。

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

（四）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

《爱尔福特纲领》虽然遭到恩格斯的批判，但是党内改良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势力不但没有稍戢，反而日见抬头。这是有其时代背景的。第一，到垄断资本形成之后，垄断资本家所赚到的高额利润使得他们有可能收买一部分工人——熟练工人，造成一小群特权工人。这部分工人生活较为优裕，所以满足于现状，丧失了革命精神。第二，社会民主党人在选举中的胜利，使得他们过高地估计议会斗争的作用，因而就忽视了革命斗争及暴力革命的意义。

90年代的德国右倾机会主义者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者”的姿态出现的，修正主义实际上就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到90年代，马克思主义已经完全战胜了工人运动中一切其他思想体系，这就逼得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穿上马克思主义外衣来反对马克思主义。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创始人便是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年）。他出身于德国一个犹太工人家庭。最初他本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1878年以后就成为革命的民主党人。1878年“非常法”颁布后，他参加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苏黎世三人团”，但是在受到恩格斯批评后，转变较快。从1881年到1890年他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在这十年期间他的立场基本上是正确的，受到恩格斯的称赞。他通过《社会民主党人报》揭露俾斯麦反动的两手政策，并且批判了为这一政策提供理论根据的国家社会主义；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批判党内残存的拉萨尔主义思想；坚持党的革命策略，同国会党团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斗争。1890年以后，他受费边派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产生了怀疑，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肯定其“具有非常合理的内核”。1896～1914年是他作为公开的修正主义者最为活跃的时期。他在1899年发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一书，全面地发挥了他的修正主义“理论”，并且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已经“陈旧”，所以应该“修正”，修正主义一词就是从这里来的。他的修正主义的主要论点如下：

第一，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他根据熟练工人实际工资的增加，否认工人群众贫困化的事实，因此他认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愈来愈接近，愈来愈“相似”，从而阶级斗争就失去根据了。

第二，他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他提出的理由是：一、“有着严格的等级制的封建制度，几乎在任何地方都不得不用暴力来加以破坏。近代社会的各种自由制度，正是在它们具有伸缩能力、变形能力和进化能力这一点上同封建时代的制度绝对不同。因此这些制度不应加以破坏，而应使之继续进化。”二、资产阶级国家并不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暴力机器。他说：德国实行的普选制已经使“民主即使实际上还没有消灭阶级，但在原则上已经意味着阶级统治的消灭”。实行普选制就意味着议会制的民主，社会民主党只要“以普遍选举权和民主为基础”，力争获得大多数选票，争取在国会里占多

数，就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三、军事技术日新月异，人民的武装斗争已成为不可能的了。他说：“在一个世代之前，人民群众保卫自己权利的最后手段是街垒战斗。这种手段已经由于现代城市建筑和现代枪炮技术而失去效用了。”

第三，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名词在今天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了！”他断言：无论从经济发展或知识水平来看，无产阶级都还不能够“实行单独的统治”，如果无产阶级过早地夺取政权，则无产阶级专政只是“意味着俱乐部的演说家和著作家的专政”。

第四，他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虽则有时在口头上表示拥护它。他说：社会主义只是“伦理上的”理想，只是人们无法实现的幻想。因此他对于社会主义这个无产阶级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抱否定的态度。他说：“最终的目的算不得什么，运动就是一切”。这就是说，工人只能为眼前的利益进行经济斗争，争取资本主义制度下面的点滴改革，而最终的社会主义目标则是虚无缥缈的，可以不必追求它。

第五，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支持德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他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德意志帝国的殖民政策是完全没有忧惧的必要的”，“不存在一开始就把获得殖民地看作是应该深恶痛绝的事”。他认为殖民政策可以帮助落后国家。他说：“欧洲人占领热带国家，并不一定会妨碍土人的生活上的安乐。”

第六，在哲学上，他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他认为社会只有逐步的、缓慢的进化，飞跃是不可能的。他说：“我确信：各民族发展上的重要时期是没有飞跃的。”

总之，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偷运到工人运动中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对于工人运动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因为他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纳乌曼写道：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批判得很好，很巧妙，而最重要的是，这是他批判的。如果是我们批判的，那末这就是‘敌人’批判的，但如果这是他批判的，那末就是‘同志’批判的”。因此，资产阶级把伯恩施坦当作一个救世主加以欢迎，极力推荐他的著作。

（五）德帝国主义

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德国就开始产生垄断组织，到 90 年代垄断组织在经济生活中已取得统治地位。1896 年有卡特尔 250 家，1900 年增至 300 家，1905 年更增至 385 家，到 1911 年速增至 550 家至 600 家。煤铁的生产基本上被几十家财阀所控制。莱茵—威斯特发利亚煤业辛迪加，在 1898~1903 年间吞并了一百多家煤业企业，到 1910 年已控制鲁尔煤产量的 94.5%。克虏伯公司垄断了军火生产。电气工业掌握在电气总公司和西门子康采恩手中。化学工业 1908 年时基本上是两大康采恩企业集团，后来联合为化学工业中最强大的垄断组织伊·格·法本康采恩。汉堡—美洲邮船公司和北德轮船公司两家控制了整个德国的航运业。1900 年前后，德国有 300 万家小企业，但几千家大企业支配了 40% 以上的工人，75% 以上的蒸汽马力，80% 以上的电能。一小撮垄断巨头支配了德国工业的 80% 以上。

银行资本也迅速集中，并和工业资本结合起来。1909 年柏林九家大银行

集中全德银行资本的 83%。德意志银行一家拥有资本 30 亿马克，控制了 200 个企业。银行由简单的中介人一变而为万能的垄断者。大银行和工业企业紧密结合，形成了金融寡头。柏林六家大银行的经理兼任 344 家工业企业的董事，这六家银行的董事会还是另外 407 家企业的监事，而这 751 家企业中的 515 个大工业家同时是这六大银行的董事或监事。德国的国民经济实际控制在 300 人手中，他们自称是德国的“群神会”。

资本输出已开始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虽然这方面德国不如英国和法国，但到 1914 年，德国输出资本也高达 440 亿法郎，德国的年轻工业开始插足于瓜分世界市场的斗争。例如德国的电气总公司 1907 年同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签订分割市场的协定，电气总公司分得欧洲，通用电气公司分得美洲；1903 年，德国的航运卡特尔和英美航运托拉斯签订划分活动范围的条约。因此，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德国已正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德国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它的容克资产阶级性质。这是由其政权的性质和经济发展的特点所决定的。德意志帝国实际上是一个大普鲁士，容克阶级握有政权，盘据政府要津，德国的资产阶级从未单独占有政权，这种情况到帝国主义时期依然如此。在经济上，容克掌握大部分土地，从事资本主义经营，他们的经济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密切结合起来，并在德国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帝国主义时期，容克和资产阶级日益融合为一。容克大地主大量加入垄断工业企业和银行业，例如容克沙夫哥彻家族不仅占有西里西亚大量地产，而且还加入上西里西亚石煤开采，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垄断资本家则力图购置地产，挤入贵族行列，克虏伯家族成了克虏伯·冯·波仑·哈尔巴赫男爵家族。正因为如此，容克阶级使整个德国的社会生活打上了它的烙印。半专制主义的统治形式和封建的意识形态继续保存着，普鲁士的军国主义精神渗透到各个政治领域，和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掠夺和扩张欲望结合在一起，给德国垄断统治的残酷性带上强烈的军事色彩，因此，列宁指出，德国帝国主义是具有现代化资本主义技术和高度组织性的“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

德国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是德皇威廉二世和 1900~1909 年任帝国宰相的皮洛夫。他们对内加紧压榨劳动人民，镇压工人运动，对外推行争霸欧洲和世界的政策，准备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

“非常法”废除后没有几年，统治阶级又开始采用恐怖统治。1894 年，垄断资本家施图姆在议会中提出对社会民主党和工人运动采取公开恐怖的法案。1896 年，萨克森邦废除了普选权。保护工人的立法被废止，垄断资本家可以任意延长工时，对工人采取专横统治。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增强了，局部没收波兰人的土地交给德国人这样的法令也颁布出来。皮洛夫为了使容克增加收入，1902 年让帝国议会通过新的关税率，提高粮食入口税，使粮食和其他食品价格暴涨，加重了劳动人民的生活负担，而容克每年多获 12.5 亿马克的收入。

从 19 世纪 90 年代起，俾斯麦的“大陆政策”已被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所代替。威廉二世得意地解释他的“世界政策”就是向海外扩展殖民地，掌握制海权，争霸世界。德国统治集团叫嚷“缺乏空间”、“领土太小”，为重新瓜分殖民地制造舆论。1899 年 12 月，当时任外相的皮洛夫在议会中

公开宣称：“我们懂得，要是我们没有巨大威力，没有一支强大的陆军和强大的海军，就不会得到幸福……在即将到来的世纪中，德国人民不是当铁锤就是当铁钻。”他“要求建立一个德意志”，容克资产阶级要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拥有广大殖民地的帝国。从1891年起担任总参谋长的史利芬，90年代中期已开始埋头制订在欧洲东西两线作战的行动方案。海军元帅梯尔比茨要求建立强大舰队，同英国一决雌雄，实现“世界政策”。1898年和1900年两次通过造舰法案，疯狂建造大型军舰，加紧扩展海军。形形色色的要求向外扩张的殖民组织纷纷出现。1891年成立的泛德意志协会是最大的一个。它有27个分会，散布于欧洲、美洲、亚洲、澳洲。垄断资本家胡根堡、基尔道夫等是它的后台。这些沙文主义组织狂热地宣扬反动的人种优劣论，德意志民族优越论。在这方面，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年）的“超人”哲学和“强权”理论最为典型。尼采在他的主要著作《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权力意志》中鼓吹“超人”应该统治世界，“弱者必受强者奴役”，人生的基本原则是“求权力的意志”，“权力意志”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等谬论。尼采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恶毒的攻击，要求对外发动战争，说什么：“胜利就能使任何战争理由神圣化”。尼采的反动哲学和政治思想不仅完全适应德国帝国主义的需要，而且成为后来法西斯思想的前驱。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帝国主义向外扩张的矛头主要指向北非、亚洲（中国）、巴尔干和土耳其。1897年，德国强占了中国的胶州湾，进一步攫取在山东建筑胶济铁路及开采矿山的权利，引起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1899年，德国利用英布战争的时机，占领了太平洋上的萨摩亚等小岛。1900年，德国在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起义时特别疯狂，威廉二世在遣送德国军队到中国时所作的“匈奴演说”中狂叫：“不要宽恕，不要捉俘虏。谁要是落入你们手中，谁就是死亡。”此后，为了同法国争夺北非的摩洛哥，德国于1905年和1911年两次挑起摩洛哥危机，把欧洲推向战争的边缘。

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的重点之一是建造巴格达铁路。1903年，德国与土耳其正式订立条约，由德国资本家出钱修建。该铁路起自博斯普鲁斯海峡，经小亚细亚、巴格达直抵波斯湾，这样就把柏林——拜占廷（君士坦丁堡）——巴格达联成一气。这条所谓“三B”铁路不仅能使德国帝国主义控制整个土耳其和小亚细亚，而且可以从陆上威胁英国在印度和埃及的统治，成为德国帝国主义“向东方推进”的有力工具。

这一铁路，经过柏林（Berlin）、拜占廷（Byzantine）和巴格达（Baghdad）三地，地名都以“B”字开头，因而又称为“三B铁路”。

第三节 法国

(一) 19世纪晚期法国的经济发展和共和党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

19世纪最后30年，法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是比其他资本主义强国缓慢。尽管蒸汽机的功率增加了四倍多，生铁产量由110多万吨增加到420万吨，但它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的比重已经从第二位下降到第四位。

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除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之外，尚有以下几点：

(1) 法国工业中存在着大量小企业。据1906年统计，一至十人的小型工业企业占工业企业总数的93%强，而百人以上的大型工业企业却只占总数的千分之八弱。小企业比重过大，阻碍了新装备和新技术的采用。

(2) 小农户大量存在。1893年，拥有耕地不足5公顷的400万农户，占总农户的71%。19世纪末，小农的抵押债务增至250亿法郎。小农的大量存在和贫困，阻碍了农业机器和新农艺的推广应用，从国内市场、工业原料和资金积累诸方面限制了工业的发展。

(3) 普法战争中付出的50亿法郎巨额赔款，割让拥有丰富矿产的阿尔萨斯和洛林，成为法国经济发展缓慢的一个因素。

(4) 19世纪70年代之后，法国金融资本发展迅速，而工业资本相对削弱。1892年，法国出售的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达770亿法郎，而投入工商业的资本只有66亿法郎。投入国外的资本又大大超过投向国内的资本。1880年，资本输出额为150亿法郎，1890年增为200亿法郎。高利贷资本的发展是法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原因。

此外，法国政局动荡，也影响了法国经济的发展。

巴黎公社失败后，法国企图恢复帝制的势力还很猖獗。在国民议会中，保皇党分子占了三分之二的议席。他们分成三派：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他们虽各怀鬼胎，但却力图推翻共和，恢复帝制。天主教僧侣组成的教权派与之勾结，在农村进行恢复帝制的广泛宣传。于1871年8月31日担任总统的梯也尔，虽然自称是“老保皇派”，但他害怕巴黎公社革命的重演，也不敢骤然废除共和制，恢复帝制，而只能限于给共和政体以保守主义性质，保持一个“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这种态度仍不能适应急不可待地窥伺王位的保皇党人的需要。1873年5月，保皇党人迫使梯也尔辞职，抬出顽固的保皇党人麦克马洪继任总统，直接着手恢复帝制。他们定制了迎接国王的轿式马车，缝制了国王的礼服，只待迎接亨利第五登极。

恢复帝制是不得人心的，不仅广大劳动人民反对，资产阶级的多数也不能苟同。1875年1月，国民议会以一票多数通过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七年，由两院联席会议选举，连选得连任，总统拥有统帅军队，签订军事条约，任免高级文武官员，实施大赦等权力，此外，总统经众议院同意还有权任命内阁，经参议院同意，有权解散众议院。总之，总统拥有很大的权力。

议会采取两院制，由参、众两院组成，众议院议员600人，四年改选一次，形式上由所谓普选产生，但又规定成年男子须居住一定地区六个月以上，才享有选举权。劳动人民，辗转谋生，流徙不定，居住条件的限制往往剥夺了劳动人民的选举权。众议院有创制法律之权，内阁对众议院负责。参议院

由 300 人组成，实行间接选举，先由地方自治机关选出选举人团，再由选举人团选出参议员。参议院权力很大，有权复议和批准众院创制的法律，可会同总统解散众议院。

1875 年宪法，是一部保护有产者利益的宪法，是保皇派和资产阶级共和派妥协的产物，但它终于从法律上使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确定下来了。

共和政体并未因宪法的颁布而自然巩固下来。保皇党人麦克马洪还盘踞在总统职位上，保皇党集团在参议院中仍占多数，共和派只能控制众议院。1877 年夏，麦克马洪宣布解散众院，企图建立独裁。但这个图谋被人民的力量所粉碎，资产阶级共和派在新的选举中获胜。1879 年 1 月麦克马洪被迫辞职，两院共同推选共和党人格雷维任总统。同年 7 月 14 日，法国政府由凡尔赛迁回巴黎。

共和制的巩固是民主派，特别是工人阶级斗争的重大胜利。而共和制的确立，也为工人阶级未来的斗争提供了有利条件。恩格斯在 1877 年指出：“……不管目前法国的共和政府怎样被人瞧不起，然而，共和国的最终建立毕竟使法国工人有了一个基础，可以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并且在将来不是为他人的利益而是为它本身的利益进行战斗。”

在法国议会中，资产阶级党派很多；各党纪律极其松弛，党员随意脱党，另入新党，朝秦暮楚，视为常事。这种“多党政治”，是法国存在大量小企业、小农户在政治上的反映。各党之间的利害、冲突变幻莫测，时而互相勾结联合，时而分道扬镳，因而，内阁更选频繁，经常引起政府危机，1873 年至 1890 年的 17 年间就更换了 34 次内阁。法国的这种“多党政治”和英美的“两党政治”，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实质上一样，都是资产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

资产阶级共和党和保皇党斗争时，曾对人民群众许下了不少诺言，如按照民主精神修改 1875 年宪法；取消参议院；教会与国家分离；颁布大赦；实行累进税等，但执政以后，这些诺言大都束之高阁。

资产阶级共和党执政以后，分裂为两派：温和派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认为共和政体既已建立，目的已经达到，乃完全抛弃过去民主改革的诺言，此派以甘必大和茹尔·费里等人为领袖；激进派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标榜一些民主的主张，以此骗取工人和农民的支持，削弱工人阶级的革命斗志。激进派于 1881 年选举时，提出了独立竞选的政纲，获得了 46 席。激进派的领袖为若尔日·克雷蒙梭（1841~1929 年）。但在 1902 年以前，法国一直由温和派共和党执政。

温和派共和党推行有利于大资产阶级的政策，疯狂进行殖民扩张。到 1900 年，法国的殖民地面积，超过其本土的 20 倍。这一政策的主要执行人是两度担任总理（1880~1881 年，1883~1885 年）的茹尔·费里，他曾直言不讳地说：“对于富强的国家来说，殖民地是最有利可图的投资对象之一。”在非洲方面，法国于 1881 年强占了突尼斯，并把塞内加尔、上几内亚、刚果、象牙海岸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1895 年发动征服马达加斯加的殖民战争，取得了对该岛的保护权。在亚洲方面，完成了对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占领，1897 年迫使清政府声明海南岛不割让给他国，1899 年强租广州湾，1900 年参加“八国联军”，血腥屠杀中国人民。

温和派共和党执政时期，统治阶级上层贪污腐化，政局动荡，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具体表现在下面三个事件上：

第一是布朗热事件。80年代末，温和派共和党的反动政策，引起人民群众的广泛不满。前陆军部长布朗热利用这一形势，煽动对德复仇主义，准备发动政变，实行军事独裁。他既同激进派调情，又和保皇党、天主教僧侣暗中勾结。1889年巴黎补选中，布朗热得到约二十五万票。他的党羽等候他发动政变，向爱丽舍宫进军。但共和派揭露了他同保皇党人联系，接收保皇党人资金的行径。政府决定以阴谋破坏共和国安全的罪名逮捕布朗热。布朗热逃亡比利时，被缺席判处无期徒刑，1891年9月在布鲁塞尔自杀身死。

第二是“巴拿马丑剧”。法国共和派政府和其他任何资产阶级政府一样，贪污、受贿是其本色。法国殖民主义者、开凿苏伊士运河的建筑师斐迪南·黎塞普，1879年又组织股份公司，开凿巴拿马运河，80年代末，公司发行30亿~40亿法郎的股票，渴望发财的法国小资产阶级争先恐后，把股票抢购一空。1888年，公司被投机分子吞没和浪费大量金钱之后，宣告破产，巴拿马运河工程半途而废。在破产清理财产过程中，1892年底和1893年初，揭露出公司曾对政党领袖、达官贵人行贿的秘密，其中连资产阶级激进派领袖克雷蒙梭，也在受贿之列。受贿者虽然罪行铁证如山，但几乎全部被法院宣告无罪。震动全法国的“巴拿马丑剧”使资产阶级威信扫地，工人群众纷纷脱离激进派而转到社会主义方面。保皇党残余分子曾企图利用这一个受贿案推翻共和政体，但被人民识破，阴谋未能得逞。

第三是德雷福斯事件。1894年发生了一个案件：有一法国军官把法国的军事秘密出卖给德国驻巴黎的使馆武官。不久，共和党政府毫无根据地逮捕总参谋部犹太籍炮兵尉官德雷福斯，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他无期徒刑。反动军官和沙文主义者乘机掀起反犹太人运动，煽动对德战争。1897年一个少校军官艾斯特加齐被证实是真正的罪犯。但是政府不肯承认错误，拒绝为德雷福斯平反。这就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并且围绕这一案件形成了两派，一为德雷福斯派，一为反德雷福斯派。前者要求政府公布此案的真相，并且立即释放德雷福斯，站在这一派方面的有工人和进步知识分子。后者硬说德雷福斯有罪，并且说什么替他辩护有损法国军队的“光荣”等等，站在这一派方面的是保皇党人、教权派及反动军人等。他们甚至想举行政变，推翻共和国。在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到1899年政府不得不重新审理了这个案件，并且宣判德雷福斯无罪。

（二）19世纪晚期法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巴黎公社失败后，法国工人运动遭受沉重打击。但工人阶级的力量很快恢复过来，到70年代末，工会和工人文化团体纷纷成立；罢工运动在巴黎和法国其他城市中开展起来；保尔·盖德和保罗·拉法格，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展开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的活动。

保尔·盖德（1845~1922年）真名为马迭埃·巴齐尔，出生于教师家庭。在第二帝国时期，他强烈反对波拿巴帝制，向往共和政体，在普法战争初期，曾在一篇文章里公开写道：“应当进军的地方不是边境，而是爱丽舍宫”。巴黎公社期间，他拥护公社，痛斥凡尔赛刽子手。公社失败后，盖德被迫流亡到瑞士和意大利。他早年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1876年回到法国，读

到马克思的著作，开始抛弃无政府主义的错误观点，向马克思作了自我批评。1877年11月创办《平等报》，刊载了马克思《资本论》的某些章节，宣传社会主义思想。

保尔·拉法格(1842~1911年)出生于古巴，1851年迁居法国。第二帝国时，拉法格曾因反对拿破仑三世政权，被巴黎大学开除，流亡英国。后来，和马克思相识，参加了第一国际。拉法格于1868年回到法国，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进行顽强的斗争。他是巴黎公社事业的坚决支持者和捍卫者。公社失败后，他在西班牙创办《解放报》，揭露巴枯宁派的阴谋，并与之进行坚决斗争。拉法格先后发表了不少重要著作，列宁认为他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有才能的、最渊博的传播者之一”。

1876年和1878年，法国各种工人团体，在巴黎和里昂先后召开过两次代表大会，1879年又在马赛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在盖德和拉法格领导下，马赛大会通过决议，声明拥护社会主义原则，拥护生产手段的社会化，指出无产阶级应从事政治斗争，并决定建立“工人党”。

1880年11月，在哈佛尔党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党的纲领。哈佛尔纲领是盖德和拉法格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导下写成的，马克思并亲自口授纲领的总纲部分，指出：工人阶级必须“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剥夺资本家阶级，把一切生产资料全部归还给社会”。又指出：生产者占有生产手段只能以集体占有形式，并且是“生产阶级——有特殊政党组织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的结果”。但在纲领的实践部分盖德和拉法格未能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指示，因而有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如要求将资产阶级国家中的所谓“国有企业”转让给工人阶级，这是一种不能实现的幻想，这种要求反而分散了工人阶级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革命斗争的力量，此种观点尚未摆脱路易·勃朗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尽管如此，在当时历史阶段，哈佛尔纲领基本上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

法国工人党成立后，一些小资产阶级活动家参加了党，形成了以布鲁斯和马隆为首的“可能派”。他们反对党纲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主张工人阶级的活动应局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办到的范围之内，因而被称为“可能派”。他们幻想和平过渡，极力主张工人阶级只要在地方自治机关——市政府中争取多数席位，无须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就可以在全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当时基本上执行正确的无产阶级路线的盖德派对“可能派”展开了斗争，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两派分裂，以盖德、拉法格为首的少数派毅然退出大会，在卢昂召开了自已的代表大会，并且保存了“法国工人党”的名称。而“可能派”另组“社会革命党”，他们取消了工人党纲领中的革命要求，拟定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纲领。

工人党在80、90年代支持和领导了几次法国工人的大罢工。1886年爆发了德卡斯维尔矿工大罢工，工人们抵抗反动军警的镇压，坚持斗争几个星

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的葬礼上发表的演说》（1911年11月20日[12月3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第386页。

保尔·布鲁斯（1844~1912年），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曾参加巴黎公社革命，后流亡国外追随无政府主义者。80年代后成为法国右倾机会主义的“可能派”的首领。

贝努瓦·马隆（1841~1893年），第一国际会员，巴黎公社委员。巴黎公社失败后流亡到意大利、瑞士等国，追随无政府主义者。80年代后成为法国右倾机会主义的“可能派”的首领。

期。工人党为捍卫工人的权利而斗争，拉法格以“乱管闲事”的罪名被捕。1891年，法国工人准备以罢工示威来庆祝五一劳动节，工人党派拉法格到北部毛纺织业中心弗尔米城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在五一节游行时，警察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弗尔米工人，九人死难，三十多人受伤，拉法格被捕并被判监禁一年。但在补选中，他以压倒多数票当选为众议员。1892年，卡尔莫矿区爆发了长达三个月的政治罢工，让·饶勒斯热情地支持了这次罢工。

工人运动的高涨，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使盖德派在议会选举中获得胜利。1893年，工人党在众议院中有12名议员，“可能派”和布朗基派合在一起也有12席。盖德派被选举胜利冲昏了头脑，觉得只要通过议会选举，无需暴力革命，就可以取得政权。他们为了争取议会议席，不惜对机会主义作原则性让步，同米勒兰领导的“独立社会主义者”结成议会党团。

第四节 英国

（一）英帝国主义是殖民帝国主义

由于生产和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而形成的垄断组织，早在 70 年代就在英国出现，但只是到 90 年代，垄断组织才大量出现。到 1902 年年底，英国已有 57 家托拉斯和其他形式的垄断组织。在军火和造船工业中出现了著名的阿姆斯特朗—惠特沃斯公司和维克斯—马克西姆公司。它们不但生产军火，建造军舰，而且有自己的钢铁冶炼厂和金属加工厂、机器制造厂等。在冶金工业中出现了纳德福特公司、鲍尔温公司、约翰·布朗公司等大冶金联合企业，它们拥有从煤矿、铁矿、炼焦、冶铁、炼钢、轧钢、金属加工直到造船等一系列工厂。在化学工业中，普特兰水泥联合公司控制了 80% 的水泥生产。盐业联合公司控制了 91% 的食盐生产。垄断组织已经支配了整个经济和政治生活。因此，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英国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

诚然，在 1871~1900 年间，英国工业生产继续有所增长。比如，在这 30 年中，煤的开采量增长了一倍以上，生铁产量及棉花消耗量均增长 50%。而且新兴工业部门发展得特别快，如化学工业、电气工业及发动机的生产等等。但是，如果与外国相比，英国相对地落后了，丧失了工业垄断地位。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 1870 年的 32% 下降到 1913 年的 14%。英国工业产值在 80 年代就被美国超过，在 20 世纪初又被德国超过。

英国工业发展速度缓慢的主要原因是：第一，英国是工业革命的母国，工厂已存在了百年之久，许多企业及机器装备都陈旧不堪。而当后起的国家采用新的技术及新的机器装备时，英国则依然使用旧机器装备，因为在资本家看来，拆毁旧的机器装备而采用新的机器装备，是不划算的。这自然影响工业发展的速度。第二，后起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工业，纷纷实行保护关税政策，这很不利于英国工业品的出口，从而影响了英国的工业生产。

正因为到帝国主义阶段英国工业发展速度相对地缓慢下来，所以英国对外贸易也发生变化：工业品出口减少了。在 1870~1900 年间，英国出口只增加 42%，而人口增加 72%。这就造成对外贸易上的入超。但是整个国际收支还是“顺差”，这就是说，从国外流入英国的货币比英国流出的货币要多，英帝国主义经济还是很繁荣的。这是因为在英帝国主义经济中，资本输出最为发达，英国资产阶级把资本投到国外工业中去，每年给他们带来巨额利润。而英国资本输出之所以发达，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英国是历史悠久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长期剥削国内工人、掠夺殖民地人民的结果，也由于长期垄断世界工业的结果，英国资产阶级积累了巨量过剩资本，这就使得他们有可能把过剩资本输出国外。第二，英国有广阔的殖民地，而殖民地是资本输出的最好的对象，因为殖民地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劳动力便宜，原料价格低廉，从而工业利润大。例如印度黄麻厂给英国厂主带来 100% 的利润，很少低于 20%。

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英国的资本输出占世界第一位，超过了法、德两国。到 1910 年为止，英国资产阶级在国外的投资达 37 亿英镑，而法国则不超过 18 亿英镑。在第一次大战前的几年中，英国在殖民地及国外的每年投资额与在本国的投资额是六与五之比。资本输出给英国带来惊人的利润，仅 1912 年就达 1.76 亿英镑。

占世界首位的英国航运业也给英国带来巨额的海外收入。1913年英国造船厂所建造的船只，总排水量达193.2万吨，为美国的七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英国旗帜下航行于大西洋的船只几乎占世界总吨位的一半。

但是，英帝国主义的繁荣是建立在对殖民地的榨取上面的。英国是当时最大的殖民帝国，拥有的殖民地比任何列强都要多。1876年英国殖民地领土总面积为2250万平方公里，人口为2.52亿；到1914年，殖民地人口已达4亿了。1876年英国本国的面积只有24.4万平方公里，为殖民地的1/92，同年本国人口为2970万，为殖民地人口的1/8。英国的殖民地遍于全世界，所以有“日不落国”之称。由于拥有这样广阔的殖民地，统治了这样多的殖民地人民，英国资本输出才达到最大的规模，才造成英帝国主义的繁荣，所以列宁称英帝国主义为殖民帝国主义。

（二）19世纪晚期英国两党制度。对外侵略的加强

19世纪晚期，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仍旧是英国的统治阶级。随着垄断资本及资本输出的发展，大资产阶级的财富日益增长，地位上升。而地主阶级中间有一部分人的地位下降了，这是因为这个时期美国粮食大量入口，国内粮食价格猛降，使他们的收入减少，这就破坏了他们的经济基础。但是另一部分地主的经济地位还是很坚固的，因为：第一，有些地主在城市里拥有土地所有权，城市的建筑物及工厂厂房的地皮都属于地主，随着城市的发展及繁荣，城市地租也不断抬高，这就增加了他们的收入。第二，英国有些地主也参加各种资本主义企业，这给他们带来巨量利润。第三，有些地主担任收入丰厚的政府要职。

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是通过两大政党——自由党与保守党——进行统治的。

保守党是以资产阶级化的大地主为其主要支柱，但是部分地也代表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自由党主要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和金融寡头的利益，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一部分资产阶级化地主的要求。因此，这两个政党都是资产阶级政党。19世纪最后30年间，这两大政党轮流执政，而没有出现第三党特别是代表人民利益之政党来威胁它们的统治。两大党在对待工人的态度上是一致的，那就是：主张用微小的改革及施以小恩小惠来缓和工人的斗争，以期使工人离开反对资本的革命道路。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两大党分别代表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集团的利益，它们在纲领主张上也有不同之处。在经济政策上，保守党强调由国家干预经济，反对自由贸易。自由党则恰恰相反，坚持主张自由贸易。在对外问题上，保守党人主张明目张胆地进行掠夺性的殖民扩张，而自由党则比较小心谨慎，力图精巧地掩饰英国殖民扩张的掠夺性。

不过，从总的方面来说，在加强殖民扩张政策上，两党是一致的。1874年至1880年保守党当政时期，夺取了苏伊士运河（1875年）和塞浦路斯（1878年）；而1880年上台的自由党在1882年占领埃及，并积极镇压苏丹马赫迪运动；从1886年到1905年长期执政的保守党（1892~1895年中断三年）完成了对苏丹的征服，发动了英布战争，把布尔人的两个国家——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共和国合并为英国领土。

这个时期英国之所以疯狂扩张，除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

过渡这一总的趋势外，是要夺取更多的殖民地以弥补失去世界工业垄断地位后工业资产阶级利润的减少，并以从殖民地夺取的超额利润来收买上层工人，缓和工人阶级的反抗。英国侵略殖民地的急先锋罗得斯在出席伦敦东头失业工人的集会，听到了工人要求“面包”的愤怒的发言后，他比以往更加相信帝国主义政策能够解决“社会问题”。他说：“帝国是一个关系面包和黄油的问题，假使你想避免内战，你就要做一个帝国主义者。”

（三）工人运动的进步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

50年代初宪章运动失败后，英国工人运动走向低潮，社会主义运动也在工人中间消失了。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70年代末。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个时期英国上层工人和工人群众在不同程度上分沾了英国资产阶级从垄断世界工业中得到的超额利润。但是从70年代英国丧失工业垄断地位时起，英国工人阶级不再享有上述好处了。英国资产阶级在世界市场上遭到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排挤，因而蒙受很大损失，为了弥补这个损失，他们便向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进攻。于是，英国工人地位恶化了。因此，从80年代初起，工人运动出现新的进步气象，社会主义运动又复活了，甚至在先进工人中间还有成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尝试。

当然，英国工人运动的这个新发展，也与下述情况有关。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马克思写的《资本论》教育了英国的先进工人，如海德曼就是由于读了《资本论》而转变成为社会主义者的。恩格斯于80年代初在英国工人刊物上发表的几篇重要文章也起了推动作用。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不应该把斗争的目标局限在工资和劳动时间上，而应为推翻雇佣劳动制度本身而进行斗争；为了达到消灭资本主义的目的，工人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这对于那些渴望进步的、有思想的工会运动者发生了重要影响。比如，青年工人詹姆士·麦克唐纳就是由于受到恩格斯的启发而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的。第二，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风行一时的土地改革运动也是促进社会主义复兴的原因之一。1879年美国人亨利·乔治写的《进步与贫困》一书曾引起许多人的注意。他把土地国有看成是医治资本主义一切罪恶的“万灵膏”，并且主张用征收高额土地税的办法实现土地国有。这种理论起了反动作用，因为它吸引工人离开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但是，对于大多数未来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土地国有的思想是他们……走向社会主义的中途站”（莫尔顿等人语）。对汤姆·曼恩说来就是如此。据他回忆说：他曾“狼吞虎咽地读了亨利·乔治的书”，他之所以在思想上倾向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本书，因为他在读了这本书之后，感到不仅把土地，而且也有把机器和资本变为公共所有的必要性。

社会主义运动复兴的最重要的表现，便是社会主义政治组织的出现。1881年社会民主同盟诞生，其创始人为亨利·迈尔斯·海德曼，参加者多半是工人。同盟在创立时，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其纲领也是社会主义的，它要求把土地、铁路、银行及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海德曼是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先驱，他写了许多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虽然拥护社会主义，但是反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提出资本主义自动崩溃说，认为资本主义将在经济危机中自动崩溃，那时工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掌握生产资料了，这些生产资料将“从地主和资本家的无能的手

中掉下来”。可见，海德曼终究不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而且，他也犯了宗派主义错误，他不愿到工人群众中去工作，不支持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及提高工资的斗争，也不愿到工会中去活动。因此，在他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同盟并没有成为一个革命的工人政党。

1884年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组织——费边社。它在理论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而主张用“社会主义浸润自由主义”，即“渗入”自由党内部，从其内部影响它，使其转向社会主义。费边社虽然是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团体，但是后来有许多工人为了要研究社会主义也加入费边社的地方支部。

参加费边社的知识分子中间也有不少知名学者和作家，如肖伯纳、韦伯夫妇等。肖伯纳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剧作家，在他所写的《鳏夫的房屋》《华伦夫人的职业》《命运的宠儿》等剧本中，大胆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嘲笑英国上层社会的伪善和精神空虚的生活，以辛辣的笔调去讽刺英国统治集团的寄生性，等等，因而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社会主义运动重新兴起的同时，工会运动也出现欣欣向荣的气象。

19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会主要是熟练工人或上层工人的组织，它的活动只限于狭隘的经济斗争，甚至反对罢工。但是到80年代，非熟练工人也组织起来，他们成立新工会。新工会是在80年代末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中产生的。它比旧工会更富于战斗精神，它领导了多次罢工。但是，不久新工会的一些领导人，在旧工会影响下，也倾向于妥协，而丧失了原来的战斗性。

社会主义运动复兴及工会运动的进展，为英国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准备了条件。1893年工人阶级的政党——“独立工党”终于诞生了，这是社会民主同盟的一部分盟员和费边社的地方支部的成员创立起来的。其党纲把实现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作为斗争的最终目标，并且把争取八小时工作日作为最近的斗争任务。

独立工党的成立，是一个重大的发展，但是该党拒绝马克思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因而实际上是一个改良主义工人党。

总的说来，19世纪晚期英国社会主义、工会运动的成就是不大的。主要原因是：第一，英国统治阶级善于玩弄政治手腕，他们在政治及社会经济方面所进行的局部改革及调整，麻痹了许多工人的革命意志。第二，早在19世纪中期工人贵族就已占整个工人的15%。到70年代后，工人贵族更增多了，在一些主要的工业部门，工人贵族占20%。他们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了工人群众。

第五节 美国

（一）内战后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1861年到1865年的内战消灭了南方的奴隶制度，解放了黑奴，颁布了《宅地法》，推动了南部工农业和西部农业的迅速发展。奴隶制残余虽然以“分成制”的形式被保存下来，但黑人的生产兴趣远比在奴隶制下为高。由于奴隶制的废除和战争的破坏，种植园主的经济地位下降，独立小农的数量增加。许多种植园主不得不廉价出卖土地，地价由每英亩100美元下降到5美元。土地多半转到“贫穷白人”手中，他们从无地的人变成了小土地所有者。南方独立小农1860年只有37万个，1900年增加到136万多个。

黑人奴隶的解放和独立小农的增加，不仅推动了南方农业的发展，而且为南方工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大量劳动人手，扩大了商品市场。同时，由于奴隶制的废除，北方资本家开始把大量资本投入南方工业企业，南方一部分种植园主也把资本从土地转移到工业上去。因此，内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工业在南方蓬勃发展起来。到80年代末，南方生产的铁，比战前全国的产量还要多。70年代初，南方只拥有50万枚纱锭，15年后已增加到200万枚。

内战期间颁布的《宅地法》为西部农业的发展创造了前提。尽管《宅地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实行《宅地法》后，政府照旧大量出卖国有土地，并把大片土地赠给铁路公司），在实施中也出现许多舞弊现象，但它毕竟促进农业资本主义沿着“美国式道路”发展。在1868~1900年间，根据《宅地法》有60万家分到宅地，总面积达8000万英亩。领到宅地的劳动者变为独立的小农，从而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西部的繁荣。小农经济发展的结果，不可避免地发生阶级分化，广大农民趋于破产，一部分富裕农民采用农业机器和人造肥料，成为资本主义大农场主。1900年，美国全国大约有580万农户，其中资本主义农场还不到100万户，但他们所生产的农产品占全国总产量的52%。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粮食、原料、出口产品和广阔的国内市场。在1860~1900年间，美国两项主要粮食作物——小麦和玉蜀黍的总产量分别增长了两倍半和两倍，棉花增加了一倍半以上。1880年农产品在全国出口品中所占的份额达83%。美国成了世界市场上粮食和肉类的主要供应者之一。

用革命的手段消灭奴隶制度以及随之而来的西部和南部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对美国整个国民经济的起飞具有重要意义。当然，19世纪晚期美国资本主义工业的迅速发展还有其他原因：第一，美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煤、铁、石油的蕴藏量极多，还有一望无际的森林。第二，美国地理环境优越，东西有两大洋保护，北邻加拿大和南邻墨西哥都是弱国，因而美国很少遭受外敌入侵及战争的破坏。第三，美国资产阶级能够利用欧洲的投资，因而不愁没有资本来源。到1890年，欧洲对美国的投资达30亿美元。第四，欧洲移民源源涌向美国，1871~1907年间大约有两千万移民来到美国，他们多半是劳动者，因而美国资本家不愁没有劳动人手。第五，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科学技术的发展，因之19世纪晚期及20世纪初美国人完成了一系列重大发明及技术革新。当然，美国也利用欧洲的技术成就和生产经验，但是在70年代后，在总结欧洲的经验的基础上，美国人接二连三地完成新的发

明和创造。在 1860~1890 年间，政府颁发的专利证达 44 万份之多。第六，与拉丁美洲诸国不同，美国的政治是稳定的，从未发生过政变或政治上的动荡。这就保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得到发展。

19 世纪晚期到 20 世纪初期，是美国工业资本主义飞跃发展的时期，其发展的速度，是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少有的。1870 年美国生铁产量为 190 万吨，到 1890 年增至 1030 万吨。钢产量 1880 年为 120 万吨，到 1900 年为 1020 万吨，煤产量在 1870 年为 3310 万吨，1900 年为 26,970 万吨，棉花消费量在 1880 年为 157 万包，到 1898 年为 346.5 万包。

铁路的增长，更能说明工业发展的程度。在 19 世纪最后 30 年内，美国全境敷设了四条铁路干线：“联合太平洋”（1861 年）、“北太平洋”（1882 年）、“大北方”（1893 年）“芝加哥—圣保罗”干线。这个期间全国铁路长度增加了 14 万英里。

在运用最新科学技术成就的基础上，美国工业方面又出现许多生产部门——机床制造业、食品工业、化学工业、橡胶工业、电气工业和汽车工业。

随着内燃机的应用，对石油的需要量大增，这就有力地刺激了石油的生产。1870 年石油开采量为 2 亿加仑，1900 年增至 27 亿加仑。

整个说来，到 1890 年，美国的工业生产较之 1860 年增长了六倍，这一年美国工业产值达 94.98 亿美元，而同年英国工业产值为 42.63 亿美元，德国为 33.57 亿美元，法国为 29 亿美元。如果说在 1860 年美国工业生产在世界上占第四位的话，那末到 1894 年已跃居世界第一位。

（二）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组织的出现

19 世纪晚期，美国工业资本主义飞跃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资本和生产集中的过程。在美国，资本和生产的集中过程，比其他国家更为迅速，更为猛烈，其中充满了欺骗、暴力及其他不正当的行为。

早在内战期间，美国大商人和工业家就利用战时的困难，通过投机倒把和盗窃国家财富等卑污手段而发了大财。工业家在供应军队方面，任意抬高价格，甚至把伪制品卖给政府。有的人用低价收购政府的废品，然后又以高数倍的价钱卖给政府，转手之间，取得暴利。内战后，铁路公司靠土地投机也积累了大量财富。政府在实行《宅地法》之后，照旧把大量国有土地赠送给私人铁路公司。“联合太平洋”铁路从政府领到 2000 万英亩的土地，圣他非铁路领到 1700 万英亩的土地。政府为了支援铁路建设而拨给的土地，一共达 158,293,377 英亩，相当于法、德两国的总面积。实际上，政府所赠予的土地，远远超过修筑铁路的需要量。这就使得铁路公司通过土地投机而大发横财。每当铁路通车地价高涨时，铁路公司便把铁路两旁的剩余土地高价出卖。有时，铁路公司出卖土地所得的钱，比修筑铁路所用的钱还要多得多。“北太平洋”铁路的修筑费一共才 7000 万美元，然而公司由于出售土地而得到的收入却超过 1.36 亿美元，而且还有大量土地尚未出售。有的企业主为了发财还采取了野蛮的暴力手段。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时常派出暴徒用炸药把自己的竞争者的企业或油田炸毁或烧毁，为的是垄断石油价格。

资本集中的程度，从下列数字中可以得到证明。从 1890 年到 1900 年，美国企业的数目从 40 万减至 20 余万，而在这些企业中的投资，在同一时期内则从 65 亿增加到 90 亿美元。

资本集中的结果，到 19 世纪 70 年代已经开始出现垄断组织。1870 年成立的美孚石油公司是最早的托拉斯组织。到 80 年代，特别是 90 年代，又产生了一系列其他联合组织和托拉斯。1884 年成立纺织业托拉斯，1887 年成立制铝、酿酒和制糖托拉斯以及制革、烟草等业的托拉斯。糖业托拉斯是 19 世纪末美国最大的垄断组织之一，它控制了美国 90% 以上的糖厂，这些糖厂遍布于波士顿、布鲁克林、费城、巴尔的摩、新奥尔良、波特兰及旧金山等大城市。托拉斯是高度集中的垄断组织形式，也是美国最盛行的垄断组织形式，因此列宁称美国为典型的托拉斯国家。到 1900 年，美国的托拉斯不下 800 家（铁路托拉斯还不算在内）。

银行资本的集中也很快，洛克菲勒的“花旗银行”的资本在 1889~1899 十年间，从 1800 万美元增至 12,800 万美元，即增加了六倍。银行资本与工业企业的融合也发生了。如洛克菲勒银行的董事就支配好些工商业大联合公司。金融寡头出现了，纽约市的华尔街的金融寡头可以向全国经济界发号施令。

（三）两党制度

早在内战前夕，美国就形成了两大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当时共和党是一个反对奴隶主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北方工业资产阶级领导的，有广大工人、农民参加的政党。民主党则是南方奴隶主以及与他们有经济联系的北方大资产阶级的联合组织。因此，共和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而民主党则是一个反动的政党。但是内战结束后，特别是 70 年代随着垄断组织的形成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发展，这两个政党的阶级基础发生了变化。共和党成为与工农大众对立的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民主党，则由于奴隶制度的废除，南方开始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就成为资产阶级化的南方大种植场主、富农和南方资产阶级的政党了。这样一来，民主、共和二党成为代表资产阶级内部两个不同集团利益的政党，从而两大党的基本差别消失了。两党只是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如关税问题（共和党主张保护关税，民主党强调自由贸易）、争夺肥缺的问题上有所争吵，而在根本问题上，如在镇压工农运动、为垄断资本家谋利及对外侵略等问题上，则步调完全一致。这样，到 19 世纪晚期，美国终于形成了“两党制度”。

在“两党制度”下，共和、民主两党轮流执政，垄断政权，代表进步力量的第三党没有上台的机会。这是因为：第一，这两大党背后都有大资本家撑腰，从他们那里得到金钱上的帮助。如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就经常捐出巨款给共和党作为活动基金。在这个情况下，这两大党就可以靠雄厚的财力掌握报纸、电台等宣传工具，并且在竞选时还可以拿出一大笔经费去贿赂选民。比如，在印第安纳州，1880 年每张选票可卖 20~70 美元。第二，在美国，成立第三大党是很困难的，因为各州的法律对于成立新的政党有各式各样的限制，对于第三党的活动也加以种种阻挠。第三，两大党都善于玩弄手腕欺骗选民。比如在共和党当政时，在野的民主党便大肆攻击政府，把自己装扮成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把大批不满政府的选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假如民主党上台，则共和党也扮演同样的角色。这样就有力地阻碍了第三党的出现，即使出现了第三党，它也难于在竞选中获胜。

从本质上来说，这两大党都是垄断资本的御用工具。垄断资本通过这两

大党操纵全国政治。他们往往用贿赂手段去诱使立法机关通过有利于自己的法案。他们甚至为国会议员准备好法案的蓝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大资本家时常要花很高的代价。如“南太平洋”铁路每年就花费 60 万美元去行贿，以保持自己的特权。这家铁路公司的首脑亨廷顿曾直言不讳地说：“要办成任何一件事，都需要钱，我估计花 20 万元便可使我们的法律草案得以通过，不过我觉得这项草案值不得这么多钱”。“伊利诺斯铁路公司”一年内支出的贿赂及诉讼费，竟达 70 万美元之多。无怪乎一些进步的政论家曾经正确地指出内战后某几个州的立法机关已成了铁路和其他公司的特种委员会了。

垄断资本的巨头们还把自己的代理人直接安插到政府机关里面去。如美孚石油公司的一个代表曾用 6.5 万美元购买选举人的选票，使他的父亲当上参议员，以便在参议院中为美孚公司谋利。此外，如参议员阿德里治、狄飘、艾尔金斯等人都是大企业派到参议院中的代理人。甚至美国的总统也变成大企业集团的傀儡，如麦金莱总统（1897 ~ 1901 年）就是洛克菲勒金融集团一手扶上总统宝座的。克利夫兰总统则是在摩根集团的支持下上台的。

两大政党不但是垄断资本手中的工具，而且也成为政客们追求官职的手段。所谓“分赃制”便是两党政治的产物。每当一个政党在大选中获胜上台执政时，便在自己的党徒中分配战利品，把在竞选中出过力的人安插到政府机关中去，同时把原有的官吏一律撤职。针对这个弊病，国会在 1883 年通过“文官制度条例”（即潘迪顿法），该条例禁止按照竞选期间在政治上的效劳来分配公职，而规定了文官考试的办法。但是这项条例并没有起任何作用。1885 年民主党上台后，有 10 万名共和党官员就在一个早晨全被免除职务，而由民主党人取而代之。

19 世纪末，针对工人反对资本的斗争的加强，统治阶级实行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军事官僚国家机器的措施。在 19 世纪 70 年代以前，美国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军事镇压机构。各州实行民兵制度，发生暴动时由各州担任镇压的职责。而且宪法还规定：联邦军队只有在州长请求下方能调到各州去镇压暴动。在 1877 年发生铁路工人大罢工时，各州民兵拒绝向工人开枪。美国资产阶级从 1877 年事件中认识到：美国的国家机器对他们来说显得不够完善，无力镇压工人运动，因而要求建立一个维护资产阶级利益更为有效的国家机器。不久，国会就通过决议，规定今后各州州长可以从联邦政府领取武器。同时，参谋本部也重新配置了国内武装力量，实行定期的军事演习。总统权力也加强了，在某一州发生暴动时，总统不管州长要求与否，均有权调联邦军队到任何暴动地点去。在 1894 年发生著名的普尔曼罢工事件之后，陆军参谋本部更决定改组陆军，并且增加了各州的地方民兵员额，把他们按正规军队的形式加以改组，以增强镇压力量。

在加强国家机器的同时，美国资产阶级又采用欺骗手法，以图缓和劳动人民的反抗情绪，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19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托拉斯的肆无忌惮的压迫，引起了工人、农民以及小业主的愤慨，一个群众性的反对托拉斯垄断的运动兴起了。善于看风使舵的两大资产阶级政党，都不得不在自己的纲领中列入了限制托拉斯的要求。1890 年，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通过了所谓“谢尔曼取缔托拉斯法”。在字面上，谢尔曼法规定，不论是托拉斯或其他形式的任何联合，还是旨在限制工商业或自由竞争的任何协定，均属违法，法庭得提出起诉并课以罚金。资产阶级制定这项法律，是想用反托拉斯的姿态来缓和群众的反抗情绪，而同时又不认真执行关于反对或

限制托拉斯的规定，因此谢尔曼法并未能阻碍托拉斯的活动，也没有妨碍新的托拉斯的出现。在通过该法案后的一年中，就又成立了 157 家工业联合组织，其资金总额高达 31.5 亿美元。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却利用谢尔曼法去反对工人运动。1892 年新奥尔良发生了总罢工，法庭便对领导这次总罢工的 44 位工会领袖提起公诉，理由是：工会是一种以“限制工商业为目的”的联合，罢工妨碍了“出卖劳动力”方面的自由竞争，因而违反了谢尔曼法。在 1892~1896 年这五年间，对工人组织的起诉案共有五宗，每次都援引了谢尔曼法，其中只有一宗案件的处理是对工人有利的。

两大政党按照宪法的规定，遵循选举的程式，定期轮流执政，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两大政党轮流执政固然充满了对于选民的欺骗，但是通过选举获胜上台的政党也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履行竞选时的诺言，因为不这样做，在下次竞选时就要遭到选民的唾弃。

(四) 19 世纪晚期的工人运动

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硬说美国是一个“例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存在着“永恒”的繁荣，工人生活水平很高，因此在美国没有工人运动发展的余地。但是，事实上恰恰相反，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在美国同样存在，因而阶级斗争同样尖锐。

到 19 世纪下期，美国仍没有任何劳工立法，工人劳动时间甚长，最多达到每天 14 小时。从 1873 年到 1880 年，纺织工人的工资下降 45%。危机年代，大批工人由于失业而被抛向街头。失业工人白天在垃圾堆中觅食，夜里在水泥地上栖身，冬季来到就靠废旧报纸遮身，聊御风寒。

1873 年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在三年内就有两万家企业和银行倒闭。全国人口 4000 万人，失业工人就达 300 万人，加上家属，共有 1000 万人挣扎在饥饿线上。同时，企业主还拼命压低在业工人的生活水平，迫害工人组织。这一切便激起了工人的罢工。规模最大的便是 1877 年铁路工人大罢工。有 17 个州的铁路工人都卷入罢工的浪潮。罢工的序幕是弗吉尼亚州西部马丁斯堡的铁路工人于 7 月 17 日揭开的，接着罢工风潮很快地就扩大到其他地方。7 月 21 日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发生了罢工工人与军队之间的战斗，有 1 万名工人拿起石头袭击手持刺刀的士兵。结果有 15 名工人惨遭杀害，25 名工人受伤。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发生的罢工规模最大，这次罢工很快地就发展为起义。罢工工人赤手空拳向军队猛扑，夺取士兵手中的武器及大炮，最后占领了全城，军队狼狈逃走。总统海斯赶忙派 3000 军队前往镇压，1877 年的轰轰烈烈的工人大罢工便被淹没在血泊里。在这次总罢工中，惨遭屠杀的工人达 300 名以上，受伤者有 1000 人，被捕者也有数千人之多。

统治阶级在用血腥手段镇压了大罢工之后，满以为此后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未过十年，美国工人在“八小时工作制”的口号下又掀起了新的斗争浪潮。1886 年 5 月 1 日，全国举行总罢工，参加者约有四十万人。在若干城市，罢工工人与警察发生冲突。5 月 3 日，在芝加哥工人集会的时候，警察向工人开枪，当场打死了六名工人。这个暴行引起了工人的莫大义愤，芝

如 1892~1896 年间发生的五宗对托拉斯违法联合的起诉案中，就有四宗是以完全对大公司有利的办法了结的。

加哥《工人报》散发传单，号召工人为死者复仇。5月4日晚，工人群众在“干草市场”召集大会，强烈地抗议政府的暴行。当大会正在进行之际，政府暗中派来的挑拨分子向会场投掷炸弹。警察立刻借口“炸弹案”进行镇压，当场打死数人，打伤二百余人，另外还逮捕数百名工人，其中有八人于1887年夏在芝加哥法庭受审。他们是：巴尔逊斯、史皮斯、恩格尔、费色、费尔登、许瓦布、林格、聂培。审判的结果，有七个人被判处死刑，一人（聂培）被处徒刑。在审判中，工人领袖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史皮斯在法庭上愤怒地揭露统治阶级的暴行和卑鄙手段。他说：“法官阁下，在这个法庭演说时，我是以一个阶级的代表来对另一阶级的代表讲话的。……如果你们以为，用绞死我们的办法，就能摧毁劳工运动……那末就绞死我们吧！你们可以在这里踩熄一个火花，但是，在那里，在你们的后面和前面，到处都会燃起火焰。这是来自地底的烈火，你们是不能把它扑灭的。”

这个判决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抗议。英国、法国、意大利、俄国、西班牙、荷兰等国的工人纷纷举行集会，反对对工人领袖的死刑判决。在美国，从大西洋沿岸到太平洋沿岸，到处举行工人群众的抗议集会。在来自国内外的强大的压力下，芝加哥的法庭不得不让步，把费尔登和许瓦布的死刑判决改为无期徒刑。巴尔逊斯、史皮斯、恩格尔和费色等四人（另一位领袖林格已在狱中自杀）在1887年11月11日英勇就义。

到90年代，美国工人运动的突出表现便是1894年的普尔曼车厢工厂工人大罢工，罢工是由于厂方一次又一次减低工资所引起的。罢工波及了许多铁路，有23条铁路线被卷入罢工浪潮之中。许多城市的交通运输都中断，因之物资的供应也断绝了。在资本家的要求下，克利夫兰总统悍然派军队前往镇压，有12个工人被惨杀，有50多个工人受伤，700多工人被逮捕。

19世纪最后30年间，在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中，工人组织和社会主义组织也纷纷出现。“全国劳工协会”，成立于1866年，领导人是铸铁工人威廉·席威思。协会拥护第一国际的原则，提出了男女工人同工同酬的主张，欢迎黑人工人参加协会。但是，席威思于1869年逝世，由于失去了强有力的领导人，这个协会到1872年就瓦解了。劳工骑士团出现于1869年，它最初是裁缝工人的秘密协会，后来其他行业的工人也参加进去。该团体的秘密性质妨碍了它的进一步发展，到1878年开始转入公开活动。劳工骑士团虽然是由非熟练工人组织起来的，但是它强调工人队伍的团结一致，提出一个家喻户晓的口号：“一人受苦，全体分忧”，要求把全体工人都组织起来，以便把工人阶级从“大公司的暴虐统治”下解放出来，“消灭雇佣劳动奴隶制”。而且，它所提出的斗争目标也反映了广大群众的要求：男女同工同酬，禁止雇用14岁以下的童工，实施工人劳动保护法，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把西部国有土地只分配给真正的移居者，禁止把国有土地赠给铁路公司。因此劳工骑士团很快发展成为一个群众性组织，到1886年会员增加到七十万人左右。在它的领导下，80年代上期，工人在许多地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罢工斗争。

但是，劳工骑士团的纲领包含了错误的思想，它天真地主张通过和平手段去消灭雇佣劳动制度，要求国家把铁路、电报电信公司及私人银行从资本家手中赎买过来，希望用国家经营的企业和国家银行去代替私人企业及私人银行，认为这样就可以消灭托拉斯。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而且，劳工骑士团后来在机会主义者包德利的领导下，一步一步走上邪路。包德利主张协调劳资关系，反对罢工。1886年发生五一一大罢工时，劳工骑士团在包

德利的领导下坚持反对罢工。此后，这个组织在工人中间的威信日益低落。

70年代罢工斗争的发展，促成了美国工人政党的成立。1876年第一国际解散后，一些原来的国际会员在费城集会，决定建立美国工党，一年后更名社会主义工党。第一国际会员内部的分歧被带进了该党，使之形成为两派，一派是以左尔格和奥托·魏德迈为首的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另一派是以凡·帕吞为首的拉萨尔主义者。党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把第一国际的原则写进纲领，积极参加了70年代的罢工斗争，发行了24种报刊，在25个州内发展了1万名党员。但是，拉萨尔主义者的影响也日益增大，在党内占了优势。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十分关心，不断地对左尔格、魏德迈等进行热情帮助，耐心教育，要他们克服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当时，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德国移民，他们到美国后，只在德国移民的小圈子里活动，不去和当地工人打成一片，甚至不学当地语言，不说英语。他们满足于把欧洲工人运动的组织形式、斗争方法、口号和纲领照抄照搬到美国工人运动中去。为了帮助他们，马克思和恩格斯郑重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并且不倦地号召美国的社会主义者深入工人群众，参加工人的日常斗争；在组织上把工人团结起来，在思想上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启发工人群众的觉悟，使工人群众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和美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但是，社会主义工党始终未能克服宗派主义，以致越来越远离了美国工人运动。

由于社会主义工党未能把美国工人运动领导起来，所以到80年代后期，美国劳工联合会成为工人运动中的重要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以下简称“劳联”）成立于1881年。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工人组织，“劳联”在其存在初期，对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因为在资产阶级加紧进攻的条件下，工人力量的团结无疑是一种进步。“劳联”在其纲领序言里，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性及二者之间的斗争的不可避免性。它写道：“当此文明世界中各国的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正在各国国内进行斗争的时候，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斗争必将一年比一年尖锐化，必将对各民族中千百万劳动人民产生极为惨痛的后果，如果他们不为了互卫和互利的目的及时联合起来的话。”

但是这个在成立初期具有一定的战斗性的组织，不久便在工联主义者龚伯斯的领导下，变成为工人贵族的组织。龚伯斯等领导人在实质上成为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中间的代理人。他们公开反对阶级斗争的思想，主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作。“劳联”在他们的领导下，拒绝非熟练工人及半熟练工人参加组织，特别是拒绝黑人工人参加。因此，到1900年，它的会员人数只有58万人，而当时全国产业工人已达750万人。

“劳联”领导集团的机会主义倾向最明显地表现在对于罢工斗争的态度上。1894年发生普尔曼罢工时，有25个工会的代表会议在龚伯斯的影响下拒绝援助罢工。

总的说来，这个时期美国工人运动比起欧洲诸国来说，是落后的。在美国没有形成群众性的、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政党，美国工人阶级主导的组织形式不是政党，而是工会。此外，在美国大多数工人斗争只带有经济性质。阻碍美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原因可以举出以下几点：第一，美国有广大的西部国有土地，在整个19世纪的过程中，它一直吸引美国工人离开城市而到西部取

得土地，变为独立的农民。这就决定了美国工人队伍的不稳定性，从而影响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战斗精神。第二，美国工人阶级中的民族成分复杂，其中有欧洲移民，有亚洲移民，也有黑人。这种情况使得资产阶级便于制造工人的分裂。第三，美国资产阶级收买工人阶级的上层——熟练工人，给他们以较高的工资，因而在美国也形成了工人贵族。工人贵族便是培养机会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思想的温床。第四，到 19 世纪晚期，美国国内存在的资产阶级的形式上的民主，如男子普选权、集会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等以及《宅地法》的实施，都被资产阶级巧妙地加以利用，以此在工人中间培养这样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有可能解决工人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

（五）农民运动

美国资产阶级政府在内战期间颁布的《宅地法》虽然是一项进步的措施，但是《宅地法》在实施过程中出现许多弊病，以致领到宅地的劳动人民为数并不很多。在 1868 ~ 1880 年间分配的宅地一共才有 6500 万英亩，而仅到 70 年代初为止，政府赠给铁路公司的土地却达到 21,500 万英亩之多。而且领到宅地的劳动人民由于穷困而借债，往往不得不抵押自己的宅地，70 年代，西部就约有四分之三的农场被抵押出去。农产品价格不断下跌，而工业品价格却不断上涨。铁路公司在运费方面实行歧视的政策：资本家运输大宗货物时，收取运费很低；而农民运输小宗货物时，则收取很高的运费。凡此种种，都引起了农民的极大不满，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早在 60 年代下期，农民就组织起来了，到处成立“农民协进会”。到 1874 年，农民协进会已发展成为大规模的组织，其会员增至 150 万人，有 21,967 个地方组织。在西部和南部，农民协进会最为壮大。农民协进会的要求主要是：限制铁路公司的货运价格，监督铁路公司的活动等等。伊利诺斯州的农民协进会曾于 1874 年发表《农民独立宣言》，号召农民以集体力量向各州政府施加压力，使其通过公平合理的法律，以保护农民的利益。在农民协进会领导的农民群众的强大压力下，伊利诺斯州政府颁布了法令，禁止铁路公司在运费方面实行歧视农民的政策。其他一些州也颁布了类似的法律。但是，各大铁路公司竭力逃避这些法令，并且最后在 80 年代迫使一些州政府以违宪为理由废除了这些法令。

由于农民协进会与资本势力斗争的效果不大，从 1875 年以后，就开始有大批农民脱离了这个斗争，其中有许多人参加了绿背纸币运动。绿背纸币是内战时期北方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由于大量发行的结果，绿背纸币越来越贬值。在这个情况下，工业资本家和银行家，为了保障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投资，扩大工业生产和加速国外贸易的发展，要求收回绿背纸币，建立稳定的金本位制。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要求，格兰特政府于 1875 年颁布了关于纸币兑换金币的法律，目的是从绿背纸币过渡到金币制。政府的货币政策对于广大农民说来是很不利的，因为农民多数是债务累累，只有在不断发行绿背纸币及货币贬值的情况下，才能顺利地偿还债务。因此，农民要求保留贬值的绿背纸币，反对实行金本位制。为了实现自己的要求，农民在 1875 年成立了“绿背党”。绿背党在自己的纲领中要求立刻无条件废除 1875 年法律，反对收缩当时流通中的绿背纸币。

参加这一运动的，主要是农民，后来，在一些地区，一些工会组织等也参加了，出现了工农运动合流的趋势。这种局面的出现，除了由于工人和农民都受到垄断资本的奴役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 1877 年铁路工人大罢工期间，农民对罢工工人极表同情，如罢工工人在斯克兰顿开办救济站时，附近的农民就自动地捐助马铃薯，支援罢工斗争，1878 年，一部分工会组织与绿背党合流，组成绿背劳工党，通过了党纲。党纲除了绿背党的要求外，还包括了一些工人的要求，如制定缩短工时的法令，废除与服役的囚犯订立劳动合同制度，设立劳工统计局等。绿背劳工党的成立，是绿背纸币运动的最高潮，在国会选举中，该党获得 100 万张选票，取得 15 个席位。

但是，从 1878 年以后，绿背纸币运动转入低潮，到 80 年代初就瓦解了。这是因为：第一，参加绿背劳工党的成分过于复杂，没有工人阶级领导，它的纲领和其他农民组织的纲领一样，基本上是一个经济纲领，而且只限于日常生活方面的一些要求，没有一套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其基本任务的革命性的纲领。资产阶级便利用了这一弱点。1884 年大选中，民主党用欺骗选民的办法，在它的纲领中列入了许多农民的要求。结果过去投绿背党的票的许多选民转而投了民主党的票。第二，1879 年以后，美国经济情况开始有所好转：欧洲发生饥馑，美国粮食出口大大增加，农民的收入也随之增加了。因为许多农民退出了绿背纸币运动。

不过，农民的情况好转只是暂时的现象。农民受到铁路公司、钱行、大谷仓所有人、商人以及其他经纪人的剥削并未减轻。1890 年，把农场抵押出去的农户为 88.7 万户，1900 年更增至 112.8 万户。这个数字占全国农户的三分之一。同时，佃农的数目也不断增加，到 1900 年，美国全国共有 200 万以上的佃农和分成农，占全部农户的 35%。

农民经济地位的下降，推动他们成立新的组织。1880 年在内布拉斯加州成立第一个“农民联盟”，接着北部诸州都成立了这样的组织。最后北方的这些组织又联合起来，成立了“全国农民联盟”（通称为“北方农民联盟”）。到 1890 年，参加“北方农民联盟”的农民在百万人以上。在南方也出现了“南方农民联盟”以及“全国有色人种农民联盟”（1886 年底）。

到 80 年代末，美国全部农民有一半以上都参加了农民联盟的组织。这些农民联盟所提出的要求，归纳起来如下：对铁路及其他交通工具设立国家监督或完全转为国有财产，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建立较公平合理的税收制度。

但是，农民认识到：为了实现农民的需求，必须成立自己的政党。因此到 1892 年，这些农民联盟终于联合起来成立“平民党”。参加平民党的不但有农民联盟，而且也有许多工会及其他工人组织。

平民党的群众基础是西部和南方的小农、南方的分成农（黑人）、工人、小业主以及小商人。平民党在成立大会上提出了下列各项基本要求：第一，没收铁路公司和其他资本家公司的多余土地以及外国人拥有的土地，并且把这些土地分配给真正的移居者（即劳动农民），第二，铁路、电报、电话及邮政均应归政府所有，并且根据人民利益加以管理；第三，实行累进所得税；第四，允许无限制铸造银币。第五，缩短工人的工作日，禁止雇用童工，取缔武装侦探。在 1892 年总统选举中，平民党的候选人威佛尔得票 100 万张以上。平民党之当选为国会议员者达 40 人之多。在四个州，平民党人当选为州长。这样，平民党成长为美国第三大党。

但是，平民党到 1896 年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面，农民并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它已分化为农业资产阶级和农业无产阶级。这就注定了平民党的内部分歧。加以缺乏工人阶级的领导，领导权落到农业资产阶级手中。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在 1896 年大选中，平民党采取了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布莱安的错误策略。结果，平民党内部发生分裂，到 20 世纪初就销声匿迹了。

（六）黑人运动

美国内战期间，南方黑人奴隶得到解放，但是美国资产阶级在“解放”了黑人之后，就竭力推行种族隔离和歧视政策，以黑人“种族低下”和“没有文化”为借口，剥夺黑人的公民权和选举权。在经济上，南方大多数黑人不但在“分成制”下面受到种植场主的残酷剥削，同时也受商人高利贷者的重利盘剥，因而地位下降到与农奴不相上下。

内战后，也有不少黑人流入城市，变为雇佣劳动者。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大约有一百万黑人工人。他们备受种族歧视，只能从事笨重的体力劳动，工资也比白人工人低下，一到经济危机时，首先被解职。因此，黑人工人处在美国工人阶级的最下层。

资产阶级对黑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迫使黑人群众不断地掀起反抗和斗争。但是，当时黑人工人刚刚形成，缺乏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加上资产阶级的挑拨以及白人工会所采取的排斥黑人的错误政策，因此，黑人运动的领导权，落入黑人资产阶级手中。

布克·华盛顿（1856～1915 年）是 19 世纪末期黑人运动的领袖。他根本否认美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认为只要通过职业教育和体力劳动，黑人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就可以提高。他反对政治斗争和社会主义，单纯鼓吹职业教育，主张黑人只应学习技术，培养“忍耐性格”。为此，他在 1881 年，在亚拉巴马州创办塔斯卡基职业学校和塔斯卡基社，开始了以鼓吹职业教育为宗旨的塔斯卡基运动。布克·华盛顿的活动，完全迎合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受到克利夫兰和罗斯福总统的青睐。克利夫兰“以极大的热情表示感谢”布克·华盛顿的活动。西奥多·罗斯福还邀请他到白宫进餐。

20 世纪初，出现了一批黑人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反对布克·华盛顿的错误言行，主张采取积极的政治斗争，争取黑人的政治权利。著名的黑人学者、社会活动家威廉·艾·伯加特·杜波依斯（1868～1963 年）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杜波依斯坚决反对布克·华盛顿领导的运动，他尖锐地指出：布克·华盛顿的纲领，是一部“工作和金钱的福音书”，是让黑人“屈服的方案”。他主张必须把争取选举权和争取政治平等的斗争放在首要地位。为此，1905 年 7 月，杜波依斯主持了著名的在尼亚加拉召开的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全国 13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 27 名代表，会上通过了“政策宣言”，号召黑人团结起来，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普选权和实现权利平等而斗争。于是便开始了尼亚加拉运动。黑人青年知识分子领导的尼亚加拉运动，以崭新的、战斗的姿态出现在黑人运动的舞台上，向二十多年来统治黑人运动的布克·华盛顿及其追随者挑战，它号召黑人拿起武器，保卫自己。1909 年，在纽约成立了“全国黑人种族协进委员会”（第二年改名为“全国有色

人种协进会”），出版了《危机》杂志。尼亚加拉运动的参加者加入了协会，杜波依斯担任协会的宣传和研究部长以及《危机》的主编。协会的会员很快发展到 10 万人。

但是，这个组织是由黑人和白人知识分子组成的，领导权则掌握在白人知识分子手中，他们主张用渐进的方式，在“合法”范围内进行斗争，反对“过激”的行动，从而也就逐渐丧失了尼亚加拉运动的战斗精神。

直到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前夕，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黑人运动的领导权，运动基本上是在中小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黑人运动还没有和美国工人运动，没有和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

（七）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

到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它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阶段。从这时起，美国的侵略步伐加快了，这不但是垄断资本推动的结果，而且也是由于到 19 世纪末，美国西部已基本上开发完毕，国内市场已容纳不了日益增加的工业产品，从而资产阶级迫不及待地寻求国外市场。

早在 19 世纪末，要求向外扩张的呼声甚嚣尘上，鼓吹侵略扩张的“理论”应运而生。

美国是参加瓜分世界的宴席的迟到者，当它走进争夺殖民地的角逐场的时候，地球上尚未被瓜分的土地已经所剩无几了。要想取得地盘，就不能不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一决雌雄。因此，它就必须建立海军。马汉的“海上实力论”便反映了这个要求。马汉被美国资产阶级称为“现代海军之父”，是一个疯狂的扩张主义者。他以反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理论基础，认为生存竞争不仅是生物发展的法则，而且也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在他看来，弱肉强食，优胜劣败，是合乎规律的现象。他在其主要著作《海上权力对历史的影响》中，大肆鼓吹建立海上霸权的重要性，并且为美帝国主义制订了一幅依靠海上力量夺取制海权、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的蓝图。另一个扩张主义者洛奇更是厚颜无耻地宣布：“为了美国人民的幸福，首先必须扩张。”这些“理论”是美国国内外各种矛盾发展的产物，它反映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实际上，早在 19 世纪下期美国就锐意建设海军，到 90 年代初，它就由世界第十二位海军国跃居第五位。凭借自己的海军力量，美帝国主义不但想把邻近的拉丁美洲诸国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也想插足于亚洲东部地区，企图把太平洋变为美国的内海。美国侵略扩张的特点是以“援助”落后国家为幌子，把财政奴役和武装侵略结合起来，用收买统治者和挑拨离间作为补充。这一侵略政策的始作俑者和执行者是麦金莱、西奥多·罗斯福、塔夫脱和威尔逊等帝国主义者。

美国侵略者早就垂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1866 年起，曾三次入侵朝鲜，但在朝鲜人民英勇抗击下均遭失败。最后又派战舰驶入济物浦港，胁迫朝鲜在 1882 年签订不平等条约。

与此同时，美国又染指夏威夷群岛。1875 年，强迫签订商业条约；1893 年，策动政变，成立“临时政府”；1898 年，正式吞并夏威夷群岛，把它变为美国的海军基地。

对拉丁美洲，美国打着“泛美主义”的旗号，组织“泛美同盟”，声称

“美洲国家利益一致”，力图排挤其他帝国主义国家。

1898年，美国发动了旨在夺取西班牙殖民地——古巴和菲律宾的美西战争。这是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列强重新分割殖民地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美国吞并夏威夷后，就积极策划夺取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和菲律宾。1895年，古巴爆发反对西班牙的起义，1896年菲律宾也发生革命。美国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夺取西班牙殖民地。1898年4月25日，美国以停泊于古巴哈瓦那港口的“缅因号”爆炸为借口，向西班牙宣战。战争以西班牙失败而告终。1898年底，美西订立《巴黎和约》，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得了古巴和菲律宾，并且把它们分别变为自己的保护国和殖民地。但是，美帝国主义者并不以此为满足，1877年，美国总统麦金莱又授意其国务卿海约翰，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共享侵略中国的权利。1900年，美国又参加“八国联军”，疯狂镇压义和团运动，并企图进一步瓜分中国。

20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提出“大棒政策”，塔夫脱又提倡“金元外交”，加紧对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帝国主义推行“大棒政策”和“金元外交”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夺取巴拿马运河地区。在巴拿马地峡开凿运河，本来是拉丁美洲人民的夙愿，而美国则乘机扩张。本来运河工程已由法国公司承办，并已于1881年破土开工。后因法国公司管理人员营私舞弊，加之工程艰巨，黄热病流行，工程陷于停顿。美国乘机收买了公司股票，排挤了法国，接着又策划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而“独立”，迫使巴拿马共和国签订不平等的《美巴条约》。美国取得了运河开凿权和霸占运河区域的永久租让权，使巴拿马运河区成为美国统治下的“国中之国”。

除夺取巴拿马运河区外，在西奥多·罗斯福和塔夫脱执政期间，美国还通过武力和贷款，逐步夺取对圣多明各、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的财政监督权，并且用暴力镇压古巴人民革命。

1912年上台的威尔逊继承其前任的扩张政策，并且给他的侵略行为披上一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的外衣。他于1914年和1916年，两次武装干涉墨西哥革命，在1914~1915年又把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和海地置于美国“保护”之下。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先是坐山观虎斗，乘机大发战争横财，到1917年就撕下“中立”伪装，参加了帝国主义战争。

西奥多·罗斯福在1916年演说中说：“应付国际关系的正当办法在于嘴里说话要温和，手里要提一根大棒”。“大棒政策”由此得名。

塔夫脱在1912年国情咨文中宣称，美国对外政策的特点是“用美元代替枪弹”。故称“金元外交”。

第六节 俄国

(一) 资本主义的发展

1861年改革，标志着俄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改革后，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到80年代，俄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在主要工业部门中，机器生产已逐渐排挤手工劳动而占统治地位，基本上完成了从手工工场向工厂的过渡。欧俄地区工厂(采矿业除外)从1866年的2500个至3000个增加到1903年的9000个左右。同时，在19世纪下半期，除彼得堡和莫斯科已形成为重要的工业中心外，还出现了许多新的工业区。例如：顿巴斯成为煤炭工业和冶金工业区，巴库成为石油工业区，克利沃罗格成为铁矿工业区，波罗的海沿岸成为机器制造业和纺织工业区，等等。

改革后，随着工业革命的迅速进展与完成，俄国工业生产大幅度增长。从1860年到1890年，棉纺织业的生产价值由5000万卢布增加到2亿卢布，增长了三倍；铁产量由2050万普特增至5200万普特，增长了一倍多；钢产量由1250万普特增至5200万普特，增长了三倍；煤产量由1800万普特增至3.67亿普特，增长了19倍。石油开采量在60年代中叶以前不到100万普特，到1890年猛增到2.43亿普特。铁路线长度从1860年的1500公里增至1900年的5.3万公里。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把农业区和工业区、边区和内地连接起来，扩大了国内市场，促进了工业的发展。1860~1900年，俄国的工业产量增长了六倍。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使俄国的经济面貌大为改观。

改革后的俄国工业生产之所以能获得迅速的发展，一是由于农奴制的废除，不仅使劳动力得到了解放，从而保证了工业部门所需要的自由劳动力，而且扩大了工业品的国内销售市场；二是由于强占了大片殖民地，对殖民地的残酷掠夺，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三是因为俄国是一个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可能利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经验和技術成就，来发展自己的工业。

农奴制废除后，俄国的农业经济也日益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农村中产生了大批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贫雇农和使用雇佣劳动力与新式农具从事资本主义经营的富农。到80年代，占农户总数20%的富农在各个不同的州里占有耕地面积的29%到36.7%；而占农户50%的贫农只占耕地面积的33.2%到37.7%。同时，由于国内外市场对农业原料与商品粮食需要逐年增多，有不少地主为了牟取高额利润，也采用资本主义农场的经营方式，使俄国的地主经济逐步向资本主义经济演化。从8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在农业中逐渐占了优势。

但总的说来，19世纪下半期，俄国基本上还是一个靠输出谷物来换取外国工业品的农业国。直到1899年，其农业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五。20世纪初，它的工业总产值在国民经济中仅占41%。不论在工业生产发展水平上或技术水平上，俄国依然远远落后于西欧和美国。比如90年代初俄国棉纺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就比英国低一半到三分之二。从经济指标来看，俄国比之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显得落后：1911年，按人口平均计算，美国每人消费的生铁量为233公斤，比利时为173公斤，德国为136公斤，英国为105公斤，可是俄国却只有25公斤。

当时阻碍俄国资本主义更迅速发展，使俄国在经济上与技术上依然远远落后于西欧和美国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由于改革前俄国的工业基础太差，技术底子太薄，经济上极端落后。

第二，因为没有一个是资本主义国家像俄国那样残存着那么多的封建农奴制残余。农奴制残余的经济基础，是贵族地主的大土地所有制。直到 1877 年，在欧俄 49 个州的 9150 万俄亩私有土地总数中，贵族地主就占有土地 7300 万俄亩，相当于全部私有土地的 80%。沙皇是俄国最大的地主，皇家霸占的土地竟比 50 万农户的土地还多！而广大农民因缺少土地无法生活，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继续受地主的奴役。农民为了租佃地主的土地，要用自己的耕畜、农具为地主耕种土地（即“工役制”），或把自己收成的一半作为实物地租交给地主（即“对分制”）。其结果：一方面由于地主坐享其成，不愿采用新式农业机器，耕作技术惊人落后，使农业荒芜不堪，生产水平极端落后；另一方面因农民被地主压榨得一贫如洗，造成购买力低下，从而限制了为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原料市场和商品销售市场的扩大，阻碍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

第三，由于沙皇专制制度的腐败，阻碍了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和科技的发展。

（二）民粹派运动

农奴制废除后的俄国，由于农村中资本主义和农奴制残余紧密结合，广大农民遭受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农村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反对地主土地所有制与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日益高涨。正是在这个斗争中形成了反映农民愿望，要求消灭农奴制残余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民粹派。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第一批民粹派组织在拉甫罗夫、特卡乔夫的领导下成立于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敖德萨等地。

民粹派主要是由一些平民知识分子组成的。尽管他们是些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者，但他们捍卫农民利益，坚决反对沙皇政府，在 70 年代还是进步的。他们的积极主张是：一、消灭沙皇专制制度和封建农奴制残余；二、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把土地分给农民；三、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然而，他们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

第一，民粹派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只是种“偶然”现象，是发展不起来的，因此无产阶级也不会成长和壮大。

第二，民粹派否认工人阶级是革命中的先进阶级。他们妄想不要无产阶级而达到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具有共产主义本能的农民”，是俄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同时，他们把农民村社视为“社会主义胚胎和基础”。他们以为光靠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骚动，就能推翻沙皇政府，然后依靠农民，通过农民村社，而不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就可实现社会主义。

第三，民粹派认为历史不是人民群众所创造，而是个别杰出人物，即所谓“英雄”所创造；人民群众即所谓“群氓”是盲目地跟着“英雄”走的。

民粹派组织建立后，最初的工作重心在城里，它一方面在知识分子中间宣传，另一方面又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他们把这种宣传活动，看作是为将来在农民中间开展工作的一种准备。它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中，有

一定影响。

到 1874 年春夏间，民粹派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发动了“到民间去”运动（“民粹派”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参加者约一千人。这些以“英雄”、“救世主”自居的民粹派知识分子宣称，他们到农村去的目的是解救受苦受难的农民。在下去以前，他们抱着天真的幻想，充满胜利的信心，满以为他们这样下到农民中间去一鼓动，农民就会跟着他们这些“英雄”人物揭竿而起，掀起社会革命，顷刻间就可以推倒沙皇政府。为了接近农民，使农民相信他们，他们换上了农民的服装，努力模仿农民的语言，在广大农民中进行宣传，企图发动农民立即举行推翻沙皇政府的暴动。诚然，民粹派“到民间去”运动显示了高度的献身精神，但结果收效甚微，被他们看作“具有共产主义本能的庄稼汉”并没有跟他们走。由于民粹派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到民间去”运动很快就被沙皇政府镇压下去，一大批民粹派分子被逮捕了。

1876 年，以菲格纳、阿普捷克曼等人为代表的一部分民粹派分子，鉴于过去的失败教训，成立了新的民粹派组织“土地与自由社”，提出与农民现实利益相结合的“土地与自由”的“民粹主义纲领”，要求把土地分给农民，让农民村社实行自治。同时，他们还在农村中建立了固定的组织，以教师、医生等身份下到农村，继续在农民中进行工作，以便发动农民起义。这时的民粹派运动，虽然比以前是进步了，但由于民粹派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没有正确看待农民，农民也不了解民粹派，所以民粹派这种“救世主”的行动同样因得不到农民的支持，而遭到了失败。

1879 年，土地与自由社因内部意见分歧而发生分裂，形成以阿普捷克曼、查苏里奇等人为领导的“土地平分社”（黑分社），和以菲格纳、米海洛夫为首的“民意党”。土地平分社继续坚持原来的立场，又不能采取正确斗争方式，因而感到无能为力，不久便停止了活动。民意党则奉行唯心的英雄史观，他们一面诬蔑人民群众是“群氓”，否定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另一面鼓吹少数“英雄”的意志可以自由决定历史发展方向，个别“豪杰”的冒险行动能够在瞬息之间扭转乾坤，因此，他们拒绝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中进行艰苦的群众性革命工作，主张以个人恐怖手段来推翻沙皇统治。1881 年 3 月，民意党人在彼得堡用炸弹把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炸死了。但刺杀个别反动人物是不能把沙皇专制制度推翻的。民意党的个人恐怖策略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造成了极大危害，因为它转移了人民斗争的视线，阻碍了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并使反动统治阶级乘机加强其对革命人民的摧残，许多革命者遭到逮捕和屠杀。民粹派运动彻底失败了。

（三）工人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工业无产阶级迅速成长起来，它形成于 19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已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

俄国工人阶级有自己明显的特点：第一，身受农奴制残余、本国资本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在经济上，工人每日工作一般 12 小时至 14 小时，多的长达 16 小时到 18 小时。而工资极低，男工平均每月工资只有 14 卢布，女工 10 卢布，童工 7 卢布。并且厂主滥用罚款制度，往往扣去了工资的大半，在某些部门中盛行包工制，工人实际得到的工资更少。此外，工作

条件十分恶劣，没有任何劳动保护。在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下，俄国没有任何劳动立法，工人的基本权利被剥夺殆尽，甚至连普通的罢工也被视作“严重罪行”。罢工工人不仅要遭到警察的毒打，而且要受到刑事审判。正因为俄国工人阶级身受三重压迫，所以它具有高度的革命斗争精神。第二，工人高度集中。1866年，集中在1000人以上的工厂工人，占全部工厂工人总数的27%，1879年占40%，1890年占46%，1902年占47.8%。这种集中程度超过了西欧和美国。由于工人高度集中，使俄国工人阶级易于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并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俄国工人阶级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开始觉醒起来，走上了革命斗争的道路。1870年5月，彼得堡涅瓦纱厂爆发了俄国工人的第一次罢工。从1870~1875年，俄国共发生了105次罢工，54次暴动。

在罢工运动的基础上，俄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认真地学习西欧工人运动的经验，开始在工人群众中宣传革命思想，并力图将工人组织起来，把工人的斗争引上政治斗争的轨道。1875年，在敖德萨成立了扎斯拉夫斯基领导的“南俄工人协会”。这是俄国第一个工人阶级的独立组织。它把“宣传工人要从资本家特权阶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思想，作为自己的任务。1878年，在彼得堡成立了由旋工奥布诺尔斯基和木匠哈尔士林领导的“俄国北方工人协会”。其纲领明确规定：“工人阶级担负了解放自己和自己兄弟们的伟大事业，担负了革新旧世界的任务”，要“推翻国内现存的政治经济制度”。协会积极开展宣传、组织工作，多次领导工人罢工。尽管这些组织还未完全摆脱民粹主义的影响，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并且很快就被沙皇政府所摧毁，但是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俄国无产阶级的觉醒。

80年代，俄国工人运动继续向前发展。在1881~1886年，俄国共发生了348次罢工，其中最大的一次是1885年在奥列哈夫·祖也夫城莫罗佐夫工厂的罢工。在这次罢工过程中，8000工人在原俄国北方工人协会会员莫依先科领导下，团结一致，坚决斗争，争得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厂立法（即“关于限制罚款法令”），规定厂主不得任意向工人罚款，所罚款项也只能用在工人身上。莫罗佐夫工厂的罢工，成了俄国工人第一次群众性的发动。它告诉了工人：只要工人团结一致，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就能显示出工人阶级的力量，取得工人的利益。

工人运动的发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到80年代，有不少革命知识分子在认真寻找民粹派失败的原因，努力探求革命真理来指导行动，其中少数人通过刻苦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并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俄国社会问题，在总结工人运动经验基础上，建立起俄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团体。

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是普列汉诺夫于1883年在瑞士日内瓦建立的“劳动解放社”。

乔·瓦·普列汉诺夫（1856~1918年）是在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人。他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功绩，是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普列汉诺夫出身于地主家庭，曾在彼得堡的矿业学院求学，于1875年加入民粹派，并当过民粹派机关报《土地与自由》的编辑，后来又成为黑分社的首领。1880年他因沙皇警察的通缉，被迫逃亡国外（直到1917年）。在国外侨居的前期，他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和西欧工人运动，与恩格斯建立了通信关系，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认识到民粹主义的错误，从而抛

弃了民粹主义思想，并决心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俄国来。1882年，他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1883年，他与旧黑分社成员阿克雪里罗得、查苏里奇等在日内瓦创立了劳动解放社。

劳动解放社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它不仅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和资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译成俄文，而且写了许多阐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把它们在国外印好，秘密地运入俄国散发，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作用，为俄国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为了扫除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障碍，劳动解放社展开了反对民粹派错误观点的斗争，对民粹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普列汉诺夫是用马克思主义对民粹派错误观点进行批判的一个人。他在反对和揭露民粹派时，写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等。他主要从下面四个方面批判了民粹派：

第一，列举出大量材料证明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批判民粹派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不会发展起来的错误观点。他说，资本主义在俄国已经发展起来了，这是社会运动的自然法则，没有任何力量能使它离开这条道路。同时他指出，革命家的任务，是从实际出发，依靠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强大革命力量，即依靠工人阶级，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把他们组织起来，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人政党，去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第二，批判民粹派否认工人阶级的革命作用，宣传了马克思主义观点。他认为，当时的俄国虽然农民占绝大多数，工人阶级在人数上比较少，但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工人阶级，而不是农民。因为无产阶级是发展着的阶级，它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增长壮大。同时，无产阶级是同最先进的经济形式和大生产相联系的，具有远大的前途、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团结一致的精神。加上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下所处的经济地位，使它成为革命最彻底的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因此，革命家应把希望寄托于无产阶级。

普列汉诺夫指出，农民虽然人数众多，但它不是增长着的阶级，而是日益分化的阶级。同时它与最落后的经济形式及小生产相联系着，是分散、落后、没有远大前途的。加之农民处于私有制的地位，革命彻底性不如无产阶级，所以农民不可能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

第三，批判了民粹派关于俄国农民村社问题的错误观点。他认为，村社不是社会主义胚胎和基础，而是掩饰富农剥削的一种形式。因为在村社里占统治地位的，是剥削雇农、贫农和中农的富农。名义上土地归村社所有，但实际上享有村社土地的只是那些有耕畜、农具和种子的富裕中农和富农。许多无耕畜、农具和一般经济力量薄弱的农民，却不得不把土地让给富农，而自己当雇农，或者干脆脱离村社，出外谋生。事实说明村社内部贫富悬殊，在剧烈分化。因此普列汉诺夫指出：“村社以前是最穷社员的靠山和支持者，现在变成了他们破产的泉源。”民粹派把这样的村社当作社会主义胚胎和基础，显然是错误的。

第四，批判了民粹派的唯心史观，发挥并论证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点。他认为，归根到底决定社会发展的不是杰出人物的愿望和观念，而是社会物质条件的发展，是社会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更，是各个阶级在物质资料生产方面相互关系的变更，是各个阶级为着自己在物质资料生产

和分配方面的作用和地位而进行的斗争。不是观念决定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而是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观念。如果杰出人物的观念和愿望与社会经济发展背道而驰，与先进阶级的需求背道而驰，那末这种杰出人物就会变成无用之人；反之，如果杰出人物的观念和愿望正确表现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正确表现着先进阶级的要求，那他们就能成为真正杰出的人物。

当民粹派认为大众是群氓，认为只有英雄才能创造历史、创造人民之时，普列汉诺夫回答他们说，并不是英雄创造历史，英雄创造人民，而是历史创造英雄，人民创造英雄，是人民群众创造和推进历史。当然，马克思主义者在肯定群众创造历史的同时，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但是，英雄、杰出人物，只有当他们能正确了解社会发展条件，了解应如何改进这些条件时，才能在历史上起重大作用。如果英雄和杰出人物不能正确了解社会的发展条件，不顾社会历史要求而胡作非为，俨然以历史“创造者”自居，那他们就会变成滑稽可笑、一文不值的社会罪人。

总之，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著作通俗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批判了民粹派的错误观点，指出了他们对于工人运动的莫大危害，从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打击了民粹主义，削弱了民粹派在革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教育和培养了俄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但是，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劳动解放社，只是在理论上为社会民主主义奠定了基础，只走了迎接工人运动的第一步。而且它自己也犯有严重错误，这不仅因为它对民粹派的批判不彻底，而且因为它的纲领本身还保存有民粹主义观点的痕迹，还采纳了个人恐怖的策略。普列汉诺夫一面否认工农联盟和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一面又过高地估计了资产阶级的作用，这些原则性的错误观点，正是普列汉诺夫后来堕落成孟什维克的思想根源。

与劳动解放社建立的同时，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俄国的许多地区都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小组。如在彼得堡有布鲁斯也夫领导的小组，在喀山有费多谢也夫领导的小组，等等。然而，无论是劳动解放社或所有这些小组，都还只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的狭小团体，它们很少联系工人群众，都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这样，在思想上彻底粉碎民粹主义，并纠正劳动解放社的错误，克服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局限，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把零散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以便领导俄国人民去推翻沙皇政府，进而夺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如此光荣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就落到了无产阶级伟大导师列宁和俄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肩上。

（四）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尼·托尔斯泰

1861年以后到1905年以前的时代，是俄国封建农奴制的旧基础急剧崩溃和资本主义关系迅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俄国千百万农民状况日益恶化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逐渐成熟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俄国涌现了一批像列·尼·托尔斯泰、涅克拉索夫、奥斯特罗夫斯基、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契诃夫和科罗连科等著名作家。特别是其中的列·尼·托尔斯泰，继承和发扬了在他之前的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等人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传统，把古典文学的人民性和真实性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成为19世纪俄国最伟大

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和世界文学中最杰出的艺术大师之一。他给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以自己辉煌的文学作品扩大了人类艺术认识的境界。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年）生于图拉附近的雅斯那亚波良那的一个伯爵家庭，1847年肄业于喀山大学。随后他试图在自己的领地上改善农民生活状况，遭到了失败。1851年，托尔斯泰由于对上流社会生活感到厌倦，参加了现役军。他先在高加索服役，同时开始文学活动，后参加了克里木战争。1857年他从军队中退伍后，曾到德、法、意等国旅行，于同年回国。回国后，他在家乡办了一所学校，并继续从事文学创作。

在1852～1863年间，托尔斯泰除发表了《幼年》《少年》和《青年》自传体小说三部曲外，还发表了《塞瓦斯托波尔尔的故事》《一个地主的早晨》和《哥萨克人》等许多有名的现实主义作品，这使他声震文坛。以后，他又写了《战争与和平》（1863～1869年）、《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年）和《复活》（1889～1899年）等著名长篇小说，以及《黑暗势力》（1886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年）、《文明的果实》（1890年）、《活尸》（1900年）和《哈泽·姆拉特》（1896～1904年）等一系列优秀现实主义作品，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俄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真实情况，揭露了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矛盾和丑恶，“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

70年代末80年代初，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转变，他与自己的一切传统观点决裂了，公开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他从根本上否定了本阶级的特权和利益，坚决反对土地私有制和整个现代制度。他甚至放弃了习惯的贵族生活条件，开始过像农民样的简朴生活，同情被压迫人民的疾苦。托尔斯泰世界观的转变，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艺术创作。在他后期的作品中，达到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最高峰。特别是在他所写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复活》里，表现得更为突出。这部杰出的作品无情地撕下沙皇俄国社会的面纱，对那个社会的种种罪恶和丑恶加以深刻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对呻吟在那个制度下俄国广大农民的悲惨处境寄以真挚的同情。但是，他不了解造成沙皇俄国社会危机的原因和摆脱危机的方法，错误地提出用“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永远饶恕一切人”和“勿以暴抗恶”作为拯救人类的灵丹妙药，把对黑暗的抗议和对恶的容忍揉合在一起，否定革命，否定斗争，形成一种称之为“托尔斯泰主义”的错误理论，暴露出托尔斯泰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局限性。

1910年11月，已82岁高龄的托尔斯泰，由于其家庭成员极力阻挠他放弃贵族特权和领地，长期与家庭不和，终于被迫离家出走。在途中得了肺炎，于11月20日在阿斯达堡车站逝世。

托尔斯泰献身文学事业将近60年，写了许多不朽的著作。他的全集有93卷之多。在1908～1911年间，列宁先后写了七篇评论托尔斯泰的文章，既充分肯定了托尔斯泰的伟大艺术成就，论证了他的世界意义，同时也指出了托尔斯泰主义的危害性及其社会历史根源，对托尔斯泰作出了正确的科学评价。他还要求俄国无产阶级批判地继承托尔斯泰的遗产，抛弃其中“偏见”的、属于过去的东西，吸收其中“理智”的、属于未来的东西。

（五）军事封建帝国主义

从 80 年代起，俄国开始产生了垄断组织。经过 90 年代的经济高涨和 1901～1903 年的经济危机，垄断组织猛烈增加。俄国垄断组织的主要形式是辛迪加。1900 年，巴库的五大石油公司控制了全国石油产量的 42.6%，南俄的七大铁厂控制了全国生铁产量的 57%。1902 年成立的金属销售辛迪加掌握了全国冶金工业的 80%。1904 年成立的顿涅茨煤炭销售辛迪加控制了南俄煤炭总产量的 75%，同年出现的火车厢制造辛迪加几乎垄断了国内所有的火车厢的生产。

与工业垄断组织纷纷形成的同时，银行资本也迅速集中，并且与工业资本结合而形成金融资本。到 20 世纪初，以俄罗斯银行为首的八大银行控制了全国银行资本的 55.7%，并且控制了电气工业投资总额的 30%、冶金工业的 50% 和煤矿业的 60%。财政资本操纵着俄国的经济命脉。因此，到 20 世纪初俄国正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俄帝国主义是有自己的特点的。

第一个特点便是它的军事封建性。在 1861 年改革后，俄国仍保存着大量的农奴制残余，这是因为沙皇制度所依靠的是地主贵族，为了保护地主的利益，就要维护农奴制残余。但是在另一方面，沙皇政府也不能不照顾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沙皇制度也是与资产阶级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特别表现在公债制度和政府的军事定货上面。由于保存农奴制残余，俄国国内市场异常狭窄，因而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要求，沙皇政府不能不发动侵略战争，以开辟国外市场。沙皇政府不但加紧对外侵略扩张，而且也对于边区各民族进行屠杀和压迫，把边区化为国内殖民地。这样，沙皇制度带有高度的军事掠夺、侵略的性质。因此，列宁称沙皇制度是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第二个特点是它在经济上的落后性。半封建农奴制残余的保存，也造成了俄国经济的落后。首先它在生产技术上落后于西欧，而且几乎缺乏机器制造业和化学工业。其次，它的工业生产量也大大低于西欧北美。由于俄国工业落后，所以沙俄便不得不在经济上依赖西欧帝国主义。因此，它的第三个特点便是它对于西欧帝国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的依存性。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俄国有大量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而本国又缺乏资本和技术，因而吸引西欧资本家在俄国大量投资。19 世纪晚期以来，英、法、德、美、比利时等国的资本源源涌进俄国。到 1900 年，外国资本竟达到全俄股份公司总额的大约 50%，直接或间接控制了俄国的冶金、煤炭、石油及机器制造业，每年从俄国榨取的利润高达九百多万卢布。二、沙皇政府在财政上依靠西欧，它向西方列强借了大量的债，特别是法、英两国。三、在资本输出方面，俄国往往充当外国资本的代理人或仆从的角色，如对波斯、土耳其及中国的资本输出就是个例子。四、俄国垄断资本大部分是在外国资本的直接影响及参加下发展起来的。俄国的垄断组织在本质上往往是外国垄断公司的分公司或子公司。

由于俄国在经济上处于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依附地位，在政治军事上也不能不依附于它们，在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中扮演了法、英两国后备军的角色，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它们提供炮灰。

根据以上的特点，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沙皇俄国是各种压迫——资本主义压迫、殖民地压迫及军事压迫——表现得最野蛮的国家；沙皇是西方帝国主义榨取东方广大人民的代理人，是西方帝国主义的重要支柱。因此，推

翻沙皇制度，不仅可以解放俄国劳动人民，而且也可以沉重地打击西方帝国主义及其在东方的殖民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更为重大，这就要求俄国有更革命的工人政党和指导这个革命政党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及策略。这就是为什么恰恰俄国成为列宁主义故乡的基本原因。

第七节 日本

(一) 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

明治政府大力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的结果，日本资本主义工业特别是私人企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从 1881 年到 1893 年，工厂数目由 1100 家增加到 3340 家。四大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在国民经济中日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天皇为首的皇室，也成为拥有巨额资本的大资本家和全国最大的大地主。

从 1868 年到 1894 年，在日本发展起来的主要是轻工业。由于缺乏煤、铁，重工业还没有大规模发展起来。比之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生产水平和技术水平还是低下的。

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起了重大作用。1894 年到 1895 年中日战争的结果，日本不仅控制了朝鲜，而且从中国勒索了 2.3 亿两库平银的巨额赔款，取得了掠夺中国资源、倾销商品和开设工厂的特权，这都大有助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战后，日本立即出现了一个兴办企业的热潮。1894 年，日本各种公司合计不到 2900 家，1898 年则激增至 7000 多家。有重要军事意义的铁路得到了更大的发展。1894 年，日本通车的铁路线为 3402 公里，到 1904 年时增为 7539 公里。重工业的发展也很显著，1897 年创立了日本的第一个大型冶金工业企业——官办的八幡钢铁厂，它的部分经费就是来自中国的赔款，它所使用的铁矿石，是强制中国大冶铁矿供给的。“八幡”创办后，开始投产的第一年度，其生产的钢铁占国内钢铁产量的 53%，钢材占 82%。它的创立，为近代日本工业奠定了基础。1896 年，日本铣铁产量仅 2.6 万吨，钢 1200 吨；1906 年，铣铁增为 14.5 万吨，钢增至 6.9 万吨；到 1913 年，铣铁增至 24.3 万吨，钢增至 25.5 万吨。

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过程中，生产和资本迅速集中。根据 1899 年的工业调查，在 6551 个工业企业中，雇用工人 500 人以上的大企业有 104 个，占工业总数的 1.6%。但这些大企业共雇用工人 12.7 万人，约占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

随着生产和资本的迅速集中，垄断组织也形成了。日本的垄断组织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在纺织、造纸、制麻等轻工业部门中就已出现了。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垄断组织逐渐统治了各个工业部门。如在纺织工业中，纺织联合会在 20 世纪初已取得垄断地位。在纺织联合会里，属于三井财阀的钟渊，属于三菱财阀的富士等八大公司所拥有的机械设备占联合会所拥有的机械设备总数的 51.6%。在造纸业中，由王子制纸和富士制纸等联合组成的辛迪加，在 1900 年垄断了全国造纸生产总额的 64%。此外，在制麻、面粉、火柴、烟草等其他轻工业部门中，也都出现了卡特尔。重工业和交通运输部门则从一开始就控制在国家和少数财阀手中。日本的采煤业主要在九州地区，在 20 世纪初，其产量的一半控制在三井手中。住友、古河、藤田、三菱、久原五大公司的铜矿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69%。造船业方面，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三家大公司建造的船舶总吨数占全国总吨数的一半。

“财阀”是日本垄断资本所具有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就是金融寡头。到 20 世纪初，三井财阀通过银行取得了对于钟渊（纺织）、王子（造纸）、芝浦（电机）、北炭（矿业）等企业的支配权；三菱财阀也掌握了造船、铜矿、

海运、造纸等许多大企业。三井、三菱、住友、安田都拥有银行，投资于各种主要企业，并向国外输出资本。

由于日本出现了许多垄断企业，它们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已占统治地位，工业资本已与银行资本相融合，并开始输出资本，所以说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日本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因其自身的历史和经济条件，成为带有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

日本帝国主义之具有这样的特点，主要是由于 1868 年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造成的。维新初期的改革，虽然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在农村还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有 50% 的土地仍然掌握在地主手中。因此，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一方面有大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同时，日本垄断资本的本身也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三井、三菱等财阀几乎都是日本政府一手扶植起来的幕末特权商人。他们几乎同时都是封建大地主，三菱就是占有二千多町步土地的日本最大地主之一。三井、三菱财阀，都以家族为中心建立垄断公司，他们的股票并不广泛发行，只卖给与其家族有密切联系的少数人。公司内部也存在着严格的“宗法式”的统治。最高权力往往不属于股东选举的董事会，而属于家族会议，甚至集中在一人身上。三井为了巩固其家族统治，在 1900 年修订了“三井族规”，条文竟达 10 章 100 条之多，对族人从一般修身齐家之道，到商业经营、财产管理等都做了规定。

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本来就都是热衷于积极鼓吹对外侵略的。在日本，由于大量封建残余的保留，劳动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购买力低下，国内市场十分狭小；日本又是较晚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经济技术水平也较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加上国内资源不足，农业落后，所以经济上处于劣势的日本帝国主义不能指望通过经济竞争去夺取国际市场和原料产地；因而，与好战的军阀相勾结的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在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方面，表现更为疯狂。所以列宁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依靠“军事力量的垄断”和“掠夺异族——如中国等等——的极便利条件的垄断，部分地填补了、部分地代替了现代最新金融资本的垄断”。

（二）自由民权运动与 1889 年宪法

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政府掌握在封建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手中。新建立的政权采用“天皇制”形式，宣布由日本天皇亲自执政，由一批主要是地主、武士特别是萨摩、长州两藩的武士出身的官僚和军阀控制政府和军队。当时明治政府既无宪法又无议会，控制政府的官僚和军阀，以天皇的名义，可以任意发号施令。实质上，日本仍是一个君主专制国家。

新政权的改革措施并未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依旧过着贫困的生活。因此明治维新后，农民斗争不仅没有停息，而且有了新的发展，仅从 1871 年到 1874 年，就发生了八十余次农民暴动。地税改革期间，农民的反抗更加激烈。其中规模最大的是 1876 年 12 月由三重县开始的起义，它迅速波及爱知、岐阜和歌山等邻县，有数十万农民参加。起义者袭击官府，焚毁各种文件簿册，捣毁监狱，释放犯人。

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2 卷，第 714 页。

这些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天皇政府。1877年1月，政府被迫宣布将地税从原来征收地价的3%，降为2.5%。当时，民众歌唱道：“竹枪冬冬冬，撞出二分五”。但这些微小的让步不能改善日本农民在半封建土地所有制残酷压迫下的悲惨处境，农民的斗争继续发生。

农民要求改变现状的斗争，鼓励了资产阶级。明治维新后，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增大了，他们不满于政治上的无权地位。尤其是中、小资产阶级对明治政府更深怀怨懣。这是因为明治政府在经济上依靠大商人和大资产阶级，给予他们种种特权和经济上的扶植，但是中小资产阶级却一无所得。中小地主也对政府的政策不满，明治政府的土地法令虽然确认了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他们是受益者，但是高额地税对他们非常不利，因而遭到他们强烈反对。另外，部分士族（中下级武士）也不满政府的改革措施。明治维新后，废除武士制度，使他们不仅失掉了往昔的荣誉，甚至连生活也失去保障。反动的封建武士在1877年2月，曾发动一次史称“西南之役”的士族暴动（又称西乡隆盛之乱）。又有部分士族，特别是他们中间的知识分子，倾向于中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并成为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在1873年，因主张“征韩论”而被萨、长“藩阀”排挤下野的参议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江藤新平、副岛种臣等人也站在反对政府的立场上。

1874年1月，板垣退助（1837～1919年）等向政府提出建立民选议院的建议书，并组织“爱国公党”，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发端。同年4月，板垣又和士族出身的片冈健吉（1843～1903年）等在土佐创立“立志社”，宣扬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论”。1875年，立志社与其他性质相近的地方团体代表在大阪集会，将爱国公党改为爱国社，在全国展开了宣传活动。

在自由民权运动的初期阶段，主要的参加者是不满“藩阀”政府的士族和士族知识分子，他们很多人受到“天赋人权论”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影响，客观上反映了资产阶级地主的政治要求。但这一运动是在强大的农民斗争的背景下展开的，从1877年开始，出现了自由民权运动同农民斗争相结合的趋势。1877年6月，片冈等人向天皇提出弹劾政府的建议书，着重指责政府以人民的税款资助特权商人和高额地税的政策。这主要是代表中小地主、资产阶级的意见，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农民的要求。1878年11月，爱国社在大阪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全国社团的联合领导组织；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杉田定一（1851～1929年）回到家乡后，领导了越前七郡农民进行了反对官府擅自规定地价的斗争，并宣传自由民权的主张，他起草的理由书中写道：“所谓官、民，同样是人。同样是人作的事，就没有说人民不对、官就绝对不错的道理”。这样，就把人类平等的主张和人民斗争结合起来了。

1880年3月，爱国社在大阪召开了第四次大会。会上，爱国社改为“国会开设促成同盟”，会员很快发展到13万人，运动的发展终于迫使明治政府于1881年10月颁布诏书宣布十年后（1890年）开设国会，颁布宪法。

1881年10月，由参加民权运动的各团体，在东京组成了自由党，选举板垣退助为党的总裁。自由党主张建立立宪政体，提倡“主权在民”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1882年4月，原政府中参议大隈重信（1838～1922年）组织立宪改进党，主张实行英国式的立宪君主制，倡导“主权属于君民之间”。

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但自由党的政治主张较激进，它的地方组织常与农民结合在一起，领导人民进行反专制政府的

斗争；而立宪改进党，则吸收了与萨、长“藩阀”关系较浅的大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是运动中的温和派。

政党的活动，很快就引起政府的恐惧。政府一方面采取严格限制与镇压的措施，另一方面又采取收买党魁和挑拨离间的手段。例如让三井出钱收买了自由党副总裁后藤象二郎，并通过后藤笼络板垣，板垣终于不顾大多数党员的反对，在运动方兴未艾时，于1883年，接受政府公费出国旅行，放弃了反对专制政府的斗争。立宪改进党乘机攻击自由党，揭露它与三井的关系。自由党则反唇相讥，揭发改进党与三菱的关系。两党互相攻讦，使政府阴谋得逞。地方党组织领导的农民斗争也引起自由党上层领导集团的不安。于是在1884年10月，自由党宣布自动解散。

争取自由民权的斗争并没有因为自由党的解散而停止。从1884年到1886年，相继发生“秩父事件”、“饭田事件”、“名古屋事件”、“静冈事件”等自由党人领导的下层群众的反政府的起义。由于起义是分散的，终于在政府的镇压下失败。但是，自由民权运动的历史意义是巨大的。它是日本近代史上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向广大人民传播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并迫使政府颁行了宪法。

在残酷地镇压了民权运动之后，政府为欺骗人民和适应资本主义发展，决定给天皇制披上一件立宪外衣。1882年，日本政府委派伊藤博文起草宪法。

伊藤博文（1841~1909年），长州藩士出身。早年留学英国，归国后参加“尊王攘夷”和明治维新运动。明治初年任参与、外国事务局判事等职，1871年以副使身份随岩仓具视赴欧美考察，归国后曾因参加币制改革、财政整理等工作而受到重视。为了颁布宪法，1885年明治政府废太政官制，实行内阁制，伊藤任日本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首相）。此后四次出任首相，三次出任枢密院议长，并在1900年创立了政友会。他是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的主谋者之一。1906年他任朝鲜统监，封公爵，1909年在哈尔滨被朝鲜爱国者安重根刺死。

伊藤博文以一年半的时间出国考察欧洲国家的宪法和政治制度，最后选中了最反动的普鲁士宪法为蓝本，制定宪法，1889年2月，以天皇名义正式颁布。

宪法在名义上宣布君主立宪，实质上天皇仍保有绝大的统治权利。宪法开宗明义就宣布：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是国家元首。天皇享有绝对的权力，有批准法律、任免大臣、召集和解散议会、宣战、媾和、统帅海陆军等权力。按照宪法规定，日本国民不称为公民而称为“臣民”。宪法允许臣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但又以“在法律范围内”为附带条件，实际上限制了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议会分为贵族院和众议院。贵族院由皇族及华族组成。众议院由选举产生，但宪法规定，只有缴纳直接国税15日元以上（满一年以上），超过25岁的男子才能享有选举权；具有同样财产资格的30岁以上的男子，才有被选举权。1890年举行第一次选举时，取得选举权的才45万人，只占总人口的1.24%。

宪法规定设立枢密院和内阁。枢密院由高官和大臣组成，是天皇的顾问机关。内阁大臣只对天皇负责而对议会只间接地负“道德上”的责任。在内阁中，海陆军大臣的权力最大，他们可以直接向天皇上奏。因为日本政府中

军人多出身于萨、长两藩，政府为他们所把持，所以天皇制政府当时也被称为“藩阀”专制政府。

宪法还规定，议会只参与法律的制定，而法律经议会通过后，还必须经过枢密院审议和天皇批准，才能成为法律。国家预算的提案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议会，如果议会不同意政府提出的预算，内阁只要采用上年度的预算即可。因此，政府不受议会左右。

可见，1889年宪法只不过是巩固了明治维新后在日本确立起来的近代天皇制度。但是，宪法毕竟承认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参政权，根据法律行使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原则，确立了同行政机构分离的立法、司法体系等等，这就使日本的国家形态和以前的绝对专制主义有所区别。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自由民权运动的成果。

宪法的颁布，使公开讨论政府的政策有了可能性。自由党与改进党作为议会中的反对派又重新活跃起来，并进行了修改宪法的斗争。但是日本政府的对外扩张政策符合有势力的资产阶级集团的利益，因而就在实质上摧垮了议会中的反对派。甲午战争后，两党都不再提出改革的要求，资产阶级自由民权运动也就停止了。

19世纪末，自由党与改进党联合成为宪政党，1900年又改为政友会。伊藤博文做了政友会的总裁。日本资产阶级政党完全同官僚、军阀结合在一起，成为对内实行军事警察反动统治，对外积极发动侵略战争的天皇专制政权的三大支柱。

（三）日本的对外侵略

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其本身尚未摆脱对欧美国家的屈从地位时，便开始走向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其矛头首先指向琉球、台湾和朝鲜。琉球曾向中国封建王朝纳贡，后被日本的萨摩藩封建主侵掠，于是明治政府硬说琉球和萨摩藩是上下关系。1872年，日本把琉球国王绑架到东京，强迫琉球国王宣布他自己是日本的琉球藩王。1871年，琉球船只在台湾海岸遇难，一些琉球渔民与台湾当地居民冲突时被杀，日本便以此为借口，于1874年发动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战争，迫使清朝与日本签订屈辱的《北京条约》，以50万两白银的赔款作为日军退出台湾的条件。

1875年，日本侵入朝鲜的江华岛，于1876年，强迫朝鲜订立《江华条约》，攫取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等。从此，日本侵略势力伸入朝鲜。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

此后，日本政府进一步阴谋策划侵略朝鲜和中国。日本驻朝鲜汉城的公使馆成为侵略朝鲜和中国的阴谋中心，它公开干涉朝鲜内政。1882年，汉城爆发了朝鲜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起义，日本出兵朝鲜。8月，强迫朝鲜订立《仁川条约》（又称《济物浦条约》），日本除获得赔款外，还攫取在汉城驻兵的特权。

1892年执政的伊藤内阁为了准备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急需英美的支持；英美也力图利用日本排挤和对抗俄国在中国的势力，于是它们便勾结起来。1894年7月，日本与英国签订条约，宣布五年后废除原在幕府时期英美等国与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随后，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也与日本签约。这些条约的签订，使日本在亚洲成为第一个摆脱了不平等条约奴役的国家，

这是日本人民长期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的重大胜利。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次修改条约，又是伊藤政府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在亚洲的矛盾，以甘愿充当其中一方的鹰犬为代价，进行交易的结果。所以，英国在签约后马上就宣称：如果日本和中国发生冲突而不损害英国在华利益，英国将采取“中立”。这显然是鼓励日本侵略中国。

在取得英美的谅解和支持后，1894年7月25日，即在日英条约签订后九天，日本不宣而战，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即“甲午战争”。这次战争对日本来说，完全是一次侵略战争。日本不但把军队开进朝鲜，而且渡过鸭绿江，侵入中国东北。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充分暴露了侵略军的本性。战争过程中，中国的士兵和部分爱国将领，坚持抗战，英勇杀敌，显示了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中国人民也奋起斗争，给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但是，由于中国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投降卖国，中国最后遭受失败。1895年，中国被迫接受了奴役性的和约即《马关条约》。根据条约，朝鲜变成所谓“独立自主国家”，实际上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从中国割去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以及赔偿战费两亿两白银。这个条约的签定，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也使日本与妄图独占中国东北的沙俄帝国主义发生了利害冲突。因此，《马关条约》签订后，沙俄便联合德、法，强迫日本将辽东半岛“退还”中国。日本这时在中朝人民的打击下已无力与俄、德、法三国对抗，结果要中国再交3000万两白银为代价，日本暂时放弃辽东半岛。沙俄借口干涉“有功”，迫使清朝政府给与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的权利；1898年，又强行租借旅顺、大连，准备把旅顺口建成它的太平洋舰队基地；同时积极插手朝鲜，这样就和日本强盗发生尖锐的矛盾。

1900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爱国反帝斗争，斗争的矛头最初只直接指向欧美列强，日本根本没有参战的理由，但是日本却认为机会难得，积极地参加了镇压义和团的八国联军。日本先后派遣25,000名军人，占八国联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是联军中出兵最多的国家。

沙俄也不甘心示弱，它一方面派出少数兵力参加八国联军攻打天津、北京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借机派重兵侵入中国东北，到9月底，至少出兵达17万人，相当于攻打北京、天津的八国联军总数的五倍以上。翌年（1901年），八国联军强迫中国订立《辛丑条约》。沙皇俄国妄图永远占领中国东北，拒不撤兵。俄国这种独占中国的野心，与日本侵略中国的阴谋发生矛盾，所以日本决定与沙俄以兵戎相见。英美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其在华侵略权益，也反对沙皇俄国，决定扶持日本。1902年1月，英国与日本签定英日同盟条约，公开支持日本。美国国务院公开宣称：“如对日开战，美国的同情将在日本方面”。

在英、美等国的怂恿下，1904年2月8日夜，日本舰队突然袭击停泊在中国旅顺口的沙俄太平洋舰队，使其蒙受重大损失，同时，日军登陆朝鲜仁川。10月10日，日俄相互正式宣战。战争是在有利于日本的情况下进行的，日本陆军主力从朝鲜北上，跨过鸭绿江，侵入中国东北。另一支部队则从海上攻入辽东半岛，包围了俄国经营多年，自夸为“举世无双”的要塞旅顺口；经过几次鏖战，日军终于在1905年1月，攻克旅顺。其后，日军以破竹之势向北推进，3月10日在沈阳会战中取胜。至此，两军在陆上的争夺基本结束。这时，经过几个月航行，远道而来的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也来到远东，1905年5月27日在对马海峡附近与日舰相遇，经过两天海战，以逸待劳的日军，将

俄舰全部歼灭。7月，日军又占领库页岛。

这时俄国国内已爆发革命，沙俄为了镇压革命，已无力再战，而日本由于战争消耗，也精疲力竭。国际帝国主义，特别是英美，一方面害怕俄国革命胜利，推翻沙皇统治，引起连锁反应，最后危及它们自己；另一方面又担心日本在战后势力过于强大，会威胁到它们远东的殖民利益。于是由美国出面调停，1905年9月5日，日俄两国在美国的朴次茅斯签订和约。根据这一和约，日本取得中国辽东半岛和俄国库页岛南部，以及对朝鲜的独占权。至此，经过中日、日俄两次战争，连同已割占的中国台湾省，日本夺取了相当于本土面积76%的殖民地，并将中国东北南部纳入其势力范围内，初步形成一个殖民帝国。

日俄战争后，日本加紧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活动。1905年底，日本政府迫使清政府同它签订《中日东三省事宜条约》，除强迫清政府承认俄国根据《朴次茅斯和约》让与日本在中国东北南部的各项特权外，又强迫清政府开放吉林、哈尔滨、满洲里等为商埠。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从此，日本日益走上了与欧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世界霸权，首先是侵略中国称霸亚洲的军国主义道路。

（四）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

明治维新后，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也开始壮大起来。据统计，日本1888年共有产业工人13.6万人，1899年增至142.6万人，1909年则达到244万人。1897年，雇佣劳动者的三分之二是在纺织业劳动的女工，这些妇女劳动力主要来自农村。

日本的工人阶级备受资本家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在明治维新后不久就展开了反抗斗争。1869年和1871年，生野矿区的矿工两次举行暴动，捣毁矿工管理局。1878年，高岛煤矿发生暴动，有三千多工人参加。1886年，甲府市（山梨县）纺织女工为反对厂主延长工时举行罢工，取得了胜利，这是日本近代产业工人的第一次罢工。此后，日本的罢工斗争在各地广泛展开。但罢工分散，互相很少联系。

中日战争后，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工人阶级队伍日益壮大，工人更加集中于大企业和矿山。同时由于剥削的加强，工人阶级状况更加恶化。因此，工人的反抗斗争，不论从思想上和组织上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据统计，仅从1897年6月到11月间，就发生31次罢工斗争，其中包括造船工人、纺织工人、矿工、印刷工人，以及铁路工人。

无产阶级在斗争中认识到组织起来的重要意义，开始建立工会。1897年，片山潜等人组织了“劳动组合期成会”，通过期成会的努力，又组织了东京及其附近的铁工工会和其他工会。铁工工会在1900年初拥有42个支部，5400余会员，它把当时大工业中熟练工人的大部分都组织起来了。它和期成会一起发行了日本最早的工人杂志《劳动世界》，片山潜担任了这个工会的书记和杂志的总编辑。

1898年2月，铁路司机工人举行罢工，片山潜也参加了这次罢工的领导。这次罢工组织得很好，由于用电报进行了联系，400名司机同时宣布罢工，使东京青森全线火车停驶，最后取得了胜利。

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想也传播开来。在这方面，片山潜也

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片山潜（1859～1933年），出生在日本冈山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23岁时流浪到东京当印刷工人。他在劳动中深刻体会到工人受压迫受剥削的痛苦，为了追求真理，26岁时去美国半工半读，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想。为了实地考察英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工人运动，他还去过英国伦敦。1896年他回到日本，投身工人运动，宣传社会主义。

1898年10月，片山潜和平民运动领袖幸德秋水（1871—1911年）等人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一年后发展为“社会主义协会”，参加了第二国际，成为在日本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十九章 第二国际（1889～1900年）

第一节 第二国际的成立

（一）第二国际成立的背景

19世纪70、80年代国际工人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群众性的工人政党相继出现，它们一般地都积极参加选举，并在议会中取得了数量不等的席位，领导各种工人组织：工会或合作社，积极为工人群众谋利益。这些工人政党的建立和发展固然是各国工人努力的结果，同时也是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分不开的。第一国际解散后，他们二人积极工作，不但在行动上鼓励和支持各国工人成立自己的政党，而且还用理论去武装各国工人政党，严肃地批评各国党内的错误倾向，使其沿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健康发展。

正在这个时候，马克思积劳成疾，在1883年3月14日溘然长逝。马克思的逝世是国际工人运动的巨大损失。噩耗传出后，各国工人无不以悲痛的心情哀悼这位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

马克思逝世后，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任落在恩格斯的肩上。恩格斯集中精力从事整理和出版马克思的遗稿，因而《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分别在1885年和1894年相继问世。80年代，恩格斯还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等著作，坚持不懈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中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越来越多的先进工人接受了这个革命理论。这与五六十年代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在各国工人政党纷纷出现和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情况下，各国工人及其政党很自然地产生一个共同的要求：加强国际工人的团结，成立新的工人国际组织。这个要求早在80年代初就出现了。

然而当时恩格斯的意见是：在这个时期如果成立一个新的国际，为时过早。按照他的主张，新的国际“再也不会是一个宣传的团体，而只能是一个行动的团体了”，因此成立这样一个国际组织不可草率从事。

但是，在第一国际解散后，无政府主义者、工联主义者以及法国的可能派都主张即刻成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他们的目的是想把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中，并且利用这样的领导地位去阻止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削弱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影响。

1889年，法国可能派抱着这个目的建议召开一个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以便成立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工人组织。由于考虑到可能派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成立国际组织会给工人运动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并且为了与可能派即将召开的国际大会相抗衡，恩格斯便敦促法国的盖德派发起召开一个国际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的代表大会。恩格斯以68岁的高龄热情地投入了大会的准备工作。

然而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比利时、荷兰的工人政党对法国可能派抱妥协态度。恩格斯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他尖锐地批判调和主义，并且揭露了可能派的阴谋。结果，接受可能派邀请的只有英国工会领袖和英国社会民主

恩格斯：《致约·菲·贝克尔（1882年2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68页。

同盟的领导人，而盖德派发出的邀请却获得绝大多数工人组织的欢迎和接受。有趣的是：许多英国工会违反他们的领袖的旨意，声明他们愿意派代表参加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大会，而不参加可能派的大会。欧美很多无产阶级组织也发出了类似的声明。

（二）巴黎代表大会与第二国际的成立

1889年7月14日，即攻陷巴士底大狱100周年纪念日那一天，在巴黎召开了两个国际代表大会：恩格斯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代表大会与可能派召集的代表大会。出席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大会的有来自22个国家的393名代表，几乎欧洲所有的国家以及美国和阿根廷的工人组织都有代表参加。而出席可能派的代表大会的代表虽多达550人，但是其中法国人就占了477名，而另外九个国家的代表只有80人，而且差不多都是工联主义者。从大会的代表成分来看，这个大会是清一色的可能派的代表大会。这一事实表明：可能派夺取新国际的领导权的计划失败了。

参加马克思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许多卓越的工人领袖，如德国的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蔡特金，法国的拉法格、盖德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的女儿伊利诺·艾维林也出席了大会。恩格斯由于正忙于《资本论》的脱稿付印工作，而未得出席。以代表的思想倾向而论，代表中不但有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改良主义者。

大会讨论了国际劳工立法问题，通过了倍倍尔提出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结果，工人阶级遭到越来越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因此工人阶级必须利用一切手段（集会、报纸宣传、请愿及示威游行等）促使各国政府制定劳工立法，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劳动保护制、保护童工和女工的利益，废除血汗制度等等。

其次，大会还讨论了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问题，并且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决议指出：展开经济斗争以争取制定劳工立法，是工人阶级解放自己的“先决条件”，是启发劳动人民阶级觉悟的手段，但是，“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只靠劳工的经济组织（工联和工会）是不够的”，还必须加强“决不与其他政党妥协的社会主义政党”，必须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统治的政治斗争。“只有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在国际上共同努力，只有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剥夺资本家阶级的生产资料并把它变为公有财产之后，劳动和人类才能获得解放”。无产者在有选举权的国家里，应当“利用自己的投票权竭力在现存制度下夺取政权”。

大会也讨论了关于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问题。为了纪念美国工人1886年5月1日的罢工斗争和支援美国工人预定在1890年5月1日举行的总罢工，大会根据法、美两国代表的建议通过了关于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决议，决议要求各国工人每年5月1日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

大会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取消常备军和实现全民武装的问题。大会在决议中谴责了军国主义，指出军国主义和常备军是为资本服务的反动工具，“是实行政变和社会压迫的工具”，是对外侵略的工具，而且给人民带来痛苦和沉重负担。因此，决议要求击败各国政府所提出的军事法案，要求取消常备军，“以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以和平与民主去代替侵略。

这样，巴黎大会制定了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这在实际上就是宣

告新的国际——第二国际的诞生。这些成就首先应归功于恩格斯的思想领导及组织领导。

但是，这次成立大会也有严重的缺点：对会上发表的一些机会主义的、错误的言论没有加以批判或反驳。奥地利的代表维克多·阿德勒在会上大肆宣传对无产阶级运动非常有害的关于资本主义自动崩溃的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不需要任何革命就可以自动走向崩溃，工人阶级只需消极等待就可以了。苏格兰工人领袖加依尔·哈地公然认为八小时工作日的法律的制定要比一切革命更有价值。

虽然如此，这次大会的成绩是主要的，因为它奠定了第二国际的基础。

第二节 19世纪晚期的第二国际

（一）恩格斯反对议会主义、合法主义的斗争

在恩格斯领导下成立的第二国际，最初还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组织。在其活动的初期，它有力地促进了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在德国，在工人运动的强大压力下，1890年取消了反对社会主义的“非常法”。英国工会不顾工联主义领导的反对，在1890年提出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在西欧国家的议会选举中，社会主义者得到的选票越来越多，工人政党被选进议会的代表也越来越多，他们有效地利用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社会主义刊物的发行量显著增加，工人政党的宣传鼓动活动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因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有更多的工人参加工人运动，加入工会，或者成立合作社。但是，就在第二国际活动的初期，已经显露出机会主义在萌生。

在1891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英国和德国代表团提议把五一示威活动改在5月第一个星期日举行。这个建议的用意非常明显：他们希望避免与资本家发生冲突，因为工人在五一这一天举行示威，势必停止工作。如果按照这个建议去做，五一节就失去革命的战斗意义。而代表大会竟然接受了这个建议。不过，事实上与这个建议的提出者的主观愿望相反，各国的工人群众每年都是在五一这一天举行示威游行。

在1893年的苏黎世代表大会上讨论了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策略问题，并且通过了决议。决议强调工人阶级必须充分利用选举权，以便“夺取政权，俾使政权由资本统治的工具变成无产阶级解放的工具”。但是决议没有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问题与无产阶级革命问题联系起来，而是要求“政治和经济斗争的方式和方法应由各国根据本国的特殊条件自行选择”。实际上是把夺取政权的希望寄托在议会斗争上面。

因此，恩格斯以全副精力与第二国际中的这种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他亲自出席了苏黎世代表大会，在会上发言警告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对于议会主义、政治改革不应有过高的估计。

1891年他不顾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反对，把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公布了。他为这一时期再版的一系列马克思的著作写了序言，揭发了机会主义，并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指出了正确的道路。他反复强调下面的基本观念：工人阶级如果没有独立的政党，如果不夺取政权，就不可能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由于恩格斯在自己的晚年用全部力量与成长着的机会主义作不妥协的斗争，第二国际在当时基本上还沿着革命的方向前进。但是，1895年8月5日，恩格斯与世长辞。恩格斯逝世后，机会主义就逐渐在第二国际中占了上风。

（二）第二国际内机会主义势力的增长

在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年（1896年）的伦敦代表大会上就已显示出机会主义势力的抬头。大会在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的决议中虽然承认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重要性，但在夺取政权的方式上，只强调议会选举，并且号召工人为下列目标而斗争：“一切成年公民有普选权，每个成年公民都有被

选举权，以投票方式进行选举”。

大会讨论了土地问题并且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决议虽然正确地指出资本主义给农民带来的日益深重的灾难，只有在社会主义下面才能消除这个灾难，但是在涉及如何对待农民问题时，大会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方针和任务来。换言之，第二国际的各国党完全忽略了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和农民建立联盟的问题，这说明它们害怕革命，不愿意引导无产阶级去进行革命，夺取政权。

在 1900 年巴黎代表大会上，机会主义表露得更为充分。在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转变关头，产生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法国独立社会主义者米勒兰之入阁，就是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实践。这两件事合在一起，就表明国际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发展到了顶点。巴黎大会在讨论米勒兰入阁问题的过程中，围绕社会主义者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政府的问题，展开了非常尖锐的辩论，并且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意见。一派是以盖德为首的反入阁派，他们在盖德—费利决议草案中指出：“在资产阶级制度下，要夺取社会权力，只有占据议席，而这要依靠党本身的力量，也就是要依靠组成阶级政党的工人的力量，并且必须禁止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

另一派是以饶勒斯为首的入阁派。他在《两种方法》一文中力图证明：米勒兰参加内阁“是社会党的发展和强大的明显标志”。他认为米勒兰入阁拯救了共和国，并且是“在政治上剥夺资产阶级的开始”。

大会的第三派是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考茨基提出的决议草案说：“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认为是夺取政权的正常开端，而只能认为是在迫不得已采取的暂时性的特殊手段。如果在某种情况下政治形势要求作这种冒险的尝试，那末，这是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国际代表大会不对此发表意见。”大会以 29 票通过了考茨基的决议草案。意大利社会党人恩科利·费利称它为“橡皮性的决定”。

大会另外还讨论了组织问题。到 1900 年为止，第二国际一直没有一定形式的常设领导机构，这是一个很大的弱点。由于第二国际活动范围的扩大，也出于加强工人组织联系的需要，大会决议成立国际的最高领导机关，即国际社会主义局。但是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领导机构，只能算是一个通信和统计的中心机构，因为它没有权力，各国的党可以自行其是。

机会主义在第二国际内的抬头，固然和恩格斯的逝世有关，但是更为根本的原因应该到时代条件中去找。

首先，机会主义的增长是由于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所造成的。帝国主义扩大了机会主义的阶级基础。资产阶级从超额利润中拿出一小部分来收买工人上层分子（如提高他们的工资等），于是这些上层分子就成为机会主义的支柱。

其次，在工人中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及越来越多的工人相信社会主义，迫使资产阶级实行广泛的劳工立法。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欧美有许多国家的工人享受了社会保险。资产阶级策略上的改变，对机会主义者有很大的诱惑力。

第三，在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许多小资产阶级破产了，他们涌入无产阶级队伍，于是就把小资产阶级意识带到工人中间来，他们还念念不忘想爬上资产阶级地位。这种思想意识也成了机会主义滋长的基础。

第四，工人政党、工会和合作社等组织中的干部逐渐成为脱离群众的官

僚，他们不关心工人群众的命运，力图回避斗争，唯恐失去优厚的待遇和地位。

第二十章 19 世纪晚期的亚洲

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列强把亚洲瓜分完了。朝鲜、越南、缅甸、阿拉伯各国相继变成了列强的殖民地；中国、伊朗、泰国、土耳其则变成了半殖民地，列强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

这个时期的亚洲，现代化的进程屡遭挫折，但社会结构开始变化，出现了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资本主义；形成或正在形成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产生了新的意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这就大大地推动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这个时期，许多亚洲国家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下层人民群众的起义。其中主要有越南安世农民的反法起义（1887～1913 年）、朝鲜甲午农民战争（1894～1895 年）、菲律宾独立战争和抗美战争（1894～1902 年）、中国义和团运动（1900～1901 年）等。

这个时期，在亚洲许多国家还出现了以地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其中主要有伊朗的君主立宪运动、土耳其新奥斯曼党人领导的立宪运动、中国的戊戌维新运动、印度的国大党运动等。这些资产阶级政治运动都没有超出自上而下的改良范畴，都没有能够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甚至还敌视工农运动，因此成效甚微，均告失败。但是，这些运动对于唤起亚洲各国人民的民族民主意识起了启蒙作用。

第一节 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一）日本的入侵和朝鲜沦为半殖民地

19 世纪晚期，当资本主义列强掀起争夺殖民地狂潮的时候，特别是当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的时候，朝鲜也面临着被欧美列强和日本瓜分的危险。

当时，朝鲜还是一个落后衰败、闭关自守的封建国家。

19 世纪中叶，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国内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农民起义的浪潮席卷全国。同时，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间的朋党倾轧也十分激烈，政变频仍。为了挽救李氏王朝的统治，1863 年掌权的兴宣大院君对内标榜四色平等，翦除外戚势力，禁止新设书院，以加强中央集权；对外强化早已实行的“锁国攘夷”政策，企图使朝鲜与外界隔绝，以防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

从 19 世纪 30 年代起，英、法、美殖民主义者的炮舰一再轰击朝鲜的大门。1866 年法国和美国的入侵，1871 年美国舰队的侵略，都因朝鲜军民的英勇抵抗而未能得逞。

1873 年外戚闵妃集团以“国王亲政”为借口，把大院君赶下了台。闵妃集团在列强炮舰威胁下，一味妥协投降。

1875 年 9 月，日舰“云扬号”驶入朝鲜的江华海峡，测量航道，向朝鲜驻军挑衅，击毁炮台，登陆永宗岛，烧杀抢掠，制造了所谓“云扬号”事件。

李氏王朝第二十六代国王高宗李熙的父亲。凡旁支入继王位的国王的父亲通称大院君。

指当时朝鲜统治阶级内部的四个派别，即老论、少论、南人和北人。

次年2月，日本侵略者又派七艘军舰，一千余名陆战队员，侵入江华岛，蛮横地要朝鲜政府派代表签订“友好”条约。闵氏集团不顾举国上下的强烈反对，向日本侵略者屈膝投降，签订了所谓《日朝修好条规》，即《江华条约》；接着又签订了《朝日修好条规附录》《朝日贸易规则》等。按这些条约的规定，除釜山外，朝鲜再向日本开放仁川、元山两港；朝日“自由”通商，日货免纳关税，日币在朝鲜各通商口岸可以自由流通；日本有权在指定的港口派驻领事，日本人享有领事裁判权，等等。《江华条约》是殖民主义者强加在朝鲜人民身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882~1892年，美、英、法、俄、德等国继日本之后，强迫朝鲜签订了类似的不平等条约。从此，朝鲜便一步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壬午兵变

《江华条约》签订后，日商通过廉价商品的倾销，对粮食和农业原料的掠夺，以及日币在通商口岸的流通，使朝鲜的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遭到了沉重打击，广大农民的处境日趋恶化。由于向日本支付通商口岸设备费、频繁的日本外交使团的接待费、庞大的行政和军事开支，以及宫廷贵族有增无已的奢侈挥霍，使国库濒于枯竭，以致下级官员和士兵的薪米长期不能发放。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封建统治者卖官鬻爵，横征暴敛，加重了人民的租税负担。

在日本侵略者与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榨下，朝鲜人民忍无可忍，奋起反抗，各地接连爆发人民起义。其中主要有：1875年蔚山人民起义，1878年韩山人民起义，1880年长连、鸟龄、安东的人民起义，1880年到1881年的仁川人民起义等。

人民群众的起义也影响了士兵。朝鲜卖国政府听从日本的诱劝，改编政府机构和军队，缩编旧军，增建新军，聘请日本教官，这实际上是为日本控制朝鲜政府和军队铺平道路。封建统治者的卖国政策和克扣军饷引起士兵的极端不满。为了缓和士兵的不满情绪，闵妃之兄兵曹判书 闵谦镐于1882年7月答应发放拖欠了一年多的军饷。但是，实际上只发了一个月的薪米，而且米量不足，并掺杂很多砂石糠粕。士兵们愤怒地拒绝领米，并且痛打值班军官和库吏，举行示威游行，闵谦镐竟然滥施淫威，将为首的士兵逮捕。统治者的暴行成了“壬午兵变”的导火线。

1882年（壬午年）7月23日，汉城驻军数千人在柳万春、金长孙的领导下举行起义，起义军队与汉城贫民起义相汇合，占领武器库，夺取武器，冲进监狱，释放被捕的士兵和无辜群众，捣毁闵谦镐、闵台镐等几个大臣的住宅，烧毁日本公使馆，杀死日本教官和官员。日本公使花房义质连夜逃往仁川。次日，汉城新军和郊区农民也参加了起义，起义的声势愈来愈大。起义军民冲进王宫，闵妃化装宫女逃走。藏在宫里的闵谦镐、金辅铉等几个卖国大臣和贵族被处死。其他大臣官僚也惊恐万状，弃官而逃。整个汉城为起义军民所控制。但是，由于一部分士兵对反对闵妃集团的大院君抱有幻想。使大院君乘机入宫，重掌政权。当然，他的地位并不巩固，8月下旬，应闵妃

兵曹判书：当时朝鲜封建中央机构设礼、工、刑、户、兵、吏六曹，各曹的首脑称判书。兵曹判书是掌管全国军事的行政首脑。

集团的请求，清政府派遣丁汝昌和袁世凯等率领 3000 军队进入汉城，残酷地镇压起义的士兵和贫民，逮捕了大院君，并把他押送中国拘留，闵妃集团重新掌权。

壬午兵变是朝鲜近代史上人民第一次反侵略反封建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朝鲜封建统治者。

日本侵略者乘机于 1882 年 8 月派兵 1500 名入侵汉城，用武力胁迫朝鲜政府签订《济物浦条约》（即《仁川条约》）和《朝日修好条规续约》，规定：朝鲜政府向日本政府和被害家属赔款 55 万元，日本在汉城有驻军之权，日本公使、领事、随员等得自由进入朝鲜内地。清政府为了牵制日本，也开始在朝鲜驻军。

（三）开化派的改良运动与甲申政变

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在朝鲜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要求改革的开化派。他们的主要成员是一些受外国资本主义影响的贵族青年知识分子和官吏，其代表人物有洪英植、金玉均、朴永孝等。通商口岸开放以后，他们看到欧美各国，尤其是日本迅速发展的近代文明，意识到封建朝鲜的落后和祖国前途的危机，要求仿效资本主义国家，走“明治维新”的道路，进行社会改革，使朝鲜开化成为像日本那样的近代独立国家。他们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极为软弱的朝鲜资产阶级要求改良的愿望和朝鲜人民自强独立的要求。

汉城起义失败以后，开化派和闵妃集团守旧派的斗争日益激烈。开化派在国内企图依靠国王李熙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在国外则寻求日本的支持。日本侵略者鉴于清政府支持闵妃集团，为了排除清廷在朝鲜的势力，完全控制朝鲜，便竭力拉拢和利用开化派，培植亲日势力。

1882 年底，开化派利用他们在政府中的职位，实行了一些自上而下的改革，如开办新式农场，研究农学，改革警察制度，设立警巡局，建立邮政局，出版《汉城旬报》，并从两班以外的平民中，选派青年学生去日本留学。但是，由于当权的守旧派的阻挠，这些改革收效不大。

从 1883 年开始，开化派积极准备打倒守旧派的政变，日美两国驻朝公使表示“支持”。1884 年（甲申年）12 月 4 日晚，开化派在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的策划下，借举行庆祝邮政局落成宴会之机，发动政变。他们依靠日本军队，杀死守旧派的主要官员闵台镐、闵永穆、赵宁夏等。次日，又挟持国王，组成新政府，宣布同清政府断绝外交关系。6 日晨，新政府发表政纲，宣布废除门阀，四民平等，革除冗官，惩处奸贪，改革租税，整编军队，统一财政，商业自由，限制国王与宫廷权力等。这个政纲的目的在于将朝鲜从封建国家体制转变为资产阶级的国家体制。但是，它没有触及当时社会的根本问题，即土地问题。他们的政变完全脱离群众，因而没有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12 月 6 日下午，清军应闵妃集团的请求入宫，向日军进攻。日本公使见势不利，率军逃跑。洪英植等为清军杀害，金玉均等亡命日本。政权又落入守旧派之手。甲申政变遂遭失败。

指官员的文武两班。

甲申政变是由封建两班出身并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领导的一次带有资产阶级改良色彩的政治运动。这次改良运动虽然很不彻底，但却是变封建朝鲜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首次尝试，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但是，开化派不敢依靠人民群众，反而求助于朝鲜人民的死敌日本侵略者，使日本借机干涉朝鲜内政。开化派的这种行动违背了朝鲜民族利益，也是他们的最大错误和失败的重要原因。金玉均逃亡日本之后，继续活动，1894年在上海被朝鲜封建统治者派人刺杀，他的遗体运到汉城，被凌迟处斩。

甲申政变失败后，日本侵略者派兵入侵汉城，蛮横地迫使朝鲜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汉城条约”，规定：向日本致书道歉，赔偿日本死难士官家属抚恤费和兵营使馆建筑费 13 万元，惩办杀害日本人的凶手，等等。

（四）甲午农民战争

甲申政变以后，资本主义列强争夺朝鲜的斗争更加激烈。俄美两国都在朝鲜封建统治集团里寻找和培植代理人。英国于 1885 年 2 月占领巨文岛。日本加紧扩充军备，准备发动大规模的“征韩”战争，进而侵略中国。在经济上，资本主义列强，特别是日本利用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各种特权，倾销商品，收购原料和粮食，加紧掠夺朝鲜人民。根据仁川、元山、釜山三港的统计，1885 年日本输往朝鲜的商品总值是 130 余万美元；1892 年就增至 250 万美元。日本商人还深入农村，用高利贷盘剥的方式收购农产品，春天贷给农民少量款项，秋天夺取收成一半。他们夺去了农民的基本生活资料，致使朝鲜粮食奇缺，粮价暴涨。1889 年饥荒遍于全国，咸镜道全部农产品都被日本高利贷商人夺去。农民死于饥荒者不计其数。日本资本家还控制了朝鲜的金融、渔业，兴办各种运输公司，垄断朝鲜的运输事业，控制对外贸易。欧美商品也由中国买办商人源源不断地运入朝鲜。1887 年，朝鲜的入超达 200 余万元。

甲申政变后，一方面因巨额赔款、大量外债，以及王室贵族奢侈靡费和官吏的贪污中饱，国家财政支出急骤增长。另一方面，因贵族官僚疯狂的兼并土地，免税漏税的土地面积不断增多，1893 年缴纳田赋的土地面积仅占全国耕地面积的一半。于是，田赋收入愈来愈少，财政亏空愈来愈大。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搜刮更多的钱财，封建统治者便滥发货币，增加税收，贪官污吏乘机加码浮派，衙役差吏借势敲诈勒索。苛捐杂税逼得农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致使“村村哭声连天，人人怨声载道”。

国内外剥削者贪得无厌的压榨，迫使人民揭竿而起。从 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国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受日本资本主义侵略之害最惨重的朝鲜南方的农民起义更加激烈频繁。起义的农民袭击官衙，惩办贪官土豪，杀死高利贷者和日本商人，“斥倭斥洋”，势震山河。农民起义的汹涌波涛也推动了东学道运动，使部分道徒摈弃了“控诉申冤”的运动形式，开始参加了农民的武装暴动。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爆发了朝鲜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甲午农民战

1860 年 5 月，庆尚北道庆州人崔济愚始创东学道。他们声称得天王启示，授予咒文，布教济民。他融合儒、佛、道三教，制成 21 字咒语，号称东学，与西学即天主教对抗。东学道运动是 19 世纪末叶朝鲜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种形式。因受封建政府迫害，这一时期东学道徒展开为教主崔济愚伸冤和争取自由传教的权利。

争。

1893年，朝鲜全国农业欠收，饿殍遍野。可是，贪官污吏仍然不择手段地压榨农民。全罗道古阜郡守赵秉甲不顾人民的死活，强迫万名民工修筑“万石淤”灌溉工程，又向农民非法征收水税，以肥私囊。这一事件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线。1894年1月10日，古阜、泰仁两郡几千名愤怒的农民群众，拿起竹枪锄头，袭击古阜郡衙，占领武器库，砸开牢门，释放无辜百姓；打开仓库，把非法征来的水税米4000石分给农民；烧毁土地奴婢契约。这次起义的领导人是东学道徒全琫准（1854~1895年）。他生长在全罗道高敞郡一个贫寒的乡班家庭。父亲因领导农民起义，袭击官衙，被逮捕杀害。全琫准怀着对封建统治者的满腔仇恨于1874年参加了东学道。后来又当了古阜和泰仁地区的东学道接主。

起义之初，全琫准领导的起义军提出了四条纲领：一、不杀人，不伤物；二、忠孝双全，济世安民；三、逐灭倭夷，澄清世道；四、驱兵入京，尽灭权贵。1894年3、4月，全琫准领导农民起义军占领古阜、泰仁以后，便以白山为根据地，把散乱的起义农民组成统一的农民军，建立农民军司令部。他担任总大将，金开南和孙化中为总管领。他们向全国发布檄文，用公开的政治形式，宣布起义军的目的是“拯救百姓于涂炭，奠国家于磐石”，“内斩贪虐之官吏，外逐横暴之强敌”，号召受压迫的人民奋起战斗。起义军高举“辅国安民”，“尽灭权贵”，“逐灭倭夷”的旗帜，矛头直指本国封建统治者和日本侵略者。起义军的纲领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迫切愿望，城市贫民、逃奴、贱民、没落两班与儒生纷纷投奔起义军。他们头系白巾，手执竹枪，建成了一支“立则白山，坐则竹山”的威武雄壮的革命队伍。

古阜起义使封建统治者惊惶万状，急忙调集军队，向起义军进攻。4月6日，农民军在黄土岬以巧妙的伏击战全歼来犯的官军，缴获了一门大炮和许多枪支弹药。接着农民军连克井邑、高敞、兴德、长茂等地。4月23日，在长城会战中歼灭了官军主力。4月28日，起义军又一举攻克南方重镇全州，直逼汉城。农民军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广大人民，全罗、忠清、庆尚、京畿、江原、黄海各道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腐朽的封建王朝陷于农民革命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农民军进逼汉城时国王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乞援于清政府，同时又向农民军求和，企图获得喘息时间，伺机反扑。农民军受骗议和，停止进军，与封建政府签订了“全州和约”。政府被迫同意农民军提出的12项要求，如停止迫害东学道徒，严惩不法两班贪官污吏、横暴富豪和私通日本者，平分土地，取消一切公私债务和苛捐杂税，解放奴婢，改善贱民待遇等。缔约之后，农民军退出全州，撤到顺天、南原一带。同时，农民军在全罗道53郡建立了农民政权执纲所，执行各项议和条款，维护农民利益。

但是，和约墨迹未干，封建统治者就向农民军进行猖狂反扑。清军应朝鲜国王之请，于6月6日在牙山登陆。日本侵略者以清军入朝为借口，随即派军队在仁川登陆，占领仁川到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7月23日，日军占领王宫，发动政变，组成了以金弘集为首的亲日派政府，并嗾使傀儡政府宣布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委托”日军驱除中国驻军。7月25日，日本即向中

地方上的两班。

东学道的地方首领。

国不宣而战。9月中旬，清军溃败，被迫撤出朝鲜。日本侵略者便完全操纵了朝鲜政府，就与傀儡政府联合向农民军发动进攻。这时农民军已发展到十万余人，控制了全国五分之三的土地，士气高昂，积极准备北伐，直取汉城，驱除日倭，推翻傀儡政府。但在这一关键时刻，农民军领导集团却发生分裂。东学道首领崔时亨一派借口使用暴力违反教义，坚决反对北进，并且进行公开的分裂活动。他们公然发表通告，诬蔑全琫准等农民革命领袖“借道酿乱”，是“国家之罪人，师门之逆贼”，号召道徒对他们“聚力而攻之”。他们的分裂活动严重地影响了农民军的统一和团结。全琫准在大多数将领支持下，坚持北进。10月中旬，农民军分三路向汉城进军。20日在公州与日本侵略军和政府军发生激战。农民军因武器简陋，缺乏军事训练，经过六天血战，重创日军之后，被迫后撤。11月下旬，在论山战役中，农民军与敌人血战11天，因力量对比的悬殊，农民军遭受严重损失，被迫分成小股部队转战于忠清道和全罗道，全琫准率领一部分军队转战到全罗道淳昌一带，准备重新集结力量，继续战斗。但因叛徒告密，12月9日，他在途中被俘，次年3月17日，英勇就义。轰轰烈烈的甲午农民战争被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绞杀了。

甲午农民战争是在东学道宗教旗帜下进行的农民战争。就其规模和影响来说，它是朝鲜旧式农民战争最大的一次。起义者的英勇斗争进一步动摇了日趋瓦解的朝鲜封建制度的基础，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进一步唤醒了朝鲜人民的民族觉醒，推动了朝鲜人民的抗日斗争，在朝鲜人民反殖、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成为19世纪末年亚洲人民反殖反封建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节 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与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

（一）阮氏王朝的反动统治

早在 17 世纪初，法国殖民主义者就派遣传教士和商人来到越南。1802 年，法国殖民主义者勾结阮福映绞杀了西山农民起义政权，建立了阮氏王朝。阮福映恢复封建秩序，扩大官僚机构，加强中央集权制。全国分为南、北、中三圻，定都顺化。任命武官为地方长官，加强军事统治，施行酷刑峻法，镇压人民反抗。官吏豪强恣意霸占公田，兼并土地。官府卖官鬻爵，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农民不仅要交纳人头、住房、灯火等税，进贡燕窝、“贡荔”、肉桂、龙眼等珍贵食品，还要服繁重的劳役，修筑宫殿城堡和官署皇陵。苛重的赋税和劳役迫使农民鬻儿卖女，倾家荡产。由于人民的极端贫困，生产技术的落后，水利的常年失修，致使水旱蝗灾，连年不断，疾病猖獗，饥荒频仍，农民死于饥馑者成千累万。仅 1820 年因病饿而死的就多达 20 万人。1850 年又饿死了 58 万多人。反动王朝还极力压抑工商业，垄断制枪、造船和对外贸易，对金、银、铜、铝、硫磺、硝石等实行专卖，严重阻碍工商业的发展。阮朝封建统治者穷兵黩武，妄图吞并和控制弱小邻国。从 19 世纪初叶开始，在“保护真腊国”（今柬埔寨）的幌子下，一再派兵入侵柬埔寨。并于 1834 年将柬埔寨变成为它的“保护国”，全面控制了柬的军政大权。随即向柬大量移民，霸占农民土地，将柬埔寨人民赶出家园，强制推行同化政策，残酷剥削柬人民，并多次血腥镇压柬人民的反抗。后又迫使老挝对其称臣纳贡。完全暴露了越南封建王朝扩张主义的凶残本质。

越南广大农民因不堪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和残酷压榨而纷起反抗。19 世纪前半叶，农民起义连绵不断。仅 1820 年至 1840 年间，农民起义就达二百多起，规模较大的有潘伯 领导的南定农民起义，黎文 领导的嘉定起义，农文云领导的宣光少数民族起义，等等。同时，柬埔寨、老挝人民也不断掀起反抗越南占领者的起义。1820 年和 1840 年柬埔寨人民曾两次打败了越南占领军。国内外人民的激烈反抗，使阮氏王朝的统治陷入严重的危机。

（二）法国在越南殖民统治的建立

当 19 世纪中期越南阮氏封建王朝的统治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候，法国殖民主义者加快了吞并越南的侵略步伐。19 世纪 40 年代，法国一再派遣舰队，侵犯土伦、西贡、嘉定等地。1861 年伙同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打败中国之后，便倾全力进攻南圻，相继占领嘉定、定祥、边和等省；次年，迫使阮氏王朝签订了丧权割地的第一次西贡条约，割让上述三省和昆仑岛，开放土伦、巴叻、广安三港为商埠；法国的商船和军舰在湄公河及其支流可自由航行；保证法国人自由贸易；偿付战费 400 万比阿斯特（西班牙货币）；越南割让土地给他国，须得法国同意。这一奴役性条约使越南开始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法国占领南圻三省取得立足点之后，又于 1867 年占领了整个南圻，1874 年 3 月强迫越南签订第二次西贡条约。越南承认外交受法国监督，把整个南圻割给法国，开放红河与河内、海防、归仁三港，法国在越南享有领事裁判权。1883 年 8 月，法国殖民者又乘阮朝皇帝嗣德死后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皇位之机，派军进攻顺化，迫使阮朝签订《顺化条约》，规定法国对越南有保护

权，越南一切外交事务概由法国控制。次年6月6日，阮氏王朝被迫又在最后的卖国契《巴德诺条约》上签字，代替以前的一切条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这样，法国经过26年的逐步吞食，通过军事进攻与政治欺骗，迫使阮氏王朝节节退让，以至完全屈膝投降，终于把越南全部吞并，变成它的殖民地。

法国殖民者在实现吞并越南，进而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又挑起了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早在70年代就应越南政府的邀请，在刘永福统率下的黑旗军开赴抗法前线，与越南人民并肩战斗在红河三角洲。1873年11月，收复河内，一举击毙法国殖民军司令安邨。1883年，法国侵略军在红河三角洲向清军发动新的进攻，遭到清军和越南人民的坚决反击。1884年，法军又进犯中国的台湾，被当地军民击败，从越南进犯广西、云南的法国侵略军，也在镇南关（今友谊关）—谅山之战中被击溃，中越人民相互支援，协同作战，取得了威震中外的辉煌胜利，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使法国的茹尔·费里内阁倒台，军事外交陷于一片混乱之中。但是，腐朽透顶的清政府却向战败的法国侵略者屈辱求和，缔结了中法《天津条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1887年法国把柬埔寨、老挝和越南合并为“印度支那联邦”，由驻西贡的法国总督进行统治。

为了巩固在越南的殖民统治，法国竭力推行殖民者惯用的阴险狡猾的“分而治之”政策。法国殖民者自侵略越南时起，就勾结拉拢封建地主阶级，收买降官叛将和土司酋长，招募伪军，用越南人打越南人。建立殖民统治之后，他们又在南、中、北三个地区采取了不同的殖民统治形式。南圻划为“直辖领地”，由法国总督直接统治，中圻划为“保护领”，保留阮氏封建王朝统治机构，同时派法国总监总揽一切，北圻又划为“半保护领”，形式上由阮朝傀儡政权统治，实际上一切听命于法国殖民统治者。他们还在印支三国之间及各个国家内的各民族之间，挑拨离间，煽动仇恨，利用这一国士兵去镇压另一国的人民起义，利用这一民族的伪军扑灭另一民族的人民反抗，破坏各国、各族人民的团结，转移斗争目标，以便各个击破。特别是利用越南傀儡军侵占柬埔寨，控制老挝，实行以越治柬，以越治老的阴谋。

法国殖民者在经济上对越南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与剥削，其主要方式是掠夺土地、征收重税、实行盐酒专卖、放高利贷、贩卖鸦片、广设赌场等等。掠夺土地是这一时期法国殖民政策的特点，他们以各种方式任意霸占农民的土地，或以开垦“荒地”，登记土地为名强行霸占，或乘农民之危以低价强购，或以参加反法起义的罪名强行没收。法国殖民者以这些无耻手段掠夺了大量的土地，1890年为1.09万公顷，1900年增至30.1万公顷，到1913年则增至47万公顷。他们把掠夺来的土地分给法国殖民官员和投机商人，这些殖民者用一部分土地直接经营大种植园，役使失去土地的农民，种植大米、橡胶、咖啡、茶树、柑桔，以供输出，牟取暴利；大部分土地则通过农村上层分子出租给农民进行封建剥削，以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有高额地租的收入。

征收苛捐杂税也是法国殖民者搜刮越南人民的重要手段。为了支付浩繁的军政费用，偿付法国资本家的高利贷债款，殖民政府的预算收入增长极快。1892年印度支那的预算收入是1968万元，1912年就达到3836万多元，增长了一倍。南圻一地预算收入，从1867年到1894年则增加了近六倍。这样庞大的预算收入，主要依靠横征暴敛。捐税名目繁多，有土地税、人头税、烟

酒税、房屋税、船户税、渡头税等。税额极其苛重，如在法国占领前，人头税每人是1角4分，到1898年，北圻则增加到2元5角，中圻为2元3角。而且死人也不能幸免，必须由生者代缴。间接税也极其繁重，1900年的间接税收入为1350万元，其中食盐、酒、鸦片三种税收占1100万元。1897年每担盐纳税2角5分，1906年就增至2元3角5分，迫使越南劳动人民减少食盐用量。

法国对越南人民的剥削方式也反映出它的高利贷帝国主义的特点。法国资本家在越南只将少量资本投入修筑战略铁路、公路、采煤以及种植园，大量资本则用于购买殖民政府的公债，对越南人民进行高利贷剥削。从1886年到1913年，法国资本家向殖民政府共贷出4.27亿法郎，殖民当局对每一个法郎都保证了高额利息。法国资本家还通过1873年成立的东方汇理银行在越南发行纸币，向殖民政府贷款，向农民发放高利贷，榨取巨额利息。1885年该行获得的利息是39.3万法郎，到1905年猛增至266.6万法郎，银行的股本也就由成立初期的800万法郎猛增到1910年的4800万法郎。法国高利贷商人还进行商业专卖活动。如以极低廉的价格强购大米，输出国外，获取厚利。对食盐、酒、鸦片实行专卖，榨取越南人民的脂膏。法国殖民者的种种残酷压榨，使越南人民陷于赤贫的悲惨境地，就是富饶的米仓南圻也饥荒连年。

（三）勤王运动与安世农民游击战争

法国殖民者入侵和奴役越南人民的过程，也是越南人民反奴役反侵略的过程。从1860年殖民军的铁蹄踏上南圻的领土到1884年迫使阮朝签订亡国条约为止，南圻人民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坚持抗法斗争达25年之久。19世纪末20世纪初，越南人民的反殖浪潮更加高涨。封建“文绅”领导的勤王运动与农民游击战争遍布各地。

法国入侵时，越南封建统治集团曾分化为投降派和主战派。阮朝卖国投敌之后，以咸宜帝为代表的一部分封建统治者，不甘做法国的傀儡奴仆，继续坚持斗争，1885年7月，阮朝大臣尊室说在顺化发动起义，袭击殖民军。咸宜帝也出走顺化，发出檄文，号召各地文绅“勤王”。1885~1896年，各地爱国文绅和封建官吏纷起响应，从北圻的兴安、清化到中圻的广治、平定，勤王起义此伏彼起，持续不断。勤王运动得到人民的支持和响应，因而也带有一定程度的人民性。尤其是潘廷逢领导的起义队伍多是农民群众，许多将领也出身于下层人民，因而战斗力最强，坚持的时间最久，活动的地域比较广阔，包括河静、义安、广平和清化四省。起义军凭借山林险要，采用游击战术，不断地袭击侵略者。从1885年直到1896年，战斗了11年之久，有力地打击法国侵略者。但各地的勤王起义因为分散孤立，没有统一的指挥，在殖民者的军事围剿和政治诱惑下，相继失败。咸宜帝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尊室说等许多将领逃亡中国。

越南人民早期抗法斗争的主流是农民游击战争。法国入侵后，各地农民就展开了广泛的自卫斗争和规模巨大的游击战争。在法国侵略者占领城市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广大农村还掌握在农民起义军的手里。在抗敌保村的自卫斗争中，农民用木棍、矛枪、钉耙、砍刀等简陋武器和入侵者英勇搏斗。他们破坏桥梁，截断交通，袭击敌伪机关，惩处为虎作伥的越奸走狗，冲击了

殖民统治秩序，推迟了法国的殖民计划。给予法国侵略者打击最大的是1887~1913年黄花探领导的安世农民游击战。黄花探出身雇农，给地主放过牛，当过佃户。法国入侵北圻后，他满怀民族仇恨参加了抗法游击队。长期艰苦的战斗锻炼，使他成为一个英勇善战深孚众望的农民游击队领袖。他把安世地区各支游击队以及勇敢善射的山区部落联合成统一的起义大军，建立了比较牢固的根据地，不断地给殖民者以沉重的打击。法国殖民军从1889年起就在高尚、友芮不断地进行疯狂扫荡。游击队依靠人民群众，采取“避锐击惰，以逸待劳，临变从容，刻机神速”的灵活战术，运用“竹尖陷阱”等方法，大量歼灭敌军，一再粉碎了敌人的扫荡。1892年3月，法国曾集中大量军队，配备重型武器，向安世根据地大举进攻。游击队在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迅速转入丛林，在敌人扑空失措的时候，游击队寻找有利时机，攻其不备，大量杀伤敌人。到1894年，游击队的活动范围已扩大到河内至谅山的铁路沿线，经常截击火车，破坏铁路，使敌人的铁路修筑和运输常常处于瘫痪状态。

1894年5月，友芮之战，敌人的扫荡又遭惨败。法军指挥部，从法国公使、监兵到营地长官，非死即伤。游击队却安然转入森林。同年9月，游击队截击火车，擒获法国大地主、《北圻未来报》主编斯耐，使法国大为震动。

被打得焦头烂额、束手无策的殖民者被迫与黄花探谈判议和。1894年10月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根据协定：法军撤出安世地区；鸦南、牧山、安礼、友尚四总（越南地方行政单位）归黄花探管辖；法国付款赎回斯耐等人。但是，协定签订后不久，法国殖民者就调兵遣将，大修碉堡，勾结土豪，扩大伪军，准备进行反扑。次年11月，法军撕毁协定，向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企图一举消灭游击队。但是，早有戒备的农民军立即化整为零，分散到森林和村庄里，采取了“彼归则出，彼出则归”的战术，驰骋于北江、北宁、福安、太原四省，袭击据点，伏击来犯之敌，截击辎重运输。经过两年的战斗，农民军又一次粉碎了殖民军的围剿，1897年12月，殖民者被迫再次与黄花探谈判停战，签订了第二次停战协定。

停战以后，法国殖民者采用各种阴谋手段，对黄花探进行威胁利诱，先想收买拉拢，后又阴谋暗害，但都遭到可耻的失败。于是，1909年又集中优势兵力，发动了更疯狂的进攻。同时他们还伙同傀儡政权，对人民采取恐怖措施，企图切断游击队与人民的联系，游击队转战于福安、永安、北宁一带，10月5日，在郎山激战中，因力量对比的悬殊，游击队损失惨重，只剩下零星队伍，被迫进行分散活动。黄花探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下，带领一部分部队，在山地森林与敌人坚持战斗了三年之久，1913年2月10日，在安世森林里被殖民者派遣的内奸杀害。农民出身的越南民族英雄，坚持抗法斗争近三十年，最后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领导的安世农民游击战争历时数十年，纵横北圻四省，沉重打击了法国的殖民统治，在越南民族解放战争史上写下了壮烈辉煌的一页。

黄花探反对外国侵略争取祖国独立的伟大斗争也得到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中法战争后，留在越南境内的黑旗军余部参加了安世农民军，与越南人民并肩抗击共同的敌人，1907年，黄花探应孙中山之请，在安世地区也掩护过中国的革命者。

第三节 1896~1902年菲律宾独立战争。美国在菲律宾殖民统治的建立

(一) 西班牙统治下的菲律宾

菲律宾是亚洲大陆东南海上的群岛之国，美丽富饶，素有“东方海洋中的明珠”之称。

15世纪末16世纪初，是“西班牙的势力独霸欧洲的时代”。西班牙不满足于称霸欧洲，它还把侵略魔爪伸向美洲和亚洲。1521年，麦哲伦率领西班牙舰队经美洲侵入菲律宾的萨马岛、宿务岛和马克坦岛。他强令马克坦岛人民服从西班牙的统治，缴纳贡税，结果遭到该岛居民的迎头痛击。麦哲伦被当场击毙，残部狼狈逃走。其后，又经过多次入侵，直到1565年西班牙才开始把菲律宾变为它的殖民地。

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建立起残酷的殖民统治。他们强制推行“授地”制度，把掠夺来的大片领地，包括领地内的居民和资源授给西班牙官吏、军官和天主教修道会，强迫领地内的居民缴纳各种捐税，从事无偿劳役。从1571年起，规定凡16岁至60岁的男子缴纳8里尔赋税，1里尔什一税，1里尔地方税，每年必须服40天的徭役。

政教合一 是西班牙殖民统治的重要特征，修道会是殖民奴役的精神支柱。在政治上，教会可以左右总督和地方行政事务；在军事上，很多修道士本身就是军队的头目；在经济上，修道会掠夺和兼并土地，成为菲律宾最大的庄园主。天主教修道会的统治权力渗透到菲律宾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他们往往把成批的居民驱入河中，强迫他们接受“洗礼”，如有反抗，便以“异教徒”之罪名处死。菲律宾居民从生到死，无不处于修道会这样或那样的控制之下。所以，菲律宾有“修道会帝国”之称。

西班牙殖民者垄断了对外贸易。从1593年起实行限制贸易政策，不准菲律宾人直接参与对外贸易，只许西班牙人（总督、殖民地官员和修道会）参与其事；除中国和墨西哥外，其他国家一概不准同菲律宾直接贸易；限定马尼拉开往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的官帆船为两艘，所载商品价值不得超过25万比索，回航时所载白银不得超过50万比索。垄断贸易使菲律宾长期与外界隔绝，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19世纪初，由于西班牙国势衰落，已无法阻止欧美商人涌进菲律宾。特别是当它失去了拉丁美洲大部分殖民地后，被迫放松了菲律宾与外界联系的控制，陆续开放了马尼拉等七个港口，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到19世纪中期，菲律宾则进一步卷入世界市场，变成欧美列强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专门种植甘蔗、烟草、马尼拉麻等出口作物的种植园日益增多。加工工厂、铁路、港口、船厂、兵工厂也相继建立起来。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菲律宾社会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变化。19世纪60、70年代，菲律宾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形成。他们大多是西班牙人或华人同菲律宾人的混血种人，由于经营种植园、造船工业、商业高利贷和岛际贸易而发财致富。菲律宾民族资产阶级与外国资本及本国封建势力有密切的联系，经济地位十分脆弱。他们一方面力图摆脱外来资本的

马克思：《革命的西班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461页。
西班牙古币名。

控制；另一方面由于脱离和害怕工农群众，也就缺乏彻底的反殖民主义、反封建主义的勇气，幻想通过改良主义和与殖民者妥协的办法，实现本阶级的政治经济目的。此外，外国资本的入侵，在菲律宾培植了一批买办势力，他们从一开始便与外国资本勾结在一起，是菲律宾人民的敌人。

菲律宾的无产阶级比本国资产阶级出现还早。在外资经营的工厂和企业中出现了第一批菲律宾工人阶级队伍。例如在烟草工业中便有两万多工人。新兴的菲律宾无产阶级站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前列。1872年1月爆发的甲米地海军船坞工人的武装起义，工人们提出了“打倒西班牙”、“打死西班牙修道士”的战斗口号，并和附近的农民联合起来向西班牙总督所在地马尼拉进发。由于准备不足，组织也不严密，起义被血腥镇压下去。殖民当局不仅镇压了参加起义的工人和士兵，而且还把那些根本没有参与起义，而只是主张改革和教会菲律宾化的爱国牧师布尔戈斯、戈麦斯和萨莫拉等人也处以死刑。甲米地起义唤醒了菲律宾人民群众的民族解放意识。

（二）何塞·黎萨尔和“宣传运动”

菲律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文化较早，有些人还直接参加过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因此，甲米地起义失败以后，他们便掀起了一个“宣传运动”。宣传运动是在西班牙和菲律宾同时进行的，它的宗旨是实现西班牙人和菲律宾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教会菲律宾化；保障出版、结社、言论和申冤自由；吸收菲律宾为西班牙的一个正式省份，恢复它在西班牙议会的代表权。这个运动的代表人物是何塞·黎萨尔、马塞洛·赫·德尔彼拉尔和洛佩斯·哈恩纳等人。

黎萨尔（1861~1896年）出身在内湖省卡兰巴镇一个富裕地主家庭里。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马尼拉阿提尼奥学院，获得文学士学位。祖国的不幸，人民的痛苦，激发他拿起笔去战斗。他18岁时发表了著名诗篇：《献给菲律宾青年》，热情宣传爱国主义思想。第二年又在一个讽刺剧里，嘲笑了西班牙教士的伪善，行政官员的残暴，受到殖民当局的迫害。1882年不得不离家赴欧，先在马德里大学学医学、文学和哲学，1885年到巴黎专攻眼科学，1886年到德国海德堡大学攻读历史和心理学。1887年他发表了第一本小说《不许犯我》，1891年出版了它的续篇《起义者》。这两本小说是菲律宾近代文学的代表作，是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鲁迅给予这两本书很高的评价，认为从黎萨尔的作品里听到了“爱国者的声音”，“复仇和反抗”的呼喊。在黎萨尔的笔下，西班牙教会的罪恶和荒淫，政府官员的贪赃枉法，国民警卫队长的残暴都一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也以同情的心情描写了菲律宾人民受奴役、压迫、欺凌的悲惨生活，表达了他们的忿懑和希望，讴歌了他们的觉醒和斗争。《起义者》就是献给甲米地起义中牺牲的三位神父的。他深情的写道：“所有的菲律宾人都怀着敬爱的心情纪念你们，称你们为烈士，这说明他们根本不承认你们有罪。”“让我把这本书当作一个枯叶编成的、未能及时送到的花圈，敬献于无人知晓的你们的坟前。”

黎萨尔在这两部小说中对菲律宾人民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道路进行了探索。小说的主人翁克里索斯托莫·伊瓦腊是一个受过欧式教育的富家子弟，回国后，想要在祖国做一番社会改革的“好事”，但他的幻想在现实中破灭

了，并被关进了监牢。伊瓦腊在一个农民的帮助下，越狱逃跑。13年后，他再次回国，要“以暴抗暴，以牙还牙”。而他策动的三次密谋，均以失败告终。在西班牙殖民者的追捕中受伤，他逃到了一个荒凉的海滨。作者在故事的结尾安排一个神父向他宣扬“积德”、“发扬善性”，“刀剑的作用已经微不足道”。他听了神父的话安然死去。伊瓦腊的悲剧和矛盾，是菲律宾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是黎萨尔世界观矛盾的表现。

1889年2月，哈恩纳在巴塞罗那创办了《团结报》，作为宣传运动的机关报。德尔彼拉尔和黎萨尔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团结报》秘密运回国内，鼓励菲律宾人民起来争取民主权利。

黎萨尔认为，反殖斗争的战场不是在国外，而是在国内，他决定回国。1892年6月26日，他从香港回到马尼拉。7月3日他创立了“菲律宾联盟”，起草了联盟的章程，规定联盟的任务是：一、把菲律宾群岛团结成为一个紧密的、坚强的、同质的团体；二、抵御一切暴力和不公正的行为；三、鼓励教育、农业和商业；四、研究并实行改革。口号是：“人人平等”。联盟成立仅仅四天，黎萨尔就被殖民当局逮捕，被流放到棉兰老岛。由于殖民当局对联盟成员的迫害和内部的分歧，联盟迅速解体了。

1896年12月30日，当菲律宾独立战争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以后，殖民当局以黎萨尔“通过他的写作煽动人民造反”和“组织非法团体”的罪名把他处死了。他临死前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他写道：

方见天际破晓，
我即与世长辞，
朦胧夜色已尽，
光明白日将至。

（三）菲律宾独立战争与共和国的建立

从1896年开始，菲律宾掀起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高潮。以安得列斯·波尼法秀（1863~1897年）为首的资产阶级激进派，于1892年7月，在马尼拉工人区建立了秘密组织“卡蒂普南”（意即民族儿女最尊贵协会）。“卡蒂普南”在菲律宾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依靠人民群众，通过武装斗争取得民族独立的纲领。《卡蒂普南初阶》写道：“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不论他的皮肤是黑是白”；“保卫被压迫者，同压迫者作斗争”；“热爱和关心祖国幸福的人是伟大而高尚的”。这个组织的成员主要是工人、手工业者、农民、士兵、知识分子、职员和小商贩。

波尼法秀出身裁缝家庭，父母早亡，自幼做苦工养活弟妹。他当过信差、办事员、仓库保管员。由于勤奋好学，精通了他加禄语，学会了西班牙语和英语，读过《法国革命史》、雨果的《悲惨世界》和黎萨尔的两本小说。他是菲律宾联盟的成员。黎萨尔被捕后，他坚信用和平手段争取民族自由是徒劳的。因此，他与哈辛托等人建立“卡蒂普南”作为准备武装斗争的核心力量。他们创办秘密刊物《自由报》，宣传自己的主张。“卡蒂普南”在全国得到了迅速发展，1896年独立战争爆发前夕，它的会员在三万人左右，而同情者则有几十万之多。

1895年底，波尼法秀在圣马特奥山洞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准备武装起义，并用黑炭在洞里书写了“菲律宾独立万岁”的口号。1896年8月26日，

波尼法秀在马尼拉近郊的巴林塔瓦克镇发出武装起义的号召，得到群众的广泛响应，从吕宋到棉兰老和苏禄群岛普遍爆发了革命，“卡蒂普南”在很多地方夺取了政权。

正当革命迅猛向前发展的时候，“卡蒂普南”内部发生了分裂。以艾米利奥·阿奎那多为首的地主资产阶级保守派，同以波尼法秀为首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展开了尖锐的斗争。阿奎那多出身于甲米地卡维特镇镇长家庭，1894年由波尼法秀亲自介绍加入“卡蒂普南”。1896年8月31日，他响应波尼法秀的号召，在卡维特领导爱国者起义，打败了西班牙正规军。10月31日发表《自由、平等、博爱》宣言，公开同“卡蒂普南”的纲领唱对台戏。年底，波尼法秀把总部迁到甲米地，阿奎那多拒不服从波尼法秀的领导，造成了甲米地两个革命组织对立的局面。由于阿奎那多害怕革命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害怕农民土地革命会危害地主资产阶级利益，便纠集甲米地的地方势力，使用阴谋手段篡夺了革命领导权，取消了“卡蒂普南”，并捏造罪名于1897年5月10日，杀害了菲律宾的民族英雄波尼法秀。后来菲律宾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为争取祖国独立而牺牲的英勇战士，在马尼拉北郊建立了一座波尼法秀领导反西起义的纪念碑。

波尼法秀的被谋杀和“卡蒂普南”组织的被破坏，使革命事业受到严重损害。西班牙殖民者利用革命阵营的分裂，派出18,000兵力向革命军进行反扑。同时又抛出一些“诺言”，诱降阿奎那多。1897年11月1日，在比阿克纳巴多召开起义队伍的代表会议，通过菲律宾共和国临时宪法，成立新政府，由阿奎那多任总统。但阿奎那多政府在殖民者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威胁利诱下，公开与敌人妥协。1897年12月14日，同殖民当局签订了“破石洞条约”。阿奎那多从西班牙殖民者取得80万比索，同意缴械投降，自动解散政府，然后流亡香港。

阿奎那多投降后，菲律宾人民仍然坚持战斗。很多起义军民不承认投降条约，拒绝缴械。1898年4月，马卡布罗斯将军在起义军控制下的中吕宋建立革命政府，领导菲律宾人民继续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使许多城镇和乡村又回到革命者手中，民族革命重新高涨起来。这时，菲律宾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又参加了反对西班牙的活动，阿奎那多在香港成立了“爱国委员会”。

1898年4月，美西战争爆发。美国一方面调遣军舰，准备武装侵占菲律宾，一方面伪装“盟友”，诡称支持菲律宾独立，并派人在香港和新加坡同阿奎那多密谈。阿奎那多幻想在美帝的“援助”和“保护”下取得民族独立，便于1898年5月乘美舰回到菲律宾。6月12日（今菲律宾国庆日），阿奎那多在甲米地发表独立宣言，成立革命政府。革命军在宣言的鼓舞下，连战连捷，到8月底几乎解放了吕宋全岛，马尼拉也被人民武装包围。9月，菲律宾议会在首都马洛洛开幕，制定宪法。1899年1月，正式颁布菲律宾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史称马洛洛宪法），宣布菲律宾共和国的诞生，阿奎那多任总统，马比尼任内阁主席。菲律宾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西班牙在菲律宾三百多年的殖民统治即将结束。

（四）菲律宾人民抗美战争与美国殖民统治的建立

1898年12月10日，美西在巴黎签订和约。按照和约的规定，西班牙以

2000 万美元的代价，将菲律宾“转让”给美国。巴黎和约签订后，美帝国主义竟公开声明要把它的统治权伸展到菲律宾全岛。菲律宾人民对美国这种蛮横无理的侵略行为，表示极大的愤慨。1899 年 1 月，菲律宾共和国在群众的推动下，曾先后两次发表宣言，抗议美国的侵略行径，要求美国承认菲律宾独立。美国总统麦金莱断然拒绝。1899 年 2 月 4 日晚，美军在作好了一切准备后，对马尼拉发动突然袭击，把战争强加在菲律宾人民头上。刚从西班牙殖民枷锁中解放出来的菲律宾人民，又被迫投入抗击美帝侵略保卫共和国的战斗。2 月 5 日，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对美宣战，两军激战于马尼拉周围。3 月 25 日，美军窜犯共和国首都马洛洛。31 日，马洛洛陷落，阿奎那多迁都圣费尔南多。菲律宾军民在武器装备十分恶劣的情况下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给美国殖民者以沉重的打击。一名美国随军记者供认，在短短几个月内“……我们由于被打死和受伤，包括病号在内，损失了 1000 人，约有 4000 人住在医院里”。

美帝占领的地盘越大，兵力越分散，处境也就越困难。因此，它除增派援军加强军事镇压之外，还大力进行诱降活动，制造革命阵营内部的分裂。面对美国的诱降政策，以彼德罗·巴特诺和布恩卡米诺为首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投降派主张妥协；以安托尼奥·鲁纳(1868~1899 年)和阿波里纳里奥·马比尼(1864~1903 年)为首的激进派则主张把反美斗争进行到底。阿奎那多在抗战派和投降派的对立中，表现得十分软弱，往往在关键时刻站在投降派一边。5 月 7 日，他支持巴特诺和布恩卡米诺分别篡夺了内阁主席和外交部长职务，而把坚持抗美斗争的马比尼排斥在政府之外。

对外屈服于侵略者的压力，对内敌视人民，是投降主义者的共同特征，巴特诺内阁正是这样。他一再派出代表向美国求和，但遭到鲁纳将军的坚决反对。鲁纳痛斥巴特诺等人为“叛国分子”，庄严表示“菲律宾人民要独立，我要鞠躬尽瘁保卫我国的事业”。投降派对他恨之入骨，于 1899 年 6 月 5 日把他杀害于总统府，并强行解散他所指挥的军队。

由于抗战派势力的削弱，美军增援部队的源源到达，菲律宾人民的抗美斗争形势日益恶化。共和国首都五次迁移，到 1899 年 11 月革命军不得不化整为零，采取分散的游击战。全国分成若干军区，每个军区由一名游击司令指挥。游击队利用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在人民群众支持下，开展丛林战。往往在夜间或清晨突袭美军前哨阵地，伏击美军巡逻队。1900 年 5 月至 1901 年 6 月间，游击队总共同美军作战 1026 次，给了美军以有力的还击。

在转为游击战后阿奎那多逃到了巴兰南镇，巴特诺等人相继被俘，向美军投降。1901 年 3 月阿奎那多也在巴兰南镇被美军俘获，4 月 1 日宣誓效忠美国，19 日发表宣言，劝游击队员接受美国的“和平”，竟然说：“让鲜血不再流，让眼泪与荒凉从此结束”。继阿奎那多之后，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纷纷投降。新生的菲律宾共和国被扼杀了。但人民仍进行武装抵抗，直到 1902 年 4 月，反美游击战争才结束。在抗美战争期间，菲律宾军民沉重地打击了美帝，使它耗资 3 亿美元，美军被打死打伤 7000 余人。美军在菲律宾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无数平民死在美军屠刀之下和集中营里。仅八打雁一省的人口就从 1899 年的 312,192 人下降到 1903 年的 257,715 人。

美国侵占菲律宾后，便着手建立殖民统治机构，它收买极端亲美分子布恩卡米诺等人，组成代表地主买办利益的联邦党，作为其统治菲律宾的工具。1901 年成立由美国把持的“菲律宾委员会”，作为民政机关，拥有立法和行

政大权，由美国第一任总督塔夫脱任主席，并拉拢联邦党的三个代表参加。190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菲律宾法案”，法案宣布菲律宾的行政、立法、司法大权均由美国掌握。法案允许在菲律宾设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立法议会。议会形式上有立法权，但是殖民总督对它的决议享有批准和否决的最高权力，美国国会更有权修改菲律宾议会通过的任何法律。法案中关于菲律宾人可以从国有土地取得一份土地的规定，则纯属欺骗农民的虚伪条文。从西班牙天主教修道会没收来的土地绝大部分交给美国资本家和军人，只有菲律宾上层分子从中分得一点残羹剩饭。1906年，美国正式宣布战争结束，但继续迫害坚持抗美斗争的爱国志士，除强化其反革命军队和警察之外，还先后设立军事法庭和各级法院，严禁人民谈论民族独立的问题，否则以“叛逆”罪论处。

菲律宾独立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它推翻了西班牙三百多年的殖民统治，打击了美国侵略者，同时揭开了20世纪初亚洲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时期的序幕。由于历史和地理上的联系，菲律宾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亚洲其他国家的被压迫民族以极大的鼓舞。也曾得到亚洲人民的支持。例如，当时正在东京的孙中山和菲律宾政府代表进行了会晤，并帮助他们购买军械、弹药。其后，孙中山把购得的一批军火租海轮运菲，可惜因故途中沉没。菲律宾革命者为了支持中国革命，也向孙中山赠送10万元作为革命活动经费，并准备派人到中国内地参加反清武装起义。在菲律宾人民抗美斗争的年月里，广大华侨与菲律宾人民并肩战斗，抗美斗争失败后，不少菲律宾革命者流亡香港和上海，又得到中国人民的热情接待。

第四节 印度人民的反英运动

（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19世纪晚期，随着世界工业垄断地位的丧失和列强争霸的加剧，英国不断强化其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和剥削。英国除继续依靠军事政治权力对印度人民进行无情搜刮、扩大商品倾销、掠夺原料外，资本输出已逐渐成为主要的剥削手段。据估计，到1910年，英商在印度的公债和企业投资总计为4.5亿英镑，每年获得的利息和利润约4000万英镑，超过英国对印度的外贸盈利（1913年对印度贸易利润只有2800万英镑）。英商投资的主要部门是殖民政府的公债、铁路、采矿、造船、种植园等。在1910年的投资中，殖民政府的公债占50%，铁路建筑占37.4%，种植园占6.6%，银行地产、工矿企业占5%。

英国殖民政府因强化对印度的殖民统治，镇压印度人民的解放斗争，行政支出和军事费用急剧增长起来，殖民政府积欠的债务也相应地飞速增加。1860年为1亿英镑，1913年增加到2.74亿英镑。英商购买公债，既是支持英国殖民政府加强对印度人民的统治，又是对印度人民的残酷剥削。

英国殖民者从70年代起开始大规模地修筑铁路，而且铁路线增长极快，1871年是5077英里，1900年达到25,371英里，1913年已达34,656英里。随着铁路网的修筑，英商为适应掠夺原料矿产的需要，还兴办了许多工矿企业，如煤炭、石油、锰矿、金矿等，控制了商港、造船、航运、电机，参与丝织、棉织、造纸、榨油等部门。

在农业方面，英商经营各种水利工程和茶叶、橡胶、靛蓝植物等种植园。由于殖民政府的强制和英商的操纵，印度的农业生产商品化、片面化有了发展，很多地区变成了单一种植区。例如，阿萨姆、孟加拉、南印度种植茶叶、橡胶，孟买、马哈拉斯特拉种植棉花，孟加拉种植黄麻和靛蓝植物，旁遮普种植小麦，马德拉斯种植花生，等等。与此同时，英国殖民者还继续保持和利用封建土地关系加强对农民的剥削。60年代以后，殖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田赋法案，巩固了柴明达尔地主的地位，保障了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对农民的剥削权利。这一时期，英国从印度掠夺的粮食原料与年俱增。1901~1906年和1892~1898年比较，输往英国的小麦增加了176%，棉花增加了43%，黄麻增加了27%。

此外，英国垄断资本又通过银行控制了印度的主要经济命脉。

英国资本输出的增长，近代工业的出现，特别是铁路网的修建，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印度民族工业的发展。因为只要把机器应用到一个有煤有铁的国家交通上，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去制造机器。在19世纪下半叶，印度民族工业就冲破殖民制度和封建关系的障碍，带着殖民地的烙印缓慢地发展起来了。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等沿海地区的一些买办商人、高利贷者和地主开始投资于英资未及控制或控制较弱的一些工业部门，如碾米、榨油、面粉、造纸，特别是棉纺工业部门。1851年买办商人达瓦尔在孟买创办了第一所棉纺厂。1861年孟买已有10所纺织厂。1885年全国有纺织厂58所。1900年有191所，纱锭494万枚，工人15万。1913年全国已达272所，纱锭660万枚，织机9万余台，工人25万余人。纺织工业的规模居亚洲第一位，超过日本与中国之和（当时日本的纱锭是241万枚，中国为30万枚）。孟买、阿

赫达巴德成为印度重要的纺织工业中心。棉布棉纱远销远东许多国家。19世纪末印资股份银行有9家，1913年增加到18家。塔塔钢铁公司、发电厂、水泥厂也分别于1907年、1910年、1912年开始动工兴建。

印度近代工业主要集中于沿海城市。1907年全国有股份公司1278个，其中孟加拉就占40.5%，孟买占37.7%，马德拉斯占8.5%。

印度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80%还是手工工场，在皮鞋、家庭生活用品制造业，特别是织布业里更为普遍。当时因机器纺纱比织布更为有利可图。所以纱厂就多于织布厂。这样，手工织布业作为纱厂的附属物得到暂时的恢复和发展。1897~1901年间，近代织布厂每年消耗的棉纱平均为8500万磅，而手工织布业则是2亿磅，相当于前者的2.5倍。1901年全国手织工人达328万人。1895年全国各类手工业人口，包括农村家庭手工业者及其家属在内达4500万人。马德拉斯、马哈拉斯特拉及旁遮普等地成为全国重要的手工业中心。

印度民族工业发展的最根本特点是它的殖民地性。机器设备、技术和资金都依赖英国资本家，原料来源与销售市场也受殖民政府控制，有的工矿企业甚至只有在英印“合营”的庇护下才能立足。同时，殖民政府为了维护英国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对印度民族工业的发展横加限制，如取消英国纺织品的进口税（1882年），加征印度纺织品5%的消费税（1894年），提高国内地区间的运价等，以削弱印度工业品的竞争力，为英国商品的倾销扫除障碍。

资本主义的产生改变了印度的社会阶级结构。除了封建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广大农民以外，印度封建殖民地社会又出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印度民族工业的殖民地性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民族资产阶级除一小部分从手工业者和小商人转化而来以外，大多出身于买办商人、高利贷者、地主和封建王公，与封建地主阶级的关系极为密切。同时，他们在经济上受制于英国资本，既依附于殖民者，又与殖民者有着深刻的矛盾。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反殖反封建斗争中的两面性。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在进行工业活动的同时，又兼营买办业务和高利贷活动，更具有封建性与买办性，对英国殖民者有着更大的依附性。英国殖民者根据自己的利益对他们也是有扶植、有控制，因此，在政治上他们就具有更大的妥协性。至于完全服务于英国资本，尾随殖民炮舰，在中、缅等国倾销英国商品、贩卖鸦片、供应军需品的大买办资产阶级则完全是英国殖民主义者豢养的，是敌视印度人民反殖反封建斗争的。广大的小商贩、小业主和手工业者等小资产阶级深受英国商品倾销之祸、苛捐杂税之害和殖民政府压制之苦，反殖斗争比较坚决，是仅次于农民的人数较多的革命阶层。

印度无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比本国资产阶级更老一些。它是随着英资厂矿企业、交通运输业的出现而产生的。19世纪末工人已有50多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达95万。主要集中于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阿麦达巴德、那格浦尔等少数城市。他们大多来自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季节性工人较多。在纺织工业中还广泛使用女工和童工。工人们身受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和本国资本主义三重压迫，工资极其低廉，生活和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劳动日长达14~15小时，童工也达9~14小时，没有假日，没有劳动保护。沉重的劳动严重地损害了工人的健康，病残伤亡者很多。印度民族工业中的情况更为严重，印度的工厂主为了与地位优越的英国资本家和廉价的英国商品进行竞

争，便以延长劳动时间、降低工资的办法加强对工人的剥削，降低成本。这样，民族企业中工人反剥削的斗争虽然直指本国的资产阶级，但归根到底也具有反殖斗争的性质。这一时期印度无产阶级人数不多，政治上还不成熟，但却与先进生产方式相联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组织性和革命性最强的阶级。他们和广大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小业主等城市小资产阶级构成城市里反殖斗争的主要力量。

（二）全印民族运动的开展与国民大会党的成立

殖民政府和封建地主、高利贷者的残酷搜刮，英国廉价商品的倾销，使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大量破产。在农业商品生产比较发展、商业高利贷资本横行的孟加拉、马哈拉斯特拉、孟买和旁遮普地区，农民丧失土地的情况更为严重，农民的处境更为悲惨。19世纪下半期，发生灾荒24次，饿死2000多万人。仅19世纪最后25年间，就饿死1500万人之多。殖民掠夺和连年灾荒激起了1872年至1882年绵延十年之久的农民大起义。1872年东孟加拉的帕布纳和博格拉的农民，为反对柴明达尔非法提高地租和加征各种捐税举行起义，提出了废除柴明达尔制度的口号。1872年，在旁遮普发生了锡克人纳姆达尔教派的起义。在木匠拉姆·辛格的领导下，起义者攻打马洛德城堡和马列尔科特拉城，但因准备不足而被英军镇压。1870~1880年马哈拉斯特拉爆发了达十年之久的马拉特人的农民战争。1873年第一次起义被镇压后，各地分散的游击队继续活动。1875年又汇合成为第二次规模更大的起义，席卷浦那和阿赫美德那加地区。参加起义的除农民外，还有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其中最大的一支是霍尼雅·巴哥吉·肯格里亚领导的农民游击队，人们称他是“债务人的朋友”。起义农民攻打高利贷者，没收并烧毁借据、地契和法院判决书，痛打收税官员。英国殖民者一面派军队镇压，一面表示要保护农民免受高利贷剥削。农民起义停止之后，英国殖民者不但未采取任何改革措施，而且不顾1876~1878年发生的严重饥荒，又提高盐税，加征工商业税。因之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反殖情绪更加高昂，1879年马哈拉斯特拉农村爆发了第三次大起义。起义的领导者是马拉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知识分子的代表瓦苏杰夫·巴尔旺特·帕德开和哈雷·纳伊克。他们计划建立和扩充革命队伍，攻占殖民政府机关，掀起马哈拉斯特拉的起义，进而扩至全国，推翻整个殖民统治。起义军攻打地主庄园和高利贷者住宅，袭击英国殖民法院和行政机关。在给殖民政府的通告中要求减轻赋税，奖励民族工商业，救济灾民，降低英国官吏高薪，等等。这次起义被镇压，瓦·巴·帕德开被俘并判终身监禁。起义的巨大意义在于开始把反殖民主义斗争与反封建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与下层人民的起义有了初步的结合。

马拉特起义失败之后，相继发生了1879年至1880年泰鲁固族和沙沃尔族的农民起义，1881年至1882年比哈尔地区农民起义，90年代东印度的曼尼普尔、肯札尔以及西印度的坎贝等地的农民起义。这些自发分散的农民起义连绵不断，此伏彼起，沉重的打击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

同时，印度工人阶级也开始展开罢工斗争。1877年，那格浦尔皇后纺织厂的工人罢工揭开了印度工人罢工斗争历史的第一页。1882年至1890年，

锡克教的一个分支，也叫“神各派”或“呼神派”。

孟买、马德拉斯、加尔各答等地发生了 25 次罢工。铁路工人、码头工人和公用事业的工人都参加了罢工斗争。1884 年孟买纺织工人举行了第一次群众集会，要求规定必需的休息日、限制劳动日等。通过反复的斗争，工人争得了某些劳动立法。1881 年殖民政府被迫颁布第一个工厂法，禁止七岁以下的儿童进厂劳动，1891 年的工厂法又规定实行星期日休息制度，禁雇九岁以下的童工，14 岁以下的儿童每日劳动时间不得超过七小时。

这一时期工人的罢工斗争是自发的、地方性的、主要是经济性的。但是，工人斗争的兴起进一步把反殖斗争引进了城市，他们与城市贫民斗争相汇合，直接打击了殖民统治的中心，配合了农民的起义，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英国殖民政府对印度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压制政策，日益引起印度资产阶级的不满。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各种地方性的资产阶级地主的改良主义政治组织。1870 年在孟买管区马哈捷夫·戈文德·拉那德(1842~1901 年)组织了“浦那全民大会”，他和达达巴伊·纳奥罗哲是“印度国民经学派”的代表。他们开始把以往零散的朴素的改革要求系统化、理论化，形成一套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理论。例如纳奥罗吉提出“财富外流说”，揭露了印英关系的实质。1873 年发表的《印度的贫困》一书，对英国在印度的剥削政策及其结果进行了全面剖析。1876 年苏·班纳吉(1848~1926 年)组成“印度协会”。他们反对英国殖民束缚，要求实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普及欧式教育，发展民族工业，改革税制，司法平等，建立陪审制度和文官考试制度，实现在英帝国范围内的殖民地自治，等等。1883 年，班纳吉以印度协会的名义，在加尔各答发起召开了第一次印度国民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除印度协会在孟加拉各地以及北印度一些地方组织的代表外，还有来自孟加拉、马德拉斯的民族主义者，会议通过的决议，如要求让印度人参加国家管理、改革文官考试制度、扩大立法会议，都是具有全国性的要求。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报刊纷纷发表文章，讨论怎样把印度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建立全印统一组织已是大势所趋。

农民起义、工人运动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虽然互相没有联系，但是七八十年代的革命形势，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个别地区与农民运动联系的前景，使英国殖民者恐惧不安。英国退休官员休谟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已成长起来的阶级的代表们……领导了人民的发动，并给其以自觉性，就能使其转变为民族起义”。殖民者为了防止工农运动与资产阶级运动的结合，在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又极力拉拢地主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力图把资产阶级运动纳入“合法”的轨道，于是便支持他们的代表建立全国性的政党。1885 年 12 月 28 日，在休谟的导演下，印度地主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在孟买宣布成立，其成员主要是上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约占 50%，地主和商业高利贷者各占 25%。会议主席苏·纳·班纳吉在开幕词中为英国殖民主义者大唱赞歌：“英国对印度造福无穷，全国都为此对英国表示感激。英国给了我们秩序，给了我们铁路，而最重要的是给了我们欧洲教育的无价之宝”！大会宣布效忠英国，同时要求民族平等和殖民地自治，要求进行行政改革，保护关税，实施民族教育，实行固定田赋制，降低税收，增加立法评议会中的民选议员，等等。国大党成立初期的活动，仅限于报刊上的宣传，抗议殖民官员的横暴，争取民族平权，要求发展民族经济，向英国议会请愿，召开年会。它的宣传鼓动对提高印度人民的民族意识起了一定的

作用。但其依靠殖民政府进行改良的基本要求却始终未能实现。

19世纪末，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印度中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及其知识分子的队伍急剧发展。到20世纪初，印度本民族的律师、记者、教师与下级职员的人数达七百余万人，学生有五十多万。他们大多数都深受殖民者的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具有较强的革命性。随着他们在国大党里力量的增长，国大党也开始发生了分化。到19世纪90年代中叶，在国大党内除了掌握领导权的“温和派”外，又出现了巴尔·甘葛达·提拉克（1856～1920年）为代表的“激进派”，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富农和广大自由职业者的愿望。他们极力反对“温和派”的改良主义，主张联合人民群众的力量，进行一切形式的斗争，推翻英国殖民统治，建立独立的印度联邦共和国。他们的弱点在于鼓吹狭隘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把印度教作为思想武器，不能团结广大的伊斯兰教徒，也没有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没有把反帝斗争与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但是，他们坚决反英的主张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提拉克主编的《狮报》及其他激进派报刊在揭露殖民主义罪行、宣传民族民主思想、启发印度人民的民族意识方面有着巨大的功绩，他们发动和组织工农群众运动的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未来的全国性、群众性反殖运动的高涨作了一定的准备。

（三）印度近代文学。罗易和泰戈尔

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印度经历了一次社会大变动。一方面印度逐渐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另一方面，旧的封建自然经济日趋解体，资本主义关系缓慢发展起来，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分化和组合。这个社会大变动必然要反映到思想意识领域中来，反映到文学中来。孟加拉在整个印度最早沦为英国殖民地，在社会变革方面也走在前列，因此新的思想、新的文化首先在这里萌生、发展，近代印度两位最杰出的文学家——拉姆·摩罕·罗易和罗宾罗纳特·泰戈尔就诞生在这里。

罗易是集新旧学识于一身的人物，是从旧的封建文学向资产阶级新文学转变的代表。1772年罗易出生于孟加拉一个婆罗门家庭。他通晓梵文、波斯文和阿拉伯文，对印度的哲学和宗教有很深的造诣。后来，他又学习英文、拉丁文和希伯来文，受到欧洲科学和文化的熏陶。他曾游历印度各地，亲眼目睹英国殖民统治给印度人民带来的苦难。他说：“我对英国在印度建立的政权极感厌恶。”在1815年以前，他组织了“雅利安人协会”，主张改革印度教，普及新式教育，反对种姓的不平等、寡妇殉葬、一夫多妻制等封建习俗。1817年他创办了“印度学院”，1821年创办了第一份孟加拉文刊物《明月报》，1822年用波斯文出版《镜报》。1828年组织了印度第一个政治团体“梵社”，宣布该社的宗旨除信仰梵天外，主要是要讨论社会问题。他主张减租，保护出版自由。

罗易被称为孟加拉散文的鼻祖。在他之前，印度文学以诗歌为主，其题材则是宗教和神话。罗易要用活的语言来反映尖锐的社会问题，表现活生生的人，因此仅仅用诗歌的形式是不够的。他的作品主题和体裁都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寡妇自焚殉葬）拥护者和反对者的交谈》《老师和学生的谈话》《答四问》等。泰戈尔在评论罗易的创作时指出：“在他以前我们的文学只限于诗歌。但拉姆·摩罕·罗易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诗歌是不够用的。

他不仅必须有感情的语言、美的语言、内心精神世界的语言，而且还必须有辩论的语言、阐述事物的语言和全体人民的语言。”

1857~1859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对人民的觉醒，对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起义时期的一些诗歌喊出了赶走殖民者的最强音。

从遥远的英国你们把黑夜，
阴雨绵绵的黑夜带给我们！
滚吧，背信弃义的外国人，
滚吧，滚回去吧，欧洲人！

印度民族起义之后，文学的主题焕然一新，抨击殖民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作品，写实的长篇小说不断涌现。邦基姆钱德拉·乔托帕戴在《肝胆照人》（1874年）中，表现了孟加拉人民在米尔·卡西姆领导下反抗英国殖民者的英勇斗争。在小说的结尾，作者虚构了一个教师向侵略者屈服的情节，反映了印度资产阶级的弱点。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欢乐的寺院》（1882年）也是以爱国主义为主题，小说中的一首歌曲：《祖国呀，我的母亲，你好！》在1905~1908年革命高潮中，成为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

泰戈尔（1861~1941年）是全世界著名的诗人和作家。出身于孟加拉地主家庭，祖父是罗易的密友，父亲是一位哲学家，深受罗易启蒙思想的影响，热心于宗教和社会改革。1878年泰戈尔赴英留学，1880年回国。1884年下乡管理祖传的田产，到处漫游，同农民有过一些接触。1901年他在圣蒂尼克坦创办了一所学校，1921年成为有名的国际大学。

泰戈尔14岁开始写诗，1881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黄昏之歌》，文名大震。他一生创作了2000首诗歌，出版了50部诗集，写了长篇和中篇小说12部，短篇小说100余篇，剧本20余种，画了将近2000幅画，还写了许多政论和哲学论文。

泰戈尔的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即19世纪70年代到1905~1908年反英运动高潮；从反英运动高潮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从战后到逝世。

第一个时期是他创作最旺盛的时期。这个时期的诗可以他的《故事集》为代表。他从佛教和印度教的传说中，从古代故事宝库中选取题材，赋予新的寓意。诗的格调明朗，技巧高超，歌颂民族英雄，宣扬爱国主义，提倡民族大团结。《最后的一课》中有这样的诗句：

但是，祖国呵，它现在风雨飘摇，
软弱无力，它任人宰割，破碎支离。

他的作品深切同情劳动人民。在《无上的布施》中宣称穷人高于国王，穷人比富人要好。短篇小说《猜中的谜语》谴责了地主高利贷者对农民的盘剥。

20世纪初，泰戈尔参加了反英民族解放运动。他用笔为武器，同殖民主义搏斗。他赞成提倡国货，保卫民族工业，但他反对使用暴力。随着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他逐渐与群众格格不入，愤而退出运动去过隐居生活。

他第二阶段的创作，是同他的退隐生活一致的。他退出政治运动受到了人们的批评。他精神苦闷，对现实感到失望。这个时期，他创作的诗多数是歌颂爱情，歌颂儿童的。有时候内容模糊，令人难以猜度，只给人以朦朦胧胧的美。1912年出版的《吉檀加利》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11年创作的《人民的心灵》现已成为印度共和国的国歌。长篇小说《家庭与世界》描写了1905~1908年印度反英运动的事件和人物，坚持了

自己的政治主张，即反对殖民主义，但认为印度的政治和经济复兴应该在持久的道德基础上进行，反对以暴力作为斗争手段。他说：“为了祖国而使用暴力手段，意味着对祖国使用暴力”。

但是，这位作家的思想没有停止不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积极投身于印度的民族解放斗争，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第五节 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反荷斗争

（一）荷兰殖民政策的改变

19世纪中期以后，在荷兰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取得了统治地位的工业资产阶级，反对强迫种植制度，要求实行新的殖民政策，力图把印度尼西亚变为商品倾销市场、工业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场所。1863年，殖民当局废除了丁香、豆蔻的强迫供应制度；1870年颁布了“糖业法”和“土地法”。“糖业法”取消了对甘蔗的强迫种植，允许私人资本经营种植园。其他作物的强迫种植也陆续缩减或废除了。“土地法”规定凡是不能证明其私有权的土地一律收归国有，殖民政府有权将其租给私人资本家经营种植园，但以75年为限。“土地法”还规定印尼农民无权把自己耕种的土地卖给非印尼人，但可以在25年的期限内租给外国公司和商人。这项土地法令的实施，目的在限制非荷兰的外国资本的渗入，维护荷兰资本家在印尼的特殊权益。

由于荷兰殖民政策的改变，从70年代起，荷兰的工业品大量涌入印尼市场，纺织品、机器、工具等商品的输入额迅速增长，1873年输入爪哇岛的商品价值为8.3万盾，1914年增加到31.9万盾。不少荷兰资本家到印尼投资，利用印尼丰富的天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开辟种植园，设立工厂，开采矿藏。租给种植园主和矿业主的土地，1883年前为18.9万公顷，1883年至1900年间为65.2万公顷。采矿业完全由外国资本家开办，产量迅速增长。石油产量1900年为53.1万吨，1915年增长到154.3万吨；煤产量1900年为20.3万吨，1915年增长到61.9万吨；银产量1900年为2.3吨，1915年为41.7吨。印尼的出口额成倍增长，且出口大于进口。1904年输入42.9万盾，输出68.4万盾，出超25.5万盾；1909年输入44.6万盾，输出217.6万盾，出超137.4万盾。出超都以外国资本家的利润、利息，殖民政府官员的费用和养老金流到荷兰。

强迫种植制度的废除和土地法的实施，加速了农民分化的过程，促进了农业中资本主义的某些发展，但同时也为农村中的富裕阶层以及官吏和高利贷者夺取农民的土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允许外国资本家对印尼农民土地的短期租赁，又导致农民对外国种植园主和商人的依附，使印尼人民遭到空前的浩劫。

（二）列强对印尼的争夺与亚齐人民的抗荷斗争

强迫种植制的废除，不仅给荷兰的私人资本，同时也给欧美列强的资本打通了通往印尼的道路。外国的殖民势力不仅侵入爪哇，而且伸张到荷兰殖民政府控制薄弱的地区。

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后，位于苏门答腊岛上的亚齐的地位日益重要起来。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美国、意大利都力图侵入亚齐，英国则不能容忍亚齐在独立的名义下成为国际商港，因为亚齐一旦为另一强国所控制，就会对英属印度和新加坡造成直接的威胁。所以，英国资产阶级宁愿让比较容易控制的荷兰独占印度尼西亚，1870年英荷签订了“苏门答腊条约”，荷兰把非洲黄金海岸的殖民地让给英国，英国则允诺退出对亚齐的竞争，不干涉荷兰对亚齐的侵略。

1873年3月，荷兰借口维持苏门答腊岛北部海上的治安，向亚齐发出通牒，要求接管亚齐的主权。在遭到拒绝后，荷兰乃向亚齐宣战。4月，荷兰陆战队在亚齐首都登陆，遭到亚齐军民顽强的反抗，指挥官古来尔被击毙，荷兰军队被迫撤回。同年12月，荷军以两倍于前次的兵力，再度向亚齐进犯。经过激烈的炮轰之后，才将首都攻下。1874年，荷兰宣布将亚齐合并于荷兰的管区。

但是，首都的占领不等于全国的征服。亚齐人民在全国各地展开了神出鬼没的游击战，继续打击敌人，挫败了荷兰殖民者要想在短期内结束战争的狂妄计划。在亚齐这次反侵略战争中，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都古·乌马尔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曾经诈降荷兰殖民者，表示愿意协助荷兰军“清乡”。荷兰为了早日摆脱困境，曾给予都古·乌马尔相当数量的武器和金钱，企图利用亚齐人来打亚齐人。结果，乌马尔利用敌人的武器，武装了亚齐的军队，使荷兰军遭到重大伤亡。1899年他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奋勇杀敌，壮烈牺牲。

荷兰殖民者看到仅凭武力不能制胜，便采取收买封建上层的政策，恢复了领主的世袭制，给他们以名义上的头衔或给以很高的薪俸。在殖民者的威胁利诱下，大封建主陆续投降，然而亚齐人民继续坚持战斗，直到1904年亚齐人民长达30年的抗荷战争才基本结束。

（三）19世纪末的爪哇农民运动

19世纪末期，印尼农民的经济状况陷于普遍恶化的境地。他们除了受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外，还受着荷兰和其他列强的资本主义剥削。过去压在农民身上的许多封建性的剥削，如劳役制、人头税等依旧保留着。由于“土地法”的颁布，许多村社集体所有的土地，如牧场、草地和森林等也被殖民当局强占。此外，荷兰殖民者还把侵略印尼的战争费用全部转嫁到印尼人民身上，迫使破产的农民受雇于种植园主，而西瓜哇则成为荷兰种植园主获得劳动力的主要市场。由于荷兰殖民者的残酷剥削，印尼各地农民不断地奋起反抗。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西瓜哇万隆一带的萨敏运动。

萨敏是印尼的一个普通贫苦农民，从19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在农民中进行秘密的反荷活动，他鼓动群众反抗荷兰殖民政府的统治，拒绝纳税，并主张农民应当联合起来，为建立自己的新国家而斗争。在这个新国家里，一切土地、森林、牧场都应成为农民的公共财产；应该人人劳动，共同耕种，分享收获。但他反对暴力，幻想通过和平抵制的方式摆脱荷兰的殖民统治。萨敏的这些主张，反映了在殖民奴役下的农民群众对自己苦难处境的愤懑不平，反映了农民要求取得土地的迫切愿望。因此，萨敏的主张很快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

由于荷兰的殖民压迫与剥削愈来愈深重，农民不得不用革命的暴力去进行战斗。这样，到了20世纪初，在群众斗争的推动下，萨敏运动超出了和平抵制的范围，转变成武装起义，农民赶走荷兰殖民者和地主，夺回土地，并和税吏作斗争。殖民当局付出很大代价才把这次席卷爪哇的农民运动镇压下去。最后萨敏也被捕判刑，流放到偏远的海岛。

第六节 19世纪中期和晚期的土耳其

（一）青年奥斯曼和立宪运动

历时半个多世纪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失败了，但它造就了一批反叛的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如接受新式学校的教育，借留学欧洲和报刊的中介，接触了欧洲近代科学和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就其出身而言，他们大多数来自封建官僚阶层，但他们却反映了正在成长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要求。伊卜拉欣·耶纳西（1826~1871年）、齐亚帕夏（1825~1880年）和纳米克·基马尔是这批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土耳其新文学的创始人。耶纳西是一位炮兵军官的儿子，曾在巴黎留学，参加过1848年革命，并把一面共和国国旗悬挂在巴黎伟人祠上。回到土耳其后，在官场受到歧视和排挤，改而从事文学和新闻事业。他从1862年起主编《舆论解说日报》。齐亚帕夏是海关办事员之子，读完中学后进入政府机关，任素丹的第三秘书，从事法文翻译。1867年到1872年一直在欧洲过流亡生活。纳米克·基马尔在这三个人中影响最大，他是青年奥斯曼派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他出身贵族家庭，学过法文、波斯文和阿拉伯文，曾在奥斯曼帝国翻译室任职。他受耶纳西的影响，并与他合办《舆论解说日报》，1867年流亡欧洲。他的剧本《祖国》在伊斯坦布尔上演，一度轰动朝野。

这批知识分子对过去的改革采取批判的态度，认为改革只是修修补补，夺去了人民的各项旧有权利，为外国人压迫和剥削土耳其人敞开了大门，加深了奥斯曼帝国的落后。怎么办呢？他们认为，补救的办法是立宪，限制君主专制。齐亚在《梦》一书中写道：“除了俄罗斯以外，难道还有任何其他地方仍旧保留着专制政府的吗？……既然我天朝也被视为欧洲大家庭中的一员，这就不可能使我们自己继续保留和全世界不相一致的做法。”他们从伊斯兰教义中寻找在土耳其实行“人民的主权”、“个人自由”和议会制政府的根据。基马尔特别赞赏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他认为英国的议会是“世界绝大多数不同政治原则的摇篮”和“‘不屈不挠地与当局相抗衡的舆论力量永垂不朽’的碑石”。

1865年6月纳米克·基马尔和另外五个人举行会议，成立了一个秘密团体。它在宣言中写道：“个人独裁是危险的，不论统治者个人有多么高的才德。”这个组织发展很快，不久便拥有245名成员了。他们自称青年奥斯曼人或新奥斯曼人。他们在《舆论解说日报》上发表了一封费萨尔亲王致素丹的公开信，建议实行宪法，并大量散发。1867年2月政府采取行动，逮捕流放了一批青年奥斯曼的成员，基马尔和齐亚被贬到地方上任职，随后流亡到欧洲。他们在欧洲发行《自由报》，继续宣传立宪的主张。1871年大赦以后，他们陆续返回土耳其，在国内从事宣传鼓动，得到了日益众多的青年军人和学生的支持。

到70年代中期，奥斯曼帝国的状况迅速恶化。农业歉收，财政破产，1875年政府宣布所有欠债一律折半付息，神学院教师的津贴和学生的口粮被减少，军官和官吏的薪金不能按时发放。所有这一切引起了普遍的愤懑。1875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爆发了反对土耳其统治的人民起义。1876年5月22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反对素丹专制统治的示威游行。这次示威是由神学院学生发起的，参加的有手工业者、商人和下级官吏，总计达4万之众。

与青年奥斯曼人有联系的穆拉德王子和改革派首领米德哈特，利用这一局势，于5月30日发动政变，宣布废黜阿布迪拉齐兹，另立穆拉德为素丹，称穆拉德五世。穆拉德五世登极后，从塞浦路斯召回基马尔，任命他为素丹私人秘书，任命青年奥斯曼的领导人萨杜拉为宫内大臣。但是，穆拉德五世即位不久就患了严重的精神病，所以改由其弟阿布迪尔·哈密德继位。他在即位之先，曾同意米德哈特等人提出的宪法草案。即位后任命米德哈特为总理大臣，筹备立宪。因为当时“宪法”成了人们的口头禅，是势在必行的事。12月23日公布了土耳其的第一部宪法。宪法规定土耳其为君主立宪国家，国会由两院组成，上院议员由素丹委任，为终身职，下院议员选举产生；宪法宣布帝国臣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素丹有权任命和罢免内阁大臣，统帅和指挥陆海军，召集和解散国会，宣布戒严和停止民法的效力，实质上拥有一个专制君主的一切权力。宪法还宣布土耳其语为国语，伊斯兰教为国教。这部宪法被称为米德哈特宪法。

当时，欧洲列强的代表正齐聚伊斯坦布尔，举行国际会议，讨论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属地的自治和改革问题。素丹以颁布宪法为由，拒绝了列强提出的改革方案。1877年1月22日，伊斯坦布尔会议毫无结果地闭幕了。

国际会议一结束，素丹便着手扑灭立宪运动。他首先放逐了齐亚和基马尔等人，2月5日免除米德哈特的职务，流放国外。1878年2月，素丹下令解散国会，取消米德哈特宪法。立宪运动失败了，封建专制统治恢复了。

立宪运动是一场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在土耳其历史上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但是，正如青年奥斯曼人指责地主阶级改革派一样，他们所做的也是修修补补，而没有打算发动群众，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制度，因而立宪运动的失败也是不可避免的。立宪运动失败以后，青年奥斯曼人发生了分化，有的与专制制度妥协，在政府部门中找到了职业，有的在流放监禁中死去，有的徬徨失望，纳米克·基马尔在临死前的一首诗中表达了这种心情。他写道：“我们是在敌人的手里；为了真主，呵！同胞们，够了！让我们真的放弃每个人的愿望和私欲吧！”但是，青年奥斯曼人的思想启发了下一代的反对专制统治的青年。尼亚齐说，他在纳米克·基马尔的影响下，“一种如醉如痴的爱国主义，使我的心——一颗赤子之心准备奔向革命”。

（二）“血腥素丹”的统治和青年土耳其党人

哈密德二世在镇压立宪运动后，建立了极为残暴的专制统治，人们称他为“血腥素丹”。

哈密德二世是靠屠杀来维持统治的。1878年5月，在青年奥斯曼人阿利·苏阿维领导下，举行了一次有500人参加的反对哈密德二世的示威。警察当场打死了阿利·苏阿维，另有20人被杀，30人受伤，不少人被流放。哈密德二世又设立“特种骑兵队”，建立特务网，在奥斯曼帝国各地恣意妄为，残害无辜。素丹政府实行严格的报刊检查制度，许多报纸被迫停刊，国内仅剩下了受政府津贴和控制的三家报纸，凡“宪法”、“国会”和“自由”等词一律禁用，“弑逆”更为禁忌，因此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之死在土耳其报纸上被说成是死于肺炎。人们称这些报纸为“太监报纸”。

在哈密德二世统治下，土耳其经济更加衰败。家庭手工业纷纷破产，民族工业奄奄一息，全国四五万工人，多数在外资厂矿做工。传统的毛织业、

棉织业和丝织业在外国商品竞争下急剧衰落。广大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占全国人口 5% 的地主、富农和阿訇占有三分之二的耕地，占全国人口 87% 的农民只占有三分之一的耕地。农民除交纳地租、什一税之外，还受包税商的盘剥。铁路沿线的农民，因土地被占，家园被毁，被迫离乡背井。

哈米德二世利用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对非土耳其民族加强统治，对亚美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马其顿人、克里特人实行血腥的屠杀。1894 年亚美尼亚人起义，素丹军队残酷镇压，屠杀了六万余人，烧毁了三千多个村庄。

哈米德二世一味对列强妥协退让，屈膝投降，企图依靠列强维持其专制统治。奥斯曼帝国更加成为英、俄、法、德、奥匈等国竞相吞食的对象，狼奔豕突的场所。

1877 ~ 1878 年俄土战争中，沙俄兵临伊斯坦布尔城下，强迫土耳其政府在首都郊区的圣斯特凡诺村签订和约，妄图独霸土耳其。只是由于美、法、德、奥匈等国的干预，野心才未完全实现。但是，土耳其丧失了大片土地，国力大衰。

俄土战争之后，列强进一步掀起了瓜分土耳其属地的狂潮。1881 年法国占领了突尼斯，次年英国又占领了埃及。列强在侵占大片属地的同时，还展开了争夺政治、经济控制权的斗争。在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财政匮乏，外债激增，到 1881 年已达 25 亿法郎。为了监督还债，同年英、法、德、意、奥匈等国成立了“奥斯曼国债管理局”，夺取了全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如食盐专卖、烟草、酒税、印花税及其他捐税，俨然成了国中之国。因外国资本不断渗入，到 19 世纪末，工矿、贸易、信贷都落入外资之手。1903 年德帝国主义又从土耳其政府取得了从柏林经伊斯坦布尔（拜占庭）直达巴格达的铁路建筑权（亦即所谓“三 B”铁路计划）。德国和其他列强的各种顾问进入军事、宪兵等国家要害部门，进行控制。土耳其面临的国际形势更加险恶，民族危机更为严重。

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各族人民并没有被屠杀、迫害所吓倒。马其顿农民组织游击队，在山区展开了争取土地和民族自由的斗争。1889 年 5 月，在首都四名医科学学校的学生，建立了一个反专制统治的团体，取名奥斯曼同盟，后改名为同盟进步委员会，欧洲人称它为“青年土耳其党”。很快，许多青年学生、军官、知识分子和国外流亡者参加了该党。它代表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的利益，主张保持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反对专制制度，要求恢复 1876 年宪法。

1889 年青年土耳其党人艾哈迈德·里扎（1859 ~ 1930 年）获准到巴黎参加巴黎博览会。他一到巴黎就成了在国外的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里扎曾留学法国，任布尔萨教育局局长。他在 1895 年创办《协商》半月刊，宣传青年土耳其党的政治纲领，并秘密运往国内。

1897 年发动军事政变的密谋，因事机泄漏而失败。青年土耳其党在首都的组织被破坏，许多人被捕，13 人被判处死刑，68 人被流放。这次事变使依靠上层政变来实现其政治主张的策略遭到了挫折。在国外的组织也分裂了。以萨巴赫丁为首的一派人，反对里扎的政治主张。1902 年由萨巴赫丁主持，在巴黎召开了青年土耳其党大会，大会讨论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仅靠宣

土耳其文为 IttihadveTerraki，旧译统一进步委员会。

传和出版不能完成革命，因此有必要设法使军队也能参加革命运动”；二是关于列强的干涉问题，大会在这个问题上公开分裂了。以萨巴赫丁为首的多数派希望得到欧洲列强的干涉，以此作为在奥斯曼帝国实行有效改革的保证。以里扎为首的少数派，坚决反对外国干涉，他们发表声明说：“所有外国都是以它们本身的利益为其行动指南的，而这种利益又不总是符合我国利益的”。会后，萨巴赫丁建立了一个新组织，名叫“个人主动与地方分权联盟”。

国内外高涨的革命形势，使青年土耳其党受到了鼓舞。他们把中央委员会从巴黎迁往马其顿的重镇萨洛尼卡，并在军队中成立革命组织。1906年由穆斯塔法·基马尔等人，在大马士革成立了“祖国与自由协会”，并在驻雅法和耶路撒冷的第五军团的军官中成立了支部。同年9月，驻萨洛尼卡的第三军团也建立了革命组织。

为了加强各派政治力量的团结，1907年青年土耳其党的两派和马其顿、亚美尼亚、阿拉伯各民族主义组织在巴黎举行代表大会，制定了共同纲领。其主要内容是：废黜素丹哈密德二世，恢复1876年宪法，保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各民族不分宗教信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实现这些要求的方法是拒绝纳税，鼓动军队发动武装起义。

第二十一章 19 世纪晚期的非洲

第一节 列强瓜分非洲

(一) 内陆探险

从 16 世纪到 19 世纪，非洲一直是殖民者“猎获黑人的场所”。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殖民者开始改变掠夺非洲的政策，逐步把非洲各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在南部非洲，英国从荷兰手里接管了开普殖民地，被排挤的布尔人向内地迁徙，建立了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共和国。在北非，法国侵占了阿尔及利亚。在西非，法国占领了塞内加尔、象牙海岸、达荷美、加蓬的某些沿海地区和据点，英国占领了冈比亚、黄金海岸、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的某些沿海地区和据点。葡萄牙扩大了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占领区。到 1876 年，殖民者大约侵占了非洲 10.8% 的土地，其中英国占 4.1%，法国占 2.8%，葡萄牙占 0.7%，西班牙占 0.8% 布尔人占 2.4%。这些国家和地区大都分布在非洲沿海地区，它们成了日后列强瓜分非洲，向内陆推进的基地。

但是，欧洲人对非洲内陆却仍然保持着一种“神奇”的观念，对非洲河川的发源地和流向、湖泊的大小、山脉的分布、人情风俗、社会经济和自然资源却不甚了了。因此，从 18 世纪末年开始的“内陆探险”，便成了殖民者实现瓜分非洲的必要前提。

1788 年，12 名英国学者组成了“非洲内陆探险促进协会”（简称非洲协会），决定首先解开尼日尔河之谜。可是，直到 1795 年以前，尼日尔河的勘探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当年，苏格兰青年医生芒戈·帕克受非洲协会之托，再一次进行调查。他推翻了尼日尔河是塞内加尔河和冈比亚河支流的假说，证实了尼日尔河是向东而不是向西流入大海的。克拉珀顿和兰德继续芒戈·帕克的调查，兰德兄弟终于沿尼日尔河顺流而下，到达了贝宁湾，找到了尼日尔河的出海口。

尼罗河发源于维多利亚湖附近的崇山间（布隆迪境内），注入维多利亚湖和阿伯特湖，但它的发源地自古以来就困惑着欧洲人。约翰·汉宁·斯皮克和詹姆斯·奥古斯塔斯·格兰特在 1861 年发现维多利亚湖是尼罗河的源头，而塞缪尔·怀特·贝克则在 1864 年到达阿伯特湖，看到了在骄阳下闪闪发光的湖水，他写道：“英国终于到达了尼罗河的发源地。”

南部非洲的地理调查是同利文斯敦的名字分不开的。戴维·利文斯敦出身贫寒，十岁时就在一个苏格兰棉纺厂做工。后来在格拉斯哥学医，并被派到贝专纳地区传教。他曾成功地穿过卡拉哈里“无水地域”到达恩加米湖，独自地勘探了赞比西河，并于 1854 年从西到东横越了南部非洲大陆。他还发现了维多利亚瀑布、姆韦鲁湖和班韦乌卢湖，考察了尼亚萨湖和坦噶尼喀湖。

利文斯顿开始揭开了“非洲心脏”的秘密，找到了刚果河的几个主要河源。斯坦利继续完成了利文斯顿的工作。他在 1874~1878 年环航了坦噶尼喀湖和维多利亚湖，沿着刚果河直到它的河口。

在整个 19 世纪，考察的次数急剧增加。据统计，1791~1850 年只进行了 24 次考察，1851~1860 年为 21 次，1861~1870 年为 29 次，1871~1880 年为 47 次。在这些探险家中，有各式各样的人物，如废奴主义者、传教士、

记者、科学工作者、政府官员和军官。他们中有不少人为献身科学或为废除奴隶贸易而投身探险（如利文斯顿）。这些探险家以惊人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顽强精神，克服了各种困难，有些人甚至献出了生命（如芒戈·帕克、利文斯顿）。他们的辛勤劳动为地理学、语言学、历史学、植物学、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资料，为外界了解非洲作出了贡献。

所有探险家的活动都离不开非洲人民的帮助。非洲人民为他们提供向导、脚伕、食品、住宿，为他们指点迷津。不少非洲人为探险献出了生命。可以说，没有非洲人的帮助，探险家们将寸步难行。

探险家们的活动得到了各自政府或各种协会或公司的赞助，即使芒戈·帕克和利文斯顿也不例外。其中一些人就是代表政府，负有特殊使命的人，如1870年纳赫提加耳代表普鲁士王国访问博尔努王国就是如此。他们搜集的河流航道、山脉、道路和人文情况的材料，适应了列强把非洲变成殖民地的需要。正如非洲人曾经担心的那样，继探险队之后，在通往内陆的道路上便出现了商人和士兵的队伍。

（二）列强的争夺

1867~1870年南非钻石的发现，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通航，陡增了非洲在世界政治、经济和战略地位上的重要性。各个帝国主义国家迫不及待地向非洲伸手，惟恐在分割非洲的土地中落后，总想尽量夺取更多的土地，不管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土地，也不管采取什么手段。瓜分非洲也像分割世界其他领土一样，帝国主义是“按资本”、“按实力”的原则进行的，它们都把“抢先占领”奉为信条。

实力强大的英国，依仗它在南部的开普殖民地和在埃及的地位，打算南北并进，吞并东北部非洲、东部非洲和南部非洲的大片土地，建立一个北起开罗、南至开普敦纵贯非洲大陆的英属殖民帝国，即所谓“2C”计划。

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法国。它企图征服马格里布各国，东、西苏丹和刚果河流域，建立一个从濒临大西洋的塞内加尔河口起，经乍得湖至索马里的法兰西非洲殖民地，即所谓“2S”计划。

德国帝国主义兴起较晚，从80年代才插足非洲的分赃事业。它妄图沿赤道非洲两侧，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德属赤道非洲殖民帝国。

至于那些较小的帝国主义国家，诸如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和葡萄牙则利用大国之间的利益对立、摩擦和冲突，想达到分得一些殖民地，或者保持自己原有殖民地的目的。

帝国主义列强分割非洲领土，不但要为自己抢到丰厚的一份，而且还要削弱对方，摧毁对方的霸权。他们在激烈的角逐中，互相指摘、对骂，甚至诉诸武力，但有时也以非洲土地作为筹码，互相妥协，进行谈判，达成分赃协议。

斯坦利对刚果河流域的勘察，吸引了列强对中非的注意。根据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倡议，1876年9月在布鲁塞尔召开了国际地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国际勘察和开化中非协会”，各国设立分会。1876年11月，比

因开普敦 Capetown 和开罗 Cairo 的字头均为“C”，故名。

因塞内加尔 Senegal 和索马里 Somalie 的字头均为“S”，故名。

利时分会宣布成立，并筹集 50 万法郎作为探险队的费用。1879 年利奥波德二世派遣斯坦利带领一批殖民者，再次深入刚果河流域。他打着国际刚果协会金星蓝旗，溯河而上，强迫当地酋长签订了近 450 个保护条约，建立了 40 个殖民据点。与此同时，法国殖民者布拉柴从加蓬向刚果河流域推进，沿途强迫当地酋长签订保护条约，建立据点，占有了刚果河北岸大片土地。1880 年，他在刚果河湖区（普尔）北岸建立了布拉柴维尔城，并抢先控制了刚果河出海口。

当斯坦利比布拉柴晚几个月到达刚果河湖区南岸，即现在的金沙萨时，与法国直接发生了冲突。斯坦利宣布布拉柴所订条约无效，又迫使当地酋长订立了类似的保护条约。1882 年，占有安哥拉的葡萄牙也提出了对刚果河口两岸的领有权。这样，比、法、葡展开了争夺刚果河下游的激烈斗争。

英、德、美也乘机参与刚果河流域的争夺。1884 年初，英葡签订条约，英国承认葡萄牙占有刚果河河口两岸和南纬 5 度到 8 度的大西洋海岸，葡萄牙则同意英国享有同等贸易权利。这个条约引起法国、比利时、德国和美国的强烈反对。为了反对英葡勾结，法国承认国际协会对刚果河口的领有权。美德也宣布支持国际协会反对英葡。他们认为，小国比利时占有刚果河口地区，有利于自己势力的渗入，更可限制强大的对手英国在非洲进一步扩张。英国面临几个大国的反对，陷于孤立，被迫让步，于 6 月宣布英葡条约停止生效。

1884 年 11 月 15 日至 1885 年 2 月 26 日，在俾斯麦的主持下，举行了柏林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英、法、德、比、美、俄、葡等 15 个国家。会议签署了包括 36 条的总议定书。会议确认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以个人名义领有“刚果自由邦”（今扎伊尔），包括刚果河河口地带。会议规定：贸易自由和刚果河航行自由；任何国家以后在非洲取得领土必须是“实际有效的占领”，而且要通知各缔约国。

柏林会议是一次赤裸裸地瓜分非洲的会议，是列强争夺非洲的新起点。柏林会议之后，根据“有效占领”的原则，列强对非洲人民进行残暴的武力征服；根据领土占有必须通知各缔约国的协议，签订了一系列双边协议，划分了势力范围。

英、法、德在西非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法国沿塞内加尔河向尼日尔河推进，先后占领了塞内加尔、几内亚、上沃尔特、马里、达荷美和尼日尔。英国除继续侵略黄金海岸外，加紧在尼日尔河中下游扩张，把尼日利亚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和保护领。德国于 1884 年宣布占领多哥和喀麦隆。这样，英、法、德三国在尼日尔河和乍得湖一带到处发生了冲突。1893 年缔结的英德条约和 1894 年缔结的法德条约划分了喀麦隆的边界，1897 年协定划分了多哥的边界。1898 年的英法协定，确定了双方在尼日尔河流域的势力范围。

1896 年，法国乘英国忙于镇压马赫迪运动之时，派马尔尚率领一支 200 人的队伍，从乌班吉河流域推进到苏丹的法绍达。法国此举不但企图在尼罗河谷地站稳脚跟，而且想迫使英国在埃及和乍得湖地区让步。但是，英国寸步不让。在占领马赫迪的首都恩图曼之后，英军迅速进抵法绍达，要求马尔尚撤退，否则将以兵戎相见。法国政府被迫让步，下令马尔尚撤退。1899 年 3 月英法签订协定，规定以尼罗河和刚果河的分水岭为双方在苏丹地区殖民

地的分界线。

英、德对东非争夺的激化开始于柏林会议之后。1884 年底，德国殖民协会派卡尔·彼得斯为首的探险队进入东非，和这个地区的一些酋长签订了 12 项保护条约。与此同时，英国东非协会派哈里·约翰斯顿为首的探险队，强迫一些非洲酋长签订接受英国保护的条约。1886 年 11 月，英德签订协定，规定沿塔纳河到北纬 1 度和东经 37 度的交点为英国领地的北界，英国承认位于塔纳河以北的维图地区为德国的领地。协定还承认桑给巴尔岛、奔巴岛和鲁伍马河以北长 1000 英里、宽 10 英里的大陆沿海地带归桑给巴尔苏丹统治。这个协定没有包括整个东非大陆，因此协定签订后，英德之间的争夺继续进行着。1890 年双方签订赫耳果兰条约。德国把布干达和维图地区让给英国，承认英国对桑给巴尔苏丹国的保护权。英国承认德国占有坦噶尼喀沿海地带，并把位于北海的赫耳果兰岛让给德国。

英、法、德、意、西、葡等国都卷进了瓜分北非的斗争，多次引起战争危机。最后，摩洛哥变成了法国的保护国，利比亚成了意大利的殖民地。

在南非，英国以开普敦为基地向东北推进，先后侵占了贝专纳、津巴布韦、赞比亚、马拉维，德国抢占了西南非洲。1889~1902 年的英布战争标志着帝国主义重新瓜分非洲的开始，结果两个布尔人共和国（奥兰治和德兰士瓦）并入了英属南非联邦。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只有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还保持着政治上的独立，其余的非洲国家都被帝国主义分割了。1914 年的非洲政区表，可以窥见被瓜分后的非洲的概貌。

独立国家	列强所占殖民地		面积（平方英里）
	宗主国	殖民地	
	法国	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法属西非、法属刚果、法属索马里、马达加斯加。	4086950
	英国	南非联邦、巴苏陀兰、贝专纳、尼亚萨兰、罗得西亚、英属东非、乌干达、桑给巴尔、英属索马里、尼日利亚、黄金海岸、塞拉利昂、冈比亚、埃及、英埃苏丹。	3701411
	德国	德属东非、西南非洲、喀麦隆、多哥。	910150
	比利时	比属刚果。	900000
	葡萄牙	几内亚、葡属西非、葡属东非。	787500
	意大利	厄立特里亚、意属索马里、利比亚。	600000
	西班牙	里奥—德奥罗、莫尼河殖民地。	79800
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			393000
总计			11458811

（三）殖民统治和殖民地经济

列强在瓜分非洲的同时，逐步建立了一套统治和剥削非洲各国人民的制度。

英国起初实行的是直接统治制度（例如在开普殖民地），到 20 世纪初开始推行狡黠的间接统治制度。这个制度的首倡者是弗烈德里克·卢加德。他在担任尼日利亚总督时，提出统治这些民族的最简便的途径是保持部落管理形式，并颁布了“土著政权法”、“土著法院法”、“土著收入法”。这三个法律构成了间接统治制度的基础。根据“土著政权法”，中央和省一级的政权由英国人掌握，至于地方则保留传统的土著权力机构，由当地的封建上层分子和酋长掌握。他们由英国总督委任，“但不得作为独立的统治者而应作为附属的统治者对人民进行治理”。他们可以设置警察，但不能组建军队。他们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向居民收税。这种制度后来推行到英国在非洲的大多数殖民地。

法国在其非洲殖民地主要推行直接统治制度，实行“同化政策”，由法国政府委派总督和各级行政官吏，推行法国的法令，统治殖民地人民。法国在占领突尼斯、摩洛哥之后，实行保护国制度，保护国制度同间接统治十分相似。这些保护国的军事、外交、财政、司法大权都在条约中规定由宗主国掌握。德国也是实行的直接统治制度，不过它多是任命军事长官统治殖民地。后来在喀麦隆北部、布隆迪和卢旺达也实行保护国制度。

在经济上殖民者夺占非洲人民的大片土地，开办农场，或者出租给当地农民耕种，实行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剥削。1910 年，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私人地产总面积达到 184.7 万公顷。在南非，白人只占总人口的 21%，但占有 90% 的土地，土著居民被赶到贫瘠的沙漠地带和山区。在德属东非，5400 名殖民者占有约 90% 的土地。在扎伊尔，242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的经营权掌握在殖民者手中。

宗主国在许多国家推行单一作物制，以适应本国和世界市场的需要，而不顾殖民地人民对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的需求。埃及、苏丹、乌干达等国变成了棉花栽培区，桑给巴尔种植丁香，黄金海岸生产可可，尼日利亚、塞拉利昂、达荷美和象牙海岸则成了棕榈油的主要供应地。这些产品由宗主国资本家以压低的价格强行收购，垄断经营。

强迫劳动制在许多非洲国家盛行。比利时殖民者规定扎伊尔成年男子每月要交纳一定数量的野生橡胶，有的地区高达 9 公斤，如不能按期完成定额，就要遭到鞭挞、截肢，甚至砍头，枪毙。这种在强迫劳动制下得到的橡胶被称为“鲜血染红的橡胶”。强迫劳动制是葡萄牙剥削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人民的主要形式，1899 年的法令规定：凡 14 岁至 60 岁的“土著人”，都有承担强迫劳动的“责任”，每人每年必须至少服劳役六个月。他们还以“契约劳工”的形式，把安哥拉人送到圣多美种植园，把莫桑比克人送到南非金矿劳动。英国在乌干达规定，每个非洲成年人每年必须无偿劳动 30 天。

非洲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经着手开采的是钻石、黄金、锰、锡、铜、煤等。矿产的开发都由垄断资本家控制，例如以谢西尔·罗得斯为首的英国资本家控制着南非钻石和黄金的生产，比利时和英国资本家组织的“上加丹加矿业联合公司”控制着扎伊尔铜矿的开采。为了掠夺非洲的资源，欧洲资本家除投资采矿业外，还纷纷投资开办银行，修建铁路，架设电报线路，兴办海上和内河航运，建立加工和修造工厂。19 世

纪末 20 世纪初，非洲变成了各国垄断资本一个新的重要投资场所。

列强对非洲各国的侵占和掠夺，其血腥的程度并不亚于万恶的贩卖黑奴时期。例如：在利奥波德二世统治时期（1885～1908 年），扎伊尔的人口就减少了近一半。由于欧洲殖民者抢占大片肥土沃壤，许多非洲的农民离开了自己世代相传的家乡，被迫到荒漠之区生息。由于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入和商品涌进，非洲各地一些原有的手工业、冶炼业被摧毁了。

尽管帝国主义为着自己的卑鄙利益，采取极其野蛮残暴的手段，把千百万人投入苦海。但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个时期却是非洲社会变革的开始。千百年来因循停滞的社会细胞受到了冲击，开始崩溃，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同时，在沿海和矿业中心，近代化的大城市开始兴起，资本主义大农场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在旧的地基上出现了。第一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比较先进的非洲国家开始形成，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的第一批知识分子被培养出来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像殖民者所期望的那样成为帝国主义的奴才，而是走向反面。青年阿尔及利亚运动、青年突尼斯运动、埃及祖国党、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立，预示着非洲反帝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

（四）近代中非关系

中国与非洲，自古以来就有悠久的友好关系，到了近代，又共同遭受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休戚相关，命运与共。

猎获和贩卖奴隶曾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因素。欧洲殖民者不仅贩卖黑人为奴，也在中国东南沿海拐掠中华儿女。葡萄牙殖民者一到澳门，就“拐掠城市男妇人口，卖夷以取资，每岁不知其数”。荷兰侵占台湾、澎湖期间，大批掳掠人口，贩运到印尼为奴。同时，他们也把黑奴带到澳门、台湾，替他们服劳役，当炮灰。因此，当郑成功收复台湾时，许多黑人自愿参加了郑成功的军队，组成铙炮队，打击荷兰殖民者。

19 世纪初，欧洲各国相继颁布禁止奴隶贸易的法会，但他们在契约劳工的名目下继续掠夺亚非各国的劳动力。华工是“契约劳工”的主要来源之一。1812 年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东招募木工、石匠和专作粗工的“契约工人”，从澳门贩运到圣赫勒拿岛。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去美途中也在该岛遇见过华工，他写道：“予等乘此停舟之际，由约姆斯坦（Jamestown）登陆，游览风景。入其村，居民稀少，田间植物则甚多，浓绿芸芸，良堪娱目。居民中有我国同胞数人，乃前乘东印度公司船以来者，年事方盛，咸有眷属。”以后，华工又被殖民者招雇到马达加斯加、留尼汪和毛里求斯岛。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列强敲开了大门，开始沦为半殖民地，非洲各国遭到了殖民主义的野蛮瓜分和侵略。中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对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行径表示愤慨，对非洲人民的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他们认为 19 世纪末非洲“是欧洲列强之间斗争的焦点”，当非洲“大体上已经划定”，作为“东亚病夫”的中国，自然而然地将成为欧洲列强“增大领土和扩展殖民地”的地方，流露出一种唇亡齿寒的感情。中国对非洲人民的反殖斗争，表示了极大的关注。1908 年孙中山高度赞扬摩洛哥人民的反帝斗争精神，他说：“法兰西、西班牙二国既派警察不已，再遣征军，尽握海口，又入重地。摩（摩洛哥）民不甘与虜王俱死，与主权同亡，乃奋发为雄，以拒外兵，以覆昏主。”

内外受敌，危险莫测，而靡民不畏也；惟有万众一心，死而后已。”

1899年“中刚简明专章”，是中国与扎伊尔签订的第一个条约，也是中国与非洲国家缔结的第一个条约。1885年柏林会议承认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以个人名义领有“刚果自由邦”之后，利奥波德政府为争取更多国家的承认，并在中国招工，与清政府签订该约。该约共二条。一、中国与各国所立约内，凡载身家、财产与审案之权，其如何待遇各国者，今亦可施诸刚果自主之国。二、议定中国民人可随意迁往刚果自主之国境内侨寓居住，凡一切动产、不动产，皆可购买执业，并能更易业主。至行船、经商、工艺各事，其待华民与待最优国人民相同。在“中刚简明专章”签订之前，就有一批华工到扎伊尔参加修建马塔迪—利奥波德维尔铁路。1901年、1902年、1904年和1906年又有几批华工到扎伊尔。

英布战争期间，南非金矿被战火波及，许多非洲矿工离散回乡。战争一结束，感到劳动力缺乏，决意招募华工。1904年5月13日，中英正式签订“保工章程”。英国在天津、烟台、广州等地张贴雇工合同，由“大包商”、“小包商”拐骗劳动人民到南非金矿卖命。自1904年5月首批华工从香港启运，到1906年，前后历时三年，共招63,811人，其中从秦皇岛启程者43,258人，天津4139人，烟台14,675人，广州—香港1741人。与从前到非洲的华工相比，这批华工所受待遇更为苛刻。他们均以三年为期，期满可再延续三年，至时遣送回国，无权移居南非。华工每日工作十小时，每两月工银为两镑半，只准做粗工，禁做熟练技工，不准经营小手工业，不准经商，不准购买不动产。华工必须住在矿主指定的场所（围场）里，如擅离住所，得拿官究治，罚款10镑或监禁一月。外出要随身携带身份证，以便稽查。这类规定，与当时对付非洲人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措施，如出一辙。

清政府为了“保护华工”，向南非派驻了总领事。这是中国向非洲派遣的第一个常驻外交使节。

20世纪初，在莫桑比克亦有华侨四百余人。他们受葡萄牙殖民者的苛例之苦，请求设领事保护。1905年，清政府委派德商费里士窝傅代理驻该地的副领事。

总之，这个时期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具有两个显著特点：在国家关系上是由帝国主义插手包办的，是按照殖民者的利益安排的；去非洲的华工和华侨与非洲人民共同生活，共同遭受殖民者的鞭打、虐待、剥削和奴役，同非洲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第二节 埃及和苏丹

(一) 阿拉比领导的埃及抗英战争

苏伊士运河通航后，资本主义列强对埃及的侵略日益加紧。

1863年伊斯梅尔继位为埃及总督，1867年被奥斯曼苏丹封为赫迪夫。他继续奉行大举外债的政策。1868年外债为一千一百多万英镑，1873年增加到三千二百多万英镑。所借之外债只有10%用于建设事业，90%用于宫廷的投机倒把和奢侈生活。例如，修建富丽堂皇的开罗阿比丁宫、亚历山大海滨行宫、开罗皇家戏院等等。外债的利息高达7%至9%。每年国库收入的大部分都被用来偿付外债利息，造成财政状况日益恶化。1874年，伊斯梅尔不得不把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票（4亿法郎）以1亿法郎的代价卖给了英国。杯水车薪，无济于事。1876年埃及公私外债总计达9100万英镑，已无力偿还。4月，伊斯梅尔正式宣布埃及财政破产。英法两个主要债权国，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在巴黎达成协议，规定由英、法、奥、意和埃及代表组成“混合管理委员会”，用亚历山大的海关和铁路的全部收入作为付息的担保；由英法派代表监督埃及的财政。破产后的埃及政府只得俯首贴耳，唯命是从。11月18日，伊斯梅尔颁布命令，任命英国人为埃及财政收入和预算的总监督，法国人为国家财政支出的总监督。英法对埃及的“双重监督”制度由此形成。1878年，埃及又在英法的强迫下成立了所谓“欧洲人内阁”，由埃及高利贷者努巴尔任首相，英国人利瓦尔斯·威尔逊任财政部长，法国人德·布里尼叶任公共工程部长，意大利人和奥地利人分任副部长。外籍部长拥有否决权，全面控制了埃及政府。孙中山在评论埃及和美国举借外债的不同结果时指出：“埃及所以借外债而亡国者，失主权故也。美国初独立时亦借外债，而美国之能兴者，则不失主权故也。”

为外国垄断资本利益服务的“欧洲人内阁”，肆意掠夺埃及人民。英法部长不满足于接管铁路、港口和海关，还强迫伊斯梅尔下令向农民征收两年后的地租。农民交纳不起，只得把土地抵押出去，因而农民的债务在七年内增加了16倍。在“欧洲人内阁”统治期间，外国雇员充斥于埃及政府机构，埃及职员处处受到排挤和歧视。欧洲人的薪金平均每人300埃镑，而埃及职员的薪金，平均每人只有30埃镑。他们还以缩减开支为名，大量解除埃及军官的职务。这一切激起了埃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强烈不满。

从50年代开始，埃及的民族资本主义又有了一定的发展。1858年埃及政府颁布了“赛德法令”，规定埃及人有权自由使用、继承和买卖土地，改实物地租为货币地租。这个法令奠定了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为地主资产阶级夺取农民土地开拓了道路。埃及资产阶级打入农村，放高利贷，收购农民土地，种植棉花和甘蔗。美国内战开始后，埃及棉花种植业获得了大发展。净棉厂和制糖厂大批建立起来，埃及的民族工业有了新的发展。到1873年埃及已有2万产业工人。

资产阶级对伊斯梅尔的卖国政策和外国资本的经济侵略深感不满，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潮应运而生。这股思潮的著名代表就是贾迈勒丁（1839～1897

意即国君或统治者。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8页，中华书局，1981。

年)。贾迈勒丁生于阿富汗，对伊斯兰教的历史和哲学有很深的造诣，曾在伊斯兰各国讲学二十余年。1871年他到埃及，被聘为爱资哈尔大学教授。

贾迈勒丁反对西方的侵略，反对专制政治，主张建立民族独立和自由的埃及。他以“自由”为题，讲解“自由”的真义，认为没有自由，人们不可能深入研究学问，不能得到生存和幸福。他提倡“教育救国”，主张研究自然科学和工艺。他带着地球仪进入课堂向学生讲授地球形状，爱资哈尔大学的顽固派便骂他为异端。他呼吁伊斯兰国家团结起来，对抗列强的侵略，建立独立的国家。他的思想和学说在爱资哈尔大学的学生和官吏、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穆罕默德·阿卜德写道：“求学的人和贾迈勒丁的学生在假期里把他们学到的东西带回家乡，接着，别人又从他们那儿把知识传到全国各地。麻木的感情复苏了，压抑的理智觉醒了，全国到处都觉悟了。”

在民族主义思潮哺育下，一个秘密团体“祖国协会”诞生了。它是由地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明的咨议会议员、爱国军人组成的。其著名代表有穆罕默德·谢里夫、阿哈姆德·撒米·鲁巴迪等人。该党创办了《埃及报》《祖国报》等刊物，提出了“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主张维护国家主权，确立宪政制度，同“欧洲人内阁”作斗争。

同时，以阿拉比为首的埃及军官成立了另一个秘密团体“青年埃及协会”。阿拉比（1841~1911年）生于札加济格附近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当过村长。他在爱资哈尔大学读过书，参军后提升为中校。青年埃及协会的宗旨是打倒土耳其贵族阶级，推翻伊斯梅尔政权，阿拉比甚至提出过“建立共和国”的主张。1879年青年埃及协会和祖国协会联合起来，建立了祖国党。祖国党只是两个组织的松散联合。双方经常共同商讨，统一步调。

1879年2月18日，2500名被解职的埃及军官在开罗举行示威，要求“欧洲人内阁”辞职。尽管阿拉比当时不在开罗，但他仍被指控为示威的幕后操纵者，被流放到亚历山大。4月，国内有影响的宗教领袖、学者、军官、商人和咨议会议员，提出了一项《民族法案》，要求组织一个纯粹的埃及人内阁，确认内阁对咨议会负责的原则。伊斯梅尔为了平息民愤，任命谢里夫组阁，草拟宪法，并同意不让英法部长参加新内阁。谢里夫很快把宪法草案提交咨议会讨论。这部宪法确认了分权的原则；咨议会有立法权；各部大臣均应对咨议会负责。英国不满伊斯梅尔的所作所为，决定换马。6月26日，英国怂恿奥斯曼帝国苏丹废黜伊斯梅尔，任命他的儿子杜菲克为赫迪夫。

杜菲克上台后，充当英国的侵略工具，拒绝批准宪法，解散咨议会，迫使谢里夫内阁辞职，恢复“双重监督制度”，逮捕祖国党人，驱逐贾迈勒丁，封闭进步报刊。

在杜菲克倒行逆施，堵塞言路的情况下，以阿拉比为首的埃及军官成了全民族的代言人。1881年1月中旬，阿拉比等三名军官呈交一份请愿书，要求撤换陆军大臣奥斯曼·里夫基，改革军队的晋升制度。2月1日当他们被召到尼罗河宫时，立即被捕，投入监狱。这个消息引起了军队的哗变。埃及籍军官和士兵冲进陆军部大楼，救出了阿拉比等三人，旋即开往阿比丁宫，再次要求撤换陆军大臣。杜菲克被迫下令免去里夫基，改任巴鲁迪为陆军大臣。

1881年杜菲克企图把具有爱国情绪的驻军调离开罗，免除巴鲁迪陆军大臣的职务，引起了新的抗议。阿拉比等爱国军官于9月9日到阿比丁广场示威，要求撤换内阁，召开国会，实施宪法。次日，杜菲克解散了里亚德内阁，

14日任命谢里夫组阁，10月4日举行大选，12月24日召开了咨议会。由于谢里夫内阁与咨议会在咨议会是否有权审核政府预算的问题上发生分歧，1882年2月2日谢里夫内阁辞职，2月4日巴鲁迪组阁，任命阿拉比为陆军大臣兼海军大臣。新内阁颁布宪法，确认内阁对议会负责，有权审查预算，大大削弱了英法财政监督的权力。新内阁的措施得到了埃及广大人民和爱国士兵的热烈拥护，遭到英法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对。

英法侵略者为保持他们在埃及的权益，1882年5月以保护外侨为名，将舰队开到亚历山大港进行威胁，并向杜菲克提出最后通牒，无理要求解散巴鲁迪内阁，放逐阿拉比。5月26日巴鲁迪内阁辞职，抗议赫迪夫接受英法最后通牒。全国各地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反对外国干涉，要求废黜杜菲克，结束“双重监督制度”，归还被外国人和封建主夺去的土地。杜菲克只得让阿拉比将军留任，其他内阁职位暂时空缺。于是，阿拉比成为唯一的内阁大臣，集中了全部权力。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涨，吓坏了地主贵族、高利贷者和欧洲资本家，他们纷纷仓皇外逃。阿拉比下令没收逃亡者的财产。6月，杜菲克以避暑为名，带领一批地主贵族逃往亚历山大，请求英法“保护”，公开投向英法的怀抱。

对于如何瓜分埃及，英法之间矛盾重重。7月10日由于法国政府内部对武装干预有分歧以及法德矛盾的加剧，法国军舰乃撤离亚历山大港。英国则决意单独武装占领埃及，于7月11日炮轰亚历山大港。阿拉比号召埃及人民进行抗战，他在告民众书中指出：“埃及民族和英国人之间进行着势不两立的战争”。尽管双方军事力量对比悬殊，但埃及军队在人民群众支持下奋勇抵抗，坚守阵地。成千上万的居民参加战斗，在枪林弹雨中运送弹药，抢救伤员。7月12日亚历山大港军民主动撤离。13日英军侵占亚历山大港。以杜菲克为首的投降派要求阿拉比停止一切防御。阿拉比针锋相对，立刻宣布杜菲克是“英国人的俘虏”，号召全国人民不要听从他的命令。

亚历山大港失陷后，阿拉比率领军队建立保卫开罗的西部防线。他们在库夫尔·都瓦尔几次击退了英军的攻击，阻止了英国人进入腹地。但是对苏伊士运河区放松了防御。当时，苏伊士运河公司负责人莱塞普斯保证，决不准英军利用苏伊士运河区，阿拉比轻信这一诺言，未在苏伊士运河区设防。英军秘密调动主力于8月20日侵占运河区，接着又向开罗进攻。9月13日，在通向开罗的要冲泰勒·阿尔·克比尔地方展开了决定性的会战。这里的埃及守军是一支没有经过训练的游牧部落新兵，战斗力不强。由于游牧部落酋长的出卖，英军突破防线，阿拉比被迫退守开罗。开罗城内的一些封建上层集团动摇叛变，乘阿拉比在城郊布防时，开门揖盗，英军于9月15日占领开罗。阿拉比、巴鲁迪等爱国将领被俘，并被放逐到锡兰（今斯里兰卡）。

阿拉比抗英斗争的失败，除了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以外，从抗英阵线内部来分析，主要原因有四：一、阿拉比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集团，本身是软弱的，内部是分裂的，祖国党内的自由派分子，反对废黜杜菲克，反对建立共和国。二、阿拉比等领导人未能真心实意地依靠群众，组织一支革命的武装力量。三、没有清洗军队中的叛徒和动摇分子。主力部队的司令阿里·优素福、骑兵侦察队长阿卜杜勒·拉赫曼·哈桑都被敌人收买。四、战略上的错误。阿拉比没有在英军易于通过的苏伊士运河防线设防。

阿拉比所领导的抗英斗争不是孤立的，它是和苏丹的马赫迪大起义互相呼应的。

（二）马赫迪大起义

苏丹是非洲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北部居民以阿拉伯人为主，南部居民大多数是苏丹黑人。1819~1821年穆罕默德·阿里征服了苏丹的大部分，名义上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实际上归埃及贵族统治。1824年埃及建立喀土穆城，设总督府于此，作为统治苏丹的中枢。苏丹被分为若干省，省长大都由埃及人担任。埃及统治阶级在苏丹夺取土地，使苏丹农民沦为农奴，残酷剥削他们。他们向苏丹人民征收土地税、牲畜税、水车税。税目繁多，税额繁重，仅1873年一年就从苏丹人民身上搜括了100万英镑。出口贸易由政府垄断，输出象牙、黄金和奴隶。为了提供更多的出口产品，还引进了棉花、靛蓝植物等作物。

埃及接受《英土商约》以后，欧洲列强，特别是英国把魔爪伸进了苏丹。法国、英国先后在喀土穆设立了领事馆。基督教传教士在喀土穆和其他地方建立教堂，传播“福音”。欧洲各国的商人开设各种贸易公司，垄断棉花、阿拉伯树胶、象牙、鸵鸟毛贸易。

英国力图借助埃及的力量控制苏丹，进而向非洲腹地渗透。1869年，一支打着埃及旗号，由埃及政府出资，而由英国人塞缪尔·贝克指挥的探险队前去征服苏丹南部诸国。1872年贝克被任命为新征服的赤道省省长。1874年由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戈登继任。1877~1879年戈登出任苏丹总督，安插殖民者担任赤道省和加扎勒河省省长，对居民横征暴敛。

苏丹人民为反对英国殖民者、反对埃及及其本国的封建统治者，掀起了震撼非洲大陆的马赫迪大起义。

马赫迪起义的领导者穆罕默德·艾哈麦德（1843~1885年）出生在苏丹栋古拉一个贫苦阿拉伯人家庭。他是伊斯兰教苦行派兄弟会教长，他以传教士身份住在白尼罗河的阿巴岛，靠耕种小块土地过活。他曾几次到外省旅行，看到每个地方的群众都一样遭到英国人、埃及人以及富人的剥削和压迫，都渴望从苦难和暴政中得到解放。他立志团结人民为摆脱外国的奴役和封建主的压迫而战斗。

曾有一种传说：若一旦穆斯林遇到苦难时，就会出现一个伟大的马赫迪（先知），这个先知会恢复真正的教义，把群众救出苦海。穆罕默德·艾哈麦德利用这个传说，自称是真主派来拯救人类的救世主，表示要在世上建立真正的信仰和正义。他主张“废除不堪负担的苛捐杂税，在真主面前人人平等”。马赫迪教义反映了苏丹贫苦农民的原始平等思想。

马赫迪的出现立即使埃及当局惊慌失措。苏丹总督拉乌夫帕夏命令马赫迪到喀土穆解释他的行为，并准备拘捕他以制止马赫迪运动的扩大。马赫迪郑重声明：“根据真主和先知的意旨，我是这个国家的主宰，我也决不到喀土穆去解释我的所作所为。”这个声明实际上成为起义的信号。马赫迪宣布苏丹全国人民要进行反对外国侵略者的“圣战”。

1881年8月12日苏丹总督派两连军队进攻阿巴岛，马赫迪带领信徒离开村庄埋伏起来，用棍棒和石头进行猛烈的袭击，歼灭敌军120名，军官6名，残敌仓皇逃跑。这次战斗被英国资产阶级描绘是“带棍棒的人杀死了带枪的人”。

马赫迪认为，第一次战斗的胜利，必然引起敌人的疯狂反扑。一方面他

组织和扩充军队，另一方面尽可能避免同敌人强大的力量对抗，以便积蓄力量。他率领起义队伍，渡过尼罗河，在山岭起伏的卡迪尔地区建立了根据地。

1881年12月9日，起义者击溃了一支400人的政府军，1882年3月又全歼了一支6000人的讨伐军。科尔多凡、达富尔和其他省的穷苦百姓纷纷投奔马赫迪，许多城镇被起义军攻占。1882年9月马赫迪率领3万大军，直捣乌拜伊德，1883年1月攻占该地，宣布废除外国当局颁布的一切法令。

埃及阿拉比领导的抗英运动失败之后，英国着手绞杀马赫迪运动。1883年秋，英国将领希克斯率领1万人的军队开入苏丹。11月初，在乌拜伊德附近马赫迪的军队与侵略军展开了一场空前的鏖战。希克斯和所有军官都被击毙，整个远征军生还者仅250人。希克斯的失败，使整个东苏丹绝大部分地区从外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了。

英国政府在损兵折将，一败涂地的情况下，重新起用已经辞职的戈登，1884年初任命他为苏丹总督。英国资产阶级称赞戈登“是最熟悉苏丹事务的英国人”，“光凭他的名字就会发生奇迹”。戈登走马上任之后，一面紧急动员，日夜赶挖战壕，加强城防；一面蛊惑人心地宣布减免赋税，焚毁欠税人的名册，释放囚犯。他还背着埃及政府策划阴谋，企图与马赫迪达成协议，由马赫迪当北苏丹独立国的首脑，而南苏丹则划归英属东非。但他的诡计未能得逞。

1884年3月，马赫迪起义军绕过喀土穆，切断了戈登退回埃及的道路。1885年1月5日马赫迪起义军攻克恩图曼，23日向喀土穆发动总攻。当攻破喀土穆之际，马赫迪战士直捣“总督府”，用长矛刺中戈登的胸口，结束了他的生命。1885年夏，起义军挥师北上，攻克了栋古拉、散纳尔等地，解放了除港口城市萨瓦金以外的整个苏丹。这样，正当欧洲列强疯狂瓜分非洲大陆的时候，苏丹却在非洲历史上第一次重新获得了独立和自由，打乱了英国侵略非洲的步伐，极大地鼓舞了非洲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武装起义的胜利，为建立独立的国家打下了基础。1885年6月，穆罕默德·艾哈麦德逝世，建立统一国家的任务便落到了他的战友阿卜杜拉身上。阿卜杜拉进行了一些改革，采取了一些维护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措施。他宣布废除英埃统治时期的税收制度，没收外国人侵占的土地，鼓励农民种植棉花、胡麻、甘蔗等经济作物。手工业的专门化有了进一步发展，并建立了制造军鞋、服装和内河船舶的小型手工工场。开办数百所学校，附设在清真寺，使用阿拉伯语为统一的官方语言。在军事上建立了一支几万人的正规军。百人队是基本的战斗单位，由百人长指挥。为了供应军需，在首都恩图曼开设了一些兵工厂，制造火药，修理各式火枪。

阿卜杜拉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分全国为20个省，由他任命的大埃米尔治理。全国实行统一的法令。财政、工农业和国内外贸易由中央金库管理。对破坏国家统一的封建主和酋长予以严厉镇压。

但是，在阿卜杜拉当政时期，对苏丹的政治经济制度并没有进行根本的变革，而且起义军的上层分子发生了封建性的蜕化，阿卜杜拉及其亲信占据了埃及官吏原有的田庄，各省的统治者也都成了大土地所有者。

英国为了实现建立从开罗到开普敦的殖民帝国计划，是决不会容许苏丹独立的。1885~1889年，英国采用“非洲人打非洲人”的阴毒手段，唆使埃塞俄比亚进攻苏丹。这场战争双方损失惨重，削弱了两国人民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力量。

1896年3月，英国国会通过侵占苏丹北部的议案，由赫伯特·基钦纳率领15,000大军侵入苏丹。1898年4月，在阿特巴拉河战役中，苏丹军队遭到了失败。9月2日，在恩图曼城下双方进行决战，苏丹军队伤亡和被俘者达26,000人。英国侵略者攻入首都后，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毁掉了马赫迪的陵墓。

阿卜杜拉率领部分军队撤到了科尔多凡。鉴于很难坚守城市，乃带领部队到农村进行游击战。1899年11月，英军进行偷袭，阿卜杜拉在乌姆德维克拉特战役中牺牲。在苏丹西部，马赫迪军队的一个将领奥斯曼·迪格纳坚持战斗到1900年。

英军占领苏丹后，苏丹在“英埃共管”的名义下，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

（三）英国统治下的埃及和苏丹

在扑灭埃及和苏丹的民族独立运动以后，英军对两国实行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1882年英国宣称，英军驻埃及只是“暂时的占领”，英国“继续承认埃及是奥斯曼帝国宗主权范围内受国际保障的独立国家，承认穆罕默德·阿里家族世袭埃及王位”。其实，奥斯曼帝国的“宗主权”和埃及的“独立主权”都是象征性的，真正的统治者是“英国驻埃及最高代表兼总领事”贝林（后升为勋爵的克罗美尔）。他把大批英国顾问分配在埃及政府各部门（1890年计有39名），发号施令。克罗美尔公开宣布：“埃及政府必须采纳英国顾问的意见，否则只有辞职。”克罗美尔对埃及人民实行恐怖统治，全国有100所监狱，埃及人民稍有不满，就会遭到监禁、酷刑、流放和处死。人们称这种血腥的统治为“克罗美尔制度”。

1898年克罗美尔又设计了一个统治苏丹的方案，这就是1899年1月正式签订的英埃《管理苏丹协定》。协定规定，苏丹最高军事与民政统治权属于“苏丹总督”，而总督由埃及“赫迪夫根据英国女王陛下政府之推荐下令任命”。第一任总督便是基钦纳。这样，名义上苏丹由英埃共管，实际上是一切由英国殖民者说了算。克罗美尔指示基钦纳：“苏丹总督必须随时听从驻开罗的英国女王陛下的代表兼总领事所发布的任何指示”，总督可以在苏丹颁布任何法律和行政命令，“毋须请示开罗”。除总督外，各省省长照例也由英国人充任。

第三节 马格里布各国

(一) 1871年阿尔及利亚大起义

法国政府执行的“同化政策”，把阿尔及利亚变成了一个欧洲移民的聚居区。1866年，阿尔及利亚的土著居民为二百六十余万人，移民竟达二十二万余人。法国政府在国内的恐怖统治，又把阿尔及利亚变成了政治犯流放地。政治犯中有新雅各宾派、共和派和各种社会主义派别。

1870年9月，第二帝国倒台的消息传到阿尔及利亚时，移民们组织了秘密的保卫委员会。10月24日，“国防政府”任命的临时总督到达阿尔及利亚时，共和协会组织了示威游行，占领总督府，逮捕了一批第二帝国的军政官员。临时总督躲在军舰里未敢上任，政权落到了以罗穆阿尔德·维耶尔莫兹为首的阿尔及尔市政府手里。11月8日，维耶尔莫兹被推为阿尔及利亚临时特别专员。当国防政府答应在阿尔及利亚实行民政管理，给欧洲移民以法兰西公民权之后，维耶尔莫兹把政权交给了国防政府任命的临时特别专员。

巴黎公社像一声春雷震撼了全世界。阿尔及利亚的许多城市举行了声援公社的示威游行，高呼“巴黎万岁”、“打倒凡尔赛”。3月28日，派到巴黎的共和协会的代表亚历山大·兰贝等人发表声明：“最坚决地支持巴黎公社”，并说：“40年中受到军事和行政中央集权的双重压迫的殖民地人民早已明白，对他们来说，公社的完全解放是他们获得自由和繁荣的唯一方法”。亚·兰贝积极参加了公社的斗争，并在“五月流血周”中被凡尔赛分子杀害。但是，在共和协会中占据领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对方兴未艾的阿拉伯人民的解放斗争采取了冷漠和敌视的态度。

备受法国殖民者奴役的阿拉伯人早就准备发动反法起义。第二帝国的崩溃和法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为之提供了有利时机。1871年初，在许多地区发生了袭击殖民者的武装冲突，出现了由10~12人组成的起义委员会。谢赫·哈达德领导的拉赫曼尼亚宗教团体，在群众中进行了有效的鼓动工作。他们指出：普法战争后法国必然要把战争赔款转嫁给阿尔及利亚人，进行新的土地掠夺。他们号召群众用“圣战”来保卫自己。3月14日，卡比利亚山区首举义旗。起义领导人是迈贾纳区首领穆罕默德·毛克拉尼。4月8日，谢赫·哈达德宣布“圣战”，卡比利亚的20万起义者拿起了武器。由于巴黎公社的英勇战斗，凡尔赛政府无力向阿尔及利亚增兵，起义者节节获胜。1871年起义军共进行了340次战斗，控制了包括250个部落，60万农牧民的广大地区。

在5月5日的战斗中，毛克拉尼牺牲，他的弟弟艾哈默德·布·迈志拉格继承遗志，继续领导反法斗争。斗争是极其艰苦的。法国殖民军焚毁村庄，抢掠牲畜，填塞水井，杀害妇女和儿童。巴黎公社被镇压后，法国政府把阿尔及利亚占领军的人数增加到85,000人，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法国殖民者对起义军采取镇压和利诱兼施的政策，起义军的一些上层领导妥协叛变。7月13日哈达德向法军投降。10月7日至12日在布塔列勃战役中，起义的主力被打垮。1872年1月法军占领了图古尔特和瓦格拉，起义最后失败。

法国反动派杀害了几千名起义者，成千上万的人被投入监狱。参加起义

的各部落被迫交出 3650 万法郎的赔款，被夺去 50 万公顷的土地。

起义被镇压后，法国加强了对阿尔及利亚的统治。1880 年划分“行使全部权力”的市镇和“混合”市镇，前者住有欧洲移民，设立享有一定权力的市政机构；后者主要居住阿尔及利亚人，由法国行政官员管理。1881 年颁布“土著制度法”，禁止阿尔及利亚人组织政党和社团，不准他们在欧洲人开办的机构中供职。根据该法，殖民当局有权逮捕、处罚和流放一切“可疑的”阿尔及利亚人，并没收他们的财产。

1882 年，法军占领姆扎卜绿洲，开始侵入撒哈拉。20 世纪初，法军完成了对阿尔及利亚全境的军事占领。

（二）突尼斯沦为法国保护国

突尼斯地处非洲大陆北岸山峦重叠的突出部分，物产丰饶，素有“地中海国家珍珠”之称。

突尼斯在 1574 年被土耳其占领。1705 年侯赛因·本·阿里在当地封建主支持下，建立了侯赛因王朝。突尼斯名义上仍隶属于奥斯曼帝国，实际上执行独立的内外政策，抗拒奥斯曼素丹的政令。

法国侵入阿尔及利亚以后，极力向突尼斯渗透，扩大它在北非的势力。1836 年奥斯曼帝国素丹派海军进攻突尼斯，希望恢复直接统治，法国也把军舰开到突尼斯沿海进行干预。土耳其在战争威胁面前退缩了。1837 年法军侵入突尼斯，但在英国干涉下撤退了。

突尼斯政府力图推行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借以增强国力，抗击外来侵略。它建立了一支新式海军和陆军（包括七个步兵团、两个炮兵团和一个骑兵团），创建军事学校，聘请欧籍教官执教。发展工业，建立军毯织造厂、面粉厂、食品厂、皮革厂、火药厂、大炮制造厂，开采铅矿，聘请法国技师和工人，购买欧洲的机器设备。1847 年开始建设邮电系统。1861 年颁布“宪法”，宣布设立咨询议会。议会由 60 人组成，其中 20 名为军政官员，40 名选举产生。宪法允许外国人经营工业，但不得购买不动产。在 1863~1871 年间，英国、奥地利、普鲁士、意大利和法国人还是取得了购买不动产的权利。

这次改革没有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而且由于军费支出大量增加，宫廷的挥霍和官吏的贪污，造成了财政极端困难。政府为了弥补开支，便大量举债。1862 年内债已达 2800 万法郎，外债到 1869 年核定为 12,500 万法郎，80% 属于法国资本。

欧洲资本，特别是法国资本大举打入突尼斯市场。在农业方面，到 1881 年法国人已购买了十万多公顷土地；在工交方面，法国公司获得了突尼斯铁路建设租让权，1879 年开办了“突尼斯银行”；1872 年英国公司建成了第一个煤气厂（后转让给法国公司）；1868 年意大利获得了赖萨斯山铝矿开采权，法国则在杰巴兴办了同样的企业。

到 19 世纪 70 年代末，法国已用经济的、财政的、政治的罗网控制了突尼斯。在 1878 年柏林会议上，英、德答应不阻挠法国占领突尼斯后，法国便加紧准备占领突尼斯。

另说 2750 万法郎。

1881年4月24日,法军借口赫鲁米尔事件,从阿尔及利亚攻入突尼斯。装备精良的法国侵略军满以为突尼斯“不堪一击”,但他们在菲兹到卡勒一线和哈扎尔·门库尔地区遇到了激烈的抵抗,克夫城周围的部落同仇敌忾,挫败了法军的几次强大进攻。后来,由于暗藏的法国间谍电报局长鲁瓦打开城门,法军才攻进克夫城。5月1日,8000名法国海军陆战队在宾泽特登陆。5月12日,法军包围巴尔杜王宫,胁迫穆罕默德·萨克多贝伊下令突尼斯军队停火,签署《巴尔杜保护条约》。条约规定:“凡法军当局认为必要占领的任何据点均可占领”;确认法国总监在突尼斯的权力;未经法国同意,突尼斯不得与其他国家建立直接联系或缔结独立的国际条约。

保护条约一签字,全国到处爆发反法起义。起义的中心是斯法克斯城。法国强迫贝伊派兵前往镇压,但派去的一千多名突尼斯士兵也站到了起义者一边。附近的农牧民也纷纷起义,并在阿里·本·哈利发率领下开进了斯法克斯城。在克夫地区有阿里·本·阿马尔领导的起义,在上草原地区有艾哈迈德·本·优素福领导的起义。

但是,抗法运动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领导,法国得以各个击破。1881年7月法军集中力量攻打起义中心斯法克斯城。该城陷落后,哈利发率众退往南方继续抗法。9月,法军增至五万余人,分三路向起义者据守的凯鲁万城进攻。凯鲁万失陷后,抗法游击队仍在南方各地坚持。

1883年,法突签订《拉·马尔萨协定》,规定突尼斯必须进行法国政府认为必要的行政、财政和司法改革,由法国总监主持内阁,总管一切内外事务。突尼斯就在这种保护制度下变成了法国的殖民地。

这种保护国制度的特点是形式上有两个最高权力,一个是总监代表的宗主国权力,另一个是贝伊所代表的被保护国的权力,实际上是被保护国的权力掩盖了宗主国的殖民专制统治,而实权始终掌握在法国总监手里。1884年法国总统颁布命令,授权法国驻突尼斯总监可以全权代表“法国政府同意在突尼斯颁布和实行贝伊殿下的一切命令”。

(三) 摩洛哥危机和摩洛哥沦为法国保护国

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不同,它顶住了土耳其的侵略,保持了独立。从1659年起,阿拉维王朝一直统治着摩洛哥。

在阿拉维王朝建立初期,摩洛哥大多数居民都从事农牧业,城市居民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八。摩洛哥封建制度的特点是具有浓厚的宗法关系。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分为寺院土地、国有土地、村社土地和私有土地。私有土地称为穆勒克,是统治阶级上层人物占有的封建大地产,一般分布在城市周围和发达的农业地区。分成制(胡姆亚西制)是剥削农民最常见的形式,一般农民获得收成的五分之一二,其余归地主。在部落制度中,农民耕种村社土地,向部落酋长缴纳贡赋,向僧侣赠送“礼品”,他们作为部落的成员之一,处境较好。

很早以来,摩洛哥就是欧洲列强竞相争夺的对象。“三王之战”给了葡萄牙以决定性的打击,摩洛哥逐步收复了葡萄牙侵占的沿海据点。1679年摩

所谓“赫鲁米尔事件”,是法国发动战争的一个借口。有一些阿尔及利亚居民曾杀死几个赫鲁米尔部落的人,指责他们抢劫牲口。约三百名赫鲁米尔人为替受害者复仇,进入了阿尔及利亚领土。

洛哥的军队包围英国侵占的丹吉尔，1684 年英国人放火烧毁该城后撤离。到 17 世纪末，只有西班牙还占据着梅利利亚、休达和佩利亚要塞。欧洲列强从沿海被赶走以后，继续同摩洛哥保持着贸易联系，相互之间交换的货物有呢绒、麻布、食品杂货、蜂蜡、羊毛和铜。在贸易竞争中，荷兰和英国商人逐步排挤了法国商人。

阿拉维王朝虽然收复了沿海据点，但内部分裂割据，内战不已，发展缓慢，到 19 世纪初欧洲列强却以更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向它扑来了。

1836 年美国首先强迫摩洛哥接受了领事裁判权制度。1856 年英国与摩洛哥签订条约，英国得到了治外法权和贸易特惠权，摩洛哥准许英国商人在全境自由贸易，征收低额关税，值百抽十。

1844 年，法国以喀德尔避入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边境为借口，派军侵入摩洛哥，签订了《丹吉尔条约》，次年又划定了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之间的边界。但法国继续寻事挑衅，侵犯摩洛哥领土。1859 年法军侵入摩境，攻打斯纳森部落。

1860 年，西班牙由陆军大臣奥当奈尔率领一支舰队和 5 万士兵在摩洛哥登陆，攻占得土安城，逼近丹吉尔。双方签订《丹吉尔条约》，摩洛哥放弃了休达附近地区的主权，赔款 1 亿法郎。

法国一贯把北非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完全占领突尼斯以后，它就积极准备夺占摩洛哥。1881~1882 年，法国侵入摩洛哥东南部，夺取了许多绿洲。1903 年给摩洛哥素丹 2100 万法郎贷款。第二年法国银行团又给摩洛哥素丹 6250 万法郎的贷款，年利 5 厘，以海关税收的 60% 作为担保。于是，海关落到了法国资本家手里。

第四节 埃塞俄比亚和非洲之角

（一）狄奥多尔二世的改革和抗英斗争

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当时，封建制度已占统治地位，但仍保留着奴隶制的残余。土地属于皇族、僧俗封建主所有。农民耕种地主土地，必须缴纳实物地租，担负徭役。手工业，特别是织造、制革、编织、首饰、木器、冶铁等行业已经相当发达，并出现了地区性分工，如阿杜瓦、阿克苏姆生产特种棉织物和精制羊皮，季马和哈拉尔则以制造木器见称。

埃塞俄比亚全国的最高统治者所罗门王朝出身的皇帝（万王之王）。但到1855年以前，各个王国（如绍阿、提格雷、戈贾姆等）具有极大的独立性。他们拥有自己的军队、行政机构，彼此之间进行无休止的战争。他们常常拥立皇族出身的人为“万王之王”，挟天子以令诸侯，如提格雷的统治者瓦尔达·塞拉西（1784~1816年）和萨巴加迪斯（1816~1830年）、中部几个行省的统治者拉斯阿里（1830~1855年）。

英法两国利用埃塞俄比亚的内战和分裂，积极向埃塞俄比亚渗透。1802年以瓦伦西亚勋爵为首的英国使团来到埃塞俄比亚，代表团的秘书索尔特曾同提格雷王国的统治者进行了接触。1841年英国使团与绍阿国王萨尔·塞拉西签订条约，获得了贸易特权。1843年又同统治埃塞俄比亚中部几个行省的拉斯阿里签订“友好通商条约”，规定对英国商品征收低额关税。同年，法国与萨尔·塞拉西两签订条约，获得了自由经商并“购买房屋和田地”的权利。在欧洲殖民侵略威胁日益严重的条件下，必须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国家，才能抵御外侮，保卫独立。

1853年，一个出身于库阿尔族小封建主家庭的人，名叫卡萨，起来反抗当权的封建统治集团。他先后打败了戈贾姆、冈达尔、提格雷和绍阿的统治者，统一了全国。1855年加冕为埃塞俄比亚皇帝，称狄奥多尔二世。

狄奥多尔为了消灭封建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取消了封建主拥有军队的权力，建立了统一的军队；废除奴隶买卖；改革税制，由中央政府统一掌握财政收入；限制高级教士特权，收回教会的一部分土地，对其余土地征收赋税；聘请欧洲工人和技师，发展工业；减少国内关卡，以利商业的发展。这些改革巩固了国家的统一，有利于埃塞俄比亚社会的发展。

埃塞俄比亚的统一和狄奥多尔二世的改革，遭到了各地封建主集团的反对。英国也不愿埃塞俄比亚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竭力策划阴谋。1867年狄奥多尔二世把阴谋策划者英国领事卡麦伦和几个欧洲人逮捕法办。英国以此为借口，悍然出兵埃塞俄比亚，并在泽拉港登陆。狄奥多尔二世号召人民起来反抗侵略者，亲自率军奋战，坚守军事要塞马拉达。由于许多反动的大封建主在保卫祖国的斗争中纷纷背叛，1868年4月13日英军侵占马达拉要塞，狄奥多尔战败自杀。

狄奥多尔二世死后，英军在埃塞俄比亚人民的反抗下，被迫撤走了。但绍阿、提格雷、阿姆哈拉的封建主为争夺皇位重新发动内战。经过四年的混战，英国扶植的约翰尼斯四世继位为皇帝。

（二）列强争夺非洲之角

包括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吉布提在内的非洲之角，控制着地中海—红海—印度洋的海上交通要道。在苏伊士运河通航后，战略地位日趋重要，成为列强必争之地。

早在 1859 年，法国就获得了奥博克港的租借权，三年后买下该港，升起了法国国旗，但直到苏伊士运河开航十年以后（即 1881 年），法国才设立一个贸易公司，真正使用该港。1884 年，法军进驻奥博克，并以此为据点，向外扩张势力，兼并了阿利角、塔朱腊、古贝特哈拉巴和其他地区。1888 年侵占吉布提港，1896 年把所有侵占的地区合并成一个殖民地，称“法属索马里”，行政中心设在吉布提港。

英国同法国在非洲之角进行了激烈的争夺。起初，英国假埃及统治者之手控制“非洲之角”。1869 年，一艘埃及船开往柏培拉，次年埃及赫迪夫派穆罕默德·贾马尔到索马里沿海活动，在布勒哈尔和柏培拉升起了埃及国旗。1873 年埃及占领了厄立特里亚的恩涅斯莱湾，1874 年占领了克伦。在英国挑唆之下，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发生了大战。1875 年埃及主力由马萨瓦和克伦南下，在贡德特一战中被埃塞俄比亚军队击溃。1876 年，埃及军队得到增援以后，双方在古拉进行决战，埃及再度败北。1877 年英国同埃及签订协定，承认埃及的管辖范围从马萨瓦向南达到哈丰角，埃及保证“索马里海岸……的任何部分，都不得以任何借口，割让给任何一个外国”。英国统治阶级对此极为满意，认为“这是防御其他欧洲强国在亚丁对岸获得立足点的唯一保证”。

1884 年，英国人由间接控制向直接侵占过渡。由于苏丹的马赫迪屡次挫败英埃军队，英国乃将埃及军队撤出了哈拉尔、泽拉和柏培拉。年底，英国直接向柏培拉、泽拉和布勒哈尔派驻“副领事”，并与当地五个酋长签订了条约，确立了事实上的保护权。次年，由于法国宣布把它在“非洲之角”的统治区域扩展到吉布提港，英国则发布一个针锋相对的公告，声称英属索马里保护地从柏培拉一直延伸到法国所要求的地区之内。双方的争执几乎诉诸武力，到 1888 年才签订协定，把英法两国的保护地的分界线划在泽拉和吉布提之间。

在瓜分非洲之角的斗争中，以确立“俄国的世界霸权”为目标的沙俄政府，也野心勃勃。“非洲之角”是它向非洲扩张的重点地区。1871 年，沙俄成为苏伊士运河第八个最大的通航国。它企图在“非洲之角”沿岸建立一个“新莫斯科港”，以便在印度洋上“支持一支沙俄舰队的出现”。1884 年，一个哥萨克冒险家阿西诺夫以“旅行”为名，从沿海窜到埃塞俄比亚，到处收集情报，为建立一个“哥萨克殖民地”作准备。1889 年 1 月，阿西诺夫远征队在塔朱腊湾的萨迦诺港登陆，升起俄国人的旗帜，抢劫当地居民的财物和粮食。阿西诺夫的侵略引起了吉布提人民的反抗，也引起了与法国殖民者的冲突。2 月 17 日，法国驻奥博克总督断然要求阿西诺夫离开。阿西诺夫拒绝后，俄法冲突爆发了。在这场争夺吉布提的战争中，俄国人七人死亡，六人受伤，其余全部被生俘。俄国在非洲之角的第一次殖民冒险以失败而告终。

此后沙俄改变手法，对“非洲之角”进行和平渗透。一是派遣各种代表团，打着“友好”的旗帜，进行政治上的拉拢。例如，从 1889 年以后，它派往埃塞俄比亚的使团就有所谓“宗教使团”、“地理考察团”等上百个之多。但使团的人员大多是现役军官、外交官员。二是打着“援助的招牌”，进行

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渗透。1892年马希科夫曾同埃塞俄比亚签订一项贸易协定，推销俄国的军火，并使日后俄国军官以“顾问”为名，打进了埃塞俄比亚的军事要害部门。在80年代，争夺“非洲之角”的帝国主义格局中，俄国站在法国一边，同英意对峙。1882年，意大利政府接管了意大利轮船公司在1869年获得的阿萨布港。1885年，英国希望获得一个同盟者，用以对抗法国，乃同意意大利占领马萨瓦和贝卢尔之间的沿海地区，意大利逐步夺取了厄立特里亚。意大利在马萨瓦站住脚跟以后，便开始向埃塞俄比亚内地推进。1885年6月占领萨蒂，1886年11月占领瓦阿。1887年1月意埃两军在多加利交战，意军败北，退回马萨瓦。1888年意军重占萨蒂，意埃之间的战火有即将重起之势，只是由于埃塞俄比亚同苏丹发生战事，埃塞俄比亚人民的抗意卫国战争才推迟了几年。

（三）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的胜利

19世纪80年代，埃塞俄比亚和苏丹都面临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本应相互支援，共同抗敌。但是，英国从中煽动仇隙，唆使埃塞俄比亚皇帝约翰尼斯四世出兵反对马赫迪国家，于1886年对马赫迪宣战。1887年马赫迪进占和烧毁了冈达尔城。1889年2月，约翰尼斯四世亲自率领15万大军从冈达尔出发，猛攻拉加巴特。3月，在梅特马战役中，约翰尼斯四世本人中弹阵亡，埃塞俄比亚战败。

约翰尼斯四世死后，麦纳里克继任为全埃塞俄比亚皇帝。意大利转而支持新皇帝，企图利用他作傀儡，把埃塞俄比亚变成自己的保护国。麦纳里克的意图是利用意大利的支持来消灭封建分裂势力，巩固自己的统治。麦纳里克很快就成功地制止了戈贾姆和阿姆哈拉的分裂势力，重建了统一的国家。

1889年，当麦纳里克继任40天时，意埃签订了“永久友好条约”，即《乌西利阿》条约。根据这个条约，麦纳里克割让若干地区给意大利，意大利则以3万枝枪、28门大炮和200万里拉作为补偿；第十七条还规定，埃塞俄比亚皇帝与其他列强交涉时，“可以”请求意大利协助。阿姆哈拉文本上的“可以”一词，在意大利文本上被故意改为“必须”。意大利根据本条的单方面解释，宣布埃塞俄比亚为意大利的保护国，并占领条约规定以外的埃塞俄比亚领土。

麦纳里克再也容忍不下去了。1891年4月他写信给欧洲列强，抗议意大利的无耻行为，声明：“我无意袖手等待海外列强来瓜分非洲。”1893年2月他又宣布，从1894年5月2日起，废除《乌西利阿》条约。

1894年意大利出兵首先占领了北部的提格雷。1895年3月，意大利向埃塞俄比亚大举进犯，侵占了阿提乌格里、阿提格腊特、阿杜瓦。9月，麦纳里克发表告全国人民书：“敌人已从海外来了。他侵略了我们的边境，妄图动摇我们的信仰，破坏我们的祖国。我们准备采取行动保卫国家和抗击敌人。凡是有力气走路的都跟我来。”这个告人民书唤起了各族人民的爱国精神，掀起了保卫祖国的热潮。人民群众自愿捐赠粮食、衣物和金钱。为购买武器而征收的特别税不到几天就收齐了，共计200万银元。自愿参军的战士从各地涌向首都，组建了一支11.2万人的军队。

在战略方面，麦纳里克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让意大利军队“长驱直入”，然后加以歼灭。意大利侵略军首领得意忘形，自我吹嘘说：如再给我两营兵

和几门炮，不用多久就能把麦纳里克装在笼子里带到罗马。可是 1895 年 12 月初，埃塞俄比亚军队猛烈袭击意大利侵略军，把它的一支 2 万人的部队打掉了十分之一，还打跑了另一支侵略军，收复了马卡累。

1896 年 2 月 29 日，意大利侵略军 15,000 人分为三个纵队向阿杜瓦进犯。埃军依靠优势兵力和有利地形，在 3 月 1 日和 2 日决战中，全部歼灭了意大利侵略军。共计打死打伤 11,000 人，俘获 4000 人，缴获了大量步枪、大炮和意军的全部装备。意大利侵略军遭到决定性的失败。10 月双方缔结了《亚的斯亚贝巴条约》，意大利承认“埃塞俄比亚帝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绝对独立”，并保证给予战争赔款 1000 万里拉。

抗意卫国战争的胜利是埃塞俄比亚人民英勇战斗的结果。在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狂潮中，埃塞俄比亚人民粉碎了意大利侵略，捍卫了自己的民族独立，给非洲人民反侵略斗争树立了一个光辉榜样。

在这次战争以后，英、法、俄等国改变侵略手法，不断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手段渗入埃塞俄比亚。一个俄国使团在亚的斯亚贝巴建馆，一批俄国军官打入埃塞俄比亚军事参谋部，指手划脚。沙俄的一个侵略头目供认，他们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意图是要在“靠近印度洋的红海海岸一个地点取得稳固的地位”，“保证我们舰队自由通到远东一带的海洋”。尽管这个阴谋当时未能得逞，但俄国企图把侵略势力侵入埃塞俄比亚，争霸印度洋的目的一直未变。

第五节 西非

(一) 阿散蒂战争

19世纪以前，西非一直是贩卖黑人的主要场所。1807年英国废止“奴隶贸易”，改变其在西非的殖民政策。它在禁止“奴隶贸易”的旗号下，开始侵占西非各国的领土，建立殖民地。除1808年建立塞拉利昂殖民地外，它的主要侵略扩张地点是黄金海岸（今加纳）和尼日尔河下游。沃尔特河和尼日尔河下游盛产珍贵的木材、棉花和棕榈油，是日益发展中的英国工业所必需的原料。

英国在贩卖黑人的过程中，曾在黄金海岸建立了海岸角等殖民据点，这些据点成了它向内地扩张的基地。但英国的扩张，长期来进展甚缓，因为它遭到阿散蒂联邦近一个世纪的顽强抵抗。

阿散蒂是加纳阿坎族的一支。直到17世纪末，它仍是一个小土邦，邓克拉邦的藩属。1697年，奥赛·屠土继位为阿散蒂王。他在祭司安诺基的辅佐下，打败了多马，征服了塔弗，组成了以库马西为首都的阿散蒂联邦。为了巩固联合，安诺基用魔法的形式设置了著名的“金凳子”，用以象征国王的权威和民族团结精神。奥赛·屠土顺应阿坎族内部经济发展和欧洲人入侵条件下要求民族统一的趋势，开始进行统一战争。他和他的继承者先后打败了邓克拉、阿基姆、阿辛等土邦，奠定了阿坎族统一的基础。

英国眼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阿散蒂联邦已经成为自己向非洲内陆扩张的障碍，乃千方百计阻挠阿坎族的统一，挑拨沿海各邦，特别是芳蒂族与阿散蒂的关系。1805年阿辛土邦的两名酋长，不服从阿散蒂王的命令，逃到芳蒂土邦避难。阿散蒂王要求交出逃犯，芳蒂断然拒绝。1806年阿散蒂与芳蒂之间爆发战争。5月在距海岸角4英里的阿波拉镇，芳蒂军的主力被彻底击败。两名阿辛酋长逃进英国据点海岸角，英国殖民者立即插手阿坎族的内部事务，承担“用调解或武力方式”援助阿辛酋长和芳蒂人。6月15~16日，英军与阿散蒂军战于安诺马布镇的威廉堡。英军伤亡严重，被迫悬旗求和，英军交出了一名阿辛酋长（另一名逃亡），双方签订了临时协定，英国承认芳蒂属于阿散蒂联邦。

阿散蒂军刚刚班师回朝，芳蒂就掀起叛乱。1809年派兵攻打阿散蒂联邦的两个重要出海口埃尔米纳镇和阿克拉镇。1811年，阿散蒂派兵镇压芳蒂的叛变，没有成功。1814~1816年再次出兵攻打，芳蒂正式并入阿散蒂联邦，由阿散蒂派总督治理。

1821年英国宣布撤销“非洲公司”，黄金海岸各租借地由英国政府接管，并入塞拉利昂殖民地。1822年查理·麦卡锡就任总督后，立即准备侵略阿散蒂的战争。5月，一名阿散蒂商贩与英国警察发生口角和冲撞，英国警察被打死。麦卡锡以此为借口，发动战争。1824年1月，两军在邦沙索村激战，英军大败，伤亡二百六十余人，麦卡锡受伤自杀。1826年英国编成一支特种“突击兵团”，裹胁大批芳蒂人，与阿散蒂军在卡塔曼索村决战，阿散蒂军首次战败。1831年英国与阿散蒂签订协定，规定邓克拉、阿辛等邦解除对阿散蒂王的臣属义务；阿散蒂不得对贸易加以任何限制；英国确认阿散蒂国家的独立。由于英国的侵略和干涉，阿散蒂的统一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英国利用这次胜利，扩大和加强在沿海地区的殖民统治。它同芳蒂等土

邦酋长缔结《1844年约章》，把“保护制”强加于沿海各邦。1850年黄金海岸殖民地脱离塞拉利昂，设置单独的行政委员会和立法委员会。同年英国人又以1万英镑的代价，“购买”了丹麦人在黄金海岸的殖民据点。1863年英国从西印度群岛调来850人的增援部队，攻打阿散蒂，但因士兵水土不服，患病伤亡甚多，以失败而告终。

1871~1872年，英国与荷兰达成协议，取得了荷兰在黄金海岸的所有殖民据点。1873年，英国拼凑了一支2000人的侵略军和一支1万人的芳蒂雇佣军，又一次发动侵阿战争。英军猛攻埃尔米纳镇，但在该镇近郊和海岸角城下，芳蒂军被击溃。阿散蒂军因感痢疾和天花，主动放弃埃尔米纳，向内地撤退。英军跟踪而进，强渡普腊河，进逼阿散蒂首都库马西。在阿摩阿弗村和奥达苏村战斗中，阿散蒂军战败。1874年2月5日阿散蒂人主动撤离首都，并带走了全部粮食和财物，英国人获得的只是一座空城。英军由于孤军深入，加之伤员众多，害怕被围歼，也退出了库马西。撤退时，英军炸毁了皇宫，焚毁了全城。

英国利用阿散蒂的困难处境，强迫阿散蒂国王缔结《福门纳条约》，规定阿散蒂放弃对沿海地区几个土邦的主权，赔款5万盎斯黄金，允许英国人在全境自由贸易。英国人战胜阿散蒂后，对芳蒂的态度剧变，逮捕了三名著名的芳蒂酋长，1874年宣布从塔诺河口至沃尔特河口的所有芳蒂人居住区为英国殖民地。

1890年12月，英国向阿散蒂国王提出接受英国保护的无理要求，遭到阿散蒂的坚决拒绝。于是英国于1891年1月挑起了新的战争。英国使用强大的兵力，猝不及防地攻占了库马西，俘虏了阿散蒂国王。8月，宣布阿散蒂为英国的保护国。但是，阿散蒂人民并没有屈服。当英国总督要阿散蒂酋长们交出金凳子后的第三天，即1900年3月30日，爆发了以埃吉苏土邦王后雅·阿散蒂娃为领袖的反英大起义。起义队伍达8000人，包围库马西英军要塞达三个月之久。英国总督及部分英军于6月23日突围，狼狈逃回海岸角。由于英军不断增援，起义才被镇压下去。1902年，阿散蒂被英国殖民者正式并入黄金海岸殖民地。

（二）英国侵占尼日利亚

英国在西非扩张的另一个重点地区是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位于尼日尔河中下游，居民主要有约鲁巴族、富拉尼族、豪萨族、卡努里族和阿拉伯人。约鲁巴人居住在南至拉各斯浅水泻湖，北至尼日尔河的广大地区。到19世纪，奥约王国已经衰落，约鲁巴各城邦处于群雄割据、内乱迭起的年代。英国殖民者利用约鲁巴各邦的矛盾，把它们一一征服了。

1851年12月，英国乘拉各斯统治者争夺继承权之机，派出四艘军舰进攻约鲁巴人的这个商业中心。拉各斯岛人民奋起自卫，组成了一支5000人的队伍，筑起防御阵地，配备50门大炮，多次打退了英军的进攻。英军炮轰岛上所有居民点，大半个拉各斯化为灰烬。12月28日英军登陆，扶植阿基托耶为拉各斯王。1852年1月1日，与他签订条约，拉各斯变成了英国的保护地。拉各斯人民并未屈服，他们曾于1853年、1856年和1861年举行起义，但都被英国殖民者残酷镇压下去了。1861年英国强迫拉各斯王多苏木在“割

让”条约上签字，拉各斯由保护国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吞并拉各斯是向尼日利亚大举扩张的开始。

19世纪70年代，以伊巴丹为核心的约鲁巴城邦联盟，阻挡着英国向尼日利亚内地的扩张。1877年，英国殖民军裹胁埃格巴人和伊杰布人，向伊巴丹发动袭击，但一直到1886年英军才占领伊巴丹。1888年，英国强迫奥约国王接受了保护条约。五年以后，英国答应恢复奥约国王对约鲁巴各地的统治权，但奥约国王必须承认英国对全境的“保护权”。随后，英国用武力镇压了拒不承认英国保护权的伊杰布奥德、阿贝奥库塔等城邦，完成了对这个地区的占领。

油河地区的伊卓人和贝宁，也对英国的侵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伊卓族的奥波博王国是尼日尔河三角洲棕榈油的最大贸易中心。国王贾贾对英国殖民者的“保护”公开表示蔑视。他封锁商路，关闭商站，不准英国人入境贸易。1887年英军兴师问罪，派军舰溯奥波博河而上，沿途轰击两岸村落。贾贾以30艘独木战舰、数十门大炮，抵抗英舰进攻达三个月之久。武力征服未能奏效，英国便玩弄和谈阴谋，提议同贾贾进行和谈。当贾贾到达和谈地点时，英国殖民者马上将他逮捕并流放到黄金海岸。英国占领奥波博后，于1885年宣布成立油河保护国。1893年改名为尼日尔河岸保护国。1894年英国侵占布罗赫米埃，将其并入尼日尔河岸保护国。

1897年1月，英军1500人和一支海军分遣队，进攻油河地区的最后一个堡垒——贝宁。在格瓦托附近的两场激战中，英军遭到重创。2月，英军在获得增援后，分三路进攻贝宁。他们夷平村庄，毁坏庄稼，砍倒香蕉树，用大炮轰击城市，贝宁一片火海。2月18日英军占领了贝宁城。不久，贝宁国王投降，被放逐到卡拉巴尔。

英国在侵占尼日尔河三角洲以后，便把扩张的矛头指向豪萨地区。英国在征服这一地区的过程中，利用豪萨人与富尔贝族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1897年征服了努佩和伊洛林埃米尔国。1900年宣布成立北尼日利亚保护国，任命弗烈德里克·卢加德为高级专员。卢加德深知，索科多王国虽已衰落，但豪萨地区各埃米尔国却还名义上承认其最高权力，并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实力，所以它决定先剪除索科多王国属下的一些埃米尔国，先后占领了约拉埃米尔国，确立了对扎里亚的“保护”地位，攻占了卡诺。1902年3月英国对索科多城发起攻击。索科多素丹在重创英军后，撤到东部地区，号召所有埃米尔国联合起来抗击侵略者。布尔米一役，索科多军大败英军。7月，英军得到增援，再度发动进攻，占领布尔米。索科多素丹逃亡国外，但豪萨人民的抗战仍然持续了好几年。

（三）西非人民的抗法斗争

在“奴隶贸易”兴盛时期，法国在塞内加尔河口两岸建立了一批殖民据点。到19世纪中叶以圣多美为首府的塞内加尔殖民地约有五万居民。50年代后，法国为了控制树胶贸易，曾不断派远征队进攻阿拉伯人部落，夺占了塞内加尔河以南的牧场。同时，法军向塞内加尔河上游推进，遭到了哈吉·奥马尔领导的图库列尔国的有力抵抗。1857年，奥马尔率军围攻法军据点两个月，后因法军增援，他才主动撤退。70年代后，法国向西非全面扩张时，西非各国人民进行了更猛烈的抵抗，其中以萨莫里·杜尔、格比达西和腊巴赫

领导的三次抗法战争影响最大。

19世纪70年代，在西非的几内亚中部，以比桑杜古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以曼丁哥人和班巴拉人为主的乌阿苏鲁军事封建国家。国王萨莫里·杜尔（约1840~1900年），出身于曼丁哥部落的一个小商贩家庭，当过许多年兵，成为一个很有才能的指挥员。1870年到1875年间，他征服许多小公国，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个国家的国王是全国土地的所有者，除国王自己占有部分土地外，大部分分给封建贵族。萨莫里把全国分为162个乡，组成10个区，委派他的部下管理各区的军事和行政。

80年代，法国沿塞内加尔河上游扩张，不断侵犯乌阿苏鲁国的领土。1882年法军袭击尼日尔河右岸，同萨莫里军交战，战败后退回塞内加尔河上游。1883年和1885年，法军又不断入侵，双方互有胜负。1886年1月，法军第一次打败萨莫里的军队，迫使他同法国缔约，规定以尼日尔河为法属领地和乌阿苏鲁国的分界线。

萨莫里为了抵御外国侵略，利用停战的时机，加强军事力量。他把军队分成三个军团：一个军团的任务是同法国侵略者作战；第二个军团作为后备力量；第三个军团的任务是在紧急时刻把全国居民及其财产撤到安全的地方。萨莫里还非常重视农业生产，规定所有的部落都有为国家耕种的义务，责成每个村庄必须集体播种一块指定的土地，并以这种方式提供军需。他设立修理武器的工场，仿造欧式枪枝。萨莫里在全国实行义务教育，通过学校对人民进行伊斯兰教教义的教育，增强保卫民族独立反对侵略的意识。

90年代，法国撕毁和约，再次挑起战争。1891年，法国集中强大的兵力进犯康康，直逼比桑杜古。萨莫里采取坚壁清野政策，主动撤退，不给敌人留下一人一物。同时不断用游击战困扰和袭击侵略军，使法国侵略军到处挨打，陷于寸步难行的境地，法军被迫停止向内地进犯。1892年初，法军再次发动进攻，于1月11日在比桑杜古附近与萨莫里军队展开激战，法军遭到严重损失，萨莫里则主动放弃首都和西部地区，转移到东部，坚持抗战。

1894年，法国侵略军又从象牙海岸出发向转移到象牙海岸北面的萨莫里军队进攻。1895年，萨莫里在人民的支持下包围了法军，给予歼灭性的打击，法国只有少数残兵逃回象牙海岸。1898年，法军偷袭萨莫里的营地，9月底萨莫里在奋战中被俘，后被放逐到法属加蓬的一个岛上，1900年死于该地。

萨莫里领导的抗法战争，坚持达16年之久，驰骋在辽阔的土地上，打击并牵制了法国在西非的力量。

差不多与此同时，达荷美人民在格比达西领导下，也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抗法战争。

达荷美位于多哥与尼日利亚之间。17世纪初，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在达古国王领导下开始统一。达荷美的统一事业是在同欧洲侵略者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当时，欧洲许多国家侵入达荷美沿海一带，设立商站，破坏达荷美的统一。到18世纪初阿加扎王在位时，国土已扩展到几内亚湾沿岸，盖佐王在位（1818~1858年）时，达荷美已处于极盛时期，其疆域西达阿达克巴梅，与阿散蒂王国为邻。

1851年法国人同盖佐订立了一个所谓友好通商条约，法国同意给他一笔款项，盖佐则给在达荷美沿海定居的法国人以保护和自由。从此，法国殖民

法国人叫贝汉津。

者开始积极渗透。1868年，法国诱骗格累格累国王签订新约，法国殖民者侵占了科托努。当格累格累意识到法国的行动是要灭亡达荷美时，他于1888年宣布废止条约。法国殖民者竟以此为借口，派远征军攻打达荷美，抗法战争遂起。

1889年，格累格累去世，其子格比达西继位。格比达西反侵略的意志更为坚决。1890年2月21日，他决定用武力收复沿海的科托努，2月23日，5000名达荷美战士在格比达西率领下进攻科托努城堡，虽然没有攻下，却成功地阻击了由塞内加尔开来的敌人援军，并且打了一个胜仗。4月20日，在阿加拉河附近进行了一次更大的战役，法国侵略军虽然有军舰参与作战，但是没有取得任何战果。法军被迫于1890年8月23日派多热尔神父与达荷美进行谈判。格比达西也感到达荷美的军队在战斗中受到很大损失，需要休整，乃于10月9日同法国签约。法国承认达荷美对整个沿海地区拥有主权，格比达西承认法国对波多诺伏的保护权并割让科托努。

事实上，这次谈判只是暂时的休战。1892年6月，法国政府破坏协定，背信弃义地发动了新的战争，法国舰队封锁达荷美海岸，炮轰沿海阵地维达和诺库埃湖许多村镇，从水陆两路向内地进犯。9月18日，在多格巴战役中格比达西组织敢死队向敌人连续猛攻，130名战士英勇牺牲。法国侵略者损失惨重，福拉克司令官被击毙。战争向北部发展，在科托努和乌阿孔一带又进行了激烈的白刃战。法国侵略军不仅野蛮屠杀达荷美居民，而且烧毁了古老的阿波美“西姆包儿”皇宫。

1893年法军深入内地，达荷美不仅在军事上失利，而且又遇上天花流行，军队不断减员。1894年，史诗般的达荷美抗战暂时终止，格比达西失败被俘，他被囚禁在马提尼克岛，以后又送至阿尔及尔，他的部下都被流放到加蓬，达荷美一部分土地被法国吞并，其余的宣布为法国的保护地。

在西非，最后一次较大的抗法斗争发生在乍得湖区域，这次抗法斗争的领袖是腊巴赫。

腊巴赫是一个阿拉伯女奴隶的儿子，生于东苏丹。70年代，他参加东苏丹苏里曼·齐贝尔反对英埃统治的起义。起义失败后，腊巴赫率领600名士兵转移至中苏丹，在乍得湖周围建立一个独立国家，在外国侵略军的威胁下，他团结了许多部落，组成了一支拥有几千人的军队，同法国侵略者进行多次血战。在反侵略斗争中他愈战愈强，并且把整个博尔努、巴吉尔米以及瓦达伊的一部分地区合并起来。法国侵略者屡犯屡败，于是变换手法，与被腊巴赫废黜的巴吉尔米和瓦达伊的前苏丹建立同盟，进攻腊巴赫国家。

法国侵略者鉴于中苏丹地处要冲，又恐腊巴赫力量再扩大，不惜投入庞大的军队，分三路攻打腊巴赫，一支从南面的法属刚果进军，一支从塞内加尔出发，第三支从北面越过撒哈拉沙漠扑来。1899年在库诺附近的一次战斗中，两连法军伤亡170余人，被迫退却。1900年4月，在库塞里战役中，腊巴赫军3000名战士，以尖柱防御工事为屏障，浴血奋战，死守阵地。当法军大炮轰开防御工事时，双方激烈搏战，腊巴赫壮烈牺牲。其子法德尔—阿拉继续领导人民抗法，1902年也在一次战斗中牺牲。

第六节 南部非洲和马达加斯加

（一）钻石和黄金的开采及其后果

1867年在瓦尔河发现了第一块钻石。1869年发现了一块大钻石，价值高达25,000英镑。1871年在瓦尔河南岸发现了一个原生钻石矿床。这一连串的发现震动了世界。一批批冒险家和财迷潮水般地涌到瓦尔河和哈尔茨河交界处。在“大洞”附近，一个新的城市——金伯利拔地而起，到1872年该城已有5万居民了。

钻石的发现引起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奥兰治自由邦、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受英国保护的西格里夸兰都声称这块宝地是属于自己的。英国驻开普殖民地总督巴克利一面建议把领土争端提交“仲裁”，一面派兵进占金伯利。“仲裁”的结果，宣布所有的钻石产地并入开普殖民地，认为它是“该地区的合法所有者”，同时给奥兰治自由邦以9万英镑的补偿金。

英国强占钻石产地，为以罗得斯为代表的英国资本家垄断钻石开采打开了道路。罗得斯于1853年生于英国的一个牧师家庭，因患肺病，1871年到纳塔尔他哥哥的农场里养病。当听到原生钻石矿床发现的消息后，他们兄弟俩急忙赶到金伯利，开始从事投机买卖。从1873年起，他开始收买破产的小企业，招收小矿主入股。1880年开办“德比尔斯矿业公司”，资本为25万英镑。80年代，他依靠英国最大的银行家路特希尔德的支持，收买“金伯利中央矿业公司”的股票，迫使后者与之联合。1888年成立了“德比尔斯统一矿业公司”。在短短的20年内，南非钻石的开采就由无数小业主发展成一个以罗得斯为首的巨大垄断组织。

继“钻石热”之后，在南非又出现了“淘金热”。1872年在莱登堡，1875年在巴伯顿先后发现了可供开采的金矿矿脉。1886年在沃特瓦特斯兰德（简称兰德），发现了一个黄金富矿。兰德的淘金热远远超过了钻石热。黄金城约翰内斯堡到1890年已达10万人。黄金开采技术复杂，提炼困难，需要更大的设备，更多的资金。小业主因资金短缺，很快破产。几年功夫，南非金矿的开采就集中到了少数几个垄断资本家手中。

南非钻石和黄金的开采，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后果。

第一，南非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在70年代以前，南非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畜牧业是经济的主要部门，近代工业寥寥无几。除了63公里铁路以外，牛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一旦下雨，牛车道泥泞不堪，难以通行。

钻石和黄金的发现，吸引大量外国资本流入南非。到1880年在南非各个经济部门共有369家公司，1889年增至642家。1890年仅在兰德各矿场的投资总额就达2200万英镑。在国际金融资本的掠夺下，南非采矿业迅速发展。1882年南非钻石生产达到2600万英镑，输出额达400万英镑，超过了当年撒哈拉以南其他非洲国家全部输出额的总和。1887年在德兰士瓦采金1200公斤，1895年采金62,700公斤，占全世界产金量的21%左右。

在采矿业的带动下，机械修造业、铁路、农业和对外贸易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1885年火车从开普敦通到了金伯利，1892年延伸到了约翰内斯堡。

沃特瓦特斯兰德（Witwatersrand），意即白水山（WhiteWaterHills）。

接着从伊丽莎白港、东伦敦港、德班港和洛伦索—马贵斯到约翰内斯堡的铁路线相继建成。1870年至1880年间，对外贸易总额增长300%。随着工矿业的发展，近代化的城市一个接一个出现。这为农产品创造了广阔的市场。农业资本家为了增加产量，开始实行农业机械化。1890年开普敦政府拨款69,400英镑购买农业机器，其中从美国进口了3万多英镑。

第二，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

工矿业的发展，使南非的社会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70年代以前，白种人的中心在沿海港口城市。黄金、钻石的发现促使他们涌向南非内地。从沿海和欧美来的白种人，统统被称为“外来人”，其中以英国人居多。他们本想发一笔横财就离开。但能侥幸致富者毕竟是少数，多数人在激烈的竞争中变得一无所有，只好滞留下来，成为矿山和工厂的技术工人。

采矿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大量的。布尔人在大迁徙中侵占班图人的土地，使他们丧失了谋生的手段，创造了一大批廉价的产业后备军。矿业的发展不仅吸收了大批南非的班图人，而且还从赞比亚、莫桑比克招工。到90年代，仅在金矿就有10万名非洲工人。他们从事粉碎矿石、运输和粗加工等笨重劳动，仅得白种工人工资的四五分之一。他们住在围场内，不准随意外出。《新民丛报》写道：“非洲之急鬼，历来充当金矿爆石开山之贱役。每月工银三镑半至四镑半不等……以金山各物之类，尚不能支持衣食，甘与西人作牛马一般。”他们不仅受到资本家的剥削，而且受到殖民压迫和种族歧视。

资本主义工矿业的发展，给以畜牧业为基础的布尔人农场制度以巨大冲击。布尔农场主过去依靠的廉价土著劳动力不再是无限的了，因为他们已被矿山工厂所雇用；他们赖以迁徙的土地也不再是无限的了，因为两个布尔共和国的领地已被限定。因天灾和竞争而破产的布尔农场主被迫流入城市，成为没有技术的“贫穷白人”阶层。

第三，黄金和钻石矿的发现，促使布尔人与英国人、英德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激化，他们为争夺南非这块宝地而拼死拼活地斗争着。

（二）英布战争

钻石和金矿的开发，几乎是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同步的。在这个时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连不毛之地都要争夺，更何况已发现大量矿藏的南非。公开鼓吹帝国主义，最无耻地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的谢西尔·罗得斯成了英国的风云人物。他的口号是：“扩张就是一切”。他说：“我们应当永远记住，南非问题的实质在于把开普殖民地扩大到赞比西河。”而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必须吞并奥兰治和德兰士瓦共和国。

尽管英国资本家在德兰士瓦采金业中占着优势，但他们受到德国资本的竞争和布尔人统治阶级的拮据。德国除投资金矿外，还渗入了南非共和国的各个经济部门。1886~1896年间，德国对德兰士瓦的输出从每年30万英镑增加到1200万英镑。为了保护布尔资产阶级的利益，德兰士瓦共和国政府实行垄断炸药价格政策，征收高额采矿税，从铁路建筑和运输业中排挤英国资

本。

为了独占南非，在钻石矿发现后，英国便提出了建立“白人”南非联邦的方案，企图通过建立联邦，达到兼并布尔人共和国的目的。由于奥兰治共和国的抵制，1876年的伦敦谈判以失败而告终。1877年4月12日，英军利用南非共和国镇压巴佩第人失败所造成的惊恐情绪，突然占领比勒陀利亚，宣布兼并南非共和国。但英国的兼并为时不长。1880年12月8日，布尔人举行“人民会议”，决定武装反抗英国统治，重建南非共和国。14日，布尔民团出其不意地袭击两连英军，将其全歼。1881年2月马尤巴战役中，英军战败。8月9日南非共和国恢复独立，克鲁格任总统。

金矿发现以后，兼并南非共和国这个老问题有了新内容。1895年英国采金业资本家在约翰内斯堡成立了一个秘密委员会，准备推翻南非共和国。行动的信号是罗得斯的军队侵入德兰士瓦。1895年12月，罗得斯派詹姆森率领一支800人的军队越过国界，但被布尔人解除了武装。德皇威廉二世借机插手，向克鲁格发电致贺，祝他“用自己的力量……在反对外来侵略中保卫了国家独立”。

“詹姆森袭击”事件是1899~1902年英布战争的前奏，双方开始紧张备战。南非共和国拨出大笔资金，从欧洲购买武器弹药，其中包括几万枝毛瑟枪，聘请欧洲教官训练16岁至60岁的布尔男子。1898年成立南非共和国与奥兰治自由邦“联邦会议”，以便联合起来，共同抗击英国的侵略。英国除向南非调遣大量军队以外，还由罗得斯亲赴柏林，会晤德皇威廉二世，缓和英德在南非的矛盾，为兼并布尔共和国办好外交手续。

1899年10月11日，英国拒绝了南非共和国提出的和平建议。当天下午，布尔民团截击英国火车，一路向开普殖民地进军，包围了马弗京和金伯利，一路向纳塔尔进攻，包围了莱迪史密斯城。12月9日至15日，被称为英国人“不祥的一周”。布尔民团歼灭英军2500名，缴获大炮12门。

战斗初期，布尔人之所以获胜是由于他们拥有相对的优势，依靠“熟悉险阻之兵丁”，机动灵活，运动神速，给英军以突如其来的袭击。相反，英军劳师远征，不服水土，英国军官目空一切，看不起“乡下佬”，照着欧洲军事操典指挥战争，不适应南非的实际情况。

“不祥的一周”，震动了英国朝野。英国政府撤掉英军司令布勒的职务，任命罗伯茨为司令，任命以镇压马赫迪运动闻名的基钦纳为参谋长，增兵4万余人。1900年2月15日一支英军突进金伯利，17日克隆日率领的4000布尔民团被围投降。战争向有利于英军转化。2月28日莱迪史密斯城解围。3月13日英军占领奥兰治自由邦首府布隆方丹。5月17日马弗京解围。24日英国宣布兼并奥兰治。6月1日，英军攻占约翰内斯堡，5日进入德兰士瓦首都比勒陀利亚。9月1日英国宣布兼并德兰士瓦。

这时，英国满以为战争已经结束，罗伯茨也奉调回国。其实，布尔人并未战败，布尔民团的建制还完整保存着。布尔人接受以前的教训，避免同英军决战，而采取游击战的方式与英军周旋。史未资等人率领民团，重新进入开普殖民地，神出鬼没地打击英军。博塔则带军攻入纳塔尔，破坏铁路交通，攻打孤立的英军据点。

1902年1月，荷兰政府出面调停。5月英布双方签订和约。布尔人放弃了独立的要求，奥兰治和德兰士瓦被英国兼并。英国答应提供“战争赔偿费”300万英镑，帮助布尔农场主“恢复家园”。和约还规定，“在宪法制定之

前，对土著居民的权利不予考虑。”两个白人种族主义统治集团，在共同压迫黑人的前提下妥协和合流了。

战争结束后，英国着手“重建”南非。为了恢复金矿生产，英国政府与清政府于1904年签订《保工章程》，招募六万多名华工去德兰士瓦。1905年黄金生产超过战前水平，达到11,572万英镑。在政治上，英国重提“联邦”方案。1908年召开了开普、纳塔尔、德兰士瓦和奥兰治四个地区代表的国民会议，就“联邦”问题达成了协议。会议决定，联邦议会设在开普敦，行政首都设在比勒陀利亚，司法首都设在布隆方丹；非欧洲人，除开普地区外都被剥夺了选举权。1909年英国国会公布了南非法案，1910年5月31日南非联邦正式宣告成立。

（三）祖鲁人和马达别列人的抗英斗争

闪闪发光的黄金和钻石，固然吸引了大批冒险家集德兰士瓦，但他们也未放过那些尚未被瓜分的土地。1878年英国驻南非高级专员向祖鲁人领袖克奇瓦约发出通牒，要求解散祖鲁军队，接受英国总督的管辖。当最后通牒遭到拒绝后，英军分兵三路，于1879年1月强渡土格拉河，侵入祖鲁兰。在伊散德尔瓦纳山下，祖鲁战士英勇反击，击毙英军千余人，大获全胜。后来祖鲁人经过七个月的血战，才被打败，克奇瓦约被俘，祖鲁兰被分为相互敌对的13个酋长统治区。这些酋长由英国人指定，受英国驻扎官管辖。1887年，英国将祖鲁兰并入了纳塔尔殖民地。

70年代，德国也开始凯觐南部非洲，提出了建立德意志南非帝国的计划。1883年德商卢德立次以80英镑和200枝旧枪的代价，从当地酋长手中“购买”了安格拉—皮基那湾。1884年德国宣布从奥兰治河口到葡属安哥拉南部边界为德属领地。为了同德国争夺，1885年英国宣布贝专纳为自己的保护地。到这时为止，南非就只有马达别列人和马绍纳人的土地还没有被欧洲殖民者侵占。这块土地成了英国、德国、葡萄牙和布尔人的竞相争夺的地区。

马达别列人是班图人的一支。他们曾经参加过19世纪20年代祖鲁人的部落联盟，在进入德兰士瓦地区后遭到布尔人的侵袭，于30年代末迁到林波波河和赞比西河间地带，与当地的马绍纳人（也属班图族）会合，建立了以布拉瓦约为首府的国家。马达别列人仿效祖鲁人的军事组织，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军队，约有一万五千人到两万人。

1888年，英国人穿过贝专纳窜入河间地带，强迫马达别列首领洛本古拉订立条约，规定洛本古拉未经英国许可，不得同任何人谈判，向任何人出售或割让土地。南非公司的代表还用1000枝旧步枪、一艘破汽艇和每月100英镑津贴的代价，从洛本古拉手中骗取了开采全境矿产的特权。英国政府则授给罗得斯的南非公司以统治德兰士瓦以北、莫桑比克以西广大土地的无限权力，其中包括行政、立法、设置军警以及分配和开发土地的权力。

洛本古拉知道自己上当受骗后，宣布暂停租让权的实施，准备用武力赶走英国殖民者。1890年，罗得斯派武装“拓荒队”侵入马绍纳人居住地区。1893年，南非公司的军队分三路向布拉瓦约进犯。英国殖民者使用新发明的“马克沁”重机枪屠杀只有长矛的马达别列人。11月4日，布拉瓦约沦陷，

又译开芝瓦约，欧洲人著作中也作塞太瓦约（Cetewayo）。

洛本古拉号召马达别列人进行“焦土抗战”，主动撤退到北方。他于 1894 年在尼亚萨湖畔患天花逝世。

英国殖民者占领马达别列人和马绍纳人的土地后，以罗得斯的名字命名为罗得西亚。他们恣意夺占班图人的土地和牲畜，把当地居民赶到贫瘠不毛的“土著特居地”。

1896 年 3 月，马达别列人发动武装起义，迫使英国殖民者龟缩到布拉瓦约和另外两个居民点，等待援军。6 月初，英军增加到 3000 人，兵分几路讨伐起义军。起义军的主力退往马托波山区，依靠崎岖不平的地形，打击英军的进犯。旷日持久的战争，引起了英军士兵的不满，厌战情绪日增。罗得斯及其同伙不得不同起义首领谈判，让一些人担任“土著地区”的首领，并允诺归还部分土地。

在 90 年代，英国终于侵占了南非内陆广大地区，包括今津巴布韦、赞比亚和马拉维，南部非洲被瓜分完了。

（四）马达加斯加的抗法斗争

在拉达马一世和拉纳瓦洛纳改革时期，法国因武力侵略屡遭失败，遂改变策略，力图在宫廷中寻找代理人。王位继承人腊科托成了他们物色的对象。法国人拉博德利用其担任教师的方便，把腊科托变成亲法派的头目，1857 年策划政变未遂。

1861 年，卖国求荣的腊科托继承王位，称腊达马二世。1862 年他同法国签订所谓友好通商条约，批准设立“马达加斯加地产、工业和商业公司”，把自然资源的开发交给了以朗贝尔为首的法国资本家。

腊达马二世的卖国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863 年 5 月 9 日人民发动起义，包围王宫，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5 月 12 日国王被勒死，王后腊佐赫里纳继承王位，宣布废除同法国缔结的条约。1864 年赖尼来亚里沃尼担任马达加斯加首相，成为实际的统治者。他利用英法争夺马达加斯加的矛盾，于 1865 年同英国签订贸易协定，企图以此抵消法国的势力。1868 年又同法国达成了一个新协定，法国声称“永久地”承认马达加斯加的独立。赖尼来亚里沃尼政府利用这一喘息时机，加紧进行内政改革。他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在中央设立外交、国防、财政、内政、教育各部，取缔债务奴隶制，禁止从事“奴隶贸易”。

19 世纪 80 年代，法国殖民者再次准备吞并马达加斯加。法国借口侨民遗产继承问题，要求对该岛西北部萨卡拉瓦人实行保护。这种无理要求被赖尼来亚里沃尼政府坚决拒绝。1883 年法军炮轰马任加港，并在塔马塔夫港登陆。马达加斯加人民奋起抗战，多次打败了侵略者，战争持续了两年多。1885 年法马两国签订和约，法国再一次承认马达加斯加的独立和主权，但外交事务由法国统监领导，法国人有权在马达加斯加长期租借土地。事实上，马达加斯加变成了法国的保护国。

1890 年英法签订协定，法国承认英国对桑给巴尔的保护权，英国则承认马达加斯加为法国保护国。法国在做了这笔肮脏交易之后，于 1894 年向马达加斯加政府提出要求全岛的管辖权。1895 年，15,000 名远征军在马达加斯加登陆，向首都塔那那利佛推进。马达加斯加政府军装备不良，给养又差，且战且退。法军花了七个月时间，经过五次激战，才进抵塔那那利佛。马达

加斯加政府没有组织保卫首都，不战而降。10月1日女王签署了保护条约，允许法国驻军全岛。首相赖尼来亚里沃尼被流放到阿尔及尔，1896年患“无名疾病”死去。同年法国宣布马达加斯加为殖民地。

英雄的马达加斯加人民没有屈服，全国掀起了“红色拉姆巴”运动。奴隶、农民、贵族和官吏都参加了这一运动。1895年10月，在瓦基南卡腊特地区，红色拉姆巴游击队进行了最初几场抗法战斗。年底，游击队转移到伊默里纳南方地区，重创了法军。与此同时，在西北和东北地区，游击队也很活跃。陷于重围的法国殖民者不得不增派15,000名军队，前来镇压红色拉姆巴运动。但是，游击战争仍然一直持续到1904年。

红色拉姆巴运动是一次民族抵抗运动，像其他非洲国家的反侵略运动一样，它加强了民族团结，奠定了民族复兴运动的基础。

第二十二章 19世纪中期和晚期的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只取得了民族独立，而没有铲除封建主义。在经济上保存了封建大地产制，在宗教上保留了天主教，在政治上形成了考迪罗主义，即大地主的专制独裁制度，因而与美国相比，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在列强的经济、军事侵略下，形成了依附性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又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

第一节 拉丁美洲各国的半殖民地化

(一) “考迪罗主义”和大地产制

18世纪末19世纪初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战争获胜之后，考迪罗主义差不多成了一种普遍的政治统治形式，它是一些国家的军人以暴力夺取政权后建立起来的军事独裁制度。在独立初期，有些考迪罗本人就是独立战争中的领袖。后来的考迪罗多半出身于军官或某一地区的地主集团的首领。这些独裁者不同于封建时代的君主，因为他们的权力并非来自世袭，而是通过无数次战争，扩展自己的势力而君临全国的；他们也不同于英、美、法等资产阶级国家的总统或首相，因为他们取得政权不是通过选举，主要是通过武装政变。各个考迪罗统治的时间长短不一，有的只有几小时，有的几天、数月、几年、十几年或几十年，能够维持终身统治而不被推翻者，则是罕见的。

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深受这一制度之害。每个军阀独裁者上台之后，都要大肆搜括，抢劫国库，横征暴敛。他们之间，为争夺政权而互相混战，闹得生灵涂炭，政局动荡。玻利维亚在74年中发生60次“革命”，平均每14个月至15个月发生一次。哥伦比亚在独立后的70年中爆发了27次内战，平均每两年半爆发一次。在考迪罗独裁者的统治下，所谓共和、宪法和议会都徒有其名，形同虚设，选举流于形式，人民的民主权利被剥夺。

考迪罗主义是在拉丁美洲特定历史条件下，大地主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独立以后，拉丁美洲各国的经济特点之一便是大地产制的保存和发展。在独立战争期间大量土地从西班牙、葡萄牙大地主手中转入到土生白人大地主手里。战后他们又通过各种方式，如垄断水源、丈量土地、出售公地、强迫迁移等各种卑劣手段，夺占农民土地，使大地产制更加扩大。在墨西哥占地2.5万英亩以上的庄园有300个，占地6.25万英亩以上的庄园有160个，占地7.5万英亩以上的庄园有21个，占地25万英亩以上的庄园有11个。在智利，626家地主平均每户拥有57,182英亩土地。19世纪一个世纪中拉丁美洲各国大地主兼并的土地等于以前三个世纪的总和。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特别是印第安人），变成债役制农民、佃农或短工。在“劳力债役制”下，债农名义上是自由的，但庄园主使用种种方法，如在地主开的商店购货、使用地主的工具要付高额租金等，使他们永远无法偿清债务，不得不世代以工抵债，依附于庄园主。债农的工资极低。在墨西哥，1804年一般为每日28塞塔弗¹，1891年平均为36塞塔弗，而同一时期货币贬值了50%。在智

西班牙语领袖或首领的意思。

¹ 塞塔弗等于1%比索。

利，佃农每周要在地主的土地上干三天活，其处境与农奴相似。

大地产制严重地破坏和摧残农业生产。约占拉丁美洲总人口 10%的人占有 90%的耕地，而广大农民由于没有土地或缺少土地，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无法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于维持。从 19 世纪初到 20 世纪 20 年代，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至少下降 50%。在大地产制下，森林被滥砍盗伐，水土不断流失，地力严重消耗，大量沃土荒芜。委内瑞拉耕种的土地仅占宜耕地的 1%强，巴西仅占 1.6%。

大地产制阻碍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地主的庄园通常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土地划分成农田、牧场和森林。庄园内有地主府第、农民村落、小型作坊、商店、教堂、邮局、仓库等等。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不能为工业提供广阔的市场。而且，大地主主张自由贸易，要求从国外输入廉价的工业品，反对保护关税，反对改善交通。

大地主与天主教会、军阀结成联盟，操纵政权，成为“考迪罗主义”的社会支柱。在对外关系上，大地主又与外国资本家勾结，成为列强统治和剥削拉丁美洲的代理人。

（二）列强对拉丁美洲的侵略

随着西班牙、葡萄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体系的瓦解，英国利用它的海上霸权和“世界工场”地位，加紧向拉丁美洲扩张。19 世纪以前，英国早就在加勒比海地区占据了牙买加、巴巴多斯、圭亚那等殖民地。1833 年用武力夺占了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1835 年侵占洪都拉斯一部分，称英属洪都拉斯殖民地。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爆发后，英国以“同情”、“支持”殖民地独立运动为幌子，对巴西、阿根廷、乌拉圭、智利、委内瑞拉等国进行经济扩张，通过贸易、贷款和投资，控制了许多国家的财政经济命脉，把它们变成自己的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1870 年英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总额已达 8500 万英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上升到 10 亿英镑，成为拉丁美洲的主要投资国和债权国。英国投资总额的 70%集中于南美。通过资本输出，英国垄断资本家控制了拉丁美洲 118 条铁路，45 家港口服务公司，112 家公用事业服务公司和 23 家石油公司，把南美许多国家变成了自己的经济附庸国。

从 19 世纪 80 年代起，德国的经济势力也渗入了拉丁美洲。1889 年德国在巴西的投资为 4870 万马克，1908 年增至 8450 万马克；同时期对智利的资本输出从 2870 万马克增至 5240 万马克。

1823 年春，法国在神圣同盟的支持下，出兵干涉并镇压了西班牙革命，复辟了波旁王朝在西班牙的反动统治，拟订了干涉拉丁美洲革命的计划。英国害怕神圣同盟干涉拉丁美洲，会把神圣同盟“干涉欧洲各国内政所依据的原则应用于美洲国家”，损害自己的利益，因而向美国政府提出了英美联合反对神圣同盟干涉拉丁美洲的建议。美国新兴资产阶级不愿受英国的约束。1823 年 12 月，美国总统门罗在致国会的咨文中声称，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和任何欧洲国家在美洲已有的殖民地，但也反对任何欧洲国家干涉美洲事务和在美洲进行新的殖民扩张。这就是著名的“门罗主义”。在当时历史条件

下，美国反对欧洲国家干涉美洲，在客观上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美国统治集团却通过门罗主义将自己凌驾于拉丁美洲各国之上，而后美国对门罗主义的解释，一直是按照自己的殖民利益来决定的。

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美国种植园奴隶主先后策动得克萨斯叛乱，发动侵略墨西哥的战争，侵占了墨西哥近一半的国土。

到了80年代，垄断资本家的利益把美国独霸拉丁美洲的计划提上了日程。1889年由美国发起在华盛顿召开了有18个国家出席的美洲国家会议。美国在会上提出了“美洲人民利益一致”的欺骗性口号，鼓吹建立泛美组织，以“巩固南北美洲各国经济、文化的联系”。在美国的倡议下，成立了所谓“美洲共和国国家联盟”，并在华盛顿设立其代表机关“美洲各国商务局”（1910年改称泛美联盟）。这是美国为了攫取西半球霸权迈出的重要一步。

美国为了独霸拉丁美洲，首要的目标是夺取在加勒比海地区的霸权，为此，它和英国展开了争夺。1895年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发生边境纠纷，英国封锁委内瑞拉港口，美国乘机干涉。美国国务卿奥尔尼声称：“今天，美国在这个大陆上实际拥有最高权力，凡是它管辖范围内的人民，都应当把它的意旨当作法律。”7月，美国照会英国政府，要求英国接受第三者的仲裁。英国被迫让步，1897年在华盛顿与委内瑞拉签订条约，双方同意成立有美国人参加的仲裁法庭，确定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的国界。在这次争霸拉美的角逐中，英国遭到了一次打击。

1898年，美国趁古巴人民掀起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机，打着援助古巴独立的幌子，发动美西战争，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波多黎各，并把古巴变成了自己的“保护国”。接着，在1903年，美国又策动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而独立，并强迫巴拿马共和国签订《美巴条约》，以极低廉的代价，攫取了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权和运河区的永久租让权，霸占了沟通太平洋大西洋的巴拿马运河，加强了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霸权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对拉丁美洲的贸易和投资也迅速增长。1913年在拉丁美洲的输入总额中，美国占25%，英国占24.4%，德国占16.6%；在输出总额中，美国占30.8%，英国占21.2%，德国占12.4%。但在投资方面，英国仍超过美国三倍至四倍，在南美保持一定的优势。

（三）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一部分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出现逐步复苏的景象。由于政治动乱渐次平息，巴西、智利、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逐渐恢复了过去被破坏的一些矿场和农庄，开始建设铁路、港口、新的加工工业和轻工业企业。1845年阿根廷使用了第一台蒸汽机。对外贸易增加了，银行、信贷也逐步建立起来。

80年代以后，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乌拉圭和古巴等国的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阿根廷，工业资本总额从1895年至1913年增加五倍以上，1900年工业企业已达2700家，铁路线长度由1880年的2313公里增加到1914年的3万多公里。近代化的城市出现了，如大西洋沿岸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蒙得维的亚、里约热内卢等。农业和畜牧业有显著的增长。例如阿根廷的小麦产量1876年以前还不足以供本国所需，1898年小麦输出

量达 64.5 万吨,1912 年更增至 483.5 万吨;1850 年全国养羊 700 万头,1899 年增至 8900 万头。许多大农场主雇用农业工人,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场,成为资产阶级化的地主。1885 年拉丁美洲的对外贸易总值将近 10 亿美元,到 1913 年增至 30 亿美元。

随着生产的发展,拉丁美洲各国的外来移民大量增加。拉丁美洲地广、物博、人稀,需要人力和物力开发自然资源,发展经济。19 世纪 50 年代以后各国始对移民采取鼓励政策。阿根廷的移民有一半以上来自意大利,三分之一来自西班牙。巴西的移民主要来自意大利和葡萄牙。由德国到拉丁美洲的移民,人数虽然不多,但在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国拥有很大的势力。德国移民往往集中住在一个或几个地区,讲德语,过着德国生活方式,保持德国的风俗习惯,控制该地区的经济和政治。除欧洲移民外,还有日本移民、华工来到拉丁美洲。外国移民不但为拉丁美洲各国增添了大批劳动力和熟练工人,而且还带来了一定数额的资金,对拉丁美洲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拉丁美洲各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渐次成长起来了。

拉丁美洲的资产阶级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与外国资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大资产阶级,其中包括金融资产阶级,进出口大商人和资产阶级化的种植园主。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外国资本的渗入,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变成了单一产品制经济。如巴西的咖啡、智利的硝石和铜、古巴的蔗糖、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的香蕉、厄瓜多尔的可可。这些国家生产单一产品,依靠单一市场。生产和经营这种产品的种植园主、商人和工业家,同外国资本建立了密切联系,并依附于外国资本家。巴西的毛阿男爵就是一个典型。他最初在里约热内卢替葡萄牙商人当代理人,后来到英国商业公司任职,1840 年成为英国“卡拉瑟斯—德·卡斯特罗公司”的股东,与英资合办“毛阿—马克·格雷戈尔公司”。五六十年代开始投资建筑铁路,开办大型造船厂,建立“毛阿银行”,成了一个大资本家。这些从种植园主和买办商人转化而来的大资产阶级成为国内考迪罗主义的另一重要社会支柱。

资产阶级的另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即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由于大地产制的束缚、考迪罗主义的摧残以及外国资本的压抑,造成拉丁美洲各国民族资本的力量比较脆弱,民族资产阶级也相应地比较软弱。但在人民革命运动的推动下,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领导了各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力图打破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的束缚。

拉丁美洲的无产阶级受到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以及本国资产阶级的重重剥削和压迫,处境极为恶劣,印第安和黑人工人的处境更为悲惨。无产阶级一是来自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二是来自欧亚的移民。19 世纪 50、60 年代,出现了第一批工人组织,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1854 年,在圣地亚哥第一次出售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1858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建立了印刷工人联合会,出版了《印刷工人联合新闻》。巴黎公社失败以后,一部分公社社员流亡拉丁美洲,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建立工人组织。1870 年,墨西哥的马克思主义者成立了“有组织的劳动者中心”,1876 年,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1872~1876 年间,阿根廷有四个第一国际支部,他们的活动得到了马克思的关怀和指导。1896 年,阿根廷社会党宣告成立。在巴西、智利、古巴、乌拉圭等国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20 世纪初,一些拉丁美洲的工人阶级掀起罢工斗争,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开始登上政治斗争舞

台。但是，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组织，由于受到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影响，未能把马克思主义与拉丁美洲的革命实际结合起来，没有指明拉丁美洲革命的性质、任务和特点。

（四）中国与拉丁美洲

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促进了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交往。西班牙侵占拉丁美洲和菲律宾之后，开辟了一条新的贸易航线，这就是太平洋大帆船贸易。我国在明代隆庆年间开放“海禁”，与外国商人之间的交往也随之增多。西班牙商人进口中国的生丝、丝织品、棉布、瓷器、家具、冰糖、药材等商品，经马尼拉贩运到拉丁美洲，再从拉丁美洲贩运白银、洋红到中国。此种贸易，获利甚巨，有时竟高达八倍。

中国商品，价廉物美，在拉丁美洲市场很受欢迎，同时大量白银流入我国。1587年，西班牙政府为了遏制中国商品的竞争和白银外流，采取限制贸易政策，把中国—菲律宾同西属美洲殖民地的贸易限制在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1593年，限制每年开往阿卡普尔科港的官帆船为两艘，每艘不得超过300吨，所载商品价值不得超过25万比索，回航时所载白银不得超过50万比索。

随着大帆船贸易的发展，中国劳动人民陆续移居墨西哥等地做工和经商。在16世纪，墨西哥城就出现了唐人街。中国人大规模移居拉丁美洲则在19世纪“苦力贸易”兴起之后。1810年，葡萄牙殖民者从澳门掠去几百名苦力，运到巴西，做种茶实验，不久全部死光。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74年禁止澳门“苦力贸易”的35年间，是掠卖华工的高潮时期，每年运往拉丁美洲的华工数以万计。1875年起，运往古巴和秘鲁的“苦力贸易”已被禁止，而打着“自由移民”幌子拐骗华工的罪恶活动并未中断。估计到拉丁美洲的华工为三四十万人，分布在古巴、圭亚那、特里尼达、苏里南、牙买加、马提尼克、瓜德罗普、波多黎各、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巴拿马、墨西哥、秘鲁、智利、巴西、厄瓜多尔，其中二十五万人左右集中在古巴、秘鲁和圭亚那。

华工在拉丁美洲受尽了人间的磨难，大批死亡。例如，从1847年到1872年，运往古巴的华工为114,081人，到1874年只剩58,400人。华工对拉丁美洲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为种植园、矿山和工厂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并把种茶、种稻的技术带到了拉丁美洲。华工还积极参加了当地人民反对殖民压迫的斗争。例如，参加古巴第一次独立战争（十年战争）的华工有一千多人，其中有许多是参加过太平天国起义的老战士。在第二次独立战争中，参加斗争的人数更多。中国战士由于英勇善战，有的人升任了尉官和校官，得到了古巴人民的一致好评。贡萨洛·德奎沙达将军在《中国人与古巴独立》一书中写道：“假如将来我们能够为中国人树碑的时候，让我们镌刻下面两句话来颂扬他们的恩义吧：‘在古巴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逃兵，没有一个是叛徒’。”

华工在拉丁美洲受到残酷的迫害，引起国内人民的愤慨和抗议，清政府不得不与有关各国办理交涉，并由此开始同一些拉美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古巴是华工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办理交涉较早的国家。1873年中国与西班牙签订“中日（日斯巴利亚，即西班牙）古巴华工条款”，1874年派陈兰

彬为专使到古巴实地调查，1877年重订古巴华工条款17条。其后，中国在哈瓦那设立了领事馆。1902年，古巴共和国成立，清政府电令伍廷芳：“古巴自立，中国自可照认，饬领事前往谒贺。”从此，我国与古巴有了正式外交关系。

1874年，中国与秘鲁几经交涉，在天津签订了“中秘友好通商条约”，双方决定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派公使、领事，并规定华工在秘鲁享受最惠国待遇。1880年，清政府与巴西签订“中巴和好、通商、航海条约”，其内容与中秘条约类似。中国与墨西哥交往最早，但直到1899年才签订“中墨和好通商行船条约”。中墨建交后，华人赴墨日益众多，1904年增至8000人，1910年已不下3万余人。双方开展了直接贸易，而不再绕道美国旧金山，1903年，中国商人在香港集资创办中华轮船公司，定期开轮往返墨西哥。

第二节 巴西奴隶制的废除

和共和国的建立

(一) “王国时期”

从 1822 年巴西宣布独立，彼得罗称帝到 1889 年帝制被推翻，在巴西历史上称为“王国时期”。1824 年巴西颁布宪法，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宪法虽然规定成立资产阶级议会，但实际上皇帝拥有绝对权力。他可以解散议会，可以限制选举权只归天主教徒所享有。他拥有广泛的任命权，可以对各种政权机关裁处协调。

1825 年乌拉圭爆发了反对巴西占领的起义，同年 10 月阿根廷制宪议会决定把乌拉圭并入阿根廷，12 月 10 日巴西向阿根廷宣战。巴西陆军连吃败仗，1827 年 2 月大败于伊图察因戈。同年 5 月，双方举行和谈，1828 年 8 月签订和约，由巴西和阿根廷保证乌拉圭的独立。

同乌拉圭和阿根廷的战争死亡近 8000 人，军费开支达 1.2 亿克鲁赛罗，促使巴西社会的各种矛盾激化起来。

在巴伊亚省，黑奴起义接连不断。1826 年爆发了黑人妇女扎费丽娜领导的起义。1828 年爆发了三次黑人起义，最大的一次起义，有 1500 人参加，600 余人在战斗中伤亡。1830 年圣萨尔瓦多市（巴伊亚）的黑人成功的夺取了军火库，同帝国军警进行了一场血战。同阿根廷作战期间，农民展开了争夺土地的斗争，城市市民展开了反对苛捐杂税、低关税制和征兵的斗争。资产阶级共和派要求废除帝制，实行改革。种植园主对彼得罗一世的专制统治，对一小撮葡萄牙贵族左右国家大事也日益不满。

各个社会阶层反对彼得罗一世专制统治的斗争，汇集成 1831 年的起义。4 月 5 日，彼得罗一世任命一个反动内阁的消息，在首都里约热内卢和外省引起了骚动。首都群众捣毁店铺和葡萄牙官吏的住宅。6 日，首都群众集合到圣安娜广场，士兵加入了起义行列。7 日，彼得罗一世被迫宣布退位，由其年仅六岁的儿子彼得罗阿尔坎塔拉继位，称彼得罗二世。由于彼得罗二世年幼，组成三人摄政委员会，执掌政权直到 1840 年彼得罗二世亲政。这次事变标志国家政权由葡萄牙贵族手中转到了巴西种植园主手里。

“王国时期”的巴西，与拉丁美洲各国相比，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君主专制政体的保留，而有别于共和政体下的考迪罗主义；二是奴隶制的长期存在，成为巴西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奴隶种植园主是君主政治的社会支柱，而君主政体则维护奴隶种植园主的利益。

种植园奴隶制是巴西经济制度的基础，奴隶仍是基本的劳动力。19 世纪 20 年代，奴隶几乎占总人口的一半，而且每年运进 4 万非洲黑人。1831 年摄政委员会颁布了禁止向巴西贩运奴隶的法令，但未认真执行，“走私”进来的奴隶照旧源源不断。奴隶主要用于种植园，种植甘蔗、棉花、烟草和咖啡，也使用于开矿和做仆役。

巴西已被开发的土地几乎都被奴隶种植园所占有。每个种植园主都像封建王侯一样，豢养一支由奴隶和雇佣兵组成的武装力量。他们也把一部分土地交给承租人耕种。承租人本身是小奴隶种植园主，他们通常拥有六个至十个奴隶，向大种植园主交纳一半的收成。19 世纪 20 年代，巴西还出现了一

种对大种植园主处于半封建依附地位的隶农。他们耕种种植园主一小块土地，但缴纳一定的收获物，并定期无偿地为种植园劳动。

巴西的大种植园通过商业资产阶级的中介，与世界市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们所需的劳动力由欧美商人从非洲贩运而来，他们向世界市场提供糖、棉花、咖啡、烟草和橡胶。1828年，帝国政府批准对所有国家的进口商品一律征收15%的进口税。这个有利于种植园主和外国资本家的决定，打击了刚刚兴起的本国资本主义工业。为数不多的工业企业，经不起英国商品的竞争而宣告破产。1827年，拥有十台纺织机的圣路易斯德伊图市纺织厂倒闭，伊帕内马市制铁厂和其他工业企业也濒临破产。

19世纪50年代，巴西的经济发生了变化。咖啡的生产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缓慢发展后开始起飞，其产量和出口量不断增长。40年代，巴西咖啡占世界总产量的40%，1889年增为57%。咖啡主要种植在巴西东南部的里约热内卢省和圣保罗省。由于咖啡生产的发展，巴西的经济重心由种植甘蔗和棉花的东北地区转移到了东南地区。

在咖啡生产开始大发展时，奴隶种植园制开始出现了深刻的危机。首先是奴隶劳动力来源的短缺。残酷的种植园奴隶制使奴隶大批死亡，而从非洲进口的奴隶人数不断下降。与此同时，在巴西种植园中出现了“合同制”。1847年圣保罗的一个种植园主同几百名德、葡侨民签订合同，规定由种植园主支付旅费和入境初期的生活费用，提供住房，侨民从日后耕种土地的收获中予以偿还，还清债务之后，侨民收成的一半归种植园主，一半归己。从此，合同制在巴西发展起来，欧洲侨民大批迁居巴西。1851~1870年间有22万人移居巴西。他们大部分来自德国、葡萄牙和意大利。奴隶输入的减少和侨民的增加，使巴西自由民与奴隶的数量对比发生了逆转。1850年巴西全国总人口为720万，奴隶人口为240万，占31%。60年代下半期，全国总人口1030万，奴隶人口为180万，约占17%。

在咖啡生产的推动下，巴西工业开始繁荣。在50年代建立了62家新的工业企业、8个矿山、20家轮船公司、3家城市交通运输公司和3家煤气公司。70年代又建立了125家新的工业企业。到1889年巴西共有636家工业企业，雇用54,000余名工人。1852年开始建筑从里约热内卢到圣保罗和米拉斯吉拉斯省的铁路线，70年代末，铁路通车里程已达745公里，1889年增加到9583公里。50—60年代巴西出现了第一批银行、保险公司。生产的发展促使出口贸易增加。从1840年到1890年，巴西的贸易额增长了十倍多。

随着资本主义在工农业中的发展，两种劳动制度——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和种植园奴隶劳动制的冲突日益尖锐，要求废除奴隶制和推翻君主制的运动日益高涨。

（二）反对奴隶制和君主制的胜利

19世纪中叶，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黑奴、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共和派都参加到废奴运动和共和运动中来。

巴拉省的“卡巴纳达”运动，是小资产阶级领导的一场反对帝制的斗争。运动的参加者被称为“卡巴诺斯”，意即穷人。1835年1月，卡巴诺斯夺取

茅屋的意思。

了巴拉省省会贝伦，成立了新的省政府。5月贝伦被政府军夺占，卡巴诺斯退往内地，号召印第安人参加起义，并提出了解放奴隶的要求，起义力量迅速增长，8月已达3000人。经过五天激战，他们再次夺取贝伦城，宣布成立共和国，选举安热利姆为总统。1836年4月，政府海军封锁贝伦，5月13日卡巴诺斯再次撤离贝伦，一直退往亚马孙河谷。1839年起义才被最后镇压下去。

与“卡巴纳达”运动差不多同时，在南里约格朗德爆发了争取民主共和国的斗争。1835年9月18日，全省各大庄园的起义队伍向省会阿雷格里港进发，20日夺占该城。6月15日阿雷格里发生反革命叛乱，起义者退往内地。1836年11月，在皮拉蒂尼市宣布成立里约格朗德共和国，表示愿“与巴西赞同联邦制的各省建立联邦关系”，并通过了凡愿意参加共和国军队的奴隶均为自由民的决定。南里约格朗德共和国坚持斗争达十年之久。意大利烧炭党人在保卫共和国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著名革命家加里波第被任命为共和国舰队司令。1839年11月在保卫拉古纳港的战斗中，他指挥共和国舰队，与政府军的22艘战舰英勇战斗。1845年2月，共和国领导人同巴西政府签订了《媾和协定》，政府答应大赦起义的参加者，准许他们推选本省省长候选人，但取消了共和国所颁布的一切法令，包括取消给黑奴以自由的法令。

1848年在伯南布哥爆发了海滨起义。起义者提出了实行普选和出版自由、保障公民自由、实行联邦制、由巴西人控制零售商业等要求。1849年初，在夺取累西腓市的战斗中，起义军遭到严重挫折。同年末，起义被政府军镇压下去了。

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武装起义是分散的、各省之间互不联系。领导这些起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代表，没有坚定地提出废除奴隶制，或者根本回避这个问题。因此历次起义都显得软弱无力，而被政府军各个击破。

1865年美国内战的胜利结束，给巴西的废奴运动一个大的推动。废除奴隶制和争取共和国的斗争开始结合起来。1870年，里约热内卢成立了奴隶解放协会，民主知识分子和商人组成了共和俱乐部。两个团体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个别领导人是同时参加两个组织的。一些废奴协会还领导协助奴隶逃亡的运动。1883年5月，国内各种废奴协会的代表成立了废奴主义同盟，领导全国的废奴运动。70、80年代，黑人建立了许多逃奴堡。其中最著名的是圣保罗省圣多斯港附近的雅巴卡拉逃奴堡。这个逃奴堡自选总统，自己组织生产，并且得到废奴运动者的帮助。

5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群众运动的高涨，促使统治阶级政党发生了分裂。南方咖啡种植园主在经济实力上已经超过北方的糖业寡头，代表他们利益的自由党要求从北方糖业巨头和宫廷贵族手里夺取政权。70年代初成立了第三个政党——共和党。它在1873年圣保罗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专门决议，声称各省都应根据自己的需要废除奴隶制，奴隶主应获得补偿。参加这个新党的不仅有圣保罗、南里约格朗德、米拉斯吉拉斯等省的资产阶级、种植园主和知识分子，而且有陆军军官。

人民群众的不断斗争，终于赢得了废除奴隶制的巨大胜利。1871年公布了“胎儿自由法”，规定从法令颁布后出生的黑奴子女都可以获得自由。1885年议会批准了一个新法案，规定60岁至62岁的奴隶无偿地为其主人服务三年，63岁的奴隶服务两年，64岁的奴隶服务一年以后都可获得解放；已获解

放的奴隶在五年内禁止离开原来的居住地点。人们指责这项法律是种植园奴隶主的卑鄙花招。废奴运动更加蓬勃发展起来。奴隶大批逃离庄园，士兵拒绝参加讨伐逃亡的奴隶。1888年5月，众院通过了废除奴隶制的法律，5月13日由摄政彼得罗二世的女儿伊萨贝拉签署生效。75万名黑奴虽然自由了，但他们没有土地，无以为生，其中多数变为雇农，一小部分则加入了手工业者和产业工人的行列。

奴隶制废除后，巴西人民的斗争锋芒便集中指向帝制了。1889年7月14日许多城市爆发了示威游行。11月11日共和派领导人同德奥多罗·达·丰塞卡元帅接触，商讨军事起义。13日深夜，德奥多罗·达·丰塞卡指挥两个团开往里约热内卢。15日起义部队到达首都，占领陆军部大厦，当晚宣布成立巴西合众国，成立以德奥多罗·达·丰塞卡为首脑的临时共和政府。次日，彼得罗二世被放逐到欧洲。从此，巴西历史进入了共和时期。

（三）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农运动

奴隶制的废除和共和制取代君主制，完成了巴西资产阶级革命的两大任务，在拉丁美洲和巴西的历史上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临时政府成立后，实行了一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1889年11月15日宣布废除军队中的肉刑。11月19日法令规定，凡年满21岁的识字的男性公民都有选举权。1890年1月7日公布了政教分离法。1月23日宣布婚礼可不按宗教仪式举行。1月17日建立了具有发行纸币权力的银行制度。1890年12月3日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1891年2月24日颁布宪法。它以美国宪法为蓝本，规定行政首脑总统由年满21岁的男子直接选举。立法机关由参、众两院组成。参议院的议员每州三名，任期九年；众院议员按人口比例直接选举产生，任期三年。司法机关由全国最高法院和各级地方法院组成，法官由总统任命，为终身职。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就业自由。同时宪法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部宪法保障了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

废除奴隶制和君主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比较广阔的道路。1889年后，巴西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咖啡、橡胶、可可的产量激增。可可在1915年输出量已居世界第二位。其次，工交事业获得了较快发展。1889年全国只有600多家工厂，其中60%是纺织业。1907年，工业企业增至3250家。1914年铁路已近24,613公里。其他如公路、水运、空运、邮电也都有相当的发展。全国性的邮电网已初步建立。随着工农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对外贸易也增加了。1890年，输出额为28,066.5万克鲁赛罗，输入额为25,552万克鲁赛罗。1913年，输出额增至98,176.8万克鲁赛罗，输入额增为100,749.5万克鲁赛罗。

但是，巴西的经济仍带有半殖民地性质，较大的工业企业和几乎全部的交通运输业都掌握在外国人手。矿山和银行大半为英国垄断资本所控制。巴西的外债，1900年为4565万英镑，1910年增至12,930万英镑。

农村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大土地所有制依然保存着。占人口极大多数的农民，对自己的无权地位、繁重的劳动和半封建的依附关系极为不满。为了争取土地和人权，1893~1897年间发动了震撼全巴西的巴依亚州农民大起义。

起义的领导者是安东尼奥·马西埃尔。他认为，国家制度和法律都不公正，主张成立人们一律平等、土地公有、共同劳动、共同分配的村社组织。人们叫他为孔塞列罗，意即“劝世者”。1893年起，孔塞列罗和他的追随者把他的思想付诸实施，在巴伊亚州一个荒凉的牧村卡努杜斯行动起来。他们夺取地主的土地，拒绝向政府缴税，在森林草原中建立根据地，自制武器和弹药，广泛地运用游击战术，在很短时期内，卡努杜斯成了拥有五千多茅屋的较大集镇。卡努杜斯的影响迅速扩大，使州长大为恐慌。1896年11月，一支警察部队开往讨伐，孔塞列罗率众击溃了它。第二次是五百多人的联合部队，也被卡努杜斯居民打得溃不成军。1897年，政府派出一支新的远征军，又被击溃，司令官（上校）被击毙。嗣后，政府派遣一位将军率领6000名远征军再度向卡努杜斯进攻。起义军运用游击迂回的办法，一度使政府军疲于奔命。但到9月末，卡努杜斯已被全面包围，突围没有成功。欧克里德斯·达·库尼亚在《腹地》一书中写道：“10月5日黄昏，卡努杜斯在其最后一批保卫者倒下去以后才被占领，它是名符其实地被一寸一寸地夺取的。”

早在帝制时代，巴西工人就开始了自发的斗争。90年代开始，工人阶级的斗争越来越具有组织性。1891年，皮特罗普利斯和中央铁路公司的工人举行了罢工。同年，具有鲜明阶级倾向的两种工人报刊《工人报》和《五一报》发行。1892年，在圣多斯建立了“社会主义中心”。1895年，在圣保罗和圣多斯等城巴西工人第一次举行庆祝五一节的示威大游行。1896年，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口号下出版的《社会党人报》开始在巴西第二大城圣保罗发行。这家报纸用葡萄牙文、意大利文和德文刊登文章，积极地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1902年召开了巴西社会党代表大会。1908年召开了有全国大多数工会代表参加的巴西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后，成立了全国性工会组织——巴西工人联合会。在联合会领导下，工人多次举行罢工。

第三节 古巴独立战争

(一) 西班牙统治下的古巴

古巴是西印度群岛中最大的岛屿，是西半球航线的重要枢纽，适宜种植甘蔗、烟草，又有大片原始森林和富饶的地下矿藏。哥伦布赞美古巴岛是“肉眼从未见过的最美丽的岛屿”。

16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开始侵入古巴。1511年贝拉斯克斯远征队，在该岛南部登陆，建立了圣地亚哥城。殖民者在古巴实行“监护制”，侵占印第安人的土地，把死里逃生的印第安人分配给殖民者做奴隶，驱赶到矿井和田庄从事繁重的劳动。大部分印第安人不是饿死和劳累致死，就是在反抗中被殖民者杀害。到1557年印第安人从原有的30万左右减少到2万人，“监护制”也在两年前废除了。

在实行“监护制”的近半个世纪中，古巴的经济没有什么发展，为“黄金热”驱使到古巴来的移民，因黄金迅速开采完毕而纷纷迁居到新发现的墨西哥和秘鲁去了。荷兰、法国和英国的海盗又不断袭击古巴。1536年法国人抢劫了哈瓦那，1554年法国海盗攻击了圣地亚哥，1555年焚毁了哈瓦那。因此，到16世纪下半叶，古巴一片荒凉，1602年，古巴的人口总共只有2万人，其中1.3万人居住在哈瓦那周围。

从16世纪初起，西班牙殖民者在古巴种植烟草和甘蔗。烟草的种植采取小型种植园制。移居古巴的白人移民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土地，烟草的栽培、修整和收获的主要劳动力是家庭成员。到18世纪末，古巴共有一万多个这样的烟草种植园。

蔗糖业的发展起初比较缓慢。1762年英国占领古巴，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给蔗糖业的发展以巨大的刺激。西班牙重新统治古巴以后，没有恢复旧的垄断贸易制度，而是鼓励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从此，蔗糖的生产扶摇直上。1765年，古巴已经拥有600个制糖厂，1779年糖产量达到5600吨。海地革命爆发以后，它的蔗糖业受到破坏，给古巴蔗糖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市场，产量和出口量迅速增长，1810年出口33,708吨，1830年增为72,635吨。蔗糖业的迅速发展，使古巴变成了以糖为经济命脉的单一作物区。

由于印第安人被残杀殆尽，西班牙殖民者主要是从非洲输入黑人以补充劳动力的不足。1524年输入第一批黑人，用来开采日阿瓜金矿，但输入的黑奴不多。随着甘蔗种植园的发展，糖厂的建立，黑人奴隶才源源不断地输入古巴。1774年古巴共有172,620人，黑人和黑白混血种奴隶占44,333人；1817年共有63万人，黑人奴隶为22.4万。这时古巴便以“糖和奴隶”而闻名于世了。

1777年，西班牙把古巴变成了一个单独的殖民地，设立由西班牙国王任命的督军直接领导，提高了它的地位。像在西属拉丁美洲其他地区一样，西班牙殖民者垄断行政、军事和教会职位。他们在任期间，拼命搜括财富。古巴每年收入的40%至50%都流入了西班牙。

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解放战争期间，古巴人民也展开了多次的革命斗争。1792年在哈瓦那、太子港和特里尼达德附近的甘蔗种植园发生了黑人奴隶的暴动。1795年在巴亚莫爆发了自由黑人领导的贫苦白人和黑人的联合起义。这次起义蔓延到整个东部地区，并提出了黑人、白人

一律平等，把土地分给贫苦白人和黑人的革命要求。1796年又在博卡—尼基阿甘蔗种植园爆发了黑奴暴动。1812年在古巴东部的奥连特和卡马圭地区爆发了一次规模巨大的黑人起义。在何塞·安东尼奥·阿蓬德领导下，起义者提出了建立“独立黑人共和国”的口号，在哈瓦那成立了领导起义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比以往任何一次起义都更具有组织性和明确的政治目标。但是，在大觉醒时期的所有起义都被西班牙殖民者镇压下去了。古巴未能同拉丁美洲各国一道争得民族独立，其原因是：一、古巴种植园经济是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海地革命和其他拉丁美洲各国革命的先例吓倒了种植园奴隶主，独立意味着废除奴隶制度，因此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他们反对任何可能导致解放黑人奴隶的革命运动。从1795~1805年，海地岛种植园奴隶主带着奴隶进入古巴（总人数达3万），增强了反对革命维持旧秩序的力量。二、古巴是西班牙镇压拉丁美洲革命运动的战略据点和供应基地，它竭力用重兵固守。三、英、美、法宁愿维持西班牙的统治，而不愿古巴落入他国之手。美国深恐古巴革命危及美国，竭力阻挠古巴革命。1825年，由墨西哥和哥伦比亚所发起的援助古巴革命的计划，就因美国的反对而未能实现。

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由于古巴受到海上封锁的影响，它同美国的贸易联系逐步加强。古巴向美国出售糖、咖啡、可可、靛青、烟草和雪茄，从美国进口面粉、酒、铁、纺织品和家具。到19世纪30年代，古巴的大部分进出口贸易都是同美国进行的，古巴糖和烟草对美国的出口额远远超过了向西班牙和英国的出口额。但是，西班牙商人力图重新控制古巴的贸易。1834年西班牙把古巴从美国进口面粉的关税，每桶提高到9.5美元，美国则以对古巴咖啡征收特别关税进行报复。美西关税战给古巴的经济带来了很大影响。咖啡生产急剧减少，蔗糖生产进一步增加。1833年，古巴有2067个种植园生产咖啡，出口6415万磅；1862年咖啡种植园的数目减为782个，出口量下降到500万磅。一些古老的咖啡种植园家族破产和失势了，他们走上了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道路。蔗糖的产量由1850年的22万多吨，增长到1869年的74.9万吨。从蔗糖生产内部来看，出现了工农分工的倾向。旧有的综合性名称——甘蔗种植园糖厂，让位给中心糖厂和蔗农。中心糖厂安装新式机器设备加工甘蔗，修建铁路，把中心糖厂同蔗农联结起来。古巴蔗糖的90%向美国出口，美国资本也直接向蔗糖工业投资，1896年美国的投资总额约为3000万美元。古巴甘蔗种植园主同美国的关系远比同宗主国西班牙的关系密切。

这样，到19世纪60年代，要求消灭西班牙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不仅有黑人奴隶、贫苦的白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还有对西班牙的政治专横和经济压制不满的商业资产阶级和土生白人种植园主。黑人奴隶和贫苦农民是古巴争取民族解放的主力军，他们始终把争取民族独立和废除黑奴制、大土地所有制联系在一起，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掌握了独立运动的领导权。

（二）独立战争

美国废除奴隶制给古巴释奴运动以新的推动，1868年，西班牙革命推翻了伊萨贝拉二世的统治，建立了共和政府，给古巴爱国志士发动起义提供了有利时机。咖啡种植园主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首先释放了

自己的黑人奴隶，联合一批爱国者，于 1868 年 10 月 10 日在奥连特省的迪马哈瓜发动起义，宣布古巴独立。起义的基本群众是黑人奴隶和白人小农，契约华工也参加了起义。起义的口号是：“打倒西班牙统治”、“废除奴隶制”、“自由古巴万岁”。参加并领导起义的自由派种植园主，抛弃家园，同起义群众一起退入丛林，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建立了根据地。在几个月之内，起义队伍从一百多人扩大到两万六千余人。起义者一面生产，一面战斗，英勇地同比自己强大的西班牙军队和反动地主武装“自卫队”激战。战斗中涌现了一批杰出的将领，例如安东尼奥·马西奥，他是一个黑白混血种人，身材魁梧、英勇善战，被誉为“青铜巨人”。他坚信古巴能凭自己的力量获得自由，反对美国干涉，他说：“我们不需要外国干涉来加速或推迟胜利”，“自由不是乞求来的，而是用刀枪赢得的”。

1869 年 4 月，颁布了宪法，成立了“自由古巴共和国”，选举塞斯佩德斯为共和国总统。同时，颁布了信教自由、解放奴隶等法令。解放奴隶法令写道：“当古巴革命宣布国家独立时，也宣布了普遍的自由，认为这个自由只限于一部分人口是不能被接受的。一个自由的古巴和一个奴隶制的古巴是水火不相容的，废除西班牙制度必须包括废除最不公正的奴隶制”。依照法令，支持革命的种植园奴隶主可以获得补偿金，被解放的奴隶可以应征服役。

西班牙殖民者采取各种残暴的办法，屠杀起义者和支持起义的群众。1873 年塞斯佩德斯被俘牺牲。此后，掌握革命领导权的自由派种植园主和资产阶级右翼，在西班牙强大军事压力下妥协动摇了。他们于 1878 年 2 月 10 日同西班牙签订了《桑洪和约》。西班牙政府答应实施改革，同意古巴人在西班牙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古巴人有担任官职之权，规定给“当时参加起义军的亚洲移民和奴隶以自由”。1880 年 2 月 13 日，西班牙颁布了废除全岛奴隶制的法令。以安东尼奥·马塞奥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拒绝接受《桑洪和约》，转移到国外继续进行斗争。1879 年 9 月 5 日，马塞奥在牙买加发出宣言，号召古巴人民、海外侨民和十年战争的老战士为独立而拿起武器来。

1868~1878 年革命，史称“十年战争”，是古巴独立战争的第一阶段。十年内共消灭敌军 14 万人，使西班牙损失 7 亿比索。但是第一次独立战争没有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黑奴制虽然废除了，但黑人既没有得到土地，也没有足以维持生活的生产资料，他们被迫给资本家做雇佣奴隶，或者当地主的债农。《桑洪和约》所规定的改革并没有兑现。西班牙殖民统治稍事稳定以后，便加强对古巴人民的压迫和榨取。十年战争参加者的财产完全被没收。税收猛增，造成大量中小农场的衰落和破产，大种植园主乘机兼并土地。1895 年，只占全国农户 1.4% 的大种植园主，却占有全国耕地的 45.5%。

所有这些事实，宣告了妥协政策的破产。一些先进的爱国者总结了第一次独立战争的经验教训，继续探索救国的真理，准备着一次新的独立战争。1892 年 4 月 10 日，古巴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何塞·马蒂，在美国纽约把分散的国内外革命组织联合起来，正式组成了古巴革命党。参加该党的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及其知识分子。古巴革命党的纲领，提出通过革命战争实现古巴的完全独立，建立独立的共和国。

何塞·马蒂(1853~1895 年)出身于哈瓦那一个西班牙贫苦移民的家庭，父亲当过西班牙皇家炮兵联队的上士。马蒂 16 岁就参加了革命活动，1869

桑洪系卡马圭省西南边的一个小镇。

年（即十年战争的第二年）他创办《自由祖国》刊物，号召古巴人民为祖国独立而英勇战斗，因而被捕入狱。

18岁时，马蒂流放到西班牙，十年战争结束后马蒂回到古巴。他反对《桑洪和约》，认为签订和约使独立大业“半途而废”。1880年马蒂流亡到美国，不倦地在纽约、佛罗里达等地的古巴侨民中进行宣传，募集经费，积聚革命力量。他与侨居美国古巴烟草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群众有广泛接触。他尖锐地批判古巴土生白人大种植场主、大商人中合并主义派的崇美、亲美思想，他洞察美帝国主义的诡诈，号召古巴和拉丁美洲人民用胸膛来堵塞“嚣张的、残暴的北方国家吞并我们美洲国家的道路”。他反对少数人的政变，坚持古巴革命必须通过人民的斗争方能取胜。他说：“权利不是哀求得来的，它是要用武力来夺取的！”

古巴革命党成立后，马蒂被海外侨民推选为党代表，负责领导革命。1892年9月13日，他到多米尼加，会晤十年战争的老战士马克西莫·戈麦斯，任命他为古巴解放军总司令。1895年1月29日，马蒂等人一致同意，在2月下半月发动全岛起义。1月24日，第二次独立战争首先在具有深厚革命基础的奥连特省爆发。3月25日，马蒂和戈麦斯在多米尼加发表了《蒙泰克里斯蒂宣言》，号召古巴人民拿起武器，同西班牙殖民者作殊死的决战。4月11日深夜，他们两人率领远征队在古巴登陆。马蒂回国后，身先士卒，奋勇杀敌，不幸于5月19日在多斯里奥战役中壮烈牺牲。戈麦斯、马塞奥等人遵照马蒂“古巴人宁愿放弃生命，也不愿放弃自由”的誓言，率领起义军继续进行民族独立战争。

1895年9月召开代表会议，正式宣布古巴脱离西班牙而独立。会议起草了临时宪法，成立了古巴共和国政府，选举贝坦科尔特为总统，组织统一古巴革命军，由戈麦斯和马塞奥分任正副总司令。9月22日，他们率领一支不到三万人的装备不好的队伍，用三个月时间，从古巴岛的东端挺进到西端，解放了大片国土。广大农民、工人、黑人、华工和其他阶层的人民群众纷纷参加革命军，或者为革命队伍传送消息，提供给养，运输军火。据估计，有三十四万余人以不同的方式参加了解放战争。

西班牙殖民者对古巴人民采取穷兵黩武政策，1896年1月19日任命被古巴人称为“屠夫”的魏勒为督军。他到任以后，一方面，采用“集中营政策”，强迫古巴人民集中到重点设防的城镇，割断解放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另一方面，他调动大批军警，围剿解放军。解放军采用游击战，以6万人对付约20万西班牙正规军的围剿，戈麦斯在给一个部下的指示中说：“不要让士兵去硬拼，要设法以步兵打伏击。要保护马匹，利用夜间（夜战）巩固阵地。白天打狙击，夜间进行偷袭。”游击战争使西班牙妄想以武力摧毁解放军的图谋成了泡影，到1898年解放军已经解放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土。西班牙两易内阁，三换主帅，非但没有扑灭古巴革命，反而使本身陷于财穷兵尽，民怨沸腾的境地。西班牙舰队参谋长孔卡斯不得不承认：“古巴的叛乱已经使战争结束了，这个岛屿已不再是我们的了。”10月31日，魏勒被撤职，11月25日，西班牙国王颁布法令，允许古巴实行自治。

正当古巴革命的胜利在望之时，美帝国主义发动美西战争，抢走了革命的胜利果实。

蒙泰克里斯蒂是多米尼加的一个镇。

第四节 墨西哥

（一）革新运动（1854～1876年）

独立战争的结果，使墨西哥摆脱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建立了共和国，使原来属于西班牙人的大地产转到了土生白人军官和官吏手里。大地产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数量大大增加，从1810年的4944处增到1854年的6092处。教会依旧是大土地所有者，最大的银行家和高利贷者。在19世纪30年代，教会财产估计约为3亿比索。

独立战争后，墨西哥的工商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黄金和白银的产量，分别从1821～1840年的28,340公斤和5,957,900公斤，增长为1841～1860年的37,790公斤和8,772,600公斤。纺织工业发展最迅速，40年代全国共有59家棉纺织厂，2609台机器，10,816名工人。

英国资本已经打入墨西哥。40年代在采矿工业中有65家英国公司，投资总额1000万英镑以上。英国资产阶级还控制了一部分纺织企业和对外贸易。

在封建大地产依旧保存和资本主义关系有了一定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19世纪上半叶墨西哥保守派和自由派频繁争夺政权的格局。封建大地主、享有特权的军官和教会联合组成了保守派。他们反对共和制，要求恢复君主制，极力维护大地产和教会的特权，所以他们又称为集权派或君主派。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地主、一部分军官、知识分子组成自由派。他们主张在联邦制的基础上巩固共和政体，实行政治经济改革，以利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由派也叫联邦派，其中右翼叫温和派，左翼叫极端派。极端派主张把天主教会的土地分给世俗土地所有者，废除教会和军人的特权，得到了小资产阶级、农民和自由职业者的支持。

在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斗争中，军官起着主要的作用。他们频繁发动政变，更换总统。从1824年至1848年，墨西哥共发生了250次左右的政变或军事叛乱，更换了31个总统。政局不稳，扰攘不宁，是这个时期墨西哥政治的特点。

墨西哥政治动荡，国家衰败，给美国扩张主义者以可乘之机。1835年6月，在美国的支持和怂恿下，得克萨斯州的移民发动叛乱，1836年独裁者圣塔安纳被叛军打败被俘，承认了所谓“得克萨斯共和国”的独立。1845年，美国正式兼并了得克萨斯。1846年，美国直接发动大规模武装侵略，1847年9月13日占领首都。1848年2月2日，强迫墨西哥统治阶级签订“瓜达卢佩—伊达尔哥条约”，割让新墨西哥、上加利福尼亚和塔马乌利帕斯、科阿韦拉、索诺拉的北部，总面积为230万平方公里左右。1853年圣塔安纳政府又以1000万美元的代价，把科罗拉多河、希拉河和格兰德河之间12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土地卖给了美国。

对统治阶级丧权辱国，卖国求荣的行径，广大人民群众义愤填膺。1854年3月1日，胡安·阿尔瓦雷斯在阿尤特拉领导了推翻圣塔安纳反动统治的起义。阿尔瓦雷斯当过骡夫，参加过独立战争，1849年担任盖雷罗州州长。他组织一支“恢复自由军”，与政府军作战。很快，起义扩大到维拉克鲁斯、新莱昂、索诺拉等州。1855年，阿尔瓦雷斯率部进攻首都，圣塔安纳逃亡国外。10月成立新政府，阿尔瓦雷斯当选为总统，奥卡姆波任外交部长，华雷

斯任司法部长，开始了墨西哥历史上的“革新运动”。

革新运动实质上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它从推翻圣塔安娜独裁统治开始，经历了内战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严酷斗争。领导这场斗争的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贝尼托·华雷斯（1806~1872年）。华雷斯出身于贫苦的印第安农民家庭，他是一个孤儿，从小就从事艰苦的劳动，青年时期勤奋学习，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艰苦的磨炼中，成长为一个反对封建主义、天主教反动势力和外国侵略者的英勇战士。他在司法部长任内，制定了《华雷斯法》，撤销了一切特别法庭，取消了军事法庭和教会法庭的民事审判权。

1856年2月，召开了制宪会议。极端派拥有多数席位的制宪会议，通过了《莱多法》，禁止世俗和教会团体拥有不动产，强制教会出售它所拥有的地产。到1856年底，根据该法令共出售了2300万比索的不动产。教会的不动产的购买者主要是本国和外国资本家。1857年，议会通过了新宪法。宪法规定：总统由普选产生，宗教界人士不得当选为总统和国会议员，禁止奴隶制度，禁止宗教和世俗团体占有不动产，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规定言论、出版、集会和通信自由。

1857年12月，根据新宪法举行了选举。科蒙福特当选为总统，华雷斯当选为最高法院院长。反对改革和1857年宪法的教会和教权派地主，策动保守派将军苏洛阿加发动叛乱，攻占墨西哥城。科蒙福特总统战败后逃亡美国，拥护宪法的70名议员，在克雷塔罗城组织新政府，根据宪法的规定，华雷斯就任总统。保守派和护宪派之间的内战开始了。

保守派占据着墨西哥中部，得到教会、教权派地主的支持。到1858年7月底教会给苏洛阿加的资助金额为四百六十万比索。护宪派则控制着墨西哥的边区各州，得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贫民的支持。内战时期，护宪派组织了几千支游击队，活跃于保守派政府控制区。内战初期，保守派政府掌握着军事主动权，1858年3月，大败护宪派，占据了采矿工业中心瓜那华托城，1859年2月，进攻护宪派的重镇维拉克鲁斯城。华雷斯政府采取坚决措施，于1859年7月颁布“改革法”，宣布僧侣为主要敌人，教会财产收归国有，政教分离和信教自由。华雷斯还制定了把教会土地分成小块出售的办法。“改革法”比较彻底地摧毁了教会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这些改革，促使内战向有利于护宪派转化。1860年8月，护宪派在西拉奥地区打败了保守派的军队，12月25日攻克首都。华雷斯还都墨西哥城后，重新公布“改革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墨西哥反动派寄希望于欧洲列强的干涉。他们在巴黎积极活动，要求拿破仑第三帮助建立在法国保护下的君主制。拿破仑第三则企图把墨西哥变成法国的保护国，并以对外战争的胜利来湮没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1861年7月，墨西哥决定停止偿付外债两年。法国、英国、西班牙以此为借口，签订了共同武装干涉墨西哥的协定，结成了反对墨西哥改革的新的“神圣同盟”。

1861年12月28日，从古巴出发的西班牙军队占领了维拉克鲁斯城。1862年1月，英法军队登陆。4月，英、西军撤回，由法国单干，沿维拉克鲁斯通往首都的道路发动进攻。1863年5月17日，法军侵占了普韦布拉城，打开了通往墨西哥城的道路。华雷斯主动撤离首都，政府迁至圣路易斯波托西。

又译胡阿雷斯。

马克思：《对墨西哥的干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389页。

1864年5月，法国干涉军把奥地利大公扶上墨西哥王位，称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但是，干涉军只占领了一些大城市及其附近的地区，三分之二的国土仍在华雷斯政府控制之下。广大群众猛烈地反抗侵略者，千百个游击队配合政府军作战，破坏交通线，袭击小股驻防军。在长期游击战争中，涌现了一批出身贫寒的优秀指挥员。如在维拉克鲁斯州活动的印第安人卡尔巴哈尔，他的部属全是牧民，在西拿罗亚州作战的印第安人鲁比，他的伙伴都是矿工。为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反抗侵略者，华雷斯政府深化了革新运动。1863年2月，颁布封闭女修道院的法令，其房屋改为医院，财产充作军需；7月又颁布法令，允许每个墨西哥人获得2000公顷以内的国家荒地，恢复印第安村社占有土地的权利。8月颁布没收卖国贼财产的法令，并将其分配给农民。这项法令只在几个州实行，因此没有改变墨西哥土地所有制的性质。

游击队的刚毅精神拖垮了法国远征军，到1867年初，远征军因作战和患病而死亡者已达20%左右。法国士兵厌战日甚，开小差和投向共和政府的事层出不穷，武装干涉终于以完全失败而告终。1867年2月5日，法军离开墨西哥城，3月中旬撤出了墨西哥。依靠法军枪柄保护的马克西米利安帝国也随之垮台了。5月15日，华雷斯政府的军队攻克克雷塔罗城，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和他的几个将军被俘，并于6月19日处死。墨西哥人民取得了反对外国侵略者的伟大胜利，保卫了革新运动的成果。维克多·雨果在给华雷斯的贺词中说：“现今美洲有两个英雄：约翰·布朗和您。约翰·布朗使奴隶制灭亡；您使自由复活。”

（二）狄亚士的反动统治

反对外国武装干涉胜利之后，华雷斯镇压了各地反对革新的保守派叛乱。这个旧的教权主义保守集团，由于投靠外国侵略者而逐渐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1871年，华雷斯第四次当选为总统。1872年7月18日，他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依照宪法规定，最高法院院长莱多继任总统。莱多任职期间，由于背离华雷斯的政策，引起国内的普遍不满。同时，旧日的护宪派分裂了。一批在内战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中发财致富的将军，因收买教会财产而成长的新地主和亲美资产阶级聚集在狄亚士的周围，组成新保守派，反对华雷斯的革新政策。

波菲里奥·狄亚士（1830~1915年）原是华雷斯手下的一个将军。在战争中从事土地投机而发财，变成一个大地主。1872年同华雷斯竞选总统，失败后发动叛乱，被镇压。1876年，他再次发动军事政变，攫取了总统职位。

从1876年至1911年，狄亚士统治墨西哥长达34年之久，其间只在1880年至1884年间，由他安置的一个傀儡冈萨斯任过一期总统，但实权还是操在他手里。

狄亚士政权代表外国资本家、新旧大地主、天主教会和各种反动势力的利益。他的政治指导原则是：“面包或是棍棒”。他给一切拥护他的人以“面包”，即用“官职和金钱”换取他们的支持；他给一切反对他的人以“棍棒”，即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打击和迫害，凡是落在他手中的反对者，统统被置于死地。

首先得到狄亚士政权好处的是大地主。1883年，颁布垦荒法令，成立专门的土地测量公司，调查荒地。凡拿不出证明文件的印第安农民的土地，都

被宣布为荒地，贱价卖给或者无偿地赐给那些拥护他的地主、将军、政客和外国资本家。在他统治时期，土地的集中达到极其惊人的地步。在下加利福尼亚有近三千万英亩土地分给了四个人。到 1910 年，墨西哥一半面积的土地属于不满 3000 户的大地主。这些大地主把土地交给雇佣的管事人经营，而自己则住在墨西哥京城或巴黎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从事农业劳动的 1000 万墨西哥人中，有 950 万人以上没有土地，大约有 500 万印第安人，被剥夺了土地，沦为债役制农民。

狄亚士对天主教会采取勾结、笼络和控制的政策。他通过妻子的宗教顾问，与大主教拉拔斯提达成秘密协约：以后教职的委任须征得他的同意。他允许重新设立一些寺院和修道院，让教会收回了许多特权，使教会得以重新聚敛财富，购买地产并垄断教育，成为独裁统治的工具。

狄亚士出卖墨西哥资源，允许外国资本家在墨西哥开采矿山、开办工厂、修建铁路、经营种植园。1887 年，狄亚士政府颁布法令，规定开采煤、石油、水银、天然气和其他矿产，除征收少量印花税外，一律免收国家税及地方税。这样，外国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便如潮水一般地涌向墨西哥。1900 年，美国资本家以每英亩略高于一美元的代价，霸占了墨西哥的大片油田，掌握了墨西哥油田、石油工业的一半以上、矿山的四分之三左右。为了建筑铁路，狄亚士政府付给外国铁路公司每公里 6000~10,000 比索的津贴。结果，外国公司控制了墨西哥铁路的修建和经营。1884 年，49 家外国公司经营 3500 英里的铁路线。外国资本家还大量购买土地，渗入农业部门。美国“索诺拉土地牛只公司”拥有 130 万英亩的土地，新闻巨头赫斯特拥有 250 万英亩土地，“帕洛马斯土地牛只公司”在奇瓦瓦州的地产达 200 万英亩。他们开办咖啡、甘蔗、烟草、柑桔、橡胶种植园，残酷剥削墨西哥农民。除美国资本外，英国主要投资于石油、贵金属、糖、咖啡和公用事业等方面，法国主要投资于纺织业，德国则主要控制五金业和医药业。外国垄断资本掌握了墨西哥的经济命脉。

狄亚士政权对外国资本家如此“忠顺”和“慷慨”，而对本国劳动人民则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以，狄亚士的独裁统治，有人称之为“外国人的亲娘，她自己子女的后母”。这种情况促使墨西哥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迅速激化。

在农村，丧失土地、深受地主剥削压迫之苦的农民，掀起了争取土地的武装斗争。1909 年的农业灾荒，逼使饥饿的农民投入革命队伍。农民运动的主要根据地是北部的奇瓦瓦州、南部的莫瑞洛斯州。在北部，农民运动的领袖是维亚（1877~1923 年），他出身于债农家庭，16 岁时因打死强奸他姐妹的地主管事，逃入山中，联合被压迫的农民兄弟，组织游击队，在奇瓦瓦一带，没收地主的财产，把土地分给农民，影响日益扩大。在南部，农民运动的领袖是沙巴达（1877~1919 年），他出身于莫瑞洛斯州贫农家庭，在地主的残酷剥削下，父母早亡，少年时就积极参加本村农民收回土地的斗争。

大事年表

公 元	外 国	中 国
1640 年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	
1641 年	爱尔兰反英大起义	
1642 年 8 月 ~	英国第一次内战	
1646 年 7 月		
1642 年		李自成于襄阳称新顺王
1644 年 3 月		张献忠克武昌，称大西王。
		沙俄开始侵犯中国的黑龙江流域。李自成率义军由西安攻入北京，明帝崇祯自缢，明亡。
10 月		中国清政府定都北京
1645 年	英国国会军在纳斯比大捷	
1646 年		郑成功入海岛抗清
1647 ~ 1648 年	意大利那不勒斯反抗西班牙统治的人民起义	
1648 年	英国第二次内战	
1648 ~ 1649 年	法国巴黎“福隆德”运动	
1648 ~ 1651 年	波兰的华沙与波兹南等地农民起义	
1648 ~ 1654 年	乌克兰反抗波兰贵族统治的民族起义	
1649 年	英国掘土派运动和平等派运动。英国宣布为共和国。	

续表

公 元	外 国	中 国
1649 年 8 月 ~ 1652 年 5 月	沙俄用法律形式确立农奴制 克伦威尔镇压爱尔兰民族起义	
1652 年	荷兰东印度公司侵占南非开普	
1652 ~ 1654 年	第一次英荷战争	
1653 年		清定一条鞭法
1653 ~ 1658 年	克伦威尔在英国军事独裁	
1654 年	沙俄兼并乌克兰	
1655 年	英国侵占牙买加	
1656 年	印度马拉特人起度开始	
1659 年	南非霍屯督人第一次抗荷战争	
1660 年	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	
1662 年		郑成功赶走荷兰殖民者 收复台湾
1665 ~ 1667 年	第二次英荷战争	
1667 ~ 1668 年	法国与西班牙、荷兰发生战争	
1668 年		中国军民在雅克萨城粉碎沙俄侵略军
1670 ~ 1671 年	俄国斯切潘·拉辛起义	
1672 ~ 1674 年	第三次英荷战争	
1672 ~ 1678 年	法荷战争	
1673 年		吴三桂反清，三藩之乱起
1673 ~ 1677 年	南非霍屯督人第二次抗荷战争	
1674 年	马拉特人建立独立国家	
1674 ~ 1675 年	法国里昂、布列塔尼两郡农	

续表

公 元	外 国	中 国
1674 ~ 1676 年	民起义 意大利墨西拿反抗西班牙统治 的人民起义	
1674 ~ 1679 年	印尼杜鲁诺·佐约反荷起义	
1677 ~ 1685 年	匈牙利农民起义	
1680 年	捷克农民起义	
1681 年		清军以湘、粤、川三路攻云南，吴世璠自杀，三藩之乱平
1683 ~ 1699 年	奥土战争	
1683 ~ 1719 年	印尼苏拉巴蒂反荷起义	
1684 年		清在台湾设府县，属福建省
1685 年		英人在广东设商馆。正式对华通商
1688 年 11 月	英国推翻斯图亚特复辟王朝的政变	
1693 年		中俄订立尼布楚条约。中俄订立北京通商条款
1695 ~ 1696 年	沙俄发动两次对土耳其的战争	
1698 年	彼得一世改革开始	
1698 年	俄国与瑞典进行“北方战争”	
1700 ~ 1721 年	普鲁士王国成立	
1701 年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1701 ~ 1713 年	法国“卡米札尔”起义	
1702 ~ 1705 年	匈牙利人民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起义	
1703 ~ 1711 年	瑞典军在波尔塔瓦与俄军决战	
1709 年 6 月	中惨败	

续表

公 元	外 国	中 国
1710 ~ 1711 年	俄土战争	
1710 ~ 1715 年	印度锡克教徒在旁遮普起义	
1713 年	沙俄迫使瑞典签订尼斯塔特和约	清封班禅为额尔德尼
1721 年		
1727 年		中俄签订布连斯奇条约
1729 年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起义	清政府推行地丁制
1730 ~ 1731 年	法国与俄、奥发生战争	
1733 ~ 1735 年	伊朗纳狄尔王朝	
1736 ~ 1747 年	印尼“红溪”事件	
1740 年 1740 ~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1748 年	秘鲁印第安人起义	
1742 年	奥女皇玛丽亚·特利萨改革	
1749 ~ 1775 年	日本久留米农民起义	
1754 年	七年战争	
1756 ~ 1763 年	普拉西战役	
1757 年 6 月 23 日		
1760 年		
1761 年 1 月 14 日	印度巴尼帕特战役。阿富汗人打败了马拉特人	全部新疆入归中国
1762 年		
1763 年		
1764 年	英国强迫伊朗签订奴役性条约。英国建立塞内冈比亚直辖殖民地。英国禁止北美十三州人民向西移殖 英国哈格里沃斯发明“珍妮纺纱机”	清政府勘查中俄边界

续表

公 元	外 国	中 国
1765 年	英国在北美十三州颁布“印花税法”	
1767 年	俄国同波兰缔结保证条约	
1767 ~ 1799 年	迈索尔战争。英国凯伊和海斯共同发明水力纺纱机	
1768 ~ 1774 年	俄土战争	
1769 年	英国瓦特制成单向蒸汽机（1782 年又制成双向蒸汽机）	
1770 年	波士顿惨案	
1771 年	英国阿克莱特建成第一个水力棉纺纱厂	
1771 ~ 1802 年	西山农民起义	
1772 年 8 月	俄普奥第一次瓜分波兰	
1773 ~ 1775 年	俄国普加乔夫起义	
1774 年	英属北美十三州第一届大陆会议。英国侵入印度奥德	山东白莲教起义
1775 年	英属北美十三州第二届大陆会议	
1775 ~ 1785 年	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改革发表《独立宣言》，建立美利坚合众国	
1776 年 7 月 4 日		
1777 年	萨拉托加大捷。美国制定“邦联条款”	
1779 年	南非科萨人反布尔殖民者的战争，从此开始持续 100 年的“卡弗尔战争”	
1780 ~ 1781 年	秘鲁印第安人大起义。新格纳达（哥伦比亚）“公社”	

续表

公 元	外 国	中 国
1781 年	起义 英将康瓦利斯在约克镇向美 兰州回民起义 军投降。奥皇约瑟夫二世宣 布取消农奴制	
1781 ~ 1789 年	奥皇约瑟夫二世改革。捷克 废除农奴制	
1782 年		广东十三公行成立
1783 年	《凡尔赛和约》，英国承认 美国独立。俄国吞并格鲁吉 亚	
1784 ~ 1785 年	匈牙利农民起义	
1785 年	英国卡特莱特发明水力织布 机	
1786 ~ 1787 年	美国谢斯起义	
1787 年	美国颁布“联邦宪法”。日 本抢米大暴动	
1787 ~ 1791 年	俄土战争	
1788 年	俄国与瑞典战争	
1789 年	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 统	
1789 ~ 1794 年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1789 年 5 月 5 日	法国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开幕	
7 月 14 日	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	
8 月 27 日	制宪会议通过《人权宣言》	
1790 ~ 1803 年	海地黑人奴隶独立解放战争	
1791 年	波兰国会通过废除“自由否 决权”新宪法。法国制宪会 议通过宪法和《露白利法》。 普奥联合声明，扬言	

续表

公 元	外 国	中 国
1792 年 4 月 20 日	武装干涉法国革命 法国对普奥宣战	
8 月 10 日	巴黎人民起义，推翻君主立 宪派	
9 月 20 日	法军在瓦尔米大败普奥联军 法国废除君主制，宣布法兰	
9 月 22 日	西第一共和国成立 俄普第二次瓜分波兰。	
1793 年 1793 年 2 月	英国联合普、奥、西和那不 勒斯等国组成第一次反法联 盟	
5 月 31 ~ 6 月 2 日	巴黎人民起义，推翻吉伦特 派统治 雅各宾派专政	
1793 年 6 月 2 日 ~ 1794 年 7 月 27 日 1794 年	科修斯古领导波兰民族民主 革命 法国“热月”政变	
1794 年 7 月 27 日	俄普奥第三次瓜分波兰	
1795 年 1795 年 4 ~ 5 月	巴黎人民两次掀起反对热月 党统治的起义	
6 ~ 10 月	法国王党分子在基贝隆半岛 和巴黎先后发动反革命叛乱 巴贝夫领导“平等派密谋团” 的运动	
1795 ~ 1796 年	法国督政府统治	
1795 ~ 1799 年		

续表

公 元	外 国	中 国
1796 年	伊朗卡扎尔王朝建立	贵州苗民起义
1796 ~ 1797 年	拿破仑·波拿巴在意大利击败奥军	英国侵略中国的澳门
1797 年		
1798 ~ 1799 年	拿破仑远征埃及失败	
1798 年 10 月	埃及开罗人民第一次反法起义	
1798 年底	英俄纠集土、奥、那不勒斯等国组成第二次反法联盟	
1799 年	英国侵占迈索尔	
1799 年 11 月 9 日	拿破仑“雾月十八日政变”	
1799 ~ 1804 年	法国执政府统治	
18 世纪末	英国侵占澳大利亚、新西兰。 沙俄侵占北美阿拉斯加	
1800 年	荷兰东印度公司解散	
1800 年 3 月	埃及开罗人民第二次反法起义	
1801 年	英国正式兼并爱尔兰。西非阿散蒂人民持续 100 年的抗英战争开始	
1801 ~ 1805 年	美国侵略的黎波里	
1802 年	英法签订亚眠和约，第二次反法联盟瓦解。越南阮氏王朝建立	
1803 年	美国从法国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	
1804 年 1 月 1 日	海地正式宣布独立	
5 月	拿破仑废除共和制，建立法	

续表

公 元	外 国	中 国
1804 ~ 1830 年	兰西第一帝国	
1805 年	塞尔维亚人民起义 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建立	
1805 年 4 月	英俄奥等国组成第三次反法联盟，于同年 12 月瓦解	
1806 年	英国取代荷兰统治南非开普。莱茵同盟成立。拿破仑占领荷兰。拿破仑废除“神圣罗马帝国”。拿破仑宣布“大陆封锁令”	
1806 年 9 月	俄、英、普、瑞典等国组成第四次反法联盟，翌年瓦解	
1806 ~ 1812 年	俄土战争	
1807 年	提尔西特和约。富尔顿发明汽船	
1807 ~ 1808 年	拿破仑先后侵占葡萄牙、西班牙	
1807 ~ 1812 年	普鲁士斯泰因和哈登堡改革 沙俄侵占瑞典统治下的芬兰。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开始实行改革。英国将塞拉利昂变成直辖殖民地	英国攻澳门炮台，未果
1808 年	西班牙反法战争	
1808 ~ 1814 年	英奥组成第五次反法联盟	
1809 年	(于同年瓦解)。“烧炭党”建立 拉丁美洲殖民地独立革命战	清政府禁止外国商船的护货兵船入港
1810 ~ 1826 年		

续表

公 元	外 国	中 国
	争	
1810年9月16日	墨西哥宣布独立	
1811年	委内瑞拉和巴拉圭宣布独立	
1811 ~ 1812年	英国“卢德运动”高潮	
1812年	沙俄迫使土耳其签订布加勒斯特和约，从摩尔达维亚公国夺走比萨拉比亚	
1812年6 ~ 12月	拿破仑侵俄战争失败	
1812 ~ 1814年	英美第二次战争	
1813年	英、俄、普、西、瑞典等国组成第六次反法联盟	天理教徒起义
1813年10月24日	沙俄强迫伊朗签订古利斯坦条约，割去伊朗大片领土	
1814年	反法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仑退位，波旁王朝复辟。斯蒂芬逊制成第一台蒸汽机车	英船侵入虎门。清政府下令捕捉英美走私船
1814年10月1日 ~ 1815年6月9日	维也纳分赃会议	
1815年3月20日 ~ 6月22日	拿破仑的“百日王朝”	
1815年6月18日	滑铁卢会战	

续表

公 元	外 国	中 国
1815 年	“神圣同盟”成立。德意志联邦成立。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	清政府定查禁鸦片章程
1816 年 7 月	阿根廷宣布独立	广东梅县天地会员起义。 云南彝族高罗衣起义
1817 年	巴西伯南布哥起义 智利宣布独立	
1818 年	马克思诞辰	英国侵入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地
1818 年 5 月 5 日	英国侵占新加坡。“彼得卢大屠杀”。大哥伦比亚共和国成立	
1819 年	葡萄牙资产阶级革命	
1820 年 8 月	恩格斯诞辰	
11 月 28 日	意大利先后爆发那不勒斯革命和皮蒙特革命	
1820 ~ 1821 年	西班牙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	
1820 ~ 1823 年	墨西哥和秘鲁宣布独立	
1821 年	希腊独立运动	
1821 ~ 1829 年	巴西宣布独立，建立帝国	
1822 年	墨西哥人民粉碎帝制复辟，建立联邦共和国	
1822 ~ 1824 年	中美联合省成立。“门罗宣言”。法国武装干涉西班牙	清政府重申在沿海口岸禁止私运鸦片
1823 年		

续表

公 元	外 国	中 国
	革命	
1825 年	玻利维亚宣布独立。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	
1825 ~ 1830 年	印尼蒂博尼哥罗领导爪哇人民起义	
1826 ~ 1828 年	俄伊第二次战争	
1828 年	乌拉圭宣布独立。美国民主党成立。沙俄强迫伊朗签订土库曼条约，吞并南高加索	
1828 ~ 1829 年	俄土战争，俄国夺得高加索黑海沿岸（巴统除外）和多瑙河口地区	
1829 年	塞尔维亚自治。希腊独立。	
1830 年	委内瑞拉、厄瓜多尔脱离大哥伦比亚自立为共和国	
	法国开始侵略阿尔及利亚	
1830 年 7 月 27 ~ 29 日	法国七月革命，推翻波旁复辟王朝	
1830 年 8 ~ 11 月	比利时革命，宣布脱离荷兰独立	
1830 ~ 1831 年	波兰反抗沙俄的民族起义。英国斯温暴动高潮	
1830 ~ 1848 年	法国七月王朝	
1831 年	法国里昂职工第一次起义。英国人民群众斗争高涨。马志尼建立“青年意大利党”。美国纳特·特纳奴隶起义	
1831 ~ 1833 年	土埃第一次战争	

续表

续表

公 元	外 国	中 国
1839 年 5 月	布郎基领导的“四季社”在巴黎起义。递交请愿书	
1839 ~ 1841 年	土埃第二次战争	
1840 年 6 月 ~ 1842 年 8 月		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
1840 年	巴黎 6 万工人大罢工。英国侵入北婆罗州	
1841 年	英伊条约。阿富汗喀布尔起义	
1841 年 2 月 26 日 5 月 30 日	天保改革	英军攻占虎门诸炮台 三元里人民严惩英国侵略军
1841 ~ 1843 年	英国夺取纳塔尔。《莱茵新闻》在科伦创办	
1842 年		中英签订南京条约
1844 年	多米尼加共和国成立。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	洪秀全创立革命组织拜上帝会
1845 年	英国占领印度旁遮普	中美望厦条约签订。中法黄埔条约签订
1845 ~ 1846 年	印度锡克教徒第一次抗英战争	
1846 年	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创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沙俄吞并大帐哈萨克	
1846 ~ 1848 年	美国侵略墨西哥战争	
1847 年	非洲利比里亚共和国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德国工人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	

续表

公 元	外 国	中 国
	盟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6月） 和第二次代表大会（11～12月）	
1848年1月	西西里巴勒摩人民起义	
2月	《共产党宣言》问世。法国二月革命，七月王朝被推翻，建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3月	维也纳人民起义和柏林三月革命。意大利米兰起义。匈牙利布达佩斯起义。摩尔多瓦雅西三月革命	
4月	“科伦工人协会”成立	
1848年5月	维也纳五月起义	
6月	罗马尼亚起义进入高潮，遭沙俄血腥镇压。捷克布拉格人民起义。马克思恩格斯在科伦创办《新莱茵报》	
6月23～26日	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	
10月	维也纳十月起义	
12月	路易·波拿巴当选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	
1848～1849年	印度锡克教徒第二次抗英战争。德国法兰克福议会制定统一帝国宪法。匈牙利革命，遭沙俄血腥镇压	
1848～1852年	伊郎巴布教徒起义	
1849年	英国吞并旁遮普，整个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罗马尼亚共和国成立。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	

续表

公 元	外 国	中 国
1850 年 8 月		沙俄侵入中国黑龙江口和库页岛，占领庙街
1851 ~ 1864 年		太平天国革命
1851 年 12 月	路易·波拿巴班变，一年后即位，称拿破仑三世，建立法兰经二帝国	
1852 年	南非共和国成立。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英国国会通过自由贸易原则	
1853 年 9 月		上海小刀会起义
1853 ~ 1856 年	史里木战争	
1854 年	美国强迫日本签订日美亲善条约。美国国会通过“堪萨斯—尼布拉斯加法案”。美国共和党成立	
1855 年	美国试验蒸汽犁成功	广东天地会起义
1856 年	英国强迫摩洛哥签订不平等条约。俄与英、法、土、撒丁签订巴黎和约	各路捻军首领会盟于亳州雒河集
1856 ~ 1857 年	英伊战争	云南回民起义
1856 年 10 月 ~ 1860 年 10 月		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7 年	奥马尔围攻塞内加尔河流域	

续表

公 元	外 国	中 国
1857 ~ 1859 年	的法国殖民据点麦地那堡。 流亡美国的爱尔兰爱国者组成“芬尼亚党”。美国“得累德·斯科特判决案”	
1858	印度民族大起义 英国宣布东印度公司解散，由英国女王直接统治。法国武装侵略越南。美荷俄英法等国先后强迫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	清政府与英、法、俄、美分别签订天津条约
1859 年	法意对奥战争。美国约翰·布郎起义	
1860 年	意大利西西里农民起义。英国伦敦工人组成“伦敦工人委员会”。美国工人成立“全国工人同盟”。林肯当选为总统	美国流氓华尔在上海组成“洋枪队”
1860 年 10 月		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中英、中法签定北京条约
11 月		沙俄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
1860 ~ 1864 年	越南张定领导的抗法斗争	
1861 年	英国吞并西非拉各斯	清政府设总理衙门，经办“洋务”。贵州各地群众反洋教斗争

续表

公 元	外 国	中 国
1861 年 2 月	美国南部七州宣布成立“美利坚诸州同盟”	
3 月	俄国颁布废除农奴制法令。意大利王国成立	
3 ~ 9 月	俄国侵占日本的对马岛	
1861 年 4 月 ~ 1865 年 4 月	美国南北战争	
1861 ~ 1866 年	普鲁士“宪法纠纷”	
1862 年	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林肯颁布《宅地法》和《奴隶解放宣言》。伦敦举办世界工业博览会。第一次西贡条约。法国侵占南圻东部三省	
1862 ~ 1867 年	墨西哥人民反法战争	
1863 年	柬埔寨沦为法国保护国。“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波兰起义。英法工人代表在伦敦举行声援波兰起义大会。法国强迫摩洛哥签订不平等条约	
1863 ~ 1873 年	朝鲜大院君执政,实行锁国政策	
1864 年 9 月 10 月 7 日	第一国际成立	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又劫夺我国西部地区 44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是年	突尼斯人民起义。法国废除	

续表

公 元	外 国	中 国
	“霞白利法”。普奥对丹麦战争	
1865年4月9日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	
4月14日	林肯被刺	
是年	沙俄侵占中亚浩罕汗国。法国强迫突尼斯签订不平等条约	洋务派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英国汇丰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
1866年	普奥战争。意大利对奥宣战	
1866年7月	美国侵略朝鲜失败	
9月	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	
10月	法国侵略朝鲜失败	
是年	萨摩、长州结成倒幕同盟	
1867年6月		美军侵犯我台湾,被我台湾各族人民击退
9月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第一国际洛桑代表大会	
10月	日本睦仁天皇对萨摩、长州两藩下讨幕密诏。幕府上书天皇,“奉还大政”	
是年	美国国会通过南方“重建法案”。美国从沙俄手中购得阿拉斯加。爱尔兰芬尼亚党起义。奥匈帝国建立。北德意志联邦成立。英国第二次国会改革法。加里波	

续表

公 元	外 国	中 国
	第红衫军进军罗马失败。 法国侵占越南南圻西部三省	
1867 ~ 1868 年	埃塞俄比亚抗英斗争	
1868 ~ 1873 年	日本明治维新	
1868 年	日本明治政府成立。第一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巴枯宁在瑞士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沙俄侵占中亚布哈拉汗国	
1868 ~ 1869 年	日本国内战争，德川幕府被推翻	
1868 ~ 1878 年	古巴十年解放战争	
1869 年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成立。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	
1870 年 4 月 22 日	列宁诞辰	
6 月		天津人民反洋教斗争
1870 ~ 1871 年	普法战争	
1870 年 7 月 19 日	法国对普鲁士宣战	
1870 年 9 月 1 日	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战败投降	
9 月 4 日	巴黎人民革命，第二帝国崩溃，“国防政府”成立，法国宣布为共和国	
9 月 20 日	意大利政府军和加里波第志愿队占领罗马	
10 月 31 日	巴黎人民武装起义	

续表

公 元	外 国	中 国
1871 年 1 月	意大利王国首都从佛罗伦萨迁至罗马	
1 月 18 日	德意志帝国成立	
1 月 22 日	巴黎人民再次武装起义	
1 月 28 日	法国“国防政府”向德国投降，签订停战协定	
2 月 26 日	法德预备和约签订	
3 月	德国天主教中央党成立	
3 月 18 日	巴黎无产阶级武装起义胜利	
3 月 28 日	巴黎公社成立	
4 月	阿尔及利亚人民反法大起义。 德国通过帝国宪法	
4 月 2 日	凡尔赛政府开始对巴黎公社发动反革命武装进攻	
5 月	朝鲜击退美国侵略军	
5 月 10 日	凡尔赛政府同德国签订法兰克福和约	
5 月 21 ~ 28 日	巴黎“五月流血周”	
7 月 4 日		沙俄派兵侵占中国的塔城和伊犁
9 月	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是年	日本废藩置县	
1872 年 9 月	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是年	印度锡克教徒起义。日本宣布琉球为其属地	
1872 ~ 1873 年	日本土地与地税改革，废除封建身份制	
1872 ~ 1882 年	印度农民起义	
1873 年 12 月 21 日	黑旗军与越南人民的河内城	

续表

公 元	外 国	中 国
日 是年	外大败法国侵略军 沙俄侵占中亚希瓦汗国。三 皇同盟条约签订	
1874 年	法越第二次西贡条约	日本发动侵略中国领土台 湾的战争遭惨败
1875 年 1 月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通 过	
5 月	德国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 派在哥达召开合并大会 ,成 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1890 年改名为德国社会 民主党)	
7 月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民 族起义	
是年	南俄工人协会成立	
1876 年	第一国际费城代表会议 ,宣 布“国际”解散。日本强迫 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沙俄吞 并浩罕汗国。美国工人党成 立(次年改名为美国社会主 义工党)。英国维多利亚女 王宣布为印度女皇	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烟台条 约 , 结束所谓“马嘉理案”
1877 年		中国军队收复南疆 , 阿古柏 政权垮台
1877 ~ 1878 年	俄土战争	
1878 年 3 月	沙俄迫使土耳其签订圣斯 特凡诺和约	

续表

公 元	外 国	中 国
6 月 是年	柏林会议。英国侵略塞浦路斯 俄国北方工人协会成立。德国 议会通过“非常法”。塞尔维亚、 门的内哥罗、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获得独立。英国托马 斯发明托氏炼钢法	
1878 ~ 1880 年	阿富汗第二次抗英战争	
1879 年 12 月 21 日 是年	斯大林诞辰	
1880 年	南非祖鲁人抗英战争。埃及祖 国党成立。日本正式吞并琉 球,改为冲绳县。法国工人党 成立。西班牙社会主义工党成 立。爱尔兰“土地同盟”成立。 俄国“土地与自由社”分裂成 “黑分社”和“民意党”	
1880 ~ 1881 年	第一次英布战争	
1881 年	法国侵占突尼斯。美国“劳联” 成立。英国民主同盟成立 (1884 年改名为社会民主同 盟)。日本自由党成立	中俄伊犁条约签订
1881 ~ 1900 年	苏丹马赫迪反英起义,建立国 家	

续表

公 元	外 国	中 国
1882 年 5 月 20 日 是年	德、奥匈、意三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 日本立宪改进党成立。朝鲜壬午兵变。朝日仁川条约签订。埃及阿拉比领导的抗英战争。英国侵占埃及。奥地利工人党成立。意大利工人党成立。法国工人党分裂。德国殖民协会建立	
1882 ~ 1885 年	非洲马尔加什人民第一次抗法战争	
1882 ~ 1898	西非萨莫雷领导的抗法战争	
1883 年 3 月 14 日	马克思逝世	
10 月	普列汉诺夫在日内瓦成立“劳动解放社”	
1883 年 12 月 ~ 1885 年 6 月		中法战争
1884 年 5 月 11 日		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中法简明条约，承认法国占有全部越南
是年	法越巴特诺条约签订。甲申政变。沙俄侵占全部土库曼。英国第三次国会改革。费边社成立。德国占领南非的安格腊贝昆纳和西非的多哥、喀麦隆	
1884 ~ 1885 年	柏林会议讨论刚果问题	
1885 年 6 月		清政府与法国签订天津条

续表

公 元	外 国	中 国
是年	英国占领贝专纳、尼日利亚。印度国民大会党成立。比利时工人党成立。俄国莫洛佐夫工厂工人罢工。德国占领伊里安岛的东北部和马绍尔群岛及东非的坦噶尼喀	约，中法战争结束
1886年5月1~4日	美国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罢工斗争（即五一大罢工）	
是年	缅甸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德瓜分东非的第一次协定	
1887年	印度支那联邦成立。挪威工人党成立。埃塞俄比亚第一次击败意大利侵略军	
1887~1894年	布朗热运动	
1887~1913年	安世农民起义	
1888年	巴西废除奴隶制	清政府北洋海军建立，并设立海军衙门
1889年7月14日	第二国际巴黎成立大会	
10月	第一次泛美会议在华盛顿召开	
11月	巴西推翻君主制度，成立联邦共和国	
是年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成立。英	

续表

公 元	外 国	中 国
1890 年	国新工联运动。日本宪法颁布。瑞士社会民主党成立。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 英德瓜分东非的第二次协定。英国完成了对肯尼亚的占领。伦敦 20 万民人举行第一次五一国际劳动节示威游行。德国废除“非常法”，俾斯麦下台	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中印藏印条约，1893 年又订立藏印条款
1891 年 8 月 是年	第二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德国泛德意志协会成立。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成立	
1892 年	菲律宾“卡蒂普南”成立。古巴革命党成立。巴西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召开。意大利社会党成立。英国独立工党成立。老挝沦为法国保护国。洛本古拉领导马达别人民抗英战争	
1893 年 8 月 12 月 12 月 26 日	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 法俄建立军事同盟	毛泽东诞辰
1893 ~ 1898 年	美国逐步吞并夏威夷群岛	
1894 ~ 1895 年	甲午农民战争（东学党起义）	中日甲午战争
1894 年 11 月 是年	英日条约签订。美日条约签	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

续表

公 元	外 国	中 国
1894 ~ 1900 年 1895 年 4 月	订。土耳其统一和进步党 成立 德雷福斯事件	日本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 条约，中日甲午战争结束。 康有为“公车上书”
8 月 5 日 1895 年 10 ~ 12 月	恩格斯逝世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 协会成立	
1895 ~ 1896 年	埃塞俄比亚第二次打败意 大利侵略军	
1895 ~ 1898 年 1896 年 6 月 3 日	古巴第二次独立解放战争	沙俄攫取了在中国东北修 筑中东（东清）铁路等特权
7 ~ 8 月 是年	第二国际伦敦代表大会 马达加斯加沦为法国殖民 地。“亚眠宪章”	
1896 年 1897 年 4 ~ 9 月 10 月	菲律宾资产阶级革命开始 希土战争	梁启超等在长沙创办时务 学堂 德国出兵侵占胶州湾
11 月 14 日 12 月 25 日 1897 ~ 1898 年		沙俄舰队侵占旅顺口、大连 湾，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 分势力范围
1898 年 1 月		谭嗣同等于长沙设“南学 会”
1898 年 3 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 代表大会	德国迫使清政府订立胶澳 租

续表

公 元	外 国	中 国
4 月		界条约，强租胶州湾。沙俄强迫清政府订立旅顺大连租地条约。 法国强租广州湾。康有为等在北京成立保国会
4 ~ 12 月	美西战争	英国强租九龙半岛包括深圳、大鹏两海湾
6 月 9 日		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百日维新”开始
6 月 11 日		
6 月 12 日	菲律宾宣布独立	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威海卫租约
7 月		
9 月	英国吞并苏丹	
9 月 21 日		那拉氏发动宫廷政变
9 月 ~ 10 月	法硕达冲突	
是年	日本片山潜建立社会主义研究会。爱尔兰社会党成立。美国侵占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	
1899 年 9 ~ 12 月		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义和团在恩县、平原一带发动武装起义
是年	“米勒兰”事件。德国侵占加罗林群岛和马利亚纳群岛	
1899 ~ 1900 年	腊巴赫领导乍得人民抗法斗争	
1899 ~ 1902 年	英布战争	
1899 ~ 1906 年	菲律宾反抗美国侵略斗争	

续表

公 元	外 国	中 国
1900 年夏		义和团进入北京、天津，控制清朝统治心脏地区
6 月 17 日		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口
8 月		义和团保卫北京的战斗。八国联军攻陷北京
9 月	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	
是年	英国工人代表委员会成立（1906 年改名为工党）。日本政友会创立	

